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文化學院
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

碩士論文

「我是不是我的我」：
以生命史取向分析李登輝國族認同的發展階段

I Am Myself not Belonging to Me: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Teng-hui Lee's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Life History Approach

研 究 生：李建宏

指導教授：許維德 博士

2019 年 7 月

「我是不是我的我」：以生命史取向分析李登輝國族認同的發展階段

I Am Myself not Belonging to Me: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Teng-hui Lee's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Life History Approach

研 究 生：李建宏　　Student： Chien-Hung Lee

指導教授：許維德　　Advisor： Wei-der Shu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客 家 文 化 學 院

客 家 社 會 與 文 化 學 程

碩 士 論 文

A Thesis

Submitted to Degree Program of Hakka Society and Culture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In

Degree Program of Hakka Society and Culture

July 2019

Hsinchu,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民國一〇八年七月

「我是不是我的我」：

以生命史取向分析李登輝國族認同的發展階段

摘要

本研究旨在以生命史取向的方式，分析李登輝的國族認同發展狀態；其中核心的理論運用，源自 William E.Cross 的「黑人化心理學（Psychology of Nigrescence）發展模型」。本研究取材自主人翁李登輝相關的傳記資料，在各個不同生命時期裡，找尋其表現出的生命故事與國族認同發展之間的相關聯。於此當中筆者最為關心的，是李登輝從早先的日本認同，過渡到中國認同，最後又發展成為台灣認同的相關原因與發展脈絡。

上一世紀中的台灣，由於經歷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束，中國國民黨政權隨後的到來，導致生長於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必須面對新國籍的認同極端轉變以及新的語言、文化學習與適應。但由於國民黨政府實施了威權統治的手段，長期受困於外來政權統治的台灣百姓，在白色恐怖橫行的詭譎年代中，不自覺產生了台灣本土意識與對抗權體制的心，這亦是台灣認同生成的原型。本研究正是順著此大時代背景，逐一檢索李登輝自童年時期開始，一直到青少年、青年、成年以後，身處不同的場域與家庭環境的改變之中，爬梳形塑李登輝內心國族認同何以轉變的原因。

就在李登輝順利放下日本認同、逐漸生成中國認同之後，李登輝的生命史亦同步進入到了踏入職場與組成家庭的過程之中。在這段進入政府體制服務前的平民歲月，李登輝接觸信仰、在專業上力求表現，也遇到了在中國認同之外，更加令他困擾的省籍問題。這也就是台灣人在追尋國族認同的過程之中，特殊有的省籍意識符號。中國認同不僅存在著忠於國家的表徵，也存在著台灣這塊土地上特有的族群問題記號。其後在李登輝選擇加入中國國民黨、進入國家體制內服務以後，省籍意識才逐漸離開李登輝的國族認同，漸漸朝向更單純的中華民國認同。

在 2000 年李登輝卸任國家元首以前，於中華民國體制內扶搖直上的他，一直都與中華民國認同產生緊密的連結；但也是在卸任前十年的期間，以「中華民國在台灣」為其過渡框架的台灣認同漸漸浮現。卸任元首後，逐漸清晰地看見李登輝朝向「台灣獨立」的台灣認同前進，並且澈底摘下了「中華民國／中國認同」；即使台灣獨立的標籤，仍然有若干不同程度的解釋可能。日本認同、中國認同、最終的台灣認同，這是一個長達 93 年的生命史、近一世紀的國族認同發展研究。

關鍵字：李登輝、生命史、國族認同、台灣獨立、黑人化心理學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identify Teng-hui Lee (1923 -)'s national identity development through a life history approach. The core theory which is applied in this thesis is originated from William E.Cross (1940 -)'s Psychology of Nigrescence development model. This thesis is obtained from the biography resources about Teng-hui Lee, indic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life 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national identity in each life period. Attempting to explain the reason why Teng-hui Lee's national identity changed from Japan to China and eventually to Taiwan through this developing context.

Taiwan, in the 20th century, underwent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nd the arr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KMT). The change of regime forced Taiwanese people to face an extreme change in their new national identity, making them learn a new language and adapt to new cultures. The KMT government's authoritative domin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white terror, and the long age of being trapped by foreign regimes triggered off Taiwanese people's lo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thought of antagonizing, which is also the prototype of Taiwan identity. This research would base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mentioned above, contrasting Teng-hui Lee's childhood, adolescence and adulthood with the change in his clan history and being in different fields individually. This could clarify the reason why Teng-hui Lee's national identity has changed and how it was shaped.

While Teng-hui Lee's national identity changed from Japan into China, his life history has come to the period of entering the workplace and forming a family. During the civilian ages before Teng-hui Lee entered the government system, he had faith, pursue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and encountered the provincial problems that bothered him. Provincial consciousness is a particular problem that Taiwanese people will face while searching for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The Chinese identity is not only represented as national identity but also includes the problem peculiar to Taiwan, which is the rivalry between the mainlanders and the islanders. After Teng-hui Lee joined KMT, entering the government agency, he gradually changed his Chinese identity into a simpler one, the Republic of China(R.O.C) identity, 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in provincial consciousness.

Teng-hui Lee rose directly to a high position in the KMT government, serving as the president of R.O.C at last. His perspective was always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R.O.C identity, but before the decade of his resignation, the transitional concept of mak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as his Taiwan identity gradually emerged. After he resigned the position as the president, he abandoned "the R.O.C / China identity" and generated a Taiwan identity with the aim of "Taiwan independence", although there may be various explanations. The 93 years life history of Teng-hui Lee, went through Japan, China and Taiwan identity, which could be regarded as a prominent case of national identity development research from the past century.

Key words: Teng-hui Lee, life history, national identity, Taiwan indepenfence, psychology of nigrescence

誌　謝

六年了，終於走到這一步。最終未能盡善盡美的碩士論文竣工，要感謝的人非常的多。首先第一個要感謝的，就是始終沒有選擇放棄我，並且不斷給予我指導與鼓勵的，我的指導教授：許維德博士；沒有他一路上在寫作過程中的看顧及提點，這一部論文將永無看見天光之日，非常感謝維德老師。

再來則是感謝在我的論文產出過程中，參與了我的論文研究計畫提出以及畢業論文口試的陳儀深博士、林秀幸博士、李翹宏博士、柯朝欽博士，有了您們的審閱與引導，使得這篇論文得以更臻完善，也讓我對於研究複雜多變的李登輝國族認同，更具信心。由衷感激您們不藏私的耐心指正。

另外我很慶幸也很榮幸能在交大客家學院完成我的碩士學業，這裡有良好的求學環境，更有著一群努力於客家學推動的超優質老師。謝謝張維安博士，我心中永遠的院長、客家學界的泰斗，您的指導與教授，總是讓人如沐春風；謝謝羅烈師博士，因為您的引領，我才能以一介軍人大老粗，踏進這個神聖的學術殿堂。

謝謝黃紹恆博士、謝謝潘美玲博士、謝謝蔣淑貞博士、謝謝張宏宇博士、謝謝鍾旻秀小姐，謝謝每一位在客院指導過、教授過、協助過我的每一個老師、每一位客家學院的工作同仁；也謝謝和我同年入學的同學們，以及前、後屆，一起修過課的學長姐、學弟妹，客院因你們而讓我的研究生涯，更加豐富、愈加有趣。

當然也不能錯過，過去六年中我之所以能夠正常生活、維持生計的所有職場上的老闆與同事。謝謝當初批准讓我順利公餘進修的部隊長官；謝謝在退伍後願意讓我繼續完成學位的立法委員老闆們，以及擔任國會助理時幫助過我的政治前輩與同事；謝謝來到桃園落腳後，一路提攜我的鄭文燦市長以及楊家偎市議員。

最後的感謝，我要留給我的家人，謝謝阿嬤、謝謝媽媽、謝謝爸爸、謝謝弟弟、謝謝妳。有著妳們的陪伴與總是在我身後的後盾，我才能夠在工作以外的時間，全心全意投入寫作，我愛您們！也謝謝始終沒有放棄做學問的自己，我撐過去了。願將來的一切都將更好。願主賜福、願社會更加和諧、願台灣獨立成功。

目錄

第一章　導論.....1
第一節　問題意識的提出.....1
一、　前言.....1
二、　問題的提出.....3
第二節　文獻回顧.....5
一、　台灣國族認同研究.....6
二、　李登輝研究.....8
三、　李登輝國族認同研究.....14
第三節　理論架構.....21
一、　Erik H. Erikson：將認同視為心理社會階段（Psychosocial Stage）..21
二、　J. E. Marcia：認同狀態取向（Identity Status Approach）.....23
三、　William E. Cross：黑人化心理學認同發展模型.....25
第四節　研究方法及主要資料來源.....30
一、　研究方法：傳記研究法.....31
二、　主要資料來源.....33
三、　小結.....36
第二章　大日本帝國殖民時代（1923-1946）.....38
第一節　童年與青少年階段（1923-1940）.....39
一、　客家族裔的李氏家族.....39
二、　先祖、父親、大兄.....43
三、　三度轉學的公學校、淡水中學校.....48
第二節　台北高等學校階段（1940-1943）.....54
一、　岩里政男及皇民化教育.....54
二、　台北高等學校的視野大開.....57
三、　年少李登輝的中國想像.....62
第三節　京都帝國大學階段（1943-1946）.....65
一、　大日本帝國的憧憬與體驗.....65
二、　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思想啟迪.....68
三、　二戰爆發的愛國情操.....70
第四節　此一時期國族認同狀態分析.....76
一、　清晰的日本認同.....77
二、　次等國民的反思.....81
三、　精神世界的探索.....84
第五節　小結.....88

第三章　國民黨政權來台初期（1946-1971）.....91
第一節　重回台灣校園生活（1946-1949）.....92
一、　農業專業領域的鑽研延續.....93
二、　加入共產黨疑雲.....98
三、　二二八事件的影響.....101
第二節　社會新鮮人（1949-1953）.....105
一、　牽手一世人 —— 與曾文惠共結連理.....106
二、　台灣大學助教工作.....108
三、　首度赴美留學經驗.....111
第三節　公部門的早期淬煉與成為基督教徒契機（1953-1961）.....115
一、　農林廳與合作金庫的工作經驗.....116
二、　中國農業復興聯合委員會歷練.....120
三、　關鍵性的信仰確立.....125
第四節　信仰與震撼（1961-1971）.....127
一、　入信基督教.....128
二、　第二次赴美留學時期.....130
三、　警總的七日約談震撼.....134
第五節　此一時期國族認同狀態分析.....137
一、　中國認同的誕生.....138
二、　中國認同的反思.....143
三、　尋求生活踏實與心靈平靜的方法.....148
第六節　小結.....153
第四章　走進體制、平步青雲（1971-1984）.....155
第一節　順遂的政治明星之路.....156
一、　加入國民黨.....157
二、　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60
第二節　全面掌權蔣經國.....166
一、　官派台北市市長歷練.....167
二、　靜默以待動盪不安.....171
三、　行政能力的累積與綻放.....176
第三節　攀向權力巔峰.....183
一、　白髮人送黑髮人.....184
二、　高官訓練場域的試煉.....190
三、　躍上副總統職務的最後關鍵.....192
第四節　此一時期國族認同狀態分析.....196

一、 中國認同.....197
二、 專注公職上的專業展現.....203
三、 省籍困頓的突破.....207
第五節 小結.....211
第五章 輸誠表態、直上天聽（1984-1990）.....214
第一節 蔣經國總統欽定副手.....215
第二節 台灣解除戒嚴.....223
第三節 第一位台灣人總統.....229
一、 繼任總統.....230
二、 鞏固新領導中心.....236
三、 自己創造的新總統任期.....246
第四節 此一時期國族認同狀態分析.....256
一、 中華民國認同.....258
二、 緩慢浮現的台灣意識.....264
三、 初登大位的政權保衛戰.....268
第五節 小結.....274
第六章 當家作主、登峰造極（1990-2000）.....276
第一節 贏得選舉的總統之路.....277
一、 交鋒黨內外省集團.....277
二、 野百合學運落幕的善果.....280
三、 多管齊下的國政方針.....283
四、 台中開啟多項溝通管道.....289
第二節 中華民國在台灣.....292
一、 國民黨內的國家路線之爭.....292
二、 生為台灣人的悲哀.....293
三、 尋求連任之路.....297
四、 當選中華民國首任民選總統.....302
第三節 最後主政時光的挑戰.....306
一、 江山代有才人出.....307
二、 交戰中國新思維.....309
三、 愈趨明朗的「新台灣人」輪廓.....312
四、 特殊國與國關係.....321
五、 成敗國民黨後的和平轉移政權.....326
第四節 此一時期國族認同狀態分析.....334
一、 精緻化中華民國認同.....337

二、 交手中華人民共和國.....340
三、 暗潮洶湧的台灣認同.....345
第五節 小結.....350
第七章 期初的李前總統生活（2000-2007）.....353
第一節 分手吧，國民黨.....354
一、 敗選後的國民黨內新局勢.....355
二、 台灣團結聯盟關係.....357
三、 走自己路的李登輝.....361
第二節 與接任總統關係.....363
一、 民主之父李登輝與台灣之子陳水扁.....364
二、 二二八牽手護台灣.....368
三、 漸行漸遠阿輝與阿扁.....371
第三節 我是不是台獨教父的我.....374
一、 放棄台獨的轉向風波.....375
二、 追求國家正常化.....379
第四節 此一時期國族認同狀態分析.....383
一、 中華民國認同揚棄.....385
二、 卸任後的國政關懷.....388
三、 具體展現台灣認同.....391
第五節 小結.....395
第八章 見證第三次政黨輪替（2007-2016）.....398
第一節 再次支持民進黨總統候選人.....399
一、 2008 年「失去政權的民進黨」.....400
二、 2012 年「最後一次拜託」.....402
三、 2016 年「台灣第一女總統」.....407
第二節 走訪日本的實話之旅.....411
一、 奧之細道與靖國神社.....412
二、 釣魚台觀點.....415
第三節 李登輝的「餘生」.....418
一、 李登輝看太陽花學運.....418
二、 光榮赴死日本兵.....421
第四節 此一時期國族認同狀態分析.....424
一、 台灣已經獨立的台灣認同.....426
二、 晚年特殊的日本經驗回憶.....430
三、 人生最後的心力奉獻所在.....433

第五節　小結.....436
第九章　結論.....438
第一節　研究發現.....438
一、　李登輝各生命階段國族認同狀態綜合回顧.....438
二、　可能貢獻與既有李登輝認同研究比較分析.....442
第二節　研究檢討與未來展望.....447
一、　研究檢討.....447
二、　未來展望.....448
參考書目.....450
附錄一：李登輝年表.....461
附錄二：李登輝總統就職演說全文（1996.05.20）.....469
附錄三：李登輝總統在歐林講座問英文版演講稿（1995.06.10）.....474
附錄四：1995 年江八點與李六條重點節錄對照表.....482

表目錄

表 1-1：Erikson 心理社會發展理論的八個階段.....22
表 1-2：「黑人化過程（Nigrescence）」的四個階段.....28
表 1-3：李登輝研究傳記選篩文本整理.....35
表 1-4：七大生命階段劃分概述.....37
表 2-1：本階段時代大事與生命史事件：成長於日治的童年至青年期.....77
表 3-1：本階段時代大事與生命史事件：新國籍誕生的早期成年期.....138
表 8-1：知名企業家表態支持馬英九連任總統一覽表.....407
表 9-1：李登輝各時期國族認同狀態簡表.....442
表 9-2：生命階段轉換主要成因比較.....443

第一章 導論

我們根本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採行所謂「台獨的路線」。四十多年來，海峽兩岸因為歷史因素，而隔海分治，乃是事實；但是海峽雙方都以追求國家統一為目標，也是事實。……海峽兩岸，都應該正視處理結束敵對狀態這項重大問題，以便為追求國家統一的歷史大業，作出關鍵性的貢獻。

—李登輝[1]

但是我[李登輝]知道，當他[李登欽][2]說「要成為堂堂[日本]帝國的海軍，報效國家」的時候，[3]心裡是認真的。那時，我和哥哥都很年輕。一心懷抱著為國家挺身作戰、光榮赴死的理想。

—李登輝[4]

何謂台灣的現狀？就是台灣不隸屬於中國、獨立的狀態，台灣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個別的「存在」。能夠以台灣之名而存在，才是唯一的重點。

—李登輝[5]

第一節 問題意識的提出

一、 前言

上述三段不同的引文，可以視作來自三個不同時空背景下，李登輝為之調整的紀實或是對外發言。今日的自己，否定了昨日的自己，可能源於自我的反省、可能出自對於事物有了嶄新的領悟，可能的原因不一而足；在道德的領域上，或許得以低空飛過評判的標準，但在法律的規範上，倒不一定可以完完全全否定過去的自我，李登輝所說：「我是不是我的我」（李登輝 2013a：12），當是構築

[1] 出處見附錄二：李登輝就職演說全文（1996.05.20）。
[2] 李登欽：李登輝的兄長，日本帝國時期受召至南洋代表日本政府作戰，因公殉難，死後受日本政府追念祀奉於日本靖國神社，李登輝曾於 2007 年赴日訪問時前往弔念。
[3] 國家係指 1895 年至 1945 年統治台灣的日本帝國殖民政府。
[4] 出處見李登輝（2015：55）。
[5] 出處見李登輝（2016：5）。

於道德、哲學等的精神層面，而非歸究於法律問題的探討。有著這層的認知，我們得以認真面對李登輝言談之中觸及的國族認同問題。

引文的第一段話，是在 1996 年李登輝就職台灣首任民選總統的就職演說中出現，很顯然的，那是一篇全球關注的重要演說，不僅僅台灣國人的引頸期盼，同時間與台灣國家發展密不可分的美、日、中等大國，肯定一字一句的緊盯其內容，為的是確保台海之間不會有任何擦槍走火導致發生戰事的可能（當然還有中國一貫的大一統思想）。但無論演說內容是否得到國人的欣賞、接受，以及國際社會的尊重、認同，依照其中字句透露的訊息，李登輝作為台灣國家領導人，在當時候可是自然而然地表達支持，並追求台、中邁向國家統一大業的一個中國。

第二段的引文，則是來自於李登輝晚近的著作—《新・台灣的主張》（2015）。雖說這是一本以 1999 年同樣是李登輝個人的著作—《台灣的主張》為基底，再一次全面提出對於台灣未來發展的具體建言，但有別於 1999 年時李登輝仍然是一個在位的總統，言論難免偏為謹慎保守，此於 2015 年的新作，似乎更增添了以往我們不會輕易在其著作中看見的「日本國族認同」。[6]即使那是以高齡 90 幾的李登輝，在對於過往生命成長的回溯憶往，但是身為一位台灣人中主政最久的前總統，其重要著作提到對於日本國族的懷念或認同，都將有必要地視之為重大的議題，並且為有興趣者應當努力進行了解與探究。

同樣一個李登輝，我們已經至少看見了兩個不同階段，透露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國族認同內容；但李登輝的國族認同，難道僅止於中國、日本此二個國家的二種不同認同嗎？恐怕再也明顯不過，答案是呈現否定的。第三段的引文中，我們確信李登輝至少有著第三種的國族認同，以台灣為主軸，對於長久爭論不休的統獨爭議，李登輝胸有成竹地為這複雜多變的爭論議題，有了自己斬釘截鐵的重言定調：「台灣已經實質獨立」（李登輝 2016a：5）。一個李登輝，自此有了至少三種不同的國族認同。

[6] 即使如此，李登輝確實明白說過自己是一位日本人：「司馬先生，我到二十二歲為止也是日本人呀！」（司馬遼太郎 1995：116）。

二、 問題的提出

李登輝出生於西元 1923 年，至 1945 年終戰前，是一位生活在日本教育之中，並歷經過皇民化教育的日本帝國殖民人民；在其求學過程之中，曾動身前往日本攻讀大學。就在李登輝於日本求學之際，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於世界各主要戰區開展，李登輝亦曾受召至日本帝國軍隊服役。而後由於日本戰敗投降，日本將台灣還給了中國[中華民國]，當時候身為日本人的李登輝，踏在日本國土上面臨已然發生的不爭事實，無論是出於被迫亦或內心也許地欣然接受，都必須迅速在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的當口，拋棄（至少形於外是必須的）已然形成許久的日本國家認同，[7]轉而重新接受現實環境政權產生的「中華民國國家認同」。

時空跳轉到李登輝主政的時代，1996 年 3 月 23 日，台灣完成史上首次公民直選正、副總統的投票，實踐了中華民國行憲以來真正的「主權在民」概念。選舉的結果，由代表國民黨的李登輝與連戰，共同贏得中華民國第九任正、副總統選舉的勝利。同年 5 月 20 日，李登輝總統就職演說中，短短 5,000 字不到的內容，清楚地向國人同胞與世人宣示了中華民國政府在於推動亞洲民主深化無可取代的地位，也宣告了台灣已然完全有能力實施具有普世共同價值的民主政治制度。

當然「主權在民」、「以台灣為主體」、「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主權國家」，更是通篇就職演說的核心所在。然而卻也是在同一篇演說中，李登輝不只一次地提到，海峽雙方都以追求國家統一為目標的這件事，讓活在 20 年後這一代俗稱「天然獨」[8] 的我們，自然有著一種衝突與違和感，無法讓人直接理解當時候是處於什麼樣的情勢與環境，為何「追求國家統一」這樣陌生少見的話語，會突兀地由我們普遍認知致力「台灣獨立」的「台灣之父」李登輝口中說出？會否礙於

[7] 也或許 1945 年終戰前李登輝的心中未必存在著真正的「日本國家認同」，這卻也是本文希望加以釐清與商榷之事。

[8] 天然獨：台灣政治名詞與主張，泛指生於 1980 年之後的台灣人世代，這個世代中，多數認同自己的台灣人身份，支持台灣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這個說法一般被認為起源自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在 2014 年發表的談話，經由林濁水等人的論述而開始傳播。（維基百科 2016b）

國際情勢的詭譎與形勢比人強的壓力，受到各方如美國、中國等世界強國的施壓所致，迫使即使是台灣人民透過民主制度所選出的國家領袖，依然必須在公開發表的重要談話中，忍痛做出時空背景下最為適當的退讓與妥協？

「李登輝研究」在近年來台灣著名人物研究之中，向來都是一位大熱門的指標性人選。其「政策」、「性格」、「台中關係」、「日本情結」，乃至「國家／國族認同」等，各項研究數量均為驚人。以李登輝為名的「自傳」、「訪談錄」，也時有出版與推陳出新。其中值得一提的部分，許多日本學者專家，也針對李登輝多有研究，一時間研究李登輝是為台、日之間的意外顯學。然現有的李登輝研究著作雖多，但對於其國族／國家認同的既有相關文獻，卻始終置重於「李登輝」與「台灣的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琢磨與處理，[9]鮮有特別對於李登輝個人的國族認同，是如何發展與轉變，並且進而影響台灣人民國族認同的方向加以研究。

對於目前仍舊存在「李登輝國族認同」的迷惘，因為既有文獻尚且無法滿足，在面對時而為日本人、時而為中國人、時而為台灣人的李登輝，難以肯定的樣態得到其個人的國族認同轉變呈現，本文將試圖以李登輝現已高齡 90 多歲，但仍然持續精彩的一生之中，針對其生命史中各個不同的發展過程階段，其中是否遭逢了什麼樣的重大事件，致使在各個階段中，引發了李登輝存在著不同的國族認同狀態。而這些不同生命階段的國族認同，李登輝是如何遭遇轉變、調適轉變，又是如何適應、接受轉變，這些過程與成因所在，是本研究的重點內容。本研究亦將致力找出在各個已然轉變的國族認同之中，相互之間是否存在著羈絆與牽引，彼此間是否也存在連動、激盪的關係，都是即將展開希望完整呈現的內容。

具體而言，本研究將緊扣著李登輝在不同生命階段中的國族認同狀態為何？這也正是於後會說明有關採用「William E. Cross 黑人化心理學認同發展模型」

[9] 如蔡石山（2006）《李登輝與台灣的國家認同》，以及前原志保（2014）《李登輝與台灣認同》，均是以李登輝個人生涯發展歷程的單線陳述，再結合對照台灣的國家認同。實質上說的是「李登輝」與「台灣國家認同」相互碰撞所呈現出來的關係，而非著重在李登輝個人的國族/家認同養成與轉變，所以無法明晰李登輝在各個時期歷經可能不同的國族認同，是如何形成，以及是哪些主要因素致使其認同產生轉變。

的前因所在，唯有應用此認同發展模型的「生命階段」劃分，吾人才有機會釐清李登輝複雜特殊的國族認同狀態呈現。

在此前提下，有著各生命階段可能表現出不同的國族認同樣貌，我們才能更進一步去析解與詮釋李登輝國族認同狀態的內涵，並且找出李登輝的台灣認同在什麼階段／時間開始發展。當然，這就會面臨到以下三個實質上的經驗問題：（一）李登輝生命階段該如何分期？（二）不同生命階段的「國族認同狀態」是什麼？（三）不同生命階段之國族認同狀態「彼此之間的關係」是什麼？筆者都將一一為這些最終決定李登輝國族認同發展狀態的關鍵因素，梳釐出最具說服力的論述。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如同在上一節「問題意識」提出的內容中所示，本研究所要探討的重要關鍵核心，是李登輝在不同生命階段的國族認同狀態為何。身為第一位台灣人總統的李登輝，是否真正具有「台灣國族認同」？若答案為是，其台灣國族認同又是從什麼生命階段開始發展？在發展階段的過程中，國族認同又是各自是以何種狀態呈現？這些都是本研究必須反覆討論再三的關注所在。

鑑於上，本節次的文獻回顧，首先將進行「台灣國族認同研究」的回顧。在探討李登輝個人的國族認同之前，應當更宏觀地檢視台灣國族認同研究現今的發展情況，以及台灣國族認同其背後代表的意涵。接著將會在第二部分探討「李登輝研究」。在種類繁多的既有李登輝研究文獻中，揀選出可能形成／影響李登輝國族認同的相關內涵加以探討。

筆者亦會在「李登輝研究」中區分成三大類別：「外在政策」、「內在思想」，以及「生命史事件」。這些都是吾人判別與李登輝國族認同正相關連的重要成因。最後，在「台灣國族認同研究」與「李登輝研究」整理與爬梳後的基礎上，吾人將進入回顧與本研究息息相關的「李登輝國族認同研究」。藉由爬梳與省視他者既存的李登輝國族認同研究成果，接續本論文寫作。希冀本研究的進行，能為所欲探討的前開問題意識，找出一條別於以往李登輝國族認同研究的嶄新道路。

一、 台灣國族認同研究

> 「國族」是在特定脈絡下與其他行動者互動之後所產生之「意欲建立主權國家」的論述。而這樣的論述，不論是從「可能之構成元素」來觀察，或者是從「與之互動的他者」來觀察，都具備了多重性、競爭性和流動性。（許維德 2013：101）

台灣因受到大時代歷史洪流的多次衝擊，使得台灣人民雖生於斯、長於斯，數百年來卻仍舊無法真正對於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產生認同。本研究環繞在「國族認同」之上，乃在於台灣前途未定論，但台灣人民卻是在一個「意欲建立主權國家」（許維德 2013：96）的當口，爭吵許久，卻從未真正突破。[10]

而本研究欲處理的問題，即是透過分析李登輝生命史的取向，展開了解與析構其國族認同發展階段；換言之，除了必須清楚爬梳李登輝國族認同相關研究文獻之外，同時間也要進行對於台灣國族認同研究既有的成果整理。當然，台灣國族認同研究的範疇遠遠大於李登輝個人的國族認同研究，並且也可以這麼說，任何從事個人的國族認同研究，都將置於「國族認同研究」這個大屋頂下進行。

台灣國族認同相關文獻之梳理，必須出現在本研究之中，明白台灣國族認同研究的演進及現況，當能更加準確回答李登輝國族認同研究問題，同時也能正面面對台灣國族認同現存懸而未決的各項癥結與爭議。除此之外，由於國族認同絕非台灣僅有的近代爭議，但隨著世界上掀起地一波波國族自主與國族主義的盛行，台灣國族問題似乎逐漸露出曙光，已故著有《想像的共同體》等一系列國族主義相關作品的國際知名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於 2003 年來台演講時是這麼說的：

> 我看不出有什麼強烈的理由，會使北京不會再經過一段時間後，也同樣調整態度，順應、接受台灣的獨立。（Anderson 2013：337）

---

[10] 中華民國政府自 1949 年撤守台灣以來，雖然台灣自終戰後擺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卻自此與國民黨政府捆綁在一起，久久無法抽離。時至今日，台灣政局展現新的氣象與遠景，但與中國政府仍有許多未決與亟待克服之處，這是蔡英文新政府首當面對的事情。鑑於 2014 年時發生的服務貿易協議等爭議議題，使得當時台灣內部紛亂不已，期盼往後能不再發生那樣使人民百姓動盪不安的遺憾之事。

然而即使是知名學者如班納迪克・安德森，都提到台灣獨立的相關議題，台灣（國族認同）獨立問題似乎不僅僅原地踏步不前，更像是隱形的聲音，難以進行公開表述。2016 年新上任的蔡英文政府，不只一次公開地表達將秉持著「維持現狀」的論述，於國族認同的問題，至今並未見其有著進一步的謀求與突破。主流民意的是否適從，除了自身的國族認同，也加入了更多的包括中國在內，還有美國、日本等大國環伺在外牽動著的經濟因素。也因而才會在 2014 年，爆發了「反服貿」的太陽花學運。[11]或許安德森當時候料想不到台灣會在 2008 年之後，中間出現長達八年之久，如此重度依賴中國經濟的前朝馬英九政府之故。[12]

王甫昌在《當代台灣的族群想像》一書中，企圖勾勒出台灣當代社會的真實族群想像，而書中精義在於「四大族群分類的出現即定型，可以說是政治力量互相較量、妥協，以及與民眾互動的社會結果」（王甫昌 2006：55）。對於台灣當代的族群想像，有著具體的描述，也使得吾人在進行相關「國族」研究的同時，帶有著最根本的認知。換言之，所有的族群分類都有其依循的分類原則。當代台灣也就有著「原」、「漢」、「閩」、「客」、「省籍」等的分類差異。對於面對龐然大物猶如中國，台灣人應當也必須正視與他國之相別的「國族」之分。

國族認同議題如此之大，又該如何精準地放到本研究中主人翁李登輝個人國族認同的視角？許維德認為，國族認同應當至少能夠區分為三種不同面向分析，分別是「制度認同」、「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而其中牽涉的概念，尚包括「鉅觀的」以及「微觀的」的二種不同層次。所謂的鉅觀，指的是充分展現「集體認同」的大的群體式認同；與之相反的，也正是本研究所定義的，微觀指的則

[11] 無獨有偶，2014 年 9 月前後陸續發生的香港「學運」與「佔中」行動，香港人民對於中國政府的極度不信任與恐懼，迫使人民走上街頭、餐風露宿，起身以薄弱肉身之姿，對抗擁有國家機器，與重裝武力（鎮暴警察、催淚瓦斯、辣椒水），一場血淚發生的「雨傘革命」，殷鑑不遠，台灣當有所警惕，中國官方絕對肯定不是支持和平與民主的那一方。

[12] 持平而論，近年來台中對立局勢和緩，社會上看似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繁華似景的熱鬧非凡。台灣人民赴中經商以及大量的中國觀光客來台，的確在若干程度上創造了互贏互利的雙贏局面。但中國的統戰策略向來可怕，害怕台灣遭到香港化是當代台灣人的集體憂慮。「中共政權在香港、澳門的一國兩制，不光是台灣民眾不能接受，香港人也發自內心地反彈抗拒」。（陳仁公 2013：242）中國政府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足以證明中國政府向來的說一套、做一套的可怕無誠信心理。

是以個人作為出發，心中所想像的國族認同。當然任何的個體，都是依附在大的群體中生存的其中之一，更正確的說，無論個人如何的發展認同，都將免不了受到外在大的群體牽引與激盪（見 Shu 2015：30-35）。

將上述觀察，發散到既有的台灣國族認同研究成果，屬於「鉅觀層面」的，有從觀察比較台、中青年國族認同是否存在差異，如以消費行為取向及產品影響著手的（郭書銘 2002），也有以「Q 方法論」去論證台、中學生國族認同的（呂承泰 2014）；另外還有以「皇民化時代戰場通譯」的國族認同探討（陳宛頻 2013），這些都是屬於大的，也就是鉅觀的集體認同探討。我們會看到一個屬於該時代下的人們，產生了什麼樣共同有的國族認同，卻不容易將之聚焦在個人國族認同之上，容易放大了焦點，卻不易看見癥結。

而與鉅觀層面分析同場放映的，就是「微觀」層面的國族認同研究。雖說個人的國族認同經常誕生在大時代之下，但是源自於聚焦之故，或許能夠更加明白在那裡頭發酵的深層意涵。《陳芳明現象及其國族認同研究》（陳明成 2002），當是在這當中引人注目的一支。除了陳芳明本身就是熱門的被研究對象之外（e.g.,Shu 2005；陳逸凡 2010；李季鴻 2012；王莉菲 2013），更在於此微觀的研究取向，事實上場次是少了鉅觀放映許多的，這也正是本研究希望與此環境下，貢獻多一些有微觀層面出發的台灣國族認同研究。

二、　李登輝研究

誠如上一章節「問題的提出」中所提，李登輝研究在近年來是為台日之間對於單一政治人物研究的意外顯學。觀察、評析李登輝的有關文獻種類繁多，包括主要在李登輝的「憲政改革」（e.g.,湯雲騰 2000；陳玲玉 2000；曾儷蒨 2001；黃安然 2004），將焦點鎖定在臺灣在邁向正常民主化的國家進程中，李登輝身為主政者，如何運用謀略與手段，逐步完成台灣現有的憲政改革成果。

另由於近代台灣從威權時代輔以戒嚴令的實施，解嚴之後要致力推動民主化的過程實在不易，如何能夠在兵不見血刃的情況下，促使台灣逐步走向深化民主

的歷程，「寧靜革命」（e.g.,張嘉恩 2009；丁玲虹 2011；葉柏祥 2014）的成功，則容易聚焦在李登輝個人的智慧發揮，讓台灣民主化加速走在正確的道路上。當然，也與上述憲政改革的內容，有著相互輝映的加乘成果。再來則是始終敏感於世的「台中關係」（e.g.,郭致佑 1999；張景明 2001；郭壽旺 2001），以及李登輝的「中國政策」（e.g., 陳鵬光 2000；田麗虹 2002；劉煒錚 2004），研究者主要鎖定在台灣近年來何以和平度過各種隱藏危機的重要關鍵所在。

而與中國政策同樣無可忽視的「外交政策」（e.g., 吳宛玲 2004；李靜宜 2013），則主要在描述李登輝過人的外交手腕，使得台灣仍然能在險峻的情勢之中，做一定程度的外交拓展，維持台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另外與台灣相近及富有歷史糾葛的日本，在李登輝的引領下，「台日關係」（e.g.,黃邦如 2004；王妙玲 2013）的保持友好，亦成了台灣於國際社會間的重要課題。其他相關學位文獻，尚有興趣於李登輝政治領導風格與「大眾傳媒」的研究（e.g.,胡淑裕 1986；遠藤隆志 1997；簡琬璧 2001；施懿珊 2001；黃少梅 2002；錢震宇 2002；文麗 2007）。

綜觀以上豐富多元的李登輝學術研究，主要聚焦在其總統任內對於國家以及民主政治上的比較與貢獻。但本文乃以李登輝國族認同研究作為出發，所以雖然相關研究成果豐碩，本章節以下展開，將聚焦在與李登輝認同研究直接相關的文獻回顧，並嘗試作一相近文獻的整理。吾人將針對有關李登輝研究緊密相關的既有研究成果，區分為三大類別，分別是「外在政策」、「內在思想」，以及「生命史事件」，進行綜合式的評析及討論。

首先看到第一種類別：「外在政策」。有關外在政策影響李登輝認同呈現的文獻，筆者以前原志保（2014）的博士論文《李登輝與台灣認同》作為出發。前原志保採用的題目名稱其實與蔡石山 2006 年所著《李登輝與台灣的國家認同》的李登輝英文傳記，有著高度的相似與重疊，但是細究其論述方式與研究範疇，其實是兩篇截然不同之作。[13]

[13] 有關蔡石山《李登輝與台灣的國家認同》一書詳細內容，將於下一小節「李登輝認同研究專書回顧評析」中進行討論。

前原志保在面對有關李登輝的認同研究，主要鎖定在李登輝已經步入政壇並且成為行政官員後，各個不同時期（包含擔任總統主政年間、卸任總統後的官方活動出席）發表的言論記載，並非是李登輝生命歷程的呈現與探討，就國族認同研究而言，非屬此一範疇的完整之作。

當然前原志保的出發點本就不是探索李登輝個人的國家/族認同，自然不以生命史的表述方式切入，這是可以清楚明白的事情。但是要探討李登輝，前原志保依舊保有完整的一個章節篇幅（第二章-李登輝的思想形成與發展，前原志保 2014：31-53），去描述李登輝的成長歷程、人生哲學包括信仰對其重要等，讓我們仍然能了解李登輝生命歷程的轉變，但必須強調，這畢竟不是最接近的全貌。

回到前原志保置入的視角，前原志保希望透過己身日人身分的眼光，嘗試回到過去種種他所迷惘困惑的許多既有事實，由「台灣與日本在地理上的距離很近，心理上的距離卻很遠……超過親日程度的李登輝，後來變成台灣總統，推出台灣民主化與活躍台灣人認同的過程，李登輝的『親日』也影響到台灣國內的親日氣氛」（前原志保 2014：1-2），我們可以看見，台灣與日本究竟是否親近，對於前原志保而言，尚且存在著一種模糊不清的界線。

經由日本人對於台灣國族認同產生的疑惑及感受，前原志保其實花了相當的力氣，嘗試去整理、分析台、日之間特殊存在的活動橋樑—李登輝「1988 年～2000 年的言論集」（前原志保 2014：5），可以想見其工程浩大，著實不易有的研究成果。也由於前原志保特殊有的日人身分與日語精通，對於李登輝研究的探討，相較其他不具日文閱讀能力的華人研究者而言，是格外具有切入李登輝日文思想的過人優勢，「李登輝用日文撰寫，設定對象不一定是日本讀者。到 22 歲都受到日本教育的李登輝，思考時最能駕馭自如的語言很可能是日文書寫體，因此，李登輝的專書，看日文版最適合了解他本來的意圖」（前原志保 2014：7）。

對於前原志保因爲擁有日文閱讀與理解的能力，吾人當是表以欽佩與尊敬之意，但同樣是前原志保所說：「李登輝以中文撰寫的作品當然比日文、英文多」（前原志保 2014：7），其出產數量甚至可能存在極大的差異與懸殊；換言之，

能夠輔以日文能力去探索李登輝研究自是好事，但筆者所要挑戰及回應的，乃是即使無法真正具備日文能力去閱讀李登輝相關著作，現有為數眾多的李登輝華文寫作，以及其實台日之間相互翻譯文字能力的卓絕，其實依舊能夠對於李登輝研究可以產生好的理解，日文能力的缺乏，絕非李登輝認同研究的受限所在。

林柏州（2003）的研究是在分析國民黨政權，在 1970 年代之後興起的政治改革運動，以「政權的台灣化」觀點下，去區分蔣經國與李登輝兩波政治改革路線，分別是基於不同的國家體系內涵與想像。林柏州更進一步將研究重心至於「政權的台灣化是如何發生的？」上，並發現蔣經國與李登輝兩位政治領袖在推動政治改革時，除了面對的社會與國際環境是類似之外，其政治脈絡是迥異的，「環境脈絡會限制與導引歷史的走向與政改路線的成型，但政治領導不必然就無任何意義」（林柏州 2003：108）。

在台灣近代民主化的過程之中，國民黨的角色一直都扮演著份量十足的左右份子，褒貶不一、甚是細看其中的好壞幾乎不成比例。但實質上自 1996 年開放總統直選以來，至 2016 年蔡英文率領民進黨重返執政前，此 20 年間仍然是以李登輝與馬英九代表的國民黨政府，先後合計共 12 年佔五分之三強的時間執政台灣，與台灣人民的治理與互動，事實上並非想像中的那般遙遠。更準確地說，國民黨選擇如何在台灣持續發展，一直到今日，仍然牽動著台灣國家未來的願景與希望，能否由本質上澈底地親近、靠近台灣人民，都將是是否羈絆著台灣成為新國家、穩健邁向新未來的一塊百年巨石。

中國國民黨的政權是否能夠本土化，是本文論述探討的關鍵問題之一，就像陳茂雄（2007）所說：「嚴格地說，臺灣目前還未完全擺脫外來勢力的殖民統治。外來勢力並不是有很多臺灣人加入就代表本土化，日治時代還不是一樣有很多臺灣人加入日本集團」；當然陳茂雄撰文時候乃是中央由民進黨政府執政，國會仍由國民黨的過半多數所把持，不同於今年 2016 年產生的有史以來民進黨單獨穩定過半的國會組成，但事實上國民黨仍舊在國會是為第二大黨，即使只剩 35 席國會議員，仍保有實質影響台灣政壇的影響力。

有別於筆者的切入方式，看重在李登輝國族認同是如何影響國民黨政權本土化的結果，林柏州則是直接針對國民黨兩位重要領導人「蔣經國」與「李登輝」的政治改革脈絡、政權台灣化下作所探討。無論是以個人國族認同影響所及的政權本土化，或是不同政治領導脈絡之下產生差異的結果，其中卻有一個共同點：唯有國民黨能夠真正落實在台灣的本土化，或許才會有真正幸福的台灣人民。

接著，本段落所要回顧的，是第二個組成李登輝研究的重點：「內在思想」。誠如前述提到，李登輝研究是近年來台日之間的研究顯學，對此，尚有兩位著名的日本學者，亦分別出版著作，探討李登輝曾為國家領袖，在政治上的心路歷程與特殊成就。第一位是與李登輝合著《李登輝學校的教誨》的小林善紀。這是一本在 2001 年出版的李登輝與小林善紀的對話集錦。彼時對於甫卸任總統不久的李登輝，小林善紀提出許多自李登輝年少時代以降思想養成，直至成為總統之後，各項攸關李登輝在政治呈現上，左右其做出決策的背後深層原因。

小林善紀亦特別點出影響李登輝深遠的基督教信仰（李登輝、小林善紀 2001：123-126），讓世人知道在李登輝的內在思想中，信仰一直是橫貫李登輝生命的重要脈絡。在此之後，第二位日本學者井尻秀憲（2010），亦與李登輝進行了數次深度的訪談，寫成了《李登輝的實踐哲學》這本著作。這是李登輝卸任近十年後，面對台灣政局快速變化，做出新的局勢觀察及提供因應之道。

井尻秀憲在著作的結構安排中，在「第一章」中及讓「李登輝的『生死觀』」（井尻秀憲 2010：24）率先登場。緊接著在「第二章」中，井尻秀憲也特別強調「影響李登輝思想觀念最大的書籍」（井尻秀憲 2010：42），這些都是關係李登輝認同研究絕無忽略的重要依靠。唯有知道李登輝的思想養成為何，才可能進一步窺探在內在思想的基礎下，李登輝可能受之影響呈現的國族認同狀態。

除此之外，探索李登輝思想世界的，尚有黃文雄（2011）的《哲人政治家李登輝之「我」》。這一本著作的誕生，彷彿為複雜難解的李登輝研究，做出跨時代的精美演繹。如同書中由知名文字工作者「老包」為此書作序的〈發現黃金存

摺〉（黃文雄 2011：3）中提到，「看完這一本著作時，我久久不能掩卷，內心許多苦悶與疑點，終於得到了解答」（黃文雄 2011：9）。

黃文雄在李登輝的內在思想探討上，做足許多功夫，讓許多興趣於李登輝研究的追隨者，有著茅塞頓開的豁然開朗。黃文雄從李登輝的「我」（黃文雄 2011：22）開始拼貼，繼而探討了李登輝的「生死觀」（黃文雄 2011：66-105）等，最後亦從「李登輝的歷史觀和國家觀」（黃文雄 2011：172）探究。讓人看見了是如何從「內在思想」的完整建構，呈現出外人所看到的「我」—— 李登輝。

第三種所要探討的類別，是「生命史事件」。事實上在本類別的項下區分，容易與其他類別重疊、甚至是混淆。無論是前述提到過的「外在政策」、「內在思想」，或是之後接續回顧的「李登輝國族認同」研究，在這些項目之中，其中包含的文本記載，或多或少都會有李登輝生命史事件的描述。鑑此，筆者在選材的區分上，就必須格外的說明與小心。

在此前提下，我們特別回顧三本重要的著作，一是李登輝卸任總統後，第一位近似傳記產出，由日本作家上坂冬子（2001）進行近身深度訪談李登輝夫婦的《虎口的總統》。第二是台灣資深記者鄒景雯（2001）採訪李登輝記錄的《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第三是美國學者柯義耕（2008）所著《台灣政治家李登輝》。期望透過日本、台灣、美國三位不同國籍背景的作家詮釋，讓我們至少看到三種以上不同李登輝生命史事件的視角。

另外在這三位作者的選材上，我們也看到了各自針對李登輝不同的生命史階段，有著不一樣的力道琢磨。其中柯義耕（2008）的切入，涵括了李登輝所有的生命階段，以一種歷史學者的角度，記錄著李登輝生命史中各個影響其成長的重要事件。鄒景雯（2001）則是專注在李登輝主政 12 年期間，各項重要政治事件的生命史紀實，其中也記述了李登輝成為國家元首前的短暫經過。

上坂冬子（2001）則是在此二者之間的綜合體呈現。但由於上坂冬子的訪談之中，加入了李登輝夫人「曾文惠」女士的元素，讓整本著作呈現出更多來自李登輝家庭內的生活紀實，這是鄒景雯與柯義耕較少處理的部分。也讓人見識到在

李登輝外表剛強的形象之下，家庭生活卻也影響著其是否表現出另外柔軟、溫柔的樣態。上坂冬子（2001）更在「從長子遺稿看李登輝夫婦」（287-299）收錄了李登輝長子李憲文的文章，讓人充分感受李登輝家庭的一切溫馨與遺憾。

三、 李登輝國族認同研究

如前述所提，現有的「台灣國族認同研究」結合吾人所述的「李登輝研究」，就會自然地走到了吾人最為關心的「李登輝國族認同研究」。於此同時，一篇名為〈關鍵的一九九一：論「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誕生〉[14]是筆者首先想要切入的重點。雖然比較起上述列舉學位論文，此篇研究論文屬晚近作品，但是吾人認為，如同陳儀深（2012）明白的揭示，有了「中華民國在臺灣」的 1991 年，許多後來李登輝的所作所為自此有了清楚的脈絡可循。換言之，一旦這個事實並不存在，李登輝爾後發展的一切作為能否同樣順利，將很可能是歷史上的大大問句。

1991 年，李登輝雖然已經經由 1990 年的國民大會代表委任選舉，就任了第八任總統，不再是依靠繼任總統所得來的不確定權力，但是面對黨內同志的環伺覬覦、黨外以民主進步黨為首的民主浪潮風起雲湧，李登輝的總統大位實質上是還沒有真正坐穩的。幸運如李登輝，恰巧碰上了「野百合學運」，順勢推動了萬年國代全面改選、召開國是會議等一系列民主改革浪潮，「一九九一年不但是內部民主化關鍵的『元年』，而且是海峽兩岸在憲法法理上『一分為二』的開端，其實也是民進黨從原來擁抱臺獨，然後準備走向轉型的開始」（陳儀深 2012：36）。當然李登輝的成就與否尚有許多複雜因素，但這的確會是重要關鍵的轉折。

一如前述所提，針對李登輝個人主政期間的研究專書謂成書海，各種不同視角切入研究李登輝的功過得失大有所在，唯關於李登輝認同研究之作實屬少見。而在這其中特別對於李登輝國家認同有所探討研究的，當屬蔡石山（2006）所著《李登輝與台灣的國家認同》為最具代表性之作。也由於此書定調為「傳記」著

[14] 作者陳儀深，自 2019 年 7 月起任「國史館館長」。

作，其實相當程度上亦真實呈現李登輝個人自小到大的生命成長歷程，與本文寫作的當有認知與基礎，已然產生緊密深厚的連結，也同時體現了回顧認同研究專書時無可忽略此一著作的高度重要性。

事實上蔡石山此書的寫作尚有一特殊的價值所在，是當代第一本以英文寫作而成的李登輝「英文傳記」。而英文書寫的特別之處，乃在於以英文寫作的思考模式其實有別於一般華人世界中的華文寫作思考，也因此產生了不同的思維注入與可能隨之而來的新觀點誕生，這對於主要以華文寫作為主的李登輝認同研究，是一種別具意義的收穫與驚喜。同時，也因為英文傳記的出版，能夠使得西方世界有興趣於李登輝研究的人們，能夠使用熟悉的語言去窺探李登輝的生命面貌，不會因為受限翻譯上的短出，形成閱讀上的無趣與誤解。

回到此一著作內容的探究上，蔡石山雖然將重心鎖定在李登輝的生命成長歷程，但蔡另外特別強調的，如同書名所提，是李登輝「與」台灣的國家認同，實質上吾人尚且無法藉由此書的敘述內容，去明晰李登輝個人國族認同的如何轉變，反而容易將李登輝與台灣國家認同間的交互影響後，所產生的關係感到模糊甚至混淆。「本書雖是一本關於李登輝生活與上個世紀台灣歷史的書籍，但從這個角度而言，它也是隱喻象徵今日台灣的一本書」（蔡石山 2006：318），實際上當蔡石山有了這種想法之後，此書的寫作即無法純然地看見李登輝個人的國族認同何以形成；或許能夠看見部分，卻絕不會是蔡石山單一寫作的重點。也許蔡石山更想傳達的，是透過李登輝的聳大存在，想法設法去呈現其所看見的今日台灣。

不過話說從頭，蔡石山（2006）也的確明確的記述了李登輝在各個不同生命階段的歷程，以及各階段間遭逢了什麼樣的特殊重大事件等，都有著明白的交代與陳述。其中更有甚者，則是透過當時時空背景的描述與歷史事實的說明，在李登輝的生命歷程中相互輝映對照，讓讀者能夠身歷其境究竟李登輝當時候是生長在什麼樣的大環境裡，這是認同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脈絡依循。

由於個人的國族認同，往往伴隨著經歷過什麼樣的生命歷程，進而成為影響生命歷程變化的主觀因素；在這其中，同時可能存在著現實生活環境中創造出的

時代背景，與社會既已存在形成的牢不可破氛圍。細看蔡石山的寫作內容，既是李登輝的傳記寫作，蔡即從「李登輝誕生時的台灣」出發，包括此一時期的台灣政治、社會、文化、李登輝的家族成員介紹等，做一全面性清楚的交代，也觀察到「在台灣多語言的環境中，殖民地的語言政策所帶來的影響，已經使像李登輝這樣的台灣人變成一個文化的混合體」（蔡石山 2006：52）。但蔡石山沒有提到的，是在這樣複雜多種文化的相互激盪形成的排斥或交融，會否也因此讓「像李登輝這樣的台灣人」同樣對於國族認同產生混合之下的困惑與迷惘。

其他蔡石山依照不同生命階段的李登輝，分別依李登輝的日本教育養成：「一個台灣經濟學人的日本教育」、大時代戰爭的遭遇：「受困於戰爭與屠殺的鉗口」、如何成為國內重要農經學者：「一個學者的形成」、宗教信仰的萌發與依靠：「皈依基督信仰」、邁入台灣政黨的初始：「初嚐權力」、關鍵重要職務的歷練：「省主席與副總統時代」、登上權力巔峰的「李登輝總統」、最後六年的主政期間：「領導台灣鞏固民主」，一共九大階段地區分各個不同時期的李登輝；先且不論分成這九大階段是否視作最佳的分階段方式，[15]但單就國族認同研究需要認真檢視個人生命中不同階段的歷程意旨而言，已然屬於絕佳的寫作表現，並且更能夠協助閱讀者全面的了解李登輝各種不同生命階段的真實樣貌。

蔡石山的《李登輝與台灣的國家認同》寫作，為我們開創了進一步探討李登輝個人國族認同形成、轉變的可能，貢獻與成就既已存在則無需更多的質疑及挑戰；但也由於個人與國家/族認同間關係的渾沌不清，使吾人更欲了解真正座落在李登輝個人的國族認同可否跨越與台灣人民國家/族認同的界線，讓李登輝的國族認同研究能夠更簡單地聚焦在其個人國族認同研究問題之上，這是筆者所正面關注與積極努力去做的。

[15] 事實上同樣以傳記形式呈現的李登輝研究專書，尚有張炎憲（2008）編撰的《李登輝總統訪談錄》，張炎憲對於李登輝的生命階段分類，是以「早年生活」、「政壇新星」、「信仰與哲學」、「財經產業」等四大面向進行區分。

作為台灣民主運動長期參與實踐的知名學者陳儀深，除了如同前述撰文明白指出李登輝關鍵擘畫的中華民國在臺灣論點之外，同樣也早在 2007 年時即針對當時台灣社會瀰漫「大綠」、「小綠」[16]的相互攻堅，提醒對於李登輝的多項指控、評判是有違事實的（見陳儀深 2007），並且清楚地說明在他的觀察之中，李登輝究竟是否存在著對於台灣地位論述的改變爭議。

當然，當時會有對於李登輝的謾罵與詆毀，主要原因出現在「保扁」與「反扁」的問題之上。時任總統的陳水扁，包含自己、家人與幕僚團隊，身陷貪腐風暴之中，無論是國民黨乃至施明德發起的「紅衫軍倒扁運動」予之大肆抨擊討伐，還是陳水扁所屬政黨—民進黨本身大老層級做出明顯切割，以求保住民進黨往後在台灣持續經營的可能，都形成台灣政壇喋喋不休與社會動盪不安的特殊情況。

對於李登輝的挺扁與否，卻意外成為保扁人士眾所矢之的撻伐之地，「可惜，一般人不在乎李登輝思想主張的變或不變，不在乎中間偏左路線在台灣社會是否值得呵護開展，只在乎政治人物或政黨力量的消長，保扁和保台灣遂變成一種難以區分的混淆」（陳儀深 2007）。此篇文章的論述其實明顯是一篇為李登輝護航以及辯駁的寫作，至於真相事實與否，並非本文探究的內容，但是其短篇寫作卻同時勾勒出一個李登輝認同研究至為重要的關鍵，即李登輝的「變與不變」。

而何謂李登輝的變與不變，在陳儀深的觀察之中，清楚看見指的是李登輝「思想」的有無轉變，而對於本文核心探討的國族認同研究，以此重要線索之下，黃鈺淳（2011）的《在台灣與中國之間---李登輝的思想脈絡及其中國認識》，則當是更貼近李登輝思想研究以及國族認同是否轉換、進入循環的重要之作。[17]

---

[16] 大綠、小綠：由於民主進步黨的黨旗主要顏色為綠色的台灣圖示，中國國民黨黨旗則是以藍色作為基底，作爲國內兩大政黨（以國會議員席次而論），一般社會通稱接近民進黨的本土意識思想政黨為「綠色陣營」，反之靠近國民黨中國大一統思想則為「藍色陣營」；台聯係李登輝一手扶植創立，走的是本土政黨路線，一般視作泛綠陣營，由於在國會席次明顯少於民進黨，故多稱為小綠，民進黨也因此而稱為大綠。

[17] 有關黃鈺淳在其研究架構（黃鈺淳 2011：19）中引證「認同形成理論」的四個認同發展階段，其實當是出自於 William E. Cross 之手，而非黃鈺淳所指 Phinney 之作，對此缺失，黃鈺淳已在 2011 年的「中國政治學會學術研討會」中撰寫〈台灣政治菁英對民眾國家認同影響之研究〉的研討會論文，將「認同形成理論」四發展階段更正為「Cross」的研究取向。

承前所述，有了李登輝清楚地宣示「中華民國在台灣」，並重新確立了我們應當遵循的法理、法統，及如何面對憲法中所規範與實際統治領土不同的嶄新詮釋，也才更進一步能有所本地區分與探討台灣國家認同是否真實存在與爭議。為此，無論是張景明或是林姮妤，都分別提出了關於李登輝主政下，對於台中關係的影響，以及台灣國家認同爭議的存在。

以張景明（2002）而言，其《李登輝主政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以國家認同為例》，是從國家認同的角度舉例，去觀察李登輝主政時期台中關係的影響與變化。張景明特別強調，在李登輝推動一連串的政治理念與政治改革的主政下，顛覆了台灣人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使台中關係脫離原來「一個中國」的軌道，呈現出多重選項。雖然這篇文章的脈絡清晰，但只能對於台灣人民國家認同做所認知，實際上是無從得知李登輝個人的國族認同變化。

同於張景明將論述重點擺在台灣人民國家認同的變遷之上，林姮妤（2003）同樣對於台灣國家認同的爭議，進行觀察與了解台灣國家認同，是由民主化與本土化兩項主軸牽引著台灣的發展，說的亦是國家認同與民主政治發展的相互牽引。但林姮妤特別強調，其中族群部分，是國家認同的關鍵因素。「牽動台灣族群的國家認同是本土化及民主化兩條主軸。當民主化的同時，台灣也正進行本土化，想藉此塑造新的台灣國族」（林姮妤 2003：101）。

林姮妤並在文中指出，雖然制度面朝著共識前進，但是族群分歧的問題仍是最大的隱憂。林姮妤進一步說明，民主化過程中，本土化也正快速進行，雖然李登輝曾嘗試要融合族群，建立「新台灣人」的人為族群認同，但因為族群間信任不足、立場不一，終究宣告失敗。

台灣的國族認同爭議，顯然必須正面考量族群分歧的相關問題，卻未必然是作當中最大的隱憂。筆者認為，若是建立在「國族」認同的高度之下去探討，能否在群眾中達成最高度的共識目標，可能重要性遠大於「族群」這個層次上經常是用來區分他群、我群這樣的基礎上。李登輝「新台灣人」的策略也許未如預期持續奏效，但是否如林姮妤的失敗之說，或許有待進一步討論與觀察。

而除了地理、文化靠近台灣的日本國度有學者投入李登輝研究之外，曾經就讀於文化大學的德國人 Antonia Maria Sachtleben（華文名為商安妮，以下以商安妮稱之），同樣為李登輝研究注入了有別於亞洲地區的歐美視角，並且以李登輝任內引發高度爭論熱議的「特殊國與國（以下簡稱為兩國論）」作為其論述主軸。對於李登輝研究的世界中，這無疑是一種良性發展與多元投入。

商安妮（2013）清楚地指出了關於李登輝兩國論的提出，即使面對國際形勢的妥協與壓力，此舉未必得以朝向合法化發展，但對於台灣本國人民向心力的凝聚與國族認同的意象發展，可以視為一劑強而有力的台灣國族認同良針。商安妮的寫作初衷，即是打破社會上普遍形成關於兩國論對於台灣國內並未產生實質影響的聲音，以政治心理學的理論驗證實際上兩國論為台灣人民帶來實質的衝擊與心態上的轉換及改變。

也許商安妮所挑戰的有違一般國人對於兩國論後帶來的衝擊與認知，但能憑藉李登輝所打造的台灣經驗，企圖擴散影響中國人民，這是非常理想的論點傳播。也因此兩國論的事實是否存在，並非商安妮探究的重點，能否由於李登輝個人特殊的強力魄力，決心帶領前往正確民主道路之上，於此良基同樣渲染發散到需要改變政體制度的國家 —— 中國，這或許是商安妮寫作之初更想看到的未來結果。

兩國論的議題拋出，的確為美、中、台、甚至是日本等國之間投下了難以預期的政治核彈，所幸十多年過去，台、中仍舊處於好比恐懼總和下創造出特殊的安全距離，並未因而走向極端、引發戰事。但無可漠視的，兩國論相當程度加強人台灣人民對於自己國家的認同，在沒有因此衍生禍害戰爭之下，李登輝當年的論述是一成功之作。當然，即使是如此，商安妮的此篇論文具有其少有的歐美視角，以及論述強調的兩國論影響，但仍舊與本文欲探究的李登輝國族認同有所落差，筆者將保留其觀察兩國論對於台灣人民國家認同的部分，繼續探討兩國論對國族認同的探討。

承續前述國家認同的爭議，我們看到了各式樣態得以切入觀察的視角，當然也包括了以下有關大眾傳播領域「戲劇五因理論」應用。高玉芳（1998）的《李

登輝總統對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言論之戲劇五因分析：以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六年為分析範圍》，就是藉由語藝批評、戲劇五因理論等大眾傳播研究工具，試圖對於李登輝位高權重的言論之下，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等議題進行剖析與探討。

高玉芳的寫作除了提供大眾傳播研究領域能夠與國家/族認同研究產生火花之外，事實上如同前述所提，李登輝仍舊在為總統期間，關於李登輝研究的論文產出是呈現低比例的姿態，也就是絕無稱得上火紅的可能。在投入的人數不多，高玉芳仍以其特殊觀察導入，著實是難得之作。然高玉芳提出的論點，仍置重在李登輝的高度所在，將如何影響台灣人民的國族認同走向，雖然此舉依舊能夠清楚理解，但是自然與本文關注之處形成若干差距；其次則是高玉芳鎖定觀察的年間亦僅僅前後囊括八年之久，自是無法將人進一步窺探李登輝的生命歷程。

談到「戲劇五因分析」去論述李登輝研究，並不僅有高玉芳的寫作。施懿珊（2002）則是以戲劇五因語藝觀點去分析李登輝主政 12 年間的論述，並發現李登輝展現了十足行動者在上的哲學。而其觀察李登輝認為李登輝的最終目的是從「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到創造一個「生為台灣人的幸福」的新場景。無論最終李登輝實踐成功與否，都是在這一段過程之中，李登輝的重要民主行動呈現。

施懿珊並發現李登輝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台灣人民能夠自己管理自己、真正的當家作主，並且在行動者堅毅的努力下，終於造就一個新的情境—一個民主的台灣」（施懿珊 2002：218）。施懿珊雖不是將研究內容重點劃在李登輝國族認同之中，但無論是「生為台灣人的悲哀」、還是「生為台灣人的幸福」，都與李登輝認同研究有著密切的關連。

因為這是直接能夠鏈結到李登輝個人的生命經驗，他想了些什麼、感受到了什麼、心中是否存在著一把國族認同的尺，才會將心思擺放在為了「台灣人民」謀求福利與生命存在什麼國家之中生存的意義。能夠從戲劇五因理論中去看見李登輝內心轉折與行動實踐，是再好不過的一次論文寫作；但是施懿珊純然將觀察李登輝的時間限縮在其主政 12 年間，事實上並無法單純由短時間內的李登輝論述，去全般了解這些心態與行動力與如何積累蘊育的。

第三節 理論架構

現存的國族認同研究脈絡中，即使此議題研究尚稱熱絡，但已然完全成熟的理論應用，大多數迄今仍然處於摸索之中。為了使未臻完善、但值得深入的國族認同研究有著更好的替代解決途徑，學者許維德在其博士論文中，嘗試「以『種族/族群認同形成理論』來分析國族認同」（Shu 2005：36）的研究方式，是一種嶄新的國族認同研究詮釋方法。在面對各方不夠正視與積極處理國族認同研究問題的當口，有了此一國族認同研究的新路徑，對於本研究的幫助甚鉅，同時亦是在「微觀」的國族認同研究中至佳的理論架構，所以筆者以此理論作為採用。

本文欲探討的國族認同研究，面臨的「國族/國族主義/國族認同」情況，同樣遭遇國族研究相關的複雜性與等待駕馭的部分，在爬梳與整理國內現有國族認同研究之後，本研究嘗試以 William E. Cross 的黑人認同發展模型，來析解本文研究對象在各種人生不同階段時期的認同轉換。透過理論模型的確立化，筆者認為，這將別於其他既有國族認同研究理論，在面對李登輝生命史取向的分析上，能夠更加真實呈現與解構屬於其國族認同發展階段的各種內容。

基於以上，本研究採用的理論分析架構基底建立在以 Cross 的黑人認同發展模型為主要理論架構藍圖。同時亦參考 Erik E. Erikson 對於認同定義的闡述，以及 James E. Marcia 有關認同狀態模型的四種取向狀態等，以期相輔相成，作爲在探討李登輝國族認同研究的多重利器。並且透過此次研究，希望有關 Cross「黑人認同發展理論」的應用，能夠更加廣及、加深刻痕地進入國族認同研究的世界，讓國族認同研究有著更令人期待的研究理論視角。

一、 Erik H. Erikson：將認同視為心理社會階段（Psychosocial Stage）

在進入討論「認同」研究的領域之中時，通常 Erik H. Erikson 會是在這個範疇中優先登場的重要人物。源自於 Erikson 對於自身認同產生混淆錯亂的緣故，

他對於認同因而有了極為用力的研究與努力；而廣為眾人知曉關於 Erikson 的認同研究成就，當屬「心理社會發展論」最負盛名。

依此理論，Erikson 將人的認知發展區分為八種不同階段，簡單來說，對於每一個發展認同的人們而言，不同階段中都將面臨可能存在的發展危機，每一個人對於適應與克服危機的時間與能力有所差異，而至終將隨之影響進入下一階段發展認同的順利性與停滯與否。

Erikson「心理社會發展論」的 8 個階段即是：(1)「信任(trust)、疑拒(mistust)」、(2)「自主(autonomy)、羞惑(shame，doubt)」、(3)「進取(initiative)、罪疚(guilt)」、(4)「勤業(industry)、自卑(inferiority)」、(5)「認同(identity)、認同混淆(identity confusion)」、(6)「親密(intimacy)、孤單(isolation)」、(7)「創建(generrativity)、休怠(stagnation)」、(8)「統整(integrity)、絕望厭惡(despair and disgust)」等 8 種。

表 1-1：Erikson 心理社會發展理論的八個階段

階段	年齡	發展任務與危機	發展順利的特徵	發展障礙者特徵
1	0-1（嬰兒期）	信任與不信任	對人信任，有安全感	面對新環境時會焦慮
2	2-3（幼兒期）	自主行動（自律）與羞怯懷疑（害羞）	能按社會行為要求表現目的性行為	缺乏信心，行動畏首畏尾
3	4-6（學齡前兒童期）	自動自發（主動）與退縮愧疚（罪惡感）	主動好奇，行動有方向，開始有責任感	畏懼退縮，缺少自我價值感
4	6-11（學齡兒童期）	勤奮進取與自貶自卑	具有求學、做事、待人的基本能力	缺乏生活基本能力，充滿失敗感

5	12-18（青少年期-青春期）	自我統整（認同）與角色混淆	有了明確的自我觀念與自我追尋的方向	生活無目的的無方向，時而感到徬徨迷失
6	19-30（成年早期）	友愛親密與孤癖疏離（親密與孤立）	與人相處有親密感	與社會疏離，時感寂寞孤獨
7	31-50（成年中期）	精力充沛（生產）與停滯頹廢	熱愛家庭關懷社會，有責任心有正義感	不關心別人生活與社會，缺少生活意義
8	50-生命終點（成年晚期-老年期）	自我榮耀（統整）與悲觀絕望	隨心所欲，安享餘年	悔恨舊事，徒呼負負

資料來源：轉引自宋美慧（2008：44）

二、 J. E. Marcia：認同狀態取向（Identity Status Approach）

另外，同樣在認同研究領域中佔據重要位置的國外認同狀態研究大家，就是 J. E. Marcia。Marcia 發展出了認同狀態中的四種認同狀態取向（Identity Status Approach），其根據正好就是來自前述 Erikson 的認同發展理論。當然有這樣新樣貌的發展，其實是來自於 Erikson 心理社會發展論中尚有不夠準確與受人非議的部分，界定認同定義的模糊不清，致使其後研究者陷入麻煩與苦惱，端此，Marcia 遂提出將認同定義為一種反身式的自我結構。

透過半結構式的問卷設計，Marcia 針對受訪者進行了研究調查，並將重點鎖定在認同結構形成的「過程」之中，嘗試將認同重新定義。Marcia 以「探索」（exploration）、「承諾」（commitment）為其中兩大重要面向，並依據此二種歷程將認同分為四種狀態，以下分別對於探索與承諾，以及衍生劃分的四種認同狀態做一詳盡的介紹與說明。

首先說明有關探索及承諾的這兩個面向。「探索」，指的就是一段找尋最終答案的過程，在這過程之中，伴隨著掙扎與質疑，無論是職業的選擇、生涯的規劃、甚至是對未來另一半的態度，都是在探索期中因為個人對於其認同產生的不同層面而引發的各種效果。而「承諾」指的則是當人們已然對於上述不同層面的問題，開始產生認為正確答案之所在後，同時間透過了行動去具體實踐那些選擇。

接著，我們將依序說明由上述衍生劃分出的四種認同狀態，分別為（一）認同分散狀態（identity diffusion status）、（二）認同早閉狀態（identity foreclosure status）、（三）認同延宕狀態（identity moratorium status），以及（四）認同完成狀態（identity achievement status）。

首先，我們看到第一個「認同分散狀態」。此一狀態中的人們，因為位處欠缺探索、未有承諾的情況，也就自然可能不曾體驗過何謂「認同危機」。也許在此過程中，個人曾經有過一段粗淺的探索時期，但由於並無法有所能力去克服那些問題，以致於對於自己息息相關無論是職業選擇、意識形態、未來目標等，都尚未能夠找到自己的定位。

第二個，是「認同早閉狀態」在此狀態中的人們，因為缺少了探索，所以並沒有經歷過認同危機；但是，此一階段是存在著承諾的，只是這種承諾上必須倚靠父母、或是其他在生命中重要的人影響之下，才會對職業選擇、意識形態等目標產生承諾。

第三，是「認同延宕狀態」如同此一狀態中的名稱所示，「延宕」指的正是尚處於認同探索的階段，由於承諾的不夠，只能任其持續探索，也正陷入認同危機之中。但事實上進入此一狀態時，對於職業選擇、意識形態、未來目標等，其實已然存在著許多可供決斷的方向與指標，只是尚未能單一做出唯一選擇。

最後是第四種「認同完成狀態」。進入到「認同完成」狀態的人，意味著順利度過了認同探索的階段，並且對於承諾也已走進穩定的狀態。此一狀態完成的人，至終有了能力對於職業選擇、意識形態等做出抉擇，哪怕是明知對於實踐認同上可能遭遇困難與未必好走，仍舊願意勇往直行、向前邁進。

三、 William E. Cross：黑人化心理學認同發展模型

William E. Cross 的「黑人化心理學」認同發展模型，是本文採用的核心分析架構。在 Cross 的發展模型中，將認同過程分為五種階段，第一階段是「前遭遇期」、第二階段「遭遇期」、第三階段「沉浸期」、第四階段「內化期」、以及最後階段的「內化-承諾期」。但由於最後的內化-承諾階段在劃分上時常容易與內化期階段混淆、模糊不清，是故本次研究仍採用與國內族群認同研究學者許維德相同的方式，將第四階段與第五階段視為同樣屬內化期階段，僅就前四種發展階段作為探討的內容。

本著國內學者許維德曾經嘗試以此黑人化心理學模型套用在其研究台美人國族認同的轉變歷程，本文亦將嘗試以此為基礎，將李登輝各種不同生命階段歷程的歷經與轉變套入其中，展開論述。以下就 William E. Cross 於 1970 年所寫的“Rethinking Nigrescence”一文中，提及的五種階段內容，輔以許維德主張所提將第四、五種階段合併敘述與濃縮，簡短說明本文同樣主張的四種階段。

首先看到第一種階段：「前遭遇期（Pre-encounter）」。前遭遇期中，由於受制於白人主宰主流社會的風潮，使得這些生而為黑人的人，對於自身並無擁有與其他優勢族群（如白人族群）才有的膚色與社經地位背景，不管是在正式與非正式的教育之中，默然承受早已強壯成形由白人主導的主流社會。他們並未有所抵抗力將白人社會產生的優勢文化加以否認或者去除，反而通常是走向接受的態度，嘗試融入白人創造的所有價值、邏輯，及一切用於平時社會中所謂主流的一切評價方式；並且此階段的黑人，是抱持否定或是傾向拒絕自身獨有的黑人文化。

Cross 認為，前遭遇期的涵括甚廣，它可能從童年期、青少年期，乃至早期成年期階段。而其中此階段尚包含了三種不同重要的類型：低強度態度、社會污名態度、反黑人態度，茲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低強度（low salience）態度」。抱持此種態度的人，其實不去刻意否認自己有著黑人的身分，只是這個身分並未對於他的生活帶來什麼樣實質上的

影響，更無所謂的衝擊。他們所過的所有生活一切，大體上都與黑人二字無關，而寧願將心力置重在種族之外的生活日常事務，如自己的職業發展、宗教信仰、家庭生活，或是在爭取社經地位的呈現上。

第二，「社會污名（social stigma）態度」。由於身處遭受打擊、迫害的一方，所以當人們談論到有關對於黑人歧視等相關議題與污名化時，正踩著了他們的痛處，於是乎才開始有了所謂的反應。但這些反應往往並非為了訴諸已身的黑人文化認同而來，他們和前述的低強度態度相同，並不真正地在乎自己族群遭遇到了什麼樣的為難處境，而是針對這些受打壓的議題所產生的壓迫與感受，而做出滔滔不絕的闡述及回應。

第三，「反黑人（anti-Black）態度」有著反黑人態度的這些黑人，基本上對於所有有關一切因黑人而起的任何訊息，都是抱持著百分之百反對與厭惡的態度，有時那樣的觀點與想法，與之白人特有的種族優越並無二異，並且認定所謂的黑人文化就是應該屏棄及離得愈遠愈好的。然而與反黑人相呼應的，這些黑人對於白人及白人文化的看法，則是處處充滿正面表列與望之讚嘆的。

接著看到第二種階段分類：「遭遇期（Encounter）」。由於在前遭遇期認同已然形成，通常會一直延續到早期成年期的階段，若不是因為一件、或者一些重要事件的衝擊，原本固有的認同是不會遭受變化與打破的。所以在認定是否進入此階段的主要依據，第一就是個人是否遇上某些重要的事件，對其造成衝擊；第二是經歷過這些重要事件後，是否為其「個人化」，讓這些遭遇有所內化與省思。

更具體而言，所謂遇上一件／一些重大事件，它的範疇其實可以是具體，亦可能是帶有抽象的意念。可能是一個重大的新聞事件造成波動與衝擊、可能是在日常生活不斷反覆接收外界給予的訊息而引發了一場夢帶來的感悟，也可能只是一次看似再也平凡不過地與他人對話相處之後產生激盪與共鳴。

而所謂進入個人化的情況，則是當上述經歷過的事情，不單單只是過了就算了，而是要真正地有所省思、內化，成為個人可以撼動原有的固有認同。在這些種種徵兆進入遭遇期之後，歷經此一階段的黑人開始有了焦慮、失序、紊亂，更

有甚者，會走到相當憤怒情緒的階段。當兩個依據前後分別發生後，才能說是真正地進入了遭遇期。

另外，第三種分類是「沉浸期（Immersion Emersion）」這是一段再社會化的過程。延續著前一階段「遭遇期」的餘韻，因為已經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衝擊以及自我內心的激盪與挑戰，這個時期的黑人，開始嘗試丟棄原有的老舊觀點，並進一步企圖建構新的認同，對於自身原有的認同有著強烈的懷疑與願意割棄。

但由於是一段無中生有的新認同建構過程，這個階段的黑人其實並不真正知曉什麼會是千真萬確的新認同內容，他們可能出自想像，或者「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方式，刻意去否定過往自己崇尚的白人文化認同，並且因為過去的所作所為，感覺羞赧甚至罪惡。

然而基於對即將建構新認同的種種不確定因素，在這個過程中即使努力透過找尋可依循的個人或團體，仍然未必使其能夠順利地完成此一階段的歷程。因為他的世界尚未真正地進行改變，就算已然下定決心，所有事情並不一定就此順遂順從，也導致在這一階段的黑人們，常陷入停滯或是退縮的普遍現象。

最後一種階段分類：「內化期（Internalization）」處於內化期階段的人們，不再若以往各個階段中都會存在的新舊認同轉變的矛盾與衝突，其中能以身為黑人視為一種驕傲，是重要關鍵的指標。另外不僅於此，不會再因任何既有的仇恨與敵視，去排斥白人文化的一切，反而更能平淡地接受與對待其他種族文化的共同存在，呈現著多元文化主義的精神。

然而即使進入到了內化期階段，這一種認同狀態卻同樣絕非遙不可破的，認同具有「流動」特質已於前述表述，所以一旦在此階段再次遭遇重大事件的影響及衝擊，那麼認同仍舊回到循環之中，往之前的階段之中探詢、反覆不斷摸索。

只是有別於其他階段的進行，一旦進入了內化期階段，其實已經放下其他階段才會出現的對於與其他種族存在的偏見、衝突，並將所關心的事物轉向其他的認同關懷，如「宗教、性別、性取向、生涯發展、社會階級和貧窮、以及多元文化主義上了」（Shu 2005：111-2）。

最後，「內化」同時是本階段最重要的語彙，在此指的內化，是建構一種深植入內心深處的非凡意義，不再輕易受到因種族認同身分而起的各項特殊原因，並跨越克服了過去各種五花八門關於黑人身分衍生的困難與挑戰，更能專注在種族以外的各項事務，將黑人性與其他生活中重大信息、議題，取得一個得來不易的絕佳平衡。

表 1-2：「黑人化過程（Nigrescence）」的四個階段

黑人化過程的四個階段	抽象表達.. 每個階段相對應的態度 以及特質	實質的行為和態度的顯現
1.前遭遇期	對種族的低強度態度； 將黑人性視為一種社會污名（social stigma）；反黑人態度（anti-Black attitudes）	抱持低強度態度的人雖然沒有強調自己身為黑人的事實，但是卻也沒有否認它。如果否認的話，他就可能可以歸為反黑人態度。
2.遭遇期	遭遇期 = 經驗到黑人性相關的事件、夢想、或者是洞見。遭遇經驗必須被個人化（personalized），也必須能夠改變一個人的觀點和態度。	遭遇期是一個人會開始找尋和黑人性相關之資訊、參加和黑人性相關之會議或聚會的起點。
3.沉浸期	將舊認同去除，將新認同打造出來。處於這個階段的人尚未真正改變，但已經決定她/他要改變。通常會伴隨著氣憤、焦慮、以及失序感。	新認同在一開始的呈現方式可能是淺薄的、極端理想主義的、十分戲劇性的、同時也十分粗糙的。處於這個階段的人，尚未完全習慣於這個新觀點和新認同，同時也可能還缺乏關於這個新認同之適當規範的資訊。
4.內化期	兩種認同共存的不和諧狀態已經解決，個人達成一種新的動態平衡，對於自己的新認同也感到十分愉悅。個人之自我的核心已經被重整過，然而，	新認同已經被內化，同時也已經變成個人之自我的「自然」部分。一般性的防衛性行為、以及簡化式的思維方式已經淡出。當個人在考慮事情的時候，黑人性變成

	改變的並不是個人的人格，而是個人的團體參考對象以及世界觀。	許多最重要之考慮點的一部份。此外，個人對黑人議題有極深的承諾，常常會參與黑人取向的文化和政治組織。

資料來源：Shu（2005：100）

而在明確地確立了本研究將採用的理論架構後，筆者嘗試性地更進一步說明，定調於 William E. Cross 的「黑人化心理學」認同發展模型應用，是基於何種考量，進行於本次研究之中。於此同時，必須回顧到目前既有運用前開 Cross 黑人化心理學認同發展模型的現存文獻。如施茗棻（2010）、黃鈺淳（2010），以及羅致遠（2011）等，皆曾經運用此模型在學位論文的研究之中。

如同羅致遠（2011：45）所提：「若以原生論或工具論來解釋國族認同的產生與形成，顯然是過度的簡化了人類思考的模式。在每一個認同產生的背後， 可能包含太多因素，如成長的環境、教育程度、性別差異、重大事件的發生……都可能造成當事人的認同固著或是認同改變」。在此思考下，顯然國族認同研究的複雜程度，遠超乎其他相關族群研究既有理論所能輕鬆駕馭。

筆者亦認為，採用 Cross 的認同發展模型，貴在其別於以往認同研究大都強調「狀態」的呈現（e.g., J. E. Marcia），而忽略了「階段」發展的可能。由於認同若以狀態的方式表現，則不容易看見認同特有的「流動性」，也無法詳盡地看出認同在面臨轉換之際，究竟是什麼樣的決定因素，致使認同流變。為了清楚地窺探李登輝國族認同的發展過程，以「階段」劃分的模型應用格外重要。

而與本研究琢磨內容相仿的黃鈺淳（2010）博士論文，亦在摘要中提出：「探究李登輝的認同究竟如何建構，不同階段的認同核心是否有所變化，其認同產生何種流轉？」同樣希望透過 Cross 黑人化心理學認同模型具備的「階段」特性，去解構李登輝國族認同的核心變化因素，並同時期待藉此看見認同的流轉。

最後回顧的則是施茗棻（2010）的研究：《嘻嘻哈哈之外：蜜拉希耶爾小說《安妮塔與我》中的南亞/英國認同》。施茗棻研究的主軸，則是透過 Cross 黑人

化心理學認同模型，去補充在 Meera Syal 的小說《安妮塔和我》中缺乏國族認同發展的分析，來詮釋「南亞／英國認同」的轉換及變化。

以上這些相關應用 William E. Cross「黑人化心理學」認同發展模型，目的均在於更詳盡地看見國族認同發展呈現出的階段差異，以及致使流動與轉變的核心原因。基於上，吾人更加確信運用此認同發展模型，將有助釐清複雜多變的李登輝國族認同狀態。希冀透過此模型運用，找出李登輝各生命階段中，影響其國族認同呈現變化的根本原因。

第四節 研究方法及主要資料來源

本文寫作採用的研究方法，將是「傳記研究法」。由於本研究對象本身具有特殊的身份，與特有的舉世成就，所以在蒐集有關李登輝相關的書籍著作及研究資料成果，自然不虞呈現匱乏，這是進行傳記研究難得有的利基所在。當然也因為素材眾多，所以在挑選合適作爲參考文本的篩選工程上，自然也必須格外謹慎與有所道理依循地選擇，本章節將針對何以從諸多可供參考的文獻中，選篩出筆者認為最具琢磨、取之引用的理由，作一翔實的解釋說明。

在檢索探究相關李登輝的研究著作之際，不難發現其各式樣著作種類繁多，其中包括對自我生命成長各種階段、具備各種不同身份的論述，同時另有第三者對於李登輝的評論、探討與觀察。希望透過交叉核對的方式，能夠在諸多敘述中建立相互間對話的可能性，歸納各種類別間的共同點、探究同時存在其中的差異點，讓我們能夠盡可能理出一條思緒清晰的李登輝生命道路，不至於遭受李登輝研究的浩瀚書海所淹沒。

至於有關資料的蒐集與選擇，源自於李登輝作為台灣民主化後首位卸任元首，對於其相關的評論、論述，乃至於關於其個人的著作與口述生命歷史，絕大多數屬於正式出版品，並且許多已發行多年，內容自然可受公議，理當具有相當高的信度，以及做到一定程度的釋疑。

但也因為李登輝在政治領域中輝煌的成就與功業，在當代的台灣仍舊具有相當程度影響時政能力，所以在傳記研究法中需要採用的大量論述文本，將遇到一個可預見的絕大風險，也就是各式文本中可能面臨到基於對於著作發行時李登輝仍是國家權力掌握者，乃至於在卸任後，依舊保有其影響力，所以在諸多的著作寫作上容易製造華麗，少去了其中原應有的真實樣貌。這一點問題，筆者嘗試以多方面的資料蒐集，除了既有官方資料（國家出版品/李登輝個人著作）外，找尋更多坊間出版資料，來反覆論證，以期收到最真實的呈現與效果。

一、 研究方法：傳記研究法

一個人的生命史呈現，能否單純透過自身文字、口述的紀錄，以及他人筆下的描述而得以完整呈現，這恐怕是一件危險而且容易有所差錯的方式，原因在於無論是主、客觀的描述，都會有其盲點與無法跨越的鴻溝，「選擇性記憶」通常是每一個人容易置身的情境，也是常理下經常發生的事情。舉例來說，我們經常有機會閱讀到所謂的「偉人自傳」，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共同點，意即選擇出版自傳的偉人們，一部分來自傳主人翁的一手資料，或以自力著作、或以口述後他人代筆寫下，也就避免不了人性中常出現的「隱惡揚善」，自然不會全面的呈現這一個自傳主角的各個面向，形成對於真實事件的落差。

另一種常見的，則是以「傳記」方式呈現。許多重要人物去世後，[18]後人推崇其在生時的諸多貢獻，希望透過傳記書寫，期供世人學習與效仿。但也就是這些寫作來源通常只剩二手資料可以找尋，或是透過第三者的認知與理解，去記述傳記中的主角人物，先且不論歌功頌德與否，單就相關資料來源的真實性與可信度，就可能必須為其折扣一番。所以這也往往是傳記研究所必須顧慮、加以說明的部分。那麼為何仍舊採取傳記研究法的方式進行本文的研究？茲就以下說明。

[18] 當然傳記也可能出現在傳主仍健康於世時，即有寫作者進行寫作甚至是採取訪談傳主的方式以求真實度；但本段落中為求凸顯與自傳可能形成的差別，特此舉例說明是在傳主過世以後所進行的傳記寫作。

依照王明珂（1996）的說法：「傳記是以一個人的生命史或生命史的一部分為主要內容的研究，寫作者不是傳記中的主體；而『自傳』則是一種自我描述，是自我生命的書寫，是一個人將生命史中的一些過去，寫成文字或編輯成書，並由自己或他人流通的文獻」，傳記與自傳的構成方式或許有所重疊，但最大的不同，就是自傳源與「自我描述」緊密相結合，傳記則不一定透過這種方式成立。而在這二者之中，尤其重要的是無論自傳或傳記，生命史中的「一部分」/「一些過去」，意味著呈現的生命史不會是一個人生命樣貌的全部呈現。

承上「生命史中的『一部分』/『一些過去』」，這個部分在對於傳記研究中較常顯現的情況是有關傳主相關的「童年」記憶。一方面在幼時乃至求學的成長過程中，不容易有完整的文字記錄去佐證這段期間發生的大小事，一方面則是囿限於人類的童年記憶未必可靠，即使不是刻意隱瞞或保留，都可能因為零碎形成結果或認知的不同，造成與事實的短出。

所以既已無可避免地材料資訊落入空泛，在傳記研究方法中，應盡可能多面向地蒐集不同視角的資料來源，前後琢磨比對，去得到最可能接近事實的部分。就這一點而言，隨著傳主個人的成就或許不同，而可能得到的資訊與真實性，就可能呈現若干量的差異；換言之，以傳記研究的方式為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受世人矚目的程度愈高，其相關可找尋查閱的資訊亦可能呈現得愈多，反之亦同。

由於李登輝恰巧符合高成就與高矚目的研究對象，對於李登輝各項相關的自傳、傳記數量不虞匱乏，也正因為李登輝曾任國家領導人的高度，所以他的言行舉止不說，單就出版著作內容的真實與否，都會受到世人拿著放大鏡地逐一檢視，也就正好能夠回應其個人在各個人生階段中所留下的記憶、紀錄，是否具有真實以及可靠。若是李登輝言而不實，當容易讓人揭穿與披露，這是公眾人物必須面對的不爭事實，卻也是對其進行傳記研究得天獨厚的自然印證。去蕪存菁同時是傳記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與元素。

以上，也許傳記研究法仍舊有其困難與待突破之處，但由於挑選研究對象的不同，會使得在找尋相關文獻時的可信度不一，本研究對象其相關研究著作甚鉅，

除經年累月可供世人公評的諸多公開出版品相繼問世外，民主國家中「國家領導人」賦予其讓世人全面檢視的責任與無可躲避地必須面對，無論是自傳的寫作，還是傳記的出版，都相對提升可供參考的可信度。當然，「盡信書，不如無書」，任何透過文字記載的事件，未必就是事情的真實樣貌，必須小心；然而透過大量回顧與閱讀、反覆摸索與辯證，定能更完整地探索李登輝的國族認同。

二、　主要資料來源

誠如上一章節所述，本文採用「傳記研究法」為本次論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取材以李登輝個人自傳、著作與相關傳記、專書等為主要軸線，並加入相關李登輝認同研究相輔相成。總括而言，這些公開的出版品包括：李登輝個人的著作、傳記、與其相關的認同研究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報章雜誌等；資料來源涵括：國家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大學院校圖書館、政府部門、財團法人群策會等。

而為了免除考量李登輝可能如同常人般常見的「隱惡揚善」，雖然短接觸的訪談內容是極為珍貴的資料來源，卻不見得是本文必須依賴之客觀方法。是故，本文在資料來源上會少去第一手與李登輝的對話訪談收錄，在此特別說明。至於如何在眾多李登輝相關的自傳性與傳記性作品中挑選出不可或缺的參考內涵，以下將進一步闡明找尋這些作品的標準與依據，並劃分三大類別：「李登輝自傳」、「李登輝傳記」、「李登輝著作」，來說明代表不同資料來源的選擇重要性。

首先我們看到第一種類別：「李登輝自傳」。事實上，至今尚無一本真正以「李登輝自傳」為名的自傳著作，但李登輝個人著作中卻不乏類似以自傳方式呈現的記述內容，其中當以 1999 年《台灣的主張》、2015 年《新・台灣的主張》、2016 年《餘生》，這三本著作最為接近李登輝個人自傳的表述方式。

也許上述三本著作內容多為李登輝從政一生的自我回顧與註解，並強調對未來亞洲政治乃至台灣、日本、中國的渴望、想像與建議，但共同點卻不僅於此。李登輝同時清楚交代了個人性格的養成，受了何種教育、書籍、思想的啟發，以

及不同生命階段中遇到了哪些影響其一生境遇的重大變革，這些都是本文採取傳記研究脈絡下至為關鍵的線索與軌跡。

此外，有關李登輝自傳類作品以現有作品歸類而言，當屬 2008 年由李登輝口述、張炎憲主編的《李登輝總統訪談錄》最具自傳規模與形式。裡頭詳載了李登輝個人生涯的四大不同生命面向，包括「早年生活」、「政壇新星」、「信仰與哲學」、「財經產業」，實際上就是李登輝生命歷程的各種主要記述及呈現。期望藉由既有專業的紀實與李登輝個人一手資料的提供與敘述，作為李登輝各種不同生命階段主要的評判軸線，以及得以窺見鮮為人知的早年／童年生活。

接著進入第二個類別劃分：「李登輝傳記」。在討論李登輝傳記之前，必須先就研究李登輝專書資料蒐整的主要來源做一清楚的交代。累積於「文獻回顧」章節時的既有基礎，筆者同樣以「國家圖書館」的公開出版收藏為找尋有關李登輝研究專書的主要利器及方法。我們同樣找得了為數可觀的相關李登輝專書出版。

由於本章節主要找尋「傳記」方向在於「他者」對李登輝傳記書寫的相關內容，而非李登輝本人的自傳著作，所以在此條件下，首要排除李登輝為作者的圖書出版品，扣除之後所剩的館藏品計 127 種。但如何在這多達百餘種的李登輝研究專書中找尋真正屬於傳記的研究範疇，則是以下重要論證與闡述的內容。

雖然相關李登輝研究的專書眾多，但仔細經過疏釐爬梳之後，其中不乏帶有濃厚政治批判色彩，如李敖的《李登輝的真面目》（2000）、曾祥鐸的《李登輝批判》（1996）、陳陽德的《奪權：吳梓.李登輝恩怨秘錄》（1995）、張友驊的《李登輝兵法：李、郝軍權爭奪戰》（1992）等求的是限縮在李登輝的政治世界中功過得失，著重的是李登輝主政生涯中，在權力運作下大眾所難以窺探的諸多秘辛，但由於定調為秘辛的緣故，成了官方不會去證實，更不會得到李登輝正面回應的內容所在。這個部分暫且排除列入傳記內容的主要參考來源。

再來，則是因為李登輝貴為國家領導人，有關其元首身份下誕生的相關專書亦不在少數，如允晨文化出版的《李登輝總統照片集》（2005）、中央日報社集結社論精選出版的《李登輝理念的實踐：中央日報 87 年度社論精選》（1999）、

丁遠超的《李登輝選戰日記》（1997）、正中書局出版的《存在.希望.發展：李登輝先生「生命共同體」治國理念》（1993）、中視文化出版的《李登輝先生》（1990)等此類官方宣傳色彩濃烈的著作出版，同樣非本次傳記研究的取材方向。

另外則是可能源於坊間趣談，或是以李登輝為主要訴求對象衍生到各種層面的論述發展，如雷鳴的《李登輝甩了我：一位癡情女子的哀怨心聲》（2002）、陸鏗的《別鬧了，登輝先生：12 位關鍵人物談李登輝》（2001）、李孟的《李登輝學校：厚黑教戰手冊》（2001）、李曉莊的《李登輝與女人》（1996）、蔡羊我編的《愛的推銷員：李登輝的心靈世界》（1990）等。先且不論這些著作引述及表現的內容是否經過查證與確認，單就這些內容的表述方式與專注的範疇，即可排除在傳記研究的文本收整之中。

那麼究竟在這浩瀚的李登輝研究專書中，哪些真正算是李登輝傳記的核心文本，筆者認為，作為他人生命歷程記錄的他者，也許無法鉅細彌遺地完整呈現傳主的完整人生風貌，但至少必須是對其某一階段歷經的人生有著客觀並且盡可能貼近事實的陳述。植基於此，本文選定了以下（表 2-3）12 本著作，納入傳記研究中，他者對於李登輝生命史呈現記述的主要著作。

表 1-3：李登輝研究傳記選篩文本整理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出版年
哲人政治家李登輝之「我」	黃文雄	前衛出版社	2011 年
臺灣政治家：李登輝	柯義耕	前衛出版社	2008 年
李登輝與台灣的國家認同	蔡石山	前衛出版社	2007 年
虎口的總統：李登輝與曾文惠	上坂冬子	先覺出版	2001 年
近寫李登輝：紅樹林生活筆記	李靜宜	遠流出版	2001 年
替李登輝卸妝	徐淵濤	徐淵濤出版	2000 年
共產青年李登輝	藍博洲	藍博洲出版	2000 年
李登輝新傳	伊藤潔	希望出版	1996 年

少年李登輝	邱定一	商周發行	1995 年
從源興居到總統府：與李登輝面對面	秋淑等著	漢光文化	1995 年
李登輝的七十年	許漢	開今文化	1993 年
李登輝傳奇	張永和	躍昇出版	1990 年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查詢系統，本研究整理製表。

最後讓我們看到第三個類別：「李登輝著作」。李登輝的著作繁多，正式出版作品最早可追溯至 1968 年李登輝的博士論文作品，其後由於其農經學者身份的關係，亦有不少相關農經學術論文著作發表，但此類作品主要聚焦在對於學術專業的研究與貢獻，與其個人生命歷程經歷較無正相關的連結，卻仍會以鳥瞰的方式檢視這些眾多的學術論文，在當中找尋是否在某些李登輝生命歷程中透露了什麼樣特別值得參考的訊息，並以資運用；本此，此類學術相關作品亦排除於外，不納入本文傳記研究寫作的主要資料參考。

除了前述李登輝「自傳」相關的作品以及上述屏除的學術作品外，李登輝尚有許多重要的個人著作出品。其中包括「宗教信仰的見解」、「從政生涯的紀實」、「日本武士道文化的析解」等不同範疇的書籍呈現，都是本文列入參考資料的重要來源。當中包括 1989 年《愛心與信心》、1995 年《經營大台灣》、2000 年《亞洲的智略》、2004 年《「武士道」解題》、2005 年《新時代台灣人》、2009 年《最高領導者的條件》、2013 年《二十一世紀 台灣要到哪裡去》、《為主作見證：李登輝的信仰告白》等書。

由於這些書籍都是李登輝個人一手的著作，也許主要訴求的內容與發表的想望不同，而無法一以概之的予以理解，但卻真實的反映與呈現李登輝在面對各種問題時的心境與解決問題提出的想法與對應，對於李登輝生命歷程中遭逢的事情與境遇，當是具有莫大參考價值與重要的脈絡依循。

三、 小結

綜合上述所言，本文傳記研究主要核心經過選篩的文本範疇將包括第一類李登輝本人親著的自傳類作品、第二類他者對於李登輝傳記式的記述文本、以及第三類李登輝個人著作之其他重要作品等計三大參考文本類別來源。

由於本文採取傳記研究法寫作，所以主要的參考文本軸線，將著重在傳記作品的範圍之中，無論是「自傳」亦或「傳記」。並且基於本研究章節規劃，將李登輝生命史劃分為七大不同的階段，分別呈現在第二章至第八章之間。以下表格內容為七大生命時期的階段劃分與概述分階段的原因。

表 1-4：七大生命階段劃分概述

階段	時間	章節	分階段原因概述
階　段（一）	1923-1946	第二章 大日本帝國殖民時代	李登輝生於 1923 年日本殖民體制年代，求學參戰緣故，1946 年春天才正式自日本返台，成為國民黨政府子民。
階　段（二）	1946-1971	第三章 國民黨政權來台初期	1946 年至 1971 年，李登輝平實地生活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之下，求學、成家、就業。一直到 1971 年加入中國國民黨，此後走向從政生涯以前。
階　段（三）	1971-1984	第四章 走進體制、平步青雲	1971 年加入國民黨之後，1972 年李登輝正式成為國家體制內的一員；在此期間仕途平順，官職歷練非凡。
階　段（四）	1984-1990	第五章 輸誠表態、直上天聽	1984 年正式成為「中華民國」副總統，1988 年成為中華民國「總統」，是人生成為中華民國代言人的特殊生命階段。
階　段（五）	1990-2000	第六章 當家作主、登峰造極	1990 年、1996 年，兩度贏得總統選舉勝利，開啟李登輝個人主政的黃金十年光陰。同時出現「中華民國在台灣」，以及「特殊國與國關係」等重要論調。
階　段（六）	2000-2007	第七章 期初的李前總統生活	2000 年卸任國家元首後，開啟正面擁抱台灣獨立運動的全新局面；李登輝正式與所有代表中華民國符號分道揚鑣。
階　段（七）	2007-2016	第八章 見證第三次政黨輪替	20007 年受訪媒體引發的「放棄台獨」風波，讓李登輝為推動台灣獨立運動與否，做出新階段的論述與詮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第二章 大日本帝國殖民時代（1923-1946）

西元 1923 年，是日本大正 12 年，恰巧，也是中華民國成立的第 12 年。只是當時的台灣，已經自 1895 年來，經歷了日本殖民統治的第 28 個年頭，所謂的「民國」12 年，並不適用彼時彼刻的台灣。台灣的年代、年份，依循在日本「大正民主」的時光。以日本統治台灣前後 50 年的縱軸來看，此一年份屬於殖民時代中後段開端；是年 4 月，皇太子裕仁（於 1926 年繼任大正天皇皇位成為昭和天皇）出巡台灣；同年，日本殖民政府開始積極在台灣實施同化政策。[19]

以 1895 年之後出生在台灣的人起算，最大的年歲已經來到了至少 27、8 歲，是一個已然能夠組織家庭、繁衍下一代的年歲了。繁衍後代，向來是人類得以永續發展的不二天性與法門，無關乎族群、地域、膚色、乃至國家的區別。這樣綿延不絕、生生不息的生命延續，也自然發生在日治時期的台灣，和清廷、乃至於 1912 年創立的中華民國無直接相關的「日本」台灣人，相繼地在台灣誕生了。

至終戰前，日本帝國前後一共在台實施長達 50 年之久的殖民統治，這一段歷史即使到了 70 年後的今日，台灣社會各界依舊存在著各自不同的體認與解讀，本文主人翁李登輝即是誕生在日本統治時期的中後半段；更尤甚者，日本政府離開台灣之時，李登輝已經是一位歷經日本求學、擔任過日本帝國軍官、參與過戰爭的成年人了。日本教育體制養成的他，對於日後國族認同的形成與轉變，是一段無可抹滅與不可迴避的既存過去；欲了解李登輝個人的國族認同，當從自小的成長階段探索起，恰巧，那一段時光，正是「大日本帝國殖民時代」。

[19] 事實上同化政策的起訖時期皆有說法，「王詩琅，將日本統治分為三期……同化政策時期（1919 年~1931 年）……高賢治將日本統治分為四期……同化政策時期（1936 年 10 月~1945 年 8 月……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的三段式分期……同化政策時期（1919 年~1937 年）……」（林淑惠 2012：87）。本文引述自柯義耕（2008：73）：「李登輝生於一九二三年。在台灣歷史上，這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因為從那一年開始，日本開始採行同化台灣人的政策」。

第一節 童年與青少年階段（1923-1940）

一、 客家族裔的李氏家族

1923 年一月份的寒冬時節，[20]位於台北州淡水郡三芝庄的一個後來舉台聞名的私人宅第——源興居，清脆、響亮的娃娃哭聲傳出；除了是一個新生命的翩然降臨之外，更是這戶人家新生一代的第二個成員。由於這個以李財生[21]為首的家庭，自家族分枝散葉之後的人丁並不算多，所以新成員的到來肯定受到所有人的目光投射與期待；無論性別為何，相信同樣都會被寄予祝福的眼光，並且盡心呵護著他成長。這一位孩子，是一位相貌堂堂的男丁，日後也果然出人頭地、甚至位高權重，成為了引領民主浪潮的領導者，1988-2000 年的台灣總統——李登輝。

如同許多如今在台灣落地生根、繁衍子孫數代，大多數自明、清時期大量自中國渡海來台拓墾營生的福老、客家族群一樣，李登輝的家族正是從現今中國福建省龍巖市永定區遷居來台的移民家族，並且在族群分類上，屬於客家族群的光譜。但是客家族群的這個身份，來到了李登輝父母親這一代時，客家話已非他們經常使用的語言，李登輝的雙親甚至沒有教導李登輝學習客語，[22]「福佬客」是更接近李登輝的族群標記；而單就這一點，李登輝在由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主編的《李登輝總統訪談錄》（2008）中，以「福佬客的生活」（李登輝 2008a：13）

[20] 1923 年，除了上述對台灣而言重要事件的依次發生之外，這一年，在亞洲的歷史洪流中，無巧不成雙、無三不成禮地先後誕生了至少三位對於 20 世紀末影響亞洲政局發展甚巨的三位政治強人。這三位強人分別是在 1996 年代表分屬台灣島內不同政黨總統候選人的李登輝（代表國民黨，並高票當選當次選舉）、彭明敏（代表民進黨，第二高票落敗），以及已故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或許是命運的安排，也或許只是機率上的巧合，在 1923 年中，確確實實在亞洲地區誕生了此三位帶領亞洲民主前進力量的重量級人士，翩然來到了世界局勢混沌不清的 20 世紀前半葉。然身處台灣這艘大船的渺小筆者，雖然敬佩李光耀在亞洲世界無可撼動的歷史定位，也對於彭明敏先生一生無私奉獻台灣的偉大精神，感到無比的推崇；但礙於眼下寫作能力受限，謹將焦點鎖定在擔任台灣總統長達 12 年之久的李登輝身上。

[21] 李財生：李登輝的祖父，見李登輝（2008a：7）。

[22] 「李登輝的父母親並未教他講客家話。他們所說的是福佬話」（柯義耕 2008：77）。

為題，去講述自己記憶中的客家背景成長生活。事實上，李登輝的日語、北京話、甚至是英語，都比客家話說得更加流利。

而在討論李登輝家族的族群屬項之際，有一項特別的區分必須同時加以說明，就是有關「客家族群」在台灣的初始，是自明、清客家族群自中國渡海來台拓墾即已存在？還是這個族群印記實則是經歷過晚近 1980 年代中末的「客家族群運動」（如 1988 年的「還我母語運動」）等族群意識抬頭訴諸街頭洗禮，後繼大量人力投入學術研究後，才使得包括李登輝在內的台灣客家族群，逐漸意識、或喚醒對於「客家族群」此一身份的認知與認同？這是有所不同及存在差異性的。

因為現存有關李登輝研究的具體成果，含括傳記類的作品出現，都是在李登輝擔任總統（1988 年）後才陸續問世，李登輝本人的回憶收錄、訪談紀實，也都是在於台灣已經掀起震天價響的客家族群運動後，才逐一地吐實與敘說，李登輝對於客家族群的想像與認同，是自小根深蒂固的族群認同，亦或隨著客家運動浪潮湧至，遂同步吸收最新客家資訊、由從政者的角度去反思自己身為客家族裔的族群身份，為此發聲、或藉以產生對於己身為當權者的有利論述，為自己拉近與此一族群的距離，而換取不得分至少也不失分的政治精算？對於身處在客家學術研究領域的我們，是絕對好奇亦極其重要的一個發問，故此同樣於此討論。

那麼在日治時期台灣的客家人，到底是如何看待自身的國族認同？有一種說法，或許能夠為我們析解當時候的客家人心中是否存在著所謂「中國認同」，那就是「在客家人心目中，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倒不見得會破壞他們的『中國』傳統，因為他們原本就不太以中國人自居」（柯義耕 2008：75）。又，甚至有更進一步從血緣上的根據去理解與判斷，「和中國人相比，客家人和日本人及韓國人彼此的血緣更為接近」（蔡石山 2007：27）。綜合上述兩種觀察與論調，在日治時期，從以往客家族群在台灣傳承下來的脈絡，無論是在認同上、亦或追溯血緣區分，客家族裔似乎並不與「中國」認同這個概念太過親近，反而呈現疏離，甚至是接近「日本」認同的那一端。

當然，上述引述柯義耕（2008）、蔡石山（2007）二位作者對於「客家」的理解，事實上不盡然是普遍一般人能夠認同對於客家的常識，甚至是與現實相距太遠。客家族群長在台灣，自西元十七、十八世紀以降，由來已久，四百多年後的今天，客家學研究，亦在近代台灣如火如荼的熱鬧展開。對於自清朝大量客家族群渡海來台拓墾謀生起算，後經日治時代、乃至國民黨政府來台統治台灣，客家族群與治理當權者的互動，是否緊密來往？常是客家研究中引發熱議的部分。

那麼為何依舊採用上述二種說法？筆者必須特別說明，以免形成不必要的誤解。客家人有否以「中國人」自居？是否有客家人在血緣上趨近什麼族裔的科學證據？顯然柯、蔡二作者並未提供我們更加有力的證據去解釋他們的論點，那麼為何仍舊採用？其實筆者更希望呈現的是，事實上是有著這麼一種視角，去析構客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去解讀可能存在著的客家族群對於中國的「認同」。

生長在客家背景的李登輝，會否如同外人觀察客家族群的中國認同屬性，採取了相同的認同取向，尚且不能輕言斷定；但是，我們卻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在接受父親的期許與栽培之下，「事實上，他的父親也希望他能學習日本的文化和語言」（柯義耕 2008：81），這一點，與前述的論調不謀而合。加上在李登輝幼童時期的學習過程中，其家庭（主要是爺爺李財生主導了李登輝的年幼學習）雖然讓年僅三歲的李登輝，到了家裏附近的媽祖宮學習漢文，[23]但據李登輝本人所言「讀漢文的時間很短，是臨時性的想要學台語才去那裡讀，並沒有常常去媽祖宮」（李登輝 2008a：41）。由此可見，李家對於「中國文化」的傳承與認同，並未花上太多心思在李登輝身上琢磨。

另外，愈觀察李登輝與客家的淵源與養成，筆者從其中可能影響甚鉅的角度切入，即是其母親江錦對他的影響與教育中去發掘。李登輝的自述中發現，「小學時期，李登輝在家裡總是處處受限，頗為壓抑。如先前所述，他的母親嚴格控

[23] 關於李登輝幼時修習漢文的內容與說法，尚有蔡石山所述「李登輝三歲大的時候，祖父送他到一家名為智成堂的私塾讀書，他在那裡開始學習初級中文與日文」（2007：49），但李登輝駁斥了這個說法，「我是在媽祖宮讀漢文的，不是像有一些人說的，是在智成廟讀漢文，這也不是一種私塾教育」（李登輝 2008a：41）。因為屬李登輝個人成長記憶，本文採以李登輝敘述為主。

制了他的生活圈子和思想」（柯義耕 2008：82），也就是年幼的李登輝生活與行為難以脫離母親的意志貫徹與期許。

雖然自信如李登輝也會不時地透露出「她（媽媽）說的話、處理的事情不合我的意，我就會大聲……所以我不要她太疼惜。為了不要讓她煩惱，我決定離開厝裡。」（李登輝 2008a：37）；但李登輝同時也說「我的老爸呢？他都不管我，我做什麼他都不會反對」（李登輝 2008a：37），易言之，在李登輝離開家中外出求學之前，接受的家庭教育，大多還是來自母親的教養，哪怕李登輝長大以後嘴硬、常說自己違抗母命。

為何先從李登輝與母親的關係談論到有關李登輝客家認同的痕跡？原因不外乎李登輝的母親在族群分類上是屬於「福佬」的族裔，即使嫁入客家家庭、努力地學習融入客家生活，「如何煮客家菜……」但「江錦不會說客家話，因此以一般福佬人的方式養育自己的孩子，結果，李登輝沒有好好學過客家話」（蔡石山 2007：49）。文化的核心價值以及精神傳遞，「語言」往往扮演了關鍵至要的角色，一旦語言流失殆盡，文化的保存與傳承，就容易啟人疑竇、為此打上了大大的折扣。為此，李登輝也承認了，「我也是客人（客家人）喔。只是我不會說客家話，那是很不對的事」（李登輝 2008a：15）。

伊藤潔更進一步說了，「李登輝本身不但不會客家話，『客家人』意識也極為淡薄的」（伊藤潔 1996：23）。那麼李登輝的客家意識究竟從何而起？是否淡薄？筆者依稀從李登輝自我的話語中，看到了模擬兩可的含糊說法。先是「我們客人（客家人）是在重陽，不然就是過年過節才去抔墓（掃墓）。我們做的、吃的物件也和福佬人不同款……我的老爸、老母都還照著那些習慣走，但是到我這一代就完全不知道這種傳統了」（李登輝 2008a：14）。李登輝看似自小時即完全明白自己的族群身份與他人不同，卻沒將這些族群傳統特有的養分作所吸收，以致幾乎喪失了應有的傳承客家文化能力。

再看大學求學時期的李登輝，「台灣客人[客家人]有一種壞習慣，怕人知道自己是客人，有 inferior complex（自卑情結）……『老師，我是客人，你知嗎？』

他（台大王益滔教授）卻告訴我：『你不要說你是客人』。……我不感覺客人不好，反而覺得很驕傲啊！」（李登輝 2008a：14）。

回顧前述李登輝已然知曉自己「錯過了」學習客家語言、文化傳統，卻仍然保有身為客家人的驕傲？這是一個有趣的發現。再者，若是李登輝的陳述為真，那麼李登輝在二十出頭歲（1940 年代後期於台灣大學求學階段）即已清楚知道自己屬於客家族群，對「客家」有著不同於其他台灣族群的認同及意識，李登輝的客家理解與族群認同，很可能就不是前述所提其族群認同與表態，非當政者受到 80 年代「客家族群運動」的影響所致。

二、　先祖、父親、大兄

李登輝的家族在初來台灣拓墾之際，曾經奔走北部各地之間尋找最適合的營生方式，但家族走到李登輝祖父李財生這一代，已然呈現穩定向上發展的絕佳趨勢，甚至在日本人推動的「保甲制度」之下，其祖父做到了「保正」[24]一職的榮譽（李登輝 2008a：16）。而與李登輝生長環境密不可分的，當屬「源興居」。對於關心、興趣於李登輝的人而言，源興居是一個再耳熟能詳不過的重要詞彙，也就是李登輝誕生、幼兒時成長的「家」。已故總統蔣經國亦曾於 1979 年到訪時任台北市長李登輝的三芝故居（李登輝 2008a：7），也就是源興居之所在。

然而源興居對於自中國移居來台的李氏家族而言，卻並非最早於此落地生根的地方，[25]即使是源興居這個名稱，也是從「王厝營」這個名稱改名而來（李登輝 2008a：6）。那麼這個後來吸引眾人造訪、成為觀光熱點的李登輝故居，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了李登輝家族生活的脈絡？其家族早先又是在台灣何處生息？據李登輝本人表示：「我們家從唐山來到台灣時，不是住在源興居，而是住在比

[24] 關於「保正」，不僅僅李登輝的祖父李財生位居此職，李登輝母親的哥哥，也就是李登輝的大舅，也曾擔任大坑的保正。李登輝對於家中長輩、親戚擔任此要職，實際上是有相當程度體會這是一個十分有地位的職務。（李登輝 2008a：16）

[25] 「李家從李登輝上溯六代時，從中國的福建省西部永定縣遷到台灣，首先於現在的桃園縣龍潭鄉[於 2014 年 12 月 25 日已升格改制為桃園市龍潭區]落脚，而在曾祖父李乾蔥那代移居三芝鄉。後來，於祖父李財生和祖母楊妹一代定居三芝鄉埔坪」（伊藤潔 1996：22）。

三芝還要頂頭的所在。我曾聽阿公〔李財生〕說起，我們家本來在陳厝坑種茶，沒種稻子……我的祖先扛了兩擔龍仔銀，在埔頭坑買一間厝，這間厝本來叫做王厝營」（李登輝 2008a：6）。

雖然靠著祖先世代的積累，李氏家族總算有了安身立命的所在，但相較繁華熱鬧的三芝街頭，源興居相對位於商業氣息難以熱絡的鄉野之間，「1926 年，當時李登輝只有三歲大，李財生決定從山丘上搬到繁忙喧囂的三芝街。在那裡，他開了一家茶行，設置一個領有執照的鴉片櫃」（蔡石山 2007：48）。

由此可見，李登輝誕生的李氏家族，除了環境有可能因為經商的情況下，逐漸有了富裕生活的可能，也讓李登輝往後接受優良教育有了經濟後盾的奠基；再者，「領有執照的鴉片櫃」，無論是在過往的清朝政府、亦或是日本殖民政府時代，都是不容易取得的「特許行業」執照，李家，果然不同於一般的升斗小民，有著其家族特殊有的社經地位。但也也許生活方式的逐漸轉變，「直到這個時候，三芝這個丘陵地上，大部分刻苦耐勞的客家居民，在與優勢福佬人的長期接觸以後，已經被福佬人同化了」（蔡石山 2007：48），原來是客家族裔的李氏家族 ，為了謀生及與人群接觸，也不例外地在此逐漸走向福佬客了。

承接上述，李氏家族順利地生存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於公學校畢業後，考取了警察學校，[26]並於畢業後任警察工作乙職，展開了為其 12 年的警察生涯。然而有關於李金龍為何會選取報考警察學校作為升學選擇？李登輝的說法是：「可能因為警察學校免學費，我老爸才去讀警察學校。我還記得他說他是偷偷去考的，我的阿公很勤儉、很固執，不可能讓我老爸讀中學」（李登輝 2008a：20）。但從外人的觀察角度來看，「李登輝客家祖父的一生中經歷過無所不在的種族隔閡，因此想透過孫兒們教育上的投資，期待他們未來有可能克服日本政府所設下的障礙」（蔡石山 2007：57）。

[26] 「他[李登輝]的父親是當地的警察，曾經上過日本人在台北開辦的警察學校」（柯義耕 2008：77）。

顯然上述二者之間，同樣都是以「李財生」為視角，看待子孫教育養成的背景，卻得到了完全差異的二種答案。顯見在過往日本統治時期，台灣人生活在異族統領的國度上，不僅僅必須要適應生計上的困難，同時也必須琢磨於「教育」之上，看待子、孫的教育方針，也就為了適應環境，逐步做了堪稱大幅度的調整。[27]無論如何，李金龍確實走過那麼一段擔任日本警察之路。或許源自於制度使然，李金龍當時任滿 12 年的警察職業，即已領退休金退職，離開了警察工作，返回三芝故鄉重新尋求新的生活方式。

由於李登輝父親從事警察工作之故，「經常被派駐各地，這樣的生活對家人而言自然不容易。李登輝光是在小學六年期間就曾經轉學三次（汐止、南港、三芝、淡水），因此很難交到朋友」（柯義耕 2008：77）。李登輝在此期間的四處轉學、適應不同的新團體生活，讓年幼的李登輝形塑了什麼樣的外在人格與內心性格，是在提及李金龍職業奔波下，更為令筆者感興趣的。

李金龍在離開了警察工作之後，先後投入了許多範疇屬於「公職」的工作，其中包括了「水利組合—現在的水利會—做主任還是什麼職務的……後來轉去三芝農會，做供銷部的主任……我的老爸還做過台北縣縣議員、農會理事長等等……我的老爸也是國民黨黨員，曾被開除兩遍呢！……做了兩任縣議員之後，他要選三芝鄉長……」（李登輝 2008a：22-23）。

若說李登輝後來是一張白紙的「學者從政」，細究起來，李登輝的政治淵源其實不淺，即使本身鑽研於農業經濟的專業研究，要形容李登輝是一位「政二代」[28]，看著他父親過往的從政歷程，卻也絕非言重的事了。如同李登輝所說：「我的老爸是大家好……一大群人牽來牽去，後來我也受到他的庇蔭」（李登輝 2008a：

[27] 當然李家到了李登輝求學過程的時候，生活環境愈趨優渥，「可以說我的厝物件真豐富，有在做田、也有在做地主，阿公開雜貨仔店……」（李登輝 2008a：23），對於可運用於學童教育投資與栽培子孫，定然起了相當程度的好助益。

[28] 李登輝祖父李財生曾經擔任「保正」乙職，類似於現今台灣體制中的「村、里長」，雖然當時非為民選，而是日本殖民政府指派，但就參與政治事務的涉入程度而言，要說李登輝是「政三代」倒也不為過，只是「政二代」或許會是在民選代議士的制度下，更為貼切的形容。

21），雖然看不出是否指的是對於「政治仕途」上的庇蔭，依靠父親人脈的積累，肯定對於李登輝爾後的仕途發展，[29]只有加分、不致減分。

> 我的老爸啊，如果就我和大兄兩個囝仔來說，他都比較疼大兄。為什麼會這樣我也不知道，也可能是因為我的老母比較疼我，也說不定是因為大兄比較像我老爸。（李登輝 2008a：32-33）

李登輝的身形高大，無論是在過去的日本時代，乃至今時今日的民主台灣，都容易在人群之中鶴立群雄、萬分醒目，如同柯義耕所說：「李登輝的魅力有一部分來自他的身材。他身高一米八（大約六呎），比大多數台灣人都高」（柯義耕 2008：31）。但是生養他的父親李金龍，身材的嬌小不高，成為了與李登輝之間的強烈對比。對此，甚至許多反李登輝者藉此強力抨擊、懷疑李登輝的真正身世，也依此妄加推斷，強冠上了李登輝是一位真正（生理上）的日本人。

面對這無稽之談，李登輝從未認真地正面回應，但是若是從其母親江錦的身形為之考究，當時候的李母，本來就在群體中有著一般婦女少見的特殊高大，[30]加上李登輝自小家庭經濟本就小康、衣食尚無疑慮的考量下，營養豐富地加速其卓然的體型成長，[31]自也無須過度質疑與討論荒謬的身世問題了。之所以先是提到李登輝特有的體型高大，一方面為了釐清長久以來李登輝飽受攻擊的「身世之謎」，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引出以下李登輝胞兄李登欽的登場。

---

[29] 由於李金龍擔任相關要職如「1962 至 1964 年被推選為三芝鄉農會第五屆理事長、淡水水利委員會委員，1961 至 1967 年間當了兩任台北縣縣議員」（李登輝 2008a：22）等，均是 1945 年以後才發生的事，相關與李登輝從政之間牽連，於次章節後討論。

[30] 「李金龍剛剛滿十六歲時，與一名叫江錦的高個子福佬女子訂婚。江錦身高超過一百七十公分」（蔡石山 2007：48）；「第一次公開了其母親江錦之名和相片……據說母親身高超過一七〇公分，這在當時不用說，就是現在也算是相當高大的女性」（伊藤潔 1996：24）。

[31] 「親戚們說，比之肥胖型的哥哥，李登輝是瘦型，幸好經營著肉店的母親江錦對營養補給用了不少心」（伊藤潔 1996：29）。

在李登輝的眾多血緣家人之中，[32]對於他的影響可能不亞於其父親的，[33]應當就是李登輝的胞兄—李登欽了。無論李登欽的身材是否壯碩、高大更勝於李登輝，還是明顯矮小於李登輝？那都將無損李登輝一生對其兄長的敬重。好比影響李登輝一生極為重要的「坐禪」這件事，就是李登輝從唯一的哥哥李登欽身上學會的，「和現在的囝仔稍稍有一點不同，當時他已經開始坐禪，我受到他的訓練、訓導，覺得坐禪也不錯」（李登輝 2008a：30）。

對比李登輝自小一頭埋進書海的世界，李登欽的表現是李家長孫、長子當有的領導風範與表率，依據李登輝的描述，他的哥哥更活躍於學校、鄰里之間，也許功課方面未如李登輝閃耀，但在各項運動乃至做人處事的和諧、圓融等（李登輝 2008a：29-34），再再都堪為李登輝效仿學習的不二對象。

> 報名的時候，我[李登欽]本來就有自信會考上海軍特別志願兵。如願以償後，內心還是欣喜無比。……而且我能夠加入無敵帝國海軍，在光榮軍艦旗下從事擊潰英美的工作。我這輩子從未如此興奮過。從今而後，我只祈求成為堂堂帝國海軍報效國家的那天能夠早日到來。（轉引自李登輝 2015：53-55）

受李登輝一生敬重的李登欽，「後來也像他的父親一樣，進入台北的警察學校就讀，成為了一名警員，其後更自願入伍，加入日本海軍的行列」（柯義耕 2008：78）。無奈情深緣淺的兩兄弟，不僅僅自小在主要的公學校求學過程中即時常分隔兩地，就連二戰爆發後陸續加入日本帝國軍的兄弟二人，最後僅剩李登輝一人安全返回台灣，其敬愛的胞兄就在戰禍中戰死南洋的異鄉了。

李登輝不只一次在自己的話語中、書本裡憶及想念與追思自己的哥哥李登欽，更在卸任總統之後，利用造訪日本的時候，前往了備受國際社會強力抨擊、飽受

[32] 除了祖父、母，父、母親，胞兄李登欽等 5 人之外，李登輝尚有一位同父異母的胞弟，叫做李炳楠，是李金龍在江錦過世之後，續絃產下的第三子：「李金龍在江錦逝世後，於一九四七年和陳伴再婚，生了李登輝的異母弟：三男李炳楠」（伊藤潔 1996：23）。

[33] 根據李登輝本人的說法，其胞兄李登欽對他的影響更勝父親李金龍，原文是「我一世人可以說受我大兄的影響很大，比受我老爸的影響更大」（李登輝 2008a：33）。

爭議的「日本靖國神社」參拜自己的大哥。這種舉動可能引發的莫大負面效益，[34]對於身為台灣一代政治家、全身充滿政治細胞的李登輝豈會不知那樣的風險高掛，卻仍然以行動證明並發表感謝日本政府對於其胞兄的尊重與款待，由此可見李登欽在李登輝心中佔據著無可取代的重要份量。

影響李登輝一生至深的胞兄李登欽，讓李登輝以他作為效仿的對象，如同從軍報效國家一般，李登欽的所作所為，成為了李登輝心中無可取代的標楷。依此線索，李登欽的國族認同是否也因此左右了李登輝對於國族的認同與想像，就成為了容易聯想與連動的部分。

> 他的日本精神很強，很日本化，為國家打拼，為了公家、為了大家，不惜自己的性命。他比我老爸還要認真，精神真驚人，這點我可能輸他。他是日本籍的台灣人，也就是日本人，所以他並不知道中國的情形，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中國來的，對這些事情他也有研究。（李登輝 2008a：31）

上述的「他」，當然指的是「李登欽」而非李登輝自己；但是深深受到胞兄影響的李登輝，難道只是單純地陳述他心目中哥哥的樣子？難道，不是藉由李登欽的身軀，娓娓吐露出自己早已成為認同日本的影子？或許李登輝不止一次說過自己年少時曾是「日本人」，但李登輝在日本人的烙印上，指的很可能是「國族身份」的法定事實，而非內心裡的國族認同；如同李登輝所說：「台灣給日本人管過五十年，有人說我親日，實在說，我是最反對日本的一個人」（李登輝 2008a：86），李登輝也不止一次公開地說自己「反日」。究竟「反日」亦或「親日」才是真正李登輝心中所想，還是必須依照人生階段區分方得明辨？至少，可以確認李登欽十分地盡忠愛國，愛的國家是日本，而李登輝則在搖擺之中。

三、　三度轉學的公學校、淡水中學校

[34] 「李登輝家族與靖國神社的關聯成了北京人士和台灣的反日派批評李登輝的素材之一」（柯義耕 2008：78-79）。

父親擔任警職期間，調動頻繁，我們也跟著不斷搬家，不斷轉學。小學六年期間，我即唸了四個學校。轉校的頻仍，使我交不到朋友。往往好不容易有了朋友，又因為父親再次調動，而中斷交往。正直多愁善感年齡的我，也因而變得有些內向，並產生了較為強烈的自我意識。（李登輝 1999：36）

日本領台初期，光是四處掃蕩、平定無法接受日本統治台灣的原住民、漢人等的武裝反抗，就花費了長達 20 多年之久的時間，可以想像當時候台灣社會的動盪不安，以及台、日人間的相互攻防與互不信任。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來台日人及其家眷，享受著與台灣人不同的生活環境及學童教育資源，自是可以想像肯定存在著若干距離的差別待遇。

任何一個家庭之中，新成員的誕生到來，定然都會被賦予滿滿的愛與期待，那是一個喜悅的時分。只是在傳統守舊的觀念裡，先後來到人世間的順序，其實會形成日後被寄予的期望不同，所謂的長子、長孫，的確會背負著家族當中更多、更大的期待。李登輝在家中排行第二，那份重擔自然落在了比他早先出生的胞兄 —— 李登欽的身上。疼愛是同樣的，但比起大哥李登欽擔負的家族責任重大，李登輝雖不見得能多有輕鬆，卻能夠想見一定是自由得多了。

「小學校」（相當於現今的小學制度）成為了只有純正日本人才可就讀的學校，台灣人因未具其資格，均前往「公學校」就讀，作為接受學制制度的開始。李登輝一開始進入正規學校教育之初，即是就讀「汐止公學校」展開他為期一生的求學旅途。隨著李登輝父親李金龍擔任警察四處調任的緣故，李登輝後來還就讀過「南港」、「三芝」、以及「淡水公學校」。四處轉學、不斷必須被迫接受適應新環境、新同學的結果，某種程度上促成了李登輝在孩童時光的人際互動出現狀況，甚而啟動了他自我埋進書海閱讀的尋求平靜保護機制。

在李登輝幼小的時候，台灣受日本統治已長達 30 個年頭之久，台灣人民與殖民政府也似乎漸漸度過磨合期，走入了能夠狀似和平相處的治好狀態。也就在 1920 年代，台灣知識階層的相繼覺醒，帶領台灣走入了一波理性抗爭地爭取台

灣人民應有政治權利階段。包括組成政黨、成立協會、甚至是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無論最終結果是否如當時候的台灣人所願，至少，在一波波的爭取權益抗議中，台灣人始終走的是一種民主法治的理性路線，而非直接挑戰殖民政府的正當性與否、以及並未搭上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自決浪潮。這是有別於當時國際社會的主流脈動，也很可能就在這個時候，台灣因而根深蒂固地種下了民主的種子，然後到了 20 世紀末才有幸萌芽、茁壯、並且正向成長。

而事實上 1920 年代末期的台灣，不僅僅是台灣人組成的政黨，如 1927 年的「台灣民眾黨」成立，遠在日本國境內成立的「日本共產黨」，也在 1928 年成立了台灣民族支部。對於民主發展進程來說，相繼由人民為核心的政治團體出現，對於民主政治都是一種好的發展與必備過程。李登輝 1929 年始進入汐止公學校，展開他接受正規日本教育的開端；而原來當時候的台灣社會，已經蓬勃發展著各種人民團體的發聲，以及為台灣人民的權益在做理性的出力。

李登輝的博學多聞，似乎是他輝煌一生中的重要註腳之一。然而一位學術成就豐碩的國內、外知名學者，卻未必能在求學的每一階段皆為順利，兩次報考中學校的失利，成為李登輝青少年求學時期重大的失落與挫敗。所幸求學未能如預期的順利，未使得這位混然天成的未來知識菁英放棄了他深以為重的知識力量，後來的發展與成就，證明了李登輝的求學之路是愈挫愈勇，不因短時間的挫折而折損他源源不絕的求知渴望。

當然，除了李登輝自身高度投入興趣的浩瀚書海之外，能夠擁有最現實的「金錢」購置書籍，終究必須獲得家中大人的願意支持，「當時的他，年紀輕輕就已經擁有七百多本私人藏書以及為數極其可觀的郵票」（柯義耕 2008：79），可以想見，一定有一股強大的家中資源在支撐著李登輝能夠有能耐進行收藏。如同李登輝所說：「就我的人生來說，最大的幸福是生長在一個小康之家，讓我有機會接受完整的教育」（李登輝 1999：36）。

> 多桑，我想在台北買「百科辭典」和數學書，一共需要四塊錢……當時的四塊錢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大概是父親薪水的一成半左右。父親聽了並沒有生氣……記得那天飄著雨……突然有人在我座位旁的窗戶上叩叩地敲著。抬頭一看，車窗外有位撐著傘的人，仔細瞧瞧，竟是父親！父親起了個大早，為我去向朋友們調借了四塊錢。（李登輝 1999：37）

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在李登輝小時候的成長過程之中，也許誠如李登輝所說，「我的老爸比較放蕩，都是做外面的事、公家的事，不會管厝內事，真少在厝內呷飯，厝內的事都是老母在推……」（李登輝 2008a：23）。但是無論李登輝的母親再怎麼樣厲害持家，將家中的大小事打理得妥妥當當；在父權至上的台灣早年社會，若非李金龍真正用心疼惜、苦心栽培李家兩兄弟，讓李登輝能夠擁有最好的錢財資源為後盾，很難想像，李登輝在為自己的興趣、好奇、求知等耗費金錢的成長過程中，得以如此順利獲得任何需要財源才能得到的一切。由此可見，李登輝的父親，並非缺席於他的年少成長之中；甚至，是他莫大堅實的助力。

對於李登輝的求學成長過程中，家人的實質金援支持，當是他能夠奮不顧身、義無反顧的忠誠後盾。但是求學之路如何去走、如何走得既順遂又成功？依照李登輝的說法：「那是因為我這個囝仔自己好奇，不然我的老爸、老母哪會知道我要得什麼學校？讀書都是我自己的意見，老爸、老母根本不知道半項……」（李登輝 2008a：43），我們看到了李登輝的自我意識高張、自信滿滿，也從中似乎能夠理解到，當時候的日本學制，即使已經不是一般常民的李登輝家族，仍舊不見得得以充分理解如何帶領小孩依循教育體制，走向正確的升學道路。

那麼年少的李登輝又是如何在這看似混沌不明且又複雜的教育體制中，找尋到自己應該前往的方向？所幸李登輝「在淡水中學校時，向陳敬輝學油畫……我在畫室畫圖時，在那裡看到很多雜誌，抽屜一開，就有怎麼準備試驗〔考試〕和勉強〔用功〕的雜誌。我把那種雜誌拿來讀，才知道不是讀中學就結束了，還要讀高等學校、讀帝國大學，這樣子才有人生的意義」（李登輝 2008a：45）。如

此一來，開啟了李登輝對未來升學的視角，也促使他一步步走向正確的求學道路，這或許是在家庭教育之外，李登輝人生中極為重要的一場巧合際遇。

至於在此一漫長的公學校、中學校求學階段中，哪些部分是此時李登輝生命歷程中格外重要的部分？以下讓我們仔細端詳及探討。

或許源自於李登輝自我意識的無限高漲，早熟個性的他，未必然全都接受及聽從家中長輩的建議與安排，加上廣泛閱讀習慣養成的他，當是有了初步自我思辯的能力。這部分我們可以從尚在公學校階段的年少李登輝「徵得母親同意，離家外宿。我[李登輝]當時的想法是，如果一直住在家裡，對自己或對母親都不好。我轉學到淡水的公學校，[35]寄宿在老師和朋友的家中，每日通學」（李登輝 1999：38-9）中，充分感受到李登輝與眾不同及特別有著自我想法之處。

有了以上認知，此階段李登輝的國族認同建立，可能絕非這個時期的他心中最重要的人生功課。除了自我意識形塑了此階段的李登輝之外，銜接李登輝公學校畢業之後，歷經二次升學考試挫敗。先是在 1935 年，淡水公學校畢業的那一年，未能順利考上台北公立中學，進而「失敗於中學考試的李登輝入了淡水公學校高等科」（伊藤潔 1996：32）；而後由於想要重考緣故，「寄宿於淡水的『偕醫館』」（伊藤潔 1996：32）。由於重考中學校階段寄宿於偕醫館，「李登輝之外尚有五名寄宿生，故馬偕博士的兒子，有時會出現。他讀聖經、彈鋼琴，鼓勵李登輝他們。李登輝在這裡接觸到聖經及其教誨，想來，可能是後來成為虔誠的基督徒的契機之一」（伊藤潔 1996：32）。

此次 1936 年的再次考試，仍不幸名落孫山，「第二年我[李登輝]又去考公立中學，還是沒有上，沒有辦法，就去考國民中學」（李登輝 2008a：42）。但是李登輝在私立「台北國民中學」[36]（係現今台北市立大同中學前身）的時間並不

[35] 針對李登輝主動提出轉學至淡水公學校的此一說法，伊藤潔卻是有著另外一種記述的方式：「轉到三芝公學校一年後的一九三二年三月，父親李登輝辭掉警察的工作……但熱心教育的父親，為了兒子將來升學，同年四月便讓李登輝兄弟轉校到淡水公學校」（伊藤潔 1996：27）；因與李登輝本人「提出」之說法產生差異，特此補充說明。

[36] 台北國民中學：「創始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 年]」，最初即是初中與高中合設之『完全中學』，民國四十八年，配合政府實施『省辦高中，縣市辦初中』政策，將高中部學生移撥『省立建國中

久，僅僅是二、三個學期的時光，[37]就結束了。「校長松田老師擔憂我的未來出路，便幫我辦好手續直接插班基督教私立淡水中學二年級」（李登輝 2016：42）。

1938 年輾轉來到了「淡水中學校」就讀的李登輝，面臨了「當時的中學教育，已經有相當強烈的軍國主義色彩。在那種氛圍之中，我[李登輝]經常閱讀的是鈴木大拙的著作。鈴木以禪思想為中心，並以世界性的視野來談佛教哲學。而其中影響我最大的，應該是『自我克制』的觀念」（李登輝 1999：39）。

> 清晨擔任勞動服務，來鍛鍊克己心；在瀑布下打坐，以便進入無我的境界；這些都是徹底的唯心論。……我[李登輝]每天一大早便積極參加打掃工作，自動努力去做打掃廁所這類別人不願做的事。……當時，唯心論深植日本人心中，後來也以各種形態影響日本軍人的精神。（李登輝 1999：40）

除了升學考試的現實殘酷以外，事實上此一階段的李登輝，在生命經驗中，卻絕非僅僅只能苦於書本之中的小孩子；考試結果的不如預期，其實並非全盤否定他在學校中全方位的耀眼表現。李登輝自公學校起，向來走的是「全課目型」[38]的學習，「淡水中學校在學中，李登輝仍然繼續著『全課程型』的學習，運動方面特別熱中劍道和棒球，……喜歡運動的李登輝除開上課之外，也隸屬於劍道部，致力練習。」（伊藤潔 1996：32）。當然，只是在積極發展全方位的學習目標下，孰重孰輕（學業與運動），愈趨知道為自己將來當有所準備的李登輝，自會自我警惕與取捨；為此，還曾有段劍道與學習之間的衝突小插曲：

學（現為市立建國中學）』及『省立師大附中（現為國立師大附中）』，成為純辦初中的『台北市立大同中學』，初中時代是大台北基隆地區的第一志願學校。民國五十七年，政府實施九年國教，本校改制為『國民中學』，對於發展國民教育克盡厥功；民國八十一年政府基於引導國中教學正常化，提昇高中教育效能，促進教育發展的區位平衡與普遍性，將本校改制為『完全中學』，在原國中部增設高中部，成為全國第一所完全中學。」（台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網站 2017）

[37] 「但是過了第二學期，因為學校沒有宿舍，我在台北沒所在住，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得到傷寒，我因此入院，休息一、兩個月，沒有辦法，就不再去上學了，我記得這是第三學期的事」（李登輝 2008a：43）。

[38] 「加以向李登輝各科都強的『全課目型』的學生，要跟『升學課目集中型』的學生競爭，無論如何總是有不利條件的」（伊藤潔 1996：32）。

我在淡水中學二年級時，自己就要讀三年級的書；……到四年級時，就要全力準備考高等學校。在這種情形下，我的時間若是拿去學劍道，那是不行的。所以我告訴老師：「我沒有時間呢」，我要讀書，要考高等學校。」他說：「讀書較重要？還是劍道較重要？」我說：「讀書較重要」。當時我是一個學生，不應該說這種話！所以我被劍道老師修理得很厲害。這個老師是我阿叔李阿逢的朋友，……後來我讀完高等學校，我告訴阿叔：「你叫你的朋友照顧我，他卻用劍道修理我」。（李登輝 2008a：52）

李登輝在回憶上述故事時，雖然在表現上顯露詼諧，但認真一讀，其實除了為其稍捏冷汗於其在那時空背景下，竟能直接了當地挑戰任教於中學校的教師。雖說也許淡水中學校的學風不若公立中學校的嚴肅、嚴謹，但已然佈滿軍國主義氛圍的校園，若非李登輝自小培養了「自我意識」的前提之下，一般的學生當不會冒然向老師們公然回嘴、產生不同見解吧！彼時彼刻的李登輝做到了，在「努力升學」的「自我克制」中，他的確克制了許多無法直接幫助自己考取好學校的旁騖、運動等等；但在「尊師重道」的「自我克制」中，此次的事件發生，隱然看見了李登輝內心底蘊中，潛藏著一顆叛逆的心，他並沒有因為對方是令人尊敬的學校老師，而因此成為了乖乖聽話、遭受馴服的對象。

第二節 台北高等學校階段（1940-1943）

一、 岩里政男及皇民化教育

日本軍國主義的向外侵略擴張，主要於 1937 年在中國的「盧溝橋事變」中，打響往後「中日戰爭」的開端。戰事接連進行了好些年頭，在國際社會中，除了有著亞洲爆發的太平洋戰爭之外，歐洲地區幾乎也全面進入戰爭狀態。1940 年時，「日・德・義結成三國同盟，同年十月成立『大政翼贊會』」（伊藤潔 1996：38），先不就其後的戰事如何發展，僅僅的日、德、義三國同盟，事實上日本已經與德、義兩國之外的其他世界列強直接為敵了。

對於主要由各個海島組成的日本國家國土來說，本就是因為自身國內天然資源相對匱乏、發展新時代工業不易，也才萌起了軍國主義的對外擴張與掠奪。加上日本軍國主義的自信過頭，如同初期對中國發起戰爭的狂妄語言：「三月亡華」，萬萬沒想到此次戰役會拖上數年之久，這對於日本軍國的資源分配及運用，無疑又是一種雪上加霜。為了提供源源不絕的海外軍需，讓日本帝國軍能夠安心作戰，台灣此一殖民地，也就成為了不可或缺的人力、物力後勤補給支援大本營。

是的，台灣的角色霎時間變得重要了。不僅提供物資需求，人員的增補也成為日本軍國無可缺少的助力與生力軍。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絕對領導、絕對服從的台灣預備軍投入，思想、教育、忠誠等，成為了殖民地中亟需快速成就的事業項目。因應前述大政翼贊會，「進入一九四一年，響應大政翼贊運動，台灣於四月設立了『皇民奉公會』。這是戰時體制的強化和促進台灣人的同化，『改姓名運動』也推動了」（伊藤潔 1996：39）。透過強有力的政策施行，如此才能確保日本於海外的各項戰事中，所需的人力能夠精準、有效地隨時補充，遂行任務。

承上，如許多台灣人改成日本姓名一般，為了澈底符合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實施皇民化教育的期待，「1940 年初，當時皇民化運動加速推動，李金龍像其他台灣人父親一樣，想要改善家庭的社會經濟條件，決定為其全家改採日本姓名」（蔡石山 2007：65）；只是事實上李金龍並非此一波皇民化的浪潮中才改為日本名，「李登輝父親擔任警員時，就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岩里龍男」（蔡石山 2007：65）。

但是在此其中特別的，是李登輝的回憶中，說到了「日本皇民化運動時，我們家改姓『岩里』，這是我大兄取的姓」（李登輝 2008a：31），就其「大兄取姓」的這一點而言，筆者認為可能性相對地低。原因除了李家的改日本名首例，是出現在李金龍擔任警員時即發生，「岩里龍男」的出現在前，已是不爭事實；再者即使到了 1940 年初的皇民化運動之際，李登欽也不過是一位十來歲的青年，很難想像一個攸關家族的重要姓氏會出自他手，有違一般的認知與常理。

無論如何，自其父親李金龍以降，家中三位男丁都改有日本姓名，姓氏的「李」改成了「岩里」，其父親名為「龍男」、其兄則是「武則」，李登輝的日本姓名，

則是廣為社會熟知的「岩里政男」。那麼為什麼「皇民化教育」乙事之於李登輝的生命歷程是重要的？或許我們可以從一些脈絡中，找到與之相呼應的線索。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在台灣的外省人特權階層之間，以這個『岩里政男』為理由，批判李登輝為『皇民化運動熱心的推動者』，主張『日本的皇民（指李登輝）沒有資格當中華民國的總統』」（伊藤潔 1996：26），這是發生在 1996 年李登輝尚在任總統時期的外省族群論述。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李登輝在 90 年代當然歷經了轟轟烈烈的政治運作、甚至堪稱爭鬥（詳盡內容於本文第四章節陳述及探討），但是稱一個當時近二十歲的學生為「皇民化運動熱心的推動者」，然後評斷為「沒有資格當中華民國的總統」，當然言過其實、不足以信。

但我們真正要看的是，改為日本名，畢竟不是當時候大部分台灣人的共同選項，「但與李家不同的是，大多數的台灣人選擇保留原來的姓名。直到 1941 年底，只有七萬名台灣人（當時台灣總人口超過五百七十萬）申請改日本姓名」（蔡石山 2007：65）。何以李登輝的父親，會做了這個影響李登輝未來如此深遠的重大決定，讓李登輝即使在日後登上了總統大位，仍飽受始料未及的挑戰與批評。

可想而知，在純樸、傳統教育環境下養成的台灣孩子李金龍，肯定是受到了什麼樣的誘因與現實必須，採取了大多數台灣人並未依循的路。或許能夠直接將其改日本名的舉動，連結到了李金龍曾擔任日本警察乙事，為求順利服務於日本殖民政府體系，改成日本名成了絕佳的途徑與表示效忠，「當時在台灣能接受警察學校這樣高等教育的人極少，與接受公費從師範學校畢業的教師並列，可說是菁英階級的一環」（李登輝 2016：26）。因為是殖民社會中「菁英」份子，順從與接受日本政府的「美意」與安排，自是再自然不過了。

但若撇開李登輝的父親從事政府體制下的特殊工作這個原因，其他非在政府部門任職的尋常百姓，又是什麼樣的契機與想望，會在那種情境下，同樣選擇了改成日本姓名？這是我們同樣期待看到那一階段的「皇民化教育」，因為即使時序走到 21 世紀，台灣社會仍然能夠於選舉之中（2014 年的台北市長選戰），見

識到因「皇民說」而起的大幅震盪與社會輿論抨擊。[39]皇民化一詞，並非塵封在上一世紀，或許隨時間過去而少提，卻絕非已經讓經歷過那一段歷史的台灣人民所淡忘。在這其中，也間接地影響了即使在那時候尚未出生的新一代台灣人。

回到李登輝身上，受到「改日本名」的風波激盪，畢竟是 20 世紀末的政治事件了。當時成為「岩里政男」是 20 世紀前半葉的事情，李登輝的內心中又是如何度過與看待自己「接受」成為岩里政男？「有人說我[李登輝]是因為改姓名才考上[台北]高等學校，開玩笑！這是沒有關係的事，我還是用我本來的名字『李登輝』去考的。其實當時我的感覺，也不是很稀罕改姓名」（李登輝 2008a：32）。

由上述我們可以得知，第一，改姓名這件事的確不斷困擾著李登輝，哪怕是否因此才考上難度甚高的台北高等學校，都必須接受別人帶著異樣眼光的質疑。第二，李登輝用了「開玩笑」當作回應，並且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是用「李登輝」的本名考取高等學校，完全能夠看出李登輝對於升學這件事的自信與霸氣外露。第三，與上述第一敘述相呼應的，外人的質疑，無非源自認為接受皇民化教育、服從改為日本姓名，能為己身帶來若干意想不到的好處及福利，對此，李登輝的想法顯然是不以為然的，他並不認為改姓名值得「稀罕」或有什麼特別的。

二、　台北高等學校的視野大開

李登輝的求學之路最終順利開花結果。無論是考上了日本帝國殖民時代當時難度更勝「台北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前身）的「台北高等學校」，[40]亦或是赴美攻讀博士學位（康乃爾大學）所撰寫的博士論文獲得肯定的獎項、在台灣進

[39] 方志賢（2014）：「不甩撕裂族群批評 郝柏村重提皇民說」：「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在北市輔選時因『皇民說』引爆各方批評，指他撕裂族群，選後外界也認為皇民說是國民黨敗選主因之一；郝昨到中山大學演講「八年抗戰與兩岸關係」，有學生舉海報抗議皇民說，但郝在答覆提問時，仍重提台北市長當選人柯文哲的祖父和李登輝都是皇民。」

[40] 「台北高等學校是當時台灣的日本教育體系當中的頂尖學校。據說，它的入學考試比台北帝國大學還難，每年只錄取一百二十名，而且其中多半是日本人的子弟，台籍學生人數很少，每班只有十到二十個」（柯義耕 2008：84）。

入台灣大學任教等等，都再再顯示出李登輝在學術領域的成就不凡。但即便如此，事實上在考進入台北高等學校之前，李登輝的求學過程未必能稱順遂。

除了年幼時配合父親李金龍擔任警察職務的數度轉學，導致此過程中不易與同學們深交熟識，以致將個人精神寄託埋首於書本之間；自公學校完成學業之後，銜著在公學校第二名畢業的優異成績，卻連續兩年於公立中學校升學考試鎩羽而歸，至終唯能選擇馬偕醫生創辦的淡水中學校完成他的中學生涯。

平心而論，也許在眾多的書籍之中都會將李登輝從小的求學歷程描繪如「天資聰穎」、「出類拔萃」、「博覽群書」等的優美「貼切」形容字眼，但務實的看， 且不論李登輝在各個公學校的成績如何數字耀人、光彩奪目，接連二次欲達成公 立中學校考取的目標未竟，「對李登輝來說，無法考上台北的公立中學必然是一次痛苦的挫折，也是對他性格的一次重大的考驗」（蔡石山 2007：58）。

當然，這一切的苦難過程只有李登輝個人得以真正體會與吸收，但是，隨後他向世人展現的，是憑藉著堪稱人中之龍的台灣本土學生佼佼者，順利考進了台北高等學校，其中格外重要的，是「在高等學校時，台灣人和日本人沒什麼差別了」（李登輝 2008a：58）。也就是在真正進入此學校之後，成為了一般相較平庸的台灣求學者來說，一個極為重要的分水嶺，也因此打開了李登輝往後求學之路更加寬廣與傲然的積極追求卓越。然而在此過程之中，艱辛苦學尚不多說，為何李登輝能夠頂住壓力？進而成功堪謂當時候中學生通往升學之路的登峰造極？想必除了決心之外，似乎有著更深一層的推動力，驅使他勇敢且無懼地前往。

> 日本人都看不起台灣人。我對日本人這種看法，有一種反抗的心，會故意帶著我老母四處行，特別是很多日本人的所在，我會帶我老母去。當時台北市最大的百貨公司是菊元百貨公司，我讀高等學校時，戴著高等學校的帽子，故意帶著我老母到這家百貨公司，要給日本人看，因為我的心裡在想：我哪裡不對？有什麼不好？你看，這個庄腳人也有這樣的後生〔兒子〕。這就是長久被人壓迫以後，所產生的反抗的心，所以我在少年時就已經有這種作法。（李登輝 2008a：87）

從上述這段小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年少時的李登輝，其實已然感受到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台灣人、日本人間，事實上並未站在同一平等線上。尚在求學受教育的年歲裡，李登輝已經清楚明白著自己身為日本台灣人，現實上是遭受真正日本人的輕蔑對待。為了能夠在社會上立足，或者換回「身為人」該有的齊頭式平等，李登輝選擇一個似乎得以真正到達的路徑，透過學習及努力，挑戰、並達成了進入「台北高等學校」這般的高門檻知識殿堂，以樹立自己的卓越與不凡。更重要的是，如此一來，就能雄赳赳、氣昂昂地走在「日本人」面前了。

另外，我們也看到了李登輝「反抗的心」，這種發自內心的反抗，不因「改名」而被撫平；不因「我很感謝日本的教育與學校制度」（李登輝 2015：42）有所改變。感激是一回事，讓李登輝得以開啟不同的視野；「反抗」卻又是另外一回事，因為己身長期處於被殖民政府所壓迫的一方。只是即使油然而生的反抗之心，在年少時的李登輝心中萌芽，李登輝卻仍舊採尋和平、安穩的方式，既未因此進行體制衝撞，也仍然接受著這個體制下所有提供的教育途徑、並且極力爭取及依循。李登輝所能做的，就是盡力達成在這個難以撼動的體制之中，實踐、證明自己的能耐，去縮短這與生俱來和日本人既已存在的差距。

既然名為台灣最具競爭力的「高等學校」，「進入台北高等學校，就等於獲得一半的保證，以台北帝國大學為首，日本全國哪裡的帝國大學都可以進去」（伊藤潔 1996：38），李登輝所能夠實質獲取的，自不是僅僅戴上帽子、帶著母親上街炫耀這般表面、膚淺的層次而已。「高等學校的教育很特殊。學校學風很自由」（李登輝 2008a：57），加上獲得新知、探索書香世界的機會大增，短短兩年半的台北高校求學過程，李登輝讓自己浸淫在書海之中，欲罷不能、多有斬獲。

> 當時高等學校學生都愛讀阿部次郎的《三太郎日記》，……而倉田百三所撰寫的戲曲《出家人及其弟子》當然也熟讀過……在唸舊制台北高等學校時期（一九四一～一九四三），我仍不斷拓展閱讀的領域，除了日本古典文學之外，像西田幾多郎的《善之研究》、和辻哲郎的《風土》以及岩波新書中的中野好夫的《阿拉伯的勞倫斯》、愛因斯坦的《物理學的誕生》等，都深獲

> 我心，即使已經事隔多年，但年少初閱時的感動仍歷久彌新。當時，我光是「岩波文庫」的書，就有七百冊之多。此外，我也愛讀湯瑪斯・卡萊爾的《衣裳哲學》，以及德國「狂飆時代」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維特的煩惱》等。而在俄羅斯革命前夕的黑暗社會中，致力追求光明的杜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等作品，也都是我主要的精神食糧。(李登輝 1999：40-41)

「愛讀書」這件事，無疑是跟了李登輝近乎整個人生。從以上李登輝本人的描述，清楚看到李登輝廣泛閱讀的習性，自求學階段即展露無遺，尤其，是身處台北高校「在自由的校風之下，我樂於和同學討論，努力用功讀書」（李登輝 2015：44）的絕佳情境之下。這個讀書的好習慣，相當程度反饋到了李登輝的個人身上，除了使他走上學者之路、擁有了絕無僅有的領導人能力，同時也藉由書中知識的探索，反覆思考、咀嚼之後，進而左右了李登輝人生未來何去何從的發展方向。

就李登輝所言：「在小學時我就熟悉日文百科事典，中學除了《古事記》、《源氏物語》、《平家物語》、吉田兼好的《徒然草》……我還喜歡讀夏目漱石全集……」（李登輝 2015：43），也就是說，李登輝的良好閱讀習慣，並非遲至進入台北高等學校才開始，是自小即培養而成的一項莫大興趣。但是無可推託的，在這些成千上百的中書籍之中，影響李登輝人生的，李登輝說到：「最近〔二〇〇二年二月〕我在台北國際書展演講，我講到對我一生影響最重要的有三本書，其中最主要的是湯瑪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的 Sartor Resartus ——《衣服哲學》，[41]第二本是歌德的《浮士德》，第三本是日本人倉田百三寫的《出家與弟子》」（李登輝 2008a：71），恰巧都是在其就讀於台北高等學校時期。

> 或許有人會對我[李登輝]的沉迷日本文史哲，感到不解。但是，在一九四五年，也就是我二十二歲之前，台灣一直都在日本統治之下。我接受正統的日本式教育，當然也深受日本傳統的影響。（李登輝 1999：41）

[41] 《衣服哲學》或作《衣裳哲學》，翻譯文字不同，李登輝各類著作中二者用法均見，同義。另外有關閱讀此著作的李登輝尚補充道：「當初我接觸卡萊爾的《衣裳哲學》，乃是閱讀英文本，有些地方難以理解，於是到圖書館找參考書籍，這便發現新渡戶稻造先生撰寫的《講義錄》」（李登輝 2009：68-69）；新渡戶稻造對李登輝的一生影響甚深，即是自此而結緣。

這些書籍對李登輝的影響至深，哪怕已然闊別約莫 60 個歲月，李登輝依舊記憶猶新、回味無窮。那麼是什麼樣的特別內容，讓李登輝一輩子記得、一輩子受用？透過李登輝本人的詳細說明，我們可以讀到，那個年少求知的李登輝，「就在升上台北高等學校後，祖母楊妹逝世了。……剛好是善感的年齡，體驗了祖母之死，對於人的生與死，變得會深深地思索」（伊藤潔 1996：38），李登輝「一直在想：人為什麼會死？死了以後要怎樣？這三本書所要探討的與我想的問題是同樣的」（李登輝 2008a：71-72）。

> 一九四一年我進去高等學校，剛好太平洋戰爭發生，在台灣以外，外面的世界愈來愈不自由，物資也愈來愈欠缺，但是台灣的情形還好。不過我比較不關心世事，不管世間怎樣變，對於心裡面的問題我還是拚命看書研究，一直在認真追求。雖然當時我是少年人，但是若是沒有思考自我和生死的問題，我會感到艱苦，因為沒有解脫，心內不會安，不會「心安理得」。我一直在讀書，都選和這些問題有關的書看，希望解決問題……（李登輝 2008a：74）

面臨死生的極度困惑，這些書籍正好填補了李登輝疑惑的心靈，同時，也能夠讓我們注意到，此一階段的李登輝，也許人生中重要事項的優先順序，除了在課業上追求卓越、在汲取新知上表現積極，面對死生的課題，恐怕優於其他諸如「國族認同」等的其他方向。這時候的李登輝，也許知曉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台灣人民是受到若干程度壓迫的；但他透過在學業上的表現卓然，嘗試去彌平與戰勝天生與日本人的差距，即使帶著反抗的心，但未必然能夠萌發與區辨「國族」這在此時空背景下，隱含的差異與危機，也就遑論產生猶如「國族認同」的心。

年少的李登輝，透過寄託於浩瀚的書海之中，去找尋可能能夠回答己身疑惑的知識答案。當然，結果不一定能夠如同期待。但至少於此過程中，增進了無可計量的知識成長；進入「台北高等學校」，真正讓李登輝的視野因而大開。此段末，特別引述李登輝道：「我打自內心覺得，自己青少年時期受日本文化涵養，接受基礎教育與教養，非常地幸運。像我這樣在難得的青少年時期浸潤在日本光

輝燦爛傳統中的人，其實不少。和我同世代的台灣人，也多多少少感激『台灣有今天，是日本時代打下的基礎』」（李登輝 2009：69）。

三、　年少李登輝的中國想像

對於一個出生在日本時代的台灣人來說，若是不刻意地迴避有關一切殖民政府體制下所安排的一切生活，包含教育、文化、衣著、語言、生活型態等等，大抵都會在既有的統治情境中，接受、或說潛移默化了來自日本帝國強有力的國家教育。先且不論台灣文化、族群特性是否能在此時登場、顯現，距離治理台灣已經至少錯過幾十年的彼岸中國，更讓台灣人摸不著邊，亦無從靠近。

李登輝不只一次地宣稱自己 22 歲以前是日本人，[42]不管是既有國籍架構下的身份產生，還是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脈絡下有所認同，都很能清楚明白。年少的李登輝其實對中國體認不多，在此情況下，也就很難連結到是否產生對中國的情感，以及是否存在著中國認同了。

此一時期李登輝對中國的認知，倒不如用「想像」來形容，更為貼切。倚靠著接收外來資訊傳遞的建構，也許「大陸早期移民後裔的我，於一九二三年，出生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李登輝 1999：35），是李登輝再清楚不過明白的事；但除了隔著一個難以跨越的海峽阻隔之外，在台灣的平常生活，本來就是一個由移民多元文化所組成的新社會型態，與中國既有傳統文化早已形成若干差異；更何況，是在日本統治 20 多年之後的台灣。

當然，據李登輝本人所言，「幼小的時候曾經於三芝老家附近的廟宇[媽祖廟]向駐廟的廟公人員學習漢文，主要是為了學習台語[福佬語]所致，並非真正地進入私塾學習中國文化與接受中國儒家教育」（李登輝 2008a：40）。李登輝真

[42] 首見於 1995 年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訪問時所說：「司馬先生，我到二十二歲為止也是日本人呀！」（司馬遼太郎 1995：116）；另外於李登輝個人的著作中，也接續提到：「我到二十二歲之前都是在全然的日本教育下長大，所以這本書揭露的，可說是原本身為日本人的李登輝……」（李登輝 2016：10）。

正接收到正規與有系統的中國歷史相關教學，是直到他進入了前述的台北高等學校時，才正式接觸。

> 考上高等學校後，我受到各方面的影響。主要受到學校外面的影響，自己讀了很多書，學校的課只是聽聽而已。當然學校對我也有影響，像是歷史課，第一年我們上日本歷史；第二年是中國歷史 —— 實在說，中國歷史的課程可能也包括南洋、印度史……（李登輝 2008a：60）

從上述這段自述，我們清楚地看到，李登輝未必然是一位乖乖牌的用功型學生，他更像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求學個體，努力不斷從各個方面尋求自己的追尋；也許，也就像他不斷表述的「自我」一詞。另外，李登輝的中國歷史接觸，的確是在高校求學時期有了系統性的知識攝取，不過，依照課程及時間分配，很顯然李登輝未能在課堂中得到更大量的中國歷史知識；要說透過這極其短暫的學校歷史課教授，就能讓李登輝徹底地對中國有所瞭解與認知，未免就太過牽強了。

不過若說年少的李登輝對於中國處於不甚了解的狀態，李登輝本人肯定未能全盤同意，至少李登輝是這麼表示的：「雖然我自幼接受日本教育，受過日本文化的薰陶，但對中國文學與思想，也曾多所涉獵。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後，風起雲湧的現代思潮，更對我有很深的影響」（李登輝 1999：42）。

「五四運動」發生於 1919 年的中國，那時李登輝尚未出生；當然，一場壯闊的學生運動，其影響絕不僅於發生的當時，事件過後的風波與文獻，當會持續傳遞及傳播，這是可以想見的。只是李登輝並未清楚交代是在什麼時期開始接觸到五四運動後的思想浪潮，我們無從得知這段對五四運動的體悟，是發生在李登輝人生的哪一時期，只能依循著他在《台灣的主張中》（1999），對於寫作時序的鋪陳，猜測此段理解與認知，是發生在他年少求學的其中階段。

源自於日人歷史老師「鹽見薰」的歷史課程講述，其中涵括了中國歷史的部分，雖然篇幅不大，見解也未必正確，卻是打開李登輝對於中國歷史理解的一扇

窗，讓李登輝有了自知識系統中獲取的中國理解與想像。此一時期的李登輝，尚未有太多的資訊與接觸的機會去一窺中國的世界，反而是「在年少時期，日本帝國對李登輝前途的影響遠大於中國。他不僅取了日本名字，也感謝日本人讓他受教育」（柯義耕 2008：101），對於「日本」，有著更深一層的情感認知。

中國實質意涵的歷史文化，對於年少苦學於日本教育與接受日本栽培的李登輝，顯然是疏遠甚至陌生的，這一點，也或許因而影響了往後必須「敞開心胸」迎接中國（中華民國政府）來台時，內心參雜悲與喜的激烈交響曲。雖然，在戰爭過程中，李登輝偶然的機運搭乘日船行經中國青島時是這麼想的：「這是我第一次去中國，我的印象是中國人很厲害……心裡想：中國人實在很可怕，在這種生活情況下，都能夠活下去，他們人多、有勇壯，日本兵要怎麼和他們相剖？日本和中國相剖一定不會贏」（李登輝 2008a：105）。

那麼為何筆者要在此章節中，特別列出「年少李登輝的中國想像」這一段？因為即使清楚知曉自幼的李登輝教育思想是全盤地接受日本教育灌溉，但身為台灣人的特殊歷史成長背景，筆者並不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並未在「日本台灣人」的身上發生。比如在語言上：「我們家屬於客人〔客家人〕的系統，但是我的老爸、老母都不會說客家話，都說福佬話」（李登輝 2008a：13）；就祭祖文化方面：「客人拜拜和福佬人也不同款，比如說，福佬人都是在三日節〔三月初三〕還是四月抔墓〔掃墓〕，我們客人是在重陽……」（李登輝 2008a：13-14）；在飲食習慣方面：「我們做的、吃的物件也和福佬人不同款」（李登輝 2008a：14）。

上述說的或許指的是李登輝心中客家與福佬族群的差異，但是，其實這一切都與日本治理台灣毫無關聯。這些既有的語言、文化、飲食脈絡，都是從中國傳至台灣，所以筆者並不認為對中國歷史的不甚了解，就全般地不受中國因素所影響。事實上，中國這個要件，一直存在於日本台灣人的生活周遭之中，無法置若罔聞，也無法完美切割剔除。也許年少的李登輝對中國的談論甚少，但博覽群書的他，也提到「魯迅的《阿 Q 正傳》等著作，以嘲諷的手法，深刻描繪中國人愛

面子的文化……中國人遇事不思解決，只求自我安慰、保住面子的心態，是使中國社會限於停滯，無法進步的主要原因」（李登輝 1999：42）。

李登輝透過他閱讀的視角，即使無法從師長的教授中，得到更完整的中國樣貌與資訊，「老實說，當時我們對中國不是太清楚，都只是在理念上、從好聽的一面去瞭解和同情，後來我讀了很多關於中國的書」（李登輝 2008a：61）。因為書中的窺探中國，得到了近代中國發展的瓶頸及待克服之處。對於未來成為領導台灣人的李登輝養成過程而言，在無意的汲取知識下，蘊育了他自年少便有了對中國社會現象的宏觀思維，有助於他在將來必須肩負著對抗中國的重責大任。

第三節 京都帝國大學階段（1943-1946）

一、 大日本帝國的憧憬與體驗

無論台灣的教育體制是否完全複製於日本帝國，各種學制、學校的設置有否一模一樣地從日本本土搬到台灣這個荒爾之地，台灣終究就是日本帝國的殖民所在地。日本的統治手段，不僅僅分化自「國民小學」起做了「小學校」、「公學校」的區別；一路延伸到了高等學校中，台灣人能夠進入就讀的名額也遠遠不及於日本人進入就讀的高比例。源自於這種不平等對待及壓迫，努力求學、求知的少年李登輝，想必受到一定程度的擠壓，卻也因此激發了李登輝的有所作為。

或許受日本統治長期壓迫的台灣人，面對這一個兩面刃，始終希望能夠找到突破的關鍵，長成一個頂天立地的台灣男子漢；往好處去想，在這樣險惡、折磨的環境之下，李登輝最終戰勝了這個體制，成就了體制中，學業表現的輝煌。也是源自於這樣奮發向上的動力，能夠到「祖國」日本的頂尖大學就讀，成為了李登輝「擺脫」二等國民的絕佳途徑，李登輝一心要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由於二戰末期戰事吃緊，使得原先存於台灣各個教育體制中的正常修業學制，進入了調整與縮短就學年限；應該就讀完整三年時間的舊制台北高等學校，李登

輝只花了兩年半的時間就取得畢業資格，[43]進而往下一求學階段挺進了。「京都帝國大學」是李登輝自高等學校畢業後的下一站，也是在日本教育體制中，李登輝求學之路的最終站；為時雖短，卻至少讓李登輝完整走過了日本帝國殖民教育體制中，無可或缺的前往日本本土求學這重要一環。

事實上，在 1943 年 9 月李登輝前往日本攻讀京都帝國大學起算，至終戰後 1946 年春天李登輝自日本回到台灣，此一趟為期約莫兩年半的日本之旅，其中只有前後大約只有一年的時間，李登輝是真正在大學之中求取教育，其他時間就是在參與戰事之中，來回奔走日、台兩地之間。所幸在從軍的過程裡，李登輝並沒有因此空白了歲月，他進行了自我對於人生的探討與自修式的方式，求取書本上的知識力量來源。這一個部分的汲取知識歷程，對於李登輝赴日求學的至終結果與影響力，恐怕毫不遜色於進入所謂正規的帝國大學教育。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是當時候日本國中頂尖的帝國大學；莫說自殖民地以優異姿態考入就學的台灣子民，就連日本本國人都是望其項背、難以考取的一所優質大學。而由於「在台灣時，李登輝被當成是次等殖民地的居民，但是到了日本之後，他反倒覺得自由很多。當時的他雖然略帶台灣口音，但日語頗為流利，又是日本一流大學的學生，因此社會地位反而比許多正宗的日本人更高」（柯義耕 2008：103），李登輝的日本求學之旅，當不會有難以融入與適應的困擾。但若說有鄉愁，那又是另外一層解讀，非進到日本本土求學環境的困惑了。

在名為「日本第一」的京都帝國大學這層意義之外，李登輝選擇進入此所學校就讀，其中重要意涵當是源自於透過修習京都帝大的學業，期盼在取得學位後，能自此進入當時候被譽為另一新天地，在中國境內中，日本政府扶植成立的「滿洲國」[44]。許多當時欲進入滿洲國工作的日本帝國莘莘學子，都知曉能從京都帝

[43] 「我讀了兩年半高等學校，本來要讀三年，應該在一九四四年四月畢業，因為戰爭的關係，學校早半年讓學生畢業……」（李登輝 2008a：74）。

[44] 「一九四〇年代初期，位於中國東北部的滿洲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儼然成了日本發展商業和農產品的重鎮，也是『現代體制成熟化』的中心……對於日本帝國的臣民而言，滿洲是一個比日本本土或其他殖民地都更加自由的地方」（柯義耕 2008：86），成為了李登輝想前往的目標。

大畢業是一條至好的前往路徑，一旦能夠進入京都帝大求學，將來很可能就得以到訪一個嶄新的進步世界 —— 滿洲國。

> 當時我想去滿洲工作，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想，實際上大學畢業以後，如果能去滿州，那裡有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這個大組織，做研究、調查的機會很大。我或許也想到可能可以改變中國社會，或對中國農業有幫助。（李登輝 2008a：79）

李登輝在考大學的準備期間，接收到了這樣的重要訊息，亦成為了他一心一意考取京都帝國大學的重要動力，為的是未來有機會前往滿洲國工作、學習的另一片藍天。但年少的李登輝，其實內心中是不斷受到現實生活中，日本殖民政府的壓迫的，就像他所說的：「總說一句，日本時代台灣人被壓迫，是二等國民」（李登輝 2008a：80）。這邊所特別強調的，「在李登輝心目中，滿洲和台灣一樣是日本的殖民地，並不一定屬於當時衰弱、混亂的中國……他之所以決定前往滿洲，並非因為他以『中國人』自居，也不是因為滿洲為中國屬地，而是完全居於事業上的考量」（柯義耕 2008：87）。

李登輝確實無論在京都帝國大學、乃至終戰後回到台灣大學就讀，他的二階段大學求學生涯，均是以「農業」專業方面知識涉獵見長。唯如同上述所說，這裡頭牽涉複雜的「大學」抉擇以及要往什麼專業領域發展，都是李登輝精密苦心的計量，卻未必是真正心目中的最佳志願：

> 或許因為我原本就喜歡讀歷史，就讀台北高等學校時，一心想著將來要成為西洋史老師。但是，在當時的殖民地政策下，台灣人是不可能成為老師的。類似這種「內地人與台灣人之間的差別」，確實存在。所以，我才會（如前所述，也受到新渡戶影響）選擇鑽研農業經濟。（李登輝 2015：49）

面對現實（讀歷史未必能有好的發展，同時也認清日本人與台灣人存在的差別），李登輝做了若干程度的取捨抉擇。當然，隨著日本殖民帝國的最終戰敗垮台，所有的美好願景在那一刻灰飛煙滅，李登輝的這一個夢想最後並未能全然實現。但是，在京都帝國大學修讀農業經濟的他，在終戰返台就讀台灣大學後，仍舊堅持著此一領域的專業，並且在往後初進入政府體制工作時，就是依此農經專業獲得蔣家政權信任與青睞。依此，李登輝至日本的求學之路，雖然在戰爭侵擾的狀態下被迫草率中止，但並未就此斬斷了他往後的求學之路，而是奠定了他日後成為農經學者的最初基石。

二、　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思想啟迪

> 李登輝為什麼從眾多帝國大學中選上京都帝國大學，又何以進入農業經濟科呢？其一是對自由主義學風有名的京都帝國大學的憧憬，其二是他生長在農村的小地主家庭，早就對農業問題有關心的緣故吧。（伊藤潔 1996：41）

李登輝在日本的求學過程中，「讀書」、「從軍」這二件事，佔據了他絕大多數的時間與精神。李登輝雖然真正留在校園裡的時間不長（1943 年 10 月入學起算至 1944 年 2 月學徒出陣，以及 1945 年終戰後短暫復學至 1946 年春天從日本返台前），但無論是否身在校園中，李登輝自小養成的閱讀習慣，即使是從軍在外、四處奔波，讀書仍是他最好的精神食糧，並且不輕易間斷的重要大事。

從「在京都帝大時，雖然是相剖期間，但是排隊買書的人還是不少……我若有時間，就到書店排隊買書」（李登輝 2008a：88），以及「我做兵時讀了很多書，因為當時在後方的人都會寄〔慰問袋〕來，裡頭放物件，也會送書……」（李登輝 2008a：98）中，都不難發現李登輝對於求知的渴望與執著。

也就是在不斷利用時間空檔，努力汲取書中各項知識的同時，時序恰巧停留在一段特殊的時光，「在 1935 年到 1947 年間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出版品十分暢銷，……馬克思主義在知識上的吸引力，一部分是因為它宣稱具有科學性。李

登輝躬逢其會，接受馬克思主義」（蔡石山 2007：99）。另外，除了馬克思主義在當時的盛行之外，「自由主義」也正熱鬧風行。

在這二者主義思想風靡年輕世代的洪潮中，李登輝捲入了這樣一個勢不可擋的潮流裡，粗淺接觸的他，努力地思考能否透過真誠的實踐，去改變這個世界目前遭遇的種種困難及問題。李登輝再一次發揮如同考取台北高等學校，藉以證明己身能力、拉近與真正日本人距離的苦讀精神，即使「京都帝國大學時期可說是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我[李登輝]住在德國傳教士蓋的『日獨寮』裡，在連食物也沒有的飢餓生活中，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全部讀完」（李登輝 2016：32）。

那麼這兩大主義思想迥異的新知識汲取，分別帶給了李登輝什麼樣的不同衝擊？先從「馬克思主義」談起。

如同前述所言，此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並非僅僅影響到在日本求學中的李登輝，[45]事實上，更席捲了世界各地群起效尤的「社會共產主義」。如蘇俄、中國共產黨、越共、北韓等等，均受到相當程度馬克思主義的引領浪潮。而這一股浪潮，自也沒讓站在東亞舞台上居軍事領導地位的日本置身事外，李登輝因而接近了馬克思主義，甚至接受了它。

> 孩提時期，看到佃農們為了能繼續承租農田，年中及年底都會到家裡來送禮。他們一意討好，甚至苦苦哀求的情況，每每令我感到疑惑與不平。……當時我就認為，農業問題將是中國未來的關鍵問題。我之所以會將農業和馬克思經濟學相結合，實與幼時的體驗有關。（李登輝 1999：44-45）

我們可以這麼說，馬克思主義的出現，提供了本來對於農業關懷即用力頗深的李登輝，得到了好的學問工具去進行思辨與論證。但馬克思主義的這把鑰匙，是否因而打開了李登輝欲解決農業問題的大門？顯然結果是令他失望的。當然理論實踐成功與否的勝敗關鍵，可能取決於「施行者」，「挑戰此一難題的是毛澤

[45] 李登輝最早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啟迪，並非始自赴日求學之後才開始；「高等學校的歷史老師鹽見薰先生，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來談中國的歷史，也使我深受影響。」（李登輝 1999：44）。

束。他認為中國與以工人為革命主體的歐洲不同，應可發動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但毛澤東始終沒有放棄個人的權力……中國歷史也無法擺脫傳統的束縛，開創新的時代」（李登輝 1999：46）。

李登輝確實曾一度一頭栽進鑽研馬克思主義的世界，「由於我在大學時期對馬克思經濟學十分熱衷，……利用馬克思經濟學，將階級的問題和農業相結合，來論述台灣所面臨的農業問題」（李登輝 1999：47）。但在投入諸多心力之後，卻未能在國際社會中的任何場域，親自見識到這一個主義的真正成功（或許的確存在曇花一現），這是讓李登輝深感可惜的部分吧。

卻也由於透過接觸馬克思主義的緣由，讓李登輝能「以唯物論者的身分潛心研究農業經濟，我[李登輝]想這就是讓我從唯心論的一面倒情況中解放出來，並開始著手改善社會公平與制度問題的良好契機」（李登輝 2016：33）。馬克思主義對於李登輝的啟發，或許未能如其預期地就此找到改善農業問題的根本方法，卻也因此帶領他跳脫以往「唯心論」的思維，漸漸將「唯物論」納入他的實踐哲學，馬克思主義的出現，讓他在農業經濟的研究，更顯成熟與茁壯。

那麼與馬克思主義精神相互違背的「自由主義」，又在此一階段帶給李登輝什麼樣另一層面的啟發？從為數不多的敘述當中，我們看到了「京都本身就是自由主義的所在」（李登輝 2008a：92）。李登輝在一個充滿自由主義的環境中學習，即使身旁的學者教授未必然都是自由主義的信奉者，如「河上肇也在那裡教書，他寫過《貧乏物語》，……這本書在日本的影響很大，完全是一本說明馬克思基礎理論的書……」（李登輝 2008a：92-93）。但就是架構在自由主義的學風當中，促使了李登輝能夠有著多元的視角，去看待在校園中所能學習的一切。

三、　二戰爆發的愛國情操

> 中途一度停靠青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國人。……我在青島停留約一週，心裡開始不安地想著：「日本與中國展開戰爭，無異是犯下大錯。」眼底所見，中國人顯然過著極低水準的生活。衛生觀念等等，和日本人天差地遠。與生活條件如此嚴酷的民族打仗，應該不會贏吧。（李登輝 2015：56）

李登輝是在「1943 年十月份進京都帝大」[46]（李登輝 2008a：97），但事實上當時候二戰的節奏正準備進入最後的尾聲，以日本軍國為例，在當時候已然嗅出可能走入敗戰墳墓的氣味，不僅物資匱乏，甚至人員短缺。在那樣動亂的年代，正值年輕力壯的大學生世代，又豈能袖手旁觀，或者說又怎麼可能置身事外的繼續尋求書中的芬芳滋味。

就在「1944 年二月就『學徒出陣』了」[47]（李登輝 2008a：97），仍是在學學生的李登輝，正式加入日本帝國軍的行列。只是必須特別強調的，「這個時期的李登輝就如同當時的台灣人一樣，是受日本教育具有日本國籍的日本人；不過，與日本人不同的是，他們是接受殖民統治的次等日本人」（張正修 1996：12）。

當然也許也能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在當時台灣受日本殖民政府統治的當口，對於殖民母國的信仰與服從，似乎也是在閃無可閃的情況下，台灣人不一定全然出自自願的情況下，加入日本帝國軍。「但李登輝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只有繼續留在軍中接受自己的命運。他的決定和他的一些台灣友人正好相反，後者根本拒絕入伍

---

[46] 關於李登輝正確進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就讀的年份，事實上至少有兩種不同的版本，分別是 1942 年與 1943 年；由於上述二種不同年份都是出自李登輝本人一手的文本紀錄之中，如「一九四二年，我進入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林經濟系就讀」（李登輝 2016：30），是李登輝近年最新著作；又如國史館發行的李登輝訪談錄：「昭和十八年〔1943 年〕九月，我出發去京都帝國大學」（李登輝 2008a：76）。而多數李登輝研究著作，是多採以李登輝 1943 年赴日就讀大學為重，如「一一九四三年，年方二十的李登輝登上了從台灣北部的基隆港啟航的一艘船，抵達了位於日本最大島——本州島……」（柯義耕 2008：103）、「李登輝於 1943 年夏天參加為期兩天的日本大學入學考試」（蔡石山 2007：75）等。那麼究竟是多數人採用的 1943 年為正確入學年份（因為此部分牽涉到李登輝真正在日本求學、生活的期間計算），還是李登輝於 2016 年出版著作載明的赴日年份方始正確，為此，筆者另外找到了同樣是李登輝個人著作的記載，「我提前半年從台北高校畢業。畢業前夕，我接受《臺灣日日新報》的採訪。……在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刊登了我的專訪內容」（李登輝 2015：50），可見 1943 年時，李登輝人仍在台灣，並於台北高校剛畢業，理當無法早於此時間點的 1942 年，即在日本求學。綜上所述，本研究係以 1943 年為李登輝赴日進入京都帝國大學之採用年份，特於此說明。

[47] 關於李登輝正式加入日本帝國軍行列的正確時間點，事實上也存在著若干文本中時間點有所出入之處。如「其實我入學京都帝國大學之後，僅僅讀了一年兩個月就放棄學業，進入陸軍」（李登輝 2015：52），以李登輝 1943 年吧 10 月入學起算，李登輝直到 1944 年底、約 12 月時投入戰事；此一說法，吻合於「李登輝就讀京都帝大的十四個月中（1943-1944）……」（蔡石山 2007：79）。但以上說詞，卻與「隨著日本敗象漸露，李登輝的求學生涯也被迫中斷。在他入學不到半年後，學校就關門了。……一九四四年時，他便和同校的其他台灣學生志願從軍了」（柯義耕 2008：106）的說法完全不同。因為李登輝從軍的正確時間點，同樣牽扯到其真正求學的相關期間，為求慎重，本研究係以國史館紀實的李登輝訪談錄記述內容：「我在一九四三年十月進入京都帝大，讀了不到半年，一九四四年二月就『學徒出陣』了」（李登輝 2008a：97），為主要依歸。

打仗，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彭明敏」（柯義耕 2008：106）。[48]無論如何，至少此當下，李登輝確實進入了日軍的隊伍，並實際參與了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戰事。

李登輝的參戰經驗，除了高度展現其與胞兄李登欽二人，均在當時充滿著滿滿的愛國情操之外，戰爭過程中的各項生死交關、危機面對經歷，也奠定了他日後面對「死生」、領導國家時處理重大事故危機的不疾不徐應變能力。以 1999 年發生的「九二一大地震」為例，這無疑是台灣數十年來面臨死傷最為慘重的天然災害，時任總統的李登輝，當時即在危機處理上，做了關鍵、效率的決策與高效能執行力，協助台灣百姓度過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慘澹歲月。

> 隔日早上就清理戰場了，我被派去整理災區，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戰場的整理從抬屍體開始……當時的情景讓我學習到在這種情形之下要如何處理。後來九二一大地震、淹大水等等，處理時我的智慧都發揮了，有步驟，處理很快……（李登輝 2008a：106-107）

然而身處生命係於危難之際，並不僅僅為日後李登輝的智慧增長奠定基礎，日本國參與戰爭就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國境內轟然響起的日本天皇「玉音放送」之中，宣布了戰敗的消息；也讓當時人尚在日本本土境內的李登輝，內心開始激盪起各種關於國家/族未來可能走向的反覆對話。「老實說，當時我們認為台灣解放了，自由了，不必由日本人管了，要回到『祖國』去了，這種感覺很強。但是『祖國』來了會變成怎樣，大家並不知道，因為台灣人對中國都不瞭解」（李登輝 2008a：109），這是日本戰敗確定之際，第一時間李登輝的反應。

---

[48] 關於沒有從軍這件事，李登輝也說過：「相剖時彭明敏沒有去做兵，他的手斷了」（李登輝 2008a：146）；此段記述，主要源自李登輝在介紹他與彭明敏曾經有的交往過程，但是簡單的兩人交往回憶，實際上李、彭兩人的記憶明顯出現差異。李登輝是這麼說的：「戰後他回來台灣，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後來就在台灣大學法學院，有一、二次〔偶爾〕我去法學院，會和他見到面，但是只是知道對方的程度而已，真少有來往，關係沒有很親密……當時政府真重用他，也對他特別栽培，我還在做講師，還沒有升副教授時，他爬得真快，已經是教授兼系主任，並兼聯合國顧問」（李登輝 2008a：146-147）；而彭明敏為台教會編著的《會診李登輝》作序時是說：「李先生[李登輝]與我因為同學的關係，確實頗有一段交情。……我因為很早就擔任教授、系主任，台大分配給我的宿舍較大，加上我的內人也很好客，李先生經常是我家的座上賓，大家一起煮酒論政，徹夜長談」（彭明敏 1996：1-2）。二者之間認知不同、產生趣味，伊藤潔也說：「彭明敏後來說他在被捕的前一天曾和李登輝見面，兩人親密的關係可見一斑」（伊藤潔 1996：62）。

李登輝的反應當然不僅於此，「日本剛戰敗時，我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因為祖先是從中國那邊過來的，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身分可能更大一些」（李登輝 2008a：111），國族認同理應不會同時存在第二種以上的可能，否則那將不會是一個肯認的答案。但若真的可能同時發生，依照上述李登輝的說法，比例上李登輝在當時候更傾向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源於祖先的發源地，而認為自己理應懷抱著「中國認同」。

戰後多年方才出生的我們，無從經驗過如同李登輝「們」才有過的重大國族認同必須轉換的情景，卻不難跨越時空去遙想，在那樣紛亂不安、戰事剛停的混雜年代，如何區分自己未來國家的歸屬與可能遭逢什麼樣的未知情境，在在都是當時候身為台灣人的莫可奈何與智慧挑戰。就像李登輝所說：「用歷史上的意義和轉變的過程來看，會說自己是中國人的大部分比較幼稚，會強調自己是台灣人的，通常比較進步。初期我就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因為沒有那個頭腦嘛」（李登輝 2008a：111）。

當然上述是年長時候的李登輝，用今日的腦袋，去整理自己過往遺留下的人生痕跡。但是不置可否的，卓越傑出、就讀台北高等學校、考進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志願加入日本軍隊行列的人中之龍李登輝，在面對遭逢國族認同轉換之際，卻也不一定能夠即刻做出最為適當的抉擇及判斷，可見那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大概也只能「總說一句，大家先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接著才說是中國人」（李登輝 2008a：111）如此般持續混淆的話語吧！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在終戰後的同一時期，當時人仍在日本國境內尚未返回台灣的李登輝，本就十分勤學上進的他，並未匆匆忙忙地奔回台灣，即便面對的，是迎接「重回祖國的懷抱」；李登輝選擇了在日本復學，希望繼續完成未竟的學業。其中特別的是，前述李登輝才明白表示自己當時是中國人，卻在回憶復學這件事上，做了其實截然不同的國族認同回應，「復學時，我告訴他們我本來的名字，過去的岩里政男馬上改回李登輝。學校當然還是看待我是台灣人，本來我就是台灣人，只是一個有日本名字的台灣人，他們不會把台灣人看成是日本

人」（李登輝 2008a：110），此時此刻的李登輝，卻又十分清楚表達自己身為「台灣人」的這個既存事實。

對於是否為中國人這件事，顯然不是他列入考量的事項；只是純粹地進行了「日本」、「台灣」兩種國族身分思辨，而「台灣」無需思索地自然勝出了。在這其中，我們也注意到，即使一心一意成為出類拔萃的「日本人」李登輝養成，李登輝的內心中或許一直都再清楚不過地知道自己無論如何並不是一個真真正正的日本人。「日本」充其量是他的外衣，絕非內裏，內心裡更應該存在著台灣。

> 彷彿蟲繭蛻變成一隻蝴蝶一般：這位日本青年岩里政男現在重生為台灣人李登輝。事實上，名字的改變並不能就此揚棄他長達二十三年成長歲月的經驗，他的戰爭疤痕與其日本學識裝備將永遠伴隨著他。（蔡石山 2007：91）

李登輝的日本經驗，除了曾經渡海遠赴日本就讀大學的這項有別於台灣當時大多數人未必能夠達成的升學之路外，其實絕大部分在台灣生活、求學時的殖民統治背景，都與那個年代的台灣年輕人有著幾盡相同的遭遇。改成日本姓名、接受皇民化教育、為日本帝國效忠、賣命，這些在在都不是只專屬於李登輝的專利；他充其量只是那個時代的人物縮影，或說是一個指標性的討論對象，如是而已。

基於「愛國」的心理，李登輝、李登欽兩兄弟選擇從軍；基於「重回祖國」的情境，李登輝錯綜複雜的心情，油然而起。戰爭終究已經過去，面對全新的國籍身分、國族認同，李登輝並沒有一下子釐得清。如同在戰爭結束當下，「我想台灣既然已經回到祖國，希望快一點回來唸書，為國家拼命、建設，不要留在日本讀書」（李登輝 2008a：116），說得斬釘截鐵；但實際上也許囿於現實考量，「什麼時候要回台灣？有船沒有？」（李登輝 2008a：116）等等這些不確定因素，都不是李登輝一己之力得以照著心願所走。

> 對於緣由日本戰敗的命運的激變，李登輝大為煩惱。究竟要留在日本回京都帝國大學繼續學業？還是回去故鄉，投身新台灣的建設？他沉思徬徨。跟老

師、台灣人的前輩和同輩一再地商量的結果，決心要回台灣繼續學業了。（伊藤潔 1996：44）

李登輝確實沒能在終戰時，旋即以最快速的方式回到台灣，但是否誠如前述所說，他真想立刻能夠回到台灣繼續學業？這一點或許只有李登輝本人能夠明白。但他的確除了秉持「學生就是要做學生的事，我去註冊復學，要回京都大學上課」（李登輝 2008a：110）以外，在確定能有船隻動身返台之前，多留在日本生活至少約莫半年之久。而這半年之中的「新身份」生活，也為李登輝這一趟日本之行，添加色彩與特殊的經歷。

例如由於是在戰敗後的兵荒馬亂時期，和李登輝相似身份赴日求學的台灣人，並非每一位都企盼著希望能有機會早日回到台灣，就連李登輝都會自我解嘲說：「如果那時我不回來台灣，留在日本，現在說不定已經變成大富翁 —— 很多台灣人就是留在那裡賺錢的」（李登輝 2008a：116），由此可見當時候繼續留在日本發展，亦成為台灣學生們的選項之一。李登輝為了正確找到儘早回台灣的方式，離開京都，前往了東京新橋（李登輝 2008a：118）。

京都一代台灣人並沒有準備返國的規劃，同時期在東京則有台灣友人聚集在一起，計畫從浦賀返國。於是我決定到東京，借宿在新橋車站附近同樣來自台灣的陳姓友人家，等待搭船出發。附近都是廢墟，只有陳先生的家孤單矗立著。（李登輝 2015：59）

也就是在等待返台前的東京經歷，李登輝於此短暫期間，結識了許多和李登輝一樣身份尚留在日本的台灣青年。藉由陳震基的引薦，李登輝「在烏秋寮遇到朱昭陽、楊廷謙、林茂生的兒子林宗義、謝國城和邱永漢[財訊雜誌創辦人]等人」（李登輝 2008a：118-119）。這些台灣人爾後各有出路與發展，在短暫交往的接觸過程中，他們與李登輝聊天、聊地、聊台灣、聊未來，其中包括「那時候大家都是共產主義者，都有這種思想，常在談一些共產主義的問題……另外我們也談

到獨立，不過很心適〔有趣〕，這種想法沒有那麼強，有這種看法的人也比較少」（李登輝 2008a：120-121）等等。

李登輝這群當時年輕人所談論的這些共產主義及台灣獨立的問題，迄今仍舊影響著台灣與中國之間發展的特殊敏感性爭議；時至今日，因為 60 年已經過去，完全能夠見識到當時赴日求學的台灣年輕人，思想進步、富有遠見。我們並不全然清楚當時李登輝的國族認同想像，但至少已然可以在 20 出頭歲的李登輝身上，嗅出潛藏在他身上，一股隱隱然台灣獨立思想散發的氣味，也許清淡、但卻蘊含。

第四節 此一時期國族認同狀態分析

本章節主要探討自 1923 年李登輝出生起算，至 1946 年李登輝從日本返抵台灣前的這一段生命歷程。雖然終戰發生在 1945 年的 8 月，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亦正式在 1945 年 10 月時畫下休止符；[49]但是對於李登輝個人而言，即使廣義上的國籍身份已然轉變，[50]但人仍舊踩踏在日本的國土之上，喝的是日本水、吃的是日本米、說的是日本語。吾人認為，此一階段的劃分，當是以李登輝真正再一次踏上台灣的土地後，方始為李登輝下一階段人生的開始。於此之前，都應將李登輝此階段的生命歷程，囊括在「大日本帝國殖民時代」。

由於此段期間橫跨李登輝的童年、青少年、乃至到日本攻讀大學的求學階段，一共長達 23 年之久。為求正確、負責的態度，達到傳達李登輝於此階段的生命歷程轉變及國族認同軌跡的客觀訊息，筆者於此末章節，嘗試針對前述各個不同時期李登輝的國族認同呈現，提出分析與討論。吾人將依序區分為：「一、清晰的日本認同」，「二、次等國民的反思」，以及「三、精神世界的探索」，各自表述本生命階段中可能影響李登輝國族認同的關鍵所在。

---

[49] 1945 年 10 月 25 日，「在台北舉行了『中國戰區台灣區投降典禮』。典禮完畢後，陳儀長官以無線電廣播發表聲明說：『從今天起台灣正式再成為中國領土，所有的土地和住民將被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國民黨政權）之主權下』」（伊藤潔 1996：43-44）。

[50] 「停戰——日本打敗戰了，不僅是日本，也把殖民地台灣的命運大為改變了。以此為界，台灣從日本的領土變成中華民國的領土，李登輝從『日本人』變成了『中華民國國民』」（伊藤潔 1996：43）。

表 2-1：本階段時代大事與生命史事件：成長於日治的童年至青年期

時間	時代大事	生命史事件
1923 年	日本在台灣已殖民 28 年	1 月 15 日，出生於台北淡水郡三芝庄埔坪村源興居（現今新北市三芝區）。父李金龍，母江錦，排行第二，上有大哥李登欽。
1928 年	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成立	
1929 年		進入汐止公學校
1930 年	泰雅族原住民反日起義，釀成「霧社事件」	
1931 年		轉學至南港公學校（三年級）
1932 年	日本扶植滿洲國成立	轉學至三芝公學校（四年級）
1934 年		轉學至淡水公學校（六年級）
1937 年	日本發動侵略中國戰爭	進入私立台北國民中學
1938 年		轉學至淡水中學（二年級）
1940 年		改日本名為「岩里政男」
		考入舊制台北高等學校
1941 年	太平洋戰爭爆發	祖母過世
	台灣「皇民奉公會」成立	
1943 年	台灣實施特別志願兵制度	
1943 年	台灣實施海軍志願兵制度	10 月，渡海前往日本，就讀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林經濟學科。
1944 年		2 月，學徒出陣，以在學學生身分加入日本帝國陸軍。
1945 年	日本戰敗，台灣由國民黨政府接收	
1946 年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完成日本資產接收。	春天自日本返回台灣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一、 清晰的日本認同

首先在「清晰的日本認同」中，筆者歸類出三大不同面向，分別是（一）皇民化教育的成功典型、（二）同為警察的父親與兄長、（三）光榮赴死大日本帝

國軍，來分述何以架構出此生命時期清晰的「日本認同」樣貌。我們就以「皇民化教育的成功典型」開始，來一窺李登輝的日本認同為何如此清晰。

出生於 1923 年的李登輝，彼時日本帝國已然自 1895 年起，對台實施殖民統治達 28 年，當時的台灣處於完完全全隸屬大日本帝國治理的狀態；如同 1993 年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中所說：「司馬先生，我到二十二歲為止也是日本人呀！」（司馬遼太郎 1995：116）。

在日本戰敗退出台灣統治的 1945 年以前，整整 22 年的時間，李登輝接受了日本的教育洗禮及養成，就像是柯義耕（2008：71）提到的：「李登輝成長於二次大戰前日本積極同化台灣人的時期。他在童年時期所認同的是日本的文化與教育。……他是日本同化政策成功的典型」。

我們也看到黃鈺淳（2010：83）說：「李登輝自幼就被以日本國民來對待，經過皇民化的過程更徹底接受日式的社會化養成」。另外，黃文雄（2011：191）從李登輝接受教育的角度切入：「從小學、舊制高中到京都帝大，李登輝接受了完整的日本式教育。學生出征後又重新入學到台灣大學（前台北帝大），當時的教授還是日本人。他到二十二歲為止，都還帶有日本人的意識型態」。

於此基礎上，我們容易理解受各界質疑「李登輝是日本人」問題，於上的時空背景與脈絡下，李登輝當時本該是日本人的這件事情上，是發生的多麼自然與不具違和。也因此，我們能夠清楚判別此一時期的李登輝，無論是在客觀且不具選擇的國籍認定上，或是來自李登輝自己主觀的意識陳述中，乃至國家教育與體制使然，都是一位不折不扣具有日本國族認同的日本人。這是我們最早整理出李登輝童年至青年期的國族認同輪廓，接著則是：「（二）同為警察的父親與兄長」。

接續前述，1945 年以前的李登輝，完完整整地生長在濃厚的日本帝國教育之下，這一段經歷，也正是李登輝（1999：41）經常提到的：「我接受正統的日本教育，當然也深受日本傳統的影響」。而李登輝之所以能夠在殖民體制中，接受正統的日本教育，甚而後來有機會考上台北高等學校、前往京都帝國大學求學，大抵脫離不了來自於他的父親及其家庭的願意栽培與支持，李登輝說：

> 就我的人生來說，最大的幸福是生長在一個小康之家，讓我有機會接受完整的教育。父親李金龍先生，畢業於警察學校（警察官練習所），曾擔任十多年的刑警。當時在台灣，僅有少數人能就讀警察學校，和公費師範學校畢業的老師一樣，都屬於社會的「菁英階層」。（李登輝 1999：36）

有了以上的認知，我們就可以理解，李登輝後來在學業上的卓越成就，若非源自於家裡有所能力的支持，其實很可能就不會長成我們今日所認識的李登輝。另外，或許由於李登輝父親「警察」職業使然，相較於其他同時期的台灣人，李登輝的原生家庭表現得更像是日本人的家庭；其中包括了改為日本名的事情。

李登輝童年至青年期的時期，適逢日本在台積極實施同化政策的時刻，按照道理來說，徹底實施皇民化的結果，台灣出身的日本人，應該都會在彼浪潮中，進行改日本名的正常舉措，然「到一九四二年戰爭爆發前夕，成為皇民的台灣人民只佔百分之四的比例」（黃鈺淳 2010：156）；換言之，就像李登輝說的，父親的職業在當時的台灣是處於「菁英階層」，這也正是為何李登輝的家庭，更加地成為了皇民化的典範原因。

接著對李登輝影響甚深的兄長李登欽，後來也投入了「警察的行列」，李登輝說：「不知道是不是我老爸的關係還是怎麼樣，他竟然自己志願跑去讀警察學校。……我去日本讀大學時，我的大兄已經在台北市警察局做警員」（李登輝 2008a：31）。父親與兄長先後成為帝國的警察，這在殖民體制中具有別具意義的特殊意涵；畢竟要成為統治體系中的「菁英階層」，絕不是普通人家、或是對於日本國族沒有抱持相當高的認同，就能夠輕鬆達成的事。就像李登輝形容他的大哥：「他很盡忠愛國 —— 愛的國家是日本，他的日本精神很強」（李登輝 2008a：30-31）。

最後，我們進入到：「（三）光榮赴死大日本帝國軍」。對於此一時期「日本認同」的探討，或許可以緊扣著李登輝所說：「在我人生當中，有兩件大事情，從十五、六歲的時候，就開始存在我心裡。一項是自我問題，另一項是死亡問題」（李登輝 2005：99）。關於這兩件事的探究，於後尚有更加詳細的表述，在此先提出，乃在於做為一位嚮往成為真正日本人的李登輝，是否願意透過自己自年少

時即關心再三的「死亡問題」，以生命付出的方式，去實踐對於祖國日本的忠與愛，回過頭來應證他成為日本人的認知與決心。

另一方面則是一以貫之的少年李登輝思想態度養成，「我很想探究，刻苦勉勵、徘徊生死之間，人會怎麼樣？……我曾想，人輕如鴻毛，不如身體力行去體驗一下戰爭的意義，因此才特別想當步兵」（上坂冬子 2011：52）。在愛國心之外，參與戰爭對於李登輝而言，也是一種苦行修煉的特殊實踐。這點與「我發現唯有在理解『自我的死』之後，才會誕生出第一次真正帶有肯定意義的『生』」（李登輝 2016：50）意義相同。

「這既不是所謂的學員動員，也不是徵兵，完全是自己決定自願入伍的」（李登輝 2015：52）。雖然李登輝抱持著有所期待於自己的心靈精進而投身軍旅，但無可否認的，他同樣表達了對於日本國家的熱愛，「他擔心日本無法贏得戰爭，自信心也開始減弱。但正如大部分的神風特攻隊的志願者將愛國與榮譽至於個人死生之上一樣，李登輝毅然決然，服從命令」（蔡石山 2007：85）。

在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李登輝到老都懷念在心的兄長李登欽對於李登輝從軍的影響。如同先前提到的，李登輝（2008a：33）說：「我一世人可以說受我大兄的影響很大，比受我老爸的影響更大」。換句話說，李登欽的所作所為，也都一點一滴地影響了李登輝看待世界的方式與國族認同。

同樣的思考邏輯，或許也能夠置放在：「他[李登欽]是日本籍的台灣人，也就是日本人」（李登輝 2008a：31），意即李登輝自己同樣是「日本人」。多年後，李登輝回憶與李登欽先後加入日本帝國軍時說道：「但是我知道，當他說『要成為堂堂帝國海軍，報效國家』的時候，心裡是認真的。那時，我和哥哥都很年輕。一心懷抱著為國家挺身作戰、光榮赴死的理想」（李登輝 2015：55）。

李登輝願以「死」來報效日本帝國，若說心中沒有懷抱著絕對的日本國族認同，恐怕是解釋不過去的。至此，經過日本皇民化教育的成功、到老都難以忘懷與感激的日本式教育，以及願以死的奉獻，守護日本帝國的延續與榮譽，這一個時期的李登輝，真真切切的充滿著無庸置疑的「日本認同」。

二、 次等國民的反思

在前述的論證之中，我們得以確立了此一時期李登輝的國族認同是屬於日本認同，然而自此以下段落的展開，卻是筆者觀察到縱觀 23 年的李登輝童年至青年期，他真正心中關切的主要大事，並非遊走在是否需要積極找尋自己的國族認同之中。換言之，他有更迫切以及心中想要排除的困惑。於是，我們再次有了三大面向的分類，來詮釋此段「次等國民的反思」，分別是：（一）殖民體制的不平等待遇、（二）日本史觀下的中國認識、（三）滿洲國的心嚮往與折衷。

同樣，我們先從「（一）殖民體制的不平等待遇」談起。李登輝「知道自己或住在台灣被日本總督府統治的人民，是和日本人不同」（黃鈺淳 2010：100），他隱然在心中清楚明白自己在殖民統治下，並不被認定為真正的日本人。但因為心之嚮往，李登輝努力地透過教育學習日本語言、文化，甚至是奮力考上日本的一流大學，背後隱含著企圖成為道地日本人的積極向上。

「在那個世代中，他[李登輝]對台灣究竟該屬誰所擁有，本來就沒有決定權，而在日本政府的制式教育下，更難以思索掙脫次等國民的途徑」（黃鈺淳 2010：101），是的，知道自己是「次等國民」，卻也無損對於日本帝國的崇敬及認同。李登輝選擇將清楚察覺到的次等國民待遇，隱藏、或說忽略之。這是殖民體制下，無以抵抗的統治事實，李登輝接受了這樣的無力，也利用自己展現升學能力卓越的方式，以及苦心學好的流利日語，試圖打破天生台灣人與正宗日本人的藩籬。

正如同李登輝所說：「在進入舊制高等學校後，雖然不論西方還是東方的典籍我都有閱讀，但我最熱衷的還是日本思想家與文學家的書籍，日本思想也因此在我身上落地生根」（李登輝 2016：28）。日本的思想深植李登輝的心中，這是透過閱讀得來的意外收穫，也是串起接下來的敘述中，重要的線索。

接著進入「（二）日本史觀下的中國認識」討論。在 1895 年日本來台統治之前，台灣畢竟歸屬於當時的滿清政府，加上此之前台灣陸續湧進了來自明、清兩朝渡海來台拓墾的漢人祖先，台灣成為了深受漢民族與儒家教育影響深遠的移

民社會。在李登輝於 1923 年出生以後，日本殖民台灣即使過了二、三十年光景，許多以往根植於民間的漢學文化教育，依舊錯落在台灣各個角落與鄉間。

依此脈絡下，年少時的李登輝亦曾短暫接受來自中國的漢文化教育，李登輝說：「我在囝仔時代讀過漢文，讀到公學校四年、五年級以後，這個課就停止。高等學校放暑假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我又回去讀漢文」（李登輝 2008a：40）。只是這些短暫的漢文學習經驗，並不足以建構李登輝完整的「中國史觀」，就像黃鈺淳提到的：「儘管知道自己或住在台灣被日本總督府統治的人民，是和日本人不同，然日治時期的李登輝對中國之認識趨近於零」（黃鈺淳 2010：100）。

已經成為殖民地子民的李登輝，主要的教育學習，自是以正統的日本教育為其核心；短暫地修習中國漢文化，並無法改變或加深他對中國的了解。但是從上述得知，我們也看到了李登輝自覺與真正日本人的不同，在殖民體制下，台灣人出身的他，即使經歷充分的皇民化教育洗禮，仍然是時代下的「次等國民」。

李登輝對於中國的史觀與認識，是「高中時期教授歷史的鹽見薰老師，用馬克思主義的史觀來談中國的歷史，對我產生了影響」（李登輝 2016：30）。前原志保說道：「鹽見教授負責教授鴉片戰爭百年後的中國狀況。李登輝接觸到魯迅、郭沫若、胡適等中國知名思想家和文學家的作品」（前原志保 2014：36）。

這也正是鄒景雯所說：「李登輝在高中時代，就透過魯迅的《阿 Q 正傳》及《狂人日記》，幫助他了解中國，由於未受過中文教育，因此讀的是日文翻譯本，而郭沫與後來的柏楊，也是他心儀的作家，李登輝坦承受到這些書的影響不小」（鄒景雯 2001：366）。在下一段落，筆者將進一步說明這些影響李登輝對中國認識之後所產生的實際想法與行為，包括學習農業期望拯救中國的企圖等。

綜觀而論，此一時期的李登輝，是在日本教育之下去認識中國、了解中國的部分樣貌，並沒有一個完整的中國歷史輪廓。正如柯義耕（2008：101）說道：「在年少時期，日本帝國對李登輝前途的影響遠大過於中國。他不僅取了日本名字，也感謝日本人讓他受教育」。在次等國民的待遇下，李登輝盡可能在日本臣

民與「想像的中國」中取得平衡；一如黃文雄（2011：172）所說：「李登輝的歷史觀，亦受到中華史觀的影響，但基本上對它是持否定的立場」。

接著在「殖民體制的不平等待遇、日本史觀下的中國認識」的討論之後，尚有（三）滿洲國的心嚮往與折衷。年少時候的李登輝，「因為父親在從事警察工作期間經常調動單位，我在小學六年之間就換過四所學校，也因此不太容易交到朋友，只能一個人畫畫、讀書來消遣時光」（李登輝 2016：26）。如同前述提到，李登輝在學習畫畫的過程中，得知了中學校以後尚有更廣闊的教育制度，也就是打開其往後繼續升學的契機所在。

有了對於高等學校的認知與帝國大學教育的嚮往，奠基了李登輝對於自己未來人生規劃的藍圖。順利在台北高等學校畢業的李登輝，最終選擇了京都帝國大學的農業經濟領域繼續他的學業，「因為我自己想要去滿洲。過去京都帝大讀農業經濟的台灣人，後來都到滿洲發展」（李登輝 2008a：77）。基於更現實的考量，「『畢業後若回到台北，身為台灣人，好像沒有什麼光明的前途。』李登輝說」（上坂冬子 2001：51）。

李登輝最終沒能去成滿洲，「因為相刨〔戰爭〕結束了，我回到台灣，就沒有去滿洲」（李登輝 2008a：77），但是立志以修習農業經濟專業，來達成至滿洲工作的願望，沒有因為去不成滿州而有所打折，「現在想起來，我[李登輝]去讀農業經濟是對的，因為這門學問比較仔細，對於大的理想和現實，兩項都抓得清楚……我如果沒有讀農業經濟，可能也不能做總統呢」（李登輝 2008a：79）。李登輝將若沒有讀過農業經濟，直接連結後來有無機會成為總統的遠因，可見因「滿洲」而起的起心動念，深遠影響了李登輝日後的人生發展。

另外，同樣以滿洲為出發與想像，李登輝當然是希望能夠得到更好的工作與有所前途的機會，願意踏上距離台灣遙遠的滿洲任職；但同時李登輝也提到：「我想去滿洲也是因為我對中國有興趣，想要瞭解為什麼中國社會會落後到那樣子。……要去中國，就先到滿洲國去，以滿洲國作為一個跳板」（李登輝 2008a：80）。此時此刻的李登輝，已經表現出關注中國發展的樣貌。

李登輝也曾在 2001 年於合著的書籍中說明當時起心動念、以前進滿洲國為目標的原因：「有一位叫做鹽見薰的教授，他教我東洋史，尤其是中國的歷史。……當時，我讀了很多著名思想家和文學家的書。……可是我愈學就覺得應該要幫幫可憐的中國。這是真心話，我很認真地考慮該怎麼幫中國，結果覺得還是專攻農業比較切實管用。我心想，要幫助中國一定要先從農業著手，因此才去京都大學念農業經濟」（李登輝、小林善紀 2001：59-60）。

透過書本上習得對中國的認識與瞭解，進而激發李登輝解救中國人民百姓的心，究竟能否以此連結李登輝產生了中國認同？吾人抱持相對否定的態度。在李登輝的性格養成上，受到日本文學與西方哲學的交融影響，李登輝很可能是處在一種愛護世人的角度，在看待相對於日本的先進文明，當時是處於落後中的中國。

三、　精神世界的探索

本段落的討論之末，是李登輝在「日本認同」與「次等國民反思」之外，李登輝花費許多人生心力在追求探討的事，也就是筆者所稱：「精神世界的探索」。我們依舊劃分出三個至為主要的脈絡：（一）一頭栽進禪學思想、（二）影響人生的三本書、（三）探索死生自我克制，來爬梳李登輝的精神世界如何建構而成。而其中又有什麼線索，影響了李登輝此階段的國族認同狀態。

首先，我們看到了李登輝「一頭栽進禪學思想」。若說「鈴木大拙」是引領李登輝進入禪學世界的敲門磚，那麼遇見「西田幾多郎」與「新渡戶稻造」，則是使得李登輝一頭栽進禪世界的兩大重要支柱：「他在心靈的成長上得益於兩位日本禪學大師的著作。其中一位是新渡戶稻造（1862-1933），另一位則是西田幾多郎（1870-1945）」（柯義耕 2008：88）。

先前提到李登輝選擇「農業經濟」做為升學求知的目標，為得是能夠取得進入滿洲工作的門票，但其實有著以農業經濟為職志的更根本想法，其實是「我[李登輝]記得自己由衷佩服新渡戶稻造這位日本人，而這份感激也大大影響了我的

升學方向，因為我期望自己能夠嘗試著去專研新渡戶先生過去所主修的嶄新學問領域 ——『農業經濟』」（李登輝 2016：32）。

新渡戶稻造除了影響李登輝決心從事農業經濟研究外，崇拜新渡戶先生的他，讀到「他在國際上也大獲好評的《武士道》」（李登輝 2016：32），自此讓李登輝接觸了「武士道」的精神，甚至在 2004 年出版書籍《『武士道』解題：做人的根本》，來重新提倡與強調新渡戶先生以往遺留下的「武士道」精義。「當我們理解新渡戶稻造對李登輝的影響時，便可知道武士道如何形塑李登輝的內在認同。除武士道外，新渡戶稻造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這些想法在李登輝身上的作用似乎也與後來尋求基督教的慰藉有著密切的關連」（黃鈺淳 2010：67）。

種種未來人生發展的連結，無論個人專業、宗教信仰，或是「武士道精神」的體悟，新渡戶先生，扮演了影響李登輝甚鉅的角色，也無怪乎李登輝會說：「新渡戶稻造是『人生的導師』」（李登輝 2016：32）。黃鈺淳（2010：69）亦說：「對李登輝來說，他深信武士道是他政治哲學的根本。日後他在政治上大力推動各項改革遭遇障礙時，武士道精神是他主要的精神後盾」。

西田幾多郎帶給李登輝的影響，自也不遑多讓，其中較為重要的論述，包括「李登輝對台灣命運的想法，源自他閱讀西田幾多郎的心得」（柯義耕 2008：91），以及「西田從純粹經驗的立場，將所有一切的對立、矛盾、發展作統一式的解明。李登輝年輕時，從西田的『純粹經驗』學習了『場所的倫理』與宗教世界觀，並將其做為『台灣經驗』的基礎」（黃文雄 2011：99）。著名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就是源自西田幾多郎的『場所邏輯』」（柯義耕 2008：92），可見西田先生的思想確實亦左右了李登輝的人生。

再來，我們進入到第二關鍵的，「影響人生的三本書」。李登輝廣泛且富有濃厚興趣的大量閱讀經典著作，讓他在養成人格與思想上，有著異於常人的體認與早熟，李登輝說：「年輕時的我，因閱讀而得救，並找到人生的目標。從這些經典中所學到的事該如何保有自我，把自我否定反轉為肯定自己的一切，也就是

犧牲小我來完成大我，讓自己能夠肯定的一切，我就是藉此達到唯心論的思考方式」（李登輝 2016：29）。

另外「在母親過度的管教而且又三番兩次轉學的情況下，同年的李登輝可說非常的寂寞。生性害羞內向的他交不到什麼朋友，只好把時間花在閱讀、唸書和後來成為終生嗜好的集郵上」（柯義耕 2008：79）。我們理解了李登輝閱讀興趣的開端，也透過前述感受到李登輝年少前涉獵書籍面向的寬廣，除了李登輝說過的：「我向來熱衷研讀日本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著作，所以日本思想對我的影響很大」（李登輝 1999：40）之外，西方哲學亦是他多所琢磨的閱讀對話空間。

先前略有提過影響李登輝一生的有三本重要書籍，在此再次強調以顯重視，「我講到對我一生影響最重要的有三本書，最主要的是湯瑪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的 Sartor Resartus——《衣服哲學》[或譯衣裳哲學]，第二本是歌德的《浮士德》，第三本是日本人倉田百三寫的《出家與弟子》」（李登輝 2008a：71）。

湯瑪斯・卡萊爾的《衣裳哲學》解答了李登輝對於死生問題的疑惑，也從該書中「和『永遠的肯定相遇』，李登輝改變了自己的人生。學習人生的哲學，在摸索人是什麼、人生這些問題後，他的人生觀也從『否定的人生』轉變到肯定的人生。李登輝在思考台灣的將來時，『永遠的肯定』成為其指標」（黃文雄 2011：96）。順帶一提，無獨有偶的，也是因為「高校時代曾讀過卡萊爾《衣裳哲學》的李登輝，為了想更瞭解其內容，找遍了整個圖書館的書。結果找到了新渡戶稻造的講義錄，聽說這便是兩人相遇的始端」（黃文雄 2011：187）。

歌德的《浮士德》在李登輝的解說中：「說來這本書是在說，人活著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大家。我到處說天下為公，其實也是這個意思」（李登輝 2008a：73）。李登輝甚至以從《浮士德》中體悟的道理來教育自己的孩子：「記憶中，父親最常跟我提起的事，就是浮士德對魔鬼出賣自己靈魂的故事」（上坂冬子 2001：297），這也是後來選擇步入政壇，李登輝不斷面臨的折磨與挑戰吧：「我[李登輝]之所以抱定『即便個人是自私自利的，也應站在社會大眾的立場，關愛

別人地生活』，以及『為政者內心若持有肯定的態度，整個社會就會充滿體貼與活力』的政治信念，便是受《浮士德》的影響」（井尻秀憲 2010：33）。

倉田百三的《出家與弟子》的重點則是：「從『完全否定』到『完全肯定』的變化，『消極的死亡轉化變成肯定且積極的新生』的過程讓李登輝非常感動，這種境界變成他的理想」（前原志保 2010：48）。李登輝也提到：「特別是這本書的最後，親鸞說道：『這樣子也不錯，大家都得救了……友善、和諧的世界』，令人感動。這種境界也正是我的理想」（李登輝 1999：41）。「有人認為倉田這部作品受到了西田幾多郎《善之研究》（1911 年）的引導，而關於《善之研究》的『純粹經驗』，李登輝也在許多著作中都曾提過」（前原志保 2014：48）。

承上述，第三，則是要探討：「探究死生自我克制」。李登輝的閱讀習慣，為他帶來了什麼樣的啟發或改變？我們必須先從他遭遇了什麼樣的困惑談起。「少年時代有兩項事情對我[李登輝]心理上有很大的負擔，我必須自己去解決，第一項是前面提過的自我問題的克服，第二項是人的生死問題的克服，……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讀了很多哲學、心理學的書」（李登輝 2008a：64），也就是黃郁淳（2010：100）所說：「他[李登輝]對自我感到迷惘、對生死亟欲瞭解，在閱讀的文本中試圖思考生命的價值」。

另外，前原志保（2014：43）也觀察到：「之後關於他 16 歲左右的故事，都必然會出現與『死』有關的概念。也就是跟死生觀有關的問題。進入台北高等學校的 1941 年祖母楊妹去世，跟最親愛家族最初的死別經驗也可能影響到他」。黃文雄（2011：94-95）也說：「給李登輝的生死觀很大影響的，是英國歷史學家湯瑪斯・卡萊爾的《衣裳哲學》、歌德的《浮士德》以及倉田百三的《出家及其弟子》……而帶給他答案的，就是《衣裳哲學》」。

而關於「自我克制」部分，「我早就想要克服自我，想樣怎樣吃苦，但是只是在想，並沒有真正在做。一直到中學時，我因為精神上的寄託，知道自我克服的方法了，別人不愛做的事情，我都撿來做」（李登輝 2008a：50-51）。加上李登欽對他的影響：「哥哥李登欽的存在，成了我的救贖。他加入地區的青年團，

青年團的活動之一就是打禪。受到哥哥的影響，我開始閱讀鈴木大拙《禪與日本文化》之類的書籍，希望藉由打禪、苦行來超越自我」（李登輝 2015：42-43）。

柯義耕亦說道:「淡水中學的課程偏重軍事訓練，但李登輝卻一心鑽研禪學、日本文學和西方哲學。他曾經表示他自己並未受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影響」（柯義耕 2008：83-84）。鑽研禪學的結果，讓李登輝「過去在日本壓制下，也是因為這種禪學式思想才讓他得以超脫被統治的束縛」（黃鈺淳 2010：70）。

更進一步說，「李登輝到 25 歲左右為止，都抱持著唯心論的思考方式。這個事實呈現在他十多歲時自我的糾葛和生死觀念上」（前原志保 2014：42），唯心論成為年少李登輝重要思考依靠；意即「他開始思考『何謂自我』……『培養自我』……執著於『自我』，[漸漸地走向]日本式的唯心論」（黃文雄 2011：24）。

投注了許多苦心與心力，為得就是從知識藍海中與身體力行的實踐，找尋年輕時困擾許久的疑惑，卻也因此巧合連結他將來的宗教信仰：「中學時期投入對禪學的思想研究，奠定其內在信仰的重視。這段時期的他，可以說是典型的唯心論者，神遊於形上學之中，自得其樂」（黃鈺淳 2010：71）。最後，必須提到的，「在自我的形成過程中，透過和強烈自我的苦鬥，他開始詢問『我是誰？』、『我不是原來的我』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瞭解李登輝的『我的思索』、『我的自覺』，也可說是理解在台灣人精神中不可或缺的『發現個人』」（黃文雄 2011：25）。

第五節 小結

回顧此一時期，吾人確定了李登輝的國族認同處於「日本認同」的狀態，但由於他十分清楚在殖民體制下，身為台灣出生的日本人，其實是二等國民或說次等國民。所以在更準確的分類上，李登輝具有的日本國族認同，應當加上「殖民體制下的次等國民」日本認同，這是更貼近事實的國族認同標籤。

作為一位日本帝國子民，李登輝深深受其文化與教育影響，並由衷感謝日本教育帶給他能夠開拓視野的一切。李登輝也展現了十足的愛國之心，願意為日本帝國奔赴戰場，守護大日本帝國體制下的家園與河山。但是嚴格上來說，若非經

歷戰爭的來襲，國族認同乃至殖民地與母國的經濟關係等，都不算是李登輝真正關心的事，黃鈺淳（2010：156）說：「這種大時代的氛圍對年少的李登輝而言，或許不是當時他最關心的事」。

黃鈺淳（2010：119）也說道：「日本政府在政治、教育、經濟及公共衛生等方面的推廣，帶領台灣走向現代化的新局。李登輝在這樣的時代脈絡下成長，既存的認同顯然是服膺日本的」。關於這樣的說法，筆者的看法大致與黃鈺淳相同，此一階段李登輝的國族認同的確呈現出「日本認同」；只是畢竟生活在殖民體制之中，即使是最基礎的小學教育，仍有本島人（台灣人）與正宗日本人的「公學校」、「小學校」之分，我們不能不正視「次等國民」所帶來是否統稱、簡化的「日本認同」。所以吾人主張在斷定李登輝此階段的國族認同上，應具體為「殖民體制下的次等國民」日本認同。

此外，「李登輝希望大學畢業之後能到滿洲工作，……這其實可以看成一種前認同與即將出現的新認同融合的具體實踐」（黃鈺淳 2010：121），對於這樣的解釋與觀察，吾人認為強度稍微過大。原因是李登輝嚮往的滿洲國工作，更多基礎原因應該置放在受「新渡戶稻造」農業經濟專業的影響與感召，以及務實地抉擇回到台灣沒有出人頭地的更多機會；即使高等學校鹽見薰帶給李登輝的中國史觀，仍舊不足以讓深以作為日本人為傲的李登輝，去思考有必要產生新的認同。

而同樣也值得討論的是，李登輝投身戰事期間，一次搭船行經中國的經驗，「相對於被日本以現代化建設的台灣，中國人顯得生活在十分惡劣的環境，……心裡不是畏懼，而是認為日本與其為敵很難獲勝。從這種想法可以看到，日本認同對他來說再也不是唯一的內涵，而成為可以相對的。新的認同雛形也悄悄呈現，讓他以超越的眼光檢視原先的認同」（黃鈺淳 2010：121）。

筆者並不明白黃鈺淳說的「新的認同雛形」所指為何？就語意上的理解，或許能夠解釋為「中國認同」悄悄呈現。倘若黃鈺淳在此觀察到的是李登輝中國認同的隱然浮現，那麼就是讓筆者更加無法理解之處。筆者更傾向蔡石山所說：「李登輝與他的同學在不知不覺中被灌輸一種為國家而學、為國家而生，乃至於像他

哥哥李登欽『志願』到菲律賓打仗一樣為國家而死的信念」（蔡石山 2007：74）。奮勇殺敵、報效國家、願為大日本帝國而死，應是更接近當時李登輝的認同狀態。

無論如何，透過前述列舉李登輝更勝國族認同關心之事，我們清楚知道，在細分國族認同考究之外，這個時候的李登輝醉心於探討「死生問題」與「自我克制」。隨後經由兄長李登欽的影響，接觸了「禪學的世界」，並進而受到日本兩位禪學大師「西田幾多郎」與「新渡戶稻造」的深厚影響。西方世界的哲學思想，也在此一階段進入李登輝的閱讀世界，卡萊爾的《衣裳哲學》、歌德的《浮士德》，也在年少的李登輝思想上，刻下印記。

接觸日本文學、思想，以至浸淫於西方哲學的思辨，不僅僅幫助李登輝渡過了年少時期的困惑，同時亦奠定了往後各個時期李登輝人生思想轉變、政治態度、國族認同等的微妙基礎。[51]易言之，以此第一階段出發，在往後李登輝人生的不同階段之中，我們都能輕易找到有關李登輝人生態度的實踐或轉變，其實都源自於這個階段中奠定影響甚遠的不變原則與基礎。

回到「Cross 黑人化心理學」認同發展模型上，在吾人的梳釐之中，認為李登輝的國族認同發展上，此一階段是處在「前遭遇期」中。由於此時的李登輝並不把國族認同置於最為關心之事，反而更加重於個人關注的事務之中，不論是探索死生問題或解答自我克制，乃至尋求解決的方法與答案；大多數的心力幾乎都與國族認同探究無關。進一步地說，這是抱持「低強度態度」的前遭遇期。

[51] 李登輝卻也曾經說過：「雖然我自幼接受日本教育，受過日本文化的薰陶，但對中國文學與思想，也曾多有涉獵。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後，風起雲湧的現代思潮，更對我有很深的影響」（李登輝 1999：42），值得注意。

第三章 國民黨政權來台初期（1946-1971）

> 昭和二十一年四月我從浦賀坐船回到台灣，我已經不記得是幾日出發、什麼時候到基隆，船的名字是「米山號」。同船的人在台灣有名聲的人真多，但是我想：坐船嘛，就好像坐車一樣，雖然坐的時候在一起，離開以後就什麼都沒有了。（李登輝 2008a：125）

終戰後，李登輝在日本停留約莫半年之久，[52]即使日本戰事的挫敗，台灣已經為國民黨政權所接收，但這並不影響李登輝回到京都帝國大學受教的機會。只是如同許多赴日求學的台灣年輕人一樣，在國際局勢尚未明朗、台灣前途未知的情況下，終究殷殷期盼希望能夠早日重返台灣、建設台灣，開始另一段離開日本殖民母國的嶄新生活。然而，就在這混沌時刻，所有事物呈現一片混亂，即使聰明如李登輝，也很難記得是什麼正確的時間點回到台灣了。

由於日本殖民時候，能夠自台灣渡海到日本求學的人，除了本身的學業表現優於一般學生之外；更重要的，這些在戰亂當下仍然透過汲取知識、希望利用所學予之奉獻社會的人，戰後在異鄉也就自然而然地「群聚」了起來。[53]於此背景下，裡頭成員自不乏當時、或者日後有所成就發展的人，也就是李登輝所說：「在台灣有名聲的人」（李登輝 2008a：125）。[54]

此章節除了接續著李登輝的生命成長歷程、順著時序向下開展之外，歷經李登輝自 1943 年前往日本求學、從軍、復學之後，再一次踏上台灣土地的李登輝，再也和日本殖民政權無從屬、國籍上的干連。此時此刻的台灣，是由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的國民黨政權進行統治。對於所有當時候的台灣人而言，這是從未有的經驗，其中，自也包括了打從出生就活在日本政權統治之下、受其教育的李登輝。

---

[52]「我做兵之前在京都帝國大學讀半年書，做兵一年多後退伍，一九四五年九月復學，又讀了六個多月」（李登輝 2008a：116）。

[53]「當時台灣人在日本被孤立起來，台灣人在日本生活需要一個組織 —— 比如同鄉會……當時大家都組織起來了，想要快一點回到台灣來建設」（李登輝 2008a：116-117）。

[54] 這些有名聲的人包括了：「我在烏秋寮遇到朱昭陽、楊廷謙、林茂生的兒子林宗義、謝國城和邱永漢等人。……他[邱永漢]創辦的《財訊》多次要來訪問我，我沒同意。日本時代台灣人在日本做官做到最高的是朱昭陽，他戰後回來台灣，為台灣在拼」（李登輝 2008a：119-120）。

第一節 重回台灣校園生活（1946-1949）

> 從神奈川縣的浦賀港搭上日本政府準備的船隻，此時的我已不再是日本人，而是以台灣人的身分返鄉，因此迷失了生存的方向，這是一九四六年的事。（李登輝 2016：51）

1943 年的李登輝，是乘著夢想的羽翼，前往日本國度求學的；期望有朝一日能夠自日本京都帝國大學修習專業的農經知識，接著再踏上心嚮往的滿州國，去實踐人生階段性理想。姑且不論這個夢想到頭來是否成真，這個已非需要著墨的重點；就李登輝的勤學與好勝的角度來看，即使無法在日本完成大學學業，回台之後的李登輝，肯定為其未竟的課業尋求延續。

在制度的保護之下，[55]李登輝得以進入台灣大學（終戰前原為台北帝國大學），繼續他的大學學業。同樣地，李登輝持續著他對「農業」領域的濃厚興趣，就讀了台灣大學的農業經濟學系。然而，仍舊多舛的，李登輝的求學之路，很難在一個期間之中，單純只有看到他身為學生的樣貌；在台灣大學前後三年的求學期間，主體上是學生身份的他，於內、於外都遭遇了影響他往後至深的重要事件。

自日本求學時期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的李登輝，回台就讀台灣大學期間，面臨了是否成為「共產黨員」的這樣一個當時台灣時空背景下，不容犯下與沾染的「過錯」，這是承接前段「於內」的部分，緊密扣著李登輝自身的舉措。「於外」指的則是在此期間，台灣島上爆發了死傷慘重的「二二八事件」[56]，造

---

[55] 這個說法，是源自李登輝陳述：「我是京都帝國大學的學生，教育處有一項規定，帝國大學的學生可以無條件編入台灣大學就讀。如果不是帝國大學的學生，想進台灣大學，還要考試」（李登輝 2008a：131）。

[56] 二二八事件：「1947 年 2 月 27 日，專賣局查緝員在臺北市天馬茶房前查緝私菸，因不當使用公權力造成民眾一死一傷，成為事件導火線。隔天民眾前往行政長官公署前廣場示威請願，但遭公署衛兵開槍掃射，使原先的請願運動轉變成為反抗政府行動，臺灣在各地發生軍民衝突後，至 3 月 6 日已蔓延到除了澎湖外的全臺灣，外省人受波及遭臺籍民眾攻擊傷亡，依警總公布〈二二八事變各縣市外省同胞死傷之統計表〉造成外省人死亡 52 人，受傷 1364 人，失蹤 10 人，而依警總 1947 年 5 月 26 日記者會公布的外省人死傷人數有 1958 人。事件期間的各地組織民兵進行武裝抗爭，尤以臺灣共產黨謝雪紅領軍的二七部隊最有規模，雖然地方仕紳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協商談判後，各地衝突稍緩，但陳儀仍請求蔣介石自中國大陸調派軍隊增援。增援軍隊於 3 月 8 日起陸續抵達臺灣，在各地展開武力鎮壓，隨後更實施清鄉。二二

成全島上下人心惶惶、動蕩不安。李登輝當然也親身經歷在那樣詭譎的情境中，並且有著許多人未必有的特殊經驗。以上，都是本節將逐一探討的部分。

一、 農業專業領域的鑽研延續

> 我在昭和二十一年四月從基隆下船，來到台北。我的老爸知道我要回來，他來台北車頭等我。我剛回台灣時，感覺台灣因為相刮受到很大的破壞。當時台灣物價已經升到一個程度了，雖然我還有錢，對我家也沒有影響，但是每個行業都因為相刮的關係蕭條了。日本時代施行經濟統制措施，戰後沒有統制。（李登輝 2008a：130）

在李登輝與國史館的訪談錄中，前後短短五頁的篇幅，出現了兩次的「昭和二十一年」。寫的內容不盡相同，一是描述「從浦賀坐船回到台灣」（李登輝 2008a：125），另一段則是「從基隆下船」（李登輝 2008a：130）。時間軸是相同的，也就在 1946 年四月，李登輝從日本返台的所見所聞、感受云云等。但在此，卻明顯存在著一個有趣的出自於李登輝本人時間敘述方式 —— 昭和二十一年。

上述的這個觀察，筆者認為是特別的。因為在回台之前，李登輝早已知曉台灣不再是屬於日本政府的殖民地，統治權來到了國民黨政權的手裡；相隔超過一甲子後，李登輝對於處理憶往的訪談紀實中，仍然沿用「日本年代」的時間表現方式。明明台灣當時的時空已然與日本切斷聯繫，李登輝不會不知；卻還是將自己的生命時序，倚靠在日本年代之下，這是頗為令人玩味的部分。可以說是出自他下意識直覺中的年份記憶，也可能是他刻意呈現的國籍／時間處理。

而在本段落的開頭之中，我們也注意到了，戰禍的確衝擊了當時台灣的經濟。但誠如李登輝說的，他們家庭暫且不受影響；由此可見他的確長在一個相較其他台灣人來得優渥的生活環境，這正好呼應前面章節所提。李登輝也在開頭的敘述中，簡短地比較了前後統治政權的不同經濟管制措施，雖沒有明說優劣好壞，卻仍然可以解讀到於其心中，多少存在著一種「比較」前後統治台灣政權的心態。

八事件造成造成臺灣與外省籍民眾傷亡，根據行政院的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總計死亡人數有 18,000 人至 28,000 人左右。」（維基百科 2017a）

事實上，可以想見面對政權轉換之際，國籍身分、執政措施、管理制度的前後不同，對於任何一個台灣百姓來說，都會是必須面對的調整適應時期。

接下來，開始走進李登輝返台之後的這段生活。在回來台灣之後，由於「學校太晚通知我[李登輝]入學，到一九四六年七月還是八月我才能入學」（李登輝 2008a：131），所以出現了於復學前的短暫等待期。不過在正式回到台灣校園求學前的短短數月之間，年已 23 歲的李登輝，此次並不若以往能夠受到全家人對他繼續求學的支持與鼓勵。我們可以見到，以往鼎力支持李登輝發揮於學業的祖父，也有著別於以往的態度：「我阿公也說：你這麼多歲了，不要再讀了」（李登輝 2008a：131）。李登輝遭遇到家人未必能夠全然諒解，順利延續課業的情境。

當然最終李登輝是順利地重返校園、繼續學業，卻也經過一番掙扎及現實的妥協。於此階段順帶一提，[57]後來與李登輝在 1949 年 2 月 9 日結為連理的前第一夫人「曾文惠」女士，[58]就是在李登輝 1946 年回台之初，心中暗自確定的未來人生伴侶。李登輝是這麼說的：

> 我的太太（當時我們還沒結婚）他們也住在天水路，所以那天晚上，我去太太他們家作客。當時我看到她，心裡想：這個人將來要做我的太太！（李登輝 2008a：130）

曾文惠在嫁入李家之前，其實已經開始影響了李登輝的生活。在復學等待中，李登輝聽從家人建議，嘗試開始工作。當時曾文惠恰如其分扮演了李登輝身旁那位支持與鼓勵的「非家人」，「我太太告訴我：[59]做這個有什麼用？還是認真去讀書最好。」（李登輝 2008a：131）。俗話說：「聽婆嘴、大富貴（福佬語發音）」！或許緣份自此展開，加上鍥而不捨的努力，李登輝果真娶到了曾文惠這個賢內助，幫助他往後面對多變的人生境遇，能化險為夷、度過諸如處理重要國政的難關。

---

[57] 有關李登輝的人生大事，與曾文惠的組織家庭，第二節中將會再提。此階段只是正好敘述他們的初遇，特此說明。

[58] 「1949 年 2 月 9 日，李登輝與曾文惠兩人的婚禮，在一家鄰近台北新公園的飯店舉行」（蔡石山 2007：118）。

[59] 1946 年的四～七月間，李登輝與曾文惠尚未結為連理，李登輝於此有這種用語，應是在現在的角度來看，早已習慣的稱謂，同時基於尊重妻子，並非錯置時空背景。

另外，在李登輝重新入學期間的幾個月當中，尚有兩件重要的人生紀事，必須特別一提。其一是就在李登輝回台不久後，他的母親江錦女士去世了。[60]面對自小對他疼愛有加的母親驟逝，李登輝心中的難過，恐怕難以用筆墨形容。但我們實在很難在李登輝的自述當中，找到太多有關這段傷痛的回憶。只有「那時候事情真複雜，我真沒閒，我的老母去世了，我還要處理插班入台灣大學的事情」（李登輝 2008a：131），其他再無多見。

屋漏害怕連夜雨，李母死後的「四個月後，他摯愛的祖父李財生過世 」（蔡石山 2007：96）。短期間內摯親接連離開人世，對於李登輝的打擊可想而知。但「李登輝一邊要忍受失去親人的痛苦，一邊還得專心學習農業經濟學與閱讀來自中國的書籍。完美主義的李登輝並不相信自己已經從台大教授那裡學得足夠的知識」（蔡石山 2007：97），也許將心思重新置放在自己向來熟習的讀書領域之中，是一個能夠幫助李登輝走出人生低谷與陰霾的好方法。

其二則是如同前述所提，李登輝的祖父一度不希望李登輝繼續求學，他也並不忤逆長輩的期望，就在等待入學前夕，嘗試著進入就業市場：「不過我也真的想去吃頭路，工作地點是台灣工礦公司內的南港橡膠公司，……做了兩個禮拜，公司裡有一個查某囝仔一直在追我，我很害怕，結果就辭職了」（李登輝 2008a：131）。嚴格上來說，這應該稱得上是李登輝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但由於只維持兩個星期即以辭職，並未能真正算得上有過職場上的正常經歷。筆者偏頗地認為，此段經歷，尚稱不上是李登輝已經走進過職場裡。[61]

李登輝終究等到了重返校園求學的機會。無論歷經親人接連逝世的痛苦煎熬；還是原本順著家人的期待，嘗試進入職場就業；都並未構成讓他再一次進入學業的阻撓。不過倒是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在進入台灣大學前，事實上存在著一個李登輝於學科上，往哪個方向鑽研的轉折，「戰後我本來不想再讀農業經濟學，我還在京都時，……我少年時代對中國歷史很有興趣，但是我不要直接去讀中國歷

[60] 「1946.05.28 江錦女士過世」（李登輝 2008a：131）。
[61] 關於李登輝真正進入職場的時間，尚有其它契機出現，於後章節將更進一步說明。

史，而是先讀西洋歷史。後來我回台灣，就想算了，台灣也沒有什麼西洋歷史可以讀，所以留下來讀農業經濟」（李登輝 2008a：134-135）。

李登輝差一點就不再拾起農業經濟的書本，轉換領域到歷史研究的範疇上。往後李登輝人生的發展結果，我們無從判斷當時的他沒有堅持興趣上的西洋歷史，而選擇繼續走向農業經濟領域的鑽研，是否是一條最為正確的道路。但是無可否認的，李登輝的確倚靠這個專業的修習，漸漸發展成為自己雄厚的本事與利器，讓他日後在學界、政界等人生旅途中，發光發熱、大鳴大放。

> 我剛回到台大時，農業經濟系的圖書館書很多，比起法學院、經濟系還要多，但是我差不多都看完了。說起來，我真正認真讀農業經濟的書，是回到台灣以後開始下功夫。我在台大差不多三年，對農業經濟非常用功。每天我總是帶一個便當，吃飽飯就在圖書館裡翻書，把圖書館的書差不多都看完了，對於什麼書、什麼理論都摸透了……（李登輝 2008a：137）

從上述的李登輝自述中，我們知曉了他的台大求學生涯，共歷時約三年之久。也感受到李登輝對於自己的博覽群書，有著滿溢的自信。或許，這正是成為國家領導人的必要特質。同時間，我們再度見識到了李登輝常年不間斷的讀書興趣，並且持以恆心、毅力地大量將精神與時間，投入在自我學習之上。這也無怪乎他能夠穩健地逐步邁向成為學者之路。

承接著上述的「自我學習」，也許我們能夠利用一個有趣的視角，去還原當時為何李登輝必須如此耗費心力的自我努力，來汲取學術無涯的精華知識所在。「當時老師都用中國話講課，……中國來的人用他們的話，其實他們的『國語』大家聽嘸〔聽不懂〕，所以他們一直寫黑板。我讀過漢文，看得懂漢文，我也認真在學中國話。只是他們的發音，根本都不是北京話……攏嘛聽嘸」（李登輝 2008a：143）。是的，面對政權的轉換，最大的不適之一，很可能就是發生在「語言」同時必須更迭的困境。不熟悉的語言、中國各地鄉音的差異，還要面臨艱難、深奧的新知學問修習，難怪乎李登輝選擇了自習一途。

於此順帶一提，上述也出現了另一附加的有趣敘述：「中國來的人用他們的話」（李登輝 2008a：143）的這一個描述之中，李登輝清楚傳達了「中國來的人」的這個區分用語。照字面上的文意解讀，這些教授學生們的老師大多的確來自「中國」，但李登輝亦點出「他們的話」這個劃分「他群」、「我群」的識別印記。很顯然李登輝在不經意形塑的隱晦之中，刻意強調了「台灣與中國」的不同。

回到李登輝在台大求學時期的語言困境上。書本上的知識獲取，若能夠來自師長們的教育，自是甚好；卻由於語言的阻隔，李登輝只能透過自身的加倍努力，去彌補上課時「有聽沒有懂」的囧境。但語言的不便，並非僅僅發生在課堂之中，「李登輝提到一九四六年十月時政府實施禁止台灣各級政府機關、學校和報章雜誌使用日語。對他而言，這無異是強迫他放棄自己做爲一個國際知識份子的身分，因為日語原本是他認識這個世界的管道，但政府卻以很少台灣人會說的北京語做為官方語言」（柯義耕 2008：115）。

這樣一個失去打開世界之窗、習慣語言的剝奪，恐怕不是一時片刻得以適應。當然，就知識教育的汲取，也許較為不受衝擊，事實上「當時台大沒有禁用日文，我[李登輝]們交換意見也是差不多都用日文」（李登輝 2008a：143），李登輝並非自此隔絕了日文世界。但是閱報早已成習慣的李登輝，[62]恐怕就無法再見到他習慣的日文書寫報紙，去窺探世界上瞬息萬變的風貌；無疑就是矇住他的眼，讓他隔上一層厚厚的紗去從事他的樂趣、探索這個世界的即時訊息。

所幸所謂「山不轉、路轉」，在此過程中，李登輝仍舊克服、度過了語言改變的必須適應。只是「除了學北京話之外，李登輝還得學中國的地理、歷史和文學……李登輝從日本人努力變成中國人的過程『在心靈上是一個很痛苦的經驗』」（柯義耕 2008：115），我們可想而知。這也不僅僅發生在李登輝孤孤一人身上，

[62] 「我在台大讀書時，受到一些人影響，第一特別的就是向周自強學到怎麼看新聞〔報紙〕……現在我讀報紙的能力都是當時培養出來的」（李登輝 2008a：136），此段敘述重點原為李登輝於台大就讀時，受到哪些人的影響，當中最特別的即是閱報，本文衍生引用作為其閱報習慣。

當時候活過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人，肯定也都有諸如語言、文化重新調整適應的過去，其中只存在著若干程度差別而已。

二、 加入共產黨疑雲

> 有人說李登輝曾經是共產黨員，沒有錯；不只是我參加過共產黨而已，過去蔣經國也曾經是共產黨員，這有什麼不好呢？思想自由嘛。但是我入黨不久，很早就退黨。（李登輝 2008a：152）

受到馬克思主義的誘發，李登輝對於這一套理論的存在，曾經存在著濃烈興趣；我們可以從李登輝個人著作中的節次劃分標語：「一面倒向馬克思主義」（李登輝 2016：30）中，嗅出這股氣息。而與馬克思主義息息相關的，就是世界各地的以馬克思思想為圭臬，發展出一套「共產主義」，並且在許多國家中相繼成立的「共產黨組織」。這二者之間，在終戰前後，始終有著難以脫離的緊密關係。

李登輝當然也與上述兩大世界議題，脫離不了關係。其中為大熱門的話題，李登輝是否曾經加入共產黨，成為共產黨員？李登輝說：「做第二任總統開始，許多人才開始批評我[李登輝]，說我參加過共產黨」（李登輝 2008a：153），大抵是以 1996 年起算，來自四面八方抨擊李登輝曾為共黨成員的聲浪，狂襲而至。更尤甚者，甚至著書出版，全文全篇在討論李登輝應是共產黨黨員的諸多證據、以及任何可以找到的蛛絲馬跡（e.g：藍博洲 2000）。

李登輝面對著打從自年輕時代起，即飽受是否曾為共產黨員的困擾。[63]這個困擾，一直到了坐著總統大位仍舊遭受不斷不斷的挑戰及質疑，是否曾經有的這段過去，李登輝遲至 2008 年，即卸任國家元首的八年後，才首度鬆口證實自己經參與過共產黨。[64]或許就像李登輝說的：「為什麼我曾經是共產黨員？……這是很稀奇的事，大家都有興趣。我已經沒做總統，應該向國史館說出這一段歷史，

---

[63] 如「他和幾個激進份子悄悄加入了一個由台灣人組成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而他後來則以共產黨員或共產黨同路人的罪名遭到警備總部（當時國民黨主要的情報機構，負責實施戒嚴、控制法庭和管理監獄）的訊問」（柯義耕 2008：113）。

[64] 「你們[國史館]會聽到第一手的故事，這是第一手的資料」（李登輝 2008a：152）。

作為歷史的資料」（李登輝 2008a：152），曾為總統的他，的確存在著許多無法在任內直接回應的事情。

但話說回來，因為李登輝是否曾為共產黨員長久以來的遭受質疑，除了藍博洲（2000）的舉證歷歷，卻也有許多參與此事討論者，嘗試為李登輝開罪、辯駁，形成一有趣的交互攻擊對比。其中寫在 2007 年，李登輝尚未揭露自己曾為共產黨員前，蔡石山（2007）曾整理了這個棘手的問題：

> 李登輝是否真的曾經加入共產黨組織這個問題，可能永遠找不到令各方滿意的答案。李登輝迄今對這個問題一直保持「不予置評」的態度。但是與他接近的人士（包括政治大學的陳芳明教授）繼續否認李登輝曾經是個共產黨員。另一方面，那些詆毀他的人，特別是頗受歡迎的作家李敖與法律學者徐淵濤（李登輝的台大導師徐慶鐘的兒子），信誓旦旦地說李登輝曾經兩度加入共產黨組織，但又兩度退出共產黨……（蔡石山 2007：100）

根據蔡石山的整理，依舊證實不出李登輝是否曾為共產黨員的這個歷史之謎。柯義耕（2008）也說過：「由於李登輝從未充分說明這段往事或提出相關證明，也從未完全否認或承認他曾經是共產黨員，因此這件事一直充滿了神秘色彩，令人好奇……」（柯義耕 2008：113）。若非李登輝個人的敘說與真實解密，恐怕到如今仍是個無解的問題。李登輝的適當陳述過去，當然解開了許多以往令有心人士作文章的謎樣過去，可是李登輝為什麼最終選擇坦然面對這段過往？大概會是有著兩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就像前述李登輝終於鬆口的敘述，他相當技巧性地把自己曾經參與共產黨組織的這個話題，硬是連結到了為許多國人緬懷敬重的已故蔣經國前總統。透過連「他」[蔣經國]都曾經這麼做，我[李登輝]這麼做卻又何仿。企圖營造出這並非是我李登輝才有的特殊經歷，連蔣經國都曾經參與共產黨了，我[李登輝]又有什麼不可以？要承認，當然也行。

第二，也就是如同懸案一般，這件事情懸宕已久，如同鬼魅般始終纏繞著李登輝，久久揮之不去。於此過程中，自也免不了有心人士的穿鑿附會、扭曲解讀。

李登輝於承認這段過去之際，同時為文做出相當篇幅的大力反擊。針對不實的敘述，火力猛烈地用力釐清。其中最清楚的回應：「你們[國史館]拿來的資料包括藍博洲的《共產青年李登輝》，……這本書很多所在都不是事實，……書裡說我兩次加入共產黨，我哪有兩次入黨？不可能嘛！沒理由的事還這樣亂講！……亂寫！」（李登輝 2008a：153、154）。

不過說也有趣，上述的第二個原因，是指李登輝在已然願意承擔真相的事實之後，回應起諸多對他過往的不實陳述。但是在其篇章中，其實僅僅主要將回應鎖定在藍博洲的著作裡。裡頭當然煞有其事地指出勘誤部分，點出「藍博洲用了許多吳克泰的說法……聽說他[吳克泰]在中國很擁護我」（李登輝 2008a：158），卻也直指「我看他[吳克泰]頭殼內有幻想了」（李登輝 2008a：159）的這番話。所謂回應，事實上就是在藍博洲的著作中打轉，順道指出吳克泰的說法並不可信。

那麼其他有關敘述李登輝這段共產黨經歷的其他著作，為何李登輝就沒有一一做出反應？或許可以以藍博洲的著作被視為證據力相對齊全的論述，找到的相關人證亦的確與李登輝產生關係，加以專書論述，所以李登輝仔細回擊。但與李登輝求學時乃至仕途後，關係一度緊密的徐慶鐘恩師，[65]其子徐淵濤（2000）的著作《替李登輝卸妝》，裡頭同樣提及李登輝的共產黨員過去，就這麼難以走入李登輝的眼裡嗎？是徐淵濤陳述正確，還是李登輝另有其他的考量，作罷回應？

我們從徐淵濤的敘述裡，發現他筆下的李登輝，是一位雙手沾滿鮮血的「共產同志加害人」；雖沒明說，但隱晦在其敘述中，不難察覺徐淵濤要將李登輝形容成背叛同志、求取榮華的不肖之人：

> 當李登輝和中國共產黨告別，頭也不回宣佈退黨後，情治機關的偵騎衝進他同志聚會的房舍，於是，原本和他同組的同志們，不是紛紛被送入監牢，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就是先後被送到台北馬場町，執行槍決，幸運的同志，必須被迫亡命天涯，和台灣的親人生離死別。當他昔日的同志們唱著〈安息歌〉，為彼此送行時，李登輝卻日漸飛黃騰達。（徐淵濤 2000：241）

[65] 有關徐慶鐘與李登輝的關係，將在下一章節中繼續說明。

從上述的句子中，我們清楚看見徐淵濤的比擬，絕對不會指的是李登輝的迷途知返、未卜先知；也不是在適當時候一走了之，往後發生的事情再和李登輝無關。顯然在徐淵濤的筆下，刻意將李登輝形塑成與其他壯烈犧牲的人，走向截然不同的命運，也就是為何李登輝能夠獨善其身、如此幸運？很可能源自李登輝做了特殊的決定，在最適當的時候。因為徐淵濤接著說：「他[李登輝]，以為歷史即將隨著槍聲，永遠被埋葬在歷史的灰燼裡，因為倒在血泊中的同志，再也不能活轉過來譴責陽間隻手遮天、掩蓋歷史真相的人」（徐淵濤 2000：242）。

這是何等重大的指控！李登輝卻僅在一次、兩次加入共產黨的這種無傷大局中打轉，用心做出回應；卻在其恩師之子徐淵濤的冒犯指控之中，置之不理，這似乎不符合常理的判斷及推理。若說李登輝因為承認自己加入過共產黨，就能自此走出這堆謎雲，恐怕卻也交代不過去。當然，有著太多太多尚待釐清的事實真相，若李登輝必須一一去回應外界所有的質疑，似乎也顯得絲毫沒有意義。

但此類事情，除非李登輝尚有其他回應產生，否則將如前述蔡石山所提，「可能永遠找不到令各方滿意的答案」（蔡石山 2007：100）。話說如此，我們在此能夠確定的是，李登輝親口證實，他的確曾經加入共產黨；無論時間長短，都曾經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共產黨員。這是在 2008 年以前，許多謎團的最佳之解。

三、　二二八事件的影響

> 原本台灣人準備歡迎國民黨的軍隊進軍台北，但是當他們看到國民黨軍隊身上穿的破舊軍服，感到很錯愕。因為台灣人已經習慣日本軍隊紀律嚴整的行軍，對他們來說，國民黨的行軍太雜亂、太沒紀律了……日治時期台灣人無法想像的貪污開始四處橫行，惡性的通貨膨脹導致經濟混亂等等，社會整個大亂。不久後，民間出現了「狗去豬來」這句話。狗是指戰前統治台灣的日本人，豬則是指來自大陸的中國人。（李登輝 2015：73）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無疑是一場台灣史上政府戕害百姓的重大浩劫。此一事件的爆發，當非偶然。自 1945 年 10 月起，國民黨政府對台灣人民的治理不當，在民怨積累的情況下，終至爆發史無前例的流血衝突，導致全台動盪不安、人心

惶惶。欲了解二二八事件的始末，必須從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時，從何而來的「狗去豬來」探討起，才能真正揭開這影響台灣人民至深的歷史事件序幕。

承接上述，當時人還在日本的李登輝，知道了日本政府確定「受降」後，台灣主政者已由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的國民黨政權取代，那時候的李登輝，其實內心算得上是平靜、喜悅的：「日本戰敗後，有在傳說日本要把台灣還給中國……當時老百姓和現在老百姓的心情完全不一樣，大家都很歡迎這個消息，老實說，當時我們認為台灣解放了，自由了，不必由日本人管了，要回到『祖國』去了」（李登輝 2008a：109）。

為此，李登輝甚至甘願放棄在日本的學業，只希望早日回到台灣。李登輝也的確沒有在停留日本多久，隔年春天就回到了台灣；雖然，或多或少挾帶著惶恐的心：「從神奈川縣的浦賀港搭上日本政府準備的船隻，此時的我已不再是日本人，而是以台灣人的身分返鄉，因此迷失了生存的方向」（李登輝 2016：34）。

只是回來台灣的開始，以最精準的方式來說，「當我在基隆上岸之後，一眼就看到市容一片荒涼的景象。那是日本戰敗之後，台灣人被迫面對的，新的『悲哀』」（李登輝 2015：72）。也就是下定決心回台奉獻心力的李登輝，自日本返台的船隻靠岸後，迎接他的，可以想見是戰亂後百廢待舉的紊亂殘骸，而不可能是戰爭結束未滿一年的情況下，台灣有著什麼樣的欣欣向榮風貌。

李登輝也許對於戰爭過後的景象心裡有底，絕不可能有辦法見到台灣社會迅速回到正常的軌道。然而畢竟長期受到日本文化教育薰陶的影響，當他重新見到的台灣情況時，似乎遠比他所能接受的，這其中存在著更多意想不到的落差，「因為台灣人受到日本很多的影響，無論在社會還是在思考方式上都和中國完全不同，文明程度有極大的落差」（李登輝 2016：34）。當然也或許，在李登輝的心中始終存在比較先、後任主政台灣的政府，究竟哪一個能真正為台灣人民帶來幸福。

某種意義上，當戰爭過後百業蕭條、國家亟需重新整裝待發的時刻，是可以令人勉為其難接受的。所謂共體時艱、共赴國難，也應該是任何時代中，身為認同國家的基本公民素養。但是再怎麼退讓與包容，倘若遇到本質上就是將台灣視

作資源掠取之地、甚至是強取豪奪的頑劣政府，恐怕也就無法如上述般，人民與政府的心同在一起了。終戰後的台灣，脫離了 50 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卻也在當下旋即陷入另一恐怖政權的開端，及前述所提人民心中默默認定的「狗去豬來」。

> 返台的第二年（一九四七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多年以來，我雖然很少提起這段往事，但「二・二八事件」卻對我的思維及理念，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般都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政權對台灣人的鎮壓行動，但問題並不如此單純。這是許多本省籍知識份子，被扣上共產黨員的帽子，而慘遭殺害的白色恐怖事件。（李登輝 1999：48）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當下，李登輝已經進入台灣大學就讀。在此之前，尚有一件重要事情，足以讓李登輝捲入這場風波之中。李登輝擔任過「台大農學院學生自治會理事長」（李登輝 2008a：166），也就在爆發二二八事件前，台北「發生反美抗議遊行，這件事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京大學學生沈崇被美軍強姦有關……法學院和農學院的學生都有參加運動。這裡有一張照片，是那天的活動，我就站在旁邊」（李登輝 2008a：166）。所以「事實上，當時我[李登輝]也是被鎮壓的對象之一」（李登輝 1999：49），就是能夠預見、而不意外的事情了。

誠如前述所提，二二八事件的肅清，主要就是針對被扣上共產黨帽子的本省籍菁英。李登輝因為參與了官方認為幕後是「共產黨」在操弄的反美遊行，被劃分為共產黨同路人，在那二二八詭譎的氛圍下，自不難推敲及想像。李登輝也因此嚐到了生命安危的脅迫，以致「二二八發生時，我和劉甲一從法學院本部回來。大部分時間我都留[躲]在何既明家……我也不是一直躲在那裡，日時〔白天〕都出去四處晃蕩」（李登輝 2008a：167）。雖然李登輝並未如禁臠般躲躲藏藏，卻很清楚地看到，事實上李登輝還是選擇了易地而處，以免正面面臨麻煩。

而在這段歷程當中，台灣人為了起身抵抗國民黨政權軍隊的暴力迫害，以謝雪紅為首的「二七部隊」因而誕生。這是一個以共產黨組織為架構的武裝部隊，謝雪紅就是共產黨在台灣活動的主要領導人，此時此刻的李登輝「也想過是不是

要到台中參加謝雪紅部隊[二七部隊] ……謝雪紅很有優勢，有部隊，也有武器，所以我會想去」（李登輝 2008a：169）。雖然李登輝最終沒有加入這個部隊，但是「想」加入的心，已經值得我們探討與研究了。

李登輝向來有著一股正義且愛國的心，從他願意奮不顧身加入日本帝國軍、在終戰後放棄日本學業趕忙奔回台灣協助建設等這些脈絡下，不難看出。卻無可避免的，懷著滿腔熱血回到台灣，遇到了二二八事件「那時候的情形真是慘，兵仔到厝內來，我雖然沒有親眼看到他們殺人，不過我在延平北路，躲在柱子下，看到他們亂開槍，被掃射到的人不少呢」（李登輝 2008a：170）。雖是三言兩語帶過，卻令人讀起來不寒而慄，況且是躲藏在柱子下，才保有餘命的李登輝。

> 自從二二八開始，我的各種想法就和中國「再見」。本來為了台灣，想要從日本回來「祖國」拼，但是這時卻感到失望了，慢慢地我轉變到以台灣為主體。後來我參加共產黨，主要是為了要對抗，要改革獨裁政府。後來看到共產黨都是由中國人在支配，我感到討厭，半路就離開共產黨。共產黨的作法沒有人性，把人當成一粒棋子在利用而已，我感覺到沒意思。這時我就改變了，變到完全以台灣為主體，開始認真讀書。（李登輝 2008a：171）

這一段話，同時揭露了幾個大的重點。第一，二二八事件過後，李登輝逐漸萌生台灣主體意識，內心的中國，已非想像中的祖國。其二，同時明白了李登輝加入共產黨的主要原由。第三，由於加入過共產黨，也因此看清共產黨葫蘆裡賣著什麼藥，因而選擇退出；並也因為這樣，更篤實了李登輝心中完整的台灣意識。最後，李登輝明白指出「開始認真讀書」的這個契機所在，因而奠定了他日後學術成就及仕途得以平步青雲的根基。

綜上，一個二二八事件，對於李登輝的影響自是不容小覷；同樣地，對於所有台灣人而言，都是一個必須正面面對的重大課題。即使 70 年後的今天，此事件對台灣所造成的影響，始終沒有出現為所有台灣人所能滿意的官方作為；其中無可避免的，尤以二二八受害者及其家屬的受傷最深。沒有還原此事件的始末，

太多被選擇隱藏的事實無法有著真相示人，使得我國人不斷地在這個重要歷史事件中，陷入徘徊、疑惑、迂迴、打轉的無限循環。

話說回來，當時候甫經歷過日本政府殖民的台灣人，說太天真也好、說太純樸也罷，逕自以為由國民黨政權先遣到台灣進行治理的官員，在爆發二二八事件之後，真會傾聽台灣人民的心聲，錯以為還停留在如同過往能與日本政府相當程度進行理性溝通的時光。結果當然不如預期，換來的對待，只是讓在台灣的國民黨官員，能換取足夠的時間，向遠在中國的蔣介石求援，進而派出荷槍實彈的軍隊，渡海來台掃蕩、平息事件。

本文主人翁李登輝並非事件的直接受害者，當然也不是受難者的後代，但卻真真切切地目睹、甚至算是經歷過此件事情。更貼切地形容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的李登輝，其實，他當是一位幸運沒有在此事件中遭受迫害、甚至因而喪命的台灣青年。於此當中，詭譎的社會氛圍，卻怎麼也避免不了地渲染到了李登輝的身上，好比「我雖然把刀仔帶回台灣來了，但是二二八時，我把刀仔丟掉，連軍服也丟了」（李登輝 2008a：76），可見李登輝的驚恐，以及時代下的明哲保身作為。

一場發生在台灣島上空前絕後的世紀災難，國民黨政府殺害了無數至今仍舊難以計算清楚的台灣人菁英。直至 21 世紀的現在，依然無法完全釐清此事件的真相;並且一拖再拖地，遲遲未能得到一個能夠令台灣各界均能認同的最終答案。說穿了，這其實是一種遮掩，亦是台灣無論如何輪替的主政者一直不願面對的醜陋過往，與殘忍真相。相關二二八的轉型正義推動，仍然必須由掌權者願意承擔地持續向前。

第二節 社會新鮮人（1949-1953）

由於李登輝的大學求學階段，挾雜著二戰時的從軍經驗，耽誤了求學的期程，所以大學求學時期總共耗費了前後六年的光陰，才順利完成此一階段的學業。以致後來卸下學生身分、成為社會新鮮人時的年齡，已然來到了 26 歲之際，也順

此回應前面章節所提，於此，李登輝方是真正進入了「職場」。相較於普遍更早投入勞動市場的台灣人而言，李登輝算是較晚進入社會的工作鍊之中了。

李登輝雖然不再具有學生身分，他首次進入社會職場的領域，卻依舊是留在校園之中服務。台灣大學的助教工作，是他進入職場的第一份工作。雖然助教的這個身分未必伴隨李登輝太久，最後也不是以平順的方式結束這個工作；但對於求知若渴的李登輝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好的銜接方式，讓他能和緩地進入社會體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歷程。

而在逐漸邁向成為學者的道路上，李登輝替自己爭取到了赴美留學的珍貴機會，畢竟唯有透過不斷的進修及深造，才能獲取更多的知識與能量，讓李登輝有實力在學術領域中發光發熱。於此之前，李登輝短暫到了農復會工作；這一段工作經驗的積累，自也在無形中種下了往後李登輝能在公部門成長茁壯的種子。這是作為一個社會新人，李登輝未曾想像到的人生際遇吧。

另外，在此階段上發生一件影響李登輝一輩子的重要大事，即是與日後陪伴他度過人生的伴侶 —— 曾文惠女士，結為連理。這一段姻緣，一走就是一輩子。一直到如今，依舊相互扶持、成為令人稱羨的神仙眷侶。在此當中，無論是信仰的養成建立、或是做為無可多得的賢內助照顧家庭，李登輝的人生因有了曾文惠的加入，而更顯無所畏懼、努力前行。以下將從李、曾二位的婚姻結合開始說起。

一、 牽手一世人 —— 與曾文惠共結連理

事實上李登輝與曾文惠兩個各自家庭的來往，能夠稱作是「三代交情」[66]。或許兩人愛情的發生，始自於李登輝的「一眼一瞬間」，但其實曾文惠祖父與父

[66] 三代交情建立於李登輝祖父時代，即已與曾文惠家族有所來往：「因為太太的外公不識字，不會算帳，所以我阿公在做埔頭坑保正時，他們叫他兼組合的常務理事，請他去幫忙」（李登輝 2008a：27），這是第一代；而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與曾文惠的父親曾慶餘，都是三芝公學校的學生：「我太太的老爸姓曾〔曾慶餘〕，減我老爸兩年〔小我父親兩歲〕，也在三芝公學校讀書」（李登輝 2008a：19），這是第二代的開始；第三代則是李登輝與曾文惠的結為連理。柯義耕也說：「曾文惠的爺爺和父親與李家關係密切。他們不僅住在同一個鎮上，上同一所學校，一起合夥做生意，還合力蓋了一座廟宇，並一同參與地方政治」（柯義耕 2008：117），可見三代交情是確定的。

親的家族、家業，正好就是在與李登輝家族比鄰而居的「三芝庄」裡。曾文惠的祖父，更曾擔任過三芝庄的庄長，[67]亦是當地出了名的大戶人家；[68]曾文惠、李登輝兩人生長的環境，除了家中經濟各有千秋之外，其他應當相距不大。

由於曾文惠家族所能提供的生活環境相對優渥，所以即使在那「重男輕女」普遍見到的年代，曾家並沒有輕忽對於曾文惠當有的栽培，「曾文惠在家中備受疼愛與照顧，她稟性聰明、擅長與人交際，在藝術與音樂方面也頗有造詣。當時她所唸的學校都是淡水和台北的一流女校，而且成績優異」（柯義耕 2008：117）。這樣的長成與涵養，其實也正奠定了日後能夠扶持李登輝一路向上成長的基礎，至少，作為夫妻間生活上的分享與日常對話，曾文惠能清楚接收李登輝所想表達的，也才能適時提供建議，讓李登輝得到情感與心靈上的安穩。

不過即使是上兩代已經有了長久來往的情誼，李登輝也在學業成就上達成了一般人未能觸及的境界，但終究論及婚嫁的兩個截然不同家庭背景，依然會遭到高標準的檢視，以及最不樂見的阻撓感情。我們看見了「當曾文惠說她想嫁給李登輝時，曾家人都嚇了一跳。因為李登輝的祖父雖是個有錢的肉販，但李登輝的父親卻沒受過什麼良好的教育，而且只是個警察，家境也不富裕」（柯義耕 2008：118），曾家帶著異樣的眼光，質疑著「門當戶不對」的現實存在。

在起初不被祝福、甚至不被認可的情況下，李登輝仍舊娶得了美嬌娘，「娶了曾文惠之後，李登輝開始享受親密溫暖的家庭生活。曾文惠是個賢慧的妻子」（柯義耕 2008：118），即使「他們在婚後那幾年似乎並未得到岳家的經濟援助」（柯義耕 2008：118），這兩夫妻依舊過的開心、踏實。哪怕「當時李登輝的助教月薪是新台幣五百元，但負責管理家務的曾文惠透露……當時他們每月開銷至少需要新台幣一千元」（蔡石山 2007：118），這樣的入不敷出生活，他們仍舊

[67] 「我太太的阿公〔曾石岳〕本來是三芝庄的庄長，兼三芝庄信用合作社社長」（李登輝 2008a：25）。

[68] 「我太太他們家的土地是當時淡水郡內最多的，是有三千石粟仔的地主，有幾百甲的土地」（李登輝 2008a：26）。

可以透過曾文惠在「閒暇時教授插花藝術，貼補家用」（蔡石山 2007：118）的方式，過著甘之如飴的生活。

每一位默默待在丈夫身旁付出、扶持的女性都是偉大的，這不會只是用在曾經貴為第一夫人的曾文惠身上；但作為一個本來穩定於職場上求職的知識女性而言，[69]曾文惠能夠掌理家務、相夫教子，成為李登輝安定的力量，[70]這是值得欽佩及嘉許的。除此之外，「面對恐怖的二二八事件，曾文惠在養兒育女之餘，也將她的丈夫帶到基督面前，並滿足他在精神和心理上的需求，讓他獲得心靈上的安慰，消彌內在的不安全感」（柯義耕 2008：119），讓李登輝接觸信仰，在信仰中獲得另一份安定，功勞同樣當歸屬曾文惠身上。

俗話說：「一個成功的男人，其背後一定有一個偉大的女人」。這一句話，用在李登輝身上，全然不顯任何違和感。以世俗的眼光來看，李登輝的學經歷精彩、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努力推動台灣民主化、卸任國家元首後仍然為台灣奉獻良多，他當是一個「成功的男人」。但倘若沒有一個堅強溫柔的後盾站在李登輝的身旁，或許這份成就與榮耀，就不會這麼順利地發生了。

曾文惠之於李登輝的重要，這肯定是牽手一世人中，難以利用筆墨來完全形容。曾文惠在李登輝此階段起的往後人生中，絕對佔據了許多關鍵時刻的重要角色位置，本段落旨在呈現曾文惠的正式登場，有關曾文惠在李登輝生命歷程的種種痕跡，筆者將於往後篇章中逐一加入此一重要元素，在此先表示之。

二、　台灣大學助教工作

此一階段，劃分自 1949 年起。原因當然是因為李登輝的生命歷程，來到了離開學生身份，進入職場工作的開始。然而，1949 年，在台灣近代的歷史發展上，卻絕非平靜、平實的一年。這一年，由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權，因為自始

[69] 「結婚以後，曾文惠辭去她在銀行的工作」（蔡石山 2007：118）。
[70] 「李登輝對曾文惠就變成百分百的依賴了。他曾經告訴同僚，他『太太不在的時候，他就覺得很難受』」（柯義耕 2008：119）。

至終無法戰勝中國共產黨，美其名的「轉進」，實則「敗退」到了台灣。至此，台灣真正進入了高壓統治的恐怖年代，甚至發佈了實施長達 38 年的《台灣省戒嚴令》。繼「二二八事件」之後，[71]台灣全島陷入蔣氏父子領導的白色恐怖氛圍。

先前提過，在從日本返台之初，李登輝原無意繼續農業專業領域的鑽研，「想到學農業經濟已經沒法去滿洲，留在台灣農業經濟可能沒用，因為感覺這個社會愈來愈亂，可能讀社會學比較有信心，就想要轉系」（李登輝 2008a：198）。所幸「當時農經系奧田彧教授說：『不可以這樣！台灣人沒幾人在唸農業經濟，你應該繼續讀啊，繼續讀下去，以後可以做助教』」（李登輝 2008a：198），因而打消了李登輝欲放棄繼續在農業專業領域的琢磨，也因而奠定了李登輝於台大畢業後，能夠從事留校擔任助教工作的基石。

不過事情的發展倒也不一定如此順著李登輝的心意，等到李登輝修習完台大課程、取得畢業學位以後，上述提到的奧田彧教授早已不在台大任教、並且返回日本了，當初的承諾到這個時刻還能履行嗎？或許李登輝注定與學術結下情緣，「他[奧田彧]向王益滔老師推薦我。王益滔老師是溫州人，但是都說日本話，他真惜〔疼愛〕我，所以我去做王老師的助教」（李登輝 2008a：199），這才真正確定了李登輝能夠畢業後旋即留在台大擔任助教的工作。

於此段落特地將李登輝的這一份職務獨立為一個標題，原因當然不外乎這是他脫離學生身份的第一份工作，其中也因為乃是順著時序走，因此而進行寫作。但是於此短暫助教工作期間，李登輝的生命歷程此時是否存在特殊與精彩，更是筆者關心之所在。我們且從他在這過程中，做了哪些事？接觸了哪些人？來推敲這份工作帶給他何種未來的連結。

首先，李登輝真是幸運！「當時做助教真好，沒有什麼工作，真自由，也不用教書，都是自己做研究，每天都在看冊〔讀書〕，好像白白在領錢一樣」（李

[71] 事實上台灣史上前後經歷二次「戒嚴」，第一次是在發生「二二八事件」之後，由當時台灣最高行政長官陳儀所發布；第二次則是發生在 1949 年的 5 月 19 日，由中華民國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發布，由翌日 20 日零時起，台灣本島及附近島嶼、澎湖群島全境實施戒嚴。（維基百科 2017b）

登輝 2008a：199），這對於總是喜好讀書的李登輝而言，當然是個不可多得的好工作。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李登輝自是多了許多得以運用發揮的空間，讓他能夠從事、接觸其他助教工作外的面向。

再一次的幸運在他身上降臨。當時台灣如火如荼地進行兩個重大變革，「一項是農會改組，第二項是土地改革」（李登輝 2008a：199），躬逢其盛的他，手邊並無太多煩雜的事及工作上的負擔，所以他能進一步參與這些重大變革的發生。如同李登輝所說：「當年我雖然是在台灣大學做助教，但是都跟農復會那些人走，跟他們去每一個所在看，才知道各地的情形是怎樣」（李登輝 2008a：200），一方面李登輝因而與「農復會」互動繁多；另一方面也讓李登輝不僅活在書本的知識裡，更進一步促成了他走進台灣各個角落，增長了他當有親近土地的重要歷程。

> 我們實際到農家做調查、幫助他們。做得最有規模成果的是彰化，彰化人實在厲害。第二個特殊研究是在高雄湖內鄉，他們是立體生產，在豬舍上飼豬，下面飼鴨，最下面飼魚仔，用豬屎和鴨屎飼魚仔，這是台灣最密集的農業。（李登輝 2008a：204）

有過這樣一段經歷的李登輝，相信對於在日後持續推動台灣農業改革上，有著相當大程度的助益。同時也讓李登輝更能深刻地思考，在學習書本中的學術理論之後，如何有效運用在真實的農村生活，不至於讓理論距離現實的差距太遠。當然，隨著改革的步伐前進，不也全然都是好的軌跡，當中或多或少都會引發民怨、甚至是直接衝擊到自己的家庭生活，「但是我[李登輝]被厝內的人罵，因為厝內的土地在土地改革以後都被政府拿了了〔完全沒收〕，說起來我是憨啊！後來厝內真艱苦，也就是因為土地改革的關係」（李登輝 2008a：201）。

由此可見李登輝在實踐真理的路上，同時必須面對來自家庭不諒解的指責；但他終究撐了過去，明白自己正在做正確的事情，所以無所畏懼。在這段經歷之中，同時也出現了李登輝的「第三個幸運」！源自「在台灣大學做助教，待遇真不好」（李登輝 2008a：201），加上「每個月還要賣土地債卷，賣一張剛好是四

百多元，不然就賣太太的戒指，我們是這樣生活過來的……我們需要錢來生活，實在沒法度，不知物價會漲得這麼厲害」（李登輝 2008a：201-202），所以李登輝亟需要有著更好的收入，讓他能夠正常地過生活，此時出現了以下的幸運：

> 蕭錚是有關台灣土地改革的主持者，他和王益滔同款是浙江人，他創辦「地政事務所」[72]，我也在那裡兼過講師，一個月可以領四十美金，這個工作我做了差不多一年。過去我沒有錢可以做西裝，這四十美金讓我第一次做了一套西裝，太太真歡喜。（李登輝 2008a：201）

所謂「一文錢逼死英雄好漢」，即使「為了社會公平、公義，我認為土地應該改革」（李登輝 2008a：201）的李登輝，終究必須面對生活上的經濟困頓。若不是能與王益滔、蕭錚等人為伍，間接受到因土地改革而起的國家資源照顧，李登輝是否能夠依舊堅持改革本色，忘卻家人應有的正常生計、勇往直前？很可能當時的他，會有著其他的盤算，然後做了適當的調整、或說轉彎。

最後，一連串幸運，在李登輝的台灣大學助教生涯中出現，但這些都不算高峰。真正李登輝短暫助教工作的完美結尾，是發生在其後取得了赴美留學的寶貴機會，亦是下一章節論述的重點。無論如何，李登輝之後能順利取得門票前往美國進修，倚靠著的，不僅僅是參加留學考試的學問實力，更是他在助教工作生涯中的人脈積累，讓他最終能夠踏出國門，持續累積自己的學術涵養，就藉此拓展視野、開啟不同以往的人生方向。幸運，或許不夠科學，卻真實發生在其身上。

三、 首度赴美留學經驗

> 我在一九五〇年開始參加留學考試……參加那一次留學考試的有一千多人，三十五人上榜，候補三十五人，雖然錄取的不都是台灣人，但是儘量取台灣人；從這樣的情況可以瞭解，美國有意思要栽培台灣人，這是美國第一次正式給台灣獎學金的考試。（李登輝 2008a：206）

[72] 地政事務所「即中央政治學校地政研究班，後來成為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及地政研究所」（李登輝 2008a：201）。

李登輝在學業上的成就，向來不俗。從日治時期考上台北高等學校、京都帝國大學等這些頂尖學府的經驗，不難看出。這一份做學問的精神與內涵，即使到了國民黨政權統治時代，李登輝仍然具備相當實力，在千名競爭者中，能夠脫穎而出。只是此時候能夠領取官方獎助、出國留學的實質內容，早已與日本時代台灣人前往日本本土求學的意義不同；直白地說，在有限的國家資源下，能否獲得國家栽培、赴外求學，很可能都是權力掌握者的謀略運用。留學成了不單純求取個人學問之事。[73]

然無論這個留學考試再怎麼困難，李登輝終究突破難關，取得了赴美進修的門票。只是或許造化弄人，就在李登輝臨出國留學前夕，「要出發的前兩天，再去照 X 光，咦！哪會胸前有兩個黑點？因為懷疑我的肺有問題，他們說我不能去美國。糟了……」（李登輝 2008a：208）。這個突如其來的意外，差一點讓李登輝的美國留學無法成行，可能也就此斷送了李登輝未來的輝煌成就之路。

算是運氣嗎？無獨有偶的，上天總是眷顧著這個勤學的李登輝，「當時農復會農業經濟組組長是美國人 Dawson，他對我真好，這時候他就為我說話：『這個人怎麼不能去？』他宣布讓我延後六個月出國，六個月後我再去檢查……」（李登輝 2008a：208）。順著這個發展，李登輝最後還是順利地前往美國的愛荷華大學進行為期約莫一年半的研究，[74]為他農經專長之路再次加分。

---

[73] 「在美國，超過 87%的台灣人學生移民中，不少人加入且最後變成台灣獨立運動的堅定支持者……在他們到美國以前，幾乎所有的台灣學生都經歷過一個慎重設計的思想灌輸計畫（洗腦），透過思想的灌輸，國民黨政權希望塑造出符合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模範國民，亦即認同中國文化，信仰孔子、孫逸仙與蔣介石的學說」（蔡石山 2007：154），所以能夠取得國家機器許可，出國留學，絕非「凡夫俗子」或擁有非純正國民黨教化思想養成的人，能夠被輕易選中。只是是否能如國民黨政權期許，為國家所用，看來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74] 關於李登輝首度赴美留學愛荷華大學乙事，最終是否取得「碩士學位」多有說法，其中包括「幾乎每個國家的媒體，包括台灣、日本與美國以及每一本談到李登輝的書，都說李登輝於 1953 年在愛荷華州立學院取得碩士學位，但李登輝親自告訴筆者他只住在阿美斯一年多，並無時間寫論文。就這件事而言，李登輝的確並未從愛荷華州立學院或其他地方取得碩士學位」（蔡石山 2007：130）；也包括李登輝個人晚近著作中「一九五二年三月，我留學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取得碩士學位」（李登輝 2015：80）；還有輕描淡寫、未提及碩士學位取得與否的「一九五三年時，李登輝完成了在愛荷華大學的進修與研究」（柯義耕 2008：134）等這些存在差異的版本。筆者認為，尤以蔡石山（2007）的版本可能屬真，因為即使是名為李登輝的著作，很可能非年過九十的李登輝一手而寫，在旁人協助整理資料、登打成書之際，難免發生錯誤，並且缺了部分的精準查證。綜合以上，筆者尚在李登輝個人口述中，找到更加確切的描述：「在愛荷華我沒有拿 Master〔碩士〕，主要是時間的問題，要拿 Master 起碼也要寫 Master 論文。……所以我沒去拿

當然話又必須說回來，在黨國體制的限制下，即使留學考試順利、身體狀況無虞，仍然必須藉由其他外力才能真正讓此路成行。所謂外力，大抵就是「人際關係」的照應，「因為農林廳為我出國做保證，當時推薦我的就是農林廳長徐慶鐘」（李登輝 2008a：207）。是的，又是推薦、又是保證，沒有這些作為後盾，哪怕再怎麼學業上有卓越表現的人，都難以跨過這個門檻，順利取得國家資源出國求學。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想來如此可笑，對於沒有萬貫家財的尋常百姓人家來說，當時為了出國留學所必須面對的一切壓力，的確是迫於無奈的妥協。

承接前述，李登輝比同期獲得獎學金出國留學的人硬生生慢了半年。只是在這半年中，李登輝也沒能閒著，「正式到農復會之前，其實已經和農復會有關係……延期的六個月內，他們叫我暫時到農復會工作……當時農復會的農業經濟組才剛剛成立，我去幫助他們，做研究，也做調查。我在農復會訓練英文、實習六個月，中間寫了一篇文章……」（李登輝 2008a：209）。雖然有了這層先在農復會歷練的關係，仍舊沒能讓李登輝學成歸國後，直接進入到農復會工作，[75]卻也因緣際會地為他日後正式加入農復會前，先行體驗、學習過那裡的工作環境了。

> 我們是當時台灣第一批去美國的公費生。去美國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從台灣離開。我本來也想過不回來，但是太太、小孩子在台灣等我，沒法度留在外國。那時完全沒想辦法接他們過去，既沒有那種頭腦，也沒有那種想法，如果接過去以後要怎麼做？怎麼找工作？我都不知道，只知道認真讀書，什麼都不會。其實台灣這邊也不可能讓我延期研究；我能延期半年，是美國政府許可的。（李登輝 2008a：214）

李登輝「出國時已經生了兩個囝仔〔李憲文、李安娜〕」（李登輝 2008a：215），但離開台灣奔向自由美國的滋味，似乎頃刻間讓他進入一種飄飄欲仙。

Master。後來我在康乃爾大學是直接攻博士」（李登輝 2008a：214）。是故，李登輝無碩士學位，應是確定之事。

[75] 肇因於出國留學需要推薦、保證之故，推薦者往往也會立下交換的條件，如「農林廳為我出國作保證……有這個保證的條件，回來就要服務兩年」（李登輝 2008a：207），自然也就不可能直接到其他單位謀職了，哪怕是待遇相對優於農林廳的「農復會」。

忘了離台前「經濟一片混亂的情況下，他的家境並不寬裕。所幸朋友們舉辦了一次餐會，為他籌募旅費」（柯義耕 2008：133）那樣的窘困；忘了農林廳為他出國的作保；也忘了是銜命遠赴重洋、求取知識，以利學成歸國，報效國家的使命。

或許自由太過可貴，所以李登輝還真的想過就此不回台灣。若不是嗷嗷待哺的兩個幼兒，以及殷殷切切希望他早日回國的太太羈絆；又或者李登輝找到了好的方法，將他的家人順利接至美國生活，他就真的一去不回頭，走往一條離開台灣的道路。慶幸當時李登輝解決類似此一問題的能力還未成熟，算是自己替台灣留下了一位難能可貴的人才，不至白白損失了國家資源的用心栽培。

李登輝閃過了不回台灣的念頭。但這最終未成真的舉措，他還是必須循規蹈矩地奮力完成他的任務、他的學業。只是日子還是辛苦地過，「經濟」仍是他在美國求學時的嚴苛挑戰。這裡所指的經濟有二，其一當然是指生活上的收入分配，在美國，「他每個月都從獎學金當中省下一部分錢寄回家，並且還擔任學校的助教，以便能有更多的收入」（柯義耕 2008：133），如同李登輝自己所言：「我儘量將錢省下來，可以買東西給家人」（李登輝 2008a：216）。

第二個「經濟」，則是回歸到他此行的目的——求學。先說結果，「去美國真正的感想，是認為他們經濟學的理論很進步，我[李登輝]後來經濟學的基礎都是在這裡打下的」（李登輝 2008a：221），這裡的學術訓練，因而奠定了李登輝日後於農業經濟專業上的扎實基礎。李登輝也在此次留美求學中，「上了七門統計學，後來我在台灣的樣本理論有一套特別的看法，就是在愛荷華訓練出來。這對我回來台灣以後在農林廳的工作，有很重要的意義」（李登輝 2008a：221-222）。

總的來說，此階段生命歷程，會是李登輝逐漸成熟的過程當中，一個十分特別的時刻。在這趟美國行之前，李登輝的世界充滿著日本與台灣的教育磁吸，「回到」中國的統治，也只不過七年左右光景，和他此時此刻的歲數佔了不多的比例。所以「當年我去愛荷華是一個新的訓練，也可以瞭解實在的事情。這和我在日本時代受的教育並沒有衝突……這一年多去美國，對我有很大的幫助」（李登輝 2008a：224），李登輝如是說。

最後，李登輝的首次赴美求學經驗，除了打開了他的國際視野、加深了他的學術涵養、體會了日本教育與美國教育存在本質上的差異等，筆者也注意到另一有趣的特殊經歷。歸咎於東方世界與歐美世界的不同，種族議題在歐美國家始終存在令人窒息的氛圍，「那時我[李登輝]去美國有一個感覺，美國對黑人、白人和黃種人的人種差別觀念還很嚴重。……看到黑人不能進去餐廳吃飯，同款的，我們要進去，他們也拒絕，感覺很差」，這是李登輝人生首見的種族歧視吧！

第三節 公部門的早期淬煉與成為基督教徒契機（1953-1961）

1953 年，李登輝自美國愛荷華州立學院完成首次赴美的進修研究。回到台灣後，旋即進入「農林廳」工作。雖然當時候的李登輝有著其他就職的機會存在，但誠如先前所提，他能夠順利前往美國進修，其中一項重要元素，就是時任農林廳廳長 —— 徐慶鐘的作保之故。所以李登輝銜著這一份恩情，說什麼也必須投身農林廳這個職場，哪怕進入政府部門工作的待遇，遠遠不如預期。

而此一時期的台灣農業發展，於公部門的力量中，事實上存在著多頭馬車的特殊情況。隸屬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是一個系統；台灣與美國共同合作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又是另一個獨立系統。另外也包括主導糧食政策的台灣省政府「糧食局」，各有各的發展方向、各有各的堅持目標，也就自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競合關係。

李登輝在此次返台之際，就遇上了農復會想要搶人才的風波；雖然堅定、誠信如他，最終沒有背信地到了農林廳工作，但那是來自於虧欠徐慶鐘的恩情。而在 1955 年徐慶鐘卸下農林廳長職務、離開農林廳之後，李登輝似也找無必要理由，繼續留在待遇欠佳的農林廳工作，因此萌生了堅定求去的念頭。同樣源自以往人脈網絡的堆疊所致，李登輝透過朱昭陽的介紹，去到了「合作金庫」任職，此時的李登輝，也已經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了；為了有效改善家計，這或許也是不得不的抉擇。

再來則是處理有關李登輝的公部門歷程裡，前後接觸、任職最長時間的「農復會」工作。在各方面的權宜考量，及受到謝森中一再的賞識、邀請之下，李登輝正式進入農復會。扣除前面章節提到他在赴美留學前在農復會的短暫工作之外，李登輝自 1957 年一腳踩進農復會之後，就一直和這個單位產生連結，直到「一九七八年擔任台北市長以後才離開」（李登輝 2008a：238），長達 21 年之久。

當然，本章節的時間安排，始自 1953 年的李登輝自美返台就業，一直走到了 1961 年間的這一個他仍然走在農復會崗位上的區段。會有這樣的安排，肇始於 1961 年時，李登輝正式受洗成為「基督教徒」；雖然尚未轉到其他重要職場，但吾人認為，這個至關重要影響李登輝的宗教信仰，當是一個全新檢視的另一階段人生開啟點。當然，最後讓李登輝成為基督教徒的關鍵事件，也會在本段末中真實呈現。是故，有了以上的時間切割與安排。

一、　農林廳與合作金庫的工作經驗

對於李登輝而言，進入農林廳工作，是一個嶄新職務的淬煉。畢竟在他赴美進修前，從事的工作，僅僅是在校園裡面擔任著助教，並非真正地踏入職場，也未曾進入體制內的公部門服務。儘管如此，這一份新工作的挑戰，卻未必會讓李登輝惶恐。因為，這些關愛、眷顧他的師長、長官們，早已與他熟識，並曾某種程度地共事過了。李登輝自不難延續他的專業，於農林廳裡貢獻他的所長。

那麼李登輝在農林廳擔任什麼職務？做了哪些工作？「我在農林廳服務兩年，做農業經濟分析股股長，這個股主要做農村、農戶調查的工作，而且要教農民記帳，農民的帳簿就是在這裡開始做起的」（李登輝 2008a：226），這是大致上的全貌概述，也就是李登輝利用自己的專長所學，實際能運用在協助台灣農民上。相信這樣的安排，對李登輝來說，是一個稱心愉快的事業。

但前後不到兩年的農林廳生活，[76]工作內容尚且算是重要；但我們更關心的是，李登輝在此階段過程中，是否遇上了哪些特別的事，足堪影響他往後的人生境遇，或是在他的思想上產生衝擊？於此前提下，筆者爬梳到了就在李登輝欲離開農林廳之際，時任廳長的金陽鎬，並不希望李登輝離開，於是有了「他要我別辭，說是為了國家，說我沒有愛國心」（李登輝 2008a：229），這樣的一段過往。

這裡指的國，當然是「中華民國」。先且不論李登輝的心中是否存在著中華民國認同，單單「『愛國』這句話，自日本時代就讓人騙得耳朵內都是這句話，用『愛國』這名義，叫少年家要去死」（李登輝 2008a：229），李登輝事實上聽了是反感、不悅的。或許並非他不愛國，而是思想卓越如他，是不喜歡任何人堂而皇之地濫用「愛國」這個詞，扣在不見得直接相關的事情上。

但是上述內容，畢竟是筆者假設的李登輝心理狀態，他並沒有脫口而出對於所謂「愛國」的解讀。即使如此，我們仍舊能夠在李登輝對金陽鎬搬出愛國大帽子的反應中，看出李登輝對於主政者欲加以「愛國之心」，來遂行統治順利之目的的這件事，他是將之引導到較為負面的想法。日本、中華民國分屬兩個前後統治李登輝的政權，卻殊途同歸；前者請他上戰場為「國家」賣命；後者仍然希望他能相忍為重，為國家奉獻心力。顯然這二者的做法，並沒有能夠讓李登輝心悅誠服；他對於「國家」的感想，多了讓人解釋的空間。

再度回到李登輝在農林廳的工作境遇上。誠如本段落一開始所提，當時台灣政府部門對於農業政策推廣，有著至少三個以上不同單位在執行。它們是李登輝任職的農林廳、李登輝出國留學前短暫待過的農復會，以及主管台灣糧食政策的糧食局。先說農林廳與農復會的關係。

以現代的角度來看。當時台、美合作的「農復會」，可謂要錢有錢、要人有人，在背景雄厚、資源豐沛的情況下，尤以徐慶鐘離開農林廳後，「接任農林廳廳長的是金陽鎬，他是外省人。他本來是農復會技正，做農林廳廳長後，都聽農

[76] 「所以我做不滿兩年，就離開了」（李登輝 2008a：230）。

復會的話，農林廳好像變成農復會的下屬機關」（李登輝 2008a：229）。所以待在農林廳工作，對於李登輝而言，肯定不會太過愉快。

再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一直到今天，台灣公部門中仍然存在著所謂的「門戶之見」，常見的型態發生於公部門任職的人，其畢業的學校、或是是從什麼國家完成留學教育的分別，形成不同背景「團體」間的暗自較勁。1950 年代的台灣兩大農業政策部門，就有相似的情形發生。「農林廳裡多數是台灣人，如果有外省人，大部分都是日本派，曾經去日本留學，而農復會則都是美國派的」（李登輝 2008a：230）。

照道理來說，李登輝受過全然的日本教育，也曾赴日就讀大學，與同樣組成多為日本經驗求學的人群聚在一起，當是一個愉悅的工作環境。但或許後來的農林廳非但無法提供更好的待遇來留住人才，也意外變成了農復會的下屬機構，對於也曾經赴美留學的李登輝而言，心中自會產生抗拒，進而希望離開這個職場。

除了上述農林廳遭遇農復會的悶虧之外，農林廳作為一個台灣省政府的農業政策執行機構，也同樣無法在其他業務遂行上，和相關部門達到合作良好的平衡點。「糧食局的勢力較大，農林廳長徐慶鐘〔一九四九～一九五四年在任〕不會贏李連春[77]！因此我去農林廳不到兩年，他就下台了。」（李登輝 2008a：231），可見農林廳的位階相對不會是三個單位中排名前頭的，加上徐慶鐘的離開，李登輝自也按耐不住決心離開的心情了。

話說回來，李登輝此次進入農林廳當然是因為徐慶鐘的原因，但是「我去美國愛荷華以前，已經和農林廳打契約了」（李登輝 2008a：225），是的，「契約」是存在著能否提早離開的關鍵。所幸李登輝意志堅決，「他們沒理由要我賠償，我主要是因為徐慶鐘的關係才去農林廳，徐慶鐘要離開時，我告訴他我也要離開，他說可以，這樣就好了」（李登輝 2008a：203），契約最終沒能綁住李登輝。

[77] 李連春時任糧食局局長。

一番折騰後，李登輝順利離開壯志尚且未酬的農林廳。接著他職場生涯的，是透過「許建裕介紹我進入合作金庫」（李登輝 2008a：233）。這同樣是先前李登輝自己的人脈培養所賜，「朱昭陽和我之前就相識，許建裕一告訴他，朱昭陽就對我說：『來！來！來！』他要我到合作金庫做研究員」（李登輝 2008：233）。

> 對於我辭掉農林廳這件事情，我們也要瞭解，這和生活的問題有關，因為政府的待遇實在太差了。農林廳一個月才四、五百元，但是合作金庫有兩千元，……去合作金庫之後，我就不用賣土地債卷、不用賣戒指來生活。我不在台灣大學專任教書，主要也是待遇的問題。（李登輝 2008a：233）

從上述這段文字中，再度證實了農林廳實質上能給李登輝的待遇確實不好。於此當中我們也發現，「待遇」似乎是這個階段中，李登輝相當關切的人生課題。無論李登輝是不是出生自小康之家、無論曾文惠的原生家族是否富裕一方，年已 30 好幾的李登輝，既已組成自己的家庭，就必須擔負起家庭生計的重責大任。這是旁人無法參與，依照李登輝固執的性格，想必也不會希望接受他人的幫助。

植基於上，李登輝唯有透過不斷地尋覓與創造轉職的契機，才可能讓家人們過上著更好的生活。在取得了待遇相對更好的工作後，也才有了「如此一來，當初為了賺點零用錢貼補家用的李夫人，也不用再去花道教室授課了。經濟上較寬裕之後，她開始讓長子去學鋼琴……」（上坂冬子 2001：90）這樣的一段敘述，這當是最貼切不過的例證了。

在進入李登輝合作金庫工作經驗的討論之前，尚有一個十分特別的事情值得注意。早在 1953 年李登輝自美返台的時候，「謝森中一直要安排我去農復會，……他叫我去農復會，一個月要給我兩百元美金，讓我作技士，有很好的條件。農復會那邊的待遇真好……」（李登輝 2008a：225），前述已經清楚地交代了李登輝當時沒能直接去農復會工作的理由，但特別地是為何在這波轉職的過程中，農復會沒有直接成為李登輝的選項，反倒是前往了待遇未必有農復會好的合作金

庫？這點頗耐人尋味，畢竟 1957 年再次轉職，也是因為「謝森中要我到農復會工作」（李登輝 2008a：235）。

那麼李登輝在合作金庫的經驗又是什麼？或許源自於隔行如隔山的概念，讓李登輝在進入合作金庫的職場後，多少陷入一種捉襟見肘的情境之中。畢竟這是在金融導向為主的工作環境中，加上「我不會打算盤，也沒有實務經驗，所以朱昭陽派我在研究室做研究員，[78]……專門做有關台灣的稻穀和其他農業災害、農業保險制度的事」（李登輝 2008a：234），這樣的安排，也算是沒有距離李登輝的專業太遠的巧妙配置了。

然而在此段時間中，對於李登輝更重要的事，恐怕不是工作上的學習與繁瑣，而是在進入這個場域後，同時間讓他增進了許多人脈的拓展。其中包括「梁國樹、許遠東、謝森中這些人我對他們比較瞭解，人不錯、又有能力，經驗也豐富」（李登輝 2008a：234）。這些人脈的積累，無形中成為日後李登輝上大位後，知道要到哪裡尋找人才，協助他治理台灣這個國家的莫大收益。

最後，在「合作金庫」歷練留下相對較少的文獻資料中，筆者猶感興趣的是：「我在合作金庫那裡，不只是做工作，整個生活都在轉變，我開始學圍棋。」（李登輝 2008a：234），的這段文字。在某種意義上，除了以圍棋作為職業的棋士之外，任何人參與圍棋運動，都算是一種生活上的調劑與休閒活動。先且不論李登輝學圍棋的年齡是早、是晚，我們更關注的是「生活都在轉變」的這件事上。

是不是在前些年苦於生活上的經濟壓力，所以李登輝沒有心思從事其他娛樂活動？還是在合作金庫這個職場上，有了以往農林廳未曾呈現的愉快氛圍，使得李登輝終能放開心胸，過著更有品質的生活？我們尚且未能爬梳出更確切的原因，但是「轉變」究竟為何，是筆者將持續探討與追蹤的所在。

二、　中國農業復興聯合委員會歷練

[78] 「研究員的地位差不多是課長的程度」（李登輝 2008a：234）。

我再說個故事給你們聽，這種故事說起來真心適。這些人會教農業，但是我帶他們去庄腳〔鄉下〕，坐車時我問他們：「你知道外面種什麼？」竟然沒有人說得出來。有時候我告訴他們：「那是『菸仔』，你知不知？」他們也不知道呢。（李登輝 2008a：243）

「中國農業復興聯合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復會），是一個國民黨政權仍在中國執政時，即已成立的機構；[79]「農復會是因為美援而成立，但是在中國的期間美援就開始了，一九四九年、一九五〇年農復會來到台灣之後，美國對農復會仍然繼續經濟援助」（李登輝 2008a：242）。本段開頭李登輝說的故事，其實已經顯現出農復會的組成成員，知識也許甚高，但顯然接地氣不夠，也就時有趣聞發生；卻也同時點出，這就是從小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李登輝，所具有的優勢。

李登輝是在 1957 年時，受到謝森中之邀，去到了農復會任職。闊別了以往「台灣大學助教工作」、「農林廳股長」、「合作金庫研究員」等工作的待遇不佳或穩定性不足的情況，這一份工作，終能讓李登輝如魚得水、好不開心。這一待，與農復會的來往就是 21 年，[80]這是一個相當穩定的職業生涯。

雖然總算來到了心嚮往的農復會任職，但相較起 1953 年即已有機會到這個待遇佳、環境好的部門工作，李登輝事實上算是經歷過一段迂迴的過程。前段中筆者提出疑惑的，為何李登輝沒能在 1955 年決心離開農林廳的時候，直接到了邀請過他的農復會工作，原來關鍵仍在於「謝森中」的身上。

「他[謝森中]本來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博士班還沒有正式畢業，……在農復會工作一段時間，才又回去拿博士，……這段時間差不多是我在合作金庫的時間。他從美國回來不久，就做農復會組長了。回來之後，他馬上跑來找我，叫我去農復會……」（李登輝 2008a：239-240）。離開農林廳轉入合作金庫任職的李登輝，

[79] 「農復會在組織上採委員會制度，由委員會決定政策及工作方針。在美援時期共有 5 位委員，中方 3 人、美方 2 人；美援停止後，中美委員各減 1 位」（李登輝 2008a：229）。
[80] 「我在農復會的時間很長，有二十幾年，一九五七年進去農復會……一九七八年擔任台北市長以後才離開」（李登輝 2008a：238）。

顯然已無先前（1953 年）承諾於徐慶鐘的限制，「自由身」（指無契約束縛）的他，想當然會希望有機會進到更好的職涯場域，例如 —— 農復會。

謝森中的赴美留學、不在台灣，以致延後了李登輝到農復會任職的時間。雖然李登輝未能在 1955 年轉職之際，順利銜接至求才若渴的農復會工作，卻也因此讓李登輝多了開啟不同視角的「合作金庫」歷練，算來不是什麼遺憾、損失的事。至於甫進入農復會，對於十分「重視」待遇的李登輝來說，可為到了一個「待遇天堂」的職場環境：

> 我到農復會時就做技正。農復會的待遇很好，一個月薪水有美金兩百元以上，領的是新台幣，把美金用新台幣換算過來。農復會每年都幫我調兩級的薪水，我厝內的生活很快就得到改善了。我在這裡工作很認真、也很有興趣，做得很心適〔有趣〕，和謝森中常常會討論事情。（李登輝 2008a：238-239）

誠如先前一再所提，「待遇」這件事，對於李登輝的此段歷程中，扮演了分外重要的角色，這是始料未及的。原因在於李登輝並非出身清寒，卻在步入社會，飽受經濟改善之所需，不斷希望能有好的待遇，來撐起以自己為主的家庭。可見「巧婦無米難為炊」這樣令人為難的情勢，也會發生在後來貴為我們前國家領導人的身上，想來格外平易近人及饒富趣味。

另外我們也注意到了，李登輝很是珍惜在農復會的這項工作，「對於我在農復會的時機，我看起來在我的人生上很有意義」（李登輝 2008a：239）。不僅如此，有別於先前在合作金庫時，和讓他能夠進到那份工作的引領者——朱昭陽其實在職場上互動不多的情況，[81]李登輝到了農復會後，卻仍常能有機會與幾乎相同原因讓李登輝謀得職務的謝森中，有著頻繁的互動。對於李登輝個人的感受、受重視感，肯定有所不同。

在每一個不同的職場上，或許生存的法則皆有所差異。同樣一個求職者，面對不同的僱傭關係，表現出的應對進退，也該因地設事、因人而異。李登輝的合

[81]「在合作金庫我很少跟朱昭陽說話，只有見面報告農業保險的事情而已」（李登輝 2008a：234）。

作金庫經歷，我們可以看出他不是一個會僭越職場倫理的人，哪怕朱昭陽稱得上是他的舊識，但他不因此忘了自己的身份，做出苦纏上司的事。而到了農復會之後，與謝森中的互動明顯不同，這很可能是出自於謝森中的分外賞識，讓李登輝更有了表現的空間與機會。

我們從「我在農復會時，還不太會寫中文，我告訴謝森中：『你的口才好，你出嘴巴，我出頭腦，我幫你做到『部長』都可以』因此兩人合作寫文章。在農業經濟上許多台灣發生的重大問題我都有研究……」（李登輝 2008a：240）這當中，能夠看出李登輝與謝森中的合作密切。這不僅像是李登輝所說對於謝森中的正面助益，同時也讓李登輝專心在農業領域上，進而累積起自己更加專業的能量。

這一份能量，果真在後來直接成為了李登輝往上躍進的重要動能，「所以我說我在農復會做得很有氣氛，我在農復會算真得意。後來蔣經國主動來找我去做政務委員，問我經濟、農業問題要怎麼解決，就是這個原因」（李登輝 2008a：239）。所以從李登輝身上發生的例子來看，只要發自善念樂於助人，那一份善緣，很可能也因此為自己帶來好運，成為邁向不同成就的一個重要基礎。

讓我們再次回到李登輝的農復會歷練。由於農復會的全程經驗，超越本段落中預設的生命歷程階段，所以筆者還是盡可能把這段農復會的時光，限縮在 1961 年前的李登輝，從中來找尋和他緊密的發生所在。在這當中，筆者發現了一個有趣的議題，「省籍」的問題，出現在這一段公部門的歷練之中，某種程度地深刻影響了李登的仕途發展，也直接關係到了他格外重視的「待遇」問題上。

在李登輝的敘述當中，省籍看似並不成為職場上升遷的核心問題，但他卻不自覺地吐露出對於這件事情的憤憤不平。「農復會有沒有省籍問題存在？說起來農復會裡面都是外省人，他們很認真、優秀；他們有很多人才，都是技術官僚。我在那裡沒有被排斥……」（李登輝 2008a：245），看起來李登輝沒有直接在「省籍正確」中受到威脅，但是李登輝卻又說：

> 表面上農復會不會區別是不是台灣人，但是若是要做官，對台灣人來說就沒那麼容易。台灣人沒辦法做組長，這是一個事實。……那時候不讓我做組長的一個理由，就是我中文比較憨慢寫。後來有幾個台灣人做組長，這是美國人的關係。（李登輝 2008a：245）

若非擁有「美國因素」在支持的對象，一般「台灣人」是無法於農復會中獲得「組長」的職務，即使是自認沒有受到排斥的李登輝，依然必須面臨這樣的窘迫。或許「中文」不擅長書寫的李登輝，自認理虧，「他們不要讓我做組長，這種問題有的人會打抱不平，我不去管它，這只是小問題」（李登輝 2008a：245）。但更深層的探討，其實說穿了這是一種存在於台灣公部門中的「省籍不正確」，不是從中國各省進到台灣公務體系背景的道地台灣人，就難以順利地一展長才、得到能力上應相對應的職務賦予。

李登輝雖然嘴巴上認為這些都是小問題，但實際上他是明顯在這個潛規則中，處於弱勢的一方。某種意義上，這樣地刻意劃分「省籍」影響著職場上的成就及地位，對於自己相當充滿信心的李登輝而言，不可能不被這種打壓所困擾；進而在他的國族認同上，也很可能受到若干的激盪，悄悄地將他推向天秤的某一端。

再次進入到農復會任用人的來源上，「農復會的職員都是外省人，大部分屬於金陵大學系統，但是沒人讀農業經濟，都是讀農藝系、園藝系這些作物方面的科系」（李登輝 2008a：242），所以倚靠著李登輝自己的專才，恰巧地為自己打開了一條能夠進入這個幾乎以外省人為主力的特殊農業單位之路。但進是進去了，先天上不具有「外省」資格的他，想必該吃的苦、受過的虧，都不在話下了。

可是也因為農復會的主要組成人員，大多來自中國，對於台灣這塊土地的陌生、不親近，使得諸如李登輝這種「本土型學者」，有了更多著墨的力量，這對李登輝的「經管」而言，絕對不是壞事。他若干程度成為了這些來自中國的專家學者與台灣這塊土地的橋樑，透過李登輝的視角，適當給了這些成員們腦力上的激盪，因此能夠迸發出更多對於台灣這塊土地的農業政策想法，這些都是好事。

農復會的主要成員除了具備「省籍正確」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之外，我們同時注意到，他們也是一群腦袋靈活、不會有專業門戶的舊思想存在，「實在說起來，農復會那些方法都是從日本時代借來的。他們來台灣，發現台灣在日本時代所做的值得他們學習，他們學得很快，變成他們的東西」（李登輝 2008a：242-243）。這是讓台灣農業發展順利的一種特別力量，不因轉換政權統治而停滯。

但從上述的脈絡下，我們更加關心的，則是李登輝觀察這件事情的態度。李登輝當然對於農復會成員願意學習日本留下來的好，表達肯定；卻也無形中顯露出，在李登輝心中，他有了對於日本與國民黨政權人才間的比較。他很清楚明白，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栽培出的各種專業人才、既有制度，甚至是農業政策的深度、涵養，都是優於繼日本政權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政權。

若是這樣思考的李登輝成立，那麼當過日本人的李登輝，此時此刻心中的國族認同想法，就是一個有趣且值得關注的問題。因為一路接受菁英教育養成的他，甚至說過「狗去豬來」的話，[82]對於省籍無從正確，卻又必須臣服外來政權的統治之中，他心裡的煎熬，與是否能夠踏實？或者帶有隱藏心中的抗拒之心？是我們必須仔細推敲、關注的。

三、　關鍵性的信仰確立

在介紹完農復會的部分經歷之後，時序必須稍微往回退到 1960 年。在這個狀似仕途尚且順利的過程裡，1961 年前，除了省籍不正確影響了李登輝的仕途發展外，其他並無太多紛擾存在李登輝的農復會歷程中。但就在一個突發事件的影響下，使得李登輝的素樸生活，產生了嚴重影響家庭的重大變故。這個巨大的改變，也讓李登輝更加走近信仰的世界，他必須憑藉信仰的力量，繼續勇往直前。

1959 年，李登輝的五十六歲岳母經診斷確定患上乳癌，這成為李家生活的轉捩點。在此死亡陰影籠罩期間，李登輝岳母擁抱基督作為她的救主。一年

[82] 「狗去豬來」見李登輝（2016：35）。

> 後岳母去世，李登輝妻子的悲傷，以及他自身的憂心，緩慢但清晰，使他向基督教信仰逐步接近。（蔡石山 2007：147）

我們不要忘記，李登輝是一個多麼深愛妻子的人。看著妻子的喪母之痛，身為先生的他，自難以置身事外，「李登輝也對信仰開始關心了起來。大概是看到喪母之後神情呆滯的妻子，心想也該好好支持她吧」（上坂冬子 2001：92）。雖然這一點對於「生來就懂得朝目標勇往直前的李登輝，三十歲左右熱衷於宗教的樣子，似乎和他向來的作風有些格格不入」（上坂冬子 2001：93），但性格特異如李登輝，或許這就是他展現疼愛妻子的具體行為。

1960 年的李登輝，雖然年未滿 40 歲，但是他的人生精彩，未因年歲尚未走進中年而相形失色。這裡指的是，細看這一路來到這個歲數的李登輝，人生走得其實不算平順；當然，他所生長的年代，比比皆是生命充滿坎坷的人，李登輝不算是例外。不過，李登輝的遭遇，的確著上其他人未必有的色彩，好比參加過「馬克思主義」為核心要旨的相關組織，讓他內心中始終必須承受一般人不會有的這種內心煎熬。所以親近李登輝如曾文惠，就曾這麼說道：

> 我丈夫之所以對基督教感興趣，我想是他讀書會的好友被槍殺的事，一直盤錯在他內心深處的緣故。要不然就是，隨著時代的變遷，他學生時代所研讀的唯物論，讓他感到有所不足也說不定。身為一位學者，大抵上已修完學業，但是又面臨了該如何突破的問題，就在千頭萬緒交錯，無法掌握下一個目標時，他的信心也有所動搖吧。（上坂冬子 2001：92-93）

是的，曾文惠也認為李登輝的「讀書會」參與經驗，後續引發了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應。其中尤以成員遭到政府處決的那一種惶恐不安，很可能致使李登輝願意接受宗教的安撫心靈。在這裡我們看到，學者之姿如李登輝，同樣可能因為知識雖不虞匱乏的情況下，在面對詭譎多變的複雜局勢中，仍然正視到己身能力的不足，必須透過不同的思考方式、接觸不同的生活樣態，或許才有機會平復內心許多的掙扎，去面對來自社會上、職涯中、生活裡的種種挑戰。

李登輝於後，確實成為了一個極度虔誠的基督教徒，甚至演變到後來「皈依基督教的行動，大大出乎他的許多親友的意料之外。其中有些人將此一激進的轉變視為李登輝一次精神的再生」（蔡石山 2007：148）。但平心而論，李登輝會有這一種大的動作與轉變，細想他的人生經歷，其實並不會令人感到太多意外。找到一個可資倚靠的心靈寄託，似乎在冥冥之中早已安排，走到了必然須經的路。

下一章節吾人以「基督教徒」作為標題。關於李登輝最終接受受洗、真正成為了基督教徒的敘述，將會持續補充。於此章節末先提到了李登輝「關鍵性的信仰確立」，乃是因為在 1953-1961 年的期間，除了公部門淬煉做為整段章節的主軸之外，若沒有於此當中確實將 1959、1960 間，李登輝岳母的罹癌、逝世、信仰基督教的部分提及，未免無法呈現這整段期間的全般風貌。並且，也會讓下一章節李登輝受洗成為基督教徒，少了前因為何的完整敘述。鑑此，這個讓李登輝成為真正基督教徒的關鍵所在，並需提早呈現，以求平順、通暢。

第四節 信仰與震撼（1961-1971）

李登輝的宗教信仰，成為了他日後成為國家領導人的重要精神倚靠。若非能夠在基督教信仰中，找尋到了許多李登輝抓破頭也難以得到最佳答案的途徑，肩負國家責任重中之重的李總統，恐怕依舊會在許多重要時刻，陷入卡關情境狀態的「孤寡人」。有了信仰的依靠，讓李登輝在面臨許多徬徨與危難之際，最終能讓心情平靜，並以清晰的思路，一一化解他自身乃至國家遭遇的重重關卡。

對於常人來說，一個信仰的相信與積累，少見是出現在靈光一現、突如其來的足以深信。這通常必須通過好長一段時間的接觸、觀察及了解，才可能成為一個人心中不二的心靈慰藉與寄託。尤其，在我們觀察之中的李登輝，是一個透過知識汲取、各種書籍沉浸，廣泛涉獵各種人生百態的理性之人，要讓李登輝澈底信服於一個宗教，不難想像這很可能會是一條漫漫長路。且也因為別於一般人的理智所然，一旦李登輝做了決定，同時意味著也將澈底地對於此一信仰的信賴，以及這個信仰必有其無可取代與過人之處。

信仰基督教，無疑是李登輝成年後的生命歷程中無可或缺的重要線索。在本階段中，除了入信基督教外，李登輝第二度的赴美求學，以及學成歸國後受到了「警備總部」連續七日的疲勞轟炸約談，同樣是本節中必須同時登場的重要事件；對於開啟李登輝往後邁向璀璨的政治人生，這段經歷當是李登輝邁向政治成功之路的開端。於此當中，蔣經國同樣扮演了至為關鍵的角色；也可以說，少了當時蔣經國的青睞，可能也就沒有往後李登輝在政治上的非凡。

一、 入信基督教

在戒嚴時期的年代，台灣籠罩著極權統治的陰影，所有日常生活的一切，都不再尋常。舉凡「公共集會、罷工、罷課、遊行與請願全面禁止」（蔡石山 2007：122），加上白色恐怖造成的夢魘揮之不去，台灣人民生活的苦痛及有苦難言，不難想像。但或許蒼天憐憫，在幾乎限制人民自由的夾縫之中，「宗教自由」這一關，卻尋得了突破的當口，國民黨政權並沒有刻意抑制宗教信仰的自由。[83]

這個宗教自由的氛圍形塑，可能主要建構在兩個有利的因素之下：其一是當時台灣最高領導人 —— 蔣介石，與他的夫人宋美齡女士，二者都是「虔誠的基督教衛理公會的教徒」（蔡石山 2007：146），所以並沒有去限制基督信仰在台灣的發展。其二原因，處於冷戰時期的年代，對抗共產主義是國際主流社會上各國間的共同目標與課題。其中容易區分和共產國家的不同，當可置重在「宗教自由的釋出也是反抗共產主義無神論」（蔡石山 2007：146）的這件事上。不願和共產黨成為同路人，當然不能做出和他一樣限制宗教自由的事。

蔣介石的爭議從未在台灣停歇，但至少於其政權統治中，宗教信仰在台灣仍延續著當有的自由，也才能讓李登輝接觸到宗教為他所帶來的美好。並且「好不容易從『228 事件』中倖存下來，並熬過了『白色恐怖』的年代，……真正體悟到信仰的必要性」（李登輝 2016：38）。這裡的信仰，指的正是「基督教信仰」。

[83] 當然更精確地說，是蔣介石政權並沒有抑制、打壓「基督教信仰」的發展；這或許會是更加持平、貼切的說法。

然而，如同前述提到的，李登輝這種特殊的人格特質，對於追求萬物真理、理性思考的琢磨，自然不會輕易地信仰任何一個宗教，「當時的李登輝在知性上很難接受基督教『處女生子』和『耶穌死裡復活』等教義。一直到他太太和他分別在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受洗之後，他才說他相信『生命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是可以並存的」（柯義耕 2008：125）。是的，這裡頭出現了一個引領李登輝走進信仰基督世界的重要角色，他的太太 —— 曾文惠。

對於基督教的信仰，有著曾文惠的共同陪伴參與，或許是李登輝一步步走近成為虔誠基督徒的重要關鍵。少時的李登輝，即開始認真思考包括「死生」、「禪學」等等的重大人生課題；但漸漸成熟的他，卻始終沒有找到真正解決問題的答案，「漸漸地，我感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可能欠缺了什麼東西，但還是不知道需要的是什麼。於是，我開始去尋找神」（轉引自柯義耕 2008：124）。於此過程中，正是曾文惠跟隨著李登輝，[84]去找尋他們心目中的神之所在。

當然積極參與教會活動，並不表示李登輝已然全心信奉此一宗教，在「受洗」這個重要儀式的到來之前，勢必仍須有著一個「重重」或者「輕輕」一推，讓李登輝本人確信能夠服膺在這個信仰之下。毋庸置疑的，理性以及接受傳統文化教育養成的李登輝，心裡激起壯闊的波濤，「生活中的外在環境開始改變他的內在世界，這種轉變的本質是痛苦的，他陷於矛盾掙扎，天人交戰——這是介於東方文化與西方信仰之間的雙重結合與雙重束縛」（蔡石山 2007：147）。

所謂「剪不斷、理還亂」，在陷入思索瓶頸之中的李登輝，遇上了「一位上海來的牧師告訴李登輝，只有透過信仰才能減輕他的痛苦，找到平靜，……他用基督教的神話、預言、神蹟，以及在神和人之間的特別關係，勸勉人敬畏上帝的力量，使李登輝心服口服。」（蔡石山 2007：147-148）。也就是在這一位牧師

[84] 「1959 年，李登輝的岳母經診斷確定患上乳癌，這成為李家生活的轉淚點……李登輝妻子的悲傷，以及他自身的憂心，緩慢但清晰，使他向基督教信仰逐步接近……李登輝與妻子參加過數百次台北的教堂聚會所的佈道……」（蔡石山 2007：147）。

的見證下，「1961 年 4 月，當時三十八歲的李登輝，……接受這位來自上海牧師的洗禮」（蔡石山 2007：148），完成了基督教信仰中，至關重要的受洗儀式。

這是一個李登輝找到內心依靠的重要里程碑，也是開啟他往後盡心盡力為其所信仰的宗教進行佈道的開端，「從一九七〇年代起，李登輝就開始在台灣各地的教會巡迴講道，在他的總統任內仍然如此」（柯義耕 2008：123）。可以看到的，李登輝不僅僅透過宗教信仰獲得已身心靈上的慰藉與自由，他也透過自我的實踐及分享，傳達這個宗教蘊含的實質教義，祈望感染更多的人們，讓大家感受這個信仰所可以帶來生活的更加美好。這也是促使他成為國家領導人之後，希望帶給人民百姓能夠過著更好生活的最基礎動能。

二、　第二次赴美留學時期

李登輝成為頂尖學者，無疑是在取得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博士學位之後，才真正確立他往後在學術上取得的成就非凡。當然，在此其中，學位的獲得，並不足以證明他有著過人的學術成就。李登輝之所以站上頂尖的學者位置，當在於他的學位論文「曾被美國經濟學會（The America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選為年度最佳論文，……康乃爾還以他的名義在校內設置了一個農業經濟講座」（柯義耕 2008：140），因此而確立了他於學術領域中的不凡。

那麼話說回來，又是什麼樣的起心動念與契機，讓年齡已至 40 好幾的李登輝，心中再度燃起前往美國留學的夢？「李登輝在農復會的工作成了他在政治上的護身符。……但他明白，如果沒有博士學位，他將無法擔任要職」（柯義耕 2008：139）。為了仕途與家計的著想，李登輝始終懷抱著出國留學的希望，可以想見，事實上只有學士學位的他，對於逐漸步入中年的未來，充滿惶恐與不安。

但是這一次的留學夢，並未如首次赴美留學時的相對順利，「我去愛荷華大學進修，回來以後，在農復會等了十二年，才有機會去美國讀博士。農復會都反對我出國進修……這段時間很久，有一些少年囝仔已經出國去拿博士了，但是我在那裡呆呆地等」（李登輝 2008a：271-272）。無論如何，不管基於什麼理由延

遲成行，堅持如李登輝，最終仍舊在 1965 年，等到了二度赴美留學的機會；這時候的他，已經時年 42 歲了。

那麼美國的知名學校諸多，又是什麼原因，李登輝選中「康乃爾大學」就讀？其實一開始李登輝的設定，是「想去哈佛大學師事顧志耐（Simon Kuznets）門下，繼續他在景氣循環、發展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方面的研究」（柯義耕 2008：139）。但誠如前述提到「家計」的考量，此一去美國留學，「農復會的工作暫時停薪，洛克菲勒農業經濟協會會有幫助我厝內生活，康乃爾大學也給我獎學金，……所以我會去康乃爾。康乃爾給我的獎學金很好……」（李登輝 2008a：271）。如此確定了李登輝二次赴美求學的座落地點。最終，他依舊是個十分務實的人。

這一趟的美國行，時間長了前一次赴美留學近一倍之多，雖然沒有碩士論文寫作的學位論文訓練基礎，但李登輝仍舊僅僅花了「兩年六個月就拿到博士了」（李登輝 2008a：273）。會有如此令人瞠目結舌的驚人速度，原因在於李登輝早已做了當有的事先準備，「我可以去美國的時候，對博士論文已經差不多都有腹案了，資料也都有了，那些資料差不多有六十年，是關於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六〇年台灣經濟的資料」（李登輝 2008a：272），在此基礎上，他能以超乎一般學生的效率，順利完成博士學位。

苦心期盼的博士學位，最終手到擒來；學術成就的表現，李登輝也沒讓自己遜色，甚至可以用表現精彩來形容。可是時序來到了已經累積一定社會經歷的 40 多歲李登輝，還有什麼特殊的生命歷程，於此階段相互輝映到這一個得來不易的留美之旅？我們先從他所居住的城市「綺色佳」周遭發生的人、事、物談起。

相較於十多年前李登輝成為第一批赴美留學的公費生背景，十多年後的 1960 年代，台灣已有更多留學生在美國求學，包括「一九七〇年四月，蔣經國訪問美國時，在前往旅館途中遭兩名台灣人行刺未遂」（柯義耕 2008：150）此著名「刺蔣案」行兇的兩位台灣人：「鄭自財與黃文雄」。此事件發生之後，也直接影響了李登輝往後受到國民黨政府的強烈質疑。因為「其中一個刺客[黃文雄]

曾是李登輝在康乃爾時期的同學，因此他[李登輝]立刻成了政府鎖定的嫌犯」（柯義耕 2008：150）。李登輝與黃文雄的結識，即發生在綺色佳這座城市裡。[85]

在此順帶一提，由於李登輝攻讀博士前，已做了事先大量資料的準備，學習起來相對輕鬆，「所以趁機邀請妻子曾文惠到綺色佳來住」（蔡石山 2007：152-153），夫婦倆得以在美國團圓，雖然「這在當時對曾文惠來說猶豫難決，因為她擔心三個十多歲的孩子的照顧問題……她讓孩子們與她住台北的哥哥一起住，這樣他們的學業才不至於中斷」（蔡石山 2007：153）。李登輝夫婦因而能共同度過李登輝在美國攻讀博士的後半段時光。

綺色佳當然不只有李登輝與黃文雄相識的痕跡。因為李登輝「年紀比所有同學乃至部分教授都要大，於是他便成了大夥的叔叔。……他的住處不僅成了台灣學生的聚會所，連教授也時常登門造訪」（柯義耕 2008：143），在這其中，學生聚會所談論的事情，也就令人格外引發好奇。學生們談論些什麼事情？會否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問題」？當然成為筆者關注的內容所在。畢竟「李登輝雖不曾與康乃爾的老師們討論政治問題，但他周遭的台灣留學生卻不乏思想激進、並在暗中進行政治活動的人」（柯義耕 2008：144）。

對此，李登輝本人算是全盤否定了上述的推測，他說：「若是說我在那裡做一些台灣獨立的活動，我是沒那麼笨去做那些事。我和主張台獨的人也很少來往，……那時候談政治那麼危險，不小心都會受一些人影響，我不要讓這些少年家受害，不敢做什麼事情」（李登輝 2008a：275-276）。李登輝表現出年紀稍長的前輩風範，希望利用自己的方式，去保護這些思想激烈的年輕人，以免他們受到迫害。再怎麼說，李登輝自己，其實亦是不斷不斷地生活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之中，讓他難以喘息、壓力久久無法散去。

[85]「在康乃爾的那段歲月裡，和住在綺色佳的形形色色的亞洲學生交往。台灣人當中與李登輝夫婦認識的，有康乃爾的研究生黃文雄與建築師鄭自財」（蔡石山 2007：153）。

> 我在康乃爾的時候是知道這些海外台獨運動，也當然對運動有同情，實在講，心中對台灣的疼惜和對台灣的獨立性問題，本來在思想上就是一體的，沒有什麼差異。……我在農復會的時候可能已經有台灣主體的想法，只是沒辦法講話而已，看到台灣人那麼可憐，專門被人家管、被人家欺負，自己的聲音都沒辦法反映，怎麼會沒有那種想法？（李登輝 2008a：276）

以現在的角度去窺探上述李登輝所說的話，自是可以理解他於康乃爾時期隱藏在心中無法表露出的真正想法。但這是他事後的說法，也是事過境遷之後才逐漸架構出的詮釋，無法輕易說服世人。李登輝在 1960 年代心中即充滿著「台灣主體」的想法，這需要有更多的跡證，去呼應他在 21 世紀時所說憶往的話。至少，「一九六九年我被警備司令部掠去，那時候我就問他們，是不是要問我在康乃爾時有沒有參加台獨」（李登輝 2008a：276）的這件事上來看，顯然李登輝本人是亟欲與「台獨」切割，並且以事後論來看，在此事件上，他是全身而退的。

當然難得赴美求學的愉悅時光，在美國那樣的先進國家之中，李登輝可以學習的當不僅於知識領域中的學問而已。好不容易到了美國這麼一遭，除了後半段妻子曾文惠的趕來生活、團聚，進而夫妻倆能共同利用機會旅遊、遊歷之外，[86] 最特別的其他學習，當屬「高爾夫球」[87]的這項運動參與，成為了陪伴李登輝往後生命階段中，一個重要的運動與休憩項目。

李登輝本就崇尚日本武士道精神，中學時期也曾苦心劍道的修煉，所以當李登輝再次碰觸如同手上擁有一把劍般的高爾夫球桿時，「一座高爾夫球場就像是一座日式庭園，是一個可讓人靜思默想或練習技巧的地方」（柯義耕 2008：143），這與李登輝修習禪宗思想的理念似乎不謀而合，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這一項運動，也的確伴隨李登輝走過了許多年頭，即使在卸任元首後的首幾年，身體仍舊硬朗無虞時，依舊能夠透過報導，看見李登輝走在高爾夫球場上的英姿煥發。[88]

---

[86] 「我太太比較慢去康乃爾，……一九六八年我畢業以後，在回來台灣以前，我們一起去很多地方旅行，從康乃爾、紐約出發，去倫敦、巴黎、羅馬，很多地方都走過了」（李登輝 2008a：274）。

[87] 「李登輝從日本人那兒學到了禪宗思想，在台灣受到基督教的啟發，但卻在康乃爾學會的打高爾夫球」（柯義耕 2008：143）。

[88] 李登輝究竟在高爾夫球場上揮竿到什麼年歲？尚不容易確切查證起，但從 2011 年的新聞報導中，可以看到「李登輝表示，他去年怕冷，身體不好，就比較沒打，去年（即 2010 年）12 月有

三、 警總的七日約談震撼

> 他們透早就來我的厝，那時候我住在松江路，有人「扣扣扣」撞門，我開門一看，「白頭摳仔」〔台語之白頭翁，指戴白頭盔的憲兵〕站在那裡。我告訴太太：「嘿，『白頭摳仔』來了，不去不行喔。」……我就在支票簿子上簽名，然後把支票交給太太，並告訴她：「妳如果沒有錢，可以拿這些去用。」那天她可能整天擔心，不知道我變成怎樣了。（李登輝 2008a：189）

台灣自從發生「二二八事件」以後，人民的生活基本上都處在「白色恐怖」的陰霾之中，「在戒嚴期間，任何人都可能無故被逮補。除了有成千上萬人喪命之外，數以百萬計的台灣人都被迫噤聲，不敢再反抗」（柯義耕 2008：114）。這一種恐懼感，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仍然沒有完全從人民的心中揮散而去，人民依舊必須面臨擔憂著「白色恐怖再現」的陰影。[89]同樣的恐懼，生活在戒嚴時代的李登輝，想必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李登輝至終還是受到了來自警備總部的「關愛」眼神，接受了一連串的疲勞訊問，在進入最後這七日約談中發生了什麼事情之前，我們有必要仔細檢索李登輝一路以來做了哪些特殊的事情，換得如此「重視」的對待。當然如同上述所說，「任何人都可能無故被逮捕」，國民黨政權辦事抓人，似乎並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但我們盡可能從李登輝的生命歷程中，找尋令他心生畏懼的「款待」理由。

我們先從最可能正面積極的角度，來看此次的約談事件。肇始於蔣介石步入晚年後的身體不佳，他漸漸下放權力到了兒子「蔣經國」的手上。即使職務上蔣經國從來不是「最大的官」，但哪怕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的嚴家淦，「只要關於重要的政策，這位友善且柔弱的嚴家淦總是唯蔣經國是從」（蔡石山 2007：163），說明了蔣經國其實已然是台灣當時實際掌握權力的人。

稍微打一下。」（Now news 2011）這樣的話語。由此可見，在卸任國家元首 10 年後，高齡已 87 的李登輝，仍舊會下場打球，可見他是多麼熱愛這項運動。

[89] 2016 年 3 月爆發憲兵違法濫搜事件：「憲兵違法搜索民宅，台灣人權倒退！魏姓民眾在網路買賣三份白色恐怖時期文件，憲兵竟以『釣魚』方式誘捕，強行將他押上廂型車，……『有如白色恐怖再現』。」（蘋果日報 2016）引發國人熱烈討論及撻伐。

由於蔣經國的接班態勢向來明顯，在掌握更多權力之後，蔣經國遠見般地擘劃起建設台灣的未來藍圖，其中「國民黨政權台灣化」[90]，就是他刻畫中的一塊拼圖。在本土化的過程中，慎選、培訓「本省籍人才」，是在這當中無可或缺的重要經歷。於此之前，李登輝並未如彭明敏的崛起過程，那樣地順遂，卻依舊保有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發光發熱、漸露頭角。

我們可以從「審訊官說了奇怪的話：『敢用你這樣的人，大概也只有蔣經國吧！』」（李登輝 2016：44）中得知，極有可能就是在蔣經國授意的之下，警備總部發動了此次的約談。後來也證實，「因為蔣經國當時就已經決定要任用我，所以這些政權的幹部才會開始調查『李登輝的過去』」（李登輝 2016：44），我們能夠這麼說，李登輝的往後的從政之路，就是由此打開的。

「在這個時間點上，蔣經國慎重考慮在他的政府任命一位訓練有素的、可以信賴、忠實的台灣人」（蔡石山 2007：167），李登輝無疑是蔣經國所要任用的人之一。為使後來李登輝能在蔣經國面前隆重登場，任何事先的審查、約談，似乎就成了一個必經的過程。所有明察暗訪，也不過就是為了讓蔣經國能真正找到為國家所用的絕佳人才，所做的一切努力。

再來我們嘗試以較為權謀的角度來看此一事件的發展。1952 年，李登輝赴美求學，過程尚且如同前述順利。但學成回國之際，卻遭遇了「一九五三年經馬尼拉轉回台灣，在馬尼拉機場轉機時竟然沒有辦法入境，還被叫去搜身……是不是有人密告或是怎樣？……只有新民主同志會這些人知道，而他們的案件都結束了」（李登輝 2008a：186-187）。這是第一個警訊，似乎有著看不見的力量，在背後阻撓著李登輝的人生。

雖然歷經怪異的事件，「最後由蔣彥士出面保證，才發給我[李登輝]入境證」（李登輝 2008a：187），暫且告一段落，沒有延燒其他風波。但到了「一九六七、

[90] 李登輝是在 1969 年遭到警備總部約談，而「1970 年春天蔣經國回到台灣後，開始推動所謂國民黨政權的台灣化（本土化）」（蔡石山 2007：172），時序上確實無法直接連接，但筆者認為蔣經國的各種所作為，係維繫其蔣家政權所致，當是一系列長遠的謀略、規劃，時序上並無絕對相關連之證明，故仍將其暗自觀察、審視李登輝之作為，視作為政權台灣化的手段過程之一。

一九六八年李國鼎推薦我去泰國，要我做農業技術團團長，但是我的護照卻辦不出來，沒人知道問題是什麼，結果我沒去泰國」（李登輝 2008a：188），這是第二個警訊。當然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下，這些說來倒也不會是什麼特別離奇的事情。

第三，在七日約談時，警總反覆詢問了李登輝有關「『新民主同志會』的經過」（李登輝 2008a：190），明明時隔二十年以上的老案，卻在這個時候再一次仔細琢磨、反覆驗證，是要追根究底李登輝這段往事的發生，還是二十年不追究的過程裡，掌握了李登輝曾為共產黨效力的確切證據？要從李登輝口中吐出更多的真相與秘密，進而掀起這段塵封過往的精采結局？

以上三點，當然同樣能夠視為蔣經國想要用人的鋪陳，卻多了更多的權謀空間。簡單說，李登輝很可能在蔣經國真正掌握權力、能夠「在所有的政策事務上與主要人員任用上，擁有最後權威」（蔡石山 2007：166）之前，早已被國家情報系統所緊盯，在不自覺中，身陷白色恐怖的情境裡。

回到「警總約談七日」的內容裡。可能歷經「二二八事件」、曾經加入「新民主同志會」（或說「共產黨」），以及上述「出國」、「入境」的不順利等等這些與國民黨政權影響生活息息相關的重大事件，李登輝心中始終存在著被威脅的恐懼，一直「到一九六九年我還是不安，不過我也沒多想，……要跑嗎？沒有機會跑」（李登輝 2008a：186）。這些情緒的積累，終於遇到了警總的上門，迎來了一個出乎意料的塵埃落定[或許吧]。

在這七天的過程之中，得以想見這絕不可能輕鬆。「他們放我回去時，也告訴我第二天還要去；以後每天我回家前，都會先告訴我第二天還要去，但是沒有說還要多久。那次約談差不多有一個禮拜，早上八點去，晚上十一、十二點放我回來」（李登輝 2008a：189）。看似輕描淡寫的一段回憶，先且不說這些日子裡什麼正事都不用想辦了，家人[尤其是曾文惠]的內心煎熬，絕非是一個學有所成、在國立大學任教的家庭眷屬，所能想像得到，並且必須面對與承受的。

而在不知道究竟原因為何的「警總約談」情況下，李登輝的太太肯定猶如熱鍋上的螞蟻、十分焦灼，「我被約談時太太很緊張，因為沒人可以依靠，不知道

要怎麼辦，就跑去找徐慶鐘[時任內政部長]請求幫助。……徐慶鐘說：『妳絕對不要來找我，這件事情我沒法處理。』就這樣一句話就把她拒絕了」（李登輝 2008a：190）。這是一個殘忍事件，但李登輝在事過境遷之後，「還是完全對待他是我的老師，沒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李登輝 2008a：190），展現了其在面臨生死交關的危難之後，仍能保有的雍容大度。

那麼在長達一週的密集約談中，什麼是警總關心的問題？除了民主同志會之外，「他很驚訝的發現警總那些特務所掌握的消息簡直多得嚇人。……他們訊問的內容顯示，他們對他在日本期間的活動，以及他在二二八事件期間和之後的生活也知之甚詳」（柯義耕 2008：147）。這似乎呼應了前述提到對於李登輝的生活一切、所作所為，事實上早已受到國民黨政權的綿密監視，任何人光是聽到自己早已被長期鎖定，就已經嚇得滿身是汗了吧！

最終李登輝於此可怕的「警總七日約談」中全身而退，至少，往後進入蔣經國內閣團隊可見李登輝在審查上的安然度過。當然，李登輝也安慰自己「有可能是因為他[蔣經國]要用我，所以要澄清，要讓一些人瞭解，所以把我掠去洗清」（李登輝 2008a：188）。這一番折騰之後，輔以貴人相助，李登輝順利於 1971 年加入國民黨，開啟了他往後無可限量的政治生涯。

第五節 此一時期國族認同狀態分析

在上一個階段中，我們確定了李登輝上一時期的國族認同狀態，是無庸置疑的「日本國族認同」；在 Cross 黑人心理認同的分類上，吾人認為李登輝正處在「前遭遇期」之中，並且更精準的詮釋上，屬於抱持「低強度態度」的前遭遇期。依此基礎上，我們繼續來爬梳與整理李登輝國族認同狀態，在新的階段中，有無可能改變其認同取向，以及是什麼因素，致使李登輝調整、轉變其認同狀態。

同樣地，筆者在本階段前後 25 年的生命史當中，找到了濃縮過後重要的三個主要依據，分別是「中國認同的誕生」、「對中國認同的反思」，以及「尋求生活踏實與心靈平靜的方法」。透過這三個核心論述有所差異的重要內容，我們

企圖來描摹是什麼樣的關鍵因素，決定了李登輝此一生命階段的認同取向；這些決定因素，又何以足以作為我們判別李登輝真實的國族認同狀態。

表 3-1：本階段時代大事與生命史事件：新國籍誕生的早期成年期

時間	時代大事	生命史事件
1946 年		4 月，進入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1947 年	爆發「二二八事件」	躲避「二二八事件」，興起參加謝雪紅「二七部隊」念頭但沒有成行
1949 年	5 月 20 日，台灣實施《戒嚴令》	台灣大學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
		2 月 9 日，與曾文惠結為連理
1950 年	蔣介石復行視事再度擔任總統	9 月 3 日，長子李憲文出生
	韓戰爆發，美軍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	
1952 年		至美國愛荷華大學進行農經研究
1953 年		遭遇馬尼拉轉機入境搜身事件
		擔任省政府農林廳技士
1955 年		擔任合作金庫研究員
1957 年		擔任農復會農經組技士
1961 年		受洗成為基督徒
1965 年		攻讀美國康乃爾大學農經博士班
1968 年		回台擔任農復會技正兼台大教授
		泰國學術參訪未能核准成行
1969 年		警備總部密集轟炸式約談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一、 中國認同的誕生

在標題「中國認同的誕生」之下，我們仍舊找到了三個重要的支撐，來闡述為何筆者有此李登輝誕生中國認同的宣稱。這三個脈絡依序是：（一）心中懷抱祖先來自中國的連結，（二）學習馬克思主義嘗試拯救中國，（三）與主張台灣獨立人士維持距離。且讓我們從第一個觀察：「心中懷抱祖先來自中國的連結」，來進入李登輝中國認同誕生的起始。

一如所知，李登輝在 1945 年終戰之後，並沒有隨即返回台灣，而是到了「1946 年的春天」[91]才回到自己的故鄉。這也是為什麼在最一開始，筆者即在分段上，採用了不同以往相關李登輝認同研究，大多將時間點劃分在「1945 年」之上，有著此刻意強調的年份區別用意。筆者認為，一直到了 1946 年，李登輝真正重新返台，開啟在國民黨政府治理之下的嶄新生活，才是他的國族認同有否進入新篇章的真正始頁。易言之，人還在日本本島接受戰後教育與生活的李登輝，任何對於中國的認知與了解，大多停留在想像與模糊之中。

當然，沒有真實生活在中國的統治裡頭，並不等於不能對於這個國家抱予期望與產生認同，在戰敗後，日本確定不再有能力殖民統治台灣後，李登輝仍舊可以對於新國籍「中國」產生若干的認同與想法。在擺脫殖民地子民的身分後，李登輝就曾基於祖先來自中國，產生了中國認同大過於台灣認同的國族認同狀態。

不僅僅是「祖先」的牽連，在戰後百廢待舉的過度時刻，現實新國籍的誕生，李登輝更一舉將相對於日本而陌生的中國認知，推上了如同先前提過，歸屬「祖國」二字的境界。對於李登輝而言，台灣已經回到「祖國」的懷抱，即使這個祖國，是自己生命中不曾經歷其治理的 —— 中國。沒有抗拒、沒有懷疑，一心一意的想要付出，是李登輝當時候真實的心境寫照。

上述的觀察，同時也是黃鈺淳的解讀：「不論那是一種文化傳統上的歸屬或是心疼之餘希望救贖中國，在他主觀的情緒結構上，中國都是他在日本認同失落後的優先選項，這與中國共產主義的解放訴求當然相同」（黃鈺淳 2010：92）。此時此刻的李登輝，其實心中並沒有太多對於「台灣認同」的想法，即使如前述提到過「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吾人認為，這依舊停留在像是前一生命階段：日治時期區分「台灣人」與「本島人」的不同層次想像之中。

[91] 1946 年春天引自：「後來有一些朋友叫我去東京，說在橫須賀附近浦賀港有船可以回台灣，……我差不多在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年〕二月或三月去東京等船，可能是在三月底時上船」（李登輝 2008a：117）。

大的國族認同仍然是「日本」或者「中國」，台灣人是做為在既有的國族之下，以「生活所在區域」作為劃分的標籤與符號，並無法將之提升為國族認同的範疇之中。雖然李登輝自己曾經說過：「台灣在日本的統治下渡過了半個世紀，……而新教育制度的引進也培養了近代的國民意識，因此讓台灣人意識到自己的地位相對低於日本人，於是『台灣意識』在此時萌芽，產生了『台灣人的台灣』這樣的想法」（李登輝 2016：34）。

但在爬梳若干李登輝日治時期生活經驗描述，筆者卻認為這般李登輝晚年出版的著作中呈現的宣稱，基礎相對的薄弱，更似一種「為賦新辭強說愁」的台灣前總統意識型態作祟，不容易令人完全採信。與此當中，我們必須找到更多的線索，去釐清李登輝台灣認同的更可能登場時期。

接續前段討論，我們將目光置放在第二個李登輝形成中國認同的可能原因：「學習馬克思主義嘗試拯救中國」。在心中認定祖先來自中國，因而在情感牽連上、新國籍的客觀事實裡均無法切割，進入最直覺反應認同中國的李登輝，在終於回歸祖國的他，希望能夠有所奉獻，付出自己的所知所學，來讓中國「更好」。在此提到的更好，源自於李登輝早年對中國的認識，以及親眼目睹中國人民真實的生活景況；[92]在日本時期培養出「愛國之心」的李登輝，當然希望能夠改善自己的國家：中國。

在李登輝的自述中我們看到了：「高等學校的歷史老師鹽見薰先生，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來談中國的歷史，也使我深受影響。當時我就認為，農業問題將是中國未來的關鍵問題」（李登輝 1999：44）。在這樣的基礎上，李登輝認為鑽研農業問題能夠有效改善「中國」，於是李登輝先是重返校園，繼續鑽研農業

[92] 「中途一度停靠青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國人。……眼底所見，中國人顯然過著極低水準的生活。衛生觀念等等，和日本人天差地遠」（李登輝 2015：56）。

經濟上的學問。[93]並進一步在校園中接觸了奉行「馬克思主義」的讀書會組織，並進而加入了「共產黨」，[94]希望能夠透過知識的力量，解救頹廢中的中國。

這也就是李登輝所說：「為什麼當時共產主義會吸引大家，因為那時台灣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認為中國應該要改變，共產主義可能可以改善中國，所以我和很多台灣人對國民政府一直並沒有認同」（李登輝 2008a：111）。換言之，不認同「國民政府」，並絲毫無所減損李登輝對於中國的認同；不喜歡國民黨政府，且經由更加好的主義與思想，來嘗試改善祖國中國的生活環境，如此而已。

馬克思主義被李登輝認為是一種拯救中國落後生活的有效武器，為了讓他「心愛的祖國」愈趨變好，他親力親為的「參加共產黨，主要是為了要對抗，要改革獨裁政府」（李登輝 2008a：171）；至此，我們能夠主張李登輝即使是加入了舉世普遍認知的「紅色中國」共產黨，在他的內心中，抗拒的並非「中國政府」，而是看不慣的獨裁統治手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京都唸書的李登輝，進入當時日本左翼思想的大本營，也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起點。之後長達十年，他對馬克思主義抱持相當大的興趣」（黃鈺淳 2010：76），也就是說，戰後台灣歸屬於中國所有，李登輝延續在日本求學時學到的理論知識，繼續展開他的高度熱忱，希望他心裡頭新歸屬的中國認同，這個國家能夠快速改變、愈來愈好。

如同彭明敏所說：「事實上，在那個時代，任何追求理想的青年，都會被馬克思主義所吸引」（轉引自上坂冬子 2001：194），在這樣的脈絡下，李登輝未必然突出於當時的時空背景。只能說，在迫切擁抱初來乍到的中國政府，李登輝未因它先天上的缺陷與不夠完善，因此不去認同中國；知識青年李登輝，在從前日本菁英教育的養成下，他期寄透過知識的力量來親近、改變他理想中的國家。

---

[93] 「李登輝決定先繼續做學問，並且獲准插班到台大農學院的農經系就讀」（上坂冬子 2001：58）。

[94] 「我參加共產黨只是想要知道共產黨的思想和理論，我們都以讀書會為中心」（李登輝 2008a：179）。

於是，他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來實踐並且證明他熱愛中國的方法；同時，這也是他從年少時追求「唯心論」，在戰後轉換成為關注「唯物論」的關鍵所在。

第三個吾人所主張李登輝中國認同誕生的因素，是「與主張台灣獨立人士維持距離」。有關這一點的提出，主要原因在於過往觀察李登輝的各個不同生命階段，尤其是正式踏入政壇之前，李登輝一直以來都呈現著追求進步的思想與價值；然而就在 1950、60 年代，台灣內部陸陸續續湧起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的聲音之時，卻沒有明晰地看見李登輝參與其中的身影。這一個對照，我們能夠從早年與李登輝交往慎密的彭明敏之中，看出這一點極其特殊的差異。

李登輝（2008a：147）說：「一九六四年時，有一個美國老傳道師在台南神學院任教，彭明敏被掠去的前一日，我們三個還一起吃飯，隔日早上就聽到他被掠去了。我嚇一跳，沒想到他變得那麼進步，……我們從來沒有談過這種事」。我們可以得知，李登輝與彭明敏有著一定程度的私交，卻在往來的過程中，完全沒有提及當時象徵進步的思想？即使我們相信了，也就因此不難看出人生根本尚與進入政府體制服務甚遠的李登輝，與台灣獨立運動維持相當程度遠的距離。

我們再稍往前看。事實上，李登輝此階段的生命過程中，並非只認識了一位追求台灣獨立的彭明敏，「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李登輝前往日本蒐集有關農業議題的資料。……在日本考察期間，遇見了黃昭堂。他是一位激進的反國民黨人士，當時正流亡日本」（柯義耕 2008：137）。與明顯台灣獨立的人士往來，卻也沒有因此引發了李登輝進而從事台獨運動的契機。

更尤甚者，黃鈺淳說道：「尤其在康乃爾唸書時，即使他知道有這些台獨運動，也對這些人或主張有所同情，但他沒有刻意要將心中對台灣的想法發展成獨立問題」（黃鈺淳 2010：106），這讓我們幾乎可以確定李登輝之所以沒有參與當時進步的台獨思想，原因在於這一個問題在他認同中國的心裡，根本並不是一個值得一提的問題所在；他認同中國的心，了然於胸。

延續著上述的思考方式，我們知道了此一生命階段的李登輝，台獨問題乃至台灣認同，並沒有成為李登輝首要著墨的要事，中國認同，依舊屹立不搖於李登

輝的心中。在這樣的立論下，或許能從黃鈺淳觀察中補充：「在美期間，所有關於台灣政局的評論，李登輝都顯得小心翼翼，幾乎找不到李登輝該時期這方面的紀錄，他關心農業或台灣發展問題，卻不碰政治議題。至一九七一年十月加入國民黨前，除專業農經政策的意見，李登輝不曾有公開提及任何他對台灣與中國之間關係的發言」（黃鈺淳 2010：105）。

另外我們也看到，「一九七〇年長老教會宣佈他們要爭取人權、支持台獨。……李登輝相信美式的民主，因此內心很想支持長老教會的運動，但為了保護家人，達成自己的生涯目標，他無法公開反抗政府」（柯義耕 2008：149）。在柯義耕的解讀上，認為李登輝「內心」中是支持台獨運動，之所以無法公開參與，原因乃在於「保護家人」的立場；對照前述黃鈺淳提到李登輝的小心翼翼，或許此一時期的李登輝心中，確有不同的國族認同想法，但我們無從確切的察覺。單就現有的資料疏釐，筆者看到了更多李登輝與主張台灣獨立運動人士的保持適當距離；也看到了在此輪廓之下，李登輝處於對中國認同尚未動搖的狀態之中。

二、　中國認同的反思

在前述李登輝誕生了「中國認同」之後，本段落將分析李登輝在此階段中，面對新國族認同的產生，是如何開始對新認同產生反思。筆者將可能形成反思的因素，概分為三，分別是：（一）經歷二二八事件的影響、（二）職場上的省籍困頓遭遇、（三）成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我們且從第一個「經歷二二八事件的影響」，開始進入對李登輝「中國認同反思」的討論。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僅僅發生在李登輝返回台灣不到一年之際，然而此重大事件的爆發，卻深深影響了李登輝往後數十年的人生。呼應前面提過的李登輝曾為共產黨員，對照上一段李登輝的自述，可以想見，「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當時，身為共產黨員的李登輝，內心會有多麼地惶恐與不安；也就在那樣的情況下，「眼見軍隊和那些燒殺擄掠無所不為的士兵來勢洶洶，李登輝只好躲在何既明的茶鋪裡避難」（柯義耕 2008：111）。

身為本省籍知識份子一員的李登輝，最終幸運地躲過了統治政權的戕害。事隔多年，李登輝在自己的著作《最高領導者的條件》裡說：「『白色恐怖』風暴籠罩台灣，台籍知識份子被大量羅織『共產黨』罪名而受害。當時我也是政府可能打壓的對象，隨時可能遭逮捕、槍殺。這是完全可能的事，所幸我並未遇害。連續兩次死裡逃生，我只能說『是神讓我活下來的』吧」（李登輝 2009：35）。

在我們理解李登輝當時受到的衝擊與內心的恐懼之後，我們繼續依此脈絡，來找尋面對「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李登輝對於中國的想像與看法，是否因此而有所影響。接續著前述有關共產主義的討論，李登輝說：「二二八事件發生以後，台灣人才進一步知道國民黨政府實際的情形，大家討論，看政府這個樣子，對國民黨失望，為了台灣的未來，開始反對國民黨。……看起來共產主義說的物質建設也是最重要的優先嘛。共產黨因此真正在台灣擴大規模和組織。二二八以前共產黨在台灣根本就沒力量，全台灣才七十幾個共產黨而已，二二八以後，變成八百多個，增加有夠快」（李登輝 2008a：170-171）。

換個方式說，二二八事件以後，李登輝更加篤定了信奉「共產黨主義」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就筆者的理解，當時的李登輝並沒有要與「中國」做出切割；結合上一段的敘述內容，在當時台灣人或是李登輝的心中，應當憤恨的是當時代表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在政府倒行逆施的不當統治手段下，不滿國民黨的心，更勝於自此要將中國認同排除出去。李登輝反的，是來自國民黨政府的暴政。

曾為日本帝國軍的李登輝，在面對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府強力的武力鎮壓之下，也曾興起是否要參加台灣人發起的武裝抵抗部隊。[95]但迫於現實的無能為力之下，「他的因應之道便是追求感情和心靈上的慰藉，並因此而做了三件事。這三件事便是：與曾文惠女士戀愛並結婚、取得台灣大學的農業經濟學學位以及皈依基督」（柯義耕 2008：116）。

[95]「我也想過是不是到台中參加謝雪紅部隊，不過想過想，實在是沒有這種機會，而且問題很多」（李登輝 2008a：169）。

也就是說，李登輝無法改變現況的難以突破，在強權壓迫之下，從而選擇了自身能力所及之事，想方設法地渡過那段恐懼、黑暗的辛苦日子。關於是否持續忠於中國認同，或許這並非是他優先考量的重要事項，更別說是尚未急迫建構的台灣認同與想像。當然，於此當中尚存有一種可能，「台灣意識」或許已在李登輝心中慢慢萌芽，只是當時的他並未自知。接著，讓我們進入第二個李登輝中國認同反思的原因：「職場上的省級困頓遭遇」。

誠如前一段落所提，此一時期的李登輝，在返台隔年後，即遭遇了聽所未聞的「二二八事件」。也許幸運地躲過了國民黨政府的迫害，卻也使得李登輝此後「好幾年的時間他似乎變得比較內向，不願參加任何的政治活動」（柯義耕 2008：115）。那麼這段期間李登輝的生活重心又是什麼？自 1948 年畢業於台灣大學、1949 年與曾文惠結為連理之後，成年的李登輝，正式脫離學生身分，轉身一變成為與曾文惠組成小家庭後的家中生活支柱與擔負起負責家中經濟的重責大任。

於是我們看到了李登輝努力地適應於職場當中，隨著子女接連出世，李登輝肩頭上的擔子，也就愈加沉重。這也正是柯義耕提到的：「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他一直小心翼翼，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他的家庭上，不去思考有關國家定位或歷史的問題」（柯義耕 2008：121-122）。這個小心翼翼的舉措，當源自於 1940 年代末，台灣開始籠罩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之中。

然不去思考國家定位、不接觸政治動，就能讓李登輝的生活變得安穩嗎？事實上，李登輝依舊沒有少去他的愛國之心：「生為台灣人，既對台灣的未來充滿使命感，也對於學習農業政策抱持著滿腔入誠，正值年輕的我，怎麼可能在當時的情況下，還不問世事，閉門苦讀？」（李登輝 1999：49）。「只因他是台灣人，也是被鎮壓的對象之一，他只好收起自己的滿腔熱情」（黃鈺淳 2010：105）。

上述所指的「台灣人」，在依循當時李登輝的理解之中，更貼近的分類應當指的是相對於來自中國「外省人」的台灣「本省人」；有了這層認識後，我們更容易析解在那個年代中，李登輝對於族群的分類，乃至於對國族的想像與區別。

身處職場之中，李登輝「台灣本省人」身分，讓他意識著自己處於「族群」弱勢的一端；不可能成為「中國外省人」的他，似乎也沒有糾結在「國族認同」之上。

當然我們無法武斷地宣稱在職場上由於省籍的不正確，因而遭受升遷困頓的李登輝，是否單純糾結在「本省」與「外省」的省籍問題上，而心中沒有產生對於台灣認同的激盪。因為對比差不多同一年代長成的鍾肇政而言，就有錢鴻鈞針對其「省籍意識」的問題加以撰文：《省籍意識與鍾肇政的鄉愁》（錢鴻鈞 2002）；主要論述內容，緊扣著對於鍾肇政來說，清晰的省籍意識，在更深層的解讀，即是「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差別。爬梳李登輝的生命史，雖然沒有令我們直覺的得以判別他是否有著與鍾肇政相同的省籍意識概念，但我們也無法因此推斷在李登輝「本省人」的認知中，其中完全不存在著對於國族認同的想像。

無論如何，此一時期的李登輝，迫切於追求職場上的卓越，來確保家庭生活的衣食無虞，但「省籍問題」卻不斷地困擾著他。1968 年「李登輝從美國最好的大學其中之一取得了博士學位，再回到農復會的職務時，可說是學經歷具備了。……一般而言，在農復會內要出人頭地並不完全在於考績如何，而是決定於其與有權勢的國民黨官員之間的交情怎麼樣，這些有權有勢的官員絕大多數是外省人。李登輝因此感到非常挫折」（蔡石山 2007：159）。

這一個揮之不去的省籍夢魘，一直在李登輝正準備輝煌於職場上的光華時，左右羈絆著他。不得志的李登輝，肯定會去思考如何突破這個與生俱來的「本省人」符號；對於自己的學識、專業、能力所及，李登輝向來都充滿著過人的自信，只是生為本省人的劣勢省籍，讓李登輝的中國認同，出現省籍意識的存在。

再讓我們看到第三個影響李登輝中國認同產生反思的重要原因，亦即李登輝「成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源自於上述關於「二二八事件」的侵襲、「省籍問題」的困頓，是此時期李登輝對於反思中國認同的兩個重要關鍵。一是大時代下的血腥鎮壓史實，另一個則是李登輝必須步入職場、以求全家溫飽的職涯發展遭遇，這兩件事情使得理應隨著新國籍誕生、產生新國族認同的李登輝，隱然有了

對於中國認同不同層次的思考與詮釋。本段落接著展開的:「白色恐怖受害者」,也不遑多讓於上述對中國認同的反思議題。

時間再次聚焦發生在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的前後,國民黨政府開始了整頓台灣的一系列手段,其中包括「只要講日語就會被處罰,也不准觀看日本的報紙、雜誌、電影等,澈底施行了排日教育。在此同時,也發布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奪走了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以及所有的一切」(李登輝 2016:39)。

配合著 1949 年《戒嚴令》的實施,台灣全島上下進入了令人為之喪膽的「白色恐怖年代」。曾經加入共產黨的李登輝,此時也如驚弓之鳥,如同前述提過的,「不參加政治活動」、凡是也顯得格外地「小心翼翼」。所幸他已與曾文惠成了家,「在白色恐怖期間,家庭成了李登輝的避風港,給了他許多精神上的慰藉」(柯義耕 2008:122),否則李登輝恐怕難以平穩地渡過白色恐怖年代帶給人們的震撼衝擊與無可迴避的高壓統治生活。

但事實上李登輝中就有了「案底」,國民黨政府的情治手段一向高明,任何發生於島內有關共產黨的大小活動與人員參與足跡,大多都牢牢地掌握在當權者的手中,李登輝自也無從例外。就像是前述提到 1953 年李登輝自美國學成歸國即將返台時在馬尼拉遇上無法順利入境的問題一般,李登輝應當早已受到政府相關單位刻意鎖定;畢竟,那是在白色恐怖、威權統治的年代。

再來看到「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李國鼎推薦我去泰國,要我做農業技術團團長,但是我的護照卻辦不出來,沒人知道問題是什麼,結果我沒去泰國」(李登輝 2008a:186-187)。上述兩件沒來由的特殊經歷,讓李登輝摸不著頭緒的無法自由的進出國門;或許這是戒嚴時期舉國皆然的常態,但李登輝親眼目睹「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國民黨政府曾硬是扣與本省人「紅帽子」:共產黨員的強加迫害,李登輝當然緊張於這樣時空背景下的白色恐怖年代。

帶著惶恐不安的心,李登輝的日子卻還是得過下去,儘管心中抱持著許多的假設與猜疑,卻也無從找人問起。「無法順利入境」、「護照無法核發」,都只是屬於白色恐怖其中的各自一環,或許是時機成熟了,警備總部才現身與李登輝

交手。這當然是一個大的衝擊，曾經參加過「新民主同志會」的李登輝說道：「雖然我已經離開，但是每次他們來掠人我都會緊張，這個問題拖到一九六九年，晚上沒一日安心睡覺，都不知何時會怎樣，對未來不確定。我當時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沒有來掠我，我相識的人都被掠去了，有的人還被槍斃」（李登輝 2008a：185）；直到警備總部找上門的那一刻，李登輝總算正面面對他多年來的恐懼。

當然，事情演變到後來，總算能夠朝好的方向發展，但這是「善」的結果；萬不一李登輝因此鋃鐺入獄，他內心的恐懼，恐怕就「噩夢成真」了。基於上，我們充分地感受到身處白色恐怖年代的李登輝，不僅是經歷二二八事件後身上留下的陰影，職場上也遭受不平等的省籍不正確對待，就連藏匿於心中多年的白色恐怖恐懼，竟也「登門拜訪」的找上了他。這樣的積累，李登輝怎麼可能不會對「中國認同」產生反思；只是認同是否應該打折或是重新調整罷了

三、　尋求生活踏實與心靈平靜的方法

就在前述提到有關李登輝「中國認同的誕生」、「中國認同的反思」之後，接著讓我們進入到在此二者與國族認同的狀態緊密地正相關之外，此一生命時期的李登輝，尚有什麼樣的重要印記，來輝映他內心中國族認同的擺盪與不安。這也正是筆者所提示的標題：「尋求生活踏實與心靈平靜的方法」。在此前提下，三個面向追求的李登輝，是構成本生命階段樣貌的最後拼圖所在。

我們找到了李登輝「二次爭取留學美國」、「受洗成為基督教徒」，以及「成為農業經濟專家」，這三個與李登輝為呼應此生命階段國族認同的動盪起伏，息息相關的尋求心靈與生活平靜的方法。首先，讓我們進入本段落第一個重要的討論：「二次爭取留學美國」的始末與啟發。

年輕時候受教於日本菁英式教育的李登輝，除了考上當時入學門檻極高的「台北高等學校」之外，也曾為了修習農業經濟的專業，而遠赴日本，就讀京都帝國大學。因為戰爭的緣故，李登輝最終沒能順利在日本完成大學學業，而是選

擇回到台灣就讀台灣大學，完成了他大學的學業。依此脈絡作為依據，求學、做學問，一直是李登輝的人生實踐中，始終伴隨的標籤之一。

離開台大校園的學生生活、步入職場後的李登輝，更曾經二度奔赴美國進修；一次是在 1952 年至愛荷華大學進行研究，另一次則是 1965 年至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這二次的留學美國經驗，不僅讓李登輝開拓了人生的視野，也讓他在職涯發展上，可能突破以往因為省籍問題產生的限制。更重要的，「在認同循環概念中，其實指出了一項重要的關鍵，一旦有國外生活的經驗，對自我身份的追尋與對國族認同的課望就會愈發強烈」（黃鈺淳 2010：73）。

那麼為什麼李登輝會選擇二度遠赴美國求學？什麼樣的動機讓到了 1965 年已經超過 40 歲的李登輝，願意離鄉背井、暫且放下家庭，再度赴美留學？先看到後面這個問題，這依舊與李登輝的職涯升遷發展有關，李登輝希望透過拿到足以證明他專業能力的更佳學歷，以期出任更重要的職場職缺。

先前提過，由於省籍問題的困頓，李登輝並沒有真正得志於他的職場之中。沒有人脈作為後盾的他，想出了或許能夠透過取得更好的學識學歷，來爭取職場中更好的職務與歷練，當然，這是他一廂情願的如意算盤。而回到上述第一個問題，1952 年的第一次赴美求學，實際上並不若第二次前往美國時有著那麼多的職涯考量，畢竟當時李登輝進入職場也只是人生中前幾年的事。以上，是二次李登輝赴美求學的概要，接著讓我們繼續琢磨這特殊經驗還有什麼其他不同的體悟。

黃鈺淳（2010：126）提到：「李登輝在美國的求學歲月，讓他浸淫在自由的風氣中，也接觸許多不同的思想，……認為此時的李登輝積極在專業領域上嶄露頭角，也在閒暇之餘參與宗教活動，李登輝關心作為人的思考間接影響後來在自我認同歸屬於中國人或台灣人的問題上作選擇」，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也是在專業追尋上與宗教信仰的思索裡，我們看到了是否藏於李登輝心中對於往後國族認同抉擇的潛在因素。

另一個埋在這段期間有關赴美求學之後留下的重要線索，是「李登輝雖不曾與康乃爾的老師們討論政治問題，但他周遭的台灣留學生卻不乏思想激進、並在

暗中進行政治活動的人。……那些年輕的學生都認定李登輝是支持台獨與民族自決的，而李登輝私下也告訴他們：他『沒有把所有的東西都寫在論文裡。如果台灣人知道他們是如何受到壓迫與剝削，很有可能會造反』」（柯義耕 2008：144）。

什麼是「沒有把所有的東西都寫在論文裡」，李登輝並沒有明說，但是 1960 年代的李登輝，若干程度已經是政府體制內的一員，在美留學期間，他依然不避諱與主張台獨人士往來；即使不碰觸敏感的政治議題，一樣是一件值得關注之事。如同黃鈺淳所說：「李登輝在一九五二年赴美求學，從戰後到留學在這短短不到十年間，他經歷日本認同的生根、摧毀、建立中國認同後動搖懷疑，再到前往美國接受文明進步的洗禮，身份認同的意義成為一種動態、卻無法逃避的自我對話展現」（黃鈺淳 2010：97），此一時期李登輝的中國認同，純度出現商榷之疑。

緊接著，環繞李登輝生命佔有舉足輕重的「基督教信仰」，是本段落討論的核心，也就是前述所提，第二個關鍵所在：「受洗成為基督教徒」。對於李登輝而言，信仰的確立，是一段歷經歲月的摸索與追尋。「我在三十歲左右的時候成為了基督徒，我本來是非常日式的唯心論者，……而在戰後數十年間都著迷於馬克思主義。可是唯物論最後還是沒能滿足我，因為那無法解決任何事，所以我只好尋求宗教的幫忙，在自我調整的過程中，一邊學習日本的神道和武士道，最後達到了『我是不是我的我』的思考方式」（李登輝 2016：50）。

後來的李登輝，在各種公開場合中一再強調信仰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在李登輝學校上課時的講義『國家領導的經驗』中，提到領導者的條件共有五項，其中的第一項最重要，就是『有信仰才能了解內心的軟弱』，表示信仰的重要性」（李登輝 2005：98）。當然此一階段的李登輝，並非所謂的領導者，那就讓我們來回顧是什麼樣的原因堆疊，以致信仰成為李登輝掛念一生的不絕於口。

受困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挫折，如同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中提到的：「從前，我們七十歲的這一代，夜裡都難以安安穩穩地睡覺。我不願讓後代子孫遭受此種境遇」（司馬遼太郎 1995：531），在 2015 年李登輝出版的《新・台灣

的主張》，更進一步闡明無法安穩入睡的原因，是「由於對以前白色恐怖的恐懼」（李登輝 2015：103）。白色恐怖下的各種陰霾，纏繞李登輝泰半的青壯年時光。

在這樣的恐懼紛擾下，「李登輝開始思考有關神的存在，是在戰後大概二十幾歲的時候。向神詢問，則是在之後的事」（黃文雄 2011：57）。李登輝說道：「我之所以信仰基督教，關鍵原因之一是妻子鼓勵。我個人即使想信教、尋求宗教拯救，忍不住還是會想信仰合理性的問題，在此情況下就很難受洗。是妻子引導我順利走上信仰這條路」（李登輝 2009：36）。李登輝又說：「信仰基督教，讓我對生命的意義有了新的領悟，對我的思想言行，也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可以說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捩點」（李登輝 1999：53）。

基督教信仰的確立，至終對李登輝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此一階段的重點所在，第一個是「透過相信神，他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觀與價值觀」（黃文雄 2011：164）；第二個部分則是「曾經影響他的唯心論、唯物論、前面提到的《衣裳哲學》、《浮士德》、《出家人及其弟子》，還有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等，都藏在基督教教誨的根基中。」（前原志保 2014：51）。

關於李登輝信仰基督教的表述，之後尚會出現在往後不同生命階段中；但對此一時期來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讓李登輝得以擺脫以往遭受白色恐怖的干擾，也讓其過往的執念，有了明確的答案依循，比如：「基於內心一股深沉的渴望，想要追尋生命與死亡的意義，尤其是死亡的意義」（柯義耕 2008：122）；更讓李登輝往後人生開啟了不同的可能：「基督教裡頭鼓勵的政教合一，也讓李登輝從剛結婚時遵循岳母的建議，遠離政治變成不懼進入政壇」（黃鈺淳 2010：73）。

我們可以這麼說，基督教信仰串起了李登輝前後階段的人生；基督教當然不是李登輝生命的全部，卻的的確確扮演起承先啟後的重要角色。或許這是在李登輝近晚所說：「我是不是我的我」的定義之下，優先於國族認同或是其他次要的追求，這一點，我們不能不知。

一如前述提過，此一生命階段的李登輝，花費許多心力在於「專業領域」上的卓越追求，於是來到了第三個我們重要的觀察：「成為專業農業經濟學家」。

從日本求學時代即對於「農業問題」表達高度關心的李登輝，到了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畢業於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的李登輝，在選擇職場上，也並未偏離這一個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唯物論」選擇。

回顧這一段學者養成的過去，在根本上來說，亦是李登輝這一整段生命史的主要縮影；以職場上的發展來看，他走上了一條成為農經學者之路。開始是：「一九四八年我從台大農經系畢業，以後做了三年助教。……當時台灣有兩項事發生，一項是農會改組，第二項是土地改革」（李登輝 2008a：198-199），關於這一段描述，李登輝（1999：58-59）也曾說過：「我大學畢業時，台灣也出現了土地改革的問題。……身為農業經濟學者，我對土地十分關心，也持續進行研究」。

後來李登輝先後到了台灣省政府農林廳、合作金庫、農復會等單位謀職，做的也都是農業經濟領域的本務工作。其中尤以待在農復會工作的時間最長，前後一共 21 年之久。而前述提過李登輝在職場上遇到的省籍困頓問題，大多也就是在農復會工作時期的遭遇與隨之而來的反思。

從正面來看，為了順利升遷進而萌生攻讀博士學位的念頭，以才讓李登輝真正走向出類拔萃的農業經濟專家之路。取得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的李登輝，「論文於 1969 年贏得美國農業經濟學協會所頒發年度傑出博士論文獎項，也是該會首次將這個獎項頒發給台灣人」（蔡石山 2007：158）。這樣的殊榮，成為了李登輝在 1972 年能夠踏進政府高位的基礎所在。

李登輝說：「我到美國留學，博士論文在美國得到第一名，在國際上獲得認定，對台灣有貢獻，後來又到農復會工作，所以蔣經國會注意到我，……那時候很多人都知道蔣經國要用李登輝了」（李登輝 2008b：14）。也就是後來在王昇的牽線下，蔣經國與李登輝有了第一次的見面，「在李登輝即將離開的時候，蔣經國告訴他政府需要像他這種具有學識的專業人才」（柯義耕 2008：168）。

原先期望透過學習農業經濟專業，來改善中國農業問題的李登輝，一直以來都專注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怎麼也沒想到，因為職場上的困頓待突破，反而成

為了讓自己站上農經權威的高位，進而與政府高層產生連結。這是李登輝意想不到的事情，當然，卻也是他自身努力的結果導致。

李登輝同樣沒想到在康乃爾期間：「當時美國受到民權運動以及反越戰的影響，社會動盪不安。一九六八年四月，主張解放黑人的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牧師遭到暗殺。金恩牧師並非從外部，而是從內部促進黑人意識變革，是偉大的領導者。我體悟到，民主主義才是促進社會和平轉型的原動力。不過，我當時完全沒想到，自己後來竟然會成為政治家」（李登輝 2015：82）。

成為政治家，是後來李登輝的人生發展；在此我們要看到的是，在此一階段兢兢業業於農業經濟專業追求與付出的李登輝，顯然沒有預料到「學而優則仕」的事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無論如何，在這段過程中，李登輝所付出的所知所學，依舊是他忠於國家的愛國表現，正如同蔡石山描述的：「李登輝在康乃爾的這三年期間，並不必然足以形構他的內在世界（精神的構造），但他後來說，回到台灣以後，便下定決心為達成台灣社會的民主而做出貢獻」（蔡石山 2007：158），這是李登輝往後人生階段進展的另一重要連結；我們也在上述三點中，看見了李登輝在反思中國認同之後，將心力到他更關心的個人專業或者宗教信仰之上。

第六節 小結

本時期開始，李登輝已經來到了 23 歲的成年階段，也就是日本不再殖民台灣，改由中國政權統治。即使在自日本返台後，李登輝重返了校園，繼續大學學業，也能夠清楚地看到對於新國籍到來的自處態度，亦即是很快地接受來自中國政權的統治，並且認同這一個與其祖先具有血緣連結的中國認同。

李登輝不僅僅是在客觀無法改變與中國情感聯繫及新國籍的誕生下，願意認同中國；他也付諸於行動，比如學習馬克思主義、參加共產黨組織等，為了讓他心中認可的國家，有機會改善成為更加美好的中國。李登輝也極其刻意地在擔任正式公職前，就沒有真正地貼近當時象徵進步思想的台灣獨立運動，這是有反他

從小展露出的急公好義，以及甚至起心動念參加民間組成的謝雪紅部隊，那樣願意起身對抗威權政府的形象。

在此基礎認知上，我們明確地看見李登輝當時認同中國的心，是持續不變的。但這樣的不變，事實上也一直經歷著衝擊與挑戰：「二二八事件」的爆發、職場上因為省籍不正確形成的困頓，以及竟然成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這些種種不利於李登輝作為一個「人」所能平靜、平淡的正常生活因素出現，讓李登輝當然不滿或恐懼於掌權的政府。不過從前述的內容評析，李登輝反對與厭惡的，是國民黨代表的政府，並不等同於就此不認同中國。

種種遭遇，或許正如同黃郁淳（2010：91）所說：「由日本回到台灣，帶著滿滿的社會主義理念，以一種失去日本認同作為憑恃的姿態，重新希望能夠建構出一套足以說服自己，也能為社會接受的新認同」，李登輝並沒有因為這些緣故，馬上動搖了他對中國認同的信任與想像。

無論是大時代下的白色恐怖氣氛，或是在職場上遭受的省籍問題困頓，李登輝迎戰的方式是「尋求宗教在心靈上的慰藉與解答」，以及「追求在專業知識上的成就卓越」，來找到自身得以安身立命的方法。國族認同於此階段沒有消失，而是呈現出告別「日本認同」並轉換為具有省籍意識的「中國認同」的全新狀態。

對照 Cross 黑人化心理學發展模型的樣態中，我們看到了李登輝此一期的國族認同狀態依舊處於「前遭遇期」中；並且根據李登輝此階段中呈現出專注於自己的「職業發展」，以及開始尋求「宗教信仰」並且倚賴著「家庭生活」的精神支持，吾人認為本時期依舊是「低強度態度」的前遭遇期。

第四章 走進體制、平步青雲（1971-1984）

在李登輝步入社會、繼而從事政府部門的相關工作經驗中，「領著國家薪俸」、「接受國家栽培」，似乎成了李登輝終其一生在職業生涯下的必下註腳。打從前一章節提到李登輝真正進入職場上的「台灣省政府農林廳」經驗起算，乃至其後攀上政治權力巔峰的 12 年總統任期，李登輝的生命無不與國家體制產生鏈結。

然而回首李登輝生命歷程中處處充滿驚喜、或者時而駭浪的過程裡，我們容易清楚發現，李登輝最終寫下了一生令人驚奇的從政歲月。在此其中，最大的轉變所在，當是於 1971 年加入國民黨後，遂逐步打開了以往他所蘊藏的能量釋放，促使他循序漸進地成就了台灣政治史上，堪稱輝煌的史頁。

從結果論來看，對比幾乎同時期出身、比李登輝更早受到國民黨政權寄予厚望、重點栽培，其後流亡海外多年的台獨份子「彭明敏」，李登輝明顯地選擇了別於彭明敏的那一條被迫離鄉、久久難以返回台灣的路。李登輝加入了國民黨、進入了謂之「黨國不分」的體制之中；李登輝的此一舉動，讓同年出生、成長歷程相似的李、彭二人，自此在體制內、體制外的隔閡下，分道揚鑣、相互遙望。

所以植基在寫作通順的段落安排上，筆者遂以「1971」年，這個李登輝加入國民黨的時序起頭，逐步地收整自其加入「國家政黨」後，可謂「平步青雲」的從政經歷。時間的走向會一直延續到 1983 年，時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的李登輝，在台灣省議會的公開場合中，大聲堅決反對台獨的發言為止。

當然，本章節欲觀察的李登輝生命史，一樣著重在其國族認同的是否轉變。而由於此階段 12 年的歲月之中，除了是李登輝從「素人加入政黨」、從「平民進入官場」、從「學者進而當官」、從「閣員轉戰首長」、之外，其家庭內發生的重大變故（e.x 其子李憲文英年癌逝）、強人殞落後的老蔣時代過去、小蔣時代來臨、台灣在國際政治處境愈趨險惡等，都將是我們欲爬梳與李登輝產生關聯的各項重點。短短的 12 年許，李登輝的生命已截然不同。

第一節 順遂的政治明星之路

其實加入中國國民黨沒什麼意思，只是因為王作榮一直跟我說：「你要參加，你若不參加，以後重要的會議都會被別人排除在外，實在沒辦法可以瞭解大事。」所以一直叫我參加，後來他和他太太〔范馨香〕把國民黨入黨申請書都寫好，要我蓋個章，然後送到中央黨部。所以我的國民黨黨籍是在中央黨部的小組。（李登輝 2008b：13）

李登輝的心情相當複雜。在這之前，他從未涉入政治，未來也並不打算要深入。尤其他才剛在國民黨的警總被整過。但是，最後李登輝還是蓋了章入了國民黨。我問他入黨的理由，李登輝以稍帶譏諷的口氣說：「因為我認為，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上坂冬子 2001：111）[96]

上述兩段文字，同樣都是在回答李登輝為何願意選擇加入國民黨的原因。前者是李登輝在類自傳的訪談錄中，提到的自述部分；後者同樣來自訪談的紀實，訴說的對象是來自日本的非小說作家。在筆者的觀察之中，面對同一件事情的李登輝回答，經常容易見到內容存在一定程度落差的答案；即使答案不致前後衝突、未必形成矛盾，卻難免讓呈現的面相無法前後一致，致使啟人疑竇、令人好奇。

是的，這就是我們所必須不斷面對、整理的李登輝生命歷程。在不同樣的時間點、不同樣的位置與高度，李登輝似乎自然地在淺意識中對於「發表言論」、「公開談話」的這些事情上，有了自我保護的自動安全閥。一旦面臨可能潛藏的風險及失言危機，就會觸發李登輝的自我防衛，做出不一定在同樣問題下，同樣的回答內容。依此軌跡，也就容易讓閱聽者逐漸培養出必須有的警覺性，去找尋哪一段話才可能是真正出自李登輝內心、更加貼近真實事件的話語。

誠如本章節破題所說，李登輝的政治之路，當是到了加入國民黨後，正式開展。一如弔詭的過往，面對於曾在公部門任職的過程中遭受「省籍不平等」對待；

[96] 此書《虎口的總統》（2001）為日本作家「上坂冬子」在李登輝於 2000 年卸任總統後，親身採訪李登輝後，於 2001 發表的李登輝「傳記」作品，是李登輝恢復為平民百姓後，最早為其立傳的作品。依據柯義耕的觀察中提到：「這本書是典型的日本人對李登輝的偶像化傳記，將李登輝的一生戲劇化，使他如英雄一般」（柯義耕 2008：178）。

一直到1969年帶著榮獲美國第一名博士學位榮耀、準備返台大顯身手的李登輝，卻同樣在國民黨政權的策劃之下，遭受到「白色恐怖」的直接襲來。這些種種源自於國民黨執政帶來的不安及恐懼，為何李登輝最終還是加入了國民黨？李登輝的順遂從政之路，當從這裡說起。

一、 加入國民黨

環扣著本章節的開始，李登輝真正走進體制的從政之路，其實正好錯落在「加入國民黨」開始，狹義上的結束，也正好是他最後一任總統任滿、具有公職身份最後一刻的前夕。所以李登輝的政治生涯，以及此今而後至總統卸任前的生命歷程，實質上近乎等同他所擁有的國民黨黨員身分，彼此緊緊扣連在一起；此二者一旦產生分離，即所謂涇渭分明、各自東西。簡言之，李登輝的主要從政歷史，就是他在具有國民黨黨籍的黨員身分下，往後各個時期裡頭的不同表現與呈現。

有了前述的基礎認知後，我們能更聚焦地將目光擺在李登輝個人的國民黨員發展史上。畢竟，台灣在後來逐步邁進民主深化前，確實冗長地經歷過那樣一段黨國不分的威權統治年代，所有國家重大決策，是由那真正掌握國民黨黨機器的人所做出；即便貴如總統，也未必然是那位真正制定國家政策的決定之人。李登輝能否在國民黨中受到器重、加以重用，才可能近一步誘發他在國家體制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所以欲了解這個時期的李登輝，必然必先知曉「中國國民黨」。

為了多一些對於此時期在台灣實行有效統治的威權政黨——國民黨的認知，時序必須稍往回退。國民黨政權雖說早在 1945 年 10 月即已從日本手中接管台灣，但真正完全掌握台灣百姓的生息，必須到了 1949 年國民黨政權完全敗守中國、退出中國後，以蔣介石為首的「中華民國」政府企圖在台灣重起爐灶時，方才完全佔據、侵佔、竊取，或說統治了台灣。而這一個轉折，也讓台灣人民自此搭上一艘不知開往何處、名為「反攻大陸」的謎航戰船，漂泊許久、難以靠岸。

由於蔣介石政權羅織的美夢始終難以實現，標舉國家統一的大旗遲遲無法插在心嚮往的「神州大陸」上，獨裁者為了延續其雄心與貫徹統治威權，遂制頒了

一系列令台灣百姓過著無從「民主」的不合情理法令。其中最突兀、也最為人不齒的，大抵會是具有高度共識的蔣介石「始終不下台」的「萬年總統」職務一事。自 1950 年 3 月 1 日有著所謂的「復行視事」、蔣介石復職總統以降，一直到 1975 年 4 月 5 日蔣介石死於第五任總統任上前，台灣的民主制度，儼然成為了蔣介石個人意志的無限擴張及無以申冤的毀憲禁臠。

此時此刻的李登輝，又或者說是這個時代中的每一位台灣人民，正是生活在充滿畸形、紊亂的國家體制當中。中央政府的「偽民主」、「真帝制」組成，歷久不退的「國民大會代表」、外省族群攏獲了絕大多數政治與社會資源分配，[97] 加上 1970 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迅速崛起，使得台灣面臨前所未有的低壓風暴，「風雨飄搖」成為了形容那樣的年代，一種常見的政治口號。

有了上述這個大時代背景、蔣介石暨其領導的國民黨政權鋪陳，我們再回過頭來仔細端倪，曾經一路遭受這個政體欺壓的李登輝，心中沒有怨懟似乎是說不過去的；李登輝的人格養成，也不似是會在強權面前即百依百順的人。所以李登輝選擇加入國民黨，當然會是個吸引人注意的事件；在當時是，乃至於其後來更登上這個政黨的主席寶座，再再都充滿著話題與可資探討的李登輝生命軌跡。

關於李登輝究竟為何願意加入國民黨的原因，如同本段落開始時引用的兩段記述，我們至少有著兩種以上版本的李登輝回答；無論最後是什麼臨門一腳的念頭所至，李登輝的的確確在經過思考、琢磨後，毅然決然地選擇加入了這個他早已有所交手，甚至飽嚐其苦頭的強勢國家政黨。這個關鍵決定，也因此種下了他往後必須告別心愛的學術工作，一步步迎向政壇、挑戰驚濤駭浪的人生新篇章。

就在李登輝加入了國民黨、成為其黨員的這一年，如同前所描述，台灣於國際的政治舞台上，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日漸強大，也逐漸退去原有的得來不易光芒。1971 年的 10 月 26 日，蔣介石為首的中華民國政權，在國際形勢壓力下，

[97] 「在政府機構與公立學校裡，基層公職人員與教師多數為台灣人，來自中國大陸的外省人雖然居於少數人口地位，卻占據了多數高層職位。由於高層軍公教人員的薪資可能高達基層人員的四倍」（蔡石山 2007：214），是以筆者認為：「外省族群攏獲了絕大多數的政治與社會資源分配」，意即與外省人從事相近性質工作的本省族群，隱隱然存在著一條跨越不過的「權力鴻溝」。

黯然離開了原來深以為傲、念茲在茲擔任「創始國」會員的聯合國舞台。這個時候的李登輝，面對此國家在發展上的重大挫敗，除了繼續熱衷於學術上的事業外，他又是如何看待這個攸關國家未來發展的重大議題？這是我們所格外關心的，畢竟，他已成為這個國政體系中的關係成員；哪怕，只是一個稚嫩的菜鳥黨員。

承上，筆者找到了當時候李登輝的粗略想法，李登輝說：「聯合國的投票結果，造成今天兩岸關係複雜的局面。老實說，當時我不是那麼在意這件事。因為這根本輪不到我出場，我只要做好自己分內喜歡做的研究工作，就心滿意足了」（上坂冬子 2001：116）。是的，即使已經成為了國民黨員，李登輝並未真正地加入了這個集團的運作，一樣醉心學術工作的他，這個何其重大的國家政治事件，其實怎麼也還輪不到他能置喙；專注本務，似乎成為了當時的他所能做的。

只是比較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有關於即使李登輝現實上的「人微言輕」，依照其既往性格，不太可能對於此重大變故心無所感。但懂得不去僭越、謹守份際，或許是李登輝在遭遇曾受白色恐怖的襲擾之後，練就的明哲保身哲理。不應有的逾越言論，就把心思投射在向來神往的學術專業上吧。

李登輝實質加入了政府領導班子的行列，始自於 1972 年躍升閣揆的新任行政院院長蔣經國的欽點任職「政務委員」開始，才真正對於權力有了初嚐的機會。當然，這個鋪陳是漫長、甚至是煎熬的。那是一段歷經白色恐怖後的芬芳而至：「『我終於意會到警總調查官當時所說的那句話』李登輝說。換言之，李登輝終於意會到，或許當年的約談調查，是當權者有心安排的」（上坂冬子 2001：120）。

一躍而上這個位階甚至高於「部長」的政務委員高位，當然可視作學術專業展現卓越的李登輝「學而優則仕」。然在戒嚴時期的威權統治、及以「外省集團」為主要領導成員的情況下，台人能夠擔任朝中大員的機會本就不多，一度被質疑有著「共產」背景、甚至可能引來牢獄之災的李登輝，若非經歷過折磨人的「白色洗禮」，絕無可能在以「情報」、「特工」起家的蔣經國政體中，進入體制服務、擔任如此重要的職位。

蔣經國也知道我[李登輝]曾經是共產主義者，雖然他沒有問過我，但他應該是知道，他不是那麼傻的人。一九六九年我被抓去問話，我當時也猜不透，懷疑可能有人向他報告，所以他下命令處理看看，也可以這樣子說吧。他們要抓我，但是沒有任何證據嘛。可能蔣經國要用李登輝，有人告訴他，不先把李登輝「清理」好，以後會麻煩，所以他就先「清理」了，後來才讓我做政務委員。（李登輝 2008b：18）

二、 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初入官場的李登輝，在受到蔣經國這個實質已經接班的領導人賞識之下，開啟了學以致用的展露身手時刻。於此之前，在西元 1972 年初，尚發生了國際間備受矚目的特殊事件 —— 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

在終戰後，台灣向來仰賴美國政府強而有力的支持，無論是各項軍備建構、美援建台，甚而是在國際上的地位、法統捍衛，美國都在在扮演了台灣持續向前的關鍵角色。1971 年台灣離開聯合國組織以後，國際上地位岌岌可危，以往宣稱的「中國正統」，顯然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強力取代，於是乎台灣與美國的關係，成為了蔣氏政權能否在台灣長治久安的首要參考。

這一切良好、長遠的台美互動，就在美國總統尼克森訪中行之後，悄然產生了劇烈的震動。台美的友善關係，遭到前所未有的強烈質疑，在蔣經國幾近全面接班、掌管政權的情勢判斷下，蔣經國深知唯有開始著眼建設台灣、培育台籍政治人才，國民黨政權才有機會繼續佇立在台灣島上，繼續統理台灣。於是在國際形勢的險惡變化下，催生了讓台籍政治菁英有機會冒出頭的「吹台青」政策。

也就是這一股源自時代環境變化下的浪潮，捲起了如李登輝等人的這些台籍政治菁英的未來之路。[98]吹台青的人才庫中，日後成為達官顯貴的的確不少，但以往後的政治生態演變來說，李登輝趕上的這一波浪潮，卻獨獨將他帶的既高又遠，遠得難以有人與之並駕齊驅。例如仕途比李登輝發跡得早，其後兩次（1990

[98] 「當時推行『吹台青』政策，主要是蔣經國要提拔一些台灣人，包括：施啟揚、梁國樹、李登輝、翁岳生、張豐緒、林洋港、邱創煥」（李登輝 2008b：7）。

年—末代委任總統、副總統選舉；1996 年，首次總統、副總統直選）與李登輝競逐總統大位的「林洋港」，最終都沒能競選成功，黯然地淡出台灣政治舞台。

當然，李登輝攀上權力巔峰，在這個台籍精英並起、李登輝尚屬政治素人的 1970 年代初期，強人領導的威權高壓統治，任誰也料想不到在 10 多年後，李登輝能夠站上以外省族群為主要領導核心的接班行列。此時此刻的李登輝，其實花了更多的心力，利用得來不易的官仕機會，去想方設法地實踐他的專業所學，沒有太多其他政治盤算。

專注本務工作、在專業上展現超群非凡，可能是所有站上國家機器高階位置的基本條件；但在群雄並起、人才濟濟的台灣政府之中，李登輝或許就是擁有其他人未必能夠效仿的自我約束：「李登輝獨來獨往，不喜歡呼朋引伴、結黨營私的個性也受到蔣經國的賞識。他從不參加派系，也不刻意經營自己的人脈。這樣的一個人當然不會對蔣經國的權力或職務構成威脅」（柯義耕 2008：157），最終才有機會屢獲蔣經國提拔、逐步走向權力之峰。

誠如前述內容所示，1972 年蔣經國正式接掌行政院；在成為閣揆之後，無論是聲望、亦或實質掌握的權力，除了其父蔣介石之外，台灣島上已然無人可及。不過等待真正全面接班之前，「他[蔣經國]需要自己的人馬；可能他的周圍也有其他台灣人，但是他還是把我[李登輝]看做他的人馬來款待……蔣經國的主要考慮是維持自己的權力，希望有辦法接他老爸蔣介石的缺。他總是要建立他的派系嘛」（李登輝 2008b：6）。

就這麼地，李登輝一腳踏進了「當權者」的人馬行列之中，展開了前後達六年之久的「政務委員」磨練時期。，多年後，李登輝憶及這段蔣經國大量提拔台灣政治菁英的事情時說：「蔣經國之所以在一九七〇年代開始任用台籍官員，只是想藉此施恩於台灣人，以收買人心，鞏固政權」（柯義耕 2008：163），這段內容與前段的說法大多一致，但卻也另外道出了「收買人心」這般的蔣經國考量。在動盪的年代，政權能否維穩，的確必須祭出非常手段。

> 蔣經國之所以任用李登輝，固然有個人和內政方面的考量，但另一方面也是國際權力政治的運作，以及海峽兩岸競相定義台灣的歸屬、爭奪台灣主權的結果。一九七〇年代美國政府承認中國、與台灣斷交，造成台灣政治混亂、人心動盪的局面。國民黨政府被迫承認它不再代表中國，因此也不能夠再以「反攻大陸、解救中國」為主要目標。問題是：它能夠在小小的台灣繼續生存並實施統治嗎？」（柯義耕 2008：158）

在 1979 年與美國斷交之前，其實早在 1972 年李登輝甫當上政務委員後不久的時間，日本正式與與中國建交，並且廢止了《日華和平條約》，台灣駐日大使館當然也就因而關閉。當國際形勢愈加險峻，迫使蔣氏政權必須固守台灣統治權力基礎，也就再次呼應了本段落不斷所提，台籍政治菁英得以相繼出現登場。

這一段不堪回首、想起令人心驚的台灣外交低谷，在那當時涉入政治不深、「當官」不久的李登輝，心中想的是什麼？蔡石山（2007）的觀察中提到：「到了 1972 年底，有三十三個國家先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切斷原本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在經歷無數外交挫敗、心理震撼與國內挑戰下，李登輝不只願意，更是渴望展開他在國民黨體制內的政治事業」（蔡石山 2007：174-175）。

我們可以想像，溯及以往的李登輝生命歷程告訴我們，對於「國家之愛」，向來存在李登輝的心中。在國家面對如此嚴峻的外交環境，中國傾盡力量地百般設法「孤立台灣」，李登輝心中的激動、憤慨，肯定是有的；只是李登輝仍舊維持自己處事的風格，找出了一種符合自己信念的奉獻方式。李登輝運用了蔣經國授命的政務委員職位，開始一點一滴地施展了他的專業拳腳。

李登輝很快地找到了他能發揮專長的所在，「肥料換穀」[99]政策的廢止，應當算是他進入為官生涯的起手式。在當時，台灣農民因為政府制度的使然，陷入

[99] 肥料換穀：「1948.09 省政府公布『化學肥料配銷辦法』，肥料不再以現金交易，農民需以稻穀向糧食局肥料運銷處換取肥料，稻穀與肥料的相對價格則為公定。肥料換穀制度施行的本意，乃是政府為了供應軍公教配糧，以肥料掌握糧源」（李登輝 2008b：27）。

了一種從農必定進入「被剝削」的困境之中，這是「蔣介石」支持的政策。[100]但是若要改善農民生活、加速農村改造，這一種絕不合理的制度，就必須予以修正。

> 蔣經國當了行政院長，叫我[李登輝]去做政務委員，改革農村也是他請我擔任政務委員的一個動機。那時他問我改革農村的情形，我說第一優先就是要把不平等的肥料換穀制度取消。（李登輝 2008b：28）

李登輝得到了蔣經國的大力支持。「台灣農村發展要走向現代化，應該鼓勵農民儲蓄，政府可以支付農民適當的價格收購米糧，農民有收入、有儲蓄就可以自行出錢買肥料。蔣經國果然被他說服了，立即廢止肥料換穀制度」（柯義耕 2008：164），事實上，蔣經國支持李登輝的舉措不僅於此，聞名遐邇的「香蕉生產過剩」的農業危機、「台塑欲廉價收購農地」可能帶來的恐怖農民人力過剩災難等等，都是為後人津津樂道李登輝一介台灣子弟在國民黨政權底下寫下的另類奇蹟。

即使在位的總統仍舊是蔣介石，然掌握行政大權的蔣經國，每每在仔細理解李登輝的作法確實可行後，願意為李登輝力排眾議；只要蔣經國認為對的，他甚至不吝惜地大聲喝止他手下的官員，[101]讓李登輝具擬的政策得以順利通過、付諸執行。不過這裡有一個觀察的點，在於強人政治下的威權年代，尚在位的蔣介石，如何能讓「只是」行政院長的蔣經國獨攬大權、執意貫徹「小蔣」[102]自己的意志？

上述問題的答案，我們或許能夠透過蔡石山（2007）的觀察來析解：「中華民國政府黨政不分，政府內閣的主要任務是實現並進一步發展黨的政策，主要的

---

100 「蔣介石並沒有要修改肥料換穀制度，這可能有受到兩個人的影響，一個是李國鼎，第二就是李連春，這兩個人堅持繼續用這樣的制度來剝削農民，政府財政才有辦法維持」（李登輝 2008b：27）。

101 「當年蔣經國經常無視於國民黨政府要員的反對，全力支持李登輝的做法……當時的財政部長李國鼎反對以這種方式補貼公務人員，但卻遭蔣經國斥責：『你閉嘴！』後來李登輝的提案便獲得通過」（柯義耕 2008：165）。

102 小蔣：台灣自 1949 年頒布戒嚴令後，由於《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輔以實施，蔣介石遂成了幾近稱帝的萬年不退總統，直至其死於 1975 年時的第六任總統任內。雖然依照憲法體制當時候副總統「嚴家淦」繼任蔣介石遺漏下來的總統職缺，其後 1978 年才由蔣經國選舉出現成為新任總統；但在那黨國不分的年代，蔣介石死後的實質權力，其實仍舊掌握在「國民黨黨主席」，也就是蔣經國的手中。一直到 1987 年台灣解除戒嚴、終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這段期間，台灣社會普遍認知為強人領導的「兩蔣威權時代」。這兩蔣，正是父子檔的蔣介石與蔣經國，父親蔣介石 —— 世人稱為「老蔣」；兒子蔣經國 —— 世人稱為「小蔣」。

決策權力是由總統府與國民黨的中常會掌控。1970 年代前，蔣經國因掌控經常臥病在床的蔣介石總統對外聯絡管道，實際上已牢牢控制住國民黨機器，只要蔣經國點頭，馬上可以立法，政策馬上可以實施。所以說李登輝的政策建議最終是獲得通過還是否決，主要依蔣經國個人態度而定」（蔡石山 2007：181）。

有了以上基礎的背景認知，我們知道李登輝這一號人物能否在推行政務上幹得響亮、做得漂亮，很大的關鍵在於「蔣經國」支持及肯定與否。1970 年代，蔣經國大幅修正，將以往國政放在苦心思量、重返「大陸」的眼光下，拉回、聚焦在如何讓剩有的台灣領土長治久安、持續向前的關心中。前述提及「加速農村改造」是一項，而「十大建設計畫」亦是後來影響台灣經濟發展迅速成長的重大決策。在這當中，身為政府高級官員一份子的李登輝，自然也扮演了當所有的賦予角色，在後老蔣時代、新小蔣時代承接、轉換之際，漸露光芒。

源自於蔣經國的賞識與重用，李登輝這一個不管部會的年輕政務委員，開始涉足了 1973 年起推動的重大國家政策 —— 十大建設計畫。「擔任政務委員時，除了在十大建設中負責石化業以外，我[李登輝]主要負責職業訓練。……除了以上的工作外，我還負責和加速農村建設計畫有關的項目，這是蔣經國個人支持我去做的」（李登輝 2008b：22）。除了農業專長外，李登輝自此開展了更加廣闊的國政參與視角，或許，真正的「栽培」，自此開始；當然，也或許是擔任一個「不管部會」政務委員的基本功罷了。

依結果論來看，這一段長達六年的政務委員歷練，到後來一路不斷受到蔣經國高規格提拔，很顯然李登輝並沒有辜負蔣經國的任務賦予，且漸漸具備不僅僅只在農經方面上的專長。李登輝由一個農經學者見長的身份，逐步跨足以往陌生、不曾參與的各項國政領域，這種歷練，可謂可遇不可求的寶貴機緣。李登輝不但把握住了，也逐漸擺脫「其中一些人對李登輝還相當輕視，認為他只是當局用以穩定台灣民心的一種『門面人物』而已」（蔡石山 2007：176）的這種不堪情景。

1975 年 4 月 5 日，「萬年總統」、高齡 89 歲的亞洲一代強人，蔣介石逝世。在當時小小的台灣島上，因為威權統治的需要，當權者刻意營造出「崇拜」、「國

難」、「駕崩」的荒謬氛圍，全國上下彷彿陷入集體迷航，去追思、哀悼，「台灣偉人」的辭世。事實上，蔣介石的生命走到盡頭，無疑是其家人的哀痛與損失，對於台灣國家政體，也的確產生了不同以往的權力改造；但萬年總統的不再掌權，對於台灣整體國家發展、民主深化等，實質產生了積極且關鍵的前進力量。

依照憲法體制，蔣介石最後任期時的副總統是「嚴家淦」，也就自然繼任「總統」；但誠如前述所提，在台灣「黨」、「政」不分的情況下，「以黨領政」更能貼近當時的國情。然而「此時，[蔣介石]長子蔣經國就任國民黨主席，自此政務和黨務分離」（上坂冬子 2001：124）的情況，可以解釋為實體上的黨政分離運作，我們卻不難想像，最終的權力核心，仍舊緊緊握在高任國民黨主席的蔣經國手中，無法放掉。小蔣獨大時代，正式來臨。

在 1978 年 5 月 20 日蔣經國就任總統前的這段期間，蔣經國除了掌握了整個國家機器運作的實權外，也在行政院長任內盡可能積極推動、努力打造各項台灣應當有的民生基礎建設。由於蔣經國企圖營造親民、愛民的形象來擄獲民心，所以頻繁走訪基層，所謂「下鄉」行程，成為了蔣經國給予人民的重要印象。於此當中，李登輝也獲得了閣揆關愛的眼神，[103]屢屢陪同蔣經國一同訪視台灣各地。

政務委員陪同閣揆下鄉訪視，本來是再正常不過的工作內容；但是回到「以黨領政」、「家即天下」的兩蔣威權統治思維，誰要是能讓當權者信任、產生好感，自然對於有心於仕途發展之人，有著大大的加分，前途一片光明。此時此刻的李登輝，除了恪盡職責、戮力從公外，是否也在他的心中，種下了初嚐權力後的其他想像？或者，如此別具意義的重點栽培訓練，李登輝本人是否也嗅到了的確不尋常的氛圍，因而立下志向，自我期許加深。

上述的問題無法明確得到答案，但是，李登輝過往遭受來自國民黨政權體制下的各種直接式攻擊或遺留下的恐懼、陰影，顯然不會因為當上政務委員、受到蔣經國格外重視，就因此而煙消雲散。這個部分正是筆者想要積極深入了解的：

[103]「蔣經國出去[訪視基層]都帶周書楷[與李登輝同時期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帶我[李登輝]啦，大概只有我們兩個人而已」（李登輝 2008b：10）。

「加入一個政黨、擔任政府要員、與外來政權掌權者親近，愈是靠近、李登輝愈是必須正面迎擊伴隨而來的國族認同挑戰」。

此外，正當李登輝順利、順心於政務委員的職權遂行，參與國政、奉獻心力之際，隨著一代強人——蔣介石的逝去，長期遭受不民主對待的台灣人民，終於再也無法吞下所有威權治理的違心產物，漸漸地透過各種可能的管道發聲，或撰寫文章、或走上街頭、或衝撞體制、或憂國憂民，黨外社團逐漸成形，著名的「中壢事件」[104]，也在此一時期熱鬧、轟烈地發生。

這些後來影響台灣民主發展至深的早年「黨外運動」，對於同一時期的李登輝而言，一則未必與其負責政務推動相吻合，二則包括李登輝 1960 年代的赴美留學時所遇上的倡議「台獨」台灣人士經驗相結合；我們熟悉的李登輝，很顯然不會輕易地在這些事件上有著明顯的接觸。這也是李登輝生命歷程的發展上，獨樹一格的處事作風，他很清楚，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上，應當呈現何種面向，去說服、去效忠、去切割、去贏得當權者的信任。

第二節 全面掌權蔣經國

1978 年，踏上接班行列許久的蔣經國，在歷經台灣政府各個重要職務的歷練之後，因 1975 年蔣介石逝世、自動繼任總統的嚴家淦，一如所有人預期的，並沒有走上競選總統一職；蔣經國與謝東閔的正、副總統搭擋組合，就在「同額競選」下，順利當選成為中華民國第六屆正、副總統。蔣經國的時代，正式、全面來臨。當然，卻也是「蔣氏政權」的最後一章。

蔣經國在登上總統大位前，擔任的是始自 1972 年 6 月 1 日的行政院長一職，這個職務一直伴隨著他直到總統任期的前一天（1978 年 5 月 19 日），整整六年的歲月，蔣經國一步步建立起自己擘劃的台灣藍圖；1978 年 5 月 20 日就職總統，

[104] 中壢事件：「是 1977 年中華民國縣市長選舉中，由於中國國民黨在桃園縣長選舉投票過程中作票，引起中壢市市民憤怒，群眾包圍桃園縣警察局中壢分局、搗毀並放火燒毀警察局、警方發射催淚瓦斯以及開槍打死青年的事件。中壢事件被認為是臺灣民眾第一次自發性地上街頭抗議選舉舞弊，開啟爾後『街頭運動』之序幕。」（維基百科 2018a）

可謂無縫接軌，在續兼國民黨黨主席的情況下，可謂「黨政一把抓」，彷彿蔣介石的再次上位，自不免引發台人的各項擔憂與猜忌。

隨著蔣經國離開行政院長職位、當上總統後，直接相伴而來的，就是新的「行政院長」任命。「孫運璿」成為了蔣經國認可的接任行政院院長人選，台灣的內閣政府、乃至官方派任的直轄市市長人選等，同步列入改組的範圍之內；蔣經國栽培許久，磨練甚深的李登輝，就在此時，果然並沒有被遺漏。

一、　官派台北市市長歷練

同年的 6 月 9 日，李登輝接任了「台北市市長」一職。這個職務顯然是一個為他開啟邁向權力巔峰的真正敲門磚，不過，對於一入宮廷深似海的國民黨大官廟，這個台北市長的職務，尚不在「權力核心」的行列中。此時的李登輝對照政務委員時期的自己，其實仍舊像是蔣經國手中的任一棋子，擺到何處、就盡力發揮自己所能吧！李登輝本人也深諳此道：「只要是上面的命令，什麼職位我都願意接」（上坂冬子 2001：136）。

> 一九七八年六月我[李登輝]從政務委員調任為台北市長，這個消息是孫院長[孫運璿]打電話告訴我的。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我當他的政務委員六年，雖然他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就任總統，由孫運璿接任院長，要另外安排我到哪裡做事、要調任到哪裡，蔣經國應該會告訴我。程序應該是這樣才對，但是他沒有這樣做。（李登輝 2008b：50）

對於台灣政情有著基礎認知的人均知，憲法賦予行政院長具有組閣權，理因負責主導所有內閣成員的選定、任命，當然，這部分並不包括另列於外的「國防」、「外交」、以及對中國事務事宜。然而，行政院長卻是由總統來任命，總統無論是在所謂「委任總統選舉」，亦或「開放總統直選」，總統最終才是真正具有民意基礎的權力掌握者。在大多實質的政治運作下，少有總統不對閣員任命保有最終決定權，更由甚者，其實閣員的任命一直是掌握在總統手中。

這一個憲政上的弔詭之處，即使直選總統開放至今已超過 20 年的光陰，台灣民主不斷地在演變、在進行深化，仍然沒有在此問題上獲得進步的成果，更何況那是在 1970 年代、台灣尚未解嚴的時刻。所以由行政院長對於所屬以下閣員（包含官派市長）進行徵詢、任用，是在制度上的必然結果，李登輝未必不知；但長年跟隨蔣經國做事、學習，建立了相當程度的緊密關係，李登輝自然會認為蔣經國當直接告訴他升任台北市長的事，況且，這些人事任用權力來源，事實上正是掌握在總統手中。

蔣經國沒有選擇跨越常規，憑藉與李登輝的互信甚篤，就選擇毀壞體制、逕行向李登輝宣佈此一重要人事任命，哪怕眾所皆知任命的權力來源顯然不會真正掉到了受總統任命的閣揆手上。在這當中，我們看到了李登輝或多或少的失望，卻也因此見識到了所謂的「君心難測」，下屬還是不該認為自己的上司會對於自己有著什麼樣的特殊關愛；不期不待，就不會受到意外傷害。

不過細究李登輝可能失望的原因，卻可以從另外一個切入點，來看待李登輝是否有著所謂的「玻璃心」，長官沒有直接告訴他的新職，就心碎滿地：

> 我[李登輝]知道在這裡他[蔣經國]要考慮一個問題：究竟是要讓我還是林洋港擔任台灣省主席？他沒有明白地講過要讓我當省主席，只是說過要一個農業的人才。之前我擔任政務委員時，常常陪他到鄉下去，他就一邊跟我說明，省政府應該要如何做，農業問題最重要等等。這是我個人的感覺。不過從我擔任政務委員開始，蔣經國就要培養我，這是沒有錯的，我可以肯定地講。（李登輝 2008b：50-51）

或許這是另一個李登輝真正有所失望的原因所在，一個更加明顯，「揣摩上意」的可能，在沒有明確指示下，李登輝從蔣經國的過往培養、話語中，認為了自己可能有機會朝擔任「省主席」職務挺進，在未能上位的同時，流露出失之交臂、無法掩蓋的落寞之情。當然，能夠站上台北市長的高度，卻也絕非「冰凍」的職務，或許更可輝映的是，這是蔣經國對李登輝刻意的「培養」之情。

雖然「省主席」一職沒有讓李登輝一躍而上，蔣經國也沒有為李登輝打破體例、逕自向他告知出任台北市長；但這並不代表蔣經國就因此少了對李登輝的其他計較與用心。李登輝一上任台北市長後，「大約有三個月的時間，蔣經國經常去造訪李登輝的住處。[直到]某日，返家的李登輝如平時一般與蔣經國閒聊時，蔣經國突然說：『你的評價非常好，已經沒問題了』。他褒獎李登輝當市長的表現很好，以後就未再走訪李家了」（上坂冬子 2001：127）。

甫任台北市長這麼一個重要職務的李登輝，事實上經歷了一段當權者緊迫盯緊的非常時刻；「蔣經國可能一方面擔心，不知道李登輝是否稱職，另一方面也想給比他更緊張不安、卻拚命努力工作的李登輝打氣，因此不時到家走走，即使聽聽李登輝的牢騷話也好」（上坂冬子 2001：127）。顯然這是蔣經國的苦心誘導，為了檢視自己的用人眼光，更為了讓李登輝能夠步上軌道、漸入佳境。

無論如何，初入政壇旋即出任有違政治倫常的「政務委員」高職；爾後的發展，也不若林洋港、張豐緒等人，先是有過地方首長經驗做為基礎，才前進首都接任市長，李登輝的仕途之路，的確走得順遂，其躍升力道，早已令其他同時期台籍政治精英望塵莫及。在此也必須平衡李登輝的心中想法，面對這個新職務，「我做事情並不是看地位的高低，我也不會去計較這些」（李登輝 2008b：51）。

前述所提，在接任台北市長之前，李登輝並沒有實質上的行政首長經歷；農復會時期、行政院政務委員時期的李登輝，像是一個學有專精的學者幕僚，主要協助所屬長官擬定、推動政策執行，責任上無需直接接受成敗的洗禮。[105]但是台北市是台灣許久的首善之都，是中央政府的所在之地，說上治理、談何容易。李登輝甫上任之際，再度恢復他的學者性格，是的，先從書本中找方法、找答案。

沒有治理城市經驗的李登輝，「我就自己用功，我首先把日本岩波出版社的《現代都市政策》買來，總共有十二本，我就拚命地讀，研究市政要如何做，其

[105] 「市長對我[李登輝]是新的科目，我好像是進入新的學校，因此很認真地研究。如果看過我的三本市政報告書就可以瞭解。市長和政務委員不一樣，市長面對的是市民、議會，不是只有上面的決策問題」（李登輝 2008b：52）。

中最有研究的就是神戶的經驗，以此來建立台北都市經營理論。……台北市的經驗對我有很大到幫助，就是因為我有一套都市計畫」（李登輝 2008b：52-53）。李登輝從擅長的書海（日本圖書）中去找尋、勾勒如何巧妙運用在不擅長的都市治理，以結果論來看，很顯然這個別具心裁的策略是奏效的。

李登輝透過自身既有的學者專業訓練，埋入熟悉的日本書海中企圖解答城市治理的法門，這是他所能加以運用的籌碼。然而於此特殊的是，在國際城市發展櫛次鱗比的成功模型典範中，李登輝獨獨選上了來自「日本模式」的參考，這一點，是值得議論、研析的琢磨所在。

我們當然可以依照比之台北市的城市規模大小、[106]李登輝熟悉其他國家語言不若日本語在掌握上來得精巧，或是在參考文獻取得上較為便利等原因，去淡化李登輝是否鍾情、醉心日本文化的色彩，去解釋在有機會成為首長、治理城市之後，李登輝沒有包藏私心，沒有希望複製日本的生活經驗應用於台灣。但是這真的足夠了嗎？這一年，距離李登輝開始生活在國民黨政權統治的時間，已經 33 年，李登輝也由血氣青年，年歲漸長地到了 55 歲的年紀；我們因此感到好奇。

話說回來，一座城市、一個首都的經營，必須思量的面向多樣，這些錯綜複雜的市政問題交疊，恐怕不會有著任何一本成功的著作，能夠載明、並且引導著治理者通往絕對正確的道路。李登輝以這些大量來自日本知識藍海的都市政策基礎，開始蒐整、囊括任何其他先進國家，[107]對於台北市未來的發展樣貌，如何正確建設、治理這個首善之都，著手進行了一系列李登輝希望打造的台北城計畫。

在進行整個為期約莫三年半的李登輝台北市長任內重要工作梳釐前，同樣發生在此一時期的台灣國家發展走向、重要國際形勢，筆者認為必須一併於此交代，

106 「我[李登輝]對台北的都市計畫大部分是借鏡日本的大阪，大阪有很多地方和台北市很接近，我就參考大阪是如何運作的。美國的都市沒有辦法提供參考，因為他們的土地太廣了，台灣的土地是很少的」（李登輝 2008b：54）。

107 「我也研究很多德國早期的都市計畫和交通問題，當時讀了很多書。都市中心的問題，則是以新宿為範本，第二都市中心也參考巴黎的規劃，都是這樣在做思考的」（李登輝 2008b：54）。

因為這些成因，無論直接或間接都會影響著一位首都市長的施政，或者亦有可能反過來是由一位卓越的首都市長政績、成效，去影響了台灣國政的發生

二、 靜默以待動盪不安

李登輝就任台北市長的這一年，是蔣經國首度執政的第一年；於國際間實質深刻影響台灣外交空間的泱泱大國——美國，繼日本之後，突如其來地與台灣的敵對國 —— 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好、建交，這無疑是讓已然險峻的台灣蕞爾小島，面臨再一次的雪上加霜。台灣島上瀰漫著不尋常的氣味，甚至引爆了好大一波的「移民出走潮」，人民開始無法再信任中華民國政府。

對於一位縣市首長而言，台灣的外交政策、國際邦援，本不屬於職責內之事；然而，做為與國際世界接軌、乃至外國使館分座落於台北市這座首善之都時，李登輝自然無法置身事外，必須實際面對台美斷交後衍生而來的各種詭譎、民眾起身抗議事情。美國的離棄，「台灣人民感覺被背叛出賣，震驚莫名，台北憤怒群眾向美國大使館投擲石頭和雞蛋洩憤。此時李登輝才剛接任市長六個月，當他下令驅離憤怒群眾時似乎也很緊張」（蔡石山 2007：194）。

我們無從得知上述有關李登輝「似乎也很緊張」的蔡石山說法是否正確，我們卻可以很確定，這些發生在「台美斷交」衍生而來的台灣民眾於台北城進行的抗議事件，李登輝顯然責無旁貸，必須一肩扛起首都的治安維護問題。面對如此悲憤情事，民眾宣洩憤怒的情緒當然能夠理解，「愛國之心」滿溢的李登輝在看待這些愛國份子的發洩行為，執法尺度的拿捏，的確是一門重要的學問。

令台灣人民無法接受的台美斷交現實，卻沒有隨著群情悲憤的沸騰情緒，而有所轉圜，「1978 年 12 月 16 日……安克志[美國駐台大使]告訴蔣經國總統，華盛頓[美國政府]已決定自 1979 年 1 月 1 日起與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時切斷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並中止與台北[台灣政府]之間的互助防衛條約」（蔡石山 2007：194）。台灣自此頓失去一位在國際間向來大力仰賴的至關重要夥伴。

台灣與美國政府的邦聯始建於 1913 年，當然，更正確的說法，應是「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邦交關係。一直到 1978 年 12 月間美國片面宣布不再與台灣保有外交關係的這超過一甲子時間，期間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終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韓戰、越戰發生、台灣退出聯合國、台日斷交等等，都沒有讓兩國相互背離，反而因爲美國的扶持，台灣得以不斷前進。

但現實終究是現實，即使長久友好的穩固情誼，最終仍敵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快速崛起後施加的壓力，美國選擇了與擁抱共產主義的非民主國家做朋友，離開了與他才是真正共同信奉民主自由的台灣。[108]所幸天無絕人之路，畢竟台美的交情並非一朝一夕的露水姻緣；台美雙方建立的深厚情誼，即使當時做出與台灣斷交決定的美國「卡特」總統，也仍然抵擋不住來自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議員自發性的協助台灣通過影響至今的《台灣關係法》。

1979 年 4 月 10 日，詳細記載著台灣、美國不再邦交之後，美國如何提供協助、守護台海和平的美國法律條文，在友台的國會議員協助下誕生。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套用在幾乎在國際外交上「舉目無親」的台灣處境上，《台灣關係法》的通過，無疑使得台灣有了在斷交後，保有美國直接在軍事上的協防無虞，確保台灣在面臨中國的亟欲併吞，有了一道得以暫且有恃無恐的屏障。

1979 年，同時也同樣是個不算平靜的一年。在台灣島上，由台灣人民自主覺醒的各項推動民主發展運動，在全台各地萌發。在戒嚴的時空背景下、在新一代強人政治的領導中，台灣當時的民主更似是種華而不實的口號，只為了對照實施共產主義的紅色中國。台灣當權者對於反對聲音的處置，其實不比共產黨高明，除了打壓之外，更透過各種手段、情治系統，嚴縝地監視台灣人民的行動。

這一年的八月，積極參與、奔走台灣民主運動的各路人馬，其中一支匯集成了具有強大論述能力、能夠針砭國政的黨外運動力量，《美麗島》雜誌因而創刊。《美麗島》雜誌的發行人，就是後來擔任過民主進步黨黨主席的黃信介，人稱—

[108] 當然客觀面對台灣當時的政治環境，仍處戒嚴中的台灣，領導者依然是承襲父志的獨裁者後代，台灣是否真正實施民主自由，這真是見仁見智的各自領悟了。

—信介仙；而社務主要負責的人，就是 1977 年「中壢事件」的主要主角許信良。當然，在 1986 年尚未取得合法即已成立在先的民主進步黨，上述二位當時的黨外人士，其後都成了這個政黨在草創之初，重要且具關鍵影響力的人物。

《美麗島》雜誌的發行，意外受到常民熱烈的歡迎與支持，「第一期就賣了十萬本，這是台灣雜誌發行史上的空前記錄」（蔡石山 2007：201）。但紙本的印刷及閱讀，卻只是這一本一砲而紅雜誌進入台灣社會的起手式，更進一步地，「雜誌社先後在十一個縣市成立了『分社』，並在各地舉辦『茶會』與『公共問題』研討會以擴大支持」（蔡石山 2007：201）。

可想而知，上述的雜誌社經營者舉措，以及掀起一股熱鬧非凡的民主公共參與，對於實施威權統治的國民黨政權而言，會是多麼的不悅與不安。國際間的形勢已經嚴重產生對於當權者統治正當性的質疑，日、美等大國相繼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加上蔣經國亦大幅修正在台統治方針的情況下，任何風吹草動都將可能直接觸動當權者的敏感神經，觸使即使再有一波「白色恐怖」活動，也絕非意外。

>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一群反對人士在高雄舉行示威活動，慶祝國際人權日的到來，並抗議政府懲處那些被關在綠島(位於台灣東南沿海)的政治犯。他們被控發起一場暴動，但實際上是王昇的手下和黑道份子利用群眾強行前進的機會將那場示威升高為一場暴動。當時有許多人 —— 尤其是當地的警察 —— 受傷。這就是所謂的「 高雄事件 」。（ 柯義耕 2008：176 ）

上述的「高雄事件」主要因《美麗島》雜誌社發起的活動而起，後來因此一事件導致鋃鐺入獄的黨外運動人士，[109]也多與《美麗島》雜誌的相關活動有所關聯，乃至高雄事件亦稱為「美麗島事件」。美麗島事件成為了當時全國矚目的重大新聞事件，過程中執政官方的手段及立場，無疑催化了所謂反動人士更加堅毅的心，自此而後，台灣民主運動更加蓬勃發展、恣意盎然。

[109] 「美麗島事件八名主要被告為：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林義雄、姚嘉文、呂秀蓮、陳菊與林弘宣」（蔡石山 2007：201-202）。

值得一提的，在那戒嚴、威權的時代，能夠不顧危險、不計得失，願意挺身站出為所有美麗島事件政治犯擔任辯護律師的諸位熱血律師如：陳水扁、蘇貞昌、謝長廷、尤清等，後來也都成為往後台灣民主深化的重要推手；競選、擔任過總統，亦或成為行政、考試院長等高職，去真正有機會實踐他們心中信奉的價值。

另外，就在美麗島事件發生過後不久，官方逮捕的相關人士中，其中一位叫做林義雄，他是後來一手將陳水扁推上總統寶座的民進黨黨主席，也是台灣反對核能運動的主要實踐者。就在 1980 年的 2 月 28 日，林義雄人還身陷囹圄的時候，意外接獲消息傳來噩耗，「震驚海內外的『林家血案』，在八名被告接受事先安排的軍法審判前，林義雄的母親與兩名女兒在家中慘遭殺害，第三名女兒被殺成重傷後被救了回來」（蔡石山 2007：202）。

這一次的林家血案好巧不巧亦發生在 2 月 28 日，距離國民黨政府於 1947 年進行戕害台灣人民的歷史血案——「二二八事件」時間不過 33 年，「兇手」刻意選在這個撥動敏感神經的日期痛下殺手，「台灣人都認為這是一次刻意安排的政治陰謀」（蔡石山 2007：202）。美麗島事件的刻意操弄、抓人，「新二二八事件」（林家血案）的無端發生，再再都讓台灣人民再度繃緊神經，嗅到濃濃新一波「白色恐怖」事件的襲來，更何況是曾被視為「箭靶」的李登輝本人。

面對著接踵而來的台灣重大社會事件、民主浪潮的瘋狂捲起，一腳踏在國民黨政權擔任要職的李登輝，難道都能因為職權未及而全般切割、置身事外？

> 台美斷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時，我是台北市長，做市長只是「黑卒仔」〔地位非常卑微〕，沒有什麼話可以說。……美麗島事件發生的時候〔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我也是同樣的看法。當時可能在中常會上討論這個事件，但是我在會上從來不為政治的事講話。對於中立性、技術性的事情，沒有什麼政治的影響，我才會發言……美麗島事件的發生，我有一個感覺：這是民眾被國民黨的情治單位騙去了。（李登輝 2008b：113）

上述是李登輝對於美麗島事件發生時，他回憶所扮演的角色對於該事件應當拿捏的分際。這和我們從諸多文獻爬梳時的內容大致相同，李登輝在進入官場之

後，許多爭議時刻都會做出優於常人、謹言慎行的保守舉措。以美麗島事件為例，李登輝當時沒有在國民黨中常會發言討論的考量，其實不僅僅是「台北市長」權責未及高雄這等表層表象問題而已，更重要的是李登輝「從來不為政治的事講話」（李登輝 2008b：113）。

事實上，自 1971 年李登輝成為國民黨員起算，至 1979 年年底發生美麗島事件時，李登輝不過是個入黨未滿 10 年、當上首都市長未滿 2 年的資淺國民黨人。即使官運確實亨通，但面對強敵環伺、輔之外省權貴組織而成的國民黨領導班子，李登輝或許就是有這種體悟或是天份，不輕易冒出頭、不過當踰矩發言，呈現了一種謹守分際、匍匐前進的小心為官姿態。

在這裡，我們所在乎的，倒也全然鎖定在李登輝的為官之道如何云云；我們更想梳釐的，是有關誠如李登輝自己都點出的「情治單位」問題所在。李登輝所指的情治單位，即是以「王昇」為首的台灣情治系統。[110]李登輝在 1960 年代經歷過的白色恐怖對待，此事的策動與權力來源，其實正是前述所提的情治單位進行與操控的。因而李登輝將美麗島事件與情治系統予之連結，在看待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李登輝內心恐怕是無法在一時片刻得到平靜的。

從前的李登輝，吃足了情治單位疲勞轟炸的詢問之苦，面對如此真實、擺在眼前的「美麗島事件」、「林家血案」這新一波白色恐怖活動，李登輝克制自己，沒有在這關鍵時刻吐露一字一句屬於他的看法與心聲，但這決不代表他無感於心。總之事件仍舊發生了，身份地位已不同昨日而語的李登輝，身處威權政府中要職的他，想必內心必定進行了左右思量、反覆琢磨的自我對話。

如同前述所提，這一場舉國矚目的「美麗島事件」，在多年之後，當時身陷牢獄、或者挺身辯護的諸位律師，成為了日後台灣推動民主深化的關鍵角色；如同李登輝所說：「說實在的，當時這些黨外人士如果沒有這樣活動，台灣的民主

[110] 「王昇自從一九四三年起，就一直在蔣經國手下的情報與軍事部門工作。因此，他成了台灣當時僅次於蔣經國的最有權勢的政治人物」（柯義耕 2008：175）。

發展也沒辦法這麼快。這也會讓蔣經國開始想：他也是台灣人，台灣不要有事情最好。」（李登輝 2008b：114）。台灣民主因此因禍得福地持續向前。

在敘述完此一時期台灣國內陸續面臨的重要大事與李登輝的關聯之後，時序稍往回推；短暫地離開悲傷，把焦點聚焦在李登輝個人家中的重要大事。李登輝一輩子最有遺憾、英年早逝的長子——李憲文，在李登輝的台北市長任內，於 1979 年的 5 月 3 日與「張月雲」結婚了。這是李府家中的重要喜事，也是原本李憲文人生應當就此甜蜜地開始：

> 有一天憲文告訴母親，希望她見一個人。那女孩在台灣大學專攻中文，兩人是在台大的圖書館認識的。「我們是薪水階級的，對方是銀行職員的女兒，生活環境很相近，所以應該是門當戶對的吧，我先生和我很快就同意了這門婚事，並且讓他們在教堂舉行婚禮。」（上坂冬子 2001：129）

上述在教堂舉行婚禮，「是在隸屬長老教會的濟南教會舉行。這裡就是以前李登輝夫婦入教的那家小聚會所……『當時實在一切都順利得太可怕』」（上坂冬子 2001：129），李登輝夫婦很開心地迎接了這個媳婦，卻也隱隱然對於人生路途太過順遂而引發惶恐。這一個惶恐，果真在不久後的未來爆發，並且因此種下了李登輝一生難以彌補、無可挽回的錐心之痛。筆者將在下一節次中，詳加描述此事的發生以及對於李登輝的影響。

三、　行政能力的累積與綻放

回到本段落標題的重點所在 —— 任職台北市市長。李登輝自不是輕鬆坐上這個位子，雖然蔣經國的親自提拔、關愛有加，但是經營一個台灣的首善城市，施政的好與不好？人民的買不買單？有不有感？簡直是一翻兩瞪眼的殘酷與現實。能否真有能力治理好這座城市，市政的推行與取得人民百姓的認同，這是顯而易見、常受公評的事情。李登輝想要混得好、往後持續能實踐心中想幹的大事，就必須在這個位子上，展現他的能力、做出一番成績。

前述已經介紹李登輝切入經營城市的方法，是大量著墨各個先進國家的成功典範，其中尤以日本做為主要城市效仿藍圖。然而台北畢竟不是神戶、不是新宿，更不是巴黎、柏林，台北就是台北，要經營、建設好台北，就必須真切、一手地直接面對台北面臨的問題，並且給予效能、可靠、務實的解決方法。

當時台北市雖然早已是我國重要政經所在之地，[111]各項基礎建設實質上也領先全國，吸引了大量來自各縣市的打拚百姓，前往台北市開創自己人生事業的璀璨可能。然而也正是源自於住民數的不斷增加，其中不乏高知識水平的民眾居住，對於施政上就無法只有保守的守成，必須不斷不斷透過方法的改變、良好的政策實踐，去趕上百姓民眾的生活所需與期許。

李登輝很快地善用自己累積的知識與所學，釐清了各項亟待克服的問題，「都市經營包括很多項目，首先是市民的福利要如何增加，交通要如何改善，和議會之間的關係要如何面對。我[李登輝]記得這句話的英文為 civil minimum，也就是市民的最低要求應該如何完成，以此做為台北市施政的基本原則，然後再進一步學習都市計畫」（李登輝 2008b：53）。

做為一個學者出身的教授級專家，輔以經歷過政務委員的磨練，李登輝找到了利用自己的融會貫通、治理一座進步城市的方法。當然，這一份艱鉅的長官交付任務，亦再不容李登輝分心到別的領域、事務上，哪怕是他長年投入的學術志業：「就任台北市長後，李登輝首度向台大提出辭呈。原本腳跨政界、學界兩邊的，現在雙腳都踏進了政治的領域」（上坂冬子 2001：126）。這一政、學脫鉤，顯然正一步步將李登輝帶往與從前截然不同的人生新頁。

全心全意投入台北市市政推動的李登輝，面對一個全新的挑戰，「百廢待舉」顯然不適宜套用在已然相對建設完善的台北城；「不過這種時代變化並非四平八穩，近半數的台北建築物有瑕疵，數十萬家庭居住在狹窄的房屋，使用有異味不

[111] 「1970 年代的台北市就像是一顆閃亮的寶石，是台灣現代文明變遷的中心。許多台灣的新時代物質象徵都首先出現於台北，市民生活也發生了明顯變化，新富階級出現是這種快速變化的社會現象之一。……台北也是台灣高等教育中心所在，也是台灣現代文化的主要發源地。」（蔡石山 2007：190）。

能生飲的自來水……台北擁有充沛的廉價勞工，因此也造成了淡水河沿岸一帶、低收入社區，相繼出現貧民聚落或違章建築。因此，擔任市長的李登輝首要工作就是都市計畫」（蔡石山 2007：190-191）。

自古以來，有志擔任父母官、治理一座城市的人，幾乎都希望能在自己任上創造出一番新的氣象；李登輝也正是一位想要展露魄力與積極作為的人，他開始了他的治理節奏；更準確地說，他要讓台北全城，進入他所用心擘劃的城市步伐之中。李登輝「首先做的是『公務人員訓練中心』，在這裡進行公務人員的訓練」（李登輝 2008b：55）。

在電腦使用尚未普及的 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是一個公務體系邁向行政轉型的重要時期，李登輝看到了這一個優先能夠處理的不足。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要讓市政步入軌道，負責遂行、推動市政的第一線公務人員素質，成為了李登輝主政的首要任務。於是他從公務人員訓練下手，推動電腦化作業，[112]甚至在許多課程中親自授課。

擔任教授者對於學者養成的李登輝自是不難的功課，透過市政推動的基礎功夫革新，「李登輝在技術方面最大的成就，是將台北市的各項數據加以電腦化，讓市民們也能夠取得。這使得市政府的施政變得前所未有地精準與透明」（柯義耕 2008：168）。這些數據的積累，成了李登輝能夠精準、客觀地有效掌握推動市政施政優先順序排列；這些數據的應用概念，正是如今熱門的「大數據」運用。

其他在李登輝台北市長任內完成、或者積極推動的重要施政事項尚有：一、「翡翠水庫的動工」，[113]帶來未來改善大台北住民用水的無虞；[114]二、「國民住宅的興建」，實踐老舊建物的翻新、提升人民住的安全，並且提供更多可能的親

112 「台北市的市政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讓辦公時間合理化……台北市政府開始用電腦管理行政，這包括建築管理、工商登記、車籍管理等等，使用電腦來改善效率」（李登輝 2008b：73）。

113 「翡翠水庫是我[李登輝]上任前就有的計畫，但是林洋港沒辦法執行，就由我來動工興建。翡翠水庫是在我卸任之後完成」（李登輝 2008b：66）。

114 翡翠水庫的興建成功、澈底改善了台北市住民水的問題，李登輝與有榮焉，甚至充滿自信地說：「現在就算沒有下雨，翡翠水庫也不容易缺水。……以翡翠水庫的供應量來說，台北市一百年內不怕沒水」（李登輝 2008b：72）。

子遊憩空間；[115]三、「交通建設的躍進」，讓台北市因城市活絡、造成長期壅塞的黑暗交通的負產物，有了稍稍喘息的機會，也讓忙碌於工作的「父親們」，有著能夠「早些回家陪孩子吃晚飯」的可能。[116]

李登輝在市長任期中，漸漸展露施政的能耐與擔當；「實際上，李登輝擔任市長的表現非常受矚目」（上坂冬子 2001：128）。這些有目共睹的解決問題能力，也發散到了李登輝與台北市議會的互動關係之間，「李登輝一直很重視民意，並鼓勵民眾積極主動的參與市政。但奇怪的是，他同時也收集所有市議員的個人資料（包括他們是否喜歡喝酒等）並加以整理建檔。他說，這些資料可以幫助他了解他們狀況，以便遊說他們通過他所提出的法案」（柯義耕 2008：168-169；重點是原作者所標注）。

市政的推動順遂與否？「府會關係」是否融洽、和諧，往往是一項關鍵、重要的指標。若是市政府與市議會呈現出劍拔弩張的對立態勢，主政的市長絕對不容易於市政的實施之上。顯然李登輝的手法十分高明，能夠有效地讓台北市議會與台北市政府同心，順利地讓李登輝的施政藍圖在最小阻力中平順前行。

而此一擔任台北市長階段的生命歷程，李登輝還有什麼其他特殊的建樹？以及又有什麼事情不著痕跡地吐露出他的國族認同訊息？第一個，如同前述提到，李登輝是一個地方首長，即使特殊為首都市長，事實上總統暨中央部會掌管的「外交」相關權責，是與直轄市市長管轄範圍八竿子也打不著的無交集議題。但是二度留美、熟稔國際事務的李登輝，在台灣外交環境險惡的當下，找到了他能協助國家、走進國際社會的破口。

> 在台北市長任內，我[李登輝]常常去美國進行姊妹市的活動，和他們的往來相當密切。……台北市後來成為美國市長會議的會員，雖然我們和美國沒有

[115] 「在我[李登輝]任內，國民住宅建得最多，一年蓋一萬兩千間，數量很嚇人。……過去的國民住宅興建後，並沒有規畫公園等設施，小孩沒有地方可以遊玩，從我開始，興建國民住宅以後，各種設備、服務也都整體規畫出來」（李登輝 2008b：56-57）。

[116] 李登輝「為了解決台北市的交通問題，我[李登輝]特別頭痛。當時的大眾運輸只有靠公共汽車……一些小孩子在等爸爸回家吃飯，但是車子卻這麼慢。當時我很用功，將公共汽車路線及汽車制度都做了改變。……儘量讓上下班不要太花時間」（李登輝 2008b：79）。

邦交，但是每年都要去參加他們的市長會議。美國的市長會議、州長會議，[美國]總統每一次都會親自參加。參加這個會議，有些地方對我們很有幫助。（李登輝 2008b：81-82）

台灣的外交處境險惡，在美國與我斷交之後更加嚴峻；李登輝雖然職權不在外交政策的推動上，他卻仍舊能夠找到一個可行的方式，讓台灣沒有因此遠離國際的舞台，努力地為台灣尋找能夠讓國際社會看見的機會。這種突破困境的心，讓我們再一次感受的李登輝特有的「愛國情操」；哪怕「因為我[李登輝]是國民黨的市長，到美國訪問時也曾被美國人罵得要死」（李登輝 2008b：82），都不會讓李登輝退卻，想方設法地推動他能投入的「城市外交」。

1980 年代的美國人，面對中國迅速強大的崛起，隨著台美的斷交，對於以往善待台灣的態度，也已有了改變。「他們[美國人]一直罵國民黨，說台灣如何如何，罵了一大堆。當時他們對中國的好感慢慢強起來，以為共產黨[中共]照顧老百姓。說起來，那時感覺很壞」（李登輝 2008b：82）。

雖然台美的情誼在當時已不若以往緊密，但仍有許多台灣人因為移民、留學，或者不一而足的原因，長期在美國奮打拚、奮鬥。這些在美國的台灣人，繼而組織而成立如「台灣同鄉會」的一些民間社團組織。不過「台灣的同鄉會是分裂的，有的是靠國民黨、有的靠黨外、也有人主張台灣獨立」（李登輝 2008b：82）。

類似這些為台灣發聲、台灣前途打拚的相關團體、組織，在美留學過的李登輝，顯然並不陌生。只是別於以往學生身份在美與這些台灣人互動的模式，再一次踏上美國領土與台灣人交往的李登輝，已經是代表著台灣政府的高官；並且因為是國民黨政府的大員，本質上亦與「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的在美台灣人，形成價值觀、國族認同上的明顯落差。

這些以留學生組成為主要活躍象徵的同鄉會組織，對於台灣政府高官的造訪美國，展現出「熱情洋溢」的學生抗議行動。「留學生組織起來，想要修理王玉雲[時任高雄市長]，但是他們不敢修理我[李登輝]。那些台灣囝仔就穿著布鞋，

站在會場外等，他們這些人就在那邊罵人。王玉雲和他們打架，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李登輝 2008b：83）。

不知何來由的原因，李登輝不認為他會成為當時台灣留學生想要「修理」的對象；不過可以確定的，這些滿腔熱血的台灣獨立運動推動者，會把握這般台灣高官訪美的有限時間，盡可能表達、遊說他們能有機會溝通的台灣高官。這當中當然也包括台灣首都市長的李登輝：「台灣同鄉會的人也會找我[李登輝]講話，他們說台灣應該獨立、民主化、自由化，都是說這些。我不會跟他們說未來不會怎麼樣，而是說這是應該的。」（李登輝 2008b：83）。

身為國民黨籍的首都市長，李登輝對於這些台獨運動人士的意見表達，並沒有進行閃躲；在為官之後的各項發言，向來謹慎小心的他，在當時卻也沒有為了「台獨」這般格外爭議的敏感話題，而選擇不去回應。相反地，在無法做出承諾的同時，李登輝似乎也有意無意地順著台獨抗議人士的話語，類似一種打太極的方式，不製造衝突、不去反駁對方論述，這一點很是有趣。

「城市外交」是一個台北市長李登輝任內的一項特殊亮點，不僅僅為台灣國際外交打開了一扇和諧的窗，同時也直接接受在美台灣獨立運動人士的腥辣交鋒。以往各個生命階段、乃至官拜台北市長的李登輝，確實尚無需訴諸社會大眾，去面對「統獨」議題的爭議挑戰；但仔細回顧以往，李登輝對於這個議題，其實早已不陌生，聰明如李登輝，很可能早在自己心中有了最好的問答。

時序走到 1980 年代初，年近 60 的李登輝，在國民黨政權的重要位置任職。我們接著看在台北市長任內的篇章，最後一個較為奇特的歷程，李登輝積極著手推動的 —— 文化建設市政。

李登輝在從政的過程之中，向來有一位堅實且無可或缺的重要倚靠，也就是他的妻子曾文惠女士。在當上台北市長後，曾文惠同樣扮演了給予李登輝寶貴意見的關鍵角色：「他常具體的問我，生活上會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或者是在公家機關的窗口辦事，用哪種方法比較輕鬆省事等等問題。因為這是我比較擅長的領域，所以我會非常積極的協助我先生」（上坂冬子 2001：128）。

這一些來自真誠、樸實的意見傳遞，成為了李登輝能夠更加貼近民意的佐證。李登輝個人的文化素養向來不低，但顯然比之溫溫儒雅的李登輝夫人稍遜一籌。成為一座偉大的城市，絕不會僅僅決戰在顯而易見的各種硬體建設；能否成為一座真正宜居的進步城市，文化建設的底蘊能否深植人心，往往才是真正軟實力的展現，進一步將城市推上高峰。

台北市能否真正成為一座深具人文素養的現代化城市，曾文惠成了李登輝決心改造台北文藝氣息的幕後推手。「李登輝表示，他的妻子曾文惠女士明白文化和藝術的重要性，於是便力促李登輝在擬定文化政策時參考 NHK 的做法。……當時，曾文惠首開風氣之先，在國父紀念館前的廣場上舉辦了大型的國際舞蹈、歌曲和歌劇等表演」（柯義耕 2008：169-170）。

對於上述柯義耕（2008）的部分說法，確實有著角色上的模糊；能真正將想法、政策落實於市政上的人，不可能是沒有一官半職的曾文惠女士，而是真正掌握實權的李登輝市長。但沒有曾文惠的有效建議，李登輝或許也很難更快速地找出可行的文化深耕方法。結果論來看，曾文惠的建議，成功熱絡了台北市的文化。

這一項文化建設的舉措，除了讓台北市有機會更近一步朝開放的國際化城市邁進之外，更重要的，李登輝推廣的文化表演打破了長期以來國民黨體制下的文化教育；文化不再僅僅囿限於中國傳統文化表演之隅。也就是「在台灣的身分認同這個議題而言，李登輝最重要的建樹便是使得台北的文化活動更加多元化」（柯義耕 2008：169），這是何其喜悅的篇章。

不過回歸到施政這件事情上，向來容易形成正、反兩造不同意見、不同感受的二元對立。舉例來說，李登輝引進了有別以往台北市民對於文化既有的刻板印象與感受；倡議「多元文化」的結果，就是「還是有些人指摘他這些作為有離經叛道之嫌」（柯義耕 2008：170）。當然，民主政治的本質，本來就是盡可能謀取絕大多數人民的共同權益；面對少數持有不同意見、不同看法，也只能盡可能消弭、以及降低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的聲音。堅持對的事情。

至於李登輝具體在文化活動推動上，是抱持什麼樣的新穎想法？「在國民黨治下，文化教育乃是以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傳統為基礎，數百年來的台灣文化只不過是其後的一小部分附錄罷了」（柯義耕 2008：169）李登輝即使將人「賣進」國民黨的體制之中，顯然他不認為這樣是正確的做法。在可行範圍之中，他企圖扭轉台灣在整個現行教育傳業中的劣勢地位。

李登輝在這個容易引發議論的施政上，一方面希望能夠真正帶動起台北市民的文化素質；一方面，李登輝巧妙地運用方法，[117]將他感受到需要介入改善中國與台灣文化在傳遞上的嚴重失衡，不著痕跡地，完成了他的想法。當然，事情也不可能皆般順遂，「後來議員好像有稍微反對，因為錢用太多，我記得最後每年差不多要三、四千萬的預算，所用的預算也是不少」（李登輝 2008b：91）。

這個階段的李登輝，是首度成為執政首長的新手；然而在過去的政務養成之中，李登輝向來是扮演一個稱職的幕僚角色。在蔣經國刻意安排與栽培之下，實際上正式打開了李登輝未來躍上大位的無限可能之門。這樣的際遇，即使是在「吹台青」政策的加持下，也並非人人有同樣的「躍上龍門」機會。李登輝遇上了。李登輝在台北市長任內的表現，除了部分零星如文化活動推廣上的稍稍離開中國傳統教育之路外，可謂四平八穩、可圈可點。帶著絕佳的政績表現，蔣經國的提拔鐘聲、再次敲響，李登輝總算站上了他想像已久的「台灣省主席」職位。

第三節 攀向權力巔峰

李登輝在 1971 年加入了國民黨，前後十年的光陰，他歷練行政院政務委員、他挑戰擔任首都市長；其後，如何搭乘蔣經國領航的「升官直升機」，他一躍而升，在 1981 年成為了「台灣省政府主席」。然而，這樣的際遇並非發跡的終點；

[117] 「他[李登輝]主張政府應該採取開放的態度，接納並鼓勵各種文化，使其蓬勃發展。他不僅發揚台灣文化，也引進世界各國的文化，以免落人口實，說他背離中國的傳統」（柯義耕 2008：170）。

在 1981 年至 1988 年短短七年時間，李登輝更從與蔣經國搭擋組合的副總統職位，在蔣經國於總統任內病逝之後，繼任成為了台灣的總統，攀上權力巔峰。

本節次欲爬梳整理的李登輝生命歷程，是他在接任台灣省主席至繼任總統前的仕途高速攀升階段。重點包括了如何能夠順利當上省主席？為何能夠進入接班梯隊，幸運接任副總統職位？以及在這一段時間李登輝所處的台灣社會，面臨了什麼樣的民主推展窒礙，又是如何捲起迅速變遷的浪潮？

其次，除了面對國政重擔漸漸逐日移轉到李登輝身上的「公事」責任之外，向來重視、珍惜家人生活的李登輝，其實也幾度面臨了家庭中不論好事、壞事的三溫暖心情。從過往李登輝走過的足跡來看，他在工作上的卓越表現，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來自家庭的溫暖與穩定。政治事業如旭日東昇、前途一片光明的李登輝，遭逢愛子驟逝的時刻，是如何跨越心中的痛，從而化悲憤為力量，用著一生懸命的心，來為台灣奉獻、來為百姓服務？亦是我們所共同關心的。

第三，李登輝在 1960 年代開始認真接觸的基督教信仰，在此生命階段，又再次粉墨登場；不過，此次的信仰故事，卻直接與「政治」產生關聯。當信仰不再純粹，成為了政治上可茲利用其中工具，虔誠如李登輝，該如何適應與運用他與宗教信仰間的關係？在私人心情上，宗教有否同樣引領著李登輝走出傷痛？與基督信仰結下不解之緣的李登輝，這些當然是觀察的主要重點。

最後，如同孫文所說：「生命的意義在於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1980 年代承受喪子之痛的李登輝，送走了愛子冰冷的身軀，卻也同時承擔起扶養、教育年幼孫女的重責大任。李坤儀的出現，深遠影響了李登輝往後的人生。

一、 白髮人送黑髮人

> 不過，此時李[登輝]家簡直像是有惡魔逼近似的，與理想的對象結婚、過著幸福日子的長子[李憲文]，不知原因經常性流鼻血。原本是細長臉、瘦高身材的他，似乎變得更瘦削了。夫婦倆[李登輝夫婦]趕緊催兒子去親戚開的醫院就醫，當場就診斷出是鼻咽癌。雖然只是兩公釐左右的腫瘤，聽到是惡性的之後，夫妻倆都感到全身顫抖。（上坂冬子 2001：135）

在接著敘述李登輝粉墨登場「台灣省主席」這個職務之前，我們先將關注的點，聚焦在一如前段揭示——李登輝的家庭情況上。在 1981 年，李登輝任職台北市長尾聲之際，李登輝的內孫女（唯一的）——李坤儀（小名巧巧），[118]翩然降臨到了李登輝的家族之中。孫女的誕生，除了是李登輝家族中的莫大喜悅，更是李登輝的兒子——李憲文，象徵身上血液的延續以及生命之火的持續傳遞。[119]

按照常理來說，年方壯年、三十出頭歲數的李憲文，在喜迎第一個寶貝女兒李坤儀的出生後，應該仍有許多機會能在不久的將來再次計畫迎接家庭中的其他新成員誕生；但是當時候的李登輝家族，顯然不敢寄望於這一種期待與想像。因為就在這個時候，李憲文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與其期待下一個新成員的到來，倒不如將所有的心思都置放在如何抵抗、擺脫李憲文身上揮之不去的可怕病痛。

在李憲文面對病魔襲擾的情況下，李坤儀能夠平安、健康的誕生，虔誠信仰基督如李家人而言，已是「主」莫大的祝福與恩賞。就這麼地，以李登輝為首的李家人，沈浸在李坤儀誕生所帶來的幸福喜悅沒多久後，旋即將所有可能的關注與心思，再一次全部回到了李憲文實已孱弱的身軀之上。以結果論來說，李坤儀此時此刻的出現，實質上因而形成了自此以後李登輝能夠堅持走在公共事務路上、從事日益繁重的政治工作，一個至為重要的憑藉與內心有所依靠的關鍵。

話題回到台灣省政府主席這個職務。早在 1978 年李登輝即將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卸任、轉向可能接任其他職務之際，台灣省政府主席就一直是李登輝心裡頭預期自己可能榮任的一個新職位。原因在於過往在李登輝擔任政務委員期間，曾經多次陪同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下鄉訪視。在這段漫長的訓練養成中，蔣經國

---

[118] 「不知是幸或不幸，李登輝在上任省政府主席的一週前，長子憲文初為人父。一九八一年八月六日出生的坤儀，小名叫巧巧，李憲文抱著襁褓中的女兒時，求生的意志想必是十分強烈吧」。（上坂冬子 2001：138）

[119] 「何既明[李登輝友人、李憲文叔執輩]此時輕輕的敲著桌子回想道：『我在憲文住院初期就去探病，……我還記得當時這媳婦[李憲文妻：張月雲]懷孕，肚子逐漸大了，心想能留下香火，也算是最起碼的安慰吧』」。（上坂冬子 2001：140）

偶爾說著若有似無的隱晦詞彙，[120]讓李登輝體認、或說「錯覺」到自己或許是當時「權峰」正在考量（打量）未來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的可能人選之一。[121]

不過就 1978 年的時空背景而論，當時候相較李登輝的資歷尚淺、不曾擔任任何行政首長職務的歷練來說，國民黨政府中顯然有著各方面經歷勝過李登輝許多的優秀行政人才，其中當包括了同樣是台籍政治菁英的「林洋港」。[122]在李登輝未必有機會證明自己的能力足以出掌台灣省政府主席這個重要職務前，原任台北市長的林洋港，先李登輝一步、進駐了位於南投中興新村的台灣省政府；出缺的台北市長一職，則由蔣經國欽點，讓可能的台灣省主席人選之一的李登輝接任。

雖然李登輝未能在離開政務委員職務後，一躍而上成為台灣省政府主席，只能先在台北市政府歷練市長這個職務；但或許也正是在台北市長任內打下的良好基礎與實質政績，讓蔣經國再無懸念地讓李登輝順利入主「中興新村」，成為李登輝心念許久的台灣省政府主席，繼而真正進入了「核心」團隊之中。

進入核心，一如上坂冬子所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管喜不喜歡，既然被納編到權力核心，只好順其自然的去開拓自己的人生」（上坂冬子 2001：137）。10 年的從政黨員經歷，李登輝確實搭上了飛也似的仕途直達列車；在蔣

---

120 「我[李登輝]知道在這裡他[蔣經國]要考慮一個問題：究竟是要讓我還是林洋港擔任台灣省主席？他沒有明白地講過要讓我當省主席，只是說過要一個農業的人才。之前我擔任政務委員時，常常陪他到鄉下去，他就一邊跟我說明，省政府應該要如何做，農業問題最重要等等」。（李登輝 2008b：50-51）

121 關於李登輝在即將卸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一職前的預判以為自己可能會轉接任台灣省政府主席一事，尚有鄒景雯整理的《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中的一種說法：「後來李登輝聽說，蔣經國當時原本要直接派李登輝就任省主席，卻遭到黨內反對，有人質疑李登輝政治經驗不夠，面對省議會恐怕不妥。是誰反對？李登輝心中有數，也立定了自我鍛鍊的決心」（鄒景雯 2001：58）；另一說則出現在上坂冬子所著《虎口的總統》中提到：「蔣經國當上總統後[1978 年蔣經國上任初期，李登輝時任政務委員]，似乎一開始就有意讓專攻農業的李登輝當台灣省主席。李登輝在擔任政務委員期間，經常與蔣經國一起去探訪農村。當時蔣經國曾很婉轉的點出，李登輝如果坐上省主席職位，整個台灣的農業就有可能升級」（上坂冬子 2001：136）。綜上，筆者認為在正式由蔣經國宣布當時即將新任的台灣省主席前，李登輝其實一直都是抱持著可能就此歷練此職務的心態。

122 林洋港當年是當時台灣一位重量級的本土型政治人物，無論出身自基層的選舉歷練，或是歷練重要職務均走在李登輝之前，然「林洋港是個高談闊論型的政治人物，這在仍是家父長制的國民黨反而是一項政治負擔。林洋港最高學歷為台大學士，雖然他也能使用日語，不過未曾接受過西洋文化洗禮」（蔡石山 2007：222）；正、反激盪下，最終沒能擄獲蔣經國更重要的倚重之心，卻也因此埋下了在 1996 年首度開放總統直選時，與李登輝正面對決、激烈競逐總統的原因。

經國用心栽培、輔以層層把關下，大大縮短了一般人歷練政治職務「站」與「站」間耗費的大量時間。一時間，李登輝躍升成為全國性的政治指標人物。[123]

李登輝榮任台灣省政府主席，本應當是舉家歡慶、甚至心緒沸騰的大喜之事；無奈隨著李憲文的癌症病情加重，此時的李登輝家庭其實是處在不安與震盪的情境之中。一般來說，對所有重病患而言，能在台灣首善之都的台北市就近倚靠醫療資源照護，是更符合病患本身的需求與家人們期待的。就這麼的，李登輝的夫人曾文惠女士，因而無法走遠、必須專心留在台北照顧愛子；[124]李登輝雖然新逢要務，卻也只能隻身前往位於南投的省政府就任，暫時與家人們分隔兩地。[125]

細數過往的李登輝，也曾為了前途發展、為了精進所學，兩度離家赴美求學；即使那是在孩子們更年幼的時候，他仍然義無反顧，清楚明白那是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所必須做出短暫與家人們別離的犧牲。但這一次，情況大大不同。即使台北到南投的路程，絕對與台灣、美國的距離之遠不成比例，李登輝在公忙過後、閒暇之時，驅車趕回台北亦不過幾個小時之間的事情；可是幾乎呈現奄奄一息的長公子身體不佳狀態，可著實磨慘了李登輝向來的堅忍不拔。

面對省政府如麻的公事下，可以想見當時李登輝內心中的不安與煎熬。於此困難，他也只能做出取捨、表現出「大公無私」了。然而在家庭與公務之間必須做出取捨的李登輝，並沒有因為大公無私的表現，得到了反對國民黨的威權人士諒解，「李登輝出任省主席一事受到了許多台籍改革人士和激進份子的抨擊，說

---

123 「一九八一年李登輝被任命為台灣省主席，使他頓時從一個公職人員變成全國性的政治人物」（柯義耕 2008：177）。

124 話雖如此，但鶼鰈情深如李登輝夫婦，曾文惠女士雖然投入了絕大部分的心力留在台北照顧愛子，但面對丈夫李登輝就任如此重要職務的台灣省主席，心中恐怕仍舊沒少了掛記，「連日來，李夫人一頭忙著看護長子，另一頭又要費心關注甫任省主席極度忙碌的丈夫。李登輝首次出席省議會的早上，夫人偷偷塞了一張小紙條在丈夫的上衣口袋。『柳枝不因風折，奚落聲就當作柳枝迎風吧。』」（上坂冬子 2001：137）。這是作為妻子的一個貼心舉動，讓李登輝能充滿信心地面對猶如洪水猛獸的省議會議員質詢。

125 「李登輝夫人因忙於照顧生病的兒子李憲文，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台北，李登輝遂讓跟隨他自己由台北市轉到台灣省政府服務的其前台大學生黃大洲住進省主席官邸。直到兒子喪事告一個段落的1982年3月，李登輝夫人曾文惠女士才有較多的時間在中興新村陪伴貴為省主席的丈夫」（蔡石山 2007：210）。

他從一個技術官僚變成了國民黨政府的同謀，和一個在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以及高雄事件中殺害並壓迫台灣人的政權合作」（柯義耕 2008：178）。

我們不得而知當時李登輝心中最真實的想法，但或許，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李登輝。當已經歷練完「台北市長」這等台灣高階首長的職務後，於實質上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外省族群攏獲絕大多數政治資源]，已算是台灣人參與政治事務上，擠身足以榮耀祖先的菁英前段班了。顯然李登輝並未甘心於此；1981 年，年近 60 的李登輝或許就是秉持繼續找尋為台灣人民服務的機會，沒有因為家中遭逢重大變故，取親情、捨大義。痛苦，他選擇自己默默承擔，然後一肩扛起，迎戰省政府主席這個角色所應擔負的重責大任。

在趕赴台灣省政府就任省主席的這個當下，源自於李登輝在台北市長任內奠定的行政經驗與基礎上，總算不同於先前匆匆上任台北市長時，身邊沒有自己既有熟識的幕僚團隊，能帶進台北市政府；這個時候的李登輝，也逐漸培養出能夠信任有加、並且也在各行政領域中具備各種專業的一時之選幕僚。當然，對於「庭院深深」的偌大國民黨，李登輝絕不可能因為官拜省府主席，自此一舉囊括所有人事命令權；其權力基礎的背後，說穿了依舊架構在國民黨內的高層授意之上。

所以能否順利將李登輝自己過去在台北市政府信賴、培養的人才，一併順勢延攬至台灣省政府服務，依舊必須憑藉上級長官的允許、批准，方得進行。所幸事情的發展其實是超出預期地順利，「我[李登輝]還沒有到省府時，孫運璿院長就跟我說起了，他說要低調進行，要帶什麼人去先確定好，到時候再發表」（李登輝 2008b：116）。李登輝幸而得以預先檢討起自己身邊（當時台北市政府團隊為基底）有無適當一同前進台灣省政府工作的「人馬」，讓李登輝不顯孤單。

在能夠預先得到長官告知即將接任省政府主席、並且可以找尋適當幕僚團隊一起進駐省政府工作後，李登輝好整以暇地逐一挑選、檢整適當的人選為新的省政府團隊效命。其中包括李登輝從前的學生、曾跟隨李登輝在台北市政府任職研

考會執行秘書的黃大洲（後來擔任 1990-1994 的台北市長），以及黃振福、余玉賢、李振光、鍾振宏、蔡兆陽等人。[126]各就定位後，李登輝展開了他的拳腳。[127]

在管轄行政區域範圍僅次於中央政府的廣大幅員下，李登輝再一次展露他天生領導的卓越才能，認真治理起「台灣省政府」。於此階段特別值得一說的是，我們熟悉的李登輝向來是以「農業」專長見長，在進入社會謀職起步的當初，就是周旋在「台灣省政府農林廳」與「農復會」這些農業專責單位任事。若干年後，李登輝成為了手中擁有足夠的權力，去任命自己以往農復會時期的同事（余玉賢）出任「農林廳廳長」，這樣的成就程度，甚至遠遠超出是李登輝自己坐上農林廳廳長的位置。李登輝已不可同昨日而語。

此時此刻的李登輝，仕途順遂自是無庸置疑之事。只是老天捉弄，就在他正進入省府運作狀況、準備施展身手做好省主席工作之際，他一生疼愛有加、並且也才初為人父的愛子李憲文，就在李登輝成為省政府主席後的三個多月，不敵癌症病魔摧殘，結束了僅僅 32 年的年輕光輝生命，離開了人世、離開了李登輝的世界；留下了遺憾、留下了未能陪其成長長大的年幼未滿週歲女兒——巧巧。

> 原本遺體都是用擔架運送到太平間，據說李登輝當時是親自抱著長子的遺體到太平間。此時巧巧才七個多月大，李登輝始終沈默不語。兒子去世後，他也藉機把酒給戒了。為了孫女，他必須健健康康的活下去。（上坂冬子 2001：139）

126「當時我是有一些人事權，這些人並不是中央確定的。黃大洲本來是台北市政府研考會的執行秘書，後來讓他到省府擔任副秘書長。黃振福也是我帶進去的，擔任秘書處編譯室主任，……余玉賢是從農復會時就和他相識，我就帶他去省政府，讓他擔任農林廳廳長。李振光是警察學校畢業的。新聞處長鍾振宏、都發局局長蔡兆陽都是我從台北市帶進去的」。（李登輝 2008b：116）

127 李登輝之所以能夠順利地開始展開他省主席工作的遂行，除了「長官」的賞識、帶上自己的人馬赴任外，更重要的，當時候國民黨是台灣永遠的執政黨。無論是中央政府，乃至於次於行政院一級的「台灣省政府」，國民黨依舊在把關省政府施政及掌握預算通過與否的「台灣省議會」中取得絕對多數的過半席次，而「由於國民黨籍議員不論是表決投票還是政策質詢，都得嚴格遵循黨的政策指示，憑著黨籍議員的支持，李登輝可以順利推動他提出的政策」（蔡石山 2007：210），這是李登輝赴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得天獨厚的優勢與前提。

李憲文的死，無疑是一記對李登輝又重又沉的無情打擊。白髮人送黑髮人，在傳統習俗上，往往被視為是一種「大不孝」，也是一種生命無常的無可奈何；即使當時年未滿 60 的李登輝尚且稱不上老邁，但是自己的親生骨肉，就在這麼年紀輕輕、人生期待輝煌的情況下，嘎然而止、結束了夫婦倆用盡所有的愛來呵護的一個寶貴生命。即使堅強如肩膀總是巨大的李登輝，又豈能不慟。

遭逢此巨變，官運亨通、扶搖直上的李登輝，亦不得不在這個當口，開始思索自己往後的餘生是否有必要繼續留在政壇裡打滾，甚至萌生不如求去的念頭：「兒子的死讓李登輝認真考慮結束他的政治生涯，到台灣的山區去傳教」（柯義耕 2008：188）。所幸李登輝沒有持續糾結在退出政界的這個環節上，雖然「兒子的死仍讓他有好長一段時間陷入深沉的憂鬱與沮喪」（柯義耕 2008：188）；他將喪子之痛轉化為「在工作上儘量為國家、為人民謀求更多的福祉。我[李登輝]要將對孩子的這份愛擴大到更多的人的身上。」（李登輝 1988：172）。

二、　高官訓練場域的試煉

李登輝終究沒有因為愛子的辭世而選擇告別政壇，他的大愛，致使台灣社會因而「拾獲」一個在未來即將更加卓越、愈趨成熟，伴隨台灣民主大步向前的政治家。忍受著內心無比哀痛的李登輝，藉由「信仰」、藉由「孫女的嗷嗷待哺、等待長大」，也將對於長子從前的關愛，轉化成將為台灣社會付出更多心力的至要契機。接下來，筆者開始敘述李登輝在省政府主席任內主政的重要內容。

有別於「台北市政府」仍屬於「地方」性質的治理團隊，台灣省政府的實質功能與台北市政府大不相同。「台北市政府是一個單位，要做什麼都能自己做，省政府是在縣市政府之上[不包含當時北、高二直轄市]，重點在要如何叫縣市政府去做事情，這是不一樣的。當省主席和台北市長是不同的，所以我在作法上已經有改變了」（李登輝 2008b：116-117）。嶄新的任務，等待李登輝達成。

台灣「省政府和行政院差不多，權力、其他方面都差不多，錢也有、人也有，管的範圍又那麼廣闊」（李登輝 2008b：116），舉凡民政、財政、教育、建設、

衛生、交通、農林等等各大行政相關面向，[128]都設有人數眾多、分門負責的專職廳、處。面對身份上轉變與不同，掌握龐大省府行政機器，向來以農經專業見長、學有所成的李登輝，上任後同樣是將台灣農業問題置於優先建設與改革之項目。

一直以來對於台灣農業問題著墨至深，不時提出改革見解、建議上官改善農業基本政策的李登輝，任職省政府主席後，終於輪到他握住權仗，針對農業問題直接開出他診斷多年後的一帖良方好藥。「八萬農業大軍是我[李登輝]在省主席任內提出的一項想法，意思是只要在台灣建立起八萬戶的核心農家，培養他們在技術、經營方面的能力，台灣的農業問題就能夠解決」（李登輝 2008b：118）。

為了達成這項「理想化」的農業大軍政策，李登輝開始有系統的組織他的政策落實，「其中一項就是把部分核心農家的子弟送到嘉義農專、屏東農專培養，技術研究以外，還有農場的管理，加強他們經營方面的知識，這些都是免費的，……第二項就是設立『神農獎』，主要是用來鼓勵傑出的農家，大部分得到獎的人都是核心農家」（李登輝 2008b：118-119）。

於此同時，專心推動農業政策革新的李登輝，也逐漸發散出政治家的氣息與高度，他不僅只關心為數眾多的主要從農主力：中壯年男性農夫，也注意到了「女性是第一打拚、第一認真，卻沒有人得到鼓勵，所以第二年開始設立『農家婦女獎』。再來就是『農業青年楷模』，用來鼓勵年輕人」（李登輝 2008b：118-119）。李登輝關心的範圍擴大了，對於普羅大眾的各個階層或年紀，從他農業政策的執行上，可以看出在邁向成為政治家的路上，他正逐步蓄增、積累他日後的能量。

當然，在 1980 年代初期以前的台灣，百姓們主要在勞動上的大宗職業，農業正是其中之一，[129]並且重度依賴；也因此有了「以農立國」的美名之稱。但事

[128] 台灣省政府，精省前組織（維基百科 2018b）。

[129] 依據「民國 69 年第三次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1980 年 12 月 28 日] 全面普查[台灣總人口數為] 18,029,798」（維基百科 2018c），也就是 1981 年李登輝任職台灣省主席時，台灣人口約莫有 1,800 萬人，而其中「農業人口近二百萬約占台灣總人口的 15%」（蔡石山 2007：211），以實際從事勞動人口的人力來說，15%已然佔了相當大的職業比重。當然當時台灣正面臨經濟轉型，農業勞動人口逐日遞減；隨之而來的，是在「1981 年，李登輝接任省主席時，台灣產業的工人已達二百五十萬人，約占當時台灣總勞動人口 40%，其中多數產業工人受雇於紡織廠與電子裝配工廠」（蔡石山 2007：212-213）。

實上台灣的農業經濟、勞動環境卻面臨每下愈況的情境，比如「生產過剩」、「農民收入普遍不高」，這些沈痾已久的惡劣環境，不會因為李登輝的一項「八萬農業大軍」政策而使得整體的農業勞動環境因此迅速提升。當一個台灣省主席，要面臨的農業問題挑戰，也不可能只有端出「農業改革政策」這一些所謂「牛肉」。

具體而言，李登輝為了達成他農業革新的雄心大志，「任內至少推動了十八大項具體政策……很顯然，李登輝省主席試圖將他在愛荷華州立大學與康乃爾大學書本上所學到的理論運用在他自己的國家。不過他的省主席施政成果顯然不如預期，……因此即使李登輝用心良苦，精心規劃，外界對他努力推動的農業改造計畫成果評價，褒貶不一」（蔡石山 2007：212）。當然，這也未必苛刻地硬是要冠上「李登輝於省主席任內最終失敗收場」的罵名，只是台灣農業問題的嚴重情形以及亟待改善的部分，遠比李登輝理想化的「想像中」要來得更加複雜多了。

台灣省政府主席的工作，除了農業問題的迫切改善之外，同時也存在著其他各式各樣的民生問題必須面對。例如長期困擾台灣的水患問題：「行政院長孫運璿要我[李登輝]執行兩項事情：第一、解決二重疏洪道的問題；另一項是為了保護德基水庫，做好水土保持，必須將大甲溪上游一百二十公頃的果樹砍除」（李登輝 2008b：129）、也例如鐵路建設：「北迴鐵路有做，但是南迴鐵路沒有做。所以我[李登輝]在省政府的時候，把南迴鐵路接起來，這樣鐵路網才完整」（李登輝 2008b：134-135）、以及「整頓省營事業」（李登輝 2008b：138）等等。

總括來說，省主席的工作多且繁瑣，少有人有所能耐能夠面面俱到、完成所有人的期望與期許。歷練省主席職位後，是否能成為再上一層樓的基礎，看的往往不只有省主席任內當有的政績表現。就好比李登輝曾說：「省主席是當官的人的『中心』[高官訓練中心]，是最後一個階段，做得好，就會再爬上去。謝東閔當上省主席，是第一次由台灣人當省主席，後來他還做到副總統」（李登輝 2008b：146）。是以如何界定「做得好」？如何再「爬上去」就是一個有趣的議題了。

三、　躍上副總統職務的最後關鍵

既然不一定是具體的有效政績（如前述所提，李登輝省主席任期評價實則褒貶不一），讓經歷過省主席職位的人有機會再往更高的職務上去，那麼此一得天獨厚的職務歷練、魚躍龍門的墊腳石，什麼才是真正關鍵影響了李登輝未來仕途發展的決定因素？面對李登輝政治生命在省主席職務後依舊璀璨發光，筆者必須慎重地找到李登輝接續接任「副總統」職務的主要可能原因，而非僅僅相信李登輝自稱的「勝任愉快獲肯定」（李登輝 2008b：144）；當然，這也是此一擔任省政府主席的李登輝生命歷程階段中，饒富趣味的重要記事之一。

> 蔣經國之所以決定推動台灣政治的自由化，也是受到一連串國內外事件的影響。……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林義雄的家人與美國學者陳文成先後遭到暗殺，再加上國民黨內的外省人士逐漸老邁，於是蔣經國便認定：唯有擴大招攬台籍人士，國民黨才能夠繼續維持它的統治地位。（柯義耕 2008：197-198）

說巧不巧，「李登輝是在美台關係最低潮的時期，邁向他的學術和政治生涯的巔峰」（柯義耕 2008：178），觀察李登輝仕途上的平步青雲之路，應從當時威權統治時代下的唯一巨人——蔣經國的角色中切入。在以蔣經國為首的威權體制，任何高官職務的任命、遴聘權力，都只集中在其一人之手。大權一把抓的情況下，莫說是台籍政治菁英的仕途，就連壟斷絕大多數政治（國家）資源的「外省權貴」發展亦是如此。這是自蔣介石時代即已樹立的「非常權威手段」。

所以選擇讓誰站上猶如一人之下的「副總統」高位，說到底，其實就是蔣經國一人說了算。易言之，只要蔣經國認定是正確的，他往往會傾心力排眾議，讓事情順著他心中想要的方向去發展。換句話說，蔣經國在位的日子裡，誰能夠獲得其青睞，才是能否有機會躍上高位的唯一保證，再無其他。

因此李登輝何以在省主席任內獲得蔣經國的信賴，最後拔擢成為副總統人選？這些或許正是李登輝走向權峰的真正關鍵。在接續下一個李登輝生命歷程——副總統階段前，我們聚焦在「蔣經國總統」、「李登輝省主席」此期間的互動，一窺李登輝是如何突破重圍、晉升高位。

事實上，台灣省政府主席直到 1994 年改制成「民選省長」前，基本上都是由中央政府所派任的政務官，隸屬行政院所管轄；也就是李登輝省主席的頂頭上司應是行政院院長，而非總統蔣經國。雖然所謂「官派」人選的背後權力，從來都是牢牢握在蔣經國的手裡，也就讓這其中形成了微妙的互動關係。按理說，行政院長是能夠直接指揮台灣省主席，但所有人都明瞭，真正駕馭李登輝的大老闆，就是蔣經國總統，更直白地說，就是一般所稱的「國王人馬」。

再者如同李登輝所言，「台灣省政府主席」向來被視為升官的訓練場域，所做的一切，除了對老百姓能所交代之外，其他說白了，就是「做給蔣經國總統看」而已。植基於蔣經國的欽點，李登輝當然是他其中所看重的人，也就自然地時不時注意與關注李登輝在省主席任內的各項表現。於是乎看似職務上沒有直接隸屬的總統、省主席，互動卻不因此而可能減少，反而有著多於常人的緊密互動。

柯義耕觀察說：「凡此種種，李登輝都在一旁冷眼旁觀。此時的他不但是台灣省主席，也是總統的密友。身為省主席，他每個星期都要和蔣經國見幾次面，和他討論各種構想與政策」（柯義耕 2008：195）。可見即使身處內地、戮力從公的李登輝，並沒有因為些許車程上的距離，而遠離了台灣政經權力所在的台北核心；好比李登輝甫就任台北市長時，蔣經國常至李登輝市長官邸走動一般，蔣一如既往，持續花費心力在培養與教導他所重點栽培的台籍政治菁英——李登輝。

然而單純憑藉蔣經國的青睞、賞識，其實還不足以能夠真正做到「服眾」。無論如何，拔擢李登輝成為省政府主席，已經是蔣經國個人意志的十足展現；在許多人覬覦，以及希望有所比拚的「副總統大位」，又豈能讓加入國民黨其實並不算久、黨齡比之尚淺的李登輝，如此簡單、又似順利般攀登。來自國民黨內的各種雜音自是有的。於是乎在這個關鍵、動盪的國內政局紛擾時刻，李登輝曾經意外披上的「台獨」衣裳，再度浮上檯面，成為有心人士議論的重要論點。

「國民黨的大老們卻反對這項任命[李登輝接任副總統]，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認為李登輝私底下可能支持台獨，要不就是對台獨人士過於同情」（柯義耕 2008：196-197）。是的，當反李登輝人士大力指責李登輝的國族認同時，若沒有

一個好的說辭與及作法，恐怕很可能成為李登輝歷練省政府主席後，阻礙其進取的莫大絆腳石；蔣經國即使權傾一時，但面對國族認同此般大事，可能也必須考量輕重，選擇真正對於中華民國這個「神主牌」認同的其他可能副總統候選人。

或許知道自己終須表明心意並竭盡所能的輸誠，以謀求將來更大的發展空間及政治上的各種可能，「一九八三年年尾，李登輝在省議會當中公開譴責台獨，使得那些反對他的國民黨人士啞口無言。陶涵在書中指出：『他在省議會中致詞表示，中國從未放棄台灣，台灣也永遠不會忘記中國。這使得蔣經國非常高興』」（柯義耕 2008：197）。[130]李登輝副總統寶座的門票，總算拿得十之八九了。

事實上在這即將改選新任國家正、副元首的關鍵時刻，除了現實上蔣經國連任總統是「理所當然」之外，實力足以問鼎副總統大位的國民黨人選，自然不會只有李登輝一人。[131]例如時任副總統的謝東閔、時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早李登輝一步歷練省政府主席、當時任職內政部長的林洋港，以及其他優異的無論台籍或是外省籍國民黨人士等，可謂群雄並起、人才輩出。所幸「蔣經國決心繼續推動『本土化』，也就是『台灣化』，以降低台灣社會日益緊張的對立情勢。換言之，蔣經國挑選的下一個副總統搭擋肯定是台籍人士」（蔡石山 2007：222）。

在排除「外省籍」的可能人選之後，接任副總統的可能人選自然縮小，「但從省籍、教育、體格、行政經歷、宗教信仰與國際經驗等綜合判斷，這些人的條件顯然都不如李登輝」（蔡石山 2007：223）。李登輝在省議會中大聲洗白自己確實不支持「台獨」運動後，一時之間，似乎確立了就是接任副總統的不二人選。

---

130 但如此慷慨激昂的反台獨言論，絕對是刀切豆腐兩面光的事情；安撫好以蔣經國為首的當權派，自也同時將反蔣改革人士們大力地往外推，可想而知「這番言論卻激怒了海外的流亡人士。他們批評李登輝太過軟弱，無法在國民黨中捍衛台灣的利益」（柯義耕 2008：197），這些都是李登輝必須獨自面對的嚴肅問題。

131 在李登輝任職台灣省政府主席的 1983 年尾聲階段，隔年的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名單，成為了台灣各地方熱烈討論的話題：「1983 年秋天之後的幾個月裡，台灣各地政治敏感的人已開始談論蔣經國將選誰當副手的問題，1984 年 2 月初，各種猜測人選紛紛出籠。自 1978 年擔任副總統的謝東閔同樣有台籍背景，不過普遍被認為年事已高。……其他被認為可能出線的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還包括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孫運璿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技術官僚，……其他較有力的台籍人選，呼聲較高的是南投出身的林洋港。林洋港也曾擔任台北市長與台灣省主席，當時為中華民國內政部長」（蔡石山 2007：222）。

為了維護國民黨在台灣統治的正當性，當權者必須審慎檢視所有有利統治的一切手段，尤其是在面臨國際情勢不斷險惡的情況下，推動「本土（台灣）」化，成為了不可逆的不二法門。蔣經國自己就是一位十足標準的外省籍，掌握了黨與國家機器，絕不可能鬆手放棄。於是乎「副總統」選擇任用台人，也就順利成章成為了蔣經國精算過後能釋放出的最大誠意，以確保能夠安撫台灣人民的心。

回顧自 1972 年時，過往從政經歷猶如一張白紙的李登輝，在短短 10 幾年間，受到了蔣經國破天荒的苦心栽培與照顧，如同李登輝自己回憶所說：「蔣經國很照顧我，他對我很特殊，在我做副總統以前，擔任市長、省主席期間，他對我已經非常關心……他和我又沒也什麼關係。他不會把人情賣給你，而是在重要的方面幫助你，讓你好做事。他是用這種方式培養我」（李登輝 2008b：153-154）。

一路的看顧與費心教導，蔣經國至終將李登輝拉拔到僅次於自己之下的副總統高度，實際上是有其脈絡可循的。當然，要說這是蔣經國的私心，卻也是源自於李登輝自己多年來苦心奠下的基礎，[132]也才可能自此讓蔣經國放心，讓省主席李登輝，更上一層樓成為了 —— 副總統李登輝。

第四節 此一時期國族認同狀態分析

在本文為李登輝人生階段的分類上，完成了前述兩個不同階段的生命史分析，李登輝的國族認同，也由原先第一階段的「日本認同」，轉換成為具有省籍意識的低強度「中國認同」。而前述二者，我們也看到了皆是處在 Cross 黑人化認同模型中的「前遭遇期」之中。接著，順著李登輝生命史的發展，在本段落李登輝來到了人生即將踏入嶄新職場的始端，接觸他以往未曾深觸的政治事業領域。

在本文分類上涵括 12 年的進入國家體制內從政早期，筆者找出了三大項最為相關於影響李登輝此階段國族認同的表述，依序是：「中國認同」、「專注公

[132] 蔣經國的「偏心」、李登輝的「苦心」，可以從「蔣經國還是偏好李登輝，原因在於他沒有太多的群眾基礎，不會藉著官位自肥，也不會利用職務上的好處來拉攏人心，培養自己的班底」（柯義耕 2008：196）這當中窺見一二。我們可以這麼說，李登輝的躍升，絕對不只單純蔣經國一心栽培、傾囊相授；也是李登輝從政來的潔身自愛，步步為營的影響所致。

職上的專業展現」，加上「省籍困頓的突破」。如此的評判基準，同樣如同前兩個生命階段相同，為的是更加聚焦在可能左右李登輝此生命階段國族認同呈現的狀態成因；當然，這也是決定本階段李登輝國族認同樣貌的關鍵所在。

表 4-1：本階段時代大事與生命史事件：進入國家體制內的從政早期

時間	時代大事	生命史事件
1971 年	10 月 26 日，台灣退出聯合國	加入中國國民黨
1972 年	9 月 29 日，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6 月，進入蔣經國行政院長內閣，成為行政院政務委員
1973 年	台灣實施「十大建設計劃」	
1975 年	4 月 5 日，蔣介石總統於任上逝世，由嚴家淦繼任成為總統	
1978 年	5 月 20 日，蔣經國就任總統	出任官派台北市市長，學習日本城市治理方法；但對政治事務如「台美斷交」、「美麗島事件」發生均選擇噤聲，不表達意見
1979 年	1 月，台灣與美國斷交	5 月 3 日，長子李憲文完婚
	4 月，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	
	12 月，爆發「美麗島事件」	
1981 年		李憲文發現罹患鼻咽癌
		出任官派台灣省政府主席，正式擠身黨政高層核心之林
		8 月 6 日，孫女李坤儀誕生
1982 年		3 月 21 日，李憲文病逝，李登輝傷心欲絕，並且有了沒實現的告別政壇、成為傳教士想法
1983 年		於省議會表達堅決反對台獨立場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一、　中國認同

進入論述「中國認同」之前，筆者一樣歸結出三大論點：（一）成為中國國民黨黨員、（二）進入國家體制內任職、（三）公開表態不支持台獨，來支撐何

以宣稱李登輝呈現出中國認同的狀態。於此，我們首先看到第一個論點，1971 年李登輝「成為中國國民黨黨員」。

在上一生命階段裡，我們得知了李登輝自 1947 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以降，生命開始產生了籠罩於白色恐怖的高張陰影之下，一直到了 1969 年親身遭遇白色恐怖襲擊、警備總部上門帶走約談，李登輝一直處於內心惶恐不安的狀態之中。但這樣的困頓，同樣出現在李登輝的職場發展之中。

1968 年如願取得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的李登輝，在「一九六八年，李登輝不顧友人的勸導和警告回到了台灣」（柯義耕 2008：146），以為就此能夠大展身手的情況下，仍舊不得志於職涯上的發展。直到了「七〇年第十屆[國民黨]四中全會之前，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十分意外的約見李登輝，表示要聽取他對農村問題的看法，這是兩人第一次見面，李登輝當天侃侃而談，……此時，李登輝終於恍然大悟，『警總的約談，是蔣經國為了要用我所採取的洗清動作』」（鄒景雯 2001：55）。

接觸了權高一時的蔣經國之後，李登輝慢慢地釐清了為什麼自己成為白色恐怖攻擊的對象；也因為這層結緣的關係，李登輝漸漸想通了若是想要求得更好的發展，勢必要打破以往既有的保守學術行事準則，李登輝說：「我與蔣經國見過面後，他勸我加入國民黨，但我並不喜歡國民黨，也對政治毫無野心，老實說，心情是五味雜陳。但最後，我還是選擇置身體制內來改革台灣的這條路。對於經歷過白色恐怖時代的我來說，這樣的判斷或許是我潛意識裡認為：『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李登輝 2016：43）。

即使內心裡並不喜歡國民黨，潛意識中也知道那是個「最危險的地方」，為了尋求更好的仕圖發展，李登輝似乎也沒有其他相對好的選項，於是他開啟了往後長達 29 年的國民黨黨員生涯；再更深層的去看，加入國民黨猶如已經一腳踏進屬於政治的叢林，何況是「層峰」直接找上了自己。素來反感於政治的李登輝，如同岳母不希望看到他碰觸政治的堅決反對，李登輝的內心中想必有著更多的掙

扎，他自己也十分明白：「在那個時代誰敢提政治的話，恐怕連小命都難保啊」（李登輝、小林善紀 2001：71）。

不管李登輝基於什麼樣的理由，最終選擇加入了國民黨，這邊特別要指出的，國民黨除了是當時掌握國家機器的「萬年執政黨」外，更重要的，國民黨是社會上通俗的簡稱，它的全部名稱，是「中國國民黨」。將「中國」二字置於政黨名稱的最前頭，可以想見這個政黨與中國之間的連結，絕不簡單易辨。中國國民黨其背後代表的國族意識、信奉價值，也絕不是簡化成國民黨能夠完全詮釋。

如同黃鈺淳所說：「選在一九七一年加入國民黨，這個似乎默認國民黨堅持的光復大陸政策，當時國民黨政府透過黨國教育體制灌輸給台灣民眾的意識形態是自居於中國主流的」（黃鈺淳 2010：126）。也就是李登輝選擇加入這個以「中國」為名，並且持續灌輸台灣民眾應自詡為主流「中國人」的國家政黨，李登輝的內心中又怎麼會沒有「中國認同」。

在上述脈絡下，我們嘗試對照後來李登輝的生命歷程，回過頭去看後來的李登輝心中企盼的國家藍圖想像，怎麼可能在當時加入開口閉口都說「這個打壓本省人、施行排日教育的國民黨」（李登輝 2016：42）。或許，彭明敏的說法，提供了另一種不同的視角與解答：「他的入黨其實是理所當然的。但我認為，即使入黨，他的內心應該沒有改變。『他可以說是命中註定必須成為雙重人格者。……李登輝的體內，必定有做為台灣人的自我與做為國民黨員的自我經常在相互爭戰。他顯然是明知如此，卻仍毅然決然的選擇了這條雙重人格者的道路，不斷忍受雙方的批判而生存下來』」（轉引自上坂冬子 2001：192）。

承上，進入第二個論點；我們討論 1972 年開始，李登輝「進入國家體制內任職」。李登輝最終跨出了他前進政治領域的第一步，加入中國國民黨之後，並不等同於從此飛黃騰達、平步青雲。有了國民黨籍身分的他，依舊待在農復會與學術界中兩棲。當然，國民黨員身分的確立，的確帶給他有別以往的更加順坦。

1972 年 6 月上任行政院長、正式組閣的蔣經國，「就任命李登輝為行政院的政務委員，負責農業發展事宜」（柯義耕 2008：154）。也就是，「1972 年 6

月 2 日李登輝在紐西蘭的威靈頓出席一項國際會議時，台北傳出他將出任內閣職務的消息」（蔡石山 2007：173），這說明了至少李登輝已經能夠不再像從前從事學術工作時的處處打壓，能夠自在出國參加會議，並意外得到了入閣的機會。

這當然是一個意外的機會。李登輝先前從未真正進入國家體制內工作，況且加入國民黨亦不過是一年左右的時間，一進入象徵國家行政中樞的內閣之中，就成為了甚至略高於「部長級」的「不管部」政務委員。若不是蔣閣揆刻意提拔，沒有背景、沒有政治人脈網絡的李登輝，如何能有機會承擔此高官爵位。

面對突如其來的封官晉爵，「李登輝實在不清楚政務委員到底是什麼。結果當時二十二歲的長子說：『那是當完部長級的大官之後，沒什麼職位可安插的老人當的官。』意思好像是被打入冷宮似的。一邊兼任大學教授，一邊擔任政務委員的李登輝，只有四十九歲，是政務委員裡最年輕的」（上坂冬子 2001：118）。

是不是打入冷宮？我們很容易從後來的態樣發展，得知原來這一步只是李登輝日後攀上權峰的第一小步，李登輝往後的仕圖發展，遠高於此，也就是柯義耕所描述：「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八年這段期間，是李登輝生命中一個巨大的轉捩點。他從一個大學教授變成國民黨員，甚至擔任市長、省主席和中華民國副總統等職位，其間經過了層層關卡，也使得他對自己的定位和使命有了更清楚的認知」（柯義耕 2008：151）。

回到國族認同的發展狀態上。進入國家體制服務，甚至在此短短的十數年之間，由一個平民政治素人到 1983 年成為台灣省政府主席，上一生命階段甫進入「中國認同」的李登輝，是不是持續順利的發展其中國認同，如同服膺在此中華民國政府體制之下，順利地當起中華民國的大官？

吾人認為，此階段尚沒有李登輝在台灣與中國間做選擇的依據，筆者因此認為延續著前一生命階段進入的「中國認同」狀態，應是保守與相對可以採信的國族認同發展。與此同時，我們卻也必須注意到：「擔任省主席對他的內心卻是一大考驗。他一方面必須制定並執行國民黨的政策，另一方面卻要盡量避免洩露自己內心真正的意向和信念。這就好像是在走鋼索一樣」（柯義耕 2008：179）。

柯義耕又說：「雖然李登輝曾經為那些台獨和民主團體提供建議，但仍以與國民黨合作為要務，因為唯有如此他才能夠掌握權力，以和平的方式推翻這個外來的政權」（柯義耕 2008：180）。當然，這是柯義耕單獨與片面的觀察詮釋，他認為即使李登輝選擇進入國家體制中服務並且妥協於國民黨機器，心中念茲在茲的，是如何匍匐前進地期盼假以時日能夠推翻這個政權。

以上這個說法，筆者持相對保留到態度看待。筆者更傾向相信：「李登輝在此刻的認同較為沈潛，但整個社會開始迸發的本土文學論戰、政治開放等運動卻展現豐富的活力。因為身兼公職，李登輝在公開場合的發言上始終維持中國法統的基調」（黃鈺淳 2010：127）。事實上，能夠在短短 12 年間即從菜鳥國民黨員躍升為省政府主席，李登輝不僅僅需要具備過人的卓越行政長才，在「漢賊不兩立」的特殊威權年代，勢必也必須展現出十足效忠、認同中華民國的態樣。

於是，出現了關鍵的第三個論點所在，李登輝「公開表態不支持台獨」。台灣省主席的職務，是本生命階段中，李登輝進入國家體制服務的最後職位所在；蛋就其日後的仕圖發展而言，我們當然知道這大抵可以稱作是其官運風亨通的中繼一站。好比先前說過的：「省主席是當官的人的『中心』，是最後一個階段，做得好，就會再爬上去」（李登輝 2008b：146）。易言之，進入國家體制服務的大員，能否有機會再上一層樓，省主席職務的歷練成敗，成為關鍵的基礎所在。

那麼什麼是「更上一層樓」？在台灣的行政體系中，台灣省政府主席再上的職位，不外乎就是「行政院長」以及「正副總統」這些明顯高於省主席的重要職務；李登輝口中的「再爬上去」，大抵與這些職務脫離不了關係。當然在黨國不分的年代裡，總統以下其他五權分立下的「五院正副院長」，實質上的職位亦比緊緊擔任省政府主席再高，但所謂的排資論輩、接班梯隊，行政院長或是副總統一職，則最終更加可能朝向總統大位：國家領導人邁進。

在這樣限縮狹義的認定下，不難想像 1981 年官拜省主席的李登輝，的確有著對未來無限寬廣的仕途高聲想像。就在進入省政府的領域之後，李登輝自然必須面對代表民意的台灣省議會議員的各項監督與質詢。當時台灣省議會是一個倡

導台獨的黨外人士議員能夠發聲的絕佳管道，於此統獨議題經常在省議會上演。作為台灣人出身的省主席李登輝，統獨立場的態度自然成為省議員們關心的重點。

在當時那樣的社會氛圍與時空背景下，李登輝必須有所表態：「逐漸浮上檯面的台灣獨立問題讓國民黨當局相當頭痛，李登輝很自然成為國民黨避開這類批評的『避雷針』。每當黨外省議員提出是否支持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的問題時，李登輝總是以國民黨的宣傳口氣堅定說『不』，他進一步解釋說：『中國未曾拋棄台灣，台灣當然也不能忘卻中國』」（蔡石山 2007：221）。

這裡李登輝所說的「中國」，其實語意上相對的模糊不清，在相對「台灣」現屬中華民國的有效管轄之下，令人難以準確的判別其口中的中國，是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李登輝進一步地說：「他的祖先來自中國，他在血統上與文化上都屬於中國人，台灣是完整中國的一部分」（蔡石山 2007：221）。

雖然李登輝口中的中國，存在著曖昧與充滿解釋的空間，但能夠肯認的，堅定的「反對台獨」，以及「認同中國」，是時任台灣省主席李登輝特意彰顯地固有立場。不過此當中卻也不可免除其中一種特殊的角度：諸如李登輝身為從政黨員，積極傳達反對台灣獨立的立場，在威權統治的黨國體制之下，又有哪一位在朝為官、尤其是高官的國民黨公職，膽敢做出不一樣的意識形態與國族認同詮釋。

回到李登輝此生命階段最後擔任的職務上。顯而易見，仕圖已然順遂的李登輝，「被任命為台灣省主席，使他頓時從一個公職人員變成全國性的政治人物」（柯義耕 2008：177），這也意味著台灣人省主席李登輝，有了更多在政治場域上揮灑空間的機會。1983 年間，蔣經國總統正準備進行再一次的總統連任選舉，傾刻間蔣經國的副手人選，成為政壇上眾所議論的焦點所在。最終李登輝從國民黨內的中生代菁英中脫穎而出，與蔣經國搭檔角逐翌年的正、副總統大位。

李登輝是憑藉著什麼樣的出類拔萃，能得到最終蔣經國的肯認眼光？「當時台灣政壇謠傳，蔣經國之所以選擇李登輝當他的繼承人，是因為李登輝公開嚴厲批評台灣獨立」（蔡石山 2007：221），這或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蔡石山也補充說明道：「不過我們不能把這種傳言太過當真，因為在台灣獨立問題上，

李登輝與他當時主要政治競爭對手，內政部長林洋港，表達的都是國民黨的基本立場」（蔡石山 2007：221），意即李登輝的反台獨立場，未必突出於紛亂之中。

我們無法宣稱李登輝是因為積極傳達反對台獨立場，而出線成為副總統候選人；但我們卻能夠很是確定當時李登輝充分地展現出認同中國的這一個狀態，台灣認同於此刻也並未浮於檯面，甚至是找到反對的痕跡。但此一時期縈繞李登輝心中的，卻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之前心裡常常想不要把我抓走就好了。不過，當台北市長時就不會擔心這個問題了，等到當省主席就沒有感覺，因為如果我被抓走，問題就很大了」（李登輝 2008a：147）。

白色恐怖的恐懼，在 1969 年李登輝遭受警備總部密集約談達到最高峰。於此之後，即使加入國民黨、成為國家體制中的內閣官員，李登輝卻一直沒能除下心中的擔憂害怕，直至擔任台北市長、乃至台灣省政府主席之後，李登輝才慢慢地將之拋諸腦後。可見這件事情的嚴重性，一直不斷地苦惱著他。我們也可以說，表達「政治正確」，似乎成了李登輝在現實環境下自然而然做的直覺反應罷了。無論李登輝此階段中有無產生台灣認同，至少他都隱藏得十分美好，好到讓我們只有看到，他是義無反顧的認同中國並且堅定的反對台灣獨立運動。

二、　專注公職上的專業展現

此生命階段本文定位為李登輝「進入國家體制內的從政早期」。前述已有提到李登輝之所以加入國民黨、展開投身政治工作之旅，最核心的要件，乃在於蔣經國的角色，是蔣經國串起了李登輝從政的可能。於是，蔣經國在此一路上究竟給了李登輝什麼樣的啟發或說教導，讓一介學者、對政治環境完全陌生的李登輝，短時間內進入狀況，成為台灣省政府主席。此段期間，李登輝進入到了「專注公職上的專業展現」，也讓我們觀察到了三個大的成因，來架構李登輝此一生命階段的「專業展現」，分別是：（一）蔣經國學校的學習歷練、（二）持續選擇噤聲政治事件、（三）喪子之痛的續留政壇。

讓我們進入第一個「蔣經國學校的學習歷練」討論。我們在李登輝的自述中，清楚地看見了其如何慎重看待自己在蔣經國身邊所學到的，以及他所感激懷念的：「我在蔣經國身邊當了六年的政務委員，雖然由蔣經國擔任主席的會議常常伴隨著接連不斷的緊張，但這可真說是我的『政治學校』。我想，我身為理論家與政治家的成長，皆要歸功於自己在『蔣經國學校』的這六年」（李登輝 2016：45）。這是多麼至高的榮耀，李登輝即使在 2016 年的著作中，仍不忘蔣經國所帶給他的學習成長機會。

是的，李登輝從政的起源，正是 1972 年榮幸加入蔣經國內閣團隊起算。而上述中描述的「六年」，也就是李登輝初入政壇，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那六年。李登輝說：「這段期間，我在加速農村計畫、勞工的職業訓練計畫和石油化學發展計畫這三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每次一有會議，我都會事先想好，哪個問題結論應該怎樣才對。可是幾乎每一次蔣經國先生都會下不同的結論。換句話說，他會從『政治』層面來思考……那六年可說是我就讀『蔣經國學校』的時期，我學到的實在非常多」（李登輝、小林善紀 2001：73）。

「蔣經國學校」當然不是真的學校，卻是日後若有人形容李登輝成為了一名「政治家」時，追根溯源在李登輝身上種下的優良政治種子，來自跟隨蔣經國身邊學習到的政治層面思考。一如李登輝所說：「在那之前，我個人已累積了一些思想基礎，進入蔣經國學校，根據這些基礎鍛鍊能力，培養解決問題的方法」（井尻秀憲 2010：113）。

李登輝當然有心於政治事業上的表現，這是他意外獲得的不同人生體驗。在蔣經國學校的經歷與學習之下，李登輝一步步融會貫通地踏穩了他在台灣險惡政壇上的每一個步履；之後應用在台北市長任內、省政府主席任上，皆無往不利。只是這邊仍舊必須提醒，學者從政的他，一方面是有心於改善國家社會，祈望奉獻心力；另一方面卻也可能是：「他很清楚他所要打交道的人就是蔣經國，也明白唯有在蔣經國的羽翼之下他才能夠安全無虞」（柯義耕 2008：182），這般說來殘酷，卻又不失真實的硬道理。

延續前述所說，李登輝明白在那樣威權統治的年代，自己必須倚靠在蔣經國的羽翼之下，才能過上平靜且安全的日子。李登輝明哲保身的態度，成為了本生命階段重要的記號，也就是第二個必須提出的：「持續選擇噤聲政治事件」。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完全不難想像來自蔣政權給予的那一碗公家飯，端得絕不輕鬆。以致於李登輝更加專注地在政務上的專業表現，諸如前面提到有關國家體制內的職務交織歷練，他的確做足了工夫，也才換得所謂官愈做愈大的一片榮景。

除了白色恐怖留下的內心防備之外，李登輝從來也都明白在那樣民主黑暗的年歲裡，政治是他以往敬而遠之的陌生領域。但既然腳已踩進這個嶄新的公共事務範疇，許多事情也就由不得李登輝自己所能做主。其中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前述提過他在擔任省府主席期間，大力宣示反對台獨的立場，那當然是再明顯不過的政治事件，或許那是一種「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真實寫照。

不過我們若是將關注拉長在此生命階段中，會發現，期初剛踏進政壇的李登輝，顯然並不外顯於政治事件的參與或發聲，反而是一頭埋進自己應擔負的專業領域中。以台北市長時期為例，1979 年 12 月，台灣發生重大的「美麗島事件」；在此之前，即使「曾是馬克思辯證唯物論的學生，李登輝感覺到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場政治風暴即將降臨，不過擔任市長的他仍全心投入市政工作，除非受到國民黨高層徵詢，他對急遽變化的台灣政治現實通常保持沈默」（蔡石山 2007：201）。一如前述也曾提過，面對 1971 年退出聯合國時，李登輝的態度亦是如此。

再次回到「美麗島事件」中，柯義耕（2008：176）就說到：「根據當時《中央日報》記者王景弘的觀察，在那次簡報中，李登輝『非常沈默』，『並未參與發言』」。是的，只要是有關「政治事件」相關情事，李登輝大抵尋著「沈默」與筆者所形容的「噤聲」，即使是件大到如前述的退出聯合國事件，或是 1978 年的「台美斷交」，李登輝的說法總是不脫這樣的範疇：「我是市長，做市長只是『黑卒仔』〔地位非常卑微〕，沒有什麼話可以說」（李登輝 2008b：113）。

選擇對政治事件保持沈默，是此生命階段中李登輝重要的標籤符號；正在政壇上展露光芒、亦步亦趨的李登輝，將更多的心力投注在本務工作的專業領域之

上，稱職地扮演好不同職務時所面臨不同挑戰的角色。這般地噤聲於政治，即使到了省主席職務後期，「1983 年 8 月李登輝偕夫人到美國從事友好訪問，……李登輝刻意與在美國的親國民黨勢力，及反國民黨勢力的尖銳對立中保持距離，即是面臨最令人厭煩難堪的情況，他也絕不顯露內心的疑惑與害怕，因為這隨時可能被國民黨的秘密警察察覺」（蔡石山 2007：219）。

源自於受到蔣經國的提拔與賞識，李登輝的仕圖發展向來令人羨慕或說嘖嘖稱奇。但即使猶如政壇明日之星的李登輝，仍舊無法輕鬆面對台灣當時權力結構錯綜複雜的高度壓迫，只能選擇惜字如金地看待任何政治事件。至於他的內心有否擺盪起任何相關國族認同？可能精明幹練如蔣經國，都未必能夠真正洞悉李登輝的想法。正如柯義耕提到：「那些曾經觀察李登輝施政表現的人士都說，他在市長任內經常使用一種日本式的模糊、微妙的語言來回答一些困難的政治問題，使人很難了解他內心真正的想法」（柯義耕 2008：180）。

接著，在本生命階段尚需探究的，是第三個重要脈絡，亦即：「喪子之痛後的續留政壇」。當李登輝在政治上的成就，已經漸入佳境，甚至擠身「權力核心之林」時，素來看重家人與家庭生活的李登輝，卻遭逢人生中少有的巨變發生；李登輝的長子李憲文，被診斷出鼻咽癌。「從最初被醫師診斷出來後，憲文只活了一年。原本遺體都是用擔架運送到太平間，據說李登輝當時是親自抱著長子的遺體到太平間」（上坂冬子 2001：138-139）。

台灣傳統習俗上最不樂見的「白髮人送黑髮人」，竟就赤裸裸地發生在時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的李登輝身上；可以想像，李登輝內心的不捨與必須承受喪子之痛的煎熬。於是，李登輝精彩的從政歷程，產生了可能隨時喊停的跡象。雖然「子喪」事件未必然直接與李登輝「國族認同」產生關聯，但李登輝是否續留政壇？則是影響其後國族認同發展的重要脈絡。於此，筆者認為此亦為重要的事件所在。

李登輝心痛長子的英年早逝，這是全天下父母都會有的自然反應與感傷，但自年輕及極度重視並探索「死生問題」，以為得到解答與救贖的李登輝，可能怎麼也沒想到，在面臨兒子已然嘎然辭世之際，自己依舊過不去心中的那道無形的

檻。第一時間的反應，就如上述提到李登輝「認真考慮結束政治生涯」，雖然當時李登輝也不過六十歲上下，未必來到了是必須退休的年紀。

最終李登輝沒有選擇自此離開政壇， 而是繼續在政治崗位上奮鬥，「李登輝最終發現，兒子的死激勵他對社會付出更多的心力，這便是其意義所在」（柯義耕 2008：188）。當然，也因為李登輝當時的決斷，我們也才有了後來的「台灣人總統」李登輝，而不是可能未必會出名的「傳教士」李登輝。

三、 省籍困頓的突破

在釐清第一段的「中國認同」成因，以及第二段「專注公職上的專業展現」之後，懸宕於上一階段形成的「具有省籍意識」的低強度中國認同，同樣衍生到李登輝此段的生命史中。那麼李登輝是如何突破「省籍的困頓」？主要原因有三，分別是：（一）吹台青政策的受益者、（二）國民黨內台灣人要角，以及（三）拔擢成為副總統人選。以下，將分別展開討論與分析。

省籍問題是李登輝自上一生命階段即關鍵影響著他國族認同狀態的因素之一，在本生命階段中，「省籍」依舊沒有遠離了他的生命；而其中能讓李登輝有著前述在公領域職務表現的機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蔣經國施行的「吹台青」政策，也就是本段討論的第一個要素，李登輝成為了「吹台青政策的受益者」。

這是一個有機會讓「台籍」政治工作者，得以進入國家體制內，擔任相較以往更高職位的動能所在。其中台籍的意思，也就是相對於來自中國「外省人」的台灣出生「本省人」；換言之，吹台青政策主要的訴求對象，就是台籍的本省人。也就讓李登輝的人生，再次遭逢因省籍是否正確而可能影響他的仕途發展。

源自國民黨政權在國際外交空間上接連的挫敗，政權開始呈現不穩定的飄搖狀態；於是就將「培養台籍政治人才」、國民黨走向本土化，當成蔣經國政府維持統治正當性的一帖良藥。李登輝搭上這一波吹台青的升官列車。1972 年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78 年升任台北市市長，1981 年更高升台灣省政府主席。

如此神速升遷的仕途之路表現，想來李登輝選擇加入國民黨的這個舉措，是一個再正確不過的明智抉擇，省籍問題困頓也自此消失。當然此之中最為重要的推手，依舊是蔣經國扮演了無可取代的角色；李登輝說：「從我擔任政務委員開始，蔣經國就要培養我，這是沒有錯的，我可以肯定地講」（李登輝 2008b：51）。

吹台青政策造就了許多優秀的台籍政治人才，進入這個偌大的黨國體制之中，各有擅長、各有表現，但此時的台灣社會氛圍，實際上也不得不迫使蔣經國必須這麼地做。例如先前提到的「美麗島事件」等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以及「台日」、「台美」相繼斷交的內外交迫下，國民黨的政權統治，一再遭受無限衝擊。這正是蔡石山所說：「諷刺的是，蔣經國越想要壓制黨外勢力，他就越不得不提拔更多像以登輝這些願意與他合作的台灣人到重要黨政位置上去，因為只有這樣，居於少數統治地位的中國人才能有效降低多數台灣人的不滿」（柯義耕 2008：203）。

最終無論「吹台青」政策的執行，有無達到蔣政權期待的效果，都讓原先因為省籍不是外省人的困頓李登輝，從此鹹魚翻身，成為了本省人在政治場域上的菁英代表。在這樣的感受上，或許李登輝總算可以感謝自己出身「本省」，而不再繼續懷疑人生；也因此讓李登輝能夠有所機會貼近不同的重要職務進行歷練與學習，並力求表現。這是歷史千變萬化的特殊偶然之一。

李登輝此段時期在台灣政壇上的快速躍進，是「蔣經國的提攜」、是「吹台青的政策」，也是「自身學術上的成就」、也是「與生俱來的省籍正確」。我們已於前述闡明李登輝在此一生命階段經歷過的國家體制中重要歷練，包括政務委員、台北市長、省主席等，這些都是屬於容易理解職位的經歷所在，也就是所謂擔任「公職」的部分。於是，本段落的第二個重點：「國民黨內台人要角」登場，即是要從李登輝擔任國民黨「黨職」的角色上切入，這是另一重要的發展脈絡，畢竟，李登輝身處的那個年代，是一個「黨政不分」的特殊年代。

承前所述，李登輝是在 1971 年正式加入國民黨，成為其黨員；就在李登輝 1972 年進入蔣經國內閣，擔任政務委員期間，「就叫我去競選中央委員〔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當時我從大安區選出來，投票三天前才通知我去參選。中央委員

由國民黨黨員投票選出，我只用了兩天準備，根本也沒什麼人脈。當時我是第二高票當選，但那都是黨中央已經規畫好的。……我也沒想到，踏入國民黨以後，我的地位會那麼高」（李登輝 2008b：13）。

一介學者成為國民黨黨員不過五年的時間，在沒有經營人脈的情況下，誤打誤撞第二高票當選了象徵國民黨內地位甚高的中央委員，不僅是李登輝料想之外的事，恐怕也讓多數關心國民黨發展的黨內資深人士，紛紛跌破眼鏡。在此我們必須理解的是，前述提過的「黨國不分」是一種混淆不清的模糊狀態；但更精準的用語，那是一個「以黨領政」的年代，也是李登輝必須加入國民黨的原因。

這麼說吧，所謂的黨國體制，代表著「政黨」凌駕於「國家」之上，真正掌握國家機器運作的那一雙手，與其說是「國家領導人」，更貼近事實的是掌握著「政黨機器」的政黨領導人。以 1975 年蔣介石逝世那一次為例，「嚴家淦自動繼位為總統，直到任期屆滿。此時，長子蔣經國就任國民黨主席，自此政務和黨務分離」（上坂冬子 2001：123）。

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接替了其父親蔣介石遺留下的國民黨領導人職缺，實際上才是實質掌握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一切的幕後黑手。也就在蔣經國接替成為國民黨主席之後的一年，李登輝被規劃／選舉為國民黨中央委員，這是又一次蔣經國用心培養的痕跡，想要在政務上嶄露頭角的國民黨員，同樣地必須先有重要黨職的頭銜或歷練，才得以服眾、才因而順利。

到了 1978 年，「此時全力投入市政工作的李登輝，因為卓越的表現受到肯定，所以在國民黨內早已不是一個泛泛的黨員。他已當上中央常務委員，擁有發言權」（上坂冬子 2001：130）。8 年間由黨員成為中央常務委員，這些都是李登輝想都不會想到的特殊境遇；然而，更特別的卻總似奇蹟般，在李登輝身上發生不完，李登輝已然不自覺地扮演起國民黨內舉足輕重的台灣人要角。

在這一波「要角爬坡」的高速前進列車，受到蔣經國的大力提拔與信賴；並受蔣經國之意，「成為外省人控制的國民黨與日益不滿的台灣人之間的溝通橋樑」（蔡石山 2007：205），李登輝的「台人」身分，顯得格外的突出與耀眼。時間

繼續往下走，「1981 年年底被任命台灣省主席之前，李登輝已不是一名農業專家或市政首長，此時的他已是一名熟練的政治家，是統治台灣的國民黨與黨外人士之間的重要溝通協調管道」（蔡石山 2007：205-206）。

第三個論述的重點，則是：「拔擢成為副總統人選」。李登輝受到國民黨內正式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是在本文分階段中下一階段的 1984 年時期，那麼為何特別在本階段已先提及成為副總統人選的部分呢？基於蔣經國決定李登輝成為其副手的關鍵，絕不會是在倉促之間決定，這是一個需要醞釀與觀察的冗長過程，端此，筆者決定讓這個決策過程置放在本階段中說明。

如同李登輝曾經說過：「一九八三年是我當省主席的最後一年，七月我在國民黨的中常會提出工作報告『省政向下紮根的做法』得到蔣經國的稱讚。……他怎麼稱讚成這樣？那時候大家就覺得這和普通時候不一樣，這就表示他很支持我。當時已經快要確定讓我當副總統，有這樣的意思」（李登輝 2008a：150）。

這個可能成為「副總統」人選的預兆，正好呼應前述記載李登輝曾描述「省主席做得好就會再爬上去」，戮力於省主席工作本分的他，可能也沒在當時有過「原來再上去就是副總統職位」的這種念頭。當然，當時副總統謝東閔，的確是從省主席職務下任後即升任副總統，並非無前例可循；但此慣例是否持續依循？這一點，沒有任何人有能力取代蔣經國回答；唯一稍微能確定的，只有前述曾經提過，此次副總統人選，「本省籍」人選出線的機率應高於「外省籍」的人選。

本省籍台灣人政治菁英當不止李登輝一人，吹台青的推動，提拔的更不只李登輝而已。然而知道了後續的發展，李登輝於 1984 年順利成為副總統，或許在諸多複雜因素考量下，「蔣經國還是偏好李登輝，原因在於他沒有太多的群眾基礎，不會藉著官位自肥，也不會利用職務上的好處來拉攏人心，培養自己的班底」（柯義耕 2008：196），李登輝因此得以從眾多一同搭上吹台青列車的台籍菁英中脫穎而出，成為了蔣經國欽點的副總統人選。原先省籍問題一度成為李登輝職涯發展上的夢魘，如今卻成了成為副總統的關鍵門票，或許這就是造化弄人吧。

第五節 小結

延續著前一時期國族認同狀態的探討，在李登輝建立了「具有省籍意識的低強度中國認同」之後，於此生命階段中，筆者仍舊判斷李登輝的國族認同狀態，是持續於「中國認同」的樣貌之中。其中關鍵的「省籍意識」，在本階段中同樣沒有消失。以下，更具體的說明評判本時期國族認同狀態呈現的緣故。

第一，我們從諸多的線索中，不斷看到了李登輝進入國家體制從政之後，表現出「認同中國」的外在形象。無論是從加入向來以「主流中國」自居、並宣稱代表法統的「中國國民黨」，成為其產物下平步青雲的從政黨員；或是在朝為官時，從來沒有表現出抵抗中國國民黨宣告天下的「反攻大陸、統一中國」指導原則；乃至於在省主席任內大聲宣告天下「不支持台灣獨立」等，在在顯示李登輝的國族認同正是「中國認同」，並無二致。況且，在此當中，我們卻也遍尋不著李登輝是否有著相關「認同台灣」的言行或處事作風。

第二，我們也許也能理解當時「身在朝中」的李登輝所面臨的政治現實環境壓迫，他幾乎不太有所空間能夠說出違反當權者一心一意胸懷壯志的「主流中國」。在白色恐怖年代吃過虧的李登輝，好不容易有了一展長才的機會，加上幸運進入「蔣經國學校」學習歷練，這份感恩之心，始終存在於李登輝的內心裡。在此情況下，李登輝選擇「噤聲於政治」，完全不會出乎意料之中。當然，中間遭逢「喪子之痛」，有機會讓李登輝重新思考了生命意義與職涯展望，最終他選擇續留政壇，將所有苦痛，昇華成為台灣百姓及社會付出的更多。

第三，若說上述第二點帶著些許李登輝於此生命階段裡的頓挫，那麼在此要提出的，就是李登輝的人生階段，進入了相對良好的「海闊天空」。「省籍困頓的突破」，為李登輝人生又一轉捩的起頭。黨齡尚淺的李登輝，也正式在 1978 年即成為象徵權力核心一員的「中央常務委員」；「吹台青」政策，讓李登輝在 1981 年成為台灣省主席這般容易家喻戶曉的全國性政治人物；更有看頭的，1983 年

中後，甚至成為極其熱門的新一任副總統任人選。於中華民國體制下可謂「大豐收」的李登輝，恐怕傾刻間也沒有多餘心力去認真思考更深層的台灣認同問題了。

另外，當筆者閱讀到：「在擔任省主席期間，李登輝開始覺得自己有責任締造一個獨立、自決、民主的台灣國，使得台灣人民可以選擇自己的領袖、為國家的命運負責」（柯義耕 2008：193），這樣的說法，是抱持相當程度的保留，吾人尚未找到更多有利支撐柯義耕的觀點或者相關論述。

本文的疏釐與分析之中，事實上是更傾向黃鈺淳所說：「不曾表達抗拒主流中國認識的立場，意即李登輝在七〇年代期間是否在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抉擇產生拉扯，並沒有明顯的答案」（黃鈺淳 2010：97）。承續黃鈺淳的話，更精確地說，筆者認為甚至是到了「80」年代初期，李登輝都尚未真正浮現有關台灣認同的意識形態，也就是此階段中尚難已找到李登輝內心中台灣與中國間來扯的真正答案。

中國認同的依舊存在，省籍意識沒有消失，是本生命階段的國族認同狀態呈現。而進入到 Cross 黑人化心理學認同發展模型之中，此時期仍然處於「前遭遇期」之中；然而在前一時期處於「低強度態度」類型的省籍意識中國認同，吾人此階段的低強度態度漸漸弱化，除了職業發展以外，其他有關「宗教信仰」、「家庭生活」等雖然依舊出現，但並非貫穿本時期的主要重點。細膩上來說，前遭遇其中，「省籍意識的中國認同」，是更貼近本時期國族認同狀態的說法。

最後，有關李登輝曾經在省主席任內期間，公開宣示不支持台灣獨立，在 Cross 黑人化心理學認同發展模型的前遭遇期裡頭，的確有一種類型叫做：「反黑人態度」，意即「有著反黑人態度的這些黑人，基本上對於所有有關一切因黑人而起的任何訊息，都是抱持著百分之百反對與厭惡的態度」，這種說法與李登輝堅決表達反對台獨立場確有幾分相似之處。

不過由於那樣的宣示在整個時期裡頭更屬於少數出現持厭惡與反對態度的個案，並非我們在其他爬梳中找到的關鍵主要敘述；在這樣的理解之下，筆者更相信在威權政府體制之內任職，並且力爭上游、希望再創人生下一高峰的李登輝，應當也是將反對台獨的論述，是為自己在官場上必須審時度勢而為之的偶發單一

事件，「反黑人態度」也就不列入本時期國族認同狀態的呈現之中，而是單純化地強調國族認同狀態為：「省籍意識的中國認同」。

第五章 輸誠表態、直上天聽（1984-1990）

延續著上一章節最後的李登輝生命史發展，台灣省政府主席李登輝，在成為熱門的蔣經國副手人選之後，不倚靠政績、不依靠背景，在做出常理上當朝為官者都會自然講述出的「反台獨立場」後，最後憑藉最有可能敲定副總統人選的「省籍正確」因素下，李登輝獲得蔣經國再一次提拔，成為了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

就在以黨領政的必然結果下，1984 年李登輝順利通過國民大會的正、副總統選舉，開啟了副總統職涯的新頁。李登輝持續接受著蔣經國的刻意培養與訓練，雖然只是有名無權的備位元首，卻開始蔣經國賦予他多功的任務型工作；例如代表蔣經國走進國際、拓展外交，例如熟悉因當是總統權責的國防、兩岸事務；也例如，成為與黨外人士疏通、協調的窗口。

蔣經國是基於什麼樣的心態在拉拔李登輝？我們不得而知。但能夠很確定的一點，蔣經國的身體健康，在他連任總統後，確實呈現日落西山、每下愈況。不過，任誰也想像不到，彼時不過年才 70 幾的蔣經國，就在任上嘎然逝世。李登輝因此繼任成為總統，這是繼「中華民國副總統」之後，更加強烈的中華民國標籤。當過日本人的李登輝，如今成為了中華民國的國家領導人。

這一個繼任而來的總統職務，當然無法使李登輝得心應手；帶著戒慎恐懼的心，李登輝必須設法讓自己坐穩這一個象徵領航中華民國的超然職務。李登輝在接掌國家機器的初期，遭遇到國民黨內長期以來作威作福的外省權貴集團抗拒，最後站穩腳步，平靜了黨內各山頭不斷進招的攻擊。想為台灣人做更多事的李登輝，挑戰了難度更高的委任總統選舉，終於成為選舉產生的第一位台灣人總統。

本階段的 7 年時間，雖然時間不若其他章節敘述生命史時涵括更長的時間；然而這段時間內，李登輝不僅僅成為中華民國的備位元首、繼任成為總統，更透過選舉當選總統。加上台灣歷經解除戒嚴，李登輝與外省權貴全面交鋒，以及影響台灣民主發展深遠的野百合學運等，都在這 7 年當中發生；短暫卻快速的變化，交疊著李登輝生命的調適與可能的認同波動，於是特別獨立此一章節敘述。

第一節 蔣經國總統欽定副手

1984 年的春天，蔣經國如火如荼地正在部署連任總統之路。同年「二月十五日國民黨第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李登輝]被提名擔任副總統」（李登輝 2008b：150）。於是乎先前許許多多人事卡位上掀起的紛紛擾擾、[133]諸多議論及揣測，自此算是塵埃落定。因為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人事案宣布，向來黨政不分、甚至是以黨領政的國民黨政權中，身兼國民黨黨主席的蔣經國總統於中常會中宣布副手人選後，也就形同李登輝直接當選新一任副總統了。

蔣家兩代父子所把持的威權政府，慣性利用實質虛假的委任正、副總統選舉，遂行自己的家業薪傳統治。意即當權在位者無論是先前的蔣介石、亦或延續其政權統治的蔣經國，一旦決定人選宣布後，其後的發展就會依照兩蔣強人的意識指引，接續召開由國大代表組成的國民大會，投票產生新一任正、副元首。[134]顯然國民大會的委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在蔣氏政權的有效掌握下，充其量不過只是走個該有的過場，形塑法律上當有的正當性。

以現在的角度來看，這種幾乎不會失誤的刻意操作與明顯違反民主精神的強勢主導，是不可思議的大開民主倒車；但只要想到這歷史共業的形成，存在於威權統治的兩蔣時代，似乎也就不再令人有所訝異。也就在這奇特的「蔣氏民主」制度下，台灣人李登輝因而順利地在 1984 年 5 月 20 日，與蔣經國共同宣誓成為「中華民國」第 7 任正、副總統。副總統的高位，在當時看來，無疑已經是終戰後長期把持台灣政府的外來政權，能夠賦予台灣人的最高職位了。[135]

---

[133] 這些諸多紛爭與紛擾，自也包括來自當時任職副總統的謝東閔，對此「李登輝苦笑著說，當時被換下的前副總統謝東閔（二〇〇一年四月八日歿），好像對他有些埋怨。……總之，在激烈的權力卡位戰中，李登輝已悠然的坐上副總統寶座了」（上坂冬子 2001：146）。

[134]「蔣經國對外宣布他的決定[提名副總統人選]後，正式的提名與投票選出都只是形式而已。確定獲得中常會支持後[以黨領政的實證]，蔣經國於 2 月 15 日正式對外宣布李登輝是他新的副總統搭檔，國民黨控制的國民大會 3 月 22 日投票選舉蔣經國與李登輝為新一任總統與副總統」（蔡石山 2007：223）。

[135] 李登輝並非第一位台籍出身的中華民國副總統，在其前任[第 6 任]副總統謝東閔，已在 1978 年伴隨蔣經國上任總統，成為台灣史上第一位台灣人出身的副總統；不過謝東閔具有「半山」身份，這一點與從未在日治時期前往中國發展、亦或工作的李登輝有所不同。

李登輝成為了蔣經國欽點的副總統人選，決定的因素與決策過程複雜；除了蔣經國刻意培養「台籍」人士進入政府領導核心、成為「樣板」之外，同時也透過拔擢「本省籍」的台灣人，傳達蔣經國「心」已在台灣，願以台灣為長久建設家園的堡壘。於此當中，同樣存在著一個可供議論的重要視角：面對國際情勢對台灣愈趨不利、社會上瀰漫民主改革的社會運動蜂擁，蔣經國意識到再不正視國民黨在台灣能否有著深耕的決心，恐怕即將失去在台灣統治的正當性。[136]

乘著這一股勢不可擋的浪潮，挾帶著省府時代表現不凡的省主席李登輝雀屏中選，從「人才輩出」、甚至「強敵環伺」的國民黨政治叢林中，穩當的站上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總統高位。進入象徵台灣最高權力機構的總統府工作，成為了備位元首；這樣的經歷，恐怕是當過日本人、經歷白色恐怖、受到外省族群打壓、一度看不見人生未來的李登輝所始料未及、無法想像的人生奇遇。

「學而優則仕」是形容優異學者選擇轉入政治領域工作的一句讚美話語，這句話用到李登輝身上似乎恰如其分。因為原本一個在學術工作上小有成就、並且醉心的他，在即將步入五十年歲大關時刻，才開始了真正接觸國民黨「一手打理」的台灣政治環境；短短 13 年間，做到了強人統治下的最高職位，無疑是將學而優則仕，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雖然，他從政之路的最高峰處，尚在後頭。

只是副手終究是副手，在台灣憲法規定上，副總統的角色清楚明白定義在「備位元首」的這個唯一功能。換言之，沒有實權、沒有固定任務，只是擔憂國家領導人萬不一在位時突然發生死亡意外，為避免國家因而產生動盪不安，需要有人暫時代行總統職務、讓國家能夠正常如舊運行罷了。再說，李登輝擔任的是大權一把抓的強人蔣經國副手，[137]各種限制與無所發揮長才，自是不難理解的情況了。

---

[136] 美國學者柯義耕的觀察說：「事實上，蔣經國之所以決定推動台灣政治的自由化，也是受到一連串國內外事件的影響。首先是尼克森在一九七二年訪問中國，接著美國政府又在一九七八年宣佈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一九七九年高雄事件[美麗島事件]爆發，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林義雄的家人與美國學者陳文成先後遭到暗殺，再加上國民黨內的外省人士逐漸老邁，於是蔣經國便認定：唯有擴大招攬台籍人士，國民黨才能夠繼續維持它的統治地位」（柯義耕 2008：197-198）。

[137] 李登輝曾清楚明白地說：「我的頭家是蔣經國總統，我和他之間並不存在分工的事，一切權力都在他的手裡。他很清楚副總統是備位元首，不會把每項事情都放手讓我去做，也不會說明哪些重點的事情要由我負責」（李登輝 2008b：154）。

李登輝自己也深刻地知道，「蔣經國期待李登輝能從副總統這個制高點來觀察國政」。……[但]『實務都是由行政院長或立法院長在擔任，所以正如蔣經國所說的，只是觀察國政而已。副總統的職位並沒扮演什麼特別具體的角色』」（上坂冬子 2001：146-147）。關於這樣的職位安排與角色認知，對於向來能夠知所進退、認清本分的李登輝而言，自也從來不會是令他產生困擾的事情。

回顧過往，李登輝總能在無論順境、逆境之中，找出一條最為適合自己的生存之道。扮演好一個「無聲」副手的角色，[138]李登輝無須多學、自也演出自然。但這一種角色期待實際上並沒有持續太久，很快地，蔣經國一一指示李登輝應該擔負的責任與任務，一點一滴的國家重擔正悄然移轉到了李登輝的身上。

在李登輝擔任副總統期間逐漸得到的任務賦予，當從影響其人生發展至深的「基督信仰」說起。在蔣經國刻意的指導之下，伴隨李登輝信仰至少走過 23 個年頭的聚會所，忽然大動作地轉籍到了長期以「反國民黨」[139]為其重要信念的基督教「長老教會」。[140]這是蔣經國沒有讓他的副手李登輝閒著當官的重要訊號，因為緊接著蔣經國就交付了李登輝成為副總統後所執行的第一個重要任務 ——釋放美麗島事件相關受刑人，[141]其中包括了隸屬長老教會的高俊明牧師。

在此有一個小插曲，「一九八四年，長老教會正準備迎接一百二十週年紀念（長老教會於 1865 年從英國傳到台灣）。台南神學院院長黃彰輝是李登輝高等學校的學長……黃院長告訴李登輝，今後宗教家不能只做單純的傳教工作，而是

---

138 關於「無聲」副手的角色，李登輝向來有其獨到的見解與心得，並且曾經分享給 2000 年取得政權、擔任陳水扁總統搭檔的副總統呂秀蓮：「最近〔二〇〇二年〕副總統呂秀蓮來看我時，我也跟她提醒副總統是備位的，除了總統有特別的指示外，儘量不要講話，也不要沒事『走來走去』」（李登輝 2008b：154）。

139 「反國民黨」指的是：「長老教會傾向於批評政治、批判國民黨。『我[李登輝]深知這一點，但我還是決定轉進長老教會。在批判國民黨聲浪極高的長老教會重鎮裡』」（上坂冬子 2001：148）。

140 基督信仰是李登輝成年發展過程中無可缺少的關鍵角色，面對「副總統」大動作轉籍的這件事，實際上自會引發關注與討論。

141 如同先前篇幅所曾提過的，在 1979 年的 12 月 10 日，台灣爆發「美麗島事件」。許多活躍、或說致力於推動台灣民主進化的改革人士，在威權政府的強力鎮壓下，羅織罪名、銀鐺入獄。這是貽笑國際社會的台灣國恥。隨著時間的滾動與前進，到了 1980 年代中期，「當時反對[反對國民黨的非民主政體]的力量愈來愈大，黨外人士也一天比一天無所畏懼。蔣經國因此要我[李登輝]和黨外人士溝通，第一就是讓我處理釋放美麗島人士的事」（李登輝 2008b：196）。

要深入社會多多接觸。……[李登輝]心想，宗教若要嘗試飛往更高的境界，或許可將宗教的提升與農業問題做結合，以利台灣的發展」（上坂冬子 2001：147-148）或許這正是李登輝在接收到蔣經國的任務賦予後，堅定他勇於接受挑戰的始末。

源自李登輝虔誠的基督教信仰，也因為「我[李登輝]和長老教會過去有一些關係。對長老教會來說，有個台灣人當副總統是很好的事，當蔣經國的命令出來後，就能直接傳達給他們。有我居間聯絡，對長老教會、對國民黨而言，等於彼此有溝通的管道和講話的機會」（李登輝 2008b：196）。

這一次的任務賦予與橋樑搭建，是李登輝開始擔負「溝通者」角色的起始。「蔣經國借用李登輝之手，釋放了那些主張台獨被關入獄的人士。接到這項任務的李登輝，為了釋放林義雄等台獨派人士，可說是東奔西走、竭盡心力。因涉及『美麗島』事件鋃鐺入獄的長老教會牧師高俊明，在此時獲得釋放，也是李登輝奔走的結果」（上坂冬子 2001：148）。所以除了因此得以深入「長老教會」外，實際上李登輝也開啟了其居中斡旋、與黨外人士密切交往的關鍵之路。

在 1986 年 9 月 28 日民主進步黨正式宣布組黨前，[142]反對國民黨威權政體的台灣社會運動人士，積極投入各項民主改革運作；包括了投入選舉、走上街頭爭取人民權益等。這些種種的抗爭、對抗政府舉動，對於既保守又守舊的威權政府而言，當然是視為眼中釘、與不可饒恕的事情。但由於台灣人民的覺醒，一呼百應的推動改革浪潮，「蔣經國對黨外人士和黨外的看法是愈來愈肯定、堅定，也不會想去壓制他們」（李登輝 2008b：199）。

時任副總統的李登輝，面對這樣特殊的情境，也認為「在國民黨裡面工作的人，很少人有志氣、敢突破勢力來表達並維持自己的理想。在國民黨的壓力之下，一些黨外人士敢出來說話，這點是很可敬的地方」（李登輝 2008b：199）。或許

[142]「1986 年 9 月 28 日，黨外後援會推薦大會於圓山大飯店舉行，一百三十二位與會人士簽名發起建黨，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民主進步黨網站 2018）。於此之前，絕大多數的民進黨創黨黨員，均投身於「黨外運動」。而包括其他後來沒有加入民主進步黨的黨外運動者，合稱黨外人士。黨外人士在推動民主改革上，往往犧牲奉獻、不遺餘力，為台灣深化民主奠定良好的基礎。

正是對於黨外人士運動抱持同樣積極正面看待的蔣經國與李登輝，身為台灣人代表的李登輝，成為了蔣經國再度委以重任與黨外人士進行溝通、協調的絕佳人選。

但是曾經於省主席任期間公開傳達反對「台獨」立場的李登輝，真的能夠得到大多倡導台灣獨立運動的黨外人士信任嗎？先前蔣經國借用李登輝之手，釋放部分美麗島相關受刑人士，或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友好訊號。蔣經國的縝密操作，讓曾經大聲疾呼台獨不是正道的李登輝，彷彿帶了重大的友善禮物去與黨外人士接觸；藉以淡化李登輝「此時此刻」追求中國統一的立場。非常高明。自此，李登輝成為了國民黨政府與「長老教會」、「黨外人士」溝通的重要渠道。

不過李登輝並非政府與黨外溝通的唯一管道。李登輝說：「或許他[蔣經國]已經夠透過什麼人在做這項工作[與黨外人士溝通]，另外又指示要我多多參與……負責溝通的人不會向我報告，當時我沒有那個權力，也不是那地位的人」（李登輝 2008b：199）。加上黨外人士既然不怕犧牲性命，勇敢站出來對抗當權政府，是否願意信任一位「刻意洗白」的國民黨副總統，似乎也不那樣重要了。

另外「在台獨人士心中，台灣人的民族[國族]主義與要求民主的運動日益擴張，正逐漸獲得社會菁英與一般社會大眾的支持，即使是蔣經國或是李登輝都已無法力挽狂瀾」（蔡石山 2007：232），看起來李登輝在這當中扮演的角色，更像是安定蔣經國那顆願以其身為台灣人、成為指定溝通協調著的心。這些一波波蜂擁而上的民主改革堆疊，或許，也正一步步將蔣經國推向他所說的：「我也是台灣人」（上坂冬子 2001：155）這句何其重要的宣示上。

在過去威權政府時代，常發生許多現今看來匪夷所思、令人不解的爭議事件。二二八事件是一樁、美麗島事件又一筆，乃至於林義雄家的滅門血案、陳文成事件等等，國民黨政府為求更加有效統治台灣人民，往往透過各種殘忍手段、不計代價的狠心達成。這種惡劣手法，到了 80 年代同樣如此，「江南事件」就是一起在李登輝上任副總統未滿半年後，在美國爆發的又一重大社會／政治事件。

在 1984 年 5 月 20 日以前，儘管李登輝已經進入政府部門工作長達十餘年，但由於經管的事務主要著眼在「內政」的範疇之上，與「國安」、「特務」乃至

「軍情」等相去甚遠；一般也就不容易將從前發生有關推動民主改革引發的前述爭議事件，與李登輝劃上連結與等號。然而面對這一次江南事件的發生，對於已然貴為副總統、身處黨政高層的李登輝，又將發生什麼樣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

我們先來看看什麼是「江南事件」。在「一九八四年在舊金山，有一位曾是國民黨幹部的作家遭到暗殺。這位作家早已取得美國國籍，……這位作家寫了一本名叫《蔣經國傳》的書，指責蔣經國總統的蠻橫暴政。作者的本名叫劉宜良，筆名江南，所以他遭暗殺的事被通稱為『江南事件』。……後來得知，……幕後的教唆者竟是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上坂冬子 2001：151）。

這起事件「究竟是蔣經國下的命令，還是蔣孝武自發性的行動，我們不得而知」（上坂冬子 2001：151），但貴為總統之子的蔣家人犯案，無論在情義上、觀感上，蔣經國都難辭其咎，甚至說為此蒙塵也毫不為過。劉宜良「是」一位美國公民，美國當局自不可能坐視不管；蔣經國政權在國際情勢上最後能夠倚靠的重要支柱，正是美國政府。以致面對再也扛不住的美方壓力，蔣經國亦不得不在「接受美國《時代週刊》香港分社主任桑朵拉波頓的專訪時表示，他從未考慮過由蔣家成員繼任國家元首（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六日）」（上坂冬子 2001：151）。

作出此一巨大且重要的宣示，首要原因自是希望藉此企圖消弭老美的不滿與疑慮；[143]在實質面上，同樣具有份量與指標性。因為自蔣介石政權以降，台灣早已成為「蔣家天下」，如同蔡石山所做的比喻：「在李登輝上台引發台灣人的強烈意識前，『蔣』總統幾乎是台灣人所知道僅有的總統」（蔡石山 2007：238）。

無論蔣經國是否出於真心真意，去說出蔣家人不再任總統的話語；所謂君無戲言，又是當著具有權威性的國際媒體，蔣經國這一個重大的宣示舉措，當然引

[143] 面對「陳文成事件」、「江南事件」等一連串引發美國關注的重大人權戕害事件引起的美國方面施壓，蔣經國不得不作出強而有力的調整與應對；否則一但持續讓美方產生不信任或是相關政策的抵制措施施行，只會使得已然一日日在國際舞台上黯淡的台灣形勢更加雪上加霜，如同江南事件所引發美國國會議員的關注一般：「美國眾議院亞太事務小組委員會（House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曾在主席索拉茲（Stephen J. Solarz，紐約州，民主黨）主持下舉行劉宜良事件聽證會，索拉茲來威脅要美國政府停止對台軍售」（蔡石山 2007：226-227），這等風雨飄搖時代的台灣之無法承受之大事。

發了未來「誰是接班人」這樣的有趣熱議。在這個特別的時刻，時任副總統的李登輝，自然浮現在是否可能成為「接班人」這樣的議題當中。

不過「國民黨內人才濟濟，所以雖然蔣經國這麼說，但也並不表示接班人就是李登輝。副總統畢竟只是備位的性質而已」（上坂冬子 2001：153）。蔣經國一直到辭世之前，從未公開表示誰是他屬意中的接班人，李登輝也說過：「經國先生提拔我為副總統，我想他並不是要我擔任接班人。也許是因為沒想到自己病情會如此嚴重而致早逝吧」（李登輝 1999：62）。

儘管如此，李登輝「和蔣經國在總統府共事才三年八個月」（李登輝 2008b：167），卻處處能夠看見蔣經國不著痕跡地打造李登輝成為未來可能的國家元首。我們可以從：「副總統是備位元首，不管軍事業務，除非蔣經國特別許可，我不會去參加演習。這個演習是為了僑胞而舉行，在場的僑胞很多，蔣經國要我出席。蔣經國也要我和總統府各局局長多接觸……過去我和軍方沒有什麼關係，……蔣經國也會叫參謀總長不定期來向我報告……」（李登輝 2008b：155-156）等等細節中，看出蔣經國對於持續「培養」李登輝的別具用心。

李登輝當然也感受到了這一份獨特發生的細膩：「從一九八四年[李登輝擔任副總統第一年]起蔣經國要我代表他主持在忠烈祠的『秋祭』，日後春秋國殤致祭也由我代理。當時他的身體還沒有壞到不能出席的程度。我看他是儘量要讓我亮相」（李登輝 2008b：156）。若說如此刻意地安排李登輝逐步熟稔非副總統應當插手的國防事務，以及沒來由的代表總統出席、主持各項國家重大祭典等不是在訓練「接班人」，這也是足以令人玩味的巧妙指導了。

李登輝漸漸地接替許多本當「國家元首」擔負的象徵型任務。除了掌握實質權力這一項之外，[144]這一位備位元首李登輝，愈來愈常代表國家元首「視導部隊」，[145]或者進行「外交工作」等，這些原先並非副總統的工作範疇。而隨著蔣經國身

[144] 蔣經國在「晚年時雖然纏綿病榻，但一直到他去世那一天，國家大權都還在他的掌握之中」（柯義耕 2008：204），想來雖然不可思議，但這就是強人政權下的最佳寫照。

[145] 視導部隊出自：「關於國防和軍事，蔣經國對我所說的話我不多作猜測。我只能說我就任副總統後，他要我去巡視金門、馬祖，這和平常[其他擔任副總統者]不一樣」（李登輝 2008b：156）。

體健康逐漸亮起紅燈，「逐漸將權力下放給包括李登輝副總統在內的手下，參加國外儀式典禮的活動幾乎都由李登輝代表出席，這使得李登輝副總統在國際場合代表中華民國的曝光率大為提高」（蔡石山 2007：225）。

於此其中，出現了一個有趣的觀察點。所謂的政治權力，可以很具體、同時也能夠很抽象。筆者一再重複與強調，強人政治下的蔣經國政權，直至其臨終前國家大權仍舊緊抓在他手上，不容質疑、也不可能放掉。然而我們也同時可以看到如同上述「逐漸將權力下放給包括李登輝副總統在內的手下」（蔡石山 2007：225）的語句形容，蔣經國正一點一滴下放其掌握的權力，這是衝突、矛盾的。

我們又看到：「一九八六年面對台幣升值問題，當時梁國樹、陳昭南一批人來找我[李登輝]，建議要怎麼做；這和當時行政院長俞國華的目標一樣，但作法稍微不一樣……其中分為短期、長期的措施與趨向，我以此向蔣經國總統報告外匯頭寸調整的必要」（李登輝 2008b：204）。由此可見，副總統李登輝雖然沒有握著實質權力，但是他的確能夠上達天聽；建議也好、稟告也罷，給予蔣經國好的政策建言與施政方向。蔣經國，是可以溝通的；李登輝可能也因此隱身在後，某種程度參與並決策當時候影響台灣發展及走向各方方面面的施政方針。

回到光環日益打亮的副「總統」李登輝外交工作上。代表國家走出國門、走訪世界的李登輝，不僅僅在國際間漸漸打響了台灣的名號，也因此墊高了李登輝個人的高度與視角。藉由蔣經國的權力賦予，李登輝逐步帶領台灣外交走向世界的舞台。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外交歷練。對於必須澈底掌握「國防」與「外交」的國家領導人而言，蔣經國煞費苦心地補足了李登輝所欠缺的這兩塊。

李登輝先後走訪了「南非……南美洲的烏拉圭與巴拉圭……[以及]三個反共的中美洲友邦哥斯大黎加、巴拿馬與瓜地馬拉」（蔡石山 2007：225-226）等國。拜蔣經國賦予重任所賜，「中華民國歷任總統與副總統當中，李登輝最常出國訪問。由台灣經濟專家轉變為政治家，再透過多次出國訪問歷練，李登輝逐漸成為一嫻熟的世界級外交家」（蔡石山 2007：226）。

由於台灣位處東亞，所以無論前往非洲亦或中南美洲等邦交國所在地，往往需要過境其他諸如美國、日本等地補充油料，再度飛行。於是「李登輝在美國舊金山做了短暫停留，……[或是]在日本的東京與橫濱停留了三天」（蔡石山 2007：226），也就成為了出訪時經常遇上的「附加行程」。

其實在這些與台灣沒有邦交關係的國際大國過境，常不僅僅單純只是後勤補給的考量而已；同時這也是一場外交政治大秀。受困於台灣外交形勢的險峻，國家正、副領導人只要進行外交出訪，往往都會竭盡所能的想方設法與國際間同樣信奉民主的重要大國接觸，以尋求面臨中國處處打壓外交上的突圍。所以「附加行程」的重要程度，並不亞於當次實際出訪的友邦國家。

李登輝諸多外交經歷中較為特別的部分，是「一九八五年從南美烏拉圭、巴拉圭等地返台途中，李登輝在日本稍作停留。儘管是在中（華民國）日斷交後相隔十三年才來到日本，但還是深受有關人士的歡迎。自民黨的佐藤信二及日華議員懇談會的成員，都到機場迎接，電視也都大幅報導」（上坂冬子 2001：154）。

曾是一個「日本人」的李登輝，如今以另一國家副元首的姿態踏上日本國土，此時的心境肯定與 1946 年必須離開求學故地、就此告別的祖國日本，有著大大的不同吧。李登輝受到日華議員及民間媒體的款待，似乎一路延續到現今日本仍舊有著一定比例高度喜愛李登輝的族群。只是同樣事件，在蔡石山的觀察中明白指出：「日本政府高層領導並未出面接待李登輝，他們不希望日本與中國新建立起來的『友誼』遭破壞」（蔡石山 2007：226），這就是國際外交現實的無奈。

第二節 台灣解除戒嚴

時序來到了西元 1987 年；這是李登輝擔任副總統的最後一個完整年度，同時也正是蔣經國擔任總統、主政台灣所邁向的第十個年頭。這一年，在台灣近代民主發展史上，是特殊、具有關鍵決定性的一年；這一年，自 1949 年起實施長達 38 年之久的戒嚴令，終於解除戒嚴；這一年，原本老死不相往來的台灣與中

國，解除了限制、開始開放台灣民眾能夠至中國探親。同時，也是在這一年，蔣經國以總統之尊，留下出席行憲紀念日慶典的最後身影的一年。

也許在近數十年的台灣，每一個年頭或多或少都有著令人印象深刻、或說影響台灣民主發展深遠的重大事件發生；然而 1987 這一年，對於本文主人翁李登輝而言，卻的確是頗為至關重要的一年。因為除了是能夠伴隨蔣經國從公的最後一個年頭之外，這一年過後，僅僅十餘天的短暫光陰，擔任副總統未滿四年的李登輝，即因繼任的關係，成為了「第一位台灣人總統」。

李登輝開啟 12 年主政台灣的內容，將在往後章節呈現。仕途發展與蔣經國緊密相連的李登輝，在這一代強人蔣經國實際上主宰台灣政治的最後一年，究竟面臨了什麼樣的時空環境，以及社會上有哪些主要的重大變革？李登輝是如何適應、執行，與承接蔣經國一一推動的台灣民主變革？接下來，讓我們一一打開這為期不長的 1987 年時光寶盒，找尋李登輝在這一年的貫徹、應對之道。

首先，兩蔣政權之所以能箝制台灣人民自由、倒行逆施的主政台灣，其中重要的依賴，就是憑藉《戒嚴令》的實施，以及頒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這是在號稱民主的台灣之中，最大的諷刺；也是猶如「帝王專制」的象徵。在解除戒嚴之前，台灣人民處處遭受無理法律的限制，白色恐怖的襲擾以及剝奪自由威權打壓。肇因蔣氏政權的極端壓迫，台灣人民被迫自我覺醒，透過衝撞與衝突，不斷發聲、走上街頭，終於在 1986 年迎來可望解除戒嚴的曙光。[146]

解嚴的定案，是自 1986 年即已決定，「不過取消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體制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完成，因為取代戒嚴令的國家安全法要經過冗長的立法程序，最快也要到 1987 年 7 月才能完成」（蔡石山 2007：236）。這無疑是遲來的正義，也是台灣人民多年來無懼強權的威逼，甚至犧牲性命換得的正常生活。而筆者所關注的，是「生為台灣人」的副總統李登輝，在此事件上有無特定角色存在。

[146] 如同上一節次所提，蔣經國政府為了持續有效在台實施統治，除了任用「台人」李登輝擔任副總統外，同時於各項政策、對於黨外人士的態度轉趨緩和以待等，煞費了不少苦心；「國民黨政府也『因應時代變遷對自我進行了調整』，宣布自 1986 年 7 月 15 日起結束長期的戒嚴體制」（蔡石山 2007：236）。

這麼說吧，解嚴是一件茲事體大的重要大事，若非蔣經國的意志貫徹，任誰也難以撼動這維繫國民黨政權的根基所在；當然，也包括了權力與職務是他人賦予的李登輝副總統。但是，即使李登輝面對蔣經國的施政走向幾乎毫無反擊之力，我們卻可以在李登輝身上找到一些蔣經國刻意重用他，所遺留下台灣即將有著重大變革的痕跡。

在內憂外患的 1980 年代中葉，李登輝先是成為了蔣經國力排眾議的「台籍副總統」，在上任副總統後，蔣經國亦開始了他認為台灣應走向的民主改革之旅。此時的「李登輝副總統仍繼續擔任其政治溝通媒介的角色，適時向黨外領導層傳達蔣經國的意見」（蔡石山 2007：231）。而所謂重大的變革，就是「他[蔣經國]開放報禁、默許反對黨的成立，並將台灣建設為東亞地區強大政經勢力的舉措」（柯義耕 2008：210）。

在面對既有「在黨內強硬派勢力的牽制下，蔣經國無法大刀闊斧的實施自由化政策，更何況他當時已經有重病在身，無法完全控制國內各軍警與情治機構之間的競爭」（柯義耕 2008：210），於是「李登輝」的角色在此更顯重要，他是蔣經國意志能否貫徹的關鍵所在。李登輝也說：「台灣在一九八六年以後的重要變化，像是政治改革、經濟變化等等，我差不多都曾參與」（李登輝 2008b：232）。

可想而知，只要談到「改革」，肯定容易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反彈與阻礙；畢竟改革是會痛的，不可能得到全數人的稱許及支持。即使「一代強人」蔣經國在以他為首的威權政體下，推動改革仍不免遭遇保守、守舊的既存勢力反對。在與蔣經國為伍的日子裡，李登輝在各項改革的步伐上，基本上都是與蔣經國所一致的；換言之，在面對義無反顧投入改革之際，有著蔣經國的支持，李登輝也才能繼續在改革的路上往前奮進。

再來要談的，是有關「開放中國探親」這另一件大事。台灣與中國自 1949 來以來，就一直處在「敵對」的狀態。到了蔣經國主政時期，甚至「針對中國提出的『三通四流』統戰宣傳，蔣經國總統於 1979.04.04[sic]發表談話，首次提到『不

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堅定立場」（李登輝 2008b：189）。也就是隔海分治的兩個敵對國家，人民也受限制的禁止往來。

但是這樣的複雜處置情形，首當其衝的即是在 1949 年隨著國民黨政府撤守到台灣的「外省族群」。這其中包括了許多當時年紀輕輕即跟隨蔣介石部隊來台灣的「軍士官兵」們，隨著時光歲月的流逝，1980 年代的當時，這一群軍人，成為了大眾口中的「老兵」們。他們與在中國的家人們一別就是 3、40 年的光陰，無法探親親人、與家人團聚，心中當然不會好受，也始終存在缺憾。

這樣的聲音，歷練過「退輔會主委」的蔣經國又豈會不知，只是時機總是不對。直到台灣與中國的形勢逐漸有所轉變，「蔣經國在 1987 年 9 月 16 日的國民黨中常會上宣布，開放台灣的外省人回中國大陸探親。隨即責成李登輝領導新成立的『新大陸政策特別委員會』，籌畫開放大陸探親事宜」（蔡石山 2007：235-236）。期盼與家人重逢團圓已久的老兵、外省族群們，總算能踏上返鄉之路了。

這裡我們看到，蔣經國繼「國防」、「外交」事務上交付李登輝任務外，此次更授與李登輝親自主持涉及高度敏感的「台中事務」；這樣的發展，也許真能嗅到不尋常的培養「國家領導人」氣味。畢竟，在台灣的政府體制內，無論是國防、外交，乃至於台中事務，都是總統所直接主責的範疇，非其他人能介入其中。

不過就在台灣人能夠重返中國、回鄉探親的前置整備時，此等大膽的開放性政策，自也免不了引發正、反兩面的激烈交鋒。「蔣經國剛提出開放民眾至中國探親的案子時，許多人嚇一大跳。那時大家想，如果開放探親，會不會有人就不回台灣。這一點蔣經國比較厲害，他懂得在策略上運用這項措施。他來自中國……他認為這些人在台灣住久了也是台灣人，和想返鄉探親並沒有衝突，外省人回中國看看，對中國就不會再有掛念」（李登輝 2008b：190-191）。

在蔣經國的堅持下終於成行：「1987 年 11 月 2 日，第一批不具軍公教身分的外省人返回大陸[中國]探親」（蔡石山 2007：236）。但主要領導此項政策執行的李登輝，雖然樂見這樣的發展與進步，但他也在多年評論：「除了探親措施，

蔣經國並沒有更具體長遠的兩岸規畫。雖然允許探親，但是他還是主張『三不政策』」（李登輝 2008b：191）。無論如何，李登輝自此正式涉入台灣對中事務。

誠如先前所提到的，1987 年 12 月 25 日的行憲紀念日，是蔣經國擔任總統任內、亦是其有限的生命年歲裡頭，最後一次能夠出席的紀念大會。此時原本猶如太陽般持續照耀台灣的蔣經國，來到了生命餘暉也似乎即將燒盡的盡頭，在這病體殘弱、勉強出席慶典的蔣經國，遭遇了或許他始料未及的「衝撞場面」，也可能因此留下了他生前最後無比的苦痛及遺憾。

事情是這樣子的，「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行憲紀念大會上，組黨才一年多的民進黨引起一陣騷動。民進黨人士拿著寫有『老賊下台』的抗議白布條，被拒絕入會。此時，糖尿病已惡化的蔣經國坐著輪椅，在台上無力的低垂著頭，看起來很痛苦的樣子」（上坂冬子 2001：155）。蔣經國臉上表情的痛苦，究竟是源自身體病痛的痛苦？亦或面對忽然失序的紀念日大會，感到不悅？或許無法清楚地詳加究明，畢竟風燭殘年的蔣經國，還剩多少氣力去應對這等偶發事情。

這無疑是一起眾所矚目的焦點事件。再怎麼說，民進黨人士在強人政權下近距離掀起的大動作挑戰行為，肯定引發各界的議論與關注。吳建國（2017：309）觀察道：「坐在輪椅上的蔣經國，抬起幾乎已無力揚起的脖子，……他口中似乎在喃喃自語：『我都已經做了那麼多，為什麼你們還不滿足、不能理解政府的苦心，而共體時艱呢？』這是蔣經國最後一次的公開露面」。

無論如何，誰也沒有想到此次的衝突，竟成為了過往所有反對蔣氏威權政體者，最後一次機會在強人蔣經國的面前，去表達心中不滿與訴求，去進行「直球對決」。而「蔣經國在這場紀念大會上重申對《時代週刊》的記者所說的話，他氣如游絲遊絲的宣布，流著蔣家血的總統就到他為止，對蔣家血脈所掌控的政權畫下了一個句點」（上坂冬子 2001：155）。

是的，即使日薄西山的蔣經國，仍舊不忘重申「蔣家人不再任總統」此般重要宣示；可見他對「兩蔣功過」，有著身為局內人的最深刻體悟。終其一生都在與中國共產黨爭奪統治「中國」法理性與正當性的蔣家父子，即使「落難」到了

台灣這一個莞爾小島，仍舊催眠台灣百姓要「反攻大陸」、「統一中國」，卻在蔣經國暮景殘光的時刻，有了不同以往大多時刻的基調，台灣，或許成為了他能夠「落葉歸根」的最終所在。

蔣經國時代的即將走到盡頭，象徵的是強人政治即將從台灣過去，亦表示將會有下一個新的國家領導人來領航台灣。自從 1945 年台灣確定再次落入外來政權之手，台灣人就從來沒有被「自己人」領導過。未來的演變，還很難說；但從蔣經國衍生而來的重要訊號，卻值得成為未來台灣發展的重要線索：「我瞭解蔣經國對台灣的態度。他對台灣本土化的意識很強」（李登輝 2008b：232）。

這是攸關全體台灣人未來國族認同的基本立場。當一代強人蔣經國都已經重新檢視自己對於台灣當有的態度，重視台灣應朝向本土化的角度發展；在這個當口，台灣與中國是否正朝著不同且明確的兩個國家政體、各領風騷？還是台灣領導人片面的一廂情願？顯然不好說，卻是一個新契機的出現與開始。

本節次末，再次把焦點回到李登輝身上。李登輝自從一腳踏入政治工作以來，無庸置疑，就是一路受到蔣經國的提拔與看顧；甚至可以說，沒有蔣經國，恐怕不會有李登輝這麼一號人物。是蔣經國讓李登輝有機會「洗白」；是蔣經國讓李登輝從一介學者，現在成為了「副總統」；是蔣經國讓李登輝一步步涉入「國防」、「外交」，乃至於「台中事務」。我們看著蔣經國與李登輝綁在一起至少一十七年，蔣經國來到了生命的盡頭；接著，我們將看到沒有蔣經國之後的李登輝天空。

無論蔣經國過往是以什麼樣的心思，對於提拔「台籍人士」、對於轉向「建設台灣」、對於建構「本土意識」；蔣經國的確做了許多台灣得以走向民主台灣的基本功夫。好比李登輝所說：「暫且不提蔣經國過去做了什麼，但是他實在是開始了民主化，他釋放美麗島事件那些政治犯、讓民進黨組黨、解嚴；如果沒有他晚年所做的事情，台灣以後的民主化發展以及我十二年的民主化工作都沒辦法進行……」（李登輝 2008b：171）。

蔣經國終究會在台灣歷史上劃上一筆；至於這一筆的功過對錯，則留待世人更全面、廣泛地思辯與討論。但爾今而後國家的民主發展與走向，則是本文主人

翁李登輝所實際參與其中。1987 年過後，向來以「外省集團」為核心的黨國領導高層，是否將持續掌控台灣？或是自此改弦易轍？這是必須持續探討的問題。

最後，在三年八個月的副總統任期中，李登輝除了潛心扮演好副手的角色之外，也因為「副總統的職務比較有自己的時間，……因此我[李登輝]開始計畫要認真讀書，並且大規模地訂書、買書」（李登輝 2008b：230），這無疑是讓生性熱愛讀書的他，有了一個藉由書海喘息與再學習、再成長的機會。透過書本「研究軍事和中國的情形……對高科技的研究……[乃至於]下功夫研究中國的文化和歷史」（李登輝 2008b：230-231），這些都讓李登輝的視野、觸角更加全面；[147] 在這無聲之中，似乎正悄然醞釀一位未來偉大的國家領導人。

第三節 第一位台灣人總統

1988 年的一開始，台灣的總統仍然是末代蔣氏政權的蔣經國當家；此時的李登輝，仍然是以備位元首的姿態，認份、認真地執行他身為副總統所應擔當的角色與責任。然而這樣的光陰僅僅維持了十三天不到，即已轉變成沒有人猜想得到的特殊局面；蔣經國病逝在其第二任總統的任內，依據憲法，李登輝成為了接替蔣經國總統的「繼任總統」。

台灣元首在任內上逝世，蔣經國當非首例；其父親蔣介石，同樣是在總統任內上辭世。所以面對突如其來的總統離世，台灣並非沒有前例可依循，很快地，李登輝順利承接政權，不至於讓台灣陷入恐慌或者政府運作空轉。然而，這只是猶如當年「嚴家淦」繼任總統的例行程序複製嗎？一場即將掀起的台灣政壇風波，其實正在悄然醞釀之中；畢竟，台灣再無「蔣家強人」，一切都不再相同了。

而身為首位「台灣人總統」的李登輝，其實宣示的是「中華民國憲法」，領導的政府一般亦稱「中華民國政府」；李登輝自己甚至發展出「中華民國在台灣」

[147] 關於李登輝在擔任副總統後的內涵再次提升方面，柯義耕也說：「李登輝利用他當副總統的四年『閒暇』（1984-1988）充實他個人在歷史、法律、經濟、哲學和宗教方面的知識，並出版了許多這類的書籍。……在遠離繁瑣的日常政務之後，他給人的印象愈來愈像是個知書達禮、很有深度 —— 雖然不見得總是很明智 —— 的政治家」（柯義耕 2008：204）。

這樣的宣稱與口號。那麼李登輝心中真正所想的「國族認同」，究竟是建構在什麼樣的政治正確之上？我們將一一找到於此當中國族認同的隱藏、脈絡、走向。

李登輝的主政台灣，一開始是走在強人過後的餘波盪漾。1990 年，李登輝順利挺過排山倒海而至的黨內政治鬥爭，與李元簇搭配成為台灣新一任「選舉」產生的正、副總統；這是李登輝「總統」的民主改革起手式。終於成為「正式」總統的李登輝，因應國家局勢發展，展開了一系列影響台灣民主改革深遠的重要政策：「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通過國家統一綱領」、「廢止萬年國代」、「啟動修憲工程」、「總統直選修憲案」等。

上述都是本節次探討李登輝生命歷程中，八年間發生的主要大事。而李登輝一手執意推動的台灣總統開放全民直接選舉的創舉，終於發生在 1996 年的台灣；而李登輝則成為了台灣首任民選總統。這些種種在政治實體產生重大變革的過程，我們同樣持續關注李登輝國族認同的發展與是否產生變化。

一、 繼任總統

> 一九八八年，蔣故總統經國先生辭世，我繼任第七任總統時，說過一句話就是「同心同德，團結一致」。以「政治人」的身分而言，我算是一個新人。新人所能說的，就只有：「各位，讓我們一起來打拼吧！」而已。（李登輝 1999：75）

如同先前所提，1987 年 12 月 25 日行憲紀念日大會，是蔣經國生前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中的露面；在公務往來中，李登輝與蔣經國見面，則是停留在 1987 年的 12 月 7 日。李登輝自 1984 年擔任副總統以來，經常都會有所機會晉見蔣經國總統，或是討論國政、或是意見交流、或是被賦予各樣式能夠擔負的任務。然而隨著蔣經國晚年身體狀況日益惡化的困擾下，李、蔣能夠會面的機會愈來愈少。

於是乎直到蔣經國逝世的 1988 年 1 月 13 日，李登輝已經好長一段時間沒有真正在私底下見過蔣經國、和他說上話，這種情況甚至陰錯陽差地也沒能讓李登輝有機會見到蔣經國離開人世前的最後一面。作為李登輝政治上的蒙師、益友，

甚至是提拔李登輝不遺餘力的蔣經國，李登輝未能在蔣臨終前見上一面，自不免心中充滿著無限遺憾與懊悔。

然而隨著一代強人蔣經國總統的逝世，依憲法繼任總統而成為第一位「台灣人總統」的李登輝，面對兩蔣時代的過去伴隨而來台灣社會產生的巨變，顯然李登輝沒有太多的時間能去悲傷。面對蔣經國遺留下來的兩年四個月任期，李登輝所要面臨的險峻挑戰，才正要開始。台灣的未來，是否能夠因為象徵威權體制的終止，自此開創一番新的民主氣象？還是只是再度回到如同 1975 年蔣介石逝世時，嚴家淦繼任總統時的「只是過渡」的一個似傀儡總統，台灣政權依舊牢牢掌握在外省統治集團手上？這是一個再關鍵不過的重要時刻。

李登輝首先面臨的挑戰，是自蔣介石時期即已肅立的「黨國不分」亂象。在過去兩蔣威權統治年代，向來都是懾服在「以黨領政」的非民主現象；在一黨獨大的戒嚴時期，掌握國民黨機器，就是真正掌握了台灣整個政府的國家機器。所以 1975 年即使嚴家淦繼任了總統，但當時並沒有如同蔣介石擔任總統時一般，兼任國民黨總裁，而是由當時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出任國民黨主席，形成了一時之間的「黨政分離」。具體來說，做為一個新科繼任總統的李登輝，能否同步出任國民黨主席，成為了極具實質政治統御意涵的重要元素。

李登輝是在 1988 年 1 月 13 日晚間 8 時宣示繼任成為總統的，這個時候的李登輝，「學者出身，沒有政治野心的我，在黨內沒有任何足以倚靠的勢力，也沒有任何軍方或情治機關的支持。孤立無援的狀態下，我的心境真的可以用『身無寸鐵』來形容」（李登輝 2015：89）。不攀親帶故、不結黨營私，原本是李登輝成為蔣經國高度賞識、進而願意苦心栽培的重要原因，此時此刻，卻也因此讓李登輝倍感孤寂，如同形單影隻的惶恐。

但政治上的較勁與抗衡，往往不會是一刀兩切的簡單數學；其中充斥著的權力平衡與算計，更是難以利用精準的科學計量，去做出最後的標準答案。當時候的時空背景，即使外省權貴再怎麼不願見到李登輝因此登上總統大位，囿於憲法

體制的規範，也只能悶在心裡，看待其至多是一位「過渡」元首罷了。於是，所有的目光焦點，自然置放在「黨主席」之爭之上。

就在這個時刻，蔣經國時代噤聲許久的蔣介石遺孀——宋美齡出手了。事實上，宋美齡在 1986 年重新自美返台以前，早已長居美國、鮮少過問蔣經國領導下的台灣政治。但在這一個蔣經國驟逝的特殊情況下，即使高齡 80 好幾的她，一生與國民黨發展緊密連結，人既已回到台灣，就不可能不對沒了蔣家強人領導的國民黨出言置喙。所謂的「官邸」派再度浮上檯面。

就在蔣經國辭世之後不到一個星期，「一月十九日，蔣宋美齡寫了一封信給李煥，信中舉陳立夫的建議，以黨內並無強有力領導為由，主張循總理孫中山逝世時的先例，由中常委輪流主持中常會」（鄒景雯 2001：64）。宋美齡之所以這麼做，原因在於許多「關心」國民黨未來發展的黨政人士，已在暫且平衡各方勢力的權衡之下，悄然運作將推舉李登輝成為「代理黨主席」。[148]

宋美齡的「寶貴意見」至終告吹，而這也是與李登輝「交手」的序章，此後宋、李兩人亦再次針對國是產生歧異，於後再表。無論如何，即使年歲已高、逐漸淡出台灣政治的宋美齡，依舊存有一定程度的舊有保守勢力，「基於事緩則圓，代理黨主席計劃決定展延一周至二十七日再進行，二十日中常會並因此取消」（鄒景雯 2001：64）。在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甫上任總統位子還沒坐穩的李登輝，已經能夠不著痕跡地直接對抗「蔣夫人宋美齡」為首的官邸派，顯然宋美齡並沒有意會到原來台灣政治史上的新一代強人，正悄然誕生。

短暫的插曲與風波渡過後，李登輝順利地在一月「二十七日早上，俞國華、李煥與當天的輪值主席余紀忠在中央黨部會商，三人共同決定本案不能再拖延，

[148] 在蔣經國晚年的規劃安排下，「黨」、「政」「軍」三大系統分別有「卓越」的外省集團所負責；「黨秘書長」由李煥出任，「行政院」由俞國華擔任院長主持，「軍令系統」則由「常任」的參謀總長郝柏村一手掌握。也就是在這巧妙的恐怖平衡下，權貴們各立山頭，誰也無法服誰。於此夾縫中，「黨主席」這塊肥肉在誰也無法直取下，李登輝順利成章的銜接「大位」。不同於「官邸」宋美齡的期望，也「由於一般都體認李登輝依憲法繼任總統，繼而兼任黨主席，是政權和平轉移的重要象徵，黨秘書長李煥依據政局安定與社會氣氛所趨，在蔣經國辭世第三天即著手執行黨政一元領導的商議與準備。按照李煥的規劃，一月二十日中常會，由俞國華領銜提案，先通過李登輝代理黨主席，待七月的十三全大會再正式真除主席」（鄒景雯 2001：63-64）。

中常會上將先討論四項預定議案，而後由俞國華提出臨時動議，通過代理主席案」（鄒景雯 2001：64）。「無論如何，根據黨中央委員會的多數決，李登輝被選為黨主席，一人身兼總統和黨主席兩項重要職位」（上坂冬子 2001：161）。

台灣人首度出任總統、台灣人首度擔任國民黨主席，顯然這一份光榮不應當為李登輝一人獨享；且無庸置疑地，自 1945 年終戰以來，台灣人再度被迫接受日本政府離開後的又一個「外來政權」統治，在歷經無數次街頭運動與民主前輩的犧牲奉獻下，進而促使蔣經國政權必須啟用象徵「本土」的台灣人菁英進入政府部門，也才創造出李登輝這一號「代表」台灣人的首要人物。

這是歷史性的一刻。帶著光榮與台灣人民的期許，李登輝踏上了進一步推動台灣民主深化改革之路。但積弊甚深、沉痾已久的台灣政壇，有可能自此一帆風順、無風無阻嗎？我們仔細來審視初登大位的李登輝，如何一步步踏穩步伐，在「台灣人總統」主政下，帶領台灣人民持續進步前進，擺脫威權體制的餘毒。

首先，時間稍往回推。植基於成為繼任總統的基礎，正是源自於 1984 年蔣經國大膽地重用李登輝成為「副總統」；再往回看，不只一次提到的，李登輝能一路平步青雲，短短十餘年從政光陰就官拜備位元首，這完全是蔣經國一手提拔之下的結果。也就是說，在沒有真正民意基礎創造出權力的威權體制中，彼時李登輝的政治成就絕非來自民意的授權與信賴，端來自蔣經國「余一人」的肯定。

> 穩定政局成為我重要的考量。他剛過世的十三天裡，我每天上班前，都會到他靈前祭拜。我這種重禮數的精神，是要表示我不會改變他的路線，會遵守他的教導，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主要是維持他的人事、政策以及他總統任內尚未執行完畢的計畫，這是讓大家安心、安定。（李登輝 2008b：259）

於是持續表現「尊蔣」，是這個時刻李登輝急需展現出的禮數與誠意。況且連續兩代蔣家父子的統治台灣，台灣人民也說不一定還沒有準備好迎接沒了強人威權的台灣民主天空。而若說李登輝是政治素人，那是在國民黨的排資論輩上，李登輝對於該黨的貢獻與實際參與運作尚稱資淺；但若從一介學者從政短短十餘

年，即已接掌大位，並且在政治倫理操作上表現的不溫不火，的確難以相信他能夠如此持重地逐漸穩定多方覬覦、各自蠢動的「無蔣時代」政局。

李登輝很清楚為了承繼法統，不可能在僅限的兩年四個月「繼任任期」中做出什麼樣有違「蔣經國路線」的驚天動地之舉，於是除了初時至蔣經國靈前祭拜、表達致敬的誠意輸出之外，「李登輝跑遍了所有舊體制的象徵，目的在傳達一項訊息：『我追隨蔣經國多年，深切了解經國先生的治國理念，我讓大家清楚，李登輝會按照蔣經國的路線，訂定國家未來發展的方向，希望大家安心』……就任初期，將貫徹蔣經國遺訓，『因此沒有李登輝政策』」（鄒景雯 2001：51-52）。

> 當然，我[李登輝]並未因而興起自己成為總統來改變政界的狂妄念頭。然而，回想起來，當時面對蔣經國突然去世的危機，我就下定決心，必須加以克服，度過這個困難的局面。雖然已經就任總統，當時其實並無餘裕考慮親手進行台灣的民主化。（上坂冬子 2001：178）

沒有李登輝政策，無非是李登輝在穩定政局必須歷經的一遭；這也是李登輝一再強調「安定人心」上，必須祭出的必要手腕。幾乎如同孤拎拎一人的李登輝，面對外省集團各大山頭的芒刺在背，李登輝沈穩以對。然而總是掛在嘴邊，說自己向來沒有政治野心的李登輝，真的沒有自己心中刻畫的台灣藍圖想要推行嗎？聰明自許、學識淵博的李登輝，真的沒有自己已然擘劃的政策推亟待推動嗎？我們先從初掌大位、甫登權峰的李登輝面臨的各種挑戰與時事所逼中切入觀察。

農經專業出身的李登輝，長久以來關心著台灣農業的發展，擔任省政府主席期間亦高度的投入精神在推動台灣農業改革之上。然而如同前面章節所提，李登輝省主席任內的農業政策成效，其實評價不一；倡導的政策，未必真正符合廣大農民的需求與期待。先前也提過，李登輝能夠受到蔣經國重用拔擢而成副總統，倚靠的並非是在省府期間的卓然政績。那麼自詡農經專才的李登輝，究竟對於台灣農業改革之路上，是否真正作出貢獻？

就在李登輝繼任總統短短四個月後，過往李登輝最為關心的農民朋友們，忍受不住謀生上的不易與從事農業環境持續惡化，只能訴諸街頭，去表達內心最沈痛的不安以及尋求政府部門協助解決改善的方法。就在 5 月 20 日，農民請願遊行，爆發了激烈的流血衝突。是的，位子還沒坐熱的新科總統李登輝，有別一月份時僅是「代理黨主席」之爭那般黨內茶壺裡的風暴，現在所遭遇的，是直接受到普羅大眾的抗議與挑戰，並且是他向來視為國家重要基礎的「農民朋友」。

這一次的「520 農運」，當然是 1980 年代末期風起雲湧的街頭運動中，屬於高度關鍵的幾場「戰役」之一，在近代民主發展史上亦奠定了具有特殊意涵的定位。那麼這一場主體為農民的社會運動，當中主要的訴求是什麼？李登輝政府又是如何因應與看待、解決廣大農民的請願與需求？讓我們接著看。

1988 年 2 月 22 日，李登輝舉行了上任以來首場的「中外記者會」，在接掌國家大權之初，李登輝有必要正式地向世人宣告他未來的施政方針。其中當然必須囊括來自世界各地關注台灣情勢發展的各國媒體。就在這一場舉世關注的記者會中，李登輝「承諾將透過進一步開放市場、降低進口關稅、購買更多美製商品以及提高台幣兌換美元匯率 25%到 40%等方式，來改善台灣對美國貿易大量出超的問題」（蔡石山 2007：244）。

殊不知，如此刻意地對美方釋出善意的結果，正是導致農民走上街頭的主要原因。「李登輝領導的政府以遠超過以往的速度與深度開放台灣市場，大幅且快速降低關稅，並進口大批美國農產品。……超過一萬名雲林的農民北上，要求政府限制美國的農產品進口。請願農民並要求李登輝總統改革既有的農業政策，這些政策正是李登輝過去十多年來努力建立起來的」（蔡石山 2007：248）。

無論是在國際政治、外交領域，乃至經濟貿易發展，自蔣介石以降，美國向來是台灣倚重的國際重要夥伴。所以求學、移民、經貿，甚至是軍購，台灣向來樂於配合美國的各項政策，以尋求美國發揮台海和平的關鍵力量。以至於無論是蔣經國晚期為了消彌美國方面的疑慮，作出「蔣家人不再擔任總統」的宣示，亦

或新科總統李登輝掌舵台灣，同樣必須向美國低頭與輸誠。所謂一體兩面，在一昧為美國創造收益時，自也伴隨犧牲台灣人民的當有權益。

當然所有的主政者也不是傻子，在「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下，掌權者也只能權衡利益得失，去做出最符合國家利益的決策。不過，站在人民的角度與立場上，捍衛基本的生存發展權，也是理所當然、自動自發的。在「520」農民運動意外的衝撞之下，農民朋友們亦提出若干具體訴求：「（1）建立農民健康保險制度；（2）保證不會任意提高化肥價格；（3）收購更多稻米以彌補大量進口農產品導致米價下跌……（6）在行政院設立部會級農業組織……」等（蔡石山 2007：248-249），企盼政府單位嚴肅、認真的回應。

2016 年當選台灣總統的蔡英文女士曾說過：「勞工是我心中最軟的一塊」，那麼，彼時的李登輝看待台灣農民是否也是其心中最軟的一塊？我們不得而知。但「李登輝總統對於雲林農民提出的多數訴求都有所回應，例如行政院不久之後成立了農委會」（蔡石山 2007：249），及李登輝自述中提到：「一九八九年七月政府正式實施農民健保，當時農民健保的實施，是不是和一九八八年發生『五二〇農民大遊行』的事件有關連？政府是不是有要補償農民的意思，所以實施農保？……我很早就有意思要實施農民健保……我感覺這個問題實在要解決才行，若農民健保制度做下去，應該會有很好的一個結果」（李登輝 2008c：225）。

李登輝上任總統後第一個面臨人民的直接衝撞與挑戰，在短短四個月時間即發生。所幸在雙方互有摩擦與部分人員受傷的情況下，朝向好的方向發展；不能說是平安渡過，卻至少至終能夠和平落幕。這是來自人民（黨外）的挑戰。但是李登輝所要面對的，明顯不會只有生性質樸的台灣人民；李登輝坐擁台灣「兩大權力」（總統與國民黨主席），想要挑戰、分食他手中大權的人，持續蠢蠢欲動。

二、　鞏固新領導中心

1988 年 1 月 27 日國民黨中常會中通過的是李登輝「代理」黨主席案，真正真除主席，則是到了國民黨召開的第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八八年七月的十三

全大會，是李登輝進行鞏固權力的第二步，李登輝在全場起立表決的方式之下，完成接任黨主席的法定程序」（鄒景雯 2001：66）。距離蔣經國辭世、國民黨內陷入群龍無首的亂象不到半年滿之際，李登輝已然堅實鞏固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這也似乎進而催促著新一代強人的誕生。然而事態的發展真如此順利？

先前提過，在蔣經國晚年對於「黨」、「政」、「軍」這三大權力系統，在人事上做了細膩、巧妙的安排。在以黨領政的國民黨黨國思想中，從「黨務」、「黨員」中切進黨政核心，似乎是最精準不過的康莊道路。於是李登輝之下，新一波的國民黨內權力爭奪與抗衡，明擺著精彩上演。「在攸關黨內權力重新分配的中央委員選舉過程，黨務系統的李煥、宋楚瑜聯手全面主導，與行政院系統相與抗衡，開票揭曉，李煥高票領先，俞國華位居閣揆卻遠落於三十五名。僅僅半年，蔣經國生前安排的佈局就開始內部傾軋。李煥不甘於這蟄伏黨務系統，自我營造的聲勢不斷竄起，俞國華因民間形象吃虧，未待大會結束，要求內閣全面改組的意見已經在會場流傳」（鄒景雯 2001：66）。

面對黨內山頭勢力的此消彼長，身為掌權者的李登輝，又是如何抉擇黨內勢力的重組與平衡？「十三全閉幕後，李登輝沒有按照若干人的主觀期待行事，他以次年將有七項選舉任務艱鉅為由，提名李煥續任黨秘書長。同時基於政局安定，支持俞內閣繼續執政」（鄒景雯 2001：66）。這就是李登輝性格。觀察李登輝，他總是能在特殊地環境情況下，做出不一定順應他人的強勢期待。或許基於「選務考量」、或許出自「政局穩定」，李登輝沒有被牽著鼻子走，這是持續鞏固權力至為重要的關節點；李登輝似乎正在宣告，他才是現今政壇的集大權者。

雖然面對李煥的自我膨脹以及營造人脈資源的進逼挑戰，李登輝不為所動的續用俞國華擔任閣揆；但是李登輝並沒有因此就讓俞國華開著行政院大車，恣意地橫衝直撞。李登輝開始介入了首次的內閣局部改組。或許承繼著蔣經國當年「催台青」中年輕化的思想，「李登輝在俞國華的首肯下，強勢進行內閣的局部改組，一群李登輝色彩濃厚、資歷尚嫌生嫩的新閣員浮上檯面。……政治見習生的上場，標示著權力交班已經進入實戰階段」（鄒景雯 2001：66-67）。

李登輝先是阻擋了挾黨內高人氣的李煥企圖進攻行政院，接著處理看似續用、實則奪取其組閣權的俞國華行政院長，至此，蔣經國時代重用的「黨」、「政」大員，似乎已經逐漸成為李登輝手中可用的棋子，無法真正自主運行當有的政治能量。但最令李登輝感受到威脅的「軍令系統」，一直到這個時刻，李登輝仍舊沒有良機能夠加以處理，「黨」、「政」，仍缺「軍」一塊。

這樣的特殊情況，即使在蔣經國逝世之際，「國防部長鄭為元、參謀總長郝柏村隨後共同上電總統，表示三軍將銜哀報效，服從命令。」（鄒景雯 2001：50）這般的紙本效忠；對於在軍中聲勢大如天、實質能夠掌握、調度軍隊，長期擔任參謀總長的「郝柏村」，[149]李登輝仍然無法真正心安。這也因此埋下了李登輝與郝柏村之間往後必須一決高下的不解之因。

不出半年的時間，李登輝逐漸坐實了「台灣總統」這個以往台灣人做夢都想不到的至高權位。接受近乎完整日本教育，在國民黨這個外省（外來）政權中蟄伏十餘年的台灣人李登輝，初試啼聲即鏗鏘有力。有效地掌握總統府外「黨」、「政」的龐大系統之後，在大部分人事維持安定的考量下，「五院院長」尚不在李登輝急迫調整的範圍之中。於此當下，與李登輝朝夕親近的總統府內人事氣象，成為了此時刻李登輝或許能夠優先調整的順序。

一如李登輝所說，他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站在這個高位上的人馬；安定人事的架構下，亦留用了大多自蔣經國時代即在位的各體系高官，例如蔣經國擔任總統時的「總統府秘書長」 —— 沈昌煥。然而這一位擔任總統首席幕僚長的沈昌煥秘書長，卻是李登輝甫任總統時，在必須極力爭取黨主席職位時，站在用力踹下李登輝那一端的反對系統。

---

149 「李登輝接任之初，顧及軍中穩定，已經在八八年留任郝柏村一年。參謀總長一任兩年，郝柏村卻已經做了八年，是極不正常的現象，必須即時調整」（鄒景雯 2001：69）。事實上，自從蔣介石掌管台灣政府以降，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毫無民主法治的禍源，擔任總統長達 25 年之久直至死在職位上；於是乎台灣各項行政體系中的無論任用條款、職務年限限制等，都成了「僅供參考」的徒具條文，毫無約束力與法治性可言。所以郝柏村成了「常任（專任）總長」，國代們成為了「萬年國代」，也就不足為奇了。

肇生於「蔣經國過世後，即使是在情況最為艱難的時刻，國民黨內的老一輩外省權力仍不願意將政治權力交給台灣人……這些人開始放出風聲：國家領導職位總統與國民黨領導職位黨主席應由不同人擔任。其中立場較為堅決的有蔣介石的八十八歲遺孀宋美齡，當時擔任總統府秘書長的沈昌煥，以及蔣經國的非親血緣弟弟蔣緯國等。」（蔡石山 2007：245）。

李登輝並沒有在取得 1988 年 1 月 27 日代理黨主席職位時，或是 7 月 8 日正式真除成為國民黨主席、權力相對穩坐後就出手拉下沈昌煥。李登輝一直等到了同年的 10 月 17 日，才由李元簇（後來與李登輝搭檔競選 1990 年末代委任正、副總統選舉）接下總統府秘書長的職位，[150]可見李登輝的沈著與忍耐應對。

接連著暫時穩定了「府」、「院」、「黨」的人事之後，前方的諸多挑戰卻一刻不停歇地持續擺在眼前等待著李登輝一一親自面對。也就在此時，緣自蔣經國時代交付李登輝與黨外人士多所接觸、互動的基礎下，李登輝有了對於 1986 年成立的新政黨 —— 民主進步黨，有著基本的了解與認識。其中 1988 年 11 月 12 日接任民主進步黨主席的黃信介，更是早已與李登輝相識。

就在蔣經國晚年釋放出的民主改革善意，逐步開放報禁、黨禁的脈絡下，1989 年的 1 月 20 日立法院終於三讀通過《人民團體法》，讓創黨之初多以黨外人士為組成骨幹的民主進步黨得以取得合法地位。同月 27 日，為因應戒嚴時期形成的「萬年國代」亂象，立法院亦通過《第一屆資深中央民代退職條例》，讓往後「老國代們」全面退場有了法源依據的相關措施條例依循。

承接蔣經國執政末期一一推展的台灣民主變革，李登輝謹遵蔣經國的路線，確實逐漸讓台灣民主改革透露出令人期待的曙光。當然，改革的幅度與效率，自不見得得到所有倡議民主大步前進人士的認可；因為兩蔣執政寫下的令人匪夷所

150 「李登輝在八八年為安排總統府秘書長人事，第一個念頭想到的就是李元簇，起初名字一時還想不起來，叫來幕僚問，以前當過法務部長、後來到政大當校長的那位先生叫什麼名字？……上午八點半與李登輝見面，敲定到總統府擔任幕僚長」（鄒景雯 2001：72）。

思「蔣氏民主」，積累了太多不合理的既有法律制度與憲政紊亂，是必須透過更多的努力與大幅修正，才能引導台灣走向正常的民主國家。

就在這一年，先是有了與李登輝同年（1923 年）出生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於 2 月份訪台，其後不久，換成了李登輝在「1989 年 3 月 6 日到 9 日前往新加坡進行正式訪問」（蔡石山 2007：252），這是在亞洲世界中兩位重要的國家級領袖相互拜訪、會晤友善表現。如同本文第一章節提過，西元 1923 年的這一年之中，亞洲地區至少誕生了除李登輝外，二位在亞洲近代史中，推動政治改革的重要領袖 —— 彭明敏與李光耀。而歷史巧妙地開展，又在著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將李光耀與彭明敏分別與李登輝產生互動又或說是緊密的關聯。

不過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與台灣的淵源，並非從李登輝主政時代才開始；「李光耀與台灣的密切關係起於蔣經國，軍事代訓最為各界所知，由於幾乎每年都到台灣度假，一九八四年開始擔任副總統的李登輝曾多次陪同李光耀到中南部參訪，有了進一步互動」（鄒景雯 2015）。

上述的「軍事代訓」，也就是普遍為世人熟知的「星光部隊」。由於「新加坡土地狹小沒有適合軍事訓練用的土地，因此自 1965 年獨立建國後，即由台灣提供基地供新加坡訓練軍隊之用」（蔡石山 2007：252），對照當時台灣外交困境的情況下，對與新加坡的交往，當然有其成效與助益；台灣當局在與新加坡政府互動的搭建上，確實下足了苦心與功夫。

回到李登輝身上，這一次的順利出訪當不是偶然，「在李登輝首度出訪東南亞國家之前，台灣已在當地有相當大量的投資。……當時新加坡人口二百六十萬人，其中 76%為華裔，他們與台灣居民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台灣與新加坡之間還有其他許多共同的核心利益，……在前述背景下，李登輝在新加坡受到李光耀總理的熱忱接待」（蔡石山 2007：252-253）。

對於李登輝首次以元首的姿態進行出訪，面對台灣一直以來的外交困境，總統在國際社會間是如何被稱呼、被何種規格接待，是所有關心台灣國際事務發展的一大重點。可想而見的，在李登輝高調代表台灣走入國際社會之際，中國政府

又怎麼可能不加以介入。不過事態的發展倒也不算太差，「新加坡則是以『來自台灣的總統』稱呼他[李登輝]。」（上坂冬子 2001：162）。

就以現在的觀點來看，稱呼李登輝為「來自台灣的總統」倒也不足為奇，甚至會讓人感覺這是再正確不過的稱呼，因為李登輝本來就是「台灣人的總統」，或說「台灣的總統」。但就當時的時空背景而言、或者現在政府體制的現實而論，台灣人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實際上官方的名稱依舊是「中華民國第 X 任總統」，政府也仍舊被成為「中華民國政府」。

加上「台灣方面因為還處於國民黨優勢的時期，所以堅持一定要於中華民國的稱謂。在這種僵局中，被稱為『來自台灣的總統』，外國人問他感想如何，李登輝只能回答說：『我不滿意，但可以接受』」（上坂冬子 2001：162）。或許我們可以解讀為在李登輝的心中他是欣然接受這樣的稱呼，但於高位上，必須有所保留與妥協，維持政權的正當性，也不應草莽、貿然行事。

總之，李登輝此次的新加坡出訪，延續著他自副總統職務以來逐漸累積的深厚外交長才，為台灣在國際社會中持續出聲；並且也讓中國政府不得不正視台灣現今雖然告別強人威權政治，但銜接而上的領袖，並非無法走進國際社會。在與新加坡的具體往來上，「除就雙方共同關切的亞洲與世界情勢交換意見，兩人[李登輝與李光耀]並簽署一項有關兩國彼此保護投資的協定」（蔡石山 2007：253），也算是交出了外交初次考試中亮麗的一頁成績。

李登輝展開了上任總統大位後，國際外交空間拓展的第一槍。而已經逐漸能夠掌握整個中央政府運作的李登輝，也沒讓手邊任何能夠有效運用、協助台灣在國際綻放光芒的政府工具閒置著。「就在此時，李登輝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心。他公開表示要對大陸[中國]採用務實外交。在北京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年度總會（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李登輝指派財政部長郭婉容女士率團赴北京與會」（上坂冬子 2001：163）。

源自於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無所不用其極的進行打壓，台灣已經連續二年沒有出席亞銀年會。「原本中華民國是亞銀成立當時的三十五個創始會員國之一，是

以 Republic of China 的國名做為會籍名稱參加的，可是一九八六年被亞銀擅自更改為 Taipei, China。理由毋庸贅言，就是因為中國大陸的壓力。……在那之後，中華民國（台灣）有兩年的期間拒絕參加亞銀年會」（上坂冬子 2001：164-165）。

此時的李登輝上任不過一年餘，即使曾經在過往副總統任內片段處理過與中國來往的「探親事務」，但在面對複雜的台、中關係，顯然仍舊尚未累積純熟的經驗。但李登輝顯然並不恐懼於中國的壓力，仍然執意參與這千載難逢、在北京召開的重要金融會議。我們可以從當時受命前往與會的郭婉容回憶中：「當時我覺得李總統英明果斷。我想李總統是認為，與其自我孤立，不如大大方方去參加」（上坂冬子 2001：165），窺見李登輝特有的勇敢與魄力。

時序走到了 1989 年 5 月許，這是距離李登輝繼任總統不過一年四個月的短暫時光，距離繼任任期的期限，也正好僅剩約莫一年之久。「依稀記得」，就在此一年多前，蔣經國剛剛撒手人寰之際，李登輝不才說過他一定恪遵蔣經國路線，更不會有所謂「李登輝政策嗎」？始自 1987 年蔣經國仍在位時即不出席亞銀年會的台灣，兩年之後就被李登輝所打破，並且是直接走進中國北京對決。李登輝似乎並不像他口中念茲在茲：「一九八八、八九這兩年是接任蔣經國總統剩下來的任期，不要有自己的政策、作法，就看他之前在做什麼，幫他完成過去沒有完成的工作」（李登輝 2008d：40）。李登輝開始嘗試走出自己的路。

就在李登輝漸漸擺脫蔣經國遺留的框架與路線約束，個人政治發展向來緊密扣連著中國國民黨的他，想要在政治上做出更多的突破與作為，自不免又必須再次回到國民黨體制的這個巢臼。不到一年前，李登輝在黨內山頭各自盤算下，幸運少費力氣的正式成為國民黨主席；當時暫且平和地壓制了掌握黨務的一方之霸 —— 李煥 —— 的進逼挑戰，但這場風暴並無因此止息，而是再一次醞釀襲來。

先前在國民黨十三全會中居於弱勢，險些丟掉閣揆職務的俞國華，倚靠著李登輝「安定人事」的謀略與權力平衡考量，暫且繼續留任行政院推動政務工作。但是隨著挾黨務自重、日益茁壯的李煥秘書長挑戰，俞國華的行政院院長職務，愈來愈加搖晃而面臨再也坐不穩的窘迫情況了。「黨大會上的緊張關係在會後轉

入立法院持續對峙，立委吳春晴質詢涉及包庇酒家女的緋聞風波引爆，讓於國華面臨前所未有的難堪之局，在聲望始終無法提振的自我壓力下，被迫於八九年五月主動向李登輝遞出辭呈」（鄒景雯 2001：67）。

表面上，這是來自立法院的立法委員發難，質疑與放大檢視閣揆的私德，但其實自「十三全會後，李登輝故意留任俞國華，壓抑李煥氣焰，……李煥人馬持續以賄賂吳勇雄立委案，女秘書緋聞案，打擊俞國華」（臧汀生 1996a：67），這些不斷進攻行政院長的手段，背後策劃者正是時任黨秘書長的李煥。加上「在俞國華請辭之前，蔣彥士與王惕吾曾雙雙面見李登輝，建議把俞國華換下來，由李煥接掌行政院，這個『說客』的組合令人難免有所聯想」（鄒景雯 2001：67），更加坐實了李煥不斷在背後操控，希望躍上閣揆大位祭出的種種手段。

李登輝卻又何嘗不知李煥的心思？擁有「武士道精神」的李登輝，難道如此輕易妥協，接受李煥的步步進犯？在俞國華請辭閣揆幾乎已成定局的情況下，[151] 李登輝首先想到的接替閣揆人選，其實仍然將李煥排除在外，「他心中的第一人選另有其人。李登輝首先徵詢意願的對象是蔣彥士……雖然蔣經國晚年並未續用蔣彥士，但是對於尚須與既有勢力周旋的李登輝而言，蔣彥士是一著好棋。……可惜蔣彥士寧愛美人不要江山，未能成全李登輝的計劃」（鄒景雯 2001：67-68）。

李登輝在此次的閣揆人事安排上，可以說是跌了個跤，即使心裡頭想要力抗李煥的勢力染指行政系統，但「當時，來自黨務系統的推舉似乎愈來愈聲勢高張，李登輝正值權力重整的關鍵時刻，若繼續再加以阻擋，無法預料黨內將出現何種狀況，李煥因此在六月一日終於如願出掌行政院」（鄒景雯 2001：68）；而黨秘書長一職的空缺，則順勢讓被視作李登輝「旗下心腹宋楚瑜全面接收黨機器」（臧汀生 1996b：67）。

[151] 或許源於俞國華的自知理虧，即使「李登輝因此認為，他不能做換閣揆的這件事，俞國華自己會有判斷。然而經過了中間人的刻意傳話，俞國華以為李登輝正等著他辭，因此知趣的向上表達辭意，但事實上李登輝接到辭呈後，並未批示，還在思考該如何妥善處理，不料俞國華已經先行一步對外公開宣佈請辭；當俞國華事後確認倒俞勢力出自何方時，已經為時已晚」（鄒景雯 2001：67），俞國華因而確定了離開閣揆的大位。

這個宋楚瑜，正是在 1988 年國民黨十三全會中與李煥共同攜手合作、全面搶攻黨內選務的宋楚瑜。這個宋楚瑜，也是後來成為台灣唯一一任民選省長，甚至數次競選台灣總統的宋楚瑜。這個宋楚瑜更是在 1988 年蔣經國逝世後引爆的代理黨主席之爭，那位「看到議程裡並沒有討論代理主席的案子，以為會上不討論這件事，就先站起來講話。當時他[宋楚瑜]是要對我表示好意。他說自己在推選代理主席的事情上踢了臨門一腳」（李登輝 2004：260）的那位宋楚瑜。

這位外省之後的宋楚瑜，迄今仍就活躍於台灣政壇，同時亦擔任一手創立的「親民黨」的萬年主席。這一位正值青壯的黨秘書長，一度為外界解讀與李登輝情同父子，但最終仍走向分手、決裂之路，於後再表。無論如何，自「代理黨主席」風波後，「宋楚瑜『公然』對抗孔宋家族的形象，立刻被輿論貼上改革派標籤，也瞬間成為國民黨內的明日之星」（鄒景雯 2001：65）。這一股氣勢，讓他順利以 47 歲的年輕之姿成為了黨秘書長，掌管了國民黨這個百年老店的黨機器。

短短不到一年的光陰過去，彷彿自十三全會後暫且各自定位的「黨」、「政」系統，霎那間被改弦易撤；兩大職務：行政院長、黨秘書長的同步換人，表示著這仍舊是各方勢力競逐、交換的政局動盪時刻。然而，台灣島內發生的國民黨內政治紛爭與不安，卻遠不及中國在這一年爆發舉世矚目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來得緊張與殘酷。一場流血衝突事件，正在紅色中國中爆裂展開。

就在時任財政部長的郭婉容代表台灣赴北京參加「亞銀年會」的一個月後，中國政府「對著在天安門前要求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學生們，人民解放軍荷槍相向鎮壓，引發流血衝突事件」（上坂冬子 2001：169）。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槍枝直指自己的人民，坦克肆無忌憚地開上人民熟悉的街頭，卻對著人民直衝；這是生活在獨裁政權下，百姓無從迴避的恐懼與哀歌。對比當時的台灣，至少已經約略能夠感受即將迎向民主改革的前輪，持續向民主、人權、法治國家邁進。

聚焦回台灣。李登輝確實沒能在此次更換閣揆之際，一舉扳倒來自守舊勢力的「李煥」系統，這也的確成為了他之後企圖選舉總統的不安因素。但至少原先代表「政院系統的」俞國華勢力，已經黯然下台；而心腹宋楚瑜全面入主黨機器，

同時亦象徵「黨權」已經率先收復，這一著，並非全盤皆輸。不過，蔣經國遺留下的三股龐大勢力中其一的「軍方系統」，卻似乎一直沒有機會讓李登輝重新加以調整與整頓，這肯定是李登輝心中急迫搬開的一塊巨大石頭。

李登輝自己也說：「在我掌握政權的過程中，最大的阻礙來自軍方。誠如『國民黨軍』這個說法所顯露的，當時一般人仍然抱著『軍隊不屬於國家，而屬於黨』的想法。必須把軍隊變成民主國家的軍隊。當時，實際掌握軍權的是參謀總長郝柏村（一九一九年生於中國江蘇省）。依照慣例，參謀總長兩年就得換人，但他任職八年之久，擁有絕大權力。……影響力睥睨軍方。他還恣意操控軍事會議，同時掌握預算」（李登輝 2015：91）。

面對簡直將國家軍隊私有化的郝柏村，由於其是直接掌握的乃是擁有部隊與國防武器的軍事強人，在制肘與權謀的削弱勢力下，李登輝當然不可能躁進行事。倘若稍有意外，不慎擦槍走火、進而引發「軍事政變」，那肯定是難以平息與收拾的慘烈結果。不同於「黨、政」中的「大鳴大放」之爭，對於軍中文化乃至人事改革，李登輝似乎更適合在狀似「寧靜與和平」中，想方設法來用「計」突破。

在台灣的國防體系中，分為「軍令」與「軍政」兩大系統。其中掌管軍令系統的是「參謀總長」一職，也就是能夠直接指揮部隊調動與作戰之人；軍政系統的領導代表，則是由「國防部長」擔任，負責軍中軍務整合與協調事宜。易言之，出任參謀總長，意即直接掌握了龐大部隊的指揮權責；郝柏村正擔任了那樣極具威脅政府正常運作的角色。

若始終無發讓郝柏村卸下參謀總長的職務，李登輝就不可能有機會將主政之手伸入軍中，進行迫切的軍事改革。於是李登輝軍事革新的首要之務，就是窮盡可能的方法，讓郝柏村脫離總長這個角色。況且，郝柏村「曾說過：『只要我在，十五年內都不會讓李登輝為所欲為』」（李登輝 2016：53），這種何其狂妄的話，聽在李登輝耳裡，肯定急欲除之而後快。

就在不動聲色下，「我[李登輝]讓他[郝柏村]升任了國防部長，名義上是升職，實際上是讓他離開最接近軍隊的參謀總長之位，使他從具有實質權力的地方

遠離，這是很大的人事變動」（李登輝 2016：53）。這個時候，也看到了李登輝逐漸外露的果斷與霸氣，誠如先前提到「在行政體系，李登輝接受現實，同意由實力派人物掌政；在軍令系統，李登輝則不再妥協，全力貫徹制度，希望擺脫軍中長期由派系壟斷的沉痾，讓軍隊逐步走向國家化」（鄒景雯 2001：69）。

但盡享軍中尊榮、獨攬權力已久的郝柏村，又豈會不知李登輝的算計釋權的權謀，郝柏村請出了官邸勢力的宋美齡說項。李登輝與宋美齡再次交鋒：「此時的我[李登輝]被召喚到蔣介石夫人 —— 宋美齡 —— 面前，她用『Please listen to me』（請好好聽我說）作為開場白，然後對我說：『能夠號令軍隊的只有郝柏村，我希望你不要換掉他參謀總長的位置』」（李登輝 2016：53-53）。

李登輝至終沒有答應宋美齡的「請求」，依舊堅持讓郝柏村就此離開參謀總長的位置。要說李登輝此次是「吃了秤砣鐵了心」，執意去貫徹他希望軍隊國家化的意志嗎？或許是。但是這也並非李登輝首度不理會「官邸」夫人派的守舊勢力聲音，不然李登輝也不可能順利當上國民黨「代理黨主席」進而真除主席。

話說回來，姑且不論蔣經國非宋美齡之子嗣，單就宋美齡早在國民黨還在中國執政之時即已在國際間大放異彩，在蔣經國主政後仍然保有極具實力的影響力，「當時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在國民黨大老之間，仍然握有很大的權力」（李登輝 2015：91）。李登輝接連兩次在重要議決上否定了宋美齡的堅持，我們就必須給予初掌權的李登輝，一個「勇於任事」的高度評價。

要知道，「李登輝此一象徵性的勝利似乎是宋美齡 1990 年 9 月 21 日決定離台赴美國紐約定居的原因」（蔡石山 2007：250）；而王牌已經打完的郝柏村，也只能「心不甘情不願的接受了國防部長的職務」（柯義耕 2008：212）。當然，李登輝這一次精心策劃的強卸郝柏村兵權，卻只是李、郝兩人交手的序章，李登輝沒有因此就充分的掌握住「軍權」；往後的發展，郝柏村也自不可能就此退讓。李登輝與郝柏村的高手過招，將在後續的篇章繼續上演。

三、　自己創造的新總統任期

很快地，繼任蔣經國遺留的兩年四個月總統任期即將到任，意味著李登輝必須做出是否如同嚴家淦前總統般就此退休、離開總統職位？或是另有規劃，自此寶劍出鞘、劍指台灣人從未有機會參與擔任候選人的總統選舉，繼續推動李登輝期望的台灣民主政治革新？若為後者，「在推動任何有意義的改革前，李登輝必須先為他自己贏得一個新的總統任期」（蔡石山 2007：259）。

我們先看看當時候的總統選舉制度以及能夠參與投票的代表組成。在 1996 年台灣首度開放公民直選總統以前，正、副元首的產生，都是經由組成「國民大會」的「國大代表」進行「委任投票」的選舉方式而成。1990 年的這一次正、副總統選舉，同樣是架構在上述的憲法制度下進行投票選舉。那麼「國大代表」如何產生？又是什麼樣背景的人士，組成了「國民大會」？這是李登輝是否有機會挑戰成為透過選舉選出，成為國家元首一事，至關重要的成敗之所在。

> 國民大會擁有「選舉與罷免總統、副總統以及制定憲法」的權限。但是國民大會的代表簡直就是具有終身不下台的資格，所以美其名是「國民」大會代表，實際上根本是與國民黨毫無關係的獨裁體制。國民大會代表的職位，要等到有一天反攻大陸凱旋成功之日才能改選。根據這個論調，由於無法處理大陸[中國]各省的事，所以能填補已死亡的國代缺額的，只有台灣地區的名額而已。當初蔣介石成立國民大會之初，總共有將近三千名的國代，歷經四十年自然淘汰的結果，第八任總統選舉時[1990 年]的國代已減至六百人左右。（上坂冬子 2001：170-171）

一般而言，這些大都來自跟隨國民黨政府自中國撤退到台灣的國大代表，就是象徵著「外省」身份的最佳表徵。以至於形成了在國民大會的組成上，嚴重呈現著族群比例的失衡，做為這塊土地上真正比例高的台灣其他各族群來說，制度的扼殺與錯誤發展，使得「國民大會」並沒有真正代表國民的聲音。面對這群既老又病的老國代們，「萬年國代」適當時候大多數台灣人普遍的稱呼與共識。

先前提到過，「外省集團」壟斷了大多數台灣島上本該共享、共治的政治資源，但在憲法、法律、臨時條款的種種保護下，台灣人實在難以透過法制的精神，

去尋求以正當手段來改善民主遲遲無法深化的泥淖。再者，因緣際會下成為台灣人總統的李登輝，繼任兩年許的光陰中，逐漸在統治台灣主要組成的「黨政軍」各系統中，插手介入、積極調整；這般攪亂既有權力分配者的衝撞作為，同時也打翻了長期以來外省權貴們端得好好的碗。這些「溫水煮青蛙」的動作與權力重分配，看在有心的外省集團眼裡，又豈能嚥得下氣、不刺紅眼？

究竟是否迎戰外省集團？以及李登輝尋求競選總統可能帶來的抵抗與衝擊？仍必須確定李登輝是否準備好參加這場戰役。回顧 1988 年李登輝「剛接任總統一職時，賡續蔣經國未竟的政治改革路線，『資深民代退職條例』、『人民團體法』，已經在立法院初步完成，民主改革的動力開啟，但民主化的工程尚未累積一磚一瓦。在強烈的使命感驅使下，李登輝決心放手一搏」（鄒景雯 2001：72）。

其實就過往兩蔣父子統治台灣近四十年的脈絡來看，在競選總統這件事由時任國民黨的總裁或主席來出馬領軍，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況且在 1988 年名正言順、透過黨代表大會選舉，拿下國民黨主席這個至高權位的李登輝，在所謂蔣經國後的接班梯隊中，自已無人可以望其項背。但會讓李登輝一度猶豫，甚至退休成為了他的選項之一，除了對於「國民大會」無法全然掌握與信任，以及「台灣人的總統要再參選總統，難免會遭遇頑強的反抗」（上坂冬子 2001：171）外；更重要的，是台灣人從來沒有機會參與這樣的選舉，我們甚至可以說，即使李登輝本人準備好了，台灣人民卻也不見得能夠快速適應這樣重大的變遷。

「總之，在戒慎恐懼、步步為營的氣氛中，李登輝決定參選第八任總統」（上坂冬子 2001：171），也代表須挑選一位合適的副手人選，來共同角逐正、副總統大未。「依照國大的政治生態，以及省籍平衡的現實要求，李登輝明瞭他必須找個外省籍、為國大代表接受、能夠合作的副手，……報紙當時的揣測極多，各路逐鹿人馬施放消息，李煥也傳來有意更上層樓的訊息……」（鄒景雯 2001：72）。

自從李登輝擔任總統以及國民黨主席以來，我們不難發現，李登輝的用人，往往不會順應群眾的鼓燥，經常不按牌理出牌，運用他特有的哲學，安排人事到他刻畫中的定位上。李煥沒有在十三全會帶著黨內高人氣直攻閣揆，宋美齡的極

力勸阻下、李登輝仍執意撤換參謀總長郝柏村，一度希望啟用蔣經國晚期已然失勢的蔣彥士出任行政院長；這些種種，再再證明李登輝有他用人的堅持及想望。

搭檔參選總統的副總統人選，李登輝再次沒有呼應來自黨內各大勢力的期待，包括雄踞一方、躍躍欲試的行政院長李煥，而是「提名了生性溫厚的外省及人士李元簇作為搭檔，這主要是考量到黨內外省勢力的意向」（上坂冬子 2001：171）。想當然這樣奇特的副手選擇，敲碎了既有山頭們的美夢，「這項未按權力牌理出牌的人事安排，引起黨內李煥、郝柏村、蔣緯國等人比預期更為強力的反彈，群起反對李登輝晉用『沒有聲音』的幕僚長當副總統」（鄒景雯 2001：72-73）。一場包藏私心的政治權力角力與鬥爭，即刻上演。

一如以往，將在國民大會中競逐正、副總統的國民黨提名人選，仍然如同 1984 年蔣經國在國民黨會議中宣佈提名李登輝競選副總統一般，1990 年的第八任國民黨提名正、副總統參選人，也是照著這個模式進行。1990 年國民大會選舉正、副總統前夕，國民黨預定於 2 月 11 日召開臨中全會來確定總統、副總統提名人選，也就是李登輝與李元簇的搭檔正式確立。

但擺明不滿以及唱反調的「李煥們」[152]，在國民黨內卻也不是泛泛之輩。各自掌握的深厚人脈與行政資源，自有一番狀似足以與李登輝分庭抗禮的氣象。一場無可避免的權力鬥爭，在 2 月 11 日臨中全會前夕，不斷在私下串連與進擊；甚至，李煥們擺出的陣仗，是要一舉打下在他們的眼中「若不是蔣經國突然過世，總統大位才會讓李登輝暫時『端著』」（鄒景雯 2001：73），非我族類的李登輝。

> 針對我要參選總統，郝柏村、李煥（一九一七年出生於中國湖北省，當時的行政院長）等人連日開會密談，似乎在策劃著什麼。黨內反對勢力擁立蔣緯國（一九一六年，生於日本東京，蔣介石的養子，當時的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出來競選。針對這種情勢，我一一造訪年邁的國大代表，贈送自己的論

[152] 李煥們：係指前述公開反對提名李元簇擔任副總統的李煥、郝柏村、蔣緯國等，其中又以對於在政治倫理上最為接近副總統職位的時任行政院長的李煥，最欲更上層樓、接任副總統大位，是以概括稱呼為「李煥們」。

文集，鍥而不捨地請求支持。結果，蔣緯國連推薦人數都無法爭取到足夠的人數，只得放棄候選資格。（李登輝 2015：94-95）

這是多年後李登輝在新著《新・台灣的主張》中短短幾行字、輕描淡寫地回憶起這段往事，但當時的情勢險峻，顯然並無法如同事過境遷般的輕鬆。「『當時，李煥與郝柏村幾乎天天聯繫商量。』李登輝敘述，但他始終不知情，以為一切似乎皆能按著計劃進行著，……沒想到，[二月]十日下午卻出現了驚心動魄的大事。國民黨副秘書長鄭心雄傳來消息說，他適才到行政院，看到當時任國防部長的郝柏村剛離開，行政院長李煥對他說：『我們是自己人，這是絕對機密的事，明天的提名要改變。』鄭心雄把這個不尋常的跡象機警的向李元簇報告，李登輝聽完李元簇神情凝重的轉述後，感到事有蹊蹺。」（鄒景雯 2001：73）。

古怪的事情不只一樁。「同時，某警政首長也來電告知，有人向他串聯，明天的提名有變，到時候靜候通知。當天是元宵節，李登輝的秘書蘇志誠預備五點半下班，經過大門口時，聽到警衛隨口提到行政院長在總統府內，蘇志誠頗為奇怪，總統已經準時下班，又是節慶日，李煥到府中找誰？在好奇心驅使下，蘇志誠詢問警衛『院長有什麼事啊』警衛隨口答覆『院長去見郝部長』。此事非同小可，蘇志誠立即向李登輝報告，情況有問題」（鄒景雯 2001：73-74）。

這一種不尋常的現象，自然必須快速了解應對，「得知訊息的李登輝毫不浪費時間，在中常會召開前即對委員們展開密集遊說」（蔡石山 2007：259）。除了盡可能掌握資訊與「固票」之外，「在得知一場『政變』正在醞釀後，為了穩定軍心，李登輝當晚把鄭為元[前國防部長]、陳燊齡[李登輝提拔，取代郝柏村的參謀總長]叫到官邸，探詢軍中有無聽到風吹草動，他倆都說局面很好。李登輝確認軍中並未介入，當即指示參謀總長陳燊齡，『明天不論發生什麼事，部隊都不能出問題』」（鄒景雯 2001：74）。

盡可能地固票、力求軍中穩定，這是李登輝尚可控制的停損範圍；然而面對「『敵暗我明』的劣勢下，總統、副總統人選究竟會不會被翻牌，根本沒有人可

以掌握情況。蘇志誠因此心生一計，當晚他沒有回家，繼續留在辦公室打電話給幾個熟識的新聞界人士。蘇志誠告訴他們，明天提名李元簇的情況會有變，最好一早到中山樓會場圍堵這些當事人，即可得到答案」（鄒景雯 2001：74）。此舉無非是希望透過媒體的力量，讓這個在暗地裡密謀的政變，能在會議進行前直接暴露在大眾監視下的陽光之中，讓有心人士百口莫辯、乃至心生退卻。

就在詭譎多變、驚濤駭浪之中，1990 年 2 月 11 日國民黨的臨中全會如期舉行。以李登輝為首的這群「國民黨新貴」，運用了各種可能的防範措施，終使這一股尚未能成氣候的「倒李派」未能成功。當然，還是出現了一些尚且可控制的小小亂流，「當天會議上，應以什麼方式通過總統副總統的提名人選，就產生『票決派』與『起立、舉手派』兩大陣營的激烈辯論，最後『起立、舉手派』以九十九對七十的票數獲勝，一八〇為中央委員全數以起立的方式通過對李登輝的提名，以舉手的方式通過對李元簇的提名」（張正修 1996b：84-85）。

然而這一場「反李」的鬥爭，並未因此畫下休止符。雖然這一場李煥、郝柏村等人策動的政治鬥爭在國民黨臨中全會上未能告捷，但是，信心滿滿的「李煥們」集團，仍舊圖謀不軌，希望直接訴諸國民大會中的總統、副總統選舉，再次提出候選人與李登輝決一高下。不只是要拉下台灣人總統李登輝，更是希望將流入台灣人手中的政權，再一次重新回到外省權貴手中。

李煥們卻也真正善於心計與審度時事，他們找出了具有「本省籍」威望與影響力的林洋港司法院長，以及蔣介石養子的蔣緯國國安會議秘書長共同搭檔，要在即將到來的 3 月 21 日、22 日國民大會中競選取代李登輝政權。這樣的舉措，當然壓得李登輝無法輕鬆看待，再次進行了縝密的因應行動。其中包括了召回時任駐日亞東協會代表的蔣經國公子 —— 蔣孝武 —— 來勸退。「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聽到兩人[林洋港與蔣緯國]要參選時，嚴詞抨擊叔父蔣緯國說，蔣家不推出接班人是父親的遺志，怎可無視於此。蔣孝武希望蔣緯國能放棄出馬參選的念頭」（上坂冬子 2001：171-172）。

另外李登輝也同步進行其他種種的作戰策略，以確保此次競選總統之職志，不會因為舊有勢力的作梗與阻礙，掀起了變天的可能。「二月十二日開始到三月三日，在這關鍵性的半個月中，李登輝依序分別約見郝柏村、蔣緯國、陳履安、林洋港、李煥，表達善意進行疏通，並示將繼續借重、不會秋後算帳之意，來穩定政局，……李登輝在三月初也同時掌握到，『林蔣配』事實上的鐵票遠低於外界想像，林洋港約為四十票，蔣緯國也只有七十六票，不僅未及一百多人的提案門檻，估計要在三月二十一日投票日之前累積『變天』的實力，並不容易」（鄒景雯 2001：76-77）。

至此，李登輝總算心中能夠稍微踏實一些。接著下來，就是走一個順應黨內大老們期待的過場，胸有成竹的李登輝，「馬上邀請黨內八大老 —— 謝東閔、陳立夫、黃少谷、袁守謙、倪文亞、李國鼎、蔣彥士、辜振甫至官邸，拜託他們調解黨內的鬥爭」（張正修 1996c：85）。對於重視倫理與排資論輩尤重的國民黨老店，「尊老」的舉動確實可以收到一些期望中的好效果。

而上述所謂的過場，則是因為事實上「李登輝認為，『八大老根本就沒有起作用』，同意八大老的出現，是讓大家有講話的宣洩管道，真正有心調和鼎鼐的，在他眼中則屬省議會議長蔡鴻文，蔡鴻文當年多番穿梭奔走，確實發揮了實效」（鄒景雯 2001：79）。此時的李登輝，彷彿已然完全精通了在政治運籌上所有該有的秘訣與手腕，面對「政權的有效掌握」，台灣政壇中似乎已無人是其對手。

就在李登輝發動一系列佔票、固票，甚至出動黨內大老協調、省議會議長疏通等排山倒海手段之後，「林洋港也深知國大情勢懸殊，隨後在三月九日下午在台北賓館辭謝國代的推舉。……國安會秘書長蔣緯國接著也在十日宣佈退選，政爭危機正式解除」（鄒景雯 2001：79-80）。「1990 年 3 月 23 日，國代投票結果在陽明中山樓會議大廳揭曉，李登輝以超過 80%得票率順利當選中華民國的第八任總統」（蔡石山 2007：260）。這是第一個經由選舉選出的台灣人總統。

或許真的是歷史的偶然，也就在李登輝焚膏繼晷、日以繼夜精算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企圖贏取總統大位的當下，台灣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由學生自主

發起的公民運動，史稱 —— 野百合學運。「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六日，幾名抗議國民大會是『萬年國大』的大學生，開始在中正紀念堂（蔣介石前總統的紀念設施，在當時是禁止遊行、集會的地方）靜坐，為野百合學運拉開序幕。媒體報導之後，支持者陸續聚集，很快就暴增到六千人的規模」（李登輝 2015：95-96）。

> 他們輪流站到台上，不斷批評政府。這是戒嚴時期台灣無法想像的事。當時我雖身處學生所批判的「權力頂端」，但我認為這些學生是富有愛國心、滿腔熱情理想的年輕人。於是，我召集治安單位的負責人到總統府，嚴令他們「絕對不可傷害學生」。即使在南國台灣，三月的夜晚還是很冷。得知學生在冷天靜坐顫抖，我想直接到廣場探視學生，與學生對話。但國家安全局百般規勸，說無法保障我的人身安全。……那是我當時的人生中，最煎熬的一段時間。因為擔心學生，我徹夜難眠。三月二十日我承諾學生所訴求的，召開國是會議，並同意接見學生代表。學生方面回覆願意「接受」我提出的邀請。……我仔細聽完他們的話，承諾加速民主化等。（李登輝 2015：95）

李登輝沒說的，是在將蔣介石奉為神祇的老舊國民黨思想中，如何能夠接受大規模群眾聚集在「中正廟」抗議，更何況如果是發生在台灣仍舊戒嚴之中。這透露出 1990 年代的台灣已經正在邁向民主轉型之中，慢慢告別威權時代種種恣意剝奪人民當享有的基本權益。於此當中，我們也看到了新一代強人李登輝心中的溫暖；或許，在這些年輕學子身上，李登輝也看到了年輕時「身為日本人」的自己，當時候滿腔熱血，急欲報效日本祖國的愛國之心。

這一場學運的訴求，主要有「四個要求：(1)解散國民大會，(2)廢除臨時條款，(3)召集國是會議，(4)訂定政經改革的時間表」（張正修 1996d：88）。這些攸關台灣民主發展的最根本訴求，在不久後，的確也一項、一項逐一在李登輝手中推動完成或奮力實踐。這是一場意想不到的學生運動勝利，而當年參與野百合學運的若干學子，踏入社會後亦紛紛投入公共事務的領域中工作。歷經十幾、二十年後，許多也成為了當代台灣社會中，各具貢獻的佼佼者。

無論如何，「內憂外患」的李登輝，排除萬難達成了成為台灣史上第一位「選舉」產生的台灣人總統，這一年，他已經 67 歲。由於此時台灣總統的任期仍是 6 年一任，意即若是李登輝順利坐滿這一屆任期，屆時他已然是 73 歲的高齡了。於是李登輝甫就任第八任總統時，就向外界宣告，「半年內使社會治安收效，一年內終止動亂，兩年內完成國會全面改選，六年後和李元簇一起退休」（鄒景雯 2001：92）。是的，李登輝預告將在六年後退休。

我們當然知道，李登輝至終沒有忠於自己的宣示，而是在 1996 年繼續尋求總統的連任之路，詳細原因往後章節會再補充。那麼我們更想知道，可謂力抗群雄，總算定於一尊的李登輝，接下來的台灣民主改革之路，將如何持續進行。就在這個時候，已經成為合法政黨的民主進步黨，開始了有正式機會與國家元首對話的空間。李登輝當選總統後不久的 1990 年「四月二日，李總統與當時的反對黨 —— 民進黨主席黃信介見面，開啟了台灣兩黨政治的新時代」（柯義耕 2008：225）。對於亟待民主深化的台灣來說，這一場會面，具有特殊且重要的意涵；即使民進黨仍在野，至少看見了台灣民主已不是唯國民黨一黨獨大的詭譎發展。

就在李登輝順利平息黨內爭鬥，以及「野百合學運」和平落幕後，終於以台灣人之姿，透過選舉成為第八任總統後，李登輝自然也就更有餘力能夠去面對與處置過往擔任繼任總統兩年多來，一些懸在心上，始終無法加以排除的難題。由於李登輝是承接著自己任期的新任總統，自沒有移轉政權這般問題的產生，在下一任期開始之前，李登輝就已經能夠開始佈署相關的人事安排與調整。

由於郝柏村長期澈底地把持了軍中的大小事務，先前「郝柏村擔任總長期間，軍中大至軍事採購，小到例行事務，李登輝完全尊重郝柏村的專業意見……但是郝柏村長期掌控軍隊、擁有龐大權力與財源，卻讓李登輝心中始終充滿著疑慮，不得不以貫徹人事升遷制度來防弊除害，同時活絡其他人才的進階管道」（鄒景雯 2001：71），於是我們看到了李登輝於 1989 年底，不顧宋美齡的極力反對，仍舊強勢轉換郝柏村的職務，讓郝從賴以維權的軍令系統離開，轉至軍政系統。

然而即使郝柏村成為了理論上只管「軍政」事務的國防部長，這一點卻不足以使他真正脫離對軍中各種事務的插手與干涉。況且，第八任總統選舉前夕引爆的「二月政爭」，在反對李登輝勢力裡頭，更是時常看見郝柏村穿梭其中的身影。再次回想「黨政軍」的三股龐大勢力，此時的俞國華算是淡出台灣政壇的紛爭；然已由黨務出掌政務的李煥，二月政爭時拉攏了郝柏村希望藉以結盟「奪權」，這些種種挑戰與抵抗，看在李登輝眼裡，又豈能袖手旁觀、心如止水？

李登輝在此下了一著技術高超的絕佳好棋，他將因應新任期到來、即將進行依照慣例改組內閣人事案的這件事情中，腦筋動到了撤換李煥、讓郝柏村上的權謀安排上。其實一開始並沒有規劃讓李煥離開閣揆的位子，「李登輝先前曾經在三月三日約見李煥，表示願意繼續留用他為行政院長，但是三月七日早晨李煥對黨主席一職的在意，無法不讓人聯想他的意圖」（鄒景雯 2001：92）。

面對李登輝執政以後，李煥的步步進逼以及已然失控的荒唐作為，甫贏得艱困選舉的李登輝，當然不會再有耐性留任李煥這個眼中釘、心中刺了。但要安排什麼樣份量重的人來取代李煥？與李煥相互結盟，持續握有軍中實質影響大權的郝柏村，成為了李登輝心目中的不二人選。

所謂「一桃殺三士」，李登輝早已收復了「黨權」，在時機更加成熟後，「又利用李煥介入『主流』、『非主流』黨爭的機會，趁勢由最具實力與發起反對李登輝的『非主流』大將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如此就輕易瓦解了『非主流』的陣營，同時逼退了李煥」（吳建國 2017：315-316）。這是李登輝的高明手段，讓反對勢力產生內部矛盾，達成他逐一擊破、鞏固政權的策略安排。

事實上，若是當時雄踞軍方勢力的郝柏村，在面對李登輝接二連三的人事安排調動上，能夠靜下心來審度一切，而不是被自己的權力薰心沖昏了頭，[153]李登輝絕不可能如此順利的瓦解他心心念念、惶恐不安的守舊勢力。當然，傳出「軍

[153] 按照李登輝的觀察說：「隨後的組閣過程，出現所謂的『超水準人事』，就是將國防部長郝柏村升任為行政院長。從國防部長轉任行政院長，對他來說，算是大大地出人頭地、仕徒高升。人就是難以抵擋權位和金錢的誘惑。郝柏村欣然接受了這項人事的安排，答應脫離軍籍」（李登輝 2015：98），此時的郝柏村應當也還未意識到，這項貌似給足甜頭的人事安排，實是有毒的。

人組閣」引發民間群起撻伐的反對聲浪，也正巧幫了李登輝一把，為了接掌閣揆大位，郝柏村也只能「辭去軍職」，[154]卸下了一生軍戎。無形中促使了李登輝更加的有恃無恐，李登輝也才更能有機會安排信任的人事進入國防的系統。[155]

總之，1990 年 5 月 10 日，李煥內閣提出總辭；待命組閣的新任行政院長郝柏村內閣團隊，也即將在 6 月 1 日正式上任。台灣人總統李登輝，在面對長期以來外來政權國民黨的高壓統治下，漸漸走出屬於自己的路。接連排除了舊有勢力俞國華、李煥之後，即將新職就任的李登輝，想必更有機會能夠推動台灣民主改革；也更有餘裕，去處置、甚至是剷除最後遺留下來、殘存的郝柏村勢力。

第四節 此一時期國族認同狀態分析

上一個時期是李登輝正式進入國家體制內的從政早期，延續著終戰以後建立的「中國認同」，在前兩個時期我們都發現李登輝的國族認同狀態，其中重疊的重要標籤，是具有「省籍意識」的國族認同，意即省籍意識牽絆著中國認同的主要核心。到了本時期的 1983 年開始，省籍意識漸漸地退出左右李登輝國族認同的狀態要素，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外露的「中華民國版」中國認同標籤。

1984 年成為中華民國副總統，乃至於 1988 年繼任成為中華民國總統（第一位台灣人總統），這兩個分別代表著中華民國正、副元首的重要記號，勢必然緊緊跟隨著李登輝所呈現的國族認同狀態。於是，我們從中找尋著李登輝完成「中華民國版」中國認同的輪廓，包括歷練副總統時的重要歷程、繼任成為國家元首

---

[154]「李登輝為了擺平非主流而邀請軍人郝柏村出任閣揆的消息傳開後，學生再次齊集中正廟[中正紀念堂，現為自由廣場]抗議，『全民反軍人干政聯盟』的抗爭行動於焉展開。……[李登輝]決定請蔣彥士轉告郝柏村自動申請除役，否則將連署總統將其除役，以尊重憲法第一百四十條文武分治的精神」（張正修 1996d：49）。為了撫平民間反對軍人組閣的聲浪，「他[李登輝]也在五月二十六日批准郝柏村的除役申請，讓郝柏村脫下了一級上將的軍服」（鄒景雯 2001：94-95）。

[155] 蔡石山的觀察中提到：「首先李登輝撤換了行政院長李煥，由七十二歲的郝柏村出任新政院長組織新內閣。李登輝的此一人事安排巧妙地達成一石二鳥的功效：一方面拔除李煥的政治影響力，另一方面則剷除了郝柏村在軍中的殘餘影響力，這一安排也提前消除任何軍事政變的可能。在確保總統任命高層將領的權限後，李登輝開始任命他信任的人馬到重要的軍事領導位置上。他不只讓一位文人接掌郝柏村留下的國防部長職位，並提拔了一批台籍將領，其中包括出身高雄的莊銘耀上將擔任國防部副部長」（蔡石山 2007：261）。不過蔡石山看待李登輝安排郝柏村出任閣揆一事未免過度樂觀，卸下軍職的郝柏村，並沒有因此直接斷掉對部隊的掌控；所謂文人部長「陳履安[也是]最後在郝柏村堅持下出線」（鄒景雯 2001：95）。

的經過，以及此時李登輝已經認真表達過去不願觸及的「政治事件」議題，比如是否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如何彰顯中華民國主權等。

另外，誠如本時期的標題所示，此一生命階段的李登輝，在其生命史上亦可稱作其從政經歷的「躍升時期」；從台灣省主席、中華民國副總統、中華民國總統，這是短短不到五年的時間，李登輝成為了台灣最有權勢的國家領導人。在逐漸掌握了凡人所不能及的權勢權位以後，李登輝似乎也慢慢地浮現了以往少有浮現的「台灣意識」：轉籍長老教會、與台獨人士交好、似有若無接受台灣總統稱謂，都讓人看到李登輝嘴上或許不明說，但台灣意識確實已經悄悄抬頭。

儘管本時期我們能夠看到李登輝的台灣意識緩慢浮現，但更加外顯與充分展現的，依舊是無庸置疑、無可迴避的「中華民國版」的中國認同。在此刻意強調「中華民國」，乃在於世上尚且存在著另外一個「中國」，亦即擁護共產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也是本階段「中國認同」的具體說明與限縮。

最後，在順利承接大位以後的李登輝總統，在外省權貴勢力保守且強大的抵制下，李登輝為了延續心中為台灣擘劃的藍圖，採取了心思縝密、機關算盡的方式，總算繼續他的執政權力。這是本時期末段中，李登輝最為忙碌的重要大事。於是在本生命階段中，有了三個重要的組成脈絡，分別是：「中華民國認同」、「緩慢浮現的台灣意識」，以及「初登大位的政權保衛戰」，於後接續展開。

表 5-1：本階段時代大事與生命史事件：浸淫國家體制內的從躍升時期

時間	時代大事	生命史事件
1984 年	10 月 15 日，爆發「江南事件」	2 月 15 日，經國民黨第十二屆中全會通過提名為黨副總統候選人
		3 月 22 日，與蔣經國共同當選中華民國正、副總統
		5 月 20 日，就任中華民國第七任副總統
		蔣經國藉李登輝之手，釋放部分主張台獨的政治受刑人，並成為橋樑
		9 月 12 日，代表蔣經國至南非外交訪問；其後多次代表總統出訪友邦

1985 年	8 月 16 日，蔣經國宣布蔣家人不再任總統	
1986 年	9 月 28 日，民主進步黨成立	
1987 年	7 月 15 日，台灣解嚴	9 月 16 日，蔣經國授命領導「新大陸政策特別委員會」，負責台灣外省人回中國探親事宜
	11 月，開放中國探親	
1988 年	1 月，開放黨禁報禁	1 月 13 日，因蔣經國總統任內逝世，依憲法規定繼任總統，成為第一位「台灣人」總統
	1 月 13 日，蔣經國總統逝世	1 月代理國民黨主席，7 月真除為國民黨主席
1989 年	6 月 4 日，中國爆發「天安門事件」	3 月，至新加坡訪問，被稱為「來自台灣的總統」
1990 年	3 月，爆發「野百合學運」	3 月，與李元簇搭檔參選中華民國第八屆正副總統並當選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一、　中華民國認同

李登輝的中國認同，到了此一生命階段，最重要的記號莫過於「中華民國」。但是要構成中華民國版的中國認同，尚有三個重要的觀察，依序是：（一）歷練特殊國家備位元首，（二）繼任成為中華民國總統，（三）抗拒中共彰顯兩個中國。我們首先進入「歷練特殊國家備位元首」的討論。

接續上一時期末的敘述，自 1983 年的中末以後，李登輝在眾多台籍政治菁英中冒出頭來，成為了蔣經國屬意的副總統不二人選。那麼為何最後會由排資論輩並非第一的李登輝，擊敗其他可能的副總統人選？原因肯定諸多，但李登輝自己這麼表示：「雖然沒有確切的證據，但我認為，蔣經國應該是很欣賞我的『日本特質』。對工作有責任感，誠實做事、不說謊。我沒有特別想要飛黃騰達的慾望，所以也不逢迎拍馬。因為這些特質，蔣經國肯定我」（李登輝 2015：87）。

當然，沒有人是蔣經國，蔣經國亦未曾公開表示他的選人標準，更遑論現今也早已無法驗證李登輝最終脫穎而出的決定性因素。但向來推崇與尊敬蔣經國的

李登輝，更進一步詮釋道：「基於這點，直到現在我還是非常尊敬蔣經國先生，因為他會去思考一個性格像日本人的本省人，能在什麼地方派上用場，也因為這樣，我才能得到成為第一個台灣人總統的機會」（李登輝 2016：49）。

上述李登輝所說「成為第一個台灣人總統」，這當然是屬於「後話」了。事實上，若非蔣經國突然猝逝，李登輝是否就能成為台灣人總統？可能一切都在未定之天。所以鄒景雯才會描述道：「在李登輝原本的生涯規劃中，八四年他從黨內群雄脫穎而出，獲蔣經國提名為副總統，已經是人生的頂峰，他一直認為，在九〇年完成任期，就是他結束宦途的理想終點」（鄒景雯 2001：49）。

這應當是更加貼近李登輝甫任副總統時的心境，「因此從八七年開始，他開始逐步把幾個從省府帶進府內的幹部，一一安排到其他單位另謀發展，正是為個人的退休作準備」（鄒景雯 2001：49）。在這樣的認知前提下，我們一一來看到成為副總統之後的李登輝，為何是筆者描摹的「歷練特殊國家備位元首」。

一如先前提到過的，自從接任台灣省主席、進入權力核心之林後，台灣人李登輝開始擔負起代表執政黨與民間溝通對話的角色，這個付託，在升任副總統之後，沒有減少、只會增多：「當時反對的力量愈來愈大，黨外人士也一天比一天無所畏懼。蔣經國因此要我和黨外人士溝通，第一就是讓我處理釋放美麗島人士的事。我就任副總統沒多久，蔣經國就叫我做溝通的工作，這是因為我是台灣人，也可以提高台灣人李登輝的地位」（李登輝 2008b：196）。

「提高台灣人李登輝的地位」，當然是李登輝自己的詮釋與解讀；也或許這是李登輝自己意外成為蔣經國提拔的副總統，內心中相對無法自信，需要透過「承攬」更多來自蔣經國交付的任務，從執行中感受自己的真實與不凡。因為由另外一個例子來看，李登輝的確刻意強調是蔣經國在打造李登輝的不同：「我在副總統時期沒有負責什麼外交工作，只是因為蔣經國的身體狀況已經不太好了，長久以來都無法走出去，所以由我代表他出國，一方面也可藉機提高李登輝的身價」（李登輝 2008b：175）。

備位元首代表元首進行外交出訪，又是在蔣經國身體狀況不甚良好的情況下，彷彿是種天經地義的事，卻在李登輝的解讀中，增添了「提高李登輝身價」的色彩，可見李登輝並不安心於已然坐上的副總統職務，也或許，是李登輝謙虛與客氣了。因為即使如此，李登輝也說：「成為他的副總統之後，蔣先生刻意，甚至非常詳細地安排，讓我在自然狀況下了解軍事、外交等非常多的國政內容」（李登輝 2009：39），這也是筆者所說：「特殊」之所在。

再怎麼說，「蔣先生大概不會想到自己會在任期中過世，任命李登輝為副總統，不過是找人協助處理國政，政局仍完全掌握在他手中」（李登輝 2009：39），於是本應直接由總統親理的「國防」與「外交」，卻在不著痕跡下，讓不需管事的副總統李登輝一點一滴地碰觸，當然是很特殊的情況。

不僅如此，「蔣經國也要我和總統府各局局長多接觸，瞭解他們的工作內容。……以前副總統和局長聯繫是被禁止的，畢竟總統府並不屬於副總統，但總統卻要我去看看大家在做些什麼。……蔣經國也會叫參謀總長不定期向我報告」（李登輝 2008b：156）。這些都是「歷練特殊」副總統的證據所在。

當然李登輝心中並非沒有掙扎，他的心中依舊有著「信仰」的存在；李登輝道：「神對我說：你六十歲以後要到山裡做我的工作。後來我從政，到六十歲時，我正擔任副總統，無法履行和神的契約，不知道怎樣才好，為此感到掙扎。周[聯華]牧師知道這件事後，就寫一封很長的信給我，勸我好好當副總統，因為副總統很重要，影響力會比在山上傳教的牧師更大，期許我透過副總統的職權，幫助老百姓面對信仰的問題」（李登輝 2008b：199）。

顯然李登輝在副總統任上，徬徨於對於信仰與工作間無法取得心中完美的平衡狀態；周聯華牧師的一封信，或許給了李登輝新的心靈啟發，讓他得以繼續堅持在從政之路上。當然務實地去看，周牧師所描述的副總統職權輪廓，肯定不是台灣國家備位元首的職責所在，但他的確提供了李登輝內心的平靜，也更加無懼的「充分利用他擔任副總統的時間，做好準備，等待契機」（柯義耕 2008：207）。

第二個形成「中華民國版」的國族認同印記，就是李登輝在 1988 年「繼任成為中華民國總統」。時序稍往回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行憲紀念日的典禮上，蔣經國總統甚至宣布：『蔣家後代不會再繼任總統了』」（李登輝 2015：88）。這件事情，與李登輝就在後來不到一個月的 1988 年 1 月 13 日繼任總統當然沒有直接的關聯；但是如此重大的宣示，對於時任副總統的李登輝，肯定收到若干的衝擊與啟發。如同柯義耕（2008：197）所說：「多年後，李登輝讚揚蔣經國決定結束蔣氏王朝的做法。他說：『經國先生宣佈蔣家人不會再擔任總統，因為他已經決心讓台灣人來治理台灣』」。

這是又一次李登輝揣摩蔣經國心中的想法，或許待過「蔣經國學校」長達六年的李登輝，真能猜中蔣經國話語的背後意涵也說不一定。「台灣人」李登輝後來的確當上了中華民國總統，無論是接任蔣經國遺留下的總統任期，或是 1990 年、1996 年，透過選舉為自己取得的政權。

只是就在李登輝繼任總統之初，事態的發展以及瞬息萬變的國內政情，卻也不是「自視甚高」的李登輝，容易輕鬆以對的複雜狀況。李登輝勢必必須及其快速地調適心態，面對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李登輝事後回想，『剛坐上總統位置，對於國家元首究竟該做什麼事，實在不清楚，也根本站不穩，最好的辦法就是儘量觀察，不必急，也不能急，因此最初兩年，我完全沒做什麼事』。所謂的沒做什麼事，較精確的定義是『少說多做』的低調行事哲學，當時李登輝在不動聲色的情況下，默默處理了諸多棘手難題」（鄒景雯 2001：52）。

低調行事的哲學，一直是李登輝長久以來的特殊作風。如同從前「噤聲於政治」一般，李登輝在許多關鍵的時刻，都不輕易顯露內心澎湃的做法。當然面對現實的情況，李登輝也曾多所抱怨：「當時我根本沒有什麼權力，做得非常辛苦。軍隊的權力不在我手裡，人事也一樣。……在國民黨裡頭，名義上我是代理主席，其實根本沒有任何實權」（李登輝、小林善紀 2001：83）。

在這樣的艱辛情況下，「李登輝的權力基礎尚未絕對穩固，需時時注意自我保護與防衛，並繼續以蔣經國繼承人來治理台灣」（蔡石山 2007：247）。如同

蔡石山所說：「就像一個突然中樂透頭獎者一樣，李登輝起初也有點不知所措，不過直覺告訴他不能讓狀況惡化。……他有必要獲得國民黨內大老的支持，他們大都是戰後從中國大陸來台的外省人」（蔡石山 2007：237）。這也就是黃文雄（2011：157-158）指出的：「1980 年代末，繼蔣經國之後，李登輝擔任總統的職位，在當時的台灣掀起了兩股潮流，一是以外省人第二代為中心的大陸移民之『逢李必反』，一是本土派台灣人的『李登輝情結』」。

除了外省籍的黨內大老之外，信仰也再次成為李登輝此時重要的倚靠：「國民黨內部為了是否讓我繼續擔任總統和國民黨黨主席的問題而發生劇烈的爭吵。本來就沒有政治野心的我，從沒想過政治鬥爭這種東西會是如此激烈，所以在這種鬥爭的漩渦裡感到全然的困惑。於是我翻開《聖經》」（李登輝 2016：175）。

這樣的徬徨，卻顯然與柯義耕的觀察產生落差：「李登輝意志堅定、願意承擔領袖大任的特性，乃是得自他在日本軍隊裡受的訓練，以及禪宗的獨斷傳統……他出任總統後，就把自己當成掌權者」（柯義耕 2008：213）。李登輝並沒有在出任總統的第一時間，認定自己就是那一位掌權的人，他反而更加謹慎以對的適應他未能快速反應的巨大轉變。

誰也沒有猜想得到的第一位台灣人總統，就在各方來不及反應的情況下檔誕生了。就像李登輝所說：「至今我仍相信，蔣經國雖任命我為副總統，不一定就是要培養我成為他的政治繼承人。只是就結果而言，我還是接了他的棒。我想這完全是歷史的偶然」（李登輝 2009：40）。這也像是柯義耕提到的：「蔣經國最大的貢獻也許在於他保護李登輝，成為他的避風港」（柯義耕 2008：210），李登輝因此能在蔣經國的羽翼之下，成長、茁壯，最終成為了中華民國總統。

接著，在前述李登輝「被動」接受「歷練特殊國家備位元首」，以及「非主動」所能掌控「繼任成為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總算能夠「主動」出擊，依照自己的意志，「抗拒中共彰顯兩個中國」。這是我們在本段落所要強調的第三個重要觀察點，也是唯一一個不再與蔣經國政體直接關聯的重要發展。

回顧李登輝的生命歷程，一直到 1983 年任職台灣省主席時才首度公開針對是否支持台灣獨立問題作出重大的宣示回應；在此之前，李登輝幾乎沒有明顯的中國國族認同思考軌跡。例如上一時期所提過的，對於政治事件的態度，李登輝大多時候選擇沈默，若非可能攸關他是否有機會獲得蔣經國認同，成為蔣經國的副手，在那威權體制下，李登輝很可能選擇繼續噤聲於政治。

但是這樣的基調，顯然無法繼續讓他持盈保泰，因為就在 1984 年 5 月 20 日，他已成為中華民國副總統；1988 年 1 月 13 日，更是接任成為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對於國族這個議題，再也無法閃躲，甚至難以閃爍。於是我們開始爬梳有關「中國認同」的李登輝態度，是在什麼時期有了清楚的表述。

1984 年，「蔣經國在宣佈由李登輝擔任副總統的五個星期之前，特地安排李登輝和李潔明[時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夫婦一起前往台灣的鄉間，進行為期兩天的旅遊。其用意很可能是要讓李潔明看看這位未來的副總統人選，然後再向華府回報。而李潔明後來也確實像國內[美國]呈交了一份被列為『機密』等級的報告」（柯義耕 2008：200）。

據柯義耕《台灣政治家：李登輝》一書的整理李潔明已部分解密的資料指出：「李潔明意識到他[李登輝]其實並不接受『一個中國』的政策，而這個政策卻是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核心，也是美國對台關係的基礎。此外，他似乎也有意藉此提醒李潔明和美國政府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讓另一批殘暴的外省人 —— 也就是中國共產黨 —— 來統治台灣」（柯義耕 2008：203）。

再根據李登輝本人所說：「我在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國民黨第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被提名擔任副總統，之前蔣經國本人從來沒有向我透露半句，一直到當天開會時才告訴我」（李登輝 2008b：150）。這兩件事合在一起討論，與李潔明共同出遊時的李登輝，是一個從不涉及兩岸以及外交領域的台灣省政府主席；對於繪聲繪影卻仍然沒有親耳從蔣經國口中得到自己即將出任副總統的李登輝，卻對於身份相當敏感的美國政府代表，吐露出自己對於中國政策的看法，非常特別。

依照當時的脈絡看來，李登輝所謂不接受「一中政策」，很有可能是呼應他自己所說不願見到「中國共產黨」來統治台灣；與進行式中的「中華民國」治理台灣，應當是清楚明白的「兩個中國」現狀。雖然這樣的認知顯然是違背中國國民黨向來的主張：統一中國，卻也不是缺少了「中國認同」，而是如同前述提過的，這個中國認同，應是更加限縮的「中華民國版」的中國認同。

在上述的基礎下，「一九八八年繼任總統，我盱衡當時國際情勢，認為台灣必須突破外交困境，乃決定放棄過去所謂的『漢賊不兩立』僵固立場，積極實施『務實外交戰略』」（李登輝 2009：103）。其中最初顯著的實例，就是前述提過在 1989 年李登輝派遣郭婉容赴北京參加亞銀年會，目的就是希望透過中華民國突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的打壓，走進國際，讓世界看見中華民國的存在。

李登輝在 1988 年上任總統記者會中「重申歷任總統所堅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談判、不接觸與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李登輝明白表示，無法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放棄『武力統一』政策的立場，並說中國宣稱的『一國兩制』將使台灣淪為地方政府，不可能為他與台灣人民接受」（蔡石山 2007：244）。

此時的李登輝，顯然效忠服膺於「中華民國」政府的體制，再怎麼說，他是在中華民國憲法保障下宣誓就職的中華民國總統。但面對國際壓力現實下，他也很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的「一個中國」或是「一國兩制」，都不是自己乃至台灣人民所能接受的，如何能夠突顯「中華民國」，是他至為重要的優先工作。

二、　緩慢浮現的台灣意識

討論完「中華民國認同」之後，在本生命階段呈現「中華民國版中國認同」的李登輝，卻也同時讓我們察覺，隱隱然開始了「緩慢浮現的台灣意識」。為此，我們找到了關鍵的三個脈絡，讓我們得以認真檢視李登輝與台灣意識的相關連，分別是：（一）轉籍至具有濃厚主張台灣獨立的長老教會、（二）與主張台灣獨立運動人士密切往來與交好、（三）不滿意但可接受「來自台灣的總統」稱呼。

依照往例，我們依舊從第一個脈絡：「轉籍至具有濃厚主張台灣獨立的長老教會」，開始進行討論。自 1961 年正式成為基督教徒以來，基督教信仰就常相伴隨著李登輝往後的人生。到了 1984 年李登輝成為副總統之後，在蔣經國的授意之下，「為了溝通方便，我在教會的會籍才從聚會所移到長老教會的濟南教會」（李登輝 2008b：196），這是非常關鍵的一次轉籍舉措，也讓人注意到是否關聯著台灣意識的隱藏其中。

因為「長老教會」背後代表的意涵，與「台灣獨立」運動息息相關，這也正是蔣經國交付李登輝進行「溝通」的重要原因。在國族認同的議題上，如同前述所提，長老教會一直以來都存在著濃厚的支持台灣獨立運動標籤，以至於形成它與其他教會在台灣社會表現與象徵的意義有所不同。

當然我們可以說李登輝大動作地進行轉籍，最原始的目的，乃在於貫徹蔣經國的意志，期望自己能夠扮演好與長老教會的溝通協調，卻也因此加深了他與長老教會的情感及良好互動。一如蔡石山說道：「蔣經國曾親自授權李登輝與長老教會領導層接觸，試圖拉攏黨外溫和派。事實上，隨著入獄的台灣長老教會牧師高俊明獲釋，李登輝獲得外界相當的信任」（蔡石山 2007：205）。

若說李登輝在本意上沒有絲毫一點「台灣意識」的存在，即使近距離接觸一群主張台灣獨立運動的教會菁英，又如何只會因為蔣經國假藉李登輝之手，釋放高俊明牧師，就如此容易贏得長老教會乃至社會外界的信任。以這一點意義上來看，蔣經國權力權謀到安排與考量，或許不巧助長、催生了李登輝的台灣意識。

值得注意的，李登輝此次轉籍到長老教會後，再也不曾移轉他在教會的會籍。事實上，長老教會與李登輝長久以來的確有這巧妙的緣份與關係，李登輝就曾說過：「我和長老教會有一種很特殊的緣分，我囝仔憲文的結婚式，還有他過世時的追思禮拜都是在濟南教會舉行的。……那時我還沒把會籍移去長老教會」（李登輝 2008c：34）。乃至於後來，孫女李坤儀的婚禮，同樣在濟南教會舉行。

接下來，讓我們看到第二個李登輝台灣意識可能浮現的重要依據：「與主張台灣獨立運動人士密切往來與交好」。延續前述李登輝與長老教會的關係，「一

九八四年，長老教會正準備迎接一百二十週年紀念……台南神學院院長黃彰輝是李登輝高等學校的學長，……李登輝之所以會和後來逃亡美國的彭明敏特別熟稔，主要也是因為黃彰輝院長的關係。彭明敏家可說是長老教會的重鎮」（上坂冬子 2001：147）。我們之前也提過，就在彭明敏於 1964 年被政府當局逮捕前一天，就是與黃彰輝、李登輝一起餐聚，由此可見李登輝與彭明敏的交往能夠推前至李登輝尚未進入國家體制之前。

由於這一層的認識，「九〇年二月，當李登輝正為黨內勢力反噬所困之際，彭明敏在紐約召開記者會，呼籲大家支持李登輝。……彭明敏當時獲得李登輝私下傳來訊息，『這個總統是在任期內接下去做的，不是真正的總統，因此不能放手去做，一但將來選出來時，即使是冒著生命危險也沒關係，一定要大力改革』」（鄒景雯 2001：80-81）。

彼時的彭明敏，早已流亡海外近二十年，是一個色彩鮮明的海外台灣獨立運動人士，高位於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依舊透過管道與彭明敏隔海心靈相通。台獨標籤深印在身上的彭明敏，願意公開支持李登輝競選中華民國總統，自有不同的意義與號召；當然，也勢必會招致同樣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的其他人士反彈，但如同彭明敏所說：「現在在台灣，除了李登輝，沒有選擇的餘地，李登輝的本錢是人民對他的肯定，不讓他當總統，也沒有別人」（鄒景雯 2001：81），這是彭明敏採取的務實作法，也看得出他與李登輝有著更深層的情誼往來。

除了彭明敏之外，曾與蔣經國面對面談論「你是台灣人嗎？」（柯義耕 2008：184）讓蔣經國答不上話的「廖述宗」，同樣是李登輝一直有往來的台獨人士。在柯義耕的描述中：「李登輝雖然當省主席當得有模有樣，但只要一有機會他還是會為非屬國民黨的台灣菁英打氣。在省主席任內，他曾和一位備受矚目的台獨份子廖述宗教授有過幾次秘密會面。……在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他們兩人始終維持密切的往來」（柯義耕 2008：183-187）。我們可以這麼說，身為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一直以來，都不抗拒於與主張台灣獨立的運動人士往來。

如同黃鈺淳說道：「李登輝還與蔡武雄是往來密切的好友。蔡武雄在美國創辦『台灣國際關係中心，……亦即五大知名『台獨』組織之一』。他和王秋山都是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時期的同學兼密友。在一九八八年底至一九八九年初，他們返台停留探親時，李登輝雖已成為總統，還在日理萬機之際，撥出數小時的時間，和這些『台獨』老同學敘舊、聊天，……不在意黨內的反對意見和台灣民眾的觀感，便可對他內在擺盪台灣與中國的想法窺知一二」（黃鈺淳 2010：106）。

我們繼續看到第三個有關台灣意識的表徵：「不滿意但可接受「來自台灣的總統」稱呼」。1989 年，李登輝剛剛坐上總統大位才滿一年，節奏明快的李登輝，即將開主動出擊的外交之旅。「李登輝 1989 年 3 月 6 日到 9 日前往新加坡進行正式訪問，這次訪問不只展示了李登輝所稱的『彈性外交』，更是他提倡的南向政策首次出擊。這也是台灣國家元首 1978 年以來的第一次正式出訪外國」（蔡石山 2007：252），以現今的角度來看，這是一次意義非凡的外交出訪。

這一趟訪星之旅，最為社會各界討論的，應是「深受政府影響的星國傳媒在訪問期間都以『來自台灣的總統』（President from Taiwan）稱呼李登輝，而非用中華民國總統(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China)或是台灣總統(President of Taiwan)。對此，李登輝表示他並不是完全滿意，但能接受這樣的『彈性』頭銜」（蔡石山 2007：253）。

或許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中，「台灣方面因為還處於國民黨優勢的時期，所以堅持一定要用中華民國的稱謂」（上坂冬子 2001：162），才符合主流國民黨政體的期待。但這一單一事件對於李登輝來說，則有著更不一樣的看法，李登輝說：「兩國沒有邦交，我無法以『中華民國總統』身分到訪，只能獲得對方『台灣總統』稱呼。當時有人批評這是『自我矮化』，但事後證明，這樣積極走出去是正確作法」（李登輝 2009：103）。

由這件事情的發生，筆者衍生出至少兩個方面的必要討論。其一，如同上述李登輝的話語中，我們能夠再次感受到李登輝對於處理外交事務的手段嫻熟，即

使只當了國家領導人一年許，他靠著自擔任副總統以降，即不陌生於出訪外國，培養出的國際外交視野，讓他能夠做出有別以往的外交突破與判斷。

第二，身為中華民國總統，卻能彈性地接受「來自台灣的總統」這般刻意矮化的稱號，當然可以理解為李登輝願意「務實」處理國際事務的身段柔軟。但是，身為「第一位台灣人總統」，克服了省籍問題的困頓之後，或許「台灣人」總統的這個稱呼，在李登輝的心中，已經逐漸撕去過往「本省人」的狹隘標籤，以至於他能夠在「雖不滿意，但可接受」的情況下，面對這個顯然經過設計的稱號。

於是，此一時期的李登輝心中，或許對於台灣意識的浮現，有著無限想像的可能。如同黃郁淳所說：「直到一九八八年蔣經國過世，他對個人生命經驗的淬練，進一步打造出對台灣認同，但要在保守傳統的國民黨中捨法統而就本上殊不可能，他採取緩步前進的方式進行對國民黨的改造」（黃鈺淳 2010：127）。

三、　初登大位的政權保衛戰

在本生命階段中，前面所提有關「中華民國認同」以及「緩慢浮現的台灣意識」，都與國族認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本段落將要論述的，是此時期李登輝在國族認同之外，生命史是否遭遇著同等重要的關鍵因素，左右了他所呈現的國族認同狀態？亦即「初登大位的政權保衛戰」標題，裡頭組成的三個關鍵要素：「走蔣經國路線」、「力抗外省集團」、「啟動寧靜革命」，分別透露出什麼樣的重要訊息，讓我們去對照此時期的國族認同狀態。從「走蔣經國路線」談起。

在沒有任何徵兆之下，蔣經國於 1988 年 1 月 13 日撒手人寰，留下了中華民國這個偌大的國家機器，依照憲法規定，政權即將移交到了蔣經國欽點的副總統李登輝身上。由於李登輝秘書在傳達來自「七海官邸」通知電話時的處置不當，以致李登輝並沒有機會見上蔣經國最後一面，這件事李登輝事後回憶道：「在這麼重要的關頭，這是比什麼都重要的事，他卻沒通知我，也因此我喪失了聽到蔣總統最後講話的機會。一直到現在，我都還很遺憾，因為我沒能夠把握住那一個最重要的時刻。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李登輝 2008b：224）。

無法聽到總統過世前的隻字片語，或是遺言交代，對於身為繼任者的李登輝，內心一定充滿惶恐與不安，我們可以從李登輝的自述中，感受他的無助與焦慮：「因為我只是一個人而已，既沒有班底、沒有情報關係、也沒有軍隊的支持，可以說什麼都沒有。在黨內也是一樣，完全不是我在掌權。我等於是典型的魁儡，既然是魁儡，就只能扮好魁儡的樣子」（李登輝 2008b：225）。於是，李登輝必須透過一些必要實行的政治手段，來確保剛交到手上的政權穩定。

在這非常的時刻，鄒景雯描述道：「既是穩定壓倒一切，手中無一兵一卒的李登輝必須完全服膺『蔣規李隨』，以順利承接大統。……李登輝告訴郝柏村，『經國先生的改革繼續推動，軍中人事以安定為原則，請你多負點責』。……李登輝接著分批約見五院院長、省市府會首長、各軍種司令，就各項國政進行簡報，讓所有官員明確了解李登輝維持人事安定的決心」（鄒景雯 2001：51）。

其他的重要政治手段，自也包括了：「蔣經國過身，我升任總統後，穩定政局成為我重要的考量。他剛過身的十三天裡，我每天上班前，都會到他的靈前祭拜。我這種重禮數的精神，是要表示我不會改變他的路線，會遵守他的教導，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主要是維持他的人事、政策以及他在總統任內尚未執行完畢的計畫，這是讓大家安心、安定。在我繼任的兩年四個月總統任內，可以說只是延續他所做的事情，繼續執行他訂出來的既有計畫」（李登輝 2008b：226）。

在當時，自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以後，威權統治的施行結果，讓台灣人民早已根深蒂固的以為台灣的總統都姓「蔣」。這當然可以看作爲一則苦中作樂的常民笑話，即使蔣經國做出過「蔣家人不再任總統」的重大宣示，台灣人民仍舊無法迅速地接受、或是想像沒有了蔣氏王朝統治中華民國的那一天終於來到，這也就不難理解到李登輝繼任成為總統期初心情何以難以平復的境遇。

帶著戒慎恐懼的心，並且怎麼做足禮數仍然嫌少的紊亂時分，「李登輝跑遍了所有舊體制的象徵，目的在傳達一項訊息：『我追隨蔣經國多年，深切了解經國先生的治國理念，我讓大家清楚，李登輝會按照蔣經國的路線，訂定國家未來

發展的方向，希望大家安心』。……就任初期，將貫徹蔣經國遺訓，『因此沒有李登輝政策』」（鄒景雯 2001：51-52）。

只有「蔣經國路線」，沒有「李登輝政策」，是李登輝身在其中做出認為最為明智的政治判斷。事隔多年，這樣「穩定」的抉擇，的確具有十足的成效，李登輝逐漸穩坐了他的總統大位，這是群敵環伺的「弱勢總統」，所不容易達成的艱險任務。多年後，李登輝再次強調：「我尊敬蔣經國，至少當初的組閣與政策，都意圖，避免辜負蔣經國路線」（上坂冬子 2001：180）。

接著是第二個重要的線索：「力抗外省集團」。李登輝成為了「第一位」台灣人總統，或許是歷史的偶然，也或許很可能只是如同嚴家淦前總統一般，只接續著完成原任總統的任期，即默默地因任期的到任，繼而離開了總統的寶座。於是李登輝是否能夠透過選舉，開啟真正屬於自己的總統任期，更成為第一位台灣人肩上受到本土台灣人矚目的焦點，當然，這一切同時必須建構在李登輝自己本身是否也願意承擔此重責大任。

前面已經提過，在當時猶如「以黨領政」的威權統治年代，台灣的政體實質上並未因蔣氏王朝的終結，而澈底改變了積弊已久的政治現實環境。政府官員的核心組成，並未因李登輝倉促就任，一瞬間就能夠地動山搖，將主要領導國民黨的外省權貴，強迫他們立即卸下手中把持的大權，自此從國民黨消失。於是，能否有效掌握黨機器運作，成為了李登輝首先必須面對的重要大事。

如同鄒景雯所說：「當時在外部環境方面，社會本土意識在解嚴後爆發，第一個台灣人當總統，已經激勵了士氣，如果國民黨又由台灣人當主席，這對本土運動具有重大意義，因此民間出現極為高度的期盼」（鄒景雯 2001：63）。在這樣的期盼之中，第一關是李登輝能否同時拿下國民黨黨主席的位置，就是重中之重的一次挑戰與未來有無可能持續執政的先機掌握所在。

鄒景雯也說：「缺乏班底的他，自知要穩定局面，必須與既有體制銜接，藉以掌握國民黨雄厚的資源，以做為領導的工具，才能從而行使影響力，其間是否接任黨主席則是重要關鍵」（鄒景雯 2001：63）。性格上從來不懼挑戰的李登

輝，為了避免成為曇花一現的魁儡總統，他必須盱衡面臨的真實景況，以期達到至少能夠讓人心浮動的動盪政局，呈現最基本的「穩定」狀態。

這是一場極具挑戰的政權穩定戰役，由代表台灣本土的李登輝，必須做足準備對抗行之有年的「外省集團」勢力，如同先前提過，李登輝受迫於外省族群的過往記憶，甚至產生了橫貫他不少生命時期的「省籍意識」。蔡石山說道：「蔣經國過世後，即使是在情況最為艱難的時刻，國民黨內老一輩外省權力層仍不願意將政治權力交給台灣人……其中立場較為堅決的有蔣介石的八十八歲遺孀宋美齡[等]，……這段期間他只能當一個過渡政府的看守總統，也就是要李登輝像當年的嚴家淦一樣」（蔡石山 2007：245）。

但原先外省集團即至少分為兩大類別，一是以上述「宋美齡」夫人為首的官邸派，另一群體則是各懷鬼胎、各自盤算，並不希望「蔣夫人」繼續干預國民黨內利益分配的各大山頭，「能否順利兼任黨主席，原不是李登輝可控制的範圍，幸運的是，蔣經國所留下的國民黨核心結構，山頭林立……這些彼此利益衝突的人物無法獨立勝出，只能共同接受順理成章而上台的李登輝，之後再各憑本事，亟思操控」（鄒景雯 2001：63）。

曾經形容自己剛繼任總統時手無寸鐵的李登輝，因為外省勢力們自我營造的恐怖平衡，成了第一回合意外擊退宋美齡們的贏家。以就是順著這個勢頭，「將黨內山頭照單全收，順手獲致了一條防堵官邸勢力的馬其諾防線，這些未來的政治對手，為了等待李登輝即將釋放的紅蘿蔔，在國民黨林中常會上，合力擊退蔣宋美齡的插手意圖」（鄒景雯 2001：63）。

甫接任總統的李登輝，不同於嚴家淦的悲情命運下，在已經沒有蔣家強人的壓制之下，兼任了國民黨代理主席。但上述提到的「政治對手」，並沒有讓李登輝真正得到足夠的喘息時間，外省權貴的蠢蠢欲動，很快地來到了下一次總統選舉的前哨。「八九年底，李登輝依法繼任總統的任期即將期滿，要不要參加競選？他做了一次慎重的思考。……在強烈的使命感驅使下，李登輝決心放手一搏」（鄒景雯 2001：72-73）。

為此，李登輝曾經誠摯地說道：「我原本無政治野心，也沒想到政治鬥爭竟如此血腥慘烈。……我在內心告訴我自己：『如果這是神的旨意，我也只能背起十字架了。不管遭遇多大艱難，為了台灣下一代，我都要奮勇向前』」（李登輝 2009：19）。下定決心競選 1990 年總統的李登輝，隨即遇到了先且暫時收手的外省集團反撲：「針對我要參選總統，郝柏村、李煥……等人連日開會密談，似乎在策劃著什麼。黨內反對勢力擁立蔣緯國……出來競選」（李登輝 2015：94）。

李登輝當然為了繼續朝向自己改變台灣的目標，必須做出十足有把握的政權延續準備。但當時的情況確實特殊，如同李登輝說道：「曾有一度我收到情報說，有人為了阻止我出馬競選，企圖發動政變。後來被我先發制人的處理好了。如果當時晚一步收到情報的話，後果可能不堪設想」（李登輝、小林善紀 2001：88）。

從前在職場上總與「省籍問題」反覆交手的李登輝，即使當上了總統，依舊沒能將此夢魘拋諸腦後。只是在成為國家領導人之後的李登輝，面對外省舊有勢力的挑戰紛至沓來，彼時李登輝所介意的，應當早已跳脫省籍問題的對立。新的情勢進展，顯然是更加上位的國家政權保衛；只是此時的外省勢力集合，是為了逕自從李登輝手中奪回他們認為本該屬於外省權貴的政權。

在此補充，在「李登輝事後回憶，九〇年春節前後的這段時間，他的精神壓力非常大，連續許多晚上都因無法安心而睡不著覺，他就起身與太太共同跪在床沿，把放在面前的聖經隨手一翻，看翻到第幾頁，就照該頁的經文進行禱告，也當作是神對他的啟示」（鄒景雯 2001：76）。基督教信仰，依舊是李登輝面臨外省集團挑戰政權的重要寄託；憑藉著神的啟示，他撐過了驚心動魄的一頁。

最後，我們所要看到的，是在此次驚濤駭浪的政權保衛戰中，第三個關鍵的因素，李登輝「啟動寧靜革命」。延續上述的時空，李登輝第一次參加總統選舉，遇到了「外省集團」想要奪取政權的亂流。但就像在蔣經國剛剛辭世沒多久時，蔡石山就觀察到李登輝：「成功渡過了這次最嚴格的權力考驗，因為他已在複雜的國民黨權力中浸泡了十六年之久，歷練出部分中國人的政治手腕」（蔡石山

2007：246），李登輝早已非昔日阿蒙，除了對抗外省勢力進逼之外，他更已有能力守護自己手中的政權。

就在排除可能威脅他總統之路繼續前進的外省反抗集團後，「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李登輝在約六百人的國代當中，得到了超過八〇%的支持。當時的總統任期是六年。李登輝首度嘗到身為台灣人而攀升權力顛峰的感受，想必也感慨萬千吧」（上坂冬子 2001：174）。即使如此，這並不代表李登輝自此一帆風順，尚有許多未知的挑戰，正在眼前等待著他。

上坂冬子說：「雖然一路攀升到權力頂峰，但是國民黨政權內還是以外省人為主流，台灣人可說是寥寥無幾」（上坂冬子 2001：174），這是一個真實的情況。柯義耕說：「李登輝並不信任那些瞧不起台灣、一心只想和他們真正的祖國——中國 —— 統一的外省菁英。因此，他在決定內閣人事時便優先任用台籍人士或那些採取親台立場的人」（柯義耕 2008：213）。

這是一個直接影響外省權貴集團的既得利益狀態，李登輝肯定難以敲鑼打鼓地去搗毀長期壟斷政經資源的外省勢力，他需要一個計劃縝密，最好不動聲響、不使刀槍的「寧靜革命」，才有機會進行改革台灣的既有初心。這也正是黃郁淳所說：「八〇年代開始，台灣經歷威權體制崩解、政治秩序重建、社會運動萌芽茁壯等風起雲湧的過程，仕途順遂的李登輝，習於黨內的威權---侍從關係，進一步成為規範的訂定者、衝突的減緩者、爭執的分析者，意見的提供者和發展的推動者」（黃鈺淳 2010：98）。

已經完全掌握國家機器的李登輝，一舉一動都將牽引著整個國家社會、百姓人民的每一天生活。在威權體制夾縫中，求取生活並已成大器的李登輝，是要將國家帶向一個民主化的理想國度，或是繼續「繼承」威權時代黨國即天下的骯髒產物，李登輝必須做出決斷。這也決定了他是否會是歷史上留下美名的第一位台灣人總統，當然，如果李登輝依舊忠於他念茲在茲的信仰，答案呼之欲出。

或許時代進步的巨輪，正巧轉到李登輝沒有理由不做出正確決定的一邊；同一個時空下，就在李登輝正式當選中華民國第八屆總統前夕，1990 年 3 月間，

台灣爆發有史以來最大規模學生運動。年紀尚輕、熱血正盛的台灣大學生們，在徬徨於國家體制紊亂、各項民主改革幾無進展的情況下，走上第一線，聚集成為舉世關注的「野百合學運」。向中央政府喊話、向政治人物訴求。

李登輝就任第八屆總統之後，順應學運的訴求，召開國是會議，啟動了憲改工程、廢除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也讓萬年國大終於退場、國會全面改選等等。這是 1990 年代初期李登輝推動的重大民主改革事項，也就是啟動所謂「寧靜革命」的始端。台灣在李登輝主政下，正式走向民主改革的進程。

第五節 小結

李登輝在上一時期的國族認同狀態，持續有著「中國認同」的呈現；在認同標籤上，同樣保留著「省籍意識」的符號。如同本時期開始的分析前語中所提，進入到職涯發展朝向人生顛峰之路邁進的李登輝，不再像以往必須隱晦於國族認同的吐露。在面對政治工作上的質疑與挑戰，李登輝正視著來自各方詢問有關他的國族認同取向，並且強力捍衛他堅決反對台灣獨立的立場。

在此狀態中，自 1984 年成為中華民國副總統起，乃至 1990 年透過選舉當選中華民國總統止，「中華民國」的強力記號，與李登輝形影不離、牢牢跟緊。我們從李登輝副總統的歷練中，發覺到了蔣經國總統十分明顯地讓李登輝的「台灣人」記號，一點一滴融入了中華民國政府體制之中，從此在李登輝身上，台灣人／本省人，已經不會是進入政府領導核心的障礙。

在 1988 年繼任總統後，李登輝即使面對了舊有外省勢力的集結挑戰，最終好的結果，完全無損於台灣人是否能夠勝任中華民國總統的這件事情，我們也在 1990 年的總統選舉中，看到台灣人李登輝再度順利勝出。「台灣」認同，在此一生命階段，並不成為李登輝積極進取於政治事業上的羈絆。李登輝甚至大膽跨越「一中政策」，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長久以來的壓力脅迫，選擇了更強而有力的捍衛「中華民國」主權方式，並且有效地限縮了以往模糊不清的「中國認同」。

若說此一時期的李登輝，心中沒有「中華民國」認同，恐怕難以說得過去。但在此框架下，我們卻也找到了可能醞釀台灣認同的種種痕跡，與具有強烈台獨主張的長老教會交好、不斷地和台灣獨立運動人士往來，甚至是有意無意地竟然在國際上接受「來自台灣的總統」稱呼，這些或許都是李登輝在往後的生命史當中，逐漸發展出台灣認同，已經悄然埋伏其中的證據，只是尚未真正浮出檯面。

結合上述兩種情況，一是清晰可見的中華民國認同，一是可能漸漸浮現的台灣意識；或許，在相互保持距離之下，中華民國國族認同，是李登輝在這個時期中，首要優先的展現項目。源自於 1988 年繼承中華民國法統，成為國家領導人的李登輝，為使國家走上正軌，也為了穩定蔣氏王朝終結於台灣的不安定狀態，李登輝關心於「蔣經國路線」的執行、對抗想要奪取其政權的外省集團勢力，他才可能推動「寧靜革命」，讓國家走向進入民主改革之路。

於是，是否在此時此刻就必須找尋台灣意識、台灣價值、台灣認同的蹤跡，很可能就不會是李登輝心心念念的優先考量選項。如何更多的論述支撐他的中華民國認同？如何讓所有關注國家發展的人，知道台灣人李登輝任職中華民國總統是完全足以勝任？在取得穩定的政權以後，緩步實踐心中對國家的期望與欲擘劃的民主藍圖，這些才是此一時期李登輝耗費最多精神的關注之所在。

「中華民國版」的中國認同，是本時期清晰不過的李登輝國族認同狀態。由於是延續前一時期的中國認同，只是在實質意涵上，省籍意識已不再是本時期最為關鍵的認同標籤，「中華民國」賦予本時期的李登輝，更多特別與身為國家正、副元首必須使上全心全意的意義。因此，筆者認定在無遇上遭遇事件、台灣認同亦尚未出現之前，李登輝仍舊處於 Cross 黑人心理認同模型的「前遭遇期」之中。

第六章 當家作主、登峰造極（1990-2000）

事實上，一個人在一輩子若是有機會成為國家元首，無論是在世俗的眼光中，亦或是政治事業的領域上，都稱得上是「登峰造極」的莫大殊榮與成就。然而，1988 年的李登輝總統，是透過繼任而來的；1990 年 5 月 20 日以後的李登輝總統，權力基礎也並沒有真實的來自民意的託付。一直到 1996 年台灣首度開放總統人民直選後，當選的李登輝，才真正是以民意為依歸、還權於民的全民總統。

本章節即將探究的李登輝生命 10 年，同時也是他主政台灣、擔任總統的倒數 10 年。1971 年加入國民黨，黨齡不到 20 年的李登輝，1988 年即成為中華民國以及中國國民黨的共同最高領導人，但成為總統的他，是否即能稱作「當家作主」？在長久以來紊亂的國民黨體制之中，加以外省權貴的霸道把持，顯然李登輝想要依照自己的心意、專心做好他想為台灣人民服務的事，必須歷經一番磨難與搬開羈絆他前進道路的各種大石。

在這 10 年當中，亦步亦趨、謹慎小心走好每一步路的李登輝，啟動了一系列他對於中華民國未來發展方向的各種政策與佈局。《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除、「國家統一綱領」的製頒、「總統開放人民直選」的推動、「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宣示等，在在留下了李登輝推動台灣民主深化的軌跡。這些已成為歷史上的刻印，如今再一次回顧起來，彷若是一盤完全按照李登輝精心設計、掌握每一步走向的精彩好棋。

然而無論再怎麼登峰造極的李登輝主政 10 年，終究會有到任結束的一天，作為執政黨：中國國民黨主席的他，也必須同時面對後繼者的蠢動或叫板。李登輝決定凍省後的宋楚瑜風波，力挺連戰參選總統後的國民黨慘敗，被逼宮交出黨主席大位的傾刻間落魄，這些都是這 10 年中李登輝生命經歷的痕跡所在。而我們所關心的認同取向，就在前述這些事件的交互堆疊下，李登輝的國族認同，也似乎讓我們在他所致力推動的各項政策與統籌事宜中，見到了再次別於上一章節／階段完成的國族認同發展。中華民國在台灣，成為了有趣的觀察指標。

第一節 贏得選舉的總統之路

排除暗潮洶湧的國民黨內挑戰李登輝繼續執政紛爭、順利化解挺過喧騰一時的「野百合學運」，李登輝與李元簇的正副總統搭檔組合，總算透過「間接民主」的方式，當選「中華民國」第八屆總統與副總統，並於 1990 年 5 月 20 日完成就任程序，開啟了真正屬於李登輝個人透過民主選舉成為國家領導人的領航時代。

然可謂披荊斬棘、突破重重難關，終於坐穩大位的李登輝，卻在此次總統任期之初，即在 5 月 22 日召開就職後記者會時做出令人咋舌、跌破眼鏡的重大宣示：「如果是本人當選第八任總統的話，希望六年中把中華民國現在所遭遇的問題，在六年中把它完成，主要的目的是在這裡。當然，對本人來說，憲法的規定，還有一任可以做，共十二年。……同時，六年後本人和李元簇先生就要退休了，為什麼呢？年歲已經大了，沒有那個能力來做這些事情，所以集中所有精力、能力在這個六年中來完成國家這些重要的工作。」（張正修 1996f：90-91）。

是的，甫完成就任、上任新總統任期第三天的李登輝，即宣告國人他將於此任任期完成後就要退休。時年 67 的李登輝，再過六年的確會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古稀長者；但撇除年紀上的現實，向來自詡慎高、以自己自律、康健為傲的李登輝，怎麼可能認為自己能力、精力有所不能及？於此剛剛任期開始之初，即有了如此重大、關鍵的宣布，李登輝腦中精算的算盤，一如既往，撥打得快，有令外界始終跟不上他明快、強烈地步伐。

我們當然都知道，至終李登輝並沒有從 1996 年第八屆總統任滿時退休，而是再一次經歷選舉，成為了台灣首位人民直選產生的總統。先不論李登輝是否打破了自己公開承諾的宣示，也不論李登輝 1990 年時顧慮的年齡、能力、精力的條件是否消彌；單就李登輝為何甫一上任新總統任期就急促地告訴世人他未來六年的規劃與盤算，裡頭肯定有著可供討論的有趣議題。

一、 交鋒黨內外省集團

我們先看看這一位剛剛透過選舉機制所產生、在歷史上必定留名的「第一位台灣人總統」李登輝，在他就任新任期之初，處於什麼樣的政治環境，以及是否因為站穩腳步、續坐大位後，就能大刀闊斧，引領台灣走向他所擘劃的碧海藍圖。首先，李登輝必須即刻處理的，就是中央政府新任閣揆以及內閣組閣的問題。源自台灣憲政長期以來的亂象，「總統制」、「內閣制」的始終存在爭議，迄今亦無法方休，1990 年代的李登輝政府，同樣存在「總統有權無責」、「閣揆經常性有責無權」的特殊情境。

在台灣中央政府運作中，總統無論是間接民主、直接民主，至少都是透過選舉的方式產生。但除了「國防」、「外交」、「兩岸關係」外，真正掌握各項民生問題、國家建設、能源、交通、環境、經濟、財政等各項政策議題的執行者，卻是由總統提名的行政院長來負責。照道理來說，在台灣擔任閣揆也可算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仿若封建時代所謂「宰相」的角色。然回顧近代民主台灣，台灣自從開放民選總統後，閣揆的人選、接替，就好像跑馬燈似般，常常令國人眼花撩亂、目不暇給，更換速度十分地快。換言之，即使行政院長在某種意義上的確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國家大權，但也猶如「消耗品」一般，汰換速度飛快。

在這情形之下，需要一位新的行政院長配合新任期政府的李登輝總統，他把合適的閣揆人選目光，放到了時任國防部長的「郝柏村」身上。如同上一節次所提，李登輝與郝柏村之間的角力、過招，始終沒有停歇。李登輝無疑是在這個時代中，「本土型」政治人物的集大成與當權者；而「郝柏村」則代表了既有老舊「外省權貴」的勢力之一。所以宏觀來說，這些爭論與對峙，並非是「李、郝」兩人的私人情緒、情感之爭，而是面對迅速崛起的「本土勢力」，嚴重影響了「外省族群」長期主宰台灣的龐大既得利益，此二者間的拉扯、抗衡紛爭。

時序稍往回拉。李登輝繼任第七屆總統執政的尾聲，行政院長是由李煥出任；更具體地說，前述「外省權貴」勢力的代表，是以「李煥」、「俞國華」、「郝伯村」等人為首。如同先前提到，李登輝的一桃殺三士，就是期望逐步將蔣經國時代遺留下「黨政軍」的各大山頭勢力，逐一擊破化解。先是順利地讓俞國華離

開「政院系統」，接著利用同樣的職位，複製成功的模式，也讓李煥不得不交出行政權，最後閣揆的大位，讓郝柏村來接任。

由於郝柏村具有「軍人身份」這個特殊印記，台灣社會可能因為「軍人干政」的印象可有所不平與反彈，於是李登輝提出：「郝柏村若擔任閣揆，李煥不得不退，難有再杯葛的餘地，昔日的結盟也將因此瓦解。接掌了行政權，郝柏村勢必辦理退役、交出軍權，有利於軍中脫離人治、建立制度。」（鄒景雯 2001：93），這是李登輝心中打好的如意算盤。

但郝柏村終究爭議太高，就在「黨部的宋楚瑜聽聞後，則期期以為不可，『真的要這樣嗎？』他大為猶疑，建議李登輝應該再三思。宋楚瑜曾是蔣經國的秘書，十分了解即使是蔣經國在世，對於蔣經國交代的事，郝柏村也未必全數照辦……宋楚瑜認為，若把行政大權交給郝柏村，未來鐵定無法駕馭」（鄒景雯 2001：93），宋楚瑜提出了建議，李登輝依舊決定就是由郝柏村出任新一任行政院長。

> 在知情者未全面看好的情況下，[1990 年]四月二十九日，李登輝依舊照著自己的想法在總統府約見郝柏村，正式告知請其接任行政院長，「郝柏村當場嚇了一跳」；李登輝想，郝柏村進門時搞不好以為是要談國防部長是否保得住的問題。李登輝不待郝柏村的臉色恢復，繼續說明，他希望郝柏村上任後能夠一起合作，把國政推上正軌，「你敢不敢做？」郝柏村此時回答，他需要三天的時間考慮，到時一定向總統報告。當天，郝柏村神情愉悅的走出總統辦公室。五月二日，郝柏村在中常會召開前主動求見，向李登輝報告了他決定受命。李登輝非常的高興，她提醒郝柏村立法院是一重要關卡，一定要盡全力去面對與處理。（鄒景雯 2001：94）

一如過往李登輝受到蔣經國拔擢為副總統候選人之時，國民黨政府執政運帷方式，大多都是主政者決定後職務人選後，將名單送交「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只是李登輝如今已然正式取代蔣經國的功能，成為了那一位完全能夠主導政府高層人事的唯一一把手。物換星移，初就任自己總統任期的李登輝，不知道對於自

己已能掌握權柄，任命過往極度打壓自己的外省集團，做為聽命於自己政府的行政院長時的心情，有否一種往事歷歷在目、說不上的複雜情緒感。

隨著郝柏村的確定擔任閣揆，各種事先的防堵與防線，自是不能掉以輕心；畢竟，郝柏村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位長期掌控軍隊的高階將領，其背後更有著日落西山、亟待反撲的外省集團勢力，以致「李登輝也未曾大意，也即刻採取主動，提出他與郝柏村分工的架構……『未來軍事、外交與大陸[中國]政策歸我[李登輝]管，提名郝柏村是為解決政局不安、治安不好、民心不定』……他也在五月二十六日批准郝柏村的除役申請，讓郝柏村脫下了一級上將的軍服。五月二十九日，郝柏村順利通過立法院的考驗，接任行政院長」（鄒景雯 2001：95）。

安排好中央政府團隊極具重要意涵與執行角色吃力的「閣揆」人事後，李登輝算是暫時平順地「安內」了。但是 1980 年代末開始急速變遷的台灣公民社會，伴隨一場場人民怒吼、展現民主改革意志的大大小小街頭抗爭運動，以及剛於 1990 年 3 月才勉強和平落幕的野百合學生運動，此時此刻地台灣，正面臨持續大步邁向正常民主化國家的始端。李登輝「攘外」的挑戰，也才正要開始。

緊扣著野百合學運引發出的各項重要議題與社會共同期待，李登輝逐步兌現了他能力所及、以及他「認為可行」的學生運動訴求回應。起手式就是受人矚目的特赦政治犯：「新當選的李登輝特赦了二十七名黨外政治人物，其中包括民進黨主席黃信介、民進黨秘書長張俊宏、2002 年出任考試院長的姚嘉文、施明德、許信良以及其他民進黨的創黨元老」（蔡石山 2007：262）。

能讓為台灣民主自由奉獻心力、無懼牢獄的民主運動人士們重獲自由、還取公道，自算是李登輝主政下的美事一樁；然民意高漲的 90 年代台灣社會，所引頸期盼的，當然不至於這些，台灣社會有著更多急待實踐的公平正義期待。這是擋也擋不住的民主社會音浪，大權在握的李登輝，也確實沒有讓百姓們等待太久，一場攸關國家未來發展的「國是會議」順利展開。

二、　野百合學運落幕的善果

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我履行與學生代表[野百合學運]的承諾，召開為期六天的國是會議。包括在野黨人士、學者、民間人士等各界領袖共一百多人，聚集在台北圓山大飯店一起討論台灣的未來。其中包含曾參與台灣民主運動的政治犯，廣泛匯集不同政治立場人士的意見，是台灣前所未有的創舉。在這次會議上討論的，就是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李登輝 2015a：99）

這一場在台灣社會備受各界矚目的國是會議，除了上述「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外，同時也完成了幾項雖未臻完美，但已是持續讓台灣向前的朝野共識動能：「歷經一週的熱烈發言，雖有許多未盡一致之處，但在相忍為國、尊重歧見的精神下，仍然做出總統直接民選、資深中央民代儘速退職、省長民選、廢除臨時條款等重大結論」（鄒景雯 2001：332）。

而上述經由國是會議激烈討論後形成的各項重大議決，各有所深遠的影響台灣民主發展，無論是總統、省長的直接民選，或是資深中央民代儘速退職等，再再決定了台灣是否能夠持續朝往一個真正落實民主、自由、法治的正常國家。不過於此諸多重大議題當中，會因此馬上受到衝擊與挑戰的，當數「廢除臨時條款」這項共識的確認，也就是直接衝擊具有「萬年國代」身份的這一群人。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指的是國民黨自中國大陸的國共內戰敗走台灣後，以「反攻大陸」為目的，也就是把奪回中國大陸當作目標，而針對一切物資進行的總動員。……即使要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該由誰來廢止卻成了一個問題，這項條款原本就是由國民大會決定，所以只要再召開國民大會就好，但當時的「國民大會」卻是因為憲法遭到凍結而誕生的萬年國會。……因此，要讓國民大會決議廢止臨時條款，就得先讓國大代表全數退職，而我所能做的也只是拜託他們「放棄自身利益，從代表之位退下」。而他們都是支持我、選我當總統的人，所以被自己所支持的總統勸說「辭職」，應該沒有人會感到愉快吧。但如果不這麼做，台灣就永遠無法走出獨裁體制。……如我所料，沒有人答應退休，所以我只好轉換方針，用高額的退休金來換取他們的退休。……就這樣廢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改選了萬年國會，在新的選舉制度下選出了新的國大代表。（李登輝 2016a：56-57）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存在，無疑是對於急迫轉型為真正民主法治國家的台灣，一大阻礙與牽絆。國情早已改變，台、中關係雖未緊密，卻也不若以往緊張的「砲火相向」，台灣於此轉型改革之際，若仍舊羈絆於「不良法令」的限制，我們將難以真正大開大闔地邁向成熟的民主法治國家。但很現實地，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茲事體大，尤以必須讓既得利益者「自廢武功」最為困擾。或許李登輝帶著新時代社會上大多數民意的寄託、或許身為一個台灣人總統的使命，又或許台灣民主正常化來到了重要的分水嶺，李登輝發揮了他的柔軟與精明，最後祭出「高額退休金」手段來說服，終於成就了此番大事。

而此一臨時條款的廢止，當不僅是台灣國內民主深化的一大步，讓國會得以全面改選正常化、讓不符合台灣現狀的民主代議士退場、讓真正棲息生活在台灣島嶼上的人民能夠進入國會殿堂議論國事，這些都是台灣「內政」的範疇。《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其背後所代表的意涵，同時正代表了「台灣」與「中國」是處在一種特殊的「內戰」當中，廢止了條款，則或許對立尚存，但「內戰」已然結束。換言之，「兩個政治實體」意味兩個不同國家存在的氣味更顯明朗。

李登輝推動民主改革的決心，在國是會議有了與社會對話、凝聚共識的基礎後，逐一邁開了他穩健的步伐。但李登輝緊接而來的舉措，卻不見得廣泛地受到台灣人民的認同，「國家統一委員會」[後簡稱為國統會]的籌設與召開，再度引發國內倡導台灣獨立運動人士的撻伐與不解。或許我們可以藉由李登輝的說法，來理解當時的情境與脈絡。

李登輝說：「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意義，一方面是去除台灣民主化的障礙，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台灣片面宣告終結國共內戰。但是，以『反攻大陸』為黨基本方針的國民黨大老，他們批評的聲浪日劇，甚至可能對政權維繫造成窒礙。因此，我在一九九〇年十月七日宣布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並且親自擔任主任委員。所謂國家統一委員會，就是為了確立中國、台灣兩岸關係的方針而成立的機構。根據委員會決定，我們公布了『國家統一綱領』」（李登輝 2015a：101）。

這個時期的李登輝，內心中是否有著追求「兩岸統一」的心願？或許依照上述脈絡仍然難以釐清。依照李登輝的說法，成立國統會、制定「國家統一綱領」，其目的主要乃在必須澈底消彌來自國民黨內大老們對於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後，「反攻大陸」已成泡影衍生而來的惶恐不安。於是大動作的表態追求國家統一，似乎是李登輝不得不下的一帖猛藥。

那麼引發是否統一正反兩極、極具爭議的「國家統一綱領」所制定的內容是什麼？「綱領中提示了『統一』的條件，有下列三點：（一）當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二）當中國的經濟變成自由經濟（三）當中國實現公平社會」（李登輝 2015a：102）。是的，這是李登輝為台、中是否朝向統一所設下的至高標準。如同李登輝所說：「我為了說服國民黨大老，才制訂這個國家統一綱領。其實目的在於制定三個明確條件，以牽制、遏阻『統一』的動向」（李登輝 2015a：102）。

為了成就遠大志向的李登輝，常常做出超脫他人想像的意外決定。如同召開國統會、制定國家統一綱領這件事，在字義上，常人容易理解李登輝是願意配合國民黨內的核心思想、追求兩岸國家統一的；但仔細推敲國家統一綱領揭櫫的內容，完全不難理解，在此嚴苛的條件限制下，台、中朝往統一的可能性「極低」。這就是李登輝一慣的處事作風及高深莫測。

順利克服源自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引發的「萬年國代退職」，以及彌平國民黨大老對於兩岸是否追求統一的不安後，李登輝繼續在施政上積極展現對於國是會議結果的高度重視。順著回應國是會議的結論，其中一項是有關「海峽兩岸仲介機構的設立」（上坂冬子 2001：181）；對於台、中兩國之間日益頻繁的各項民間文化、經濟交流往來，此事已刻不容緩。

三、　多管齊下的國政方針

源自台、中之間在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前處於「內戰」的對立關係，加上蔣經國時代再次重申的「不接觸策略」，台、中兩國長期以來並沒有正式往來的溝通渠道；但面對自 1987 年台、中逐漸破冰，台灣「開放探親」、「通

郵」等善意措施，兩國往來早已密切升溫，於是除了李登輝擔任副總統時期曾主持過的「新大陸政策特別委員會」，對中事務似乎有所必要由中央政府籌設一個專責部會機構，來確保國人在兩國各項交流事務往來的平順與安全。

> 李登輝政府 1990 年 4 月 27 日成立了內閣級的大陸事務委員會（陸委會），[156]由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兼任主任委員。1991 年 2 月 8 日，政府提供五億兩千萬台幣成立民間組織「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再由政府委託該會出面處理兩岸快速增加的家庭、經濟與觀光來往事務。在台籍董事長辜振甫領導下，海基會與代表政府的陸委會簽訂了一項十四款授權協議，由政府授權後者處理兩岸之間的「技術性」與「一般商業性」事務。政治性問題與政策性決定則都保留在政府陸委會，……同一時間，中國方面也成立相對機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代替中國政府出面處理兩岸往來所衍生的事務性問題。（柯義耕 2008：262-263）

台灣的「海基會」、中國的「海協會」這兩會的相繼成立，對於 1990 年代台、中往來的各項事宜上，確立了許多可供對話的溝渠，也包括了其後分別在 1993 年、以及 1998 年二度舉行的「辜汪會談」（有關辜汪會談相關內容於後再敘）。首次贏得選舉勝利、當選總統的李登輝，在 1990 年代初期即已展現強大的實踐力；對於台灣前途發展而言最為棘手的台、中關係，李登輝也開始投入有別以往兩蔣時代的冷處理模式，充分傳達出希望有效改善台海和平的過人意志力。

李登輝逐漸坐穩屬於他開創的總統大位，或說 —— 李登輝時代！除了持續穩定國內外紛擾的政治局勢與想方設法開創台灣欣欣向榮的工商業發展外，年輕時（1947 年）親眼目睹「二二八事件」發生，甚至自己差一點捲進二二八事件風

[156] 內閣級大陸事務委員會係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後改制為「大陸委員會」；但柯義耕敘述之「1990 年 4 月 27 日成立」，經查應為「1990 年 4 月，行政院特別擬訂《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組織條例》（草案）」（維基百科 2018d），屬於行政院內部決議之草案；俟「政府為了強化大陸政策的決策功能及工作推動的效率，訂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組織條例」經立法院於 80 年 1 月 18 日三讀通過，並由總統於同月 28 日公布施行，本會乃正式成為政府統籌處理大陸事務的專責機關。」（大陸委員會網站 2018）才真正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施行之。

波、深受困擾許久的李登輝，就在新任期就任不到兩年的時間，隸屬李登輝的行政團隊，行政院於 1992 年 2 月 23 日公布了「『二二八事件』報告書」[157]。

如同前述提到，現在的李登輝，除了已經成為能夠主宰一切重要政府高官任用、去留的真正台灣國政掌權者；李登輝也站在台灣最高權力領導機關的國家領導人位置上，有能力針對過往國民黨政府主政下所有不合理、非人性的執政過失，去檢討、去撥正。這是李登輝再一次無法想像到的人生際遇，同時，這卻也是李登輝責無旁貸、必須一肩挑起的面對歷史的錯誤；因為，「他」不是外來政權，他，是一位飲台灣水、吃台灣米，土生土長的台灣人總統。

時序推進到了 1992 年。李登輝主政下的台灣，已堂堂邁向第五個年頭，依後來改制的總統任期四年一任來看，李登輝實際上已經完成一個總統的任期；由他自己創造出的新總統任期，也已經過了三分之一。換言之，必須開始檢視，李登輝在擔任總統以來的這幾年，台灣民主是否持續深化？台灣社會有無朝著更加祥和、經濟繁榮的軌跡前進？台灣人選出這一位「本土」的台灣人總統，有沒有達到人民共有的期許？

回顧歷史，1992 這一年，立法院總算三讀通過「刑法一百條修正案，排除思想叛亂入罪」以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國民大會則是在第一次臨時會三讀通過「八條憲法增修條文，完成二階段實質修憲」。上述這些法案，無論對於人民生活、台中關係，乃至憲法改革等，都是攸關台灣民主化的重要進展；就這一點來說，李登輝的確作足功夫，帶領著台灣社會走向正確的民主化國家。

這無疑是一段大步向前的民主改革時期，當然這一切好的正向發展，其實緊扣著前述《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除後的一片榮景。例如曾經讓李登輝本人寢食難安、久久難以釋懷的「警備總部」（警總），也在「1992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廢除，其主要的業務由海巡署接掌」（蔡石山 2007：267）。警備總部對於李登輝的衝擊與傷害，不是本人難以真正瞭解；但惡名昭彰的「警總」，能夠順利

[157] 二二八事件報告書：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

在李登輝主政下畫下句點，卻也是李登輝這種真正經歷過其痛楚的人，才會積極使它走入歷史的灰燼之中吧。

也就在警總廢除的同一天，李登輝主持了國統會，「宣布兩岸現階段關係為一個中國、兩個地區、兩個政治實體分治」，這是繼台、中「內戰」結束後，最新的台中關係解釋說法。當然，其中「一個中國」則是最挑起敏感神經的特殊詞彙。這是當代台灣始終存在爭辯與意識型態相爭的大是大非問題，卻也沒有塵埃落定的「國族認同」之爭，有待國人持續形成共識與克服國際間的種種問題。

在「一個中國」爭議始終爭喋不休的情況下，以及中國「始終沒有放棄以武力犯台」的前提中，台灣國防能否做好萬全的準備及因應，成為了國家領導人必須高度正視的嚴肅課題。為了確保台海能夠長治久安，不受到任何心懷不軌的他國侵犯，李登輝開始了強化台灣國防的各項積極準備；易言之，能否有效地在國際列強中找尋對台灣最有利的武力軍購建軍，成了當務之急。

國土四面環海，卓然於世、屹立在太平洋上的美麗台灣，在國防武力建軍上，「制空」與「制海」的兩大戰略確保，是台灣刻不容緩的軍購所需。仰賴著《台灣關係法》的連繫，以軍力見長的美國政府，向來對於「軍售」這種有著巨大利益可圖的台灣所需，彈性相對的大、顧慮相對的少，加上「體認台灣對美國國家戰略所具有的重要地位，美國老布希總統沿襲歷代美國政府所實施明確而謹慎的『一中一台』政策，此一政策主要目的在於阻止中國入侵台灣的野心，同時鼓勵台海兩岸和平對話。……老布希總統 1992 年 9 月[2]日宣布出售一百五十架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製造的 F-16 戰機給台灣」（蔡石山 2007：271）。

F-16 戰機的充實，為台灣制空能力大大前進了一步，但不僅於此，美國政府同時「也同意讓台灣向美國海軍租借三艘諾克斯級（Knox-class）巡防艦」（蔡石山 2007：271），持續加強台灣海軍在「制海權」的堅實戰力。上述是在與「美國」方面的軍購往來。但李登輝卻也不是一味在軍購上向美國單方面的傾倒，畢竟國際間的局勢與相互平衡，對於台灣外交處境的發展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台灣有意尋求美國軍事供應的替代來源，……儘管有中國施加的強大外交壓力並提

出誘人的經濟誘餌，法國仍於 1991 年宣布將出售六十架達梭（Dassault）飛機公司所製造的幻象（Mitterand）2000-5 型戰機給台灣」（蔡石山 2007：272）。

至此，台灣制海、制空的國防能力已然大幅提升；即使在國際強權武力國家競爭下，台灣未必成為「一方之霸」，但面對最有可能侵犯我們國家的敵對「中國」來說，台灣至少保有能夠奮力一搏的自我基礎防衛，已經是最好的結果。至於同於 1991 年台灣向法國定約採購「拉法葉艦」案，諸多過程爭議迄今仍舊沒有公決，與本研究「國族認同」核心上亦相差甚遠，遂暫且不在本文討論之中。

然而李登輝主政下的台灣，看似各項施政順利，在國防議題、在民主深化、在轉型正義上，都有著不錯的進展與踏實；但是長期以來「一個政黨」——國民黨主宰一切的「民主」台灣，到了李登輝手上卻呈現出中央民意代表席次銳減的翻轉情況。1992 年的 12 月 19 日，拜「資深民代退職條例」所賜，立法院首次進行全面改選。這一次的國會選舉，在 161 席應選席次中，國民黨僅僅拿下 102 個席次；代表最大在野力量的民主進步黨，則一舉拿下 51 個席次。[158]

這樣的態勢與選舉結果，顯然是李登輝在執政上的挫敗跡象。當然，民主社會中各種類型選舉結果的走向與好壞，往往無法以單一論調來解釋成敗；起肇於 1980 年代末台灣人民的自我公民覺醒，風起雲湧的民主改革浪潮，一路堆疊到了 1990 年代初期，正一步步扭轉了長久以來國民黨一黨獨大的不正常台灣民主亂象。李登輝的施政是否得當？或許真的無法從一次國會選舉來拍板論定。

雖然 1992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結果，國民黨不再如同過往輝煌，但無論如何，仍舊掌握了遠遠超過半數以上的優勢席次，對於李登輝希望繼續施展拳腳、穩定執政而言，沒有成為李登輝的拖累或負擔。然而對於提名行政院長須經立法院同意這件事，卻的的確確引發不小的波瀾與挑戰。

1990 年 6 月 1 日正式組閣上任的郝柏村內閣，在此次全新組成的國會監督下，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力質疑與批判。「九二年底，立法院全面改選，國民

[158] 有關席次方面數據，參考自維基百科網站：1992 年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基百科 2018e）。

黨受到嚴重挫敗，席次下滑，新國會產生的新民意對郝柏村爭取續任極為不利，加以李登輝認為順應民意，中生代接棒的時機已經到來，因此希望郝柏村建立行政院在國會改選後總辭的憲政慣例，這使得國民黨兩派人馬再度激烈攻防」（鄒景雯 2001：98）。

李登輝與郝柏村過往的交手上，本來就始終沒有存在平和，或者可以說，這兩位 1990 年代各擁台灣主要行政權力的高位者，彼此雙方是相互隱忍的沒讓交鋒檯面化。但是這一次，李登輝假意順應新國會的誕生，顯然又是再一次在郝柏村身上起了算計。但郝柏村當然不是長在路上的張三李四，他是如今外省權貴的掌權代表，亦是仍舊坐在位子上的內閣閣揆，豈會就此鬆手、離開權位。

郝柏村傾盡所能的希望奮力一搏與李登輝討價還價。面對此複雜情況，「李登輝提出由其[郝柏村]擔任政策指導小組召集人，並在十四大出任[國民黨]副主席的交換條件，郝柏村立場鬆動，但又提出由林洋港當閣揆，邱創煥任黨秘書長，宋楚瑜必須下台的要求」（鄒景雯 2001：98）。

可想而知，如此至高權力的保衛與爭奪，過程絕對不會輕鬆。各擁實力的李、郝兩人，腦中的算盤肯定一刻也沒得停下來撥動；「九三年元月二十五日，郝柏村主動到李登輝官邸會面，……郝柏村推翻原先的說法，表示總辭與留任是兩回事，他願意留任。……郝柏村不避諱的問起提名之事，……李登輝發了脾氣，閣揆與黨秘書長都是他的提名權，郝柏村跑來詢問，本身就不對，這是一個不友善的行為。……因此拍桌一聲：『沒有這回事！』由於突如其來，加上聲響太大，郝柏村當場愕然，……」（鄒景雯 2001：98-99）。

至此，有關郝柏村內閣總辭或留任的各敏感問題，已然塵埃落定；李、郝兩任此次的紛爭，明顯最後是由李登輝取得全面性的勝利，畢竟，總統是他，掌握國民黨機器的黨主席，也還是李登輝。「元月三十日，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閉幕，朝野國代當著郝揆的面高喊『郝柏村下台！』，場面為之混亂；一生軍旅的郝柏村不願受辱，中午回到行政院即正式發表不再續任閣揆的聲明，同時也將辭

呈送到李登輝手中。二月二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郝內閣總辭案。幾個月後，郝柏村與林洋港在國民黨十四全大會上共同被發表為副主席」(鄒景雯 2001：99)。

對於郝柏村的失勢下台，在民主憲政的慣例上，或許正如李登輝所言，希望開創一個嶄新的國會改選後內閣總辭的先河；同時也很明確的能夠得知，李登輝對於郝伯村各項行事作風以及其身後代表著的外省權貴勢力，吞忍了許久、內心中也早就憤憤不快。但是筆者更為關心的，是在郝柏村下台後，取而代之的連戰，是台灣難得出現的首位台籍閣揆，對於台灣民主化的進展，的確大大向前再跨進一步；台灣人的總統，台灣人的行政院長。

「在獲李登輝邀請出面組閣時，連戰的職位是台灣省主席。連戰出任行政院長案 1993 年 2 月 23 日在立法院通過，連戰任命案得到一百零九票支持，反對票三十三票，有十八票無效票」（蔡石山 2007：276）。那麼連戰所遺留下的台灣省主席一職，將由誰來補上？「李登輝最早慎重思考的是駐日代表許水德與內政部長吳伯雄兩個人選」（鄒景雯 2001：100）。

「李登輝約詢連戰的意見時，連戰則提出由宋楚瑜到中興新村的構想。李登輝因而轉念長考，『在蔣經國時代，向來的不成文慣例是外省籍任閣揆，本省籍當省主席，如今閣揆既由本省籍的連戰出任，省主席若由外省籍的宋楚瑜接掌，確實有助於弭平政壇因郝柏村下台的省籍衝擊，可化解族群問題。』李登輝於是圈選宋楚瑜出線，宋楚瑜一改原先去意。立即欣然接受」(鄒景雯 2001：100)。

是的，面對權力平衡與政治謀略，1993 年擔任總統已滿五年的李登輝，在考量重要人事佈局上，仍舊慎重地將「省籍」問題列入重要選項；「血統」源自哪邊，在 1990 年代的台灣政壇，依舊是重要的 DNA 依據。接著，我們把視野轉進被視為台、中關係重大突破的首次「辜汪會談」。

四、　台中開啟多項溝通管道

在進行首次辜汪會談實質內容討論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將此次台、中兩國得以假第三地（新加坡）順利進行會談的前置準備工作做一翔實敘明。李登輝主

政下的台灣，對於台中關係的推展與應對，來到了國民黨主政台灣的最高峰。無論是成立了實質的內閣級部會（陸委會）處理台中兩國政策及事務，或是刻意組成國統會、製頒「國家統一綱領」，以及成立海基會特種官方色彩濃厚的民間台中事務專責機構，都不斷傳達出李登輝政府正在積極改善台中必須正視的關係。

於此當中，後來被證實的「台中密使」，成為了不得不謹慎解讀的重要過程。如同鄒景雯所說：「『九二[三]辜汪會談』、『總統直接民選』、『江八點』、『李六條』、『李登輝訪美』，這是牽動兩岸關係的幾件重要行事曆，這條秘密管道都曾試圖進行相互溝通、降低誤解的努力」（鄒景雯 2001：192）。

那麼什麼是密使？「李登輝主政十二年，兩岸關係從外表看來，有時波瀾壯闊、氣象萬千，有時又似驚濤駭浪、冷峭險峻，然而在昏暗深沉的水面下，李登輝分別與對岸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始終維持一條聯繫的秘密管道，直到李登輝卸任」（鄒景雯 2001：192），在這條秘密管道進行對口工作、肩負總統賦予任務，與中國方面接觸的人，就是所謂的「密使」。

這是一著險棋。所以能夠受到總統青睞、授命的可能人選，除了專業能力與應對進退必須是一時之選外，是否是一位李登輝總統真正信得過的人選，才是有機會成為密使的關鍵。「蘇志誠就是這項任務的執行者，外界稱之為『密使』。十二年來，李登輝授權蘇志誠前往珠海、香港、澳門與對岸的『對口』會面共達二十七次，前九次香港學者南懷瑾全程參與，其後十八次，兩岸則共同排除『第三者』，直接對話」（鄒景雯 2001：192）。

蘇志誠是何許人也？除了當時候職務上隸屬總統府的總統秘書外，其實，他同時也是李登輝獨子，李憲文的大學同學。「蘇志誠在就讀文化大學時與李登輝獨子李憲文結為好友，在李憲文患鼻咽癌時曾入住台大醫院照顧李憲文，被外界認為此舉受到李登輝信賴」（維基百科 2017）。李登輝在坐上大位後，經常亦可見到蘇志誠在重要決策中穿梭的身影，例如 1990 年李登輝在面對林洋港等可能於國民黨臨中全會挑戰李登輝的「政變」時，「當時，李登輝身旁只有這麼一個

出主意的人，一老一小開始應付自繼任以來最險峻的考驗」（鄒景雯 2001：74），這位「小」，指的正是蘇志誠。

確立了來自台灣足以擔負李登輝所託的密使人選後，畢竟這是與中國的雙向溝通秘密管道，中國方面又是以什麼樣的規格與人選來和蘇志誠交手？199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蘇志誠在香港君悅酒店首度與楊尚昆[中國國家主席]的代表楊斯德見面，……兩岸密使的第一次會談，雙方僅就隔絕四十年的疏離廣泛交換意見，互探彼此的想法與意向」（鄒景雯 2001：196）。

此次會談中，有兩個關鍵的內容指向，必須於此提出來討論。第一個，我國代表「蘇志誠提醒：這些人[係指台灣舊勢力]到中國大陸去所提供的情報，與事實有非常大的出入，不可以被誤導，例如他們指李登輝先生是獨台、台獨，事實上，李先生正在積極準備，即將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不再將中共視為敵對的一方」（鄒景雯 2001：196）。

第二個討論的則是中國代表「楊斯德立刻正面回應，中共中央對李登輝先生是很肯定的，也希望在他任內解決國家統一問題」（鄒景雯 2001：196-197）。台灣方面極力且撇清任何有關台獨標籤黏貼在李登輝身上，中國代表也表示對李登輝的肯定，並且期望李登輝任期中能夠一同解決懸吊已久的台中統一問題。也許，這並非是正式的兩國談判會議，但是由於雙方背後都是銜國家領導人之命前來商討大計，所以彼此都十分明白雙方在意的點，盡可能初期能夠有著善意的雙向溝通。於是統、獨問題在第一次會談中就迅速登場。

有了這一條直接由兩國層峰授意的秘密溝通管道後，向來詭譎多變的台中關係，似乎有了良善往來的曙光。植基於陸委會與海基會的分工，1993 年的辜汪會談，台灣方面即是由海基會帶著陸委會的授權，由時任海基會董事長的「辜振甫」先生領軍，前往雙方事先協議訂下的第三地新加坡，與中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一行，進行台、中兩國的首次非官方，但帶著濃濃官方授意的會議對談。

「九三年四月，兩岸首次辜汪會談順利在新加坡登場，會後並達成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兩岸聯繫與會談制度、辜汪會談共同協議

等四項協議，透過辜振甫與汪道涵在國際注目下舉杯致意，李登輝有意藉此凸顯兩岸和解的政治形式，以及雙方對等的形象，皆成功達成」（鄒景雯 2001：185）。而首次辜汪會談雖尚稱平順落幕，但比預期延宕更久的「第二次」辜汪會談，則是遲至 1998 年才再度舉行，於後再表。

第二節 中華民國在台灣

一、 國民黨內的國家路線之爭

1993 的這一年，「不只是李登輝第二階段政治改革的標示年，台灣在這一年也創下許多歷史里程碑。首先，台灣人口突破了二千一百萬，平均國民所得突破了一萬美元。立法院的台籍立委首度超過外省籍立委。大批台灣新人在黨政軍與司法機構取代外省『老賊』」（蔡石山 2007：279）。這一切的發展，對於主政的李登輝來說，似乎呈現出「美不勝收」的美好時刻。但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因為李登輝對中政策的大幅修正，國民黨內部分人士更視李登輝為「獨台」的代表，於是基於統獨路線爭議的國民黨紛爭，出現了分裂、出走的現象。

> 在國民黨召開的十四全會上，李登輝掌控的黨中央強行通過「當然黨代表」案，充分稀釋非主流的實力。基於一九九二年兩黨一派得票配置，非主流評估，與其留在被「當然黨代表」稀釋後永無翻身可能的黨內，不如跳出國民黨，以關鍵少數的地位，箝制勒索雙方皆未能過半的國民黨與民進黨。基於這樣的盤算，一九九三年八月十日，「新國民黨連線」正式宣佈脫離國民黨，成立獨立的新黨。……新黨的前身，是由趙少康等人組成的立院次級團體「新國民黨連線」。在資深立委與新生代增額立委衝突頻仍的年代，形象清新、辯才犀利的「新國民黨連線」鋒頭甚健。（林耀淞 2004：133）

「新黨」的出現，是對李登輝主政下國家統獨路線最為鮮明的強力挑戰。上述的成立新黨成因，表面上看來是為這些「非主流」所屬的「新國民黨連線」，為了獲取更多的政治資源，精算過後的分裂主因。但是旗號鮮明的新黨，素來以

追求「兩岸統一」為黨的價值核心，這不僅僅是政治資源到是否能夠囊括，更是直接挑戰台、中之間是否統、獨的急統路線。所謂「志不同、道不合，不相為謀」，顯然李登輝的統、獨立場，沒有受到趙少康等外省新貴認同，憤而出走。

那麼李登輝不是才剛召開國統會、頒訂國家統一綱領，並且自擔任台灣省主席以降，於大小場合公開宣示反對「台獨」嗎？新黨何以認定並投下對李登輝統、獨立場不夠分明的反對票？以及先前提到過，蘇志誠也必須向中國密使澄清李登輝不具有「獨台」、「台獨」立場？顯然李登輝就是做了些什麼，以致遭受到國民黨內促統派的強力質疑；而也同時形塑於外界李登輝有著台獨立場信念。

二、　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無論如何，新黨的成立，是屬於國民黨內部的分裂與紛爭，大多數的陣痛與國人無關；但有關李登輝國族的認同與立場，筆者會持續追蹤。時序再往後走，1994 年，來自日本的小說家 —— 司馬遼太郎，再次來到台灣與李登輝進行對談。正如李登輝所說：「司馬先生在一九九三年訪台兩次、一九九四年訪台一次。我們都是二次世界大戰時由學員升上士官，同樣經歷戰火洗禮的好朋友」（李登輝 2015：103）。

那麼為何一位來自日本的小說家，訪台與李登輝對談必須特此提出來討論？因為，在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話當中，李登輝說出引發台灣社會熱議的諸多言論：「與司馬先生談些什麼呢？我和妻子商量後，決定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我[李登輝]告訴司馬：『到目前為止，掌握台灣權力的，包括國民黨在內，都是外來政權。一定要將國民黨變成台灣人的國民黨。由於對以前白色恐怖的恐懼，七十多歲這一代晚上都沒辦法睡得安穩。不希望子孫再受到這樣的待遇。』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的說法，讓我在國內受到相當大的批評」（李登輝 2015：103）。

上述的這一段李登輝自述，有三個觀察重點，第一：「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第二：「包括國民黨在內，都是外來政權」；第三：「對以前白色恐怖的恐懼」。我們先從最廣為人知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切入。如同李登輝所說，這是緊扣

「外來政權」衍生下的台灣人處境，長久以來，台灣人始終沒能有所能力來經營、治理台灣，無論是清朝政府、鄭成功家族時代，亦或是 1895 年台灣開啟了淪為日本殖民地的 50 年歲月，台灣人就是一群被迫接受外來政權治理的子民。

在這一個脈絡下，終戰後的 1945 年台灣，本來有著命運翻轉的可能，但如同眾所皆知的「狗去豬來」解讀，國民黨政府以台灣為「復興基地」，挾帶著軍隊武力與大批自中國敗退而來的「政府官員」，開始了威權、獨裁的治理起台灣。無論再怎麼不情願，台灣人還是必須選擇「接受」了。一直到 1988 年李登輝繼任總統、1990 年李登輝透過選舉當選總統，似乎隱然出現了台灣人治理台灣人的機會，那麼為何李登輝仍舊把「外來政權」這個解釋緊緊掛在嘴上？因為，李登輝除了是台灣人總統之外，同時，他也是這個外來政權，國民黨的黨主席。

而這個黨，即使逐漸湧入多數的台灣人政治工作者、國會議員也逐漸由本省籍代表取代外省籍代表，但是好比李登輝在 1993 年任命閣揆與台灣省主席之際，仍必須將省籍一併考量進去。沒錯，廣義上國民黨與總統職權，現在是由「台灣人」所領導；但在狹義上，這一個外來政權政黨，其實一直都沒有真正內化成為台灣人的政黨。它的骨幹、它的權力核心組成，依舊存在太多外省權貴領導陰影。

於是在這樣的統治結構下，台灣人始終走不出外來政權統治的陰霾，怎麼能不悲哀。而李登輝也說：「身為台灣人，卻無法為台灣盡力的悲哀，這就是我所謂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而那些為此批判的人，大概無法感受到這樣的悲哀吧。眾所皆知，台灣人長期以來，有著自己無法治理自己國家的悲哀歷史，而我生為台灣人，也曾處於想為自己做些什麼卻辦不到的年代」（李登輝 2016：61）。

即使貴為國家元首，李登輝依舊為所生長的政治情況感到無奈與不滿；他選擇說了出來，依照他的性格，他肯定正想方設法要為此「悲哀」來進行突破。我們也從上述中看到，李登輝說：「我生為台灣人，也曾處於想為自己做些什麼卻辦不到的年代」，就這一點，筆者認為與前述第三點：「對以前白色恐怖的恐懼」的內容息息相關。

李登輝歷經白色恐怖的襲擾，嚴重影響了李登輝的精神感官，前述所提所謂「七十多歲這一代晚上都沒辦法睡得安穩」，形容的正是李登輝自身的遭遇。蔣氏政權的高壓獨裁統治，深遠影響了台灣好幾代人的平常生活時光，這一點，李登輝本人也未嘗忘記。作為國家領導人，李登輝深刻體認到當代台灣人共同面對與必須革新克服的一切不正常環境，或許，這也正埋下了為何 1996 年李登輝一反 1990 年甫上任時做出做完一任六年即與李元簇副總統一起退休的承諾，李登輝要做的、想做的更多，六年任期，尚且不夠：

> 台灣第一次舉行總統直選的二年前，也就是司馬遼太郎和我對談的一九九四年，司馬先生對我說：「李先生，為了你好，建議你不要出來參選下屆總統比較好。」我想司馬先生是為我著想，才會基於友情給我忠告，又或者覺得，像我這樣的學者留在政界總顯得格格不入吧，所以擔心不管我願不願意，都會被捲入政治的危險局面裡。但我卻違背了司馬先生的好意，投身於總統直選當中，因為我認為，為了讓台灣更進一步民主化，我還需要一個任期。我對人民抱有使命感，在這個使命達成之前，我不能放下肩上的重擔。（李登輝 2016：59）

其後的發展，我們都清楚的知道，李登輝於 1996 年繼續尋求總統連任之路，並且得到超過半數選民的支持，順利贏得台灣第一次人民直選的總統寶座。而這一次總統直選的法源依據，正來自同年「1994 年 7 月 28 日，第二屆國大臨時會中正式通過了『總統、副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的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明訂『總統選舉方式自第九任總統改由人民直接投票產生』」（維基百科 2018g）。

除了上述台灣終於將總統、副總統選舉辦法透過修憲改為人民直接選舉外，這一年，台灣同樣有著一場眾所矚目的重要選舉，「1994 年，台灣人民將投票選舉台灣省長與北、高市長，北、高兩市原來都是中央直接管轄的院轄市，這次選舉因此被視為台灣民主改革的一項重要成果。……1994 年 12 月的省長與北、高市長選舉不只是候選人的個人競爭，也是一場關係著地方與全國問題的選戰。…

…不過三大政黨激烈角逐的首都台北市長之爭最有看頭，許多人把這場市長選舉視為台灣民主發展的指標性選戰」（蔡石山 2007：291）。

1994 年的台灣省長與北、高市長選舉，無疑是一場歷經激烈角力的選戰；又或者說，台灣過往的民主選舉中，少有不激烈的選戰。然而這一場受到關注的選舉，為何被視為台灣民主改革的一項重要成果？或許我們可以從台灣首長選舉時，代表民進黨出征的「陳定南」，其團隊喊出的「四百年來第一戰」這句口號中看出一些端倪。

如同台灣省主席轄管的規模，除了當時北、高院轄市之外，幾乎涵括台灣所有行政面積，是僅次於中央政府管轄的場域，改制後的台灣「省長」，轄管的行政區域與台灣省主席相同，因此，這是視作僅次於「總統級」選舉的規模，一點也不為過。但是自古以來，台灣人從來沒有機會自主的決定如此大範圍執政的領導人，即使 1996 年的直選總統在即，這一役，仍視為台灣民主大步向前的重要里程碑。北、高直轄市長不再以官派任用，也同樣是台灣民主深化的重要指標。

台灣人渴望擁抱真正的民主自由，在 1994 年底這一場省長與北、高市長直選中展露無遺。而被視為「指標性選戰」的台北市長一役，「尋求獨立的台灣人，當然首推民進黨。經過激烈的選戰，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當時熱烈推舉陳水扁的台灣人之間，曾有傳聞指出，『國民黨雖然遭到挫敗，但是冀望獨立的陳水扁當選，李登輝心裡一定非常高興』。事到如今，當時的傳聞已經無關緊要，不過李登輝還是徹頭徹尾的予以否認」（上坂冬子 2001：226）。

無論當時候李登輝內心如何看待台北市長由主張台灣獨立代表的陳水扁當選是否符合李登輝心意，但這一場拉升至「統獨」議題，台灣人民高度熱議的選戰，似乎也曾為了李登輝得以順利渡過決定開放人民直選總統的反對聲浪與難關，這一點讓我們回溯到同年國民黨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李登輝回憶道：「在各界代表出席的大會上，李煥等人對我大肆謾罵[質疑直選總統制度]。大約有一百人排隊，連飯都不吃持續開罵，我則以早晚會獲得諒解，安靜聆聽他們的意見。

結果真的依照我的想法獲得結論，直接選舉制終於底定。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九日，這一天我永遠不會忘記」（上坂冬子 2001：222）。

面對反對者的不斷挑戰與質疑，李登輝一如既往堅定其深信的信念，不溫不火地決定還權於民，讓台灣人民參與真正的民主；但這一個選舉制度的改變，李登輝是否直接成為受惠者？此時的李登輝「就任第八任總統的第四年，台灣人長久以來夢想的總統直選，即將在兩年後展開。當然，李登輝本人對於是否再接再厲出馬競選，一句話也未對外透露」（上坂冬子 2001：222）。

李登輝選不選首屆的民選總統？當然是國內外關心台灣前途發展的人持續議論紛紛的首要大事。面對這些好奇聲浪，學者性格養成的李登輝，此時再次以他所擅長的方式，「在這一年年底也出版了一本著作《經營大台灣》。……李登輝原本打算到選舉前才表態參選，不過，任何人都可明顯領會出，他是在將以往的政績透過著作向民眾展現，盼望直接選舉時選民能投他一票。因為在此前一屆由國大代表投票的選舉時，李登輝也曾把一本厚厚的《台灣農業經濟論文集》分送給他的選民 —— 約六百位國大代表」（上坂冬子 2001：225），至此，李登輝自身是否追求連任的企圖與想望，不言而喻。

三、　尋求連任之路

台灣順利修憲通過總統、副總統選舉改為人民直選，台灣省長與北、高直轄市長選舉也順利落幕，向來「關心」台灣民主進展的中國，在此關鍵時刻，當然也不可能悶不作聲。「1995 年 1 月 30 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所謂的『江八條[點] 』意見，宣稱『中國人無意打中國人』催促台灣與中國談判統一問題」（蔡石山 2007：288）。

面對中國方面再次強烈宣示「促統」問題，以蘇志誠為首的「台、中秘密溝通管道」，此時此刻發揮了重要的功用。「九五年的農曆前夕，江澤民發表對台政策『江八點』前夕，大陸方面就特地暗示，期望台灣方面屆時給予重視並友善的回應。對岸的先打招呼，李登輝立即指示蘇志誠因應，幕僚因此在除夕夜忙得

人仰馬翻。『江八點』正式發表後，原本陸委會的官員在面對記者查詢時還表示『不具新意』，但在年後李登輝在新春團拜時特別指出『江八點值得重視』，他並指示政府成立專案小組進行研究。表達高度的誠意」(鄒景雯 2001：201-203)。

在中國強烈的暗示、明示雙管齊下的狀態中，李登輝政府很難不謹慎以對、小心處理，以免引發任何不必要的台海危機。而我們一直以來認識的李登輝，在絕大多數時候會呈現出一種「識時務者為俊傑」的特質，意即即使他的內心不一定如此認同，他也會審視時局，做出一定程度的退讓，來成就更美好的事情。果然，「其後，李登輝藉由國統會的場合提出『李六條』作為較具體的立場表述，藉此與江澤民進行隔空對話。李六條發表前，台灣同樣在事前提醒了江澤民方面多加體會台灣的用心」（鄒景雯 2001：203）。

只是台灣政府與中國政府的交手，向來不曾出現真正的互信與平順。就在兩國針對「統一問題」隔空喊話之際，外交手段日臻嫻熟的李登輝，拋出了「赴美訪問」的重大訊息，此舉使得兩國關係再度陷入緊張。當然，李登輝是將以什麼身分訪問美國？美國方面又將以何種規格來接待李登輝？這是牽動中國敏感神經的國際外交大事，台中之間的秘密聯繫管道再次啟用。

> 蘇志誠與曾慶紅[中國密使]最後一次會面，是在九五年三月，這次在澳門的晤談中，蘇志誠告訴曾慶紅，對於李登輝即將前往中東與美國訪問，希望對岸能夠有所理解。「這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也確定將去得成。」當時中共當局不認為李登輝的美國之行能去成，根據錢其琛提報給江澤民的訊息，中共認為美國行政部門不會同意讓李登輝去訪。因此中共的態度是「你們有你們的立場，我們有我們的立場，因此到時候批評還是要批評的。」(鄒景雯 2001：203)

李登輝為何忽然間興起希望有機會造訪美國的念頭？這一部份，再一次將時序稍往回推。「李登輝當選總統後，只要職務許可總會盡量出國訪問。骨子裡雖是外交之旅，但卻多半以度假、打高爾夫球為名。初期他訪問過的地區包括東南亞、拉丁美洲和中東。但日本、南韓和美國等地，卻因為中共的打壓而無法成行。

……到了一九九四年初，諸如此類的限制已經讓李登輝不勝其煩，便決定正面迎擊，後來果然成功的在那一年過境美國」（柯義耕 2008：232-233）。

事情也就是因上述的「過境美國」而起。「一九九四年五月，李登輝計畫訪問台灣在拉丁美洲的友邦……。他的辦公室人員要求美國給予過境簽證，以便讓他的飛機能夠在洛杉磯或西雅圖降落並加油，也讓七十一歲的李登輝能夠在當地過夜並稍事休息。但美國國務院卻因為害怕得罪中國而加以拒絕，只同意李登輝的飛機在夏威夷降落並加油。」（柯義耕 2008：234）。

事情發展至此，或許長久以來面對外交困境的李登輝也只能自行吸收脾氣、盡可能「理解」美方的作為；但是美國隨後的安排與接待方式，卻直接引爆了李登輝不滿且沸騰的情緒：「為避免觸怒中國，美國國務院安排李登輝的專機在夏威夷的一個小型軍用機場降落，且只安排一名上校軍官接待。李登輝得知降落的機場設備極為簡陋時，氣得決定以拒絕下機表達不滿。等到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白樂崎（Natale H. Bellocchi）上專機致意時，李登輝故意穿著夾克與拖鞋向對方抱怨，表示代表一個民主主權國家的他應受到有尊嚴的接待，這種次等待遇他無法忍受。非常明顯，中國意圖全力壓縮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盡其所能羞辱李登輝總統」（蔡石山 2007：288-289）。

或許李登輝個人的牛脾氣刻意拉高分貝、表達不滿，但李登輝身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民主台灣國家領導人，在外訪問即代表著一個國家元首的身分，這是不容任何有心人士或是處心積慮算計外交利弊得失的國家、政體所能輕易污衊與踐踏的。在李登輝強烈宣示自己該被有的禮貌對待上，李登輝寸土不讓，堅定了台灣人的國格，也不負國人深切的寄望與所託。

「經過這次事件，李登輝決定要公開對美國人民發聲，讓他們了解台灣這個新興的民主國家」（柯義耕 2008：235）。李登輝開始尋求可能訪問美國的機會與管道。1995 年，「蔣介石逝世二十週年後的第五天，康乃爾大學校長羅茲拜訪李登輝。這位年老的地質學者是位英裔紳士，因為即將退休，表明希望舉辦李登輝的演講會。稍早前，美國參眾兩院曾經決議，歡迎李登輝以個人身分訪美（三

月六日）。李登輝也捐獻兩百萬美元在母校設立獎學金，……進入五月，美國眾院有三百六十九位眾議員投票贊成邀請李登輝訪美（只有一人未投贊成票），邀請康乃爾農經博士李登輝前來康大演講的事，就此定案」（上坂冬子 2001：232）。

不過，事情真如此順利，有了美國國會議員的背書、康乃爾校方的邀請，李登輝訪美行就能因此而成行嗎？顯然這其中仍有未完全表示明白的重要關鍵，也就是美國柯林頓政府乃至其國務院的態度，畢竟通行與否，依照政府的權力劃分原則，仍舊是美國總統柯林頓願意點頭才算。那麼李登輝政府究竟是如何突破重重困難，迫使柯林頓放行？我們來看看李登輝做了哪些努力：

> 李登輝透過國民黨投審會主委劉泰英聘請美國知名的卡西迪（Cassidy & Assoiates）公關公司，負責台灣對美國政府的遊說。據稱在簽訂的三年合約期間，台灣每年給付卡西迪的費用高達一百五十萬美元……為實現李登輝訪美，卡西迪成功遊說動員了美國三百六十九位眾議員及幾乎是兩黨的全部參議員，促成參眾兩院分別通過支持李登輝訪美的決議。另外還有成千上萬旅美台灣人寫信給白宮，要求美國政府發簽證給李登輝，不要向中國的壓力屈服。美國總統柯林頓最後並沒有照單全收，僅同意在嚴格限制國家元首禮遇條件下，讓李登輝以「私人旅遊」而非國家元首身分訪問康乃爾大學，而且不准他在訪美期間舉行記者會。（蔡石山 2007：289）

很顯然李登輝利用了誰也想像不到的國民黨「黨產攻勢」，成功的找到了公關公司來向美國參眾兩院議員遊說；這當然是一筆為數龐大的外交策略支出，但對於身兼國民黨主席，坐擁黨產萬貫、富可敵國的李登輝總統而言，能夠順利出訪美國，這些旁人認為為數可觀的金錢，應該覺得花得十分值得。

李登輝回憶道：「一九九五年五月中旬，當時我在台中視察地方建設時，一輛車從總統府火速奔馳而來，為了傳遞一則電報，內容是關於美國政府允許我到康乃爾大學訪問。之所以能實現訪美，是因為美國國會考慮到民意，促使當時的柯林頓總統作成決議。距離上次訪美，已時隔三十年。六月九日，我在母校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講，題目是『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李登輝 2015：105）。

無懼中國打壓的台灣、無畏中國抗議的美國，這一次做了破天荒的外交關係合作；無論美國柯林頓政府怎麼樣定義李登輝訪美的身分，無論李登輝是否被歸類降格的元首接待，只要李登輝能夠順利的踏上美國國土訪問，甚至在康乃爾公開演講，他代表的就是台灣人總統的身分，無需懷疑，也無所置喙。值得一提的，這是台灣首位總統能夠順利到美國進行訪問的。

李登輝成就了他認為的：「務實外交」（李登輝 2015：108），但可想而知，中國對台灣在外交上的有所斬獲，肯定不會開心，「李登輝歸國後的一九九五年夏天，中國軍方在南中國海發射導彈，第二年（一九九六年）三月，更對高雄外海發射三枚，對日本沖繩的與那國島附近海域發射一枚，導致美國出動兩艘航空母艦。由於李登輝受到美國的歡迎，在康乃爾大學的演講也頗受好評，大陸[中國]方面一定是害怕這會影響到即將舉行的總統選舉」（上坂冬子 2001：235）。

面對中國軍方不斷挑釁、導彈試射的台海危機，此時「李登輝在中國軍隊甚至有可能登陸台灣的騷嚷傳聞中，完全不為所動，……李登輝不緊張的一大原因，前面已經提過，那就是當時台灣與大陸[中國]之間已建立秘密聯絡管道，李登輝事前已把康乃爾之行通知過大陸方面，也知道對岸不會輕率的妨礙選舉」（上坂冬子 2001：235-236）。但儘管如此，中國的手腕與把戲不只軍事武力這一樁。

1993 年台、中破冰，順利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一次「辜汪會談」，讓世人誤以為台、中交往有了良善的發展與基礎；「第一次辜汪會談在九三年完成後兩岸兩會原訂在九五年下半年舉行第二次辜汪會談，但遭對岸以抗議美國同意李登輝訪美為由，逕行取消」（鄒景雯 2001：205）。這是中國長久以來的小鼻子、小眼睛，也是處處打壓台灣的最佳例證。

時節進入距離 1996 年台灣首次總統民選倒數約莫七個月的關鍵時刻，由於是第一次的人民直選總統，所以有心問鼎大位、謀求為台灣人民服務機會的各路人馬早已各自籌組團隊，希望得到最多選民的支持，繼而實踐主權在民的真義。於此時刻，作為台灣第一大政黨，同時亦是當時執政黨的國民黨，將要推出什麼樣正、副總統的組合搭檔來參與這神聖、備受世人期待的一仗？

以結果論來說，李登輝、連戰的組合贏得了最終選舉的勝利（詳細後敘），但李登輝的「繼續參選」，直接「打臉」自己 1990 年的六年退休宣示，以及 1994 年日本小說家司馬遼太郎的殷殷規勸，希望李登輝不要再角逐總統大位的期望。對此，李登輝是這麼表示的：「我之所以這麼做，還是想到如果要讓台灣的民主化更上一層樓的話，就不得不再當一任。雖然守節很重要，但是我對人民有使命，只要能完成這使命，以後就可卸下不管了」（李登輝，小林善紀 2001：113）。

「對人民有使命」成了李登輝不計毀譽、繼續尋求連任的最主要原因。但事實上李登輝似乎並沒有想像中的戀棧權位，「因此在提名前，李登輝曾經個別把連戰、宋楚瑜、許水德、吳伯雄等中生代找來，一一詢問過每個人要推誰出來參選？最後也把大家集合起來，當眾表明他已無意參選，請大家當面公推人選，但是中生代們當天面面相覷，還是找不出共主。……之後，中共壓力紛至，不服輸的個性，加以個人使命感一出，李登輝自是再披戰袍出征」（鄒景雯 2001：102）。

以上，當然都是李登輝個人的詮釋與說法。但無論如何，掌握實權的李登輝，還是依照其黨內的民主程序，順利取得競選的門票：「中國國民黨第十四屆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於 1995 年 8 月 23 日召開，支持黨主席李登輝連任總統。李登輝與當時的行政院院長連戰一同搭配競選正、副總統」（維基百科 2018h）。此時年已近 73 歲高齡的李登輝，繼續帶著雄心壯志以及對人民無法割捨的使命感，即將挑戰 8 年總統任期後的下一個璀璨 4 年任期。

四、　當選中華民國首任民選總統

延續上一段落李登輝最終決定投入參選台灣首屆民選總統的選舉，1996 年的李登輝，已經高齡 70 有 3 了；不過這樣的年紀，似乎並不會是成為國家領導人的阻礙。因為同場與李登輝對戰的其他總統候選人，除了 1937 年出生的陳履安屬於相對年輕以外，其他兩位總統候選人彭明敏、林洋港，也已年過 70，或是逼近 70 了。其中與林洋港搭配的副總統候選人郝柏村，更是堂堂邁入 77 歲的高齡大關了，卻也不減活力四射地積極參與這一次的直選選戰。

承上，由於這是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的重大變革，同時象徵著還權於民的無限希望，除了代表國民黨出征的李登輝、連戰搭配外，自 1986 年尚未政黨合法化即成立的當時國內主要在野反對力量——民主進步黨，也推出與李登輝同樣年齡、因「台獨案」流亡海外多年終於平安返國的民主鬥士彭明敏，搭檔自美麗島事件後擔任辯護律師、其後投入政壇的謝長廷。這是當代民主台灣重要的兩大主要政黨候選人，也是後來台灣接續完成三次和平轉移政權的兩個政黨。

接續第一段提到的林洋港與郝柏村的搭配，另外尚有陳履安與王清峰的組合。林洋港、郝柏村兩人與李登輝的過往與交鋒，本文中已有許多重點敘述，此段不再重提；但這同屬泛國民黨陣營的李、林兩組候選人之外，第三個出頭來的陳履安，又是何許人也？陳履安的父親擔任過蔣介石總統時期的行政院長、副總統，陳履安自己本身也在李登輝政府中擔任過國防部長以及監察院院長，是典型的國民黨權貴型人物；由於除了是正統的國民黨名流之後，也是當時外省集團的菁英領導人物，挾著本身累積的聲望與既有的政治實力，在不認同李登輝領導台灣的種種理念下，同樣加入這一場精彩絕倫、龍爭虎鬥的 1996 年選舉。

上述是 1996 年這一場令人屏息以待的台灣首場總統直選四組正、副總統候選人的組合，話題再次回到我們的主人翁——李登輝身上。尋求連任的李登輝，面對這一場可能是人生中最後一場選戰的民主戰役，他的競選活動事實上早在 1995 年時已然悄悄展開。包括前述提到排除萬難、達成赴美國康乃爾大學的成功外交之旅，也包含李登輝既有的慣用手法，以「文字戰」的方式，出版《經營大台灣》來向他的人民（選民）報告與訴求百姓的認同與支持。

卻也就是李登輝積極地運作台灣走入國際場域，期望能夠讓更多世界上的人看到，成功赴美訪問後，產生的後遺症就是惹惱了中國官方大一統的「邪惡立場」。「訪美之行後，中國的媒體不斷抨擊：『李登輝主張台獨。』很明顯的，這是對隔年一九九六年三月即將舉行的台灣首次總統民選的恫嚇行為。在一九九六年三月總統直選前，中國舉行飛彈演習。對於中國的恫嚇行為，美國政府派遣『尼米茲號』與『獨立號』兩艘航空母艦到台灣海峽，牽制中國」（李登輝 2015：108）。

中國軍方不斷透過軍演、試射飛彈等方式，企圖直接影響台灣總統的選舉，讓他們苦惱許久的李登輝因而失利，無法再繼續他的任期。那麼於此情況中，總有個對照組是中國官方願意接受的台灣國家領導人。很顯然主張台獨、遠超過李登輝激進的民進黨候選人不可能受中國所青睞，接受兩國朝統一發展的林、郝配、或是陳、王配，則成了中國寄與厚望的可能候選組合。

> 台灣首次總統直選，就在這種不安的氣氛下進行。我[李登輝]在演講中呼籲人民：「別怕，那飛彈不是實彈，是空包彈。」「對付中國的威脅，我們準備了十八套劇本。」說是準備了十八套劇本，其實是準備了三十套以上，但不能把手上的牌都亮出來，所以對人民說的數字少了些。我們甚至掌握到情資，得知中國的軍事演習只是心理上的威嚇行為，實際上無意展開攻擊。就這樣，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總統直選的結果，我獲得總票數的百分之五十四（五八一萬三六九九票），成為第九任總統。總統的任期從以前的六年改為後來民選的四年。（李登輝 2015：108-109）

面對來自中國龐大的「文攻武嚇」壓力之下，台灣人將手中首次參與直選總統的關鍵一票，以超過 54%的過半數支持度，選擇了已經擔任長達 8 年總統的李登輝。對於朝向真正民主開放、法治自由的台灣而言，這無疑是極為喜悅的時刻，台灣人當家作主，並且用堅定的選票，支持「台灣人的總統」李登輝。當然，這也是李登輝總統任期的再一次嶄新開始，卻同時也是最後一個任期了。

不過上述援引了李登輝著作中的一大段話，主要原因是為了討論有關李登輝當時競選場合中，對人民說出的國防安全內容與心理喊話，其實曾經引起不小的紛爭與爭議。李登輝說：「別怕，那飛彈不是實彈，是空包彈。」為什麼李登輝能夠如此確切般地向人民信心喊話？顯然依照李登輝謹慎行事的性格上，加以站在國家領導人的高位上，上述這段話，他不是「喊爽的」，希望矇騙善良的台灣老百姓而已；他應當是掌握了更精準的情資，讓他得以有恃無恐。

李登輝接著說：「我們甚至掌握到情資，得知中國的軍事演習只是心理上的威嚇行為，實際上無意展開攻擊」，所謂掌握到情資，照著本文中之前談論的「密

使」管道，李登輝很有可能再一次因為能夠事先與中國高層進行意見交換與若干共識的取得，藉此釐清中國軍方大動作「武力展示」、「導彈試射」背後是否有著武力犯台的動機。這一台灣、中國秘密溝通管道，看來發揮的實效著實不小。不過李登輝的恣意傳達猶如「中國軍事機密」的話語，卻成為了另一個獲得情資管道 —— 情報網的悲情結尾：

> 1996 年，台灣進行首屆總統民選，那時兩岸情勢顯得更緊張，因為演習隨時有可能化為實際的軍事行動，當時前總統李登輝在大選前為安撫民心，公開宣講中共軍演發射的是「空包彈、啞巴彈」，引起中共懷疑有人洩漏情資，大舉清查內部人員，使得被台灣收買的解放軍少將劉連昆、大校邵正宗遭到處死，代號「少康專案」的情報網也因此瓦解，連負責在大陸連絡劉連昆的我國情報員姚嘉珍、楊銘中都遭逮捕，迄今已入獄 20 年，分別將在今年六月及明年七月期滿獲釋，成為台灣遭大陸拘押最久的情報員！（中時電子報 2018）

這或許是李登輝性格上的使然，也可能是面對生涯最後一次可能的總統大選機會，為了延續自己的政權，導致不夠謹慎地洩露了本不該在任何情況下從李登輝口中而出的機敏話語。當然，台灣、中國之間是否相互存在著各自派遣進駐異國的諜報人員？我們無法一一加以釐清，但此之間若存在著任何一絲絲的可能，身為掌握兩國情勢與國政大權的台灣領導人，實不應該做出任何可能傷／波及為我國效命的情報工作人員；保護都來不及了。

無論如何，在 1996 那年，李登輝處在中國的武力威脅中，面對多達四組的各方競選總統隊伍中，順利穩定時局、脫穎而出，成為台灣改制總統民選的第一任總統。「事實上，中國的軍事威嚇已將一場總統選舉變成誰最有能力對付北京誰最能確保台灣發展的公投。結果很明顯，中國的飛彈不只沒有嚇倒台灣人，反而弄巧成拙，變成了李登輝贏得 54%選票的一大助力。這結果讓李登輝能大聲地說，他的政策和國家信念已獲得台灣人民的信任支持，他也因此贏得了台灣『民主先生』（Mr. Democracy）的雅號」（蔡石山 2007：300-301）。

第三節 最後主政時光的挑戰

李登輝「總統」的任期，始自 1988 年 1 月 13 日蔣經國前總統逝世於任上、由李登輝「副總統」繼任成為總統起算。歷經 1990 年的末代委任總統選舉，一直到 1996 年台灣首次開放人民直選總統，由李登輝勝出擔任首屆民選總統，此次任期亦經修憲工程調整為 4 年一任。直至西元 2000 年 5 月 20 日，李登輝正式卸任交接總統、完成台灣首度和平政權轉移，李登輝前後共擔任台灣總統長達一十二年多之久。

所謂「上台總有下台時」，對於一個真正實行民主法治的國家而言，任何民選首長亦或國家領導人，都會有任期的限制，以及能「連選連任」幾次的規範。依照台灣憲法規定，事實上李登輝儘管成為國家領導人已經 12 年了，但由於李登輝擔任總統的最後一任，卻是「民選總統」的第一任，李登輝是具備再次尋求連任的資格與條件；最後，李登輝沒有選擇這麼做，而是選擇交棒，裸身退出他已然再熟悉不過的總統府以及總統大位。

或許是年事已高、或許是李登輝認為已經找到可以信任、託付，能夠接替他繼續領航台灣的人；也或許是李登輝認為自己的階段項任務已然完成，李登輝這一次再也沒有如同 1990 年就任第八屆總統時允諾 6 年後退休的黃牛，真真正正沒有再尋求連任，順利交出他得來不易、一度深深深緊握的政權。植基於上，本章節定名為「最後主政時光的挑戰」。

搭配著最後一個李登輝總統的任期，筆者將由 1996 年李登輝成為台灣民選總統後，接著敘述到李登輝完成他光輝的 12 年任期前。但最後這短短的 4 年光陰，在於回顧上，卻同樣不會輕鬆。無論是台灣政壇上的快速變動、國際情勢的瞬息萬變，還是李登輝個人許許多多大、小主張如「特殊國與國關係」提出等，李登輝最後的主政時光，一如他的一生般，依舊精彩。新一代「強人」的引退、卸任，是否等同於偃息於台灣政壇？不再有任期連任懸念的李登輝，是否會表露出真正的國族認同傾向？讓我們繼續揭露這李登輝國族認同的神秘面紗。

一、　江山代有才人出

順利贏得勝利、取得再一次新任期的李登輝，絕對是意氣風發、容光煥發。在與同樣是「台灣人」的副總統連戰攜手連袂就職第九任正、副總統之後，此時李登輝的首要任務，就是重新打造一個能夠跟隨他的腳步，繼續為政府效命、為百姓服務的新內閣團隊。很可能是最後一個總統任期的李登輝，就在這個時刻，開始察覺到了來自國民黨內中生代相互爭權、爭位的浮躁與不安。

> 九六年對於李登輝的權力鞏固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在此之前的八年，李登輝為穩定個人的執政基盤奮戰不懈，並且在當選首任民選總統後，達到最顛峰。但是這個政治生命的最高點剛剛達及之際，李登輝馬上就面臨黨內中生代權力分配的索求，直到李登輝四年後卸任方止。（鄒景雯 2001：100-101）

對照起李登輝擔任第八屆總統末期時，在國民黨內始終沒有中生代挺生而出希望延續李登輝的執政，來競逐首次開放總統民選的選戰，在李登輝順利挺過選舉、高得票率當選後，這些原本被寄與厚望的國民黨「中生代們」，卻在此時為了擄獲更多、更大的政治資源與權位，開始動作頻仍，向李登輝叫板喊話了。

時任省長的宋楚瑜，首先發難：「三月二十三日選舉過後沒幾天，帶著五十四%高票當選的快意，李登輝心情輕鬆的把輔選有功的宋楚瑜找到官邸暢談國是。……在勝選愉快的對談氣氛中，宋楚瑜對李登輝提起，他很清楚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作為一個外省人怎麼可能選總統，副總統是備位，沒有什麼事情可做，而他是個做事的人，因此他最大的心願是當行政院長。」（鄒景雯 2001：101）。

接著，曾經於 2008 年與馬英九搭配，共同角逐正、副總統選舉，順利當選副總統的蕭萬長，也開始發出積極正取更高職位的聲音：「宋楚瑜的現象，並不是單例。第二個顯露意願的是蕭萬長，蕭萬長在競選期間擔任競選總部總幹事，同樣輔選辛勞，他曾與李登輝的身邊人談論起對閣揆的抱負。當時總統提名行政

院長尚須經過立法院同意，與李登輝親近的人士擔心，立法院這一關是個變數，蕭萬長的反應是：這是片面之詞，不表認同」（鄒景雯 2001：102）。

面對宋楚瑜、蕭萬長等這些中生代的菁英、輔選時的大將，一個個展露出欲角逐閣揆大位的心志，深謀遠慮如李登輝，卻也有自己心中完整的思量與規劃。先前提到過的，連戰是第一位成為行政院長的台籍閣揆，並且順利地與李登輝搭檔聯合競選正、副總統成功，在李登輝順利連任後再一次組成「新」政府之際，已經貴為備位元首的連戰，交出「行政院長」一職，其實也是順理成章的安排。

然而向來不按牌理出牌的李登輝，啟動了澈底執行「栽培連戰」的計畫：「李登輝接著找了連戰來，想聽聽他的想法，連戰已經是副總統，未來若準備接班，只當個陽春的副總統，中斷行政歷練與資源，對於四年後參選，確實並非正數。連戰表達了願意繼續兼任的意願，李登輝認為言之成理，由連戰維持一段時間，可以避免黨內生態的不安定，他決定不再為閣揆人選傷腦筋，就由連戰連下去」（鄒景雯 2001：103）。

其實連戰是先站上行政院長高位，才繼續朝副總統之路挺進的。自 1993 年 2 月 27 日擔任閣揆起算，至 1996 年 5 月 20 年就任副總統，前後擔任行政院長也已超過 2 年近 3 個月的時間，並沒有行政歷練不完整的問題，差別只在於手中是否持續掌握行政資源得以順利往總統競選之路邁進罷了。在這一個環節上，1996 年的李登輝，確實是願意支持連戰成為其可能接班人選的；並且，讓連戰贏在起跑點的心，一覽無遺。

李登輝繼續啟用連戰副總統來兼任行政院長，固然有他為了平衡國民黨內的紛爭考量，以及欲培養接任自己成為下一任台灣總統的個人私心，但是「這個照顧現實的安排，在六月五日對外宣佈後，由於與民間期待落差太大，加以李登輝在大選前二月二十三日的記者會曾經公開表示連戰在當選後不會再做院長，如今卻為政治情勢有所權宜，立法院因此出現強烈質疑。民進黨當時發動『六月政改』，並提出大法官釋憲申請，拒絕連戰到院總質詢，兩院互動為之癱瘓……李登輝自

比法國的戴高樂，認為自己擁有五百八十萬票的最新民意，沒有必要受制於舊民意的立法院」（鄒景雯 2001：104）。

有了李登輝的全力相挺輔以不向在野黨妥協的支持下，連戰最終以副總統之姿，兼任了高度爭議的行政院長一職。但黨內的茶壺裡風暴，並沒有因此真正停歇，雖然率先明志的宋楚瑜並沒有反對連戰兼任閣揆，「他的省長任期必須任滿三年，才能解決不必改選的問題，連戰做下去在另一形式上正是為他卡位」（鄒景雯 2001：103-104），但是聰穎過人、權謀至深的他，很快地將目光轉移到「國民黨秘書長」一職上；而「蕭萬長」也是。

最終無論是蕭萬長或是宋楚瑜都沒能在這一波府院黨的人事改組中，取得心所想的夢幻職位，「黨秘書長的人選最後發表，李登輝決定由另一位自動請見表達意願的吳伯雄由總統府秘書長轉任……。李登輝認為，『這麼做是站在黨領導人的立場，必須扮演交通警察的角色，維持黨內的秩序，有人若意圖要插隊，我不得不吹哨警告，否則必然局面大亂』」（鄒景雯 2001：106）。

二、 交戰中國新思維

帶著嶄新且高得票率為基礎的新民意，李登輝這一任期的四年之初，強勢任用連戰來掌控台灣龐大的行政資源系統，也不著痕跡地擺平了國民黨內中生代們的權謀算計之爭；此時此刻的李登輝，也該當有餘裕來面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在未來應當如何走下去了。

> 將來，如果中共對台灣的敵意降低，同時大陸發展的不確定性也逐漸減少，我們的政策可能會有很大的改變。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堅持「戒急用忍」的政策。……事實上，台灣早已放棄「漢賊不兩立」的思考模式，而改以「雙贏」的態度，希望積極改善兩岸關係，促進兩岸合作，……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善意的提案，幾乎都沒有辦法實現。因為中共當局還是用舊的「鬥爭」、「吃掉」的心態，面對新的兩岸關係，一定要把我們納入他們所謂的「一個中國」模式，不然就指控我們「搞台獨」。結果，我們的善意加多了，中共的敵意卻加深了。「雙贏」的想法不能發揮作用，迫使我

們不得不採取「戒急用忍，行穩致遠」的因應方針。……我們希望美國能了解並認同「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而不要陷入「中國大陸的『一個中國』政策」的框架，甚至推衍出台灣在「搞台獨」的錯誤訊息，來推動對台政策，否則將會造成嚴重的問題。（李登輝 1999：155-156）

「戒急用忍」政策，是李登輝在最後一個任期之初，最早拋出的台、中關係概念。我們可以清楚知道，李登輝並沒有真正的鎖國治之，也沒有希望切斷與中國的鏈結；甚至在可能的情況下「同時也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方案，例如，『領導人會面』、『國際合作』、『境外航運中心』、『文化交流』、『農業合作』、『國有企業改革』等」（李登輝 1999：156）。

台、中關係的複雜其來已久，就在 1995 年李登輝順利訪美後、1996 年台灣舉辦總統直選前，中國不斷的武力恫嚇，讓台、中更陷入了雪上加霜的詭譎氣氛。以直接民意為基礎，坐實了國家領導人位置的李登輝，對中政策顯得格外重要；同時間，長期維繫台海和平的美國政府，也正注視著，李登輝的談話內容，始終不僅僅說給中國當局聽，也必須注意美國的感受與反應。

在現實上，儘管中國在 1990 年代乃至迄今，依舊維持一黨獨大、獨裁統治的共產社會體制，沒有民主，也沒有人權法治；但是，中國企圖以武力挑戰世界霸主的心，可以從他每年編列龐大預算購置軍需中清楚看見他的野蠻與暴力。再一次強調，中國從未放棄以武力犯台，以致地狹人稠、缺乏天然礦物資源等因素的台灣，面對這樣僅僅一海之隔的惡鄰居，只好不斷不斷找尋不失尊嚴，卻也盡可能維持良善關係，朝雙方和平往來、創造「雙贏」的方向去。

台灣單方面的傳達友好之心，中國政府顯然沒有領情。但作為肩負兩千多萬人身家性命、財產安全的國家領導人，李登輝唯有持之以恆地為台海和平釐出清楚頭緒，並小心翼翼地與中國交手，台灣人民才有可能得以安居樂業，進而繼續創造台灣人獨有的「經濟奇蹟」，過著更好的正常生活。不過這個時候的李登輝輝，刻意傳達的「一個中國」概念，內容是什麼？容後討論。

邀集朝野人士召開國家發展會議，是李登輝九六年就職演說的重要承諾，總統府秘書長黃昆輝在到任新職後，八月間就開始積極籌辦，規劃在當年底如期舉行，以為次年的國大修憲鋪路。繼總統完成直選，簡化行政層級已是朝野共識所趨，那段期間，國發會籌備是在地方舉辦的一系列巡迴座談會，主張精省或凍省的意見幾乎是一面倒獲得基層人士的支持，成為十分清楚的社會主流意見。十一月四日，宋楚瑜方面終於以記者會正式提出反擊，省府發言人說，台灣省存在五十年，創造了經濟奇蹟，怎麼會突然一夕間成為阻礙進步的「代罪羔羊」！（鄒景雯 2001：107）

精省或凍省的發展，首當其衝的，就是於 1994 年底選上第一屆台灣省長的宋楚瑜；也是在前一波閣揆以及國民黨黨秘書長爭取接替，無端挑起李登輝另眼看待的宋楚瑜。宋楚瑜是在 1988 年國民黨內爆發「代理黨主席」之爭時，大動作「挺李」而開始受到各方的好奇與關注。在李登輝逐步掌穩政權的辛苦道路上，也不時見到宋楚瑜為其效命的身影，李、宋關係想來肯定不差。

但上述「國發會」主導，由下而上形成的「精省／凍省」共識，再再劍指只當第一任，就沒有機會尋求民選連任的宋楚瑜。遭受「工作權」脅迫的宋楚瑜暨其省府團隊，在此「生死存亡」之際，想必心裡不會好受，於是「高分貝」的喊話，形成「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同黨不同調。宋楚瑜展開了一連串「救亡圖存」的積極作為，希望能夠扭轉幾乎已成定局的惡劣情勢。

十二月十八日，國發會前夕，國民黨召開高層會議，李登輝第一次公開對省級問題表態，他未如外界預期，竟作出「廢省」與「省虛級化」不宜討論的共識裁決。當天會議舉行的目的原是要藉黨內多數發言，使受邀前來的省長宋楚瑜了解此一民意趨向，但是無奈的，會中其他中生代卻觀望大於行動，有備而來的宋楚瑜，則一人舌戰群雄，讓李登輝當場吞下了心中的定見。宋楚瑜所代表的省方立場，之所以令李登輝必須正視，因素甚廣，其中包括國民黨次年縣市長選舉是否會受到牽連等政治效應，此外更有情感層次，當天李登輝在會議總結時，特別問了宋楚瑜一句「你還有沒有問題？」道盡箇中意味。（鄒景雯 2001：108）

國發會舉行前夕的國民黨內部高層會議，原意是希望透過黨內承受民意的走向，讓宋楚瑜清楚明白黨貫徹的意志與不可逆的民意匯流。但這畢竟牽涉甚廣，保守如國民黨員，又如何由中生代們主動發聲來與仍舊位高權重的宋楚瑜省長抗衡？顯然李登輝的算盤這一次撥得並不精準。從上述我們也得知，李登輝與宋楚瑜之間的私交或說情誼，確實是存在過的。

李登輝於就任本屆總統時承諾召開的「國家發展會議」，當然不能食言；1996年「12 月 23 日到 28 日，一百七十名政黨代表、民意代表、政府官員、學者、專家與地方領袖等在連戰副總統主持下總計通過了一百九十二項建議案，其中包括精簡省政府決議」（蔡石山 2007：302），至此，台灣省政府將逐步削弱實質效力，而後的發展，也的確漸漸地走入台灣的歷史；台灣省，再不復見。

最關鍵的權利影響當事人——宋楚瑜，當然不是省油的燈，「當時擔任台灣省省長的宋楚瑜也以抗議國發會通過停辦省長與省議員選舉的精省案為由，宣布辭去省長職務。與多數外省人一樣，宋楚瑜很早就懷疑李登輝暗藏台灣獨立建國的陰謀，將取消省政府組織視為李登輝把陰謀攤在陽光下的行動」（蔡石山 2007：302-303）。曾經與李登輝關係密切、甚至外界看來情同父子的宋楚瑜，就在李登輝坐看「精省案」通過後，兩人漸行漸遠，最後在 2000 年總統大選前，走向兩人形同陌路的無奈發展。本段落末，補充李登輝對凍省案的看法：

> 一九九六年底，我以總統的角色召開國家發展會議。這是仿效一九九〇年召開的國是會議，……在這會議上決定的重要決策，就是凍結台灣省。……凍結台灣省，不但可處理舊往的利益政治問題，還可拆穿中國所謂「台灣是中國的一省」的虛構謊言，結果是，可以讓很多台灣人對台灣的主體性產生覺醒。台灣就是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事實就是如此。（李登輝 2015：109-110）

三、 愈趨明朗的「新台灣人」輪廓

1997、1998 這兩年，在近代台灣民主進展上社會存在一種「無選舉不歡、無投票不樂」的特殊氛圍之中，這兩年，台灣依舊進入一種舉國關注、熱鬧動員的接續選舉嘉年華系列活動裡。由於李登輝的政權之所以能夠愈加穩固，最主要原因即是倚靠訴諸還權於民的策略，透過選舉、堆疊民意的支持選票後，才得以不動如山的坐在大位上領導改革；換言之，李登輝的政權向來與選舉息息相關，我們也因此透過 97、98 年分別舉行的各式樣選戰，來近身觀察此時的李登輝。

有了主要的走向與觀察重點後，卻還不夠；筆者同樣會依照時程，接續描摹每一個年份中與李登輝生命歷程密切相關的國內外大事。首先，我們再一次必須提到在 1997 年正好遇上「五十週年」的「二二八事件」紀念。二二八事件對於李登輝來說，是自年輕親眼目睹，一直到他年紀漸長、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後，始終無法拋卻的生命刻痕。

一直到後來，李登輝的官位愈做愈大，等到他真正掌握至高權力後，開始了一連串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調查與某種意義上的平反。如同上一章節所提，在李登輝的主導下，行政院於 1992 年 2 月 23 日公布了《二二八事件報告書》（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 1994）；時隔五年，1997 年 2 月 23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二二八補償條例》，明定二二八為和平紀念日。這個時代的慘劇與眼淚，能夠在發生 50 年後，透過國會來立法明定紀念日，當然不會全是李登輝一人的功勞；但是作為一個充分掌握行政暨立法大權、完全執政的國家領導人，李登輝確實在二二八事件上不敢怠忽，也同時有著總統李登輝才有的另一份特殊情懷。

然而過往的傷痛即使持續透過國家力量盡可能地去撫平、補償，1996、1997 年在李登輝主政下的台灣，卻接連出現台灣史上少有的重大社會暴力事件，治安持續惡化，人民再次陷入焦灼以及難以平復的惶恐不安。「1996 年 11 月 21 日，桃園縣長劉邦有與七名桃園縣議員在縣長官邸慘遭殺害。十天後，民進黨婦女部主任彭婉如在高雄遭殺害。雖然政府當局堅決表示要將兇手繩之以法，這兩個看似政治謀殺的兇手至今仍逍遙法外。緊接著是知名女星白冰冰的女兒白曉燕 1997 年 4 月 14 日遭人綁架勒贖事件」（蔡石山 2007：301-302）。

這些令人心驚膽顫、恐懼油然而生的駭人聽聞慘案，都是倡言以民主法治帶領台灣持續朝向進步的李登輝政府治理下的治安。人民失去信心，因為政府再也守護不了子民最基本生活要素的「免於恐懼的自由」，以及性命財產安全。於是再也按耐不住的台灣人民情緒，只能再次透過走上街頭、向政府當局表達最沉重的怒吼，「[1997 年]5 月 4 日，為數約五萬人的群眾在台北市區遊行後聚集到中正紀念堂，他們大罵政府面對日益增高的犯罪率態度軟弱，束手無策，要求政府建立更好的公共安全秩序。……為此李登輝在 5 月 15 日的記者會向人民公開致歉，他向人民保證，將盡一切力量確保社會與人民的安全」（蔡石山 2007：304）。

對於李登輝猶如「宣示般」的舉措，自然無法平息來自人民內心無限恐懼的怒吼；於是來自民間各方要求「撤換內閣」的聲浪，始終沒有停過，副總統連戰兼任閣揆的位子，恐怕是做不久了。「在社會強力要求壓力下，李登輝局部改組政府，一些人在這次改組下台一鞠躬。……[一直到]1997 年 8 月 28 日李登輝宣布由台籍的蕭萬長組閣，組織李登輝就任總統以來的第五個內閣」（蔡石山 2007：304、306），這個嚴重的治安缺失風暴才總算勉強渡過。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源於已故的桃園縣長劉邦友血案，桃園縣長必須進行補選；曾經為美麗島事件政治受難者的呂秀蓮女士，代表民進黨出征，大敗國民黨候選人、取得壓倒性勝利，成為民進黨籍的桃園縣長。而後呂秀蓮在 2000、2004 年兩度與陳水扁搭檔，競逐正、副總統大選，先後擔任了台灣八年的備位元首——副總統，也是台灣截至目前為止，唯一一位女性副總統。

接著，讓我們把焦點稍稍轉移到國際上的視野。也就是 1997 這一年，在此之前談論許久的「香港 97 大限」，終於到了最後移交的時刻。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主權由英國移交給中國，結束香港長達 153 年的英國政府統治；香港正式回歸中國。這一個重要的國際事件，後來也衍生了「一國兩制」的嚴肅議題，覬覦台灣許久的中國，多次寄望以此「糖衣」矇騙過關來統一、治理台灣。

我們重新把視角擺回李登輝的脈絡上。如同本節次破題所示，1997、1998 年的台灣，依舊是熱熱鬧鬧的「選舉年」。除了 1997 年 3 月份因劉邦友慘遭殺害

而出缺進行的桃園縣長補選外，這一年底，牽動台灣地方政府的縣市首長選舉，才真正是除北、高直轄市外，幾乎關聯著台灣每一位百姓的大型選舉。

這一次的選舉，成立已經 11 年的民主進步黨，透過 10 餘年來歷經台灣各類型選戰的洗禮，已經漸漸蛻變成為愈來愈能與執政黨／國民黨抗衡的台灣最大在野黨。「1997 年 11 月選舉，國民黨在激烈的縣市長選舉中輸掉了近三分之二的地方政權，民進黨贏得二十三個縣市長中的十二個，國民黨由原來在十五個縣市主政減少到只剩下八個」（蔡石山 2007：307），這無疑是長期主政台灣的國民黨難以想像的選舉結果；中央執政換黨的徵兆，似乎已然悄悄浮現。

不過即使國民黨面對了在地方政府選舉上的大敗，身為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卻也沒有因此而黯淡下台；李登輝真正面臨黨主席保衛之戰，是在 2000 年總統大選國民黨候選人連戰慘敗之後，直接面對失望的國民黨支持群眾，「逼宮下台」的囧境，於後再表。但不可諱言的，在面對選舉失利依舊坐穩黨主席的李登輝，倚仗的肯定不是民主制度的保護，而是在這執政最後兩年半餘，他依舊是國民黨內最有權勢的一號人物，無人敢進犯、無人能挑戰。

時間來到了 1998 年。還記得 1995 年李登輝赴美訪問康乃爾大學，最後批准的美國總統柯林頓，1996 年順利連任的他，1998 年動身訪問中國，一向「友台」的柯林頓總統，卻在中國訪問談話時，拋下了一枚台灣無法承受之重的對台政策震撼彈。傾刻間，台灣上下無論支持統一、支持台獨立場的各方人馬，都無法立即回神，彷彿是讓美國政府離棄了一般：

>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柯林頓總統訪問中國……這是九年以來第一次，現任美國總統正式訪問中國，目的在修復……冷卻的中美關係……柯林頓不小心或有意的在高峰會談中說出不必要的話，就是「三個 NO!」後來，總統特別助理柏格透露「三不」的內容是：一、不支持兩個中國。二、不支持台灣獨立。三、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上坂冬子 2001：265-266）

在 1979 年台美斷交以前，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與地位，早已隨著退出聯合國組織、台日斷交等外交重挫後每況愈下；直至與美國政府切斷最後建交關係後，台灣在國際外交空間上，沒了最後強而有力的盟友。但聰明精算如老美，無論是考量維繫台海和平的戰略重要因素，或是因預防中國武力迅速崛起後直接威脅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因而衍生出有利益可圖的「對台軍售」；或者美國協防台灣的《台灣關係法》確立等等，1979 年後的台灣與美國關係，說來也真沒那麼的差，美國依舊是台灣在國家發展上的重要倚靠。

這一次，柯林頓政府為了修復與中國的關係而前去訪問；顯而易見地，台灣方面的相關前瞻與未來，成為了柯林頓可以操之在手的「交換禮物」。這是再一次驗證了李登輝所說：「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由於美國政府對中國官方釋出的爆表善意，連帶促使台灣國家領導人必須正面迎擊這個「炸裂國本」的課題，李登輝隨後在 1999 年接受國際媒體訪問時正式提出「兩國論」的論述，容後敘述。

接著依尋時序的脈絡，時節進入到了 1998 的秋天；這一個秋天，對於李登輝總統來說，依舊是個多事之秋。除了年底即將舉行立法委員及北、高直轄市市長等重要選舉在即外，1993 年僅舉辦一次即停擺的台、中「辜汪會談」，也在闊別五年後的這一個秋天，可望再次復談，進行第二次的辜汪會談。

其實有關台、中在 1949 年國民黨敗守台灣以降，台灣官方向來不願意透過任何形式、任何管道與中國當局溝通或對談。直至 1987 年台灣解除戒嚴後，蔣經國因應時局變化，態度稍微放軟後，開放台人至中國探親、逐步放寬通郵、通信等，台灣與中國才逐漸有了民間之間的相互往來與交流。但是雙方面對於是否開啟官方對話，仍舊各有盤算、始終保留。

僵局一直持續到了 1993 年，我國海基會在陸委會的支撐與指導下，終於由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為台灣代表，至新加坡與中國官方代表：海協會會長汪道涵，進行「隔海分治」44 年，首次具有濃濃官方味道的雙方對談。然而就在看似台、中可能攜手朝向和平共榮的一次珍貴性對談後，這一扇好不容易開啟的會談大門，就又再次因為中國不滿李登輝於 1995 年順利訪美等因素，而悄悄關上。

其實單就結果論來看，無論是第一次、或是第二次的辜汪會談，會議中的結論往往宣示大於實質效果；畢竟這個會議的代表出席層級，即使雙方各自直接銜命國家領導人的指示，但終究不具有任何正式官方身分，也就不可能真正簽訂任何正式的協議、發佈任何具有效力的官方文件。好比 1998 年在確定第二次辜汪會談可成行時，台灣政府的立場就定調：「復談是為了未來的兩岸關係塑造良好條件，因此只要辜振甫與汪道涵兩人見面，國際媒體廣為報導，目的即已達成」（鄒景雯 2001：210）。

有別於第一次辜汪會談進行地點，是在兩國之外的第三地：新加坡舉行；第二次的辜汪會談地點，是到中國的上海舉行。台灣方面由辜振甫董事長領軍的代表團，主要成員組成如下：「康寧祥是以國統會委員、但曾為反對黨的經歷，成為見證台灣民主，訴求政黨政治的代言人，蔡英文負責對國際媒體闡述政策，吳榮義則職司經濟出擊，張榮恭在結束大陸行直接飛往美國，代表台灣對美進行簡報」（鄒景雯 2001：213）。

各司其職的台灣代表，銜著李登輝總統行前囑咐的：「這次去，一定要談台灣的民主，並且在國際文宣上強調主權對等，這兩個法寶缺一不可」（鄒景雯 2001：212）；民主與主權對等，成為了台灣定調的最高指導原則。其中作為此行會談的首要靈魂人物：辜振甫董事長，除了如期與中國代表汪道涵在上海進行會談外，也藉此行到了「北京」，與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進行會晤。

「九八年辜振甫訪問大陸的行程中，除了在上海進行歷史性的第二次辜汪會談，最重要的重頭戲當數北京的『辜江會』。當年十月十八日，辜振甫與江澤民在釣魚台國賓館進行了一小時又四十五分的對話，……[辜振甫]建議，我們並不放棄統一，不過在還沒統一前，我們雙方是不是同稱兩個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彼此的承認不妨礙將來國家統一，例如德國的例子。……辜振甫接著打出民主牌，他對江澤民說，台灣五十年來民主化的程度已經來到了一個水準，不是說台灣的民主沒有缺點，不過世界潮流告訴我們要走上民主、自由化，……江澤民文言果然不能接受。『余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鄒景雯 2001：215-216）。

打出「民主牌」，是台灣面對中國亟欲併吞的惡質霸權，一張再強有力不過的王牌。台灣擁有的高度民主法治與自由，甚至是在人權維護的各項議題上，都是專制獨裁的中國政體所望塵莫及的。人口、土地、武力，甚至是國際外交空間都相對弱勢於中國的台灣，在必須與中國交手的各項談判上，唯有緊抓著我們成功的民主經驗，才可能創造出更多有利於我們的談判空間。

辜振甫與江澤民前後 105 分鐘的對話，想當然難以讓各自擁有絕對主觀立場的兩人，有著什麼樣的共識或說火花；但作為台灣領導人所高度信任的辜振甫代表，無論是面對中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或是真正在中國掌權、統御的國家主席江澤民，都恰如其分的捍衛台灣寸土不讓的國格與主權，是為再一次漂亮的對戰中國精彩出擊。「辜江會的對話過程，李登輝想到都會笑，辜振甫回國後，他親自在總統府接待，給了辜振甫最高的榮譽，徜徉兩岸談判近十年，薑也的確是老的辣」（鄒景雯 2001：219）。

在第二次「辜汪會談」一如預期順利地平和落幕後，李登輝將政務核心，再次由國際上的攻防，轉回在國內即將舉行的年底國會議員及直轄市長選戰上。就在選戰進入密集倒數衝刺的時刻，作為國民黨黨主席的李登輝，一如既往，又一次扮演了「輔選大將」的重責大任。由於上一年國民黨在地方政府的選舉中，慘敗於民進黨，導致李登輝暨其領導的國民黨團隊，不得不大幅修正選戰策略，於是，早發於 1994 年曾經短暫出現的「新台灣人」口號，再次隆重登場。

>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五日的台北市長選舉，中國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馬英九先生獲得當選。國民黨贏得勝選，固然值得欣喜，但我們在這次選戰以「新台灣人」為訴求，獲得勝利，更具有重大的意義。馬英九先生的父親是出身中國大陸的菁英，也就是所謂的「外省人」。以往在地方首長選舉上，外省人因為人口結構問題，多半居於劣勢。……和馬英九先生一起競選的，是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先生，他贊成台灣獨立，主張「台灣優先」。……我[李登輝]曾在一場造勢活動中問馬英九：「馬英九，你是哪裡人？」馬英九馬上面對上萬民眾，毫無遲疑地回答：「我是吃台灣米長大，愛台灣的新台灣人。」

這個答案讓民眾掌聲如雷，熱情沸騰。我們就是以「新台灣人」為主軸，打勝了這場選戰。（李登輝 1999：262-263）

「新台灣人」這一句打動人心、使馬英九贏得台北市長選舉的口號，其實並非於 1998 年這場選戰中才首次出現。源於國民黨統治台灣向來都是以外省菁英為領導核心班底，以致即便到了 1998 年李登輝早已成為台灣總統十年整了，在代謝緩慢的情況下，當時候的國民黨真正決策的高層核心，乃至家喻戶曉的亮眼、看板人物，依舊四處存在著外省集團一路栽培上來的明星子弟。1998 年的馬英九是如此，比馬英九更早成名於 1994 年選上台灣省長的宋楚瑜也是這樣。

但如同蔣經國當年推動吹台青政策一般，台灣本省與外省的對立與分配資源上的始終不對等，若持續讓外省集團領導台灣，國民黨將很可能走入衰竭的情況，被公民意識日日升高的台灣本省族群所挑戰，甚至是連根拔起。所以身為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既然坐在這個外來政權的首腦位子上，他也必須面對現實，整理出一個可行的「本省」與「外省」共存共榮的政治運行方式。

「九四年底省長民選時，宋楚瑜到了台北縣大票倉，他[李登輝]首先提出『新台灣人』的口號替宋站台拉票，馬英九還是之後的事」（鄒景雯 2001：110），這正是作為黨主席的李登輝，在為自己政黨重要候選人針對省籍在選戰中可能遭遇的障礙，做出化解的選戰策略；也是站在國家領導人的高度，希望台灣各族群間過往的恩恩怨怨，能夠化干戈為玉帛，大家都是「新台灣人」。李登輝如是說：

這正是我多年來所期待實現的理想。國民黨雖然是從中國大陸播遷來台的政黨，但現在早已不是所謂的「外省人的政黨」。今天，我們共同生活在這片土地，追求共同的發展，就必須先確立對台灣的認同（Identity）。也就是由台灣人以自由意志來建立自己的政府，實行符合台灣人意願的政治體制，建設出不分省籍，屬於全體台灣人的繁榮社會。（李登輝 1999：263）

1994 年台灣省長、1998 年台北市長，兩次皆由國民黨籍「外省菁英」出戰且告捷的選戰，作為最高指揮官的黨主席李登輝，顯然「新台灣人」為主軸的策

略指導與執行的非常成功。於此當下，李登輝卻也同時拋出了「台灣認同」這個重要的觀點；在討論何謂台灣認同之前，且些看看在 1998 年最後一件特殊政事。

隨著 12 月 5 日北、高直轄市長選舉的結束，意味著自 1994 年台灣省長與北高市長開放人民直選的任期來到了延續或交接政權的尾聲。不同於 1994 年同時有三位首長當選人，1998 年的這一場選舉，能有機會尋求再次連任或企盼首次勝選的，僅僅只剩下台北市長與高雄市長這兩個職務；台灣省長的這個職務已然不再存在，宋楚瑜因此成為了首任也是末代的「唯一任台灣省長」。

本章第三節曾提過，台灣省虛級化的由來，是 1996 年李登輝所主持的國家發展會議中即已作成決議通過；所以自 1996 年底以來，瞬間成為「末任」的台灣省長宋楚瑜，就曾經透過省府發言系統，大力批判並反抗這個具備台灣主流社會共識的議決；更由甚者，在「[1996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發會閉幕，會中終於達成精簡省政府層級的朝野共識。宋楚瑜立刻於三十一日在省議會宣佈辭職，並且隨即向行政院遞出辭呈，政局為之震盪」（鄒景雯 2001：109）。

當然最終李登輝政府沒有接受宋楚瑜的請辭，並且願意接受慰留；宋省長也再次回到中興新村辦公，直至坐滿任期。嚴格上來說，台灣省政府組織的精簡一案，是社會上多數人民的期望與聲音，並且由最具權力的李登輝總統來強勢主導執行，更何況，其實宋楚瑜是帶著更多的算計以及自身前途的私心。最後，在屢次抗衡未果的情況下，宋楚瑜也只能選擇接受一途。

然而這究竟是一件台灣政壇上備受矚目的改革大事，作為 90 年代迅速串起的政治新星宋楚瑜，堪慮於自身的將來，「九七年九月，……副總統連戰為化解黨內衝擊，在總統府秘書長黃昆輝陪同下在總統府約見宋楚瑜，宋楚瑜再次表達了對於行政院長的意願。……現在的時機不對，但是等到時機對的時候，及所餘任期不足一年時，黨應該對他有所安排」（鄒景雯 2001：112）。

在沒有得到黨高層的積極回應後，宋楚瑜持續他「吵糖吃」的謀略或說小動作：「宋楚瑜先是拒絕出席行政院會，接著以地方補助款問題叫陣，……宋楚瑜先是安靜了幾天，但是持續沒多久，行政院又面臨槍林彈雨，宋楚瑜與李登輝幾

乎斷絕了互動。『這點，我的個性很像蔣經國，硬要是要不到的』李登輝當然也動了氣」（鄒景雯 2001：112）。

曾經情同父子的李登輝與宋楚瑜兩人，各自有各自的堅持及盤算；漸行漸遠的兩位不同階層領導人，就在許多的不巧合或說陰錯陽差下，愈來愈少交集。甚至到最後是「李登輝質疑，『我的門是敞開的，你為什麼不來看我？我可以幫你解決嘛！』」（鄒景雯 2001：113）。總之，屢次求取閣揆大位不成的宋楚瑜，在卸任省長職務不久後，即宣布參選 2000 年總統；當然，對手陣營包括了民進黨，以及長期灌溉宋楚瑜成長、以李登輝黨主席為首的中國國民黨。

四、　特殊國與國關係

1999 年是李登輝總統多年主政台灣的最後一個完整年，這一年，卻也台灣人永遠難忘的一個傷痛記憶年。從這一年初開始，不再競選連任的李登輝，進入了他執政 12 年的最後倒數。或許即將卸下國家元首的重擔，李登輝開始尋求對國際外媒的管道發聲，同時亦出版了結合執政經驗與心力的大作《台灣的主張》，來向世人匯報李登輝過往成就了哪些台灣經驗，以及對於未來有何展望與期許。

誠如上述所提，這一年是台灣人共同承擔傷痛的記憶年；就在台灣各主要政黨以及各組參選 2000 年正、副總統候選人正如火如荼的進行選舉活動拜票之際，9 月 21 日台灣島內發生死傷慘重的「九二一大地震」，美麗的台灣寶島，頓時陷入愁雲慘霧，許多台灣同胞被迫面臨生離死別、家破人亡的慘境。作為台灣十多年來領航者的李登輝，在距離卸任不到一年時刻，怎麼做？國人都在看。

在討論李登輝如何帶領台灣人民挺過地震災難前，礙於時序編排，筆者必須重新回到這一年發生與李登輝緊密相關的事件上，繼續展開。於是，本節次的標題：「特殊國與國關係」，首先登場。特殊國與國關係，一般也稱為「兩國論」，所謂兩國，無非指得正是「台灣」與「中國」；這樣的論調與舉措，對於向來以「祖國」自居的中國官方來說，無疑挑動了其最為敏感的「統一大業」神經。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驚天動地、引發熱議的兩國論論述，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提出，而提出此全新定義的李登輝，是如何來詮釋他所認定的：特殊國與國關係；以及台灣人民共同面對的敵人：中國，又是如何來因應它所無法容忍的事情。

>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的專訪。因為這場專訪的言論，台灣海峽再度陷入騷動不安的局面。主要內容如下：「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成立以後，從未統治過中華民國所轄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地區。我國在一九九一年修憲，增修條文第十條將憲法行使的有效地區縮限於台灣，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統治的合法性。並且增修條文第四條，明定立法院立法委員僅從台灣人民選出。一九九二年的憲改進一步於增修條文第二條，規定總統、副總統由台灣人民選舉產生。設立的國家機關，也是僅代表台灣人民，關於國家權力的統治正當性，也是只能來自台灣人民的委託授權。因此，與中國人民完全無關。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Sui generis）國與國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者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之內部關係。因此，北京政府將台灣視為『叛離的一省』的說法，完全是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兩岸關係的定位已經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現在沒有必要再宣布台灣獨立。」（李登輝 2015：110-111）

由上述李登輝的自述中，我們清楚地看到，李登輝自己十分清楚明白，他的這一番言論，使得「台灣海峽再度陷入騷動不安的局面」。我們也看到，李登輝在 1999 年被解讀為「兩國論」的特殊國與國關係主張，絕非一時亢奮的失言之語。這一次訴諸國際媒體的言論發表，其實是一場最遲可往前推至 1991 年李登輝動手主導修改台灣憲法部分增修條文起算，包含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在內的一連串措施，李登輝正一步步猶如鴨子划水般，試圖在憲法法律條文上、在民主選舉過程中、在台灣政府實際運行的實務裡，將台灣帶向必定走出一條不同於中國官方視角的全新道路。

此將兩國關係重新定義的危險性舉措，除李登輝擔任總統以來一路的鋪排，會讓其在即將卸任的最後關頭脫口而出其醞釀許久的爭議性話語，其中確實存在某種囿限於中國方面的壓力，迫使他不得不這麼做。肇因於上一年辜汪會談後的

汪道涵可能於 1999 年訪台：「進入四月，汪道涵來訪一事卻毫無動靜，不久又傳來希望延到九月的消息。經台灣方面多方調查的結果，訪台行程可能延到十月二十日以後，因為汪道涵、計畫趁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週年，在台灣就統一問題舉行政治會談，並宣布北京為中央，台灣是地方」（上坂冬子 2001：267）。

得到相關情報訊息的李登輝政府，當然無法漠視或不想法設法迎戰中國方面的巨大襲擊，「在這種體制之下，從台灣發出國家成立五十週年的國慶消息，明白宣示北京是中央，台灣是地方的話，其影響至深且鉅，弄不好，台灣甚至會失去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上坂冬子 2001：268）。於是李登輝最終搭配國際媒體發聲管道的機會，展開先發制人，提出了「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定調。

「當然，李登輝說出如此重大的問題，並非突發奇想。在此之前，李登輝曾與蔡英文及一些英國學者等組成小組，進行研究，『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即為他們共同研究的結論」（上坂冬子 2001：268）；這是李登輝刻意搶先在中國方面可能出手「定義」台、中關係的破解方式，想當然中國或是長期關心台海是否能夠平靜的美國政府，肯定不可能接受李登輝的片面孤行話語，果然「李登輝此話一出震撼了美國華府當局，中國則隨即對積極準備的汪道涵訪台事宜喊停，大家都想知道李登輝此話的真正目的」（蔡石山 2007：309）。

面對美、中兩國肯定做出劇烈反應的可以預期，李登輝的內心盤算究竟是什麼？何以吃了秤砣鐵了心，就是要與中國一分你我？李登輝是這麼說的：「不過，中國大陸批判台灣，也有其不得不然的一面。總之，蔣介石以違反人道的作法保住了台灣，蔣經國則推動十大建設，把台灣的經濟拉拔起來。我想，我的使命，就是確立台灣的認同」（上坂冬子 2001：268-269）。

確立台灣的認同，是李登輝認定自己應擔負起的使命，但是身為國家領導人的他，一舉一動、一字一語，都動見觀瞻；李登輝以面對媒體訪問的形式，說出了兩國論的話語，但也僅僅只能止步於此，無法再訴諸其他更加具體的方法，因為「李登輝有意將台海新關係的語言納入憲法。但中國的反應非常激烈。他們宣

稱，如果李登輝修改憲法，讓台灣變成另外一個國家，他們必然會採取軍事行動」（柯義耕 2008：258）。

暴力野蠻如中國的共產政權，一直以來都是以「武力」來威脅、恫嚇純樸的台灣人民，1995、1996 年的導彈試射引發的台海危機即是如此；這一次面對李登輝決心捍衛台灣主體、確保台灣認同的話語一出，中國同樣如法炮製，認為軍事武力可以解決一切他們不喜歡的障礙與問題。愈發升高的此階段台中緊張關係，無奈又無言的竟然終結在台灣島內發生的一場巨大天災裡：

> 中國對我的發言大為反彈，不斷進行軍事上的恫嚇。於是我召開軍事會議，嚴令：「絕對不可回應對方的挑釁。但也不要示弱。」來自中國的恫嚇行為一直持續，直到百年大地震襲擊台灣為止。（李登輝 2015：112）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對所有的台灣人來說，是永難忘懷的日子。這天凌晨，台灣發生芮氏規模七・六的大地震。我最親近熱愛、深信蒙上帝特別恩寵的台灣這塊土地，刻印上莫大的傷痕」（李登輝 2015：112）。此時此刻，再也沒有任何事務重要於搶救人命以及協助災區災民儘速安頓好生活的事了。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李登輝，當然必須立即走向第一線面對群眾，解決問題。

天災的發生，是所有人所不樂見，並且無法完全做到預防的災難襲來；這一天搖地動的百年大地震，是為國殤。回憶在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的台灣，無論是台灣島內國人同胞的同島一命、出錢出力，亦或是來自國際間各式樣的人道救援湧入，都使得身受震災所苦的災區民眾，不顯孤單。那麼作為主政者的李登輝總統，災難發生後的時刻，又都在做哪些國家機器應該擔負起的責任與決策？

> 地震發生時，我[李登輝]還在書房裡，先是察覺到電燈漸漸暗去，不到幾秒，就開始一陣天搖地動。我心頭一驚，並感憂慮，規模這麼大的地震，災情恐怕會很慘重。……報告陸續送達，受災的範圍和情況也逐漸浮現。想到許多民眾在黑暗中等待援手，內心的焦急和傷痛，實在無法形容。得知國軍已經出發趕往災區，參與搶救工作，心雖稍定，但我仍盼天亮，儘快趕赴災區，實地了解災情。七時許，交代侍衛長先到辦公室，然後安排赴南投、台中災

區。一坐上車，想到屋倒人亡、民眾受苦的情景，我簡直一刻都無法等待。因此，車行到北一女中校們前，即決定不進辦公室，直接到松山機場，趕赴南投縣。……搶救工作尚在進行，一名婦人連哭帶喊請求：「救救我的孩子！我的孩子還在裡面呢」！哭嚎聲在機具的挖掘聲中，格外令人鼻酸。是的，「你的孩子，你的親人還受困其中，我們一定會盡一切的努力，搶救每一個有生還希望的生命。」我的心中許下承諾。（李登輝 2004：10-12）

以上，是恢復李登輝總統面臨地震發生時的第一時刻情景。如同我們所熟悉的，李登輝在處理事情的風格上，向來屬於節奏明快的那一種，況且這是攸關國人百姓的性命與財產安全，他當然必須做出果決以及爭取時效來搶救任何受困、受災的百姓同胞。包括了在 9 月 25 日的晚間「八時在總統府簽署發布緊急命令。施行期間自即日起到明年三月二十四日止，為期六個月。……緊急命令的唯一目的，是在盡力維護憲政體制與公民自由的同時，能夠最大限度擴大政府因應救災所需的處置空間，使救災與災後重建以最高效能進行」（李登輝 2004：31）。

總統這個職務，即使是透過民主選舉機制來產生，但是只要依循法律的規範，仍舊充分掌握許多能夠運用的國家資源與權力。所以即使在民主言論自由的國家中，成為國家領導人經常也同時成為人民百姓「謾罵」或「宣洩情緒的對象」，是個經常吃力不討好的重擔工作，卻仍舊吸引許許多多有志大位的政治人才進攻與搶奪。一場大地震，讓我們映證了台灣的總統究竟能為百姓扮演什麼樣的造福角色，並且因此透露出總統一職真的必須是具有絕對才幹的人才才能勝任。

一如前述提過，巨大天災發生後的關鍵救援時刻，再也沒有任何事情更重要於投入各項搶救、賑災的工作；比如早已如火如荼、各方籌備的 2000 年總統大選選務，當然不可能比救災工作來得重要。在 1999 年早先已經分別投入選戰如 7 月 10 日民進黨全代會通過提名的「陳水扁總統候選人」、或是曾為國民黨新星，如今已決心走出自己的路的「前省長宋楚瑜」於 7 月 16 日表態參選總統、以及係出國民黨，在 8 月 29 日十五大二次會通過的「連戰、蕭萬長正副總統」參選人等，面對此巨變與國殤，都自然而然地暫停所有競選活動，「救災第一」。

不過由於距離 2000 年總統大選其實剩不到最後的半年，這一場攸關台灣未來至少四年走向的重要選戰，在震災逐步進入軌道、努力重建台灣家園之際，仍舊有許多人心繫這一場選舉；例如「地震發生一星期之後的十月二日，李登輝指示召開『行政院震災復興推進委員會』，四日並由行政院長蕭萬長宣布『重建四階段計畫』。第十任總統選舉即將在半年後投票之際，大家逐漸傳出，『選票將會因此走向國民黨』」（上坂冬子 2001：272）。

是的，救災與賑災當然處在燃眉之急，但台灣未來四年的前途與發展，將由什麼樣的卓越領導人帶領台灣人民繼續向前進？這也是一件極為重要、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大事之一。就連貴為總統的李登輝，在勞心勞力、克服一切困難，急需協助災區百姓重建家園之際，也不免會有思緒停留在選戰之上，「的確，我的腦海裡充滿選戰對策。在這關頭發生大地震，的確讓我受到極大震撼。但我瞬間想到，這是上帝對我任期最後的重大考驗」（上坂冬子 2001：272）。

描述「九二一大地震」的最後，筆者必須將目光再次拉回原先爭鋒激烈，因為遇上台灣天災而暫時緩和珠璣的「台中對戰」上。「李登輝在苦笑之後特別指出，當時大陸[中國]的態度實在太過失禮。無庸諱言，那是指大陸方面向各國要求，提供給台灣的救災金，應先交由大陸轉交等。大陸以自己為中央，台灣為地方，意圖在台灣受難的時候實現一個中國的原則」（上坂冬子 2001：272-273）。

這就是台灣長期以來不得不與之交手的：一個中國。哪怕台灣陷入緊急、關鍵的震災救援工作，中國官方的出發是持續站在如何獲取最大政治上利益來考量；人命關天的救援金或是如何儘速協助災民重建家園？這些都不會來得比中國想要掠取的政治資源來得重要。台灣人民能不覺醒嗎？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且些讓我們放下地震帶來的傷痛；接下來，繼續進入李登輝任滿前的最後半年時光。

五、　成敗國民黨後的和平轉移政權

本章節初提過，李登輝的從政史，幾乎等同於他在國民黨員的這個身分下，相互輝映、相互牽引的一種缺一不可的緊密連結。李登輝在從事公職的職務高峰，

是在 1988 年繼任總統時起算，也就在同一年，李登輝成為了國民黨的代理黨主席，一直到後來真除為主席後，總統與國民黨主席這個職務，始終與李登輝雙雙扣連在一起，從來不曾鬆脫。

李登輝的政治生涯，起點就在加入國民黨後開始，乃至於後來一路得以受到蔣經國的青睞，甚至是平步青雲、扶搖直上，都跟他「睿智」的選擇成為國民黨員緊密相關，形成了所謂「成是國民黨」的這個概念。但聰明如李登輝，可能也沒料想到，在他手上緊緊抓牢的政權，最後會是他擔任國民黨主席的時刻，慘敗收場的必須將不曾丟掉過的政權移交給代表其他政黨的總統當選人，導致泛國民黨的支持者群起激憤，最後形成「逼宮」迫使李登輝辭掉黨主席職務；對於李登輝這般重視名節的人，無法善終於國民黨的歷練，無疑是一種莫大的污辱，黯淡下台的他，肯定深刻體會到「敗也國民黨」的苦澀滋味。

究竟在李登輝執政最後的半年時光裡發生了什麼樣的重大變動？為何明明在九二一大地震後，李登輝領導的團隊在震災救援的表現上，尚可讓百姓大眾接受，李登輝本人也認為可能可以因此轉換成 2000 年總統大選的支持與選票，卻在最終的選舉結果，親手丟掉了孕育他成長茁壯，讓他走向光榮、邁向政治事業巔峰的國民黨政權？我們逐一來檢視導致李登輝成為國民黨罪人的可能原因。

2000 年的台灣總統大選，總共不只出現前述的陳水扁、宋楚瑜、連戰的三組人選，另外尚有許信良以及李敖在內的共五組正、副總統候選人。由於依照最後得票率來看，許信良、李敖這兩組候選人，總得票率皆未超過 1 成，所以囿限於篇幅，筆者主要仍舊限縮討論陳、宋、連三組主要候選人與即將交棒的李登輝總統間的牽連與微妙的互動來作敘述。

我們先來看到代表國民黨參選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連戰以及蕭萬長這組搭檔。連戰的祖父是台灣近代史上家喻戶曉的《台灣通史》作者連橫，而父親亦是在黨國體制下，始終佔有一席之地、位津要職的連震東。連戰本身同樣是一路接受國民黨栽培，於李登輝主政下集其大成、官拜副總統且兼任閣揆的重點中重點栽培的標準型權貴人物。

蕭萬長的出身或許沒有連戰來得顯貴，但在李登輝一手扶植與提拔之下，同樣擠身國民黨內的接班梯隊之中，成為了連戰之後，第二位「本省籍」的行政院長。比起連戰具有「半山」身分的不純背景，事實上，蕭萬長更接近、或可稱作台灣史上真正第一位「土生土長」的本省籍閣揆。

百年老店的國民黨，在李登輝確定不連任、選擇交棒之際，就是選擇了這兩位排資論輩、省籍正確、歷練豐富的重點栽培人物，來扛著國民黨大旗，競逐 2000 年大選大位。以上，是我們片面從後來的已知中，去描述我們所知曉的代表國民黨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組合；但是這是攸關至高無上權力的權位之爭，國民黨又是當時掌握行政資源、亦不曾「被輪替」過的永遠執政黨，人選最後的敲定與產出。當然不可能如此看似按牌理出牌的接班順序銜接。

在台灣憲政體制上，雖然總統與副總統都是透過選舉機制下的候選人當選所產生，但一如李登輝自己也曾擔任過副總統，台灣的副總統角色，就是定位在「備位元首」的任務上，幾乎不會有實權，也不可能與總統權力共享，所以社會大眾關注的總統大選內容，一般來說，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目光，都只會聚焦在「總統」候選人上，於是，我們來看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連戰。

當時的連戰，除了前述既有的家世背景與國民黨內的地位崇高，能夠雀屏中選外，當時仍舊掌握提名大權的李登輝黨主席，卻也道出百年老店國民黨也只剩下連戰一個可行的人選，再無其他：「常有人懷疑為何我要推連戰為總統候選人，那麼請問，除他之外，國民黨還有什麼人才？連戰的父親是在戰爭時期前往中國，原本就是台灣人，母親雖然是外省人，但從血緣來看，在國民黨的現況之下，他是最穩當的人選。長期以來，他曾以副總統協助我，是我的夥伴，我也看準他有能力……」（上坂冬子 2001：274）。

李登輝暴露出國民黨內的現實窘境，除了連戰之外，他也再想不出任何更適合的總統候選人選，於是，擔任李登輝副手的連戰，因而出線。而從上述中我們也清楚看到，「省籍」的問題，一直是李登輝在考量各種政治佈局下，重要的當

然元素，省籍的平衡與象徵性，甚至關聯到候選人父母各自的省籍背景組成；這一點，放在可能擔任「國家領導人」的身上，更顯重要。

確立了總統候選人後，雖然前述提到在台灣的副總統人選，遠遠不及總統候選人搶眼，即使選上後，能發揮的空間也實在有限，但重輩分、愛權位的國民黨集團，仍舊不會輕視或忽略過副總統這一個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備位元首高位。於是「遴選」搭配連戰競選的副手，也成為可以檢視當時國民黨內中生代們相互角力、此消彼長的有趣脈絡。

1999 年，主政台灣超過 50 年的國民黨，在長期壟斷資源分配的情況下，靠著國民黨近親繁殖的小圈圈栽培下，國民黨內其實仍有一批可用的政治人才，於是「九九年中，國民黨內的副總統爭奪戰，仍然引爆了後李登輝時代新一波的權力卡位戰。所有中生代將目光對準第一回合的副總統之爭」（鄒景雯 2001：130）。

但在進入哪些國民黨中生代加入副總統之爭前，有一位重量級的原國民黨新星則不得不先登場，那就是自 1998 年底台灣省政府正式精簡，沒了台灣省長職務的宋楚瑜，因為，「選舉期間，國民黨內的『連宋配』呼聲持續不墜」（鄒景雯 2001：129）。沒錯，「在這之前擔任台灣省長的宋楚瑜，除了台北與高雄之外，幾乎走遍全省，在省轄區內獲得深厚的支持與愛戴」（上坂冬子 2001：273），比較起其他國民黨中生代明星，宋楚瑜顯然更加耀眼，也更加家喻戶曉。

連戰最後當然沒有選擇宋楚瑜成為搭檔組合，宋楚瑜後來更出走國民黨，成為了勝過連戰、拿下第二高票的獨立總統參選人。那為何呼聲居高不下、又可能可以避免宋楚瑜脫黨形成國民黨分裂局面的「連宋配」最後合不成？「連戰的主觀意願是決定性的關鍵。原因非常簡單，沒有一個主官願意找一個處處企圖爭鋒、對自己造成困擾的副手，連戰當然不會例外。早在宋楚瑜於省府獨霸一方時，他的身邊人在外公然譏笑連戰是『扶不起的阿斗』，宋楚瑜卻未加約束，連戰就已經斷了找宋楚瑜合作的念頭」（鄒景雯 2001：129）。

少了宋楚瑜此一可能的副手強棒人選後，作為征戰 2000 年總統大選主將的連戰，將目光鎖定在黨內其他優異同志或是國內非政治圈內，備受社會期待的可

能人選，「在連戰尋覓副手的過程中，起初確實有意帶給外界不同的氣象，因此將眼光指向形象清新人士，曾經親自拜訪過中研院長李遠哲，希望搭檔組成『夢幻組合』，但李遠哲經過慎重考慮，婉拒了連戰的邀請」（鄒景雯 2001：130）。

選擇李遠哲成為副手，的確可能令社會大眾耳目一新，畢竟李遠哲是享譽國際、獲得諾貝爾獎的知名科學家，形象十分良好，可為連戰暨國民黨團對大大加分；無奈未果的情況下，「第二階段連戰將目標轉回國民黨內部，一一就吳伯雄、許水德、蕭萬長、章孝嚴、黃昆輝、江丙坤、胡志強等組合，比較其中的利弊得失。當時，吳伯雄與蕭萬長一致公開表示『義無反顧』的意願，競爭十分激烈，其他未表態者，也等著待價而沽，黨內氣氛十分詭譎」（鄒景雯 2001：130）。

然而意想不到地，連戰在選擇搭配副手上，卻意外地再次浮現「宋楚瑜因素」。蕭萬長和吳伯雄都各自代表著不同意涵上的背景實力，如若選擇具有客籍背景的吳伯雄，則象徵了對台灣第二大族群的高度重視，應可囊括不少來自客家族群的選票；「但是蕭萬長卻有另一層『優勢』，他與宋楚瑜交誼極久，儘管執行凍省時兩人交惡，但是政治利害卻可以隨時使之復合，若不取蕭萬長，促成宋蕭配，將是頭等麻煩。即是蕭萬長不動搖，龐大的行政資源若不能齊心輔選，也將成為穩定選情的最大變數」（鄒景雯 2001：130）。

最後，蕭萬長順利出線。對於連戰選擇蕭萬長聯合搭檔競選正、副總統的結果，作為當時國民黨內的大家長李登輝，又是如何正面看待這即將可能承接、延續他苦心打下民主深化基礎的年輕組合呢？「李登輝說，『許多人以為蕭萬長是我指定給連戰的，這不是事實，選舉不是我在選，我怎麼有立場去干涉，我是在連戰提出後，表示了同意的態度，認為還不錯』」（鄒景雯 2001：131）。

當李登輝說出：「選舉不是我在選，我怎麼有立場去干涉」這樣的明白宣示，往正面積極的意涵上看去，這是絕佳的民主常軌示範，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即將卸下總統身分的李登輝，理當不應干預或插手下一任可能的接替人選人事。但是作為國民黨黨主席，李登輝難道不應該為了全般的勝選考量，為黨推出的候選人做一審慎的評估與把關嗎？李登輝真的認為「連蕭配」是可以贏得選

舉勝利的完美組合嗎？顯然無論選舉結果將會如何發展，一心一意準備交棒的李登輝，暫時管不了這麼多了；或許對他而言，能夠在任內順利完成和平政權轉移，是最重要的事情，至於是誰來接替，就交給智慧的台灣人民來決定。

承續著上開的話題，做為國民黨領導人的李登輝，希望將政權傳遞給自己政黨提名的候選人，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連戰競選總統的過程中，李登輝加入輔選行列的列車，這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的事情，高齡 77 歲的李登輝，出現在全台各地連戰競選活動的大小場合；李登輝的全心全意投入，就連當時貴為第一夫人、年事也高的曾文惠女士，同樣高度參與其中，「明明不是她[曾文惠]先生在選，她卻經常臨時被通知『馬上要去高雄，請準備』，而且一到現場，就被安排搭上宣傳車當連戰競選」（上坂冬子 2001：281）。

李登輝在輔選連戰的節奏上，連自己的妻子都派上戰場，顯然沒有怠慢或輕視國民黨候選人的選舉勝敗；那麼，在連戰之外，李登輝又是如何看待其他兩組主要候選人，宋楚瑜與陳水扁的選戰？做為領航台灣超過 12 年的李登輝，難道不擔心自己一生懸命、心心念念的國家台灣，交到一個自己無從置喙、不知要將台灣帶到哪裡去的人手中嗎？畢竟，選舉沒有包贏的；連戰也不一定能夠勝選。

> 二〇〇〇年三月，台灣舉行第二次總統直選。我早已決定不出馬參選，因此推舉多年來擔任副總統、輔助我的連戰（一九三六年生於中國陝西省西安市）為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並且為他輔選。其他候選人還有民進黨的陳水扁（一九五〇年生於台南市）、無黨籍的宋楚瑜（一九四二年生於中國湖南省湘潭縣）。選舉結果出人意料之外。與大家預期的相反，執政的國民黨候選人敗選，在野的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當選了。但是，我並沒有特別感到震驚。相反地，想到有個四十多歲的年輕領導人，可以取代年近八十的我，為了台灣，我覺得這是好事。於是，我協助完成政權順利移轉，之後的一段時間，還積極、建設性地協助新政府。（李登輝 2015：117）

李登輝說得保守：「選舉結果出人意料之外。與大家預期的相反」，事實上依照選舉結果來看，代表國民黨參選的連戰，僅僅獲得第三名的票數，得票率遠

遠落後民進黨的陳水扁以及無黨籍參選的宋楚瑜。或許這是一位曾經高居國民黨掌門人，對於輔選失敗、丟掉政權，必須說出委婉、降低傷人的話語。同時我們卻也看到，對於陳水扁的當選，李登輝選擇了看好以及欣然接受這樣的結果。

但是並非每一位國民黨的從政黨員或是支持者，都能理性地看待難以想像的敗選事實；「選舉結束的兩天內，一些國民黨死忠份子跑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抗議，憤怒的宋楚於支持者在李登輝居住的總統官邸附近，放火焚燒路邊汽車。他們認為是李登輝逼得宋楚瑜離開國民黨，才會讓宋楚瑜以無黨籍參選落敗，他們要李登輝為國民黨的分裂負責。……正為敗選苦悶的連戰也要求李登輝立刻下台，……在這種政治指控即其他黨內領導人壓力下，李登輝深感沈痛，不得不於 3 月 24 日宣布將黨主席職權交給他四年來的副手連戰」（蔡石山 2007：312-313）。

這是料想不到的最難看結果。「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八日，選舉開票的結果，訴求台灣獨立長達十四年（一九八六年創黨）的民進黨，在台灣民有民治民享的第二次總統直選中，終於贏得勝利」（上坂冬子 2001：275-276），而非原先預期「李登輝希望連戰順利當選的意志堅定」（鄒景雯 2001：147）能夠實現的結果；李登輝頓時的落魄與失勢，可想而知。但最令李登輝痛心的：

> 李登輝匆匆辭去黨主席職位，其中有一些具體的理由，三月十八日確定慘敗，等緩了一口氣，到了二十日，連戰還是沒有出現在李登輝面前。李登輝洞悉連戰的內心，就把他叫過來說：「這次選舉的結果我也有責任，我打算辭去黨主席的職位。」結果連戰間不容緩的回答說：「要辭的話，越快越好。」既沒有感謝李登輝長久以來的照顧，也沒有為自己實力不夠而道歉。李登輝身邊的人表示，四年來擔任李登輝副手的連戰說出這樣的話，好像是在指責李登輝緊抱國民黨主席的位子不放。「那一天，我先生回到家，只說了一句『真令我心寒』。」李夫人以沈重的口氣說。（上坂冬子 2001：277）

一場敗選，讓連戰不帶任何感恩地以近似「逼宮」的方式，讓李登輝交出掌管 12 年的國民黨主席大位；12 年總統任期也即將到任、並沒有尋求連任的李登輝，肯定不是一個戀棧權位的老年政客。李登輝並非沒有為了國民黨的慘敗而自

責，也很明快地做出辭去黨主席的肩負應扛起的政治責任，但顯然連戰的反應「直白」到久經政治沙場如李登輝，同樣感到心寒與心痛。

或許，李登輝的心寒、心痛，是自找的也說不一定。例如 1996 年曾與李登輝在總統大選中一決高下的彭明敏就說過：「當初我就判斷連戰難以當選。不僅連戰，連李登輝曾經關愛過，因為這場選舉和李登輝決裂，以無黨籍身分參選的宋楚瑜，我想都不是一流人物。不管李登輝有多厲害，但顯然他並沒有什麼識人之明」（上坂冬子 2001：276）。

國民黨最終在李登輝手上丟掉了從沒想過會失去的政權，可能造成的因素繁多；其中包括了人民長期以來對於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政權厭惡、宋楚瑜出走國民黨形成選戰上的分裂、創黨 14 年已然具備足夠執政能量的民進黨倔起，最後一根壓死駱駝的稻草，也可能是中國方面再次出手干預台灣的選舉，「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六日，也就是投票前兩天，台灣的《中國時報》，報導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朱鎔基在全國人民大會開幕前舉行的記者會，指出：『任何形式的台灣獨立，我們都不會承認。謀求獨立者不會有好下場，希望台灣的選民要做聰明的歷史性選擇』」（上坂冬子 2001：274）。

如此帶著威脅與刺激性話語，明顯不懂溫良純樸台灣人的心，「『朱鎔基總理是上海出身，我認為他是中國大陸的高層中，少數能夠理解民主思想的人才，背地裡我們也對他有些期待。不過，看到他那種嘴臉後，我很失望，覺得台灣只好獨立，就把票投給了民進黨』一位在輔仁大學研究所念日文的女性這樣說」（上坂冬子 2001：275）。中國繼 1996 年想以武力影響台灣選舉結果後，再次砸鍋。

2000 年 5 月 20 日，經由台灣第二次總統直選結果產生的民進黨籍總統陳水扁就要上任；無論是否接受選舉結果，也不管國民黨內如何進入最後李登輝時代的紛爭與權鬥，台灣民主至終都要進入下一新的篇章。李登輝順利、成功地將政權和平移轉給新當選的陳水扁總統，這是值得全台灣人民驕傲與珍貴的民主時刻：「關於台灣的政權移轉，有人認為：『如果發生在其他亞洲國家，可能就會引發軍事政變，真是驚險萬分的局面。』但另一方面，確實可以看到，來自世界上許

多人的正面評價：『李登輝總統進退從容得宜。他親自見證了，長年獻身努力的民主與自由化，終於開花結果』」（李登輝 2015：117-118）。

第四節 此一時期國族認同狀態分析

此一時期的李登輝，唯一的公職身份，就只有「總統」一職。順利排除外省集團勢力反撲的李登輝，在 1990 年贏取了自己第一個投入選舉的總統任期；1996 年台灣首度開放總統由人民直選的選舉，李登輝拿下過半選民的選票支持，再一次穩坐了中華民國總統高位。

也就是在這完整兩任的總統任期中，李登輝此一十年的掌握大權實力，遠遠超過在 1988 年繼任總統之初，當時權力的倍受挑戰與焦躁不安。可想而知，作為第一位台灣人總統，彼時的李登輝，在黨國機器長期圈養的既得利益者眼中，成為了希望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李登輝順利地挺過了所有的挑戰與磨難。

而在國族認同的變化上，對內保持新統治者高度的李登輝，因為身份關係的使然，想當然是全台灣第一個無庸置疑代表「中華民國」符號的絕對表徵人物。在前一時期表現出進階的「中華民國版」中國認同，到了自己主政的關鍵黃金十年，李登輝在國族認同的表現上，似乎又再次起了若干程度上的變化。

除了將中華民國認同透過政策加以「精緻化」之外，在安內上漸漸掌握技巧與發生實質影響力的李登輝，開始了必須直球對決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力。身為中華民國的代表人，李登輝一方面必須承擔來自台灣內部嚮往「一個中國」的舊有統治集團壓力，制定諸如《國家統一綱領》的必要性；一方面也必須想盡任何方法，讓台灣在承受中國在國際上的外交打壓下，為台灣走出新的活路。

另外，無論此一階段李登輝的台灣認同是否已經生成，我們很明白李登輝一心一意地將台灣與中國塑造成「兩個中國」，至少是「特殊國與國關係」。對於兩蔣時代總不放棄「一統中國」的大夢來說，李登輝終止了「內戰」、廢除了「台灣省」，甚至脫口而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他的確一步一步地在開創並帶領台灣走向不同以往的「一中」道路。

聚焦在此一時期的國族認同狀態上，李登輝最為具體且關鍵的呈現，當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版」的台灣認同。亦即是李登輝原先具備有的「中國認同」符號，到了此時已經轉變成為「台灣認同」的符號。但是「中華民國」此一前階段登場的標籤，並沒有因此隨之撕去，而是處於中國與台灣認同二者之間的完美過渡。

更清晰的台灣認同其實並未出現。無論是「中華民國總統」的這件外衣實在搶眼，也無論李登輝是否若有若無的提升了「台灣意識」的論述，作為中華民國國家領導人的他，並沒有將之棄之蔽屣。但很明確的限縮中華民國治權，清楚在國際上宣傳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這個真實現況，李登輝嘗試在中華民國認同與台灣認同之間，做出不具違和、能夠使人民理解的現況。

於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版」的台灣認同，是此一時期國族認同的呈現樣貌。我們接著展開更細緻的本時期生命史的歷程描摹，並且找出為何李登輝自「日本認同」消失過後，一直伴隨李登輝的「中國認同」，在此十年間，竟然再度轉變、成為「台灣認同」的原因。我們也將找出李登輝在 Cross 黑人化心理學認同模型的發展過程裡，是否離開了前遭遇期，進入到「遭遇期」當中。

最後，筆者同樣在本階段國族認同分析的描摹之中，歸納出三個主要的構成因素，分別是：「精緻化中華民國認同」、「交手中華人民共和國」、「暗潮洶湧的台灣認同」。透過此三個分屬不同意涵的脈絡，嘗試理解李登輝何以呈現出「中華民國在台灣版」的台灣認同狀態。

表 6-1：本階段時代大事與生命史事件：國家體制內的完全制霸時期

時間	時代大事	生命史事件
1990 年	5 月 26 日核准郝柏村除役，郝於 6 月 1 日正式組閣、出任行政院長	5 月 20 日，就任中華民國第八屆總統，並簽署「美麗島事件特赦令」，特赦 27 名黨外政治人物
	6 月 28 日，召開「國是會議」	
	8 月，籌設「國家統一委員會」	5 月 22 日，上任記者會宣布與李元簇副總統會在六年後退休
1991 年	2 月，制定《國家統一綱領》	

	4 月，啟動憲改工程，並於第一次修憲通過第二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法源；在勸退「萬年國大」退場後，國會全面改選	
	5 月 1 日，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結束與中國的內戰關係，是為「兩個政治實體關係」	
1992 年	2 月 23 日，行政院公布「二二八事件報告書」	
	7 月，修訂《刑法一百條》	
	12 月 19 日，立法院全面改選	
1993 年	2 月 2 日，通過郝柏村內閣總辭案	
	2 月 23 日，李登輝提拔連戰成為第一位台灣人閣揆	
	4 月，首次舉行「辜汪會談」	
	8 月 10 日，「新國民黨連線」出走，趙少康等另組「新黨」，國民黨出現分裂	
1994 年	7 月 28 日，第二屆國大臨時會通過「總統、副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	接受司馬遼太郎訪問，談及「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12 月，台灣省長、北、高市長人民直選	
1995 年	中國江澤民發表對台八點策略，一般稱之為「江八點」	6 月 9 日赴美康乃爾大學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為題發表演講，並多次提到「Repulic of China on Taiwan」，也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李登輝總統回應中國提六項主張，一般稱之為「李六條」	
	7 月起，中國對台實施導彈試射威脅	
1996 年	12 月召開國家安全會議會中通過精簡台灣省政府決議	3 月 23 日，與連戰搭檔當選台灣第一屆民選正副總統
		5 月 20 日，就任中華民國第九屆總統
1998 年	12 月，台灣省政府虛級化	

1999 年	7 月 16 日宋楚瑜表態參選總統，11 月 17 日國民黨開除宋楚瑜黨籍，國民黨再陷分裂	7 月 9 日，接受外媒「德國之聲」訪問，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
	9 月 21 日，芮氏規模 7.2 大地震發生	
2000 年	3 月 18 日，民進黨籍陳水扁當選第十屆總統	3 月 24 日，遭連戰逼宮，提早辭去中國國民黨主席職務
	5 月 20 日，完成台灣首次和平政權轉移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一、　精緻化中華民國認同

在詳細展開「精緻化中華民國認同」之前，同樣地，筆者再次歸結出三個有關構成此段論述的特別觀察，依序是：（一）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二）限縮中華民國治權範圍、（三）主導國會進行全面改選。依此前提，我們依舊先從第一個特殊現象，李登輝「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開始說起。

上一時期提到了李登輝在 1990 年贏得現今已知的「末代委任總統選舉」後，順應「野百合學運」的訴求與社會共識，李登輝在新的任期開始了緊鑼密鼓的民主改革舉措，「李登輝在就職演說中鄭重宣告將在最短期間內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並且經由法定程序推動憲政體制的改革」（鄒景雯 2001：92）。

當然要做出迥然於以往威權統治時期的重大政策調整，勢必必須透過平和且創造最大共識的方式進行，於是同樣是學生運動中的重要訴求：召開國是會議，成為了李登輝凝聚團體力量的必要手段。如同李登輝所說：「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我履行與學生代表的承諾，召開為期六天的國是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討論的，就是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李登輝 2015：99）。

那麼實質上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究竟代表著什麼意義？李登輝解釋道：「那就是終結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內戰狀態，然後讓中國大陸歸中國大陸，而台灣歸台灣，姑且讓各自的政府去依法統治吧！就是這麼一回事」（李登輝 2016：

60）。此一舉動，重新定義了中華民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關係，李登輝說道：「我們主動放棄了過去一向主張我方為正統政府，彼方為叛亂團體的臨時條款。因此，與雙方的勝負無關，這意味著蔣介石時代所規定的內戰，已經從此自然消滅」（上坂冬子 2001：183）。

這是一個表面上對於中國釋出善意的積極政策，不再將中國視為「叛亂團體」，並且承認其在中國的「依法統治」，實際上亦是李登輝為中華民國擠壓出合於現況生存空間，也就是李登輝指出的：「結束了內戰關係後，台灣實施民主化，憲法的內容也做了大幅的修正。中華民國再也不是原來涵意的國家了。現在的中華民國已經成為『第二共和』（New Republic）」（李登輝、小林善紀 2001：94）。

就在蔣經國逝世過後的三年許，李登輝在倚靠自身力量取得選舉而來的政權之後，李登輝旋即在對中國的政策中，調整了施行已久的重要方針。這一個起手式的成功，當然正是奠定於前述所提，1990 年六月下旬舉行的「國是會議」所致；正如鄒景雯所說：「國是會議的成功，為接續的國會改革注入了來自民間的活力，也為兩岸關係開展奠定了基本基礎，更成為揭起『李登輝時代』的一個重要的起點」（鄒景雯 2001：332）。

「李登輝時代」是否真如鄒景雯所說，就從 90 年國是會議的成功起算？這必須依此時間往後延伸，仔細找出在李登輝往後主政的十年中，一切是否都如李登輝對國家的大政方針、民主改革藍圖，都照著其規劃順利執行與實踐。我們接著看到伴隨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而來的，也正是第二個使得中華民國認同呈現「精緻化」的關鍵，李登輝「限縮中華民國治權範圍」

一如柯義耕提到：「這意味著台灣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也意味著中華民國政府宣告其治權僅及於台灣以及其他幾個外島」（柯義耕 2008：244），這些外島，正是我們所熟悉的「澎湖」、「金門」、「馬祖」。加上佔有人口絕對多數的台灣本島，合稱「台澎金馬」，就是中華民國的現今有效實質治理範圍。

李登輝更進一步指出：「將台灣的統治權限定在台灣、澎湖、金門和馬祖，暗示不及於中國大陸」（李登輝 1999：63），這也就是筆者所說的，「精緻化的

中華民國認同」。中華民國的全貌想像，不再是以往黨國教育如同「秋海棠」形狀、亦或是「老母雞」樣貌的全中國地圖景況，李登輝主政下的中華民國，明明白白地僅僅有效治理著「台、澎、金、馬」。

當然為了更具體以及法制化的確立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就必須配合「憲改」乃至直接由人民選舉出中華民國總統，才能更加說服世人這整個限縮治權的合情、合理、合法。這正是李登輝所說：「中華民國經過兩次修憲，以及人民直接選舉總統後，管轄權只及於台澎金馬，國家權力統治的正當性只來自台灣人民的授與，與中國大陸人民完全無關」（鄒景雯 2001：241）。

而這一波逐步釐清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各自擁有的統治範圍不同，到了李登輝執政末期，達到了整段改革的高峰，李登輝推動廢除「台灣省政府」。「一九九八年底，台灣省被廢，台灣省政府時代結束，各縣市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台灣方面以事實展現，由台澎金馬組成的台灣，與大陸各省毫無關聯，並由此開展了一個新的時代」（上坂冬子 2001：251）。

第三，則是李登輝「主導國會進行全面改選」。自 1949 年隨著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敗退來台的各政府組織包括中央民意機構，因為台灣頒布《戒嚴令》實施戒嚴，連帶著「國民大會」、「立法院」，都進入了長期不改選的情況。這當然不會是一個正常國家的現象，充其量，只是統治者為了更加有效掌控他所強佔下來的台灣，不讓政權動搖的惡劣方式。

所幸象徵威權統治的「兩蔣王朝」終究隨著時間過去而停止，台灣的政權總算首度輪到台灣人自己的手中。李登輝雖然貴為中國國民黨主席，亦是中華民國總統，但清楚明白知道取得權力後，必須為台灣民主改革做出貢獻，端正長久以來扭曲、紊亂的民主體制；國會的全面改選，即是重中之重。

當然在 1991 年正式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前，這些俗稱「萬年國代」、受條款保障的中央民代，如何能輕易放棄自身擁有的權利與利益，自廢武功的離開職務？這必須透過高明與柔軟的政治手段，才可能讓這些既得利益者，願意離開自己的職位，做一次從善如流的抉擇。這也就是蔡石山所說：「李登輝

成功利用野百合的反對聲浪迫使『終身國代』在 1990 年 3 月的總統選舉中選他為新總統，之後再以優厚的退職條件說服他們離職」（蔡石山 2007：250）。

這是彼此連動的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過程，李登輝（2016：57）說道：「要讓國民大會決議廢止臨時條款，就得相讓國大代表全數退職，……而他們都是支持我、選我當總統的人，所以被自己所支持的總統勸說『辭職』，應該沒有人會感到愉快吧。但如果不這麼做，台灣就永遠無法走出獨裁體制」。

在李登輝一手促成萬年國代願意退場的情況下，「一九九一年底，新的國大代表三二五名選出來了。在第二屆國民大會會議上，制訂了立法委員選舉辦法」（李登輝 2015：100-101），也因此同步讓從未改選的立法院「萬年立委」，有了重新改選的契機，台灣的中央民代自此進入真正代表台灣民意的紀元。

這是又一次精緻化中華民國的歷程。將代表全國最高民意機關的「國會」，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讓原先意義上代表著中華民國「各省」組成的國大代表離開國會殿堂，取而代之由「台澎金馬」的台灣人民選舉出的代議士，這絕對是嶄新的「中華民國」存在。台灣不僅僅邁向告別獨裁體制，同時間也藉由中央民代組成的革新，加深中華民國與台灣相互間的連結。李登輝的深謀遠慮，可見一斑。

二、　交手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確立了中華民國認同呈現出精緻化的過程之後，我們同樣注意到了李登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端出的政策與態度，這也就是本段標題所說：「交手中華人民共和國」。端此，筆者繼續整理出三個與交手中共緊密相關的重要舉措：「組織國統會與制頒國家統一綱領」、「啟動辜汪會談增設密使溝通管道」，與「贏得總統直選回應中國武力威脅」。

首先看到的，是李登輝組織「國家統一委員會」，以及依此國統會，制頒《國家統一綱領》。做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如何有效運用掌握莫大的政治資源與權力，成為了影響整個國家走向的關鍵所在。如同前述所提，李登輝透過贏取選舉扎實地取得執政權力之後，先是一波又一波的「安內」動作與舉措，顯然李登輝將重

點放置在呈現奇形怪狀的憲政與民主改革之上，為求一個國家的運作能夠更加順暢及安穩。同時亦精確地將中華民國重新定義，讓國人同胞更加有所歸屬感。

然而李登輝率領的執政團隊，在組成的結構上，萬不可能所有人都和他同心同德，秉持著相同對於國家的認同與國族的想像。換言之，許多自兩蔣時代即任職高位的保守勢力，不一定能夠認同李登輝主政之後的種種國家定位與走向，追求「統一中國」的信念，不會因為李登輝的上台自此消失。

面對這股短期間不會消失的保守勢力，為顧全大局，李登輝必須祭出得以服眾的一套方式，讓國內政局穩定。多年後李登輝說道：「我為了說服國民黨大老，才制訂這項國家統一綱領。其實目的在於制定三個明確的條件，以牽制、遏阻『統一』的動向。然而，表面上又不能明講」（李登輝 2015：102）。

李登輝所謂的三個條件，即是：「『統一』的條件，有下列三點：（一）當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二）當中國的經濟變成自由經濟（三）當中國實現公平社會」（李登輝 2015：102），這些條件無論是放在 90 年代，或是相隔將近 30 年的今天，都會知道那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發生。或許李登輝正是看準了中國終究無法達成簡單普世價值的條件，遂有把握的組織國統會、制頒國家統一綱領。

利用文字上的縮限，以及走一個完美統一大夢的過場，李登輝成功的說服了代表保守統一勢力的國民黨大老們，這是屬於「安內」的節奏。但真正交手的敵人，其實正是劍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此一時刻國統綱領的相關措施，主要焦點實質上是安內大於攘外的一個現況，但喊話的對象卻不折不扣就是中國。

上坂冬子進一步地說：「在這種嚴厲的條件下，『國統綱領』四個字，反而凸顯了社會制度與思想大相逕庭的兩個中國」（上坂冬子 2001：183），當然，這是上坂冬子個人的解讀，並不代表彼時的李登輝，就是刻意地主張「兩個中國」、分庭抗禮的情況。但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實上存在著許多明顯的文化、經濟、民主制度等差異，真實地讓李登輝透過國統綱領的制訂，反映出彼此之間孰優孰劣的差別。這是李登輝交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期初。

國統會現已廢止，那是在陳水扁執政時期才結束的一個組織任務。但在李登輝主政時期，一直到了 1998 年都還尚未停止運作，李登輝說：「我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國家統一委員會』的閉幕致詞中，……我們在此鄭重重申：中國要統一，但必須統一在既照顧全體中國人利益，又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自由、均富的制度之下，而不應統一在經過實踐證明失敗的共產制度或所謂的『一國兩制』之下」（李登輝 1999：157）。

無論是「安內」的必要手段，或是「攘外」的權宜措施，「在李登輝的角度，國統會設置的目的，當時最迫切待解的是求取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減少兩岸猜忌，以及我方內部的歧見，以爭取憲政改革的時間，因此使用了『國家統一』的帽子」（鄒景雯 2001：183），或許這是高明的李登輝，採用了迂迴前進的方式。

在過程中造成紛紛擾擾，總算平息的國統會設置，鄒景雯說：「國統綱領最後在郝柏村也同意的情況下通過，成為中華民國與中共交往時依據的新方針。這是有史以來，中華民國首度在文件中明確的承認台海兩岸分處不同地緣的政府，是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階段性的意義相當重大」（鄒景雯 2001：183）。

第二個，則是李登輝一手主導「啟動辜汪會談增設密使溝通管道」。在國統綱領頒布後，台灣有了最新的對中政策；在此根據下，為求台中關係朝向穩定發展的李登輝，必須有著更具體的實踐方式，才可能使得台灣與中國走向和平友善的進展。但制頒《國家統一綱領》，畢竟是我國內部「一廂情願」的政策推動，未必「中共」因此領情。「在我方表達積極意願時，中共卻提出了『一個中國』，作為談判的原則，並在多次協商時為此不歡而散」（鄒景雯 2001：184）。

「這個難題應該如何解決？李登輝因此在九二年八月一日召開國統會，先就『一個中國』的涵義做出我方的界定」（鄒景雯 2001：184）。為了避免在台中交流互動中，台灣吃了來自中國的虧，詳細的擬定有關「一個中國」的界定，才可能進行實質上與中國的交往，包括了本段落描述的「辜汪會談」登場。

在過往兩蔣主政台灣的年代，一向不與中共有所往來，也就是先前提過蔣經國對中政策的「三不主張」，即使在蔣經國執政晚年，開始有了有限度的「探親」、

「通郵」，但有僅止於人民間的文化互訪，而從來不曾出現官方上的實質往來。90 年代初期漸漸坐穩總統寶座的李登輝，知道台灣與中國的交流必須有所突破，才更加符合台灣人民的最大利益。在設有保護機制的前提之下，透過由官方授意的非政府組織往來，成為了李登輝政府與中國政府達成的默契與共識。

失去聯繫長達數十年的中華民國與中共，再度恢復理性對話絕不是一蹴可幾，必須透過種種的前置作業與溝通協調，才可能慢慢聚焦，互相尋求對彼此皆為有利的共識。於是李登輝腦中的盤算與策略，不斷反覆推敲上演；「根據[1992 年]八月一日『一個中國』的定義，李登輝非常放心得展開辜振甫與汪道涵的會面，他希望經由一個國際級的場景，把兩岸的新關係做出確定」（鄒景雯 2001：184）。

經過縝密與密集的交換意見與協商，李登輝讓中華民國與中共一同躍上檯面的正面對話形成可能：「一九九三年的主要話題，不外乎是兩岸會談。……四月二十七日，台灣方面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的辜振甫，與大陸方面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的汪道涵，終於在新加坡進行了會談。這是台灣與大陸間，自蔣介石遷台以來首次正式碰面」（上坂冬子 2001：207）。這當然是破天荒台中關係好的進展，即使仍然各持己見的部分無法排除，卻依舊達成了若干的共識。

這是李登輝主導中國政策的一大進展，也讓台中和平對話成為可能的選項；但與此同時，上述純屬檯面上的種種風光，卻不是台灣對話中國的唯一保證管道。一如本段落標題提到：密使，是李登輝主政期間，與中國官方有所連繫的另一重要渠道。正如鄒景雯所說：「李登輝主政十二年，兩岸關係從外表看來，有時波瀾壯闊、氣象萬千，有時又似驚濤駭浪、冷峭險峻，然而在昏暗深沉的水面下，李登輝分別與對岸兩代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始終維持一條溝通聯繫的秘密管道，直到李登輝卸任」（鄒景雯 2001：192）。

那麼這一條秘密管道有何特殊？「『九二[三]年辜汪會談』、『總統直接民選』、『江八點』、『李六條』、『李登輝訪美』，這是牽動兩岸關係的幾件重要行事曆，這條秘密管道都曾試圖進行相互溝通、降低誤解的努力」（鄒景雯 2001：192）。幸由秘密管道的或許通暢，成了李登輝更有把握於台中關係的平和進展。

第三個重要的，是李登輝「贏得總統直選回應中國武力威脅」。李登輝曾經在 1990 年上任新一屆總統任期之初，「說過『六年後帶著李元簇[副總統]一同退休』的話。後來司馬遼太郎來台灣訪問，李登輝也曾經告訴這位日本友人他不打算再選了」（鄒景雯 2001：102）。上述的這些說法，終究沒有兌現，1996 年台灣首度開放總統民選，李登輝正是其中一位總統候選人。誠如前述提到，李登輝為了實踐對人民的使命，仍舊決定投入總統選舉。

於是，在「一九九五年八月，我接受中國國民黨的提名，決定參加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選舉。我在決定參選的聲明中，首度強調『台灣』的意識，認為台灣人民必須真正擁有主權，才能充分發揮自由意志，開創自己的未來」（李登輝 1999：76）。卻也是因為李登輝下定決心繼續參選的舉措，受到了來自中國官方的百般阻撓，台海一度呈現戰爭武力威脅的重大危機。

而種下這次危機的前因，在於李登輝發布競選總統連任的不久前，一次成功的美國康乃爾大學演講之行，刺痛了中國斜眼看人的眼睛，「中國當局指李登輝的康乃爾訪問是為台灣走向獨立建國序幕，是孤注一擲的一場政治豪賭。中國自 8 月 15 日起開始一系列軍事演習威嚇台灣……對中國的武力威嚇，這種不向中國屈服的精神已成為李登輝留給台灣人的重要資產」（蔡石山 2007：290-291）。

中國的軍事武力恫嚇，顯然沒有在這一次的總統大選中產生原先預期的效果；中國原本寄望「唯有靠武力恫嚇的方式，才能迫使台灣的政府與人民接受中國的條件，放棄李登輝的獨立政策」（柯義耕 2008：255）。1996 年總統大選，「開票的結果，在歷史性的首次直選中，李登輝獲得了五百八十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九票，在四組候選人中得到總投票數的五四％」（上坂冬子 2001：243）。

這樣的選舉結果，肯定出乎中國領導階層的預期，李登輝就曾說：「像中國這樣根據偏頗意識形態，對熱愛自由、和平與民主的台灣人文攻武嚇，絕不可能得到台灣民心支持。不過，也正因為中國無理打壓，台灣民眾更加團結、勇敢，台灣產生一代又一代的優秀領導者」（李登輝 2009：161）。

這是李登輝主政期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為強烈與直接的交手，在美國的介入協助下，台海和平得以延續。但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李登輝最後為何選擇背離曾經許下不競選的承諾，繼續跳上第一線奮戰到底，或許我們可以從以下的自述中，看到李登輝有著更深一層的期許：

> 我認為，這次總統選舉不應該採取以往，由國民大會代表選出的間接選舉方式，應該採取由住民選出總統的直接選舉方式。這樣一來，就不是由國民黨選出的「國民黨的總統」，而是由台灣選民挑選的「台灣人的總統」（李登輝 2015：104）

三、 暗潮洶湧的台灣認同

上一生命階段中曾經提過，李登輝的「台灣意識」呈現出緩慢浮現的態樣，到了此時期之後，李登輝的台灣認同愈趨明晰，也就是筆者宣稱的：「暗潮洶湧的台灣認同」。這是一個大膽的指稱，因此，我們必須透過更加翔實的梳釐，來支撐此一論點。為此，我們整理出三個重要的關鍵點，分別是：「反思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張」、「特殊國與國關係的提出」。

上述結尾的這段李登輝自述，是在 2015 年出版的《新・台灣的主張》中所提，未必然就是完完整整李登輝在 90 年代力推總統直選的心境，但卻可以看出此一生命階段的李登輝，其實「台灣認同」已經如同泉湧般，不斷在各種情境中出現。像是前述李登輝在 1995 年參選總統聲明首度提到的「台灣意識」，也像是我們所要提出的第一個論點：「反思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這一句著名的話，始自於 1994 年李登輝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訪談中所提：「當我向內人提起，和司馬先生交談時，什麼話題才好呢？她說：『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吧』」（司馬遼太郎 1995：524）。身為時任中華民國總統，同時擔任「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李登輝，一席話當然引發熱烈討論。

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中，做進一步的闡述：「我想讓司馬遼太郎先生了解的是，生為台灣人，卻有一種對台灣無能為力的悲哀。回顧台灣歷史，台灣人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不能治理自己的國家，而我個人也曾經歷過身為台灣人，卻不能為自己同胞做些什麼的痛苦」（李登輝 1999：34）。

在司馬遼太郎的訪談中，李登輝更明白指出：「以往掌握台灣權力的，全部都是外來政權。最近我都可以坦然這麼說了。即使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呀！那只是來統治台灣人的黨。必須將它變成台灣人的國民黨」（司馬遼太郎 1995：531）。「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指稱國民黨是「外來政權」、澈底反思台灣人所歷經的困難處境，原先具有中國認同的李登輝，此時此刻是出人意料的。

面對當時所有人的疑惑與質疑，李登輝後來還原道：「坦白講，當時的李登輝真的是充滿自信，很多事想做就做，只是，之前我幾乎不太會講自己的理念和想法……到了一九九四年，我已坐穩總統的位子，不必擔心話講出來會遭遇什麼不測。也所以，面對司馬遼太郎先生，我毫無避諱地講出心裡的話。如果不了解時間的變化，很難理解我為什麼『突然』那麼講」（井尻秀憲 2010：81）。

原來，李登輝內心的話，必須審時度勢的說，並不是在每一個生命階段中，都能侃侃而談自己內心所想。這一點，與筆者的認知尚無差異，畢竟在成為國家領導人之前，李登輝即使貴為副總統，仍舊同樣生活在威權體制的壓迫之中；走過白色恐怖年代遭遇的李登輝，一言一行都難以忘了謹慎，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李登輝放開嗓子、用了膽子，明白指出生為台灣人所經歷的一切苦痛，不管基於何種更深層的考量，他都勇於突破禁忌，表達內心真正的想法。這或許正是黃文雄所說：「產生『李登輝情結』的歷史背景，主要是在苦境或逆境中成長的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在那裡潛藏著李總統和司馬遼太郎對話中『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與『台灣人出頭天』這種對解放的渴望」（黃文雄 2010：159）。

既然李登輝已經對台灣意識起了頭，持續坐穩總統大位的他，自然不會輕易收手。在此，正式進入了第二個關鍵的發現，李登輝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張」。原先刻意透過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及一步一步推動憲政改革的李登輝，達成了將中華民國治權限縮在「台澎金馬」的現況，這個時候，李登輝念茲在茲的仍然是「中華民國」四個大字，求得僅僅是做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區別，並沒有明顯的「台灣認同」出現。但經由國會全面改選，甚至開放由台灣住民直接選舉總統，對李登輝而言，「台灣」本身的意涵，開始產生質變。

就像是前原志保所提：「從 1988 年當時起至 1992 年左右為止，依循中華民國『一個中國』的意識形態，也將中華民國憲法規定領土範圍之中國大陸的中國人包含在內，台灣人則被定位為中國人的地方認同之一」（前原志保 2014：197）。所謂台灣是「地方認同」，指的就是台灣的國族認同並未在李登輝主政初期時出現，這是一個流動的演繹，一直到 94、95 年後漸漸清晰。

於此過程中，「中華民國在台灣」，無疑是李登輝最後主政的十年當中，最具代表性的總結詞彙。短短的七個字，卻原原本本地道盡了這十年中，李登輝昇華、內化的國族認同思想。這七個字在 1995 年李登輝突破難關，順利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為題的演講之後，瞬間聲名大噪。在演講稿中出現多達九次的「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成為了台灣現狀的新解。

而在李登輝文本的記述中，我們發現，這一句李登輝念茲在茲的國家現狀名詞，原來是約莫在 1993 年時，由蔣彥士所建議，李登輝說：「有一陣子不是說『中華民國在台灣』嗎？〔一九九三年〕『在台灣』這三個字就是他[蔣彥士]的建議，可能是開會時他提出來的」（李登輝 2008b：152）。

身為國家領導人，在擁有極其龐大的文官體制襯托下，總統身旁肯定有許多學有專精的特殊人才協助其施政以及扮演輔佐的功能。無論是各種公開場合演講稿中我們看到的「文膽」角色，或是各式樣如同「國安諮詢委員」、「總統府戰略顧問」等，都在不同的位置上做出適當的建議，以供總統作為判斷、決策之用。

是的，李登輝在主政 12 年的期間，肯定會遇上各種來自幕僚、專家的建言；但是無論是再怎麼樣進步或是可靠的資訊，也只有李登輝自己一人能夠加以評判與消化。換言之，百百種的辭藻與國家走向，還是只能仰賴李登輝自己做出最終的決定。因為，只有他一人能夠代表這個國家。他的一言一語，也向來動見觀瞻。

李登輝選擇了告訴世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這個事實；這也是他自 90 年代初期以降，不斷地在進行改革、修憲的總合所在。中華民國的治權透過修憲，

明確的限定在「台、澎、金、馬」地區；選舉產生的國會代議士，也僅限於代表著台灣地區的人民，再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關。反之亦然。

植基於上，中華民國在台灣，不僅僅是依據能夠簡單詮釋台灣向現狀的口號，同時也實質地解釋了中華民國統治的疆域範圍，讓長在中華民國的台灣人，知道自己生長在什麼樣的明確國度內，進一步澈底根絕了兩蔣時代「神州大陸」的奇特幻想。這是李登輝的創舉，也是他的用心良苦所在。在此，也同時進入了李登輝本時期出現「台灣認同」的第三討論要素：「特殊國與國關係的提出」。

當然前述這些複雜成果，從來都不是能夠一步到位的簡單工程，李登輝必須透過更多的方法與策略，才可能讓他心中甜美的台灣果實，逐漸幻化成真真實實閃耀在世人面前的美麗花朵。廢省，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步驟，李登輝說：「凍結台灣省，不但可處理舊往的利益政治問題，還可拆穿中國所謂『台灣是中國的一省』的虛構謊言，結果是，可以讓很多台灣人對台灣的主體性產生覺醒。台灣就是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事實就是如此」（李登輝 2015：110）。

回到「中華民國在台灣」這一個精心策劃的關鍵詞彙，卻也沒有因此讓中國安心多少。中國依舊維持他一慣的步調，持續透過各種手段或者難以計數的小動作，來欺辱台灣、打壓台灣。好比李登輝 1995 年成功訪美行、並暢言「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論述之後，中國就祭出武力威脅，在 1995 年下半年以及 1996 年台灣總統選舉前，不斷試射導彈，引爆就連美國都派出第七艦隊巡防航的台海危機。

身為台灣人總統的李登輝，不斷意識著台灣所陷入的中國壓迫之中，他開始嘗試透過更多的方式，帶領台灣走出新的道路。「中共持續在國際上打壓我們，否認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既不公平，也不符事實……針對中華民國在國際法上的地位，他[李登輝]想在國際法上找一些法律專家，在法理上證明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鄒景雯 2001：222）。

李登輝在這樣憂心於台灣前途的情況下，包括中國官方百般刁難所遲至 1998 年才願意召開時隔五年的第二次辜汪會談，李登輝必須尋求突破。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舉行建國 50 週年的前夕，李登輝政府得到訊息，中國代表汪

道涵將在訪台期間，將台灣定調成為「地方」，而中國自稱為「中央」，使得李登輝必須有所大動作，以卻維護台灣的主權完整性，不讓中國恣意妄為。

於是「一九九九年七月接受德國重要電視台『德國之聲』專訪，提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的見解，明確定位台灣的國家定位』」（李登輝 2009：104），向世界傳達台灣官方一致性的既有立場，也就是廣為人知的「兩國論」。其實「特殊國與國關係」本質上與「中華民國在台灣」並無二異，只是李登輝必須在中國官方可能竭盡心思的破壞台灣主權情況下，緊急踩上煞車，以免台灣自此弱勢於國際社會。這是先發制人的必要手段。

面對如此挑動台中敏感神經的發言，李登輝必須做出更加詳盡的詮釋，以避免引發台中兩國的戰爭危機：「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Sui generis）國與國關係，……北京政府將台灣視為『叛離的一省』的說法，完全是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兩岸關係的定位已經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現在沒有必要再宣布台灣獨立」（李登輝 2015：111）。

雖然李登輝做了上述的完整論述，為求在說出事實上，能夠盡量減低中國對台灣長久以來有關統獨議題的敵意，可想而知，中國依舊不為有善意的回應：「此說法引起很大的爭議。中國駐美大使批判李登輝是『歷史上的國賊，』將此言論視為『台灣獨立的動向』的中國政府，在台灣海峽上製造了緊張情勢」（黃文雄 2010：167），所幸李登輝政府做了危機處理，並沒有引發戰事的襲來。

對於李登輝來說：「我把台灣與中國定位為『特殊國與國』的關係，完全是出自公義之心的發言。說這句話時，我心中沒有私利與私慾，所想的完全是如何才能維護台灣利益。我認為，終極而言，中國與台灣應該和平相處，我想台灣民眾大都抱持類似想法」（李登輝 2009：45）。

李登輝也說道：「中國大陸批判台灣，也有其不得不然的一面。總之，蔣介石以違反人道的作法保住了台灣，蔣經國則推動十大建設，把台灣的經濟發拔起來。我想，我的使命，就是確立台灣的認同」（上坂冬子 2001：269）。是的，無論是反思「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主張「中華民國在台灣」，或是石破天驚的

「特殊國與國關係」，李登輝在他此一時期的主政十年期間，除了扮演好「中華民國」總統角色之外，他也正在為台灣一點一滴灌溉著即將茁壯的「台灣認同」。

第五節 小結

在本研究的分析之中，李登輝於上一生命時期的國族認同狀態，是「中華民國版」的中國認同；到了本時期的國族認同狀態分析，卻發現中國認同已不再是可靠的國族認同狀態，就連中華民國版的認同標籤，也都有值得商榷的可議部分。於是在本時期的第一大段，筆者提出了「精緻化中華民國認同」。

研究發現，在完全掌握執政權力的李登輝，開始調整了過往舊政府的「中華民國想像」：策動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限縮規範中華民國實質有效統治範圍、著手進行國會全面改選與憲政改革等，李登輝將其認為中華民國應呈現的樣貌，做了大幅度的調整即將自己的意志加入其中，此為一個精緻化的過程。

精緻化的第二步，是李登輝透過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手的過程之中，利用設置國統會、制頒《國家統一綱領》的方式，讓人誤以為他真心追求「國家統一」的決心；也巧妙運用台中破冰的「辜汪會談」，企圖營造台中和平的榮景。最後在與中國對決上，藉著扛下中國武力恫嚇的危機，贏得首次總統民選的勝利。

精緻化的再進化，則是在李登輝一連串民主與憲政改革的鋪陳之後，李登輝率先打破過往的禁忌，直指國民黨是「外來政權」，並且深刻地反思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最後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讓此一精心打造的「精緻化中華民國認同」，順利過渡、轉換成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嶄新認同標籤。

這邊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 Cross 黑人化心理學發展模型中，李登輝在以往的生命階段中，吾人都將之歸類為「前遭遇期」之中，但是到了本生命時期，筆者卻認為李登輝已經進入到了「遭遇期」的階段。然而此一遭遇期的出現，卻沒有明確的「單一」遭遇事件發生，在我們的觀察中，前述各項重要的標籤或記號，都是一個個在此十年間恣意流動的各種偶發遭遇事件。

順著遭遇期的到來，李登輝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則成為此一時期為何確定轉換成「台灣認同」的重要脈絡。特殊兩國論的出現，使得李登輝不再需要背負著「一個中國」；雖然台灣尚未能稱為一個國，但李登輝的國族認同，已再無中國存在的必要，而是已經轉變成「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台灣認同。

另外，在此同一時期當中，雖然無法明確地指出是哪一個單一確切的遭遇事件，使得李登輝進入到「遭遇期」當中，但遭遇期過後，隨之而來的，即是「沉浸期」的開始。是的，李登輝的認同發展，在此十年間，先是經歷過了遭遇期的階段，然後呈現出許多沉浸期會出現的表徵。

這裡所要強調的，由於無法明確地指出李登輝進入遭遇期是源自哪一個單一的遭遇事件，因此於此時期中，李登輝的遭遇期與沉浸期實際上呈現出反覆糾結的一種特殊狀態。易言之，這一種發展模式讓我們看到李登輝可能進入沉浸期之後，又似乎往回退到遭遇期的階段之中。

在此其中，也同樣牽扯到另一複雜的政策因素使然。例如李登輝在 1994 年提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1995 年在國際上更主張「中華民國在台灣」，這些都是清晰的「台灣認同」樣貌，讓我們認為李登輝的國族認同，順利地朝向台灣認同發展，然而到了 1998 年時，仍然能夠看見李登輝對於「國家統一」的發言。

「中國統一」的目標，沒有消失在「國家領導人」李登輝的詞彙之中。這是身為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無法完全與中華民國認同做出切割的困難所在；身為中國國民黨的領導人，李登輝依舊必須對於統一中國的立場，做出一定程度的宣誓。這也就是在「政策」下，我們難以做出遭遇期與沉浸期的明顯分野；也明顯地看見了認同具有「流動」的特性，也就是可能不斷反覆地前進與後退。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探索，這些來回擺盪於中華民國認同與台灣認同之間的紛紛擾擾，1999 年李登輝提出的「特殊兩國論」，為此一時期吾人的諸多揣測，找得了塵埃落定的依靠。李登輝明白地將過往追求統一、依附在中華民國／中國認同的記號丟去，讓台灣認同能夠以「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方式登場，即使李登輝的內心中未必能清楚地完整解釋出他新建構的認同，但卻是朝向「台灣認同」前

進，擺脫了舊有、追求統一的中華民國認同。以上，即是筆者分析李登輝此一時期的國族認同狀態，進入到「台灣認同的遭遇期與沉浸期」之中。

第七章 期初的李前總統生活（2000-2007）

卸任元首交出政權的李登輝，年齡已經來到 77 歲，不僅僅來到了適合退休的年紀，也是一生奉獻國家的他，該當利用有限度的生命，多多花時間與家人們相處的時候了。但是，顯然李登輝選擇了退而不休的生活。無論是成立為政府獻策的智庫型研究單位群策會，或是協助成立台獨立場濃厚的政黨 —— 台灣團結聯盟，以及四處可以看見李登輝前總統現身亮相參加的公開演講活動；不當總統處理國政的李登輝，也沒有選擇成為一個閒雲野鶴的輕鬆老人。

會有這樣的退休生活，顯然與李登輝總是憂國憂民的性格有關。在性格之外，交班給民進黨政府之後的台灣政壇動盪不安，可能也是心愛台灣的李登輝所無法過著安心養老的生活。於是李登輝在成為李前總統的期初，繼續是許多媒體關注的焦點，他沒有因為卸任，而真正淡出台灣的公共事務參與。在此過程中，也可能因為少了元首身份的束縛，李登輝的發言，尤其是相關國族認同的內容，打破了以往的深沉，讓人們似乎更能明白李登輝的言下之意，他也認同台灣獨立。

這一個章節的安排，筆者將以前面三個篇章，最與李登輝緊密連結的「中國國民黨」談起。2000 年 3 月 24 日被逼宮導致提交交出黨權的李登輝，依舊還是國民黨黨員；但在卸任總統不久後，國民黨祭以黨紀，開除了這位與國民黨共同奮鬥近 30 年的前主席。接著我們也會爬梳李登輝離開國民黨後，與李登輝最為息息相關的台灣團結聯盟政黨，看看李登輝如何運用這一個路線訴求本土的新興政黨，發散李登輝窮其一生的最後政治能量與光環。

當然，李登輝卸任的初期，新政府執政就是民進黨的陳水扁政府；李登輝甚至在 2004 年陳水扁競選連任之時，大力相助陳水扁過關。但後來李、扁兩位先、後總統的關係，顯然走向冰點，裡頭的可能原因，應當做一清楚的敘明。最後則是鎖定在成為卸任元首後，李登輝的一言一行依舊是鎂光燈不肯錯過的焦點；其中最為關鍵的，應當就是李登輝鮮明而積極的台獨立場。但在 2007 年初，一場媒體專訪後，李登輝被稱作「放棄台獨」的論調真相，是本章節的收尾所在。

第一節 分手吧，國民黨

李登輝總統的任期，是到 2000 年 5 月 20 日完成和平轉移政權的那一刻；而李登輝國民黨主席的任期，則是提早結束在 2000 年 3 月 24 日國民黨敗選後的第六天。首嚐失去政權滋味的國民黨，面對前所未有的潰敗，全黨上下都在尋找「戰犯」，位高權重、權傾一時的李登輝，成為了無可迴避的明顯標的物，提前卸下黨主席職務，對於苦悶失志的國民黨集團來說，只是剛好而已的宣洩出口。

然而李登輝辭去黨主席職務後，並沒有隨著他的總統任期到任，而同步終止他的政治生涯；至少，沒了總統與黨主席職務的他，依舊是一位黨齡近 30 年的國民黨資深老黨員。卸甲歸田的他，除了旋即在「淡水一棟三十層大樓頂樓的『台灣綜合研究院』保留了一間辦公室，他經常在那裡接見客人、撰寫演講稿與從事卸任總統後的各種活動[外] ……李登輝卸任總統後並不等於就此回歸平靜沈寂，和外國許多退休總統不一樣的是，彷彿永遠靜不下來的李登輝對外界責難時很少沈默退縮。他的精力、個性以及他的『大嘴巴』，經常讓他對許多問題發表的見解意外成為台灣的報紙頭條」（蔡石山 2007：313）。

所以持續針砭時事、提出獨到見解的李登輝，聲量並沒有隨著成為卸任元首而減少。加之「在陳水扁總統就任後，有次因為朝野僵局備感困擾來看李登輝，曾經感嘆的說，如果李登輝繼續當黨主席一段時間，他也許會比較好做事，政局也不致如此混亂。李登輝的回答就是『不見得。』他告訴陳水扁，『如果我被國民黨綁住了，要如何與你互動？我若是國民黨主席，你來看我，問題會更大，我現在比較超然，你隨時來找我，可以問我很多問題，你需要我如何協助，我才可以方便行事，這對國家也比較好』」（鄒景雯 2001：162）。

就是這樣的性格與憂國憂民的情懷，卸任後的李登輝並沒有停下他關心台灣的腳步。但卻也因為對時事的回應、與昔日政黨對手的良善互動，甚至在「二〇〇一年七月協助「台灣團結聯盟」（Taiwan Solidarity Union，簡稱 TSU，台聯）組

黨，而台聯是一個比民進黨還更偏向訴求台灣獨立的政黨。對國民黨而言，簡直『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便在那年九月將他開除了黨籍」（柯義耕 2008：294）。

曾經貴為國民黨內最有權勢的總統兼任黨主席，就在即將告老還鄉、光榮引退之際，傾刻間變成國民黨內的頭號罪人。沒有總統職務的他，在黨內也早已明確失勢，面對「逼宮」、提前「卸任」，成為眾所矢之的首要「檢討」對象後，最後，是被國民黨祭以黨紀「開除」。這樣的收場，李登輝會否感到唏噓？李登輝的生命史，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一、　敗選後的國民黨內新局勢

一如眾所知道，因為 2000 年總統大選國民黨提名人連戰的慘敗，李登輝除了必須親手將政權交接給非國民黨籍的新國家領導人；做為黨主席的他，面對選戰潰敗失利，也必須一肩扛起敗選的要責，在來不及拖到總統任期到任前，即被以「逼宮」的方式，提早辭去黨主席的職務。對於加入國民黨已 29 年、曾經登峰造極的他來說，這絕對不是一個善終的預期結果。不過面對這樣的頹勢，年近 80 的李登輝，大概也不想再花更多的氣力，去挽回些什麼了。

在連戰與國民黨支持者進行所謂抗議、壓迫李登輝必須下台以示負責以前，原本李登輝心裡規劃的交出黨主席時間，是在卸任總統、再經過一段時間後：「李登輝卻若無其事的說：『我本來打算在選舉結果揭曉半年以後，大約在九月間辭去黨主席職務。那只是讓我把時間稍微提早而已』」（上坂冬子 2001：278）。所以這樣因為敗選導致提前辭去黨主席職位的李登輝，李登輝倒也淡然看待。

> 我決定辭掉國民黨主席的時候，腦海裡想的有三件事：第一，我已經完成推動台灣政治改革的時代任務。第二，我已不再需要借重國民黨的龐大政治機器，而且也已經不必再利用國民黨去做政治改革了。第三，我希望在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日順利完成政權和平轉移之後，能脫離台灣的政治舞台，站在超然的立場為台灣的未來多做一些事。因此我辭去黨主席的職務，理由是非常

明確的。……其實我很高興，我認為我已完成了歷史性的任務。（李登輝／小林善紀 2001：110-111）。

不過在這邊仍舊要提的是，在選前兩個月，美國持續關心台灣這一場 20 世紀末的總統大選，李登輝政府也不斷地必須向美國政府表達連戰足以勝出的訊息，「台灣方面為取信人，此時又拿出兩份資料說明，在『相信度』方面，聯合報元月十日的民調指出，連戰為六十一%，宋楚瑜四十三%，陳水扁四十二%；至於『看好度』，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元月三日的調查，連戰為三十八，陳水扁十三%，宋楚瑜十二%，連戰皆遙遙領先」（鄒景雯 2001：149）。也就是說，李登輝暨其掌握的黨機器與輔選團隊，一致認為連戰的選情看好，一定會順利當選。

既然連戰可以勝出，依照慣例，在成為台灣總統後的連戰，理當向過去的每一位選舉出的國民黨籍總統般，兼任國民黨主席，但是「台灣當時特別向美國強調，在連戰出任總統以後，李登輝將繼續擔任國民黨主席，而國民黨又擁有國會的多數，因此台灣政治持續穩定可以預期」（鄒景雯 2001：150）。這或許就是李登輝原先規劃連戰勝出、擔任總統後，他將續任黨主席，直到九月間。

選舉的結果，當然與國民黨當時向美國彙報的資訊產生相當大程度的落差，連戰不僅僅不會當選，而且還被陳、宋兩人遠遠拋開；是國民黨團隊信心過了頭，還是掌握整個黨機器的李登輝，並沒有把真正正確的訊息告訴大眾。如果是後者，那麼李登輝很可能早就知道連戰不會當選，也就沒有總統是否兼任黨主席的衝突爭議，作為長久以來國民黨內的新一代霸主，卸任的李登輝繼續擔任黨主席，也只是剛好而已的一個自然現象罷了。李登輝只是沒有想到會有後來激烈的逼宮。

李登輝黨主席的任期，比起他能夠順利完成和平政權轉移，顯得黯淡無光。但任期本就是有到任的一天，無論是總統大位，或是黨主席職務；對於人生經歷豐富的李登輝而言，想必倒也不是無法放下心中大石頭的那一塊，只是或多或少總帶有些微的感慨吧。畢竟，他的一生中若真在政治事業上有了什麼長足的進展與成就，國民黨黨員／國民黨黨主席者兩個身分絕對脫離不了關係。

李登輝交出黨主席職務後，國民黨機器交到了總統大選中落敗的總統候選人連戰手中，雖然連戰在此役中輸得相當難看，但他卻也是當今國民黨內扣除李登輝之外的第一把手。除了參加 2000 年總統選戰，連戰同時也是剛剛卸任的副總統，更經歷了好長一段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光；即將進入 21 世紀的民主新興台灣，過去長期以李登輝馬首是瞻的國民黨，如今隱然已成為連戰所接續掌舵的全新開始，正式進入沒有李登輝領導的嶄新時代。

二、 台灣團結聯盟關係

> 不料，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國會依然是少數黨，陳水扁總統所擬定的政策幾乎全部都遭受國民黨反對勢力阻撓，政局擾攘不安。這樣下去，只怕好不容易建立的台灣自由民主主義體制會徹底瓦解。很自然的許多有識之士呼籲，台灣應該有人帶頭發動「支持少數執政民進黨的新國民運動」，他們希望我重出江湖，帶領大家行動。基於「見義而不為非勇也」的觀念，我因此再度回到政治最前線。……終究我只是想為台灣做一些事，完全沒有政治的野心。我堅信，公義就應如此。（李登輝 2009：46-47）

總統大選的勝利，並不代表執政就能夠順利，這是自 2000 年以來，民進黨連續兩次贏得總統大選，但國會選舉始終沒能過半，以致形成「朝小野大」的國內政壇動盪不安的主要原因。剛剛卸下總統職務的李登輝，也不再掌握長期在國會擁有多數席次的國民黨，這個時候的李登輝，究竟還能為台灣的民主奮鬥些什麼？如同李登輝所說：「他們希望我重出江湖，帶領大家行動。……我因此再度回到政治最前線」（李登輝 2009：47）。

那麼什麼是李登輝口中的「政治最前線」？在比較清晰的脈絡上，協助組成台灣團結聯盟政黨，帶領象徵本土的小黨進軍國會，是李登輝重回政治戰場，最明顯的例證。當然，這也是前述中提到過的，最終國民黨黨紀開除李登輝的最主要原因。李登輝不計毀譽、不較得失的協助台聯，無非就是希望看見在他手中進入民主深化的台灣，能夠不因任何的政治紛擾羈絆，而停止繼續向前。

2001 年，「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以後，李登輝系新政黨於八月十二日舉行黨員大會，政黨名稱為『台灣團結聯盟』，由前內政部長[黃主文]出任創黨黨主席……台聯政策上繼承李登輝路線，海峽兩岸關係則標舉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的關係』論，……之後，台聯動向成為台灣政局焦點之一」（井尻秀憲 2010：174）。

「李登輝是台灣團結聯盟的精神領袖，台聯則是熱烈推展台獨宣傳的主要政黨」（蔡石山 2007：315）。這一個新興政黨的成立，最基本的要素當然就是組成的「黨員」；那麼以李登輝路線為圭臬、視其為精神領袖的情況下，該如何補實、壯大其黨員基礎？「創黨時主要以原中國國民黨內本土派的黨員及民進黨內獨立派的黨員組成」（維基百科 2019a）。

沒錯，這一個新的政黨，成立初期的主要黨員，來自政壇上兩大政黨的國民黨與民進黨。不過這裡頭有著相當重要的訊息存在，國民黨內的「本土派」，以及民進黨內的「台獨派」，是台聯黨鎖定的目標範圍。當時由於民進黨已成為執政黨，為了顧及更大方向的國家安全與利益，在「統獨議題」上已經不能再如在野時走得如此激進；於是民進黨內積極倡導台灣獨立的部分人士，在黨內無法得到共鳴的情況下，選擇走向台獨立場更為激進的台聯黨，是有脈絡可循的。

但是什麼又是國民黨內的本土派？葫蘆裡賣的又是什麼藥？基本上，我們可以從「省籍」之中進行琢磨。誠如李登輝提過，他希望將中國國民黨這一個外來政權的國家政黨，改造、內化成為「台灣的」國民黨。當然，最終結果他並沒有真正成功，反而落得遭受開除黨籍的下場。

我們接續來看，所謂本土派的國民黨人物，大抵傳達的意思就是國民黨內「本省籍」為主的政治人物。因為「黃復興」、「黃國園」等特種黨部一直存在的國民黨，在結構上長期以來保有濃厚的外省政黨氣息，在國民黨內真正掌握權力的領導班子，大多仍舊由外省權貴集團把持，這是牢不可破的國民黨省籍陋習。

於是終不得志的國民黨內本土派成員，在長年與李登輝的從屬關係不在之後，看著了李登輝另闢蹊徑的曙光，加入了新成立的台聯黨。至此，這是台灣團結聯盟政黨早期成立的黨員主要組成樣貌。接下來，我們繼續看到台聯黨究竟在台灣

兩大政黨各據山頭下，還有什麼樣發揮、使力的空間；以及從未正式加入台聯的李登輝，與這個政黨保持著什麼樣的關係。

源自李登輝看著台灣政治環境的愈趨不好，他毅然決然重新回到政治的最前線，於是協助成立台聯。任何政黨的成立，基礎的原則都是希望能夠在期初透過選舉、取得進軍國會的機會，才會有真正發揮效果的功能所在。就在台聯成立不久後，同年年底「十二月一日，台灣舉行立委與縣市長大選，全部二二五個議席一一三過半的立委大選，民進黨取得八十七席，……國民黨取得六十八席，……親民黨取得四十六席，……台聯選上十三席（7.7%），……新黨一席，……其餘無黨派人士十席」（井尻秀憲 2010：176）。

初試啼聲的台聯黨，在執政黨與泛藍陣營夾殺的情況下，算是開出不錯的成績。台聯黨因此有了躍上全國版面的機會。當然，若與執政民進黨的 87 席相加，合計 100 席立法委員的席次，仍舊沒有在國會殿堂一舉過半，在某種程度上，當然消減了李登輝欲協助陳水扁排除執政困難的力道。不過，「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國會大選與之後台灣政界勢力重組，都受該黨影響與牽動。對於這樣的政局發展，李登輝前總統指出，『現在選民已經對（國民黨與民進黨這兩個）政黨失去信心……，中間勢力大有發展空間』。在此情況下，當然有必要匯集『中間勢力』重組政界，組織一個可以為大部分民眾代言的政黨」（井尻秀憲 2010：174-175）。

李登輝希望激發出匯集「中間勢力」、組織一個更加強大的政黨心願，一直到今天，似乎這個理想並沒有在台灣真正實現。中央執政大權迄今仍然是李登輝所說，民眾沒有信心的國、民兩黨之爭，就連國會也依舊是國、民兩黨為多數的天下，2001 年成立的台聯黨，在 2016 年立委大選中，甚至一個席次也沒有選上，政黨面臨前所未有的泡沫化危機。

其實台聯黨的發展並非急轉直下的曇花一現，這個政黨也持續正常運作了至少超過十年。那麼為何在高舉李登輝精神、奉行李登輝路線的情況下，沒有機會持續壯大與茁壯？台聯黨標榜的台獨立場旗幟太過鮮明，或許是它無法獲得更多中間選民放心與認同的停滯發展主因。「根據台聯的建黨宣言，他們拒絕接受『台

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概念，並認為所有將台灣和中國加以連結的符號和概念都必須加以弱化。台灣必須完全與中國分割」（柯義耕 2008：295）。

或許正是過於強烈的主張，一時間無法得到更多台灣人民的普遍共識與認同，所以這個政黨一直沒有真正長大起來。「美國國務院認為，台聯的分裂主義將對台海安全構成威脅，並認為李登輝不斷主張台灣獨立並爭取其他國家的承認，不懂得節制，簡直是一個『麻煩製造者』。李登輝與台聯則認為，如果『一個中國』的概念意味著，台灣必須以一個不平等實體的身分『回歸』中國，那麼這樣的概念是無法令人接受的」（柯義耕 2008：296）。

或許台聯與李登輝的腳步太快，所以跟上的台灣人太少；但是台聯黨仍舊在台灣的民意代表選舉中，屢有所獲，呈現著穩定與緩步的成長，並且與民進黨素來保有良好的泛綠陣營互動。但是政黨之間總免不了為了維持自己的民意基礎與政黨勢力，出現類似同樣陣營的競合，是在所難免的。例如 2004 年底的立委選戰，台聯與民進黨間就存在不少的摩擦與嫌隙。

> 二〇〇四年年底備受矚目的立委改選，各政黨席次……民進黨八十九……台灣團結聯盟十二……泛綠陣營合計一〇一席。國民黨獲得七十九……親民黨三十四……新黨一……泛藍陣營合計一一四席，……針對這項選舉結果，台灣某消息人士指出，這代表泛綠陣營挫敗，而失敗主因是配票出了問題，……陳總統公開指責台聯瓜分民進黨票源，台聯則反批民進黨搶食其票源，雙方對立。不過，這只是選舉戰術的對立，民進黨基本上仍和台聯同一陣線。選舉之前，台聯提議「和民進黨一起配票」，卻遭民進黨反對。（井尻秀憲 2010：188-189）

台聯黨是一個李登輝以促進台灣政壇更加和諧為起步的政黨；之後，各政黨為了自己的發展與民意所需，相互競爭、各自表現，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以至於開始修正各種不同路線、爭取不同票源，是政黨為了延續存在的必要努力。對於李登輝而言，台聯黨當然是他一手拉拔成長的政黨，但是，政黨的發展也有其現實環境的限制，這絕非是李登輝一人之力足矣。至終，其實台聯黨更像是李登

輝希望台灣持續更好的情況下，善用的其中一種優質武器；但在此之外，李登輝尚有其它方式，來展現他為所愛的國家，願付出的心力。

三、 走自己路的李登輝

在國民黨內節節敗退、全面失勢，甚至最後被開除黨籍的李登輝，其實並沒有完全折損他從政多來以來蘊藏的巨大能量。除了進駐「台灣綜合研究院」持續關心國政及維持與外界的互動聯繫之外，李登輝同時「總統卸任後，二〇〇一年十二月『群策會』成立。這是個超黨派的政策研究組織，而且不只扮演偏重理論與構想的智庫（think tank）角色，還擁有動員基層與國會議員實踐理念與推動法案的能力，堪稱『動庫』（do tank，著重行動的研究機構）。而群策會成立後，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擬定『台灣二十一世紀國家總目標』，提供政府政策建議」（李登輝 2009：204）。

卸任後的李登輝，當外界請他針貶國政時，雖然嘴巴上總是說：「我是卸任元首，不能做任何評論」（鄒景雯 2001：172），但其實將泰半人生奉獻給國家的他，對於台灣的前途發展與未來好壞，實在不亞於任何關心台灣的國人同胞。所以接著前述所示，「二〇〇三年群策會出版《台灣二十一世紀國家總目標》一書，此乃諸多學者與專家持續研究、討論的成果，其出版宗旨在於建立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與『國家目標』，作為政府施政後盾」（李登輝 2009：120-121）。

一生憂國憂民、為台灣奉獻的李登輝，在成為卸任元首後，繼續用他畢生的經驗的學者養成背景，打造高水準的專業團隊，企圖以群策群力的方式，為他心所愛的台灣盡心盡力。這就是我們一向認知的李登輝，不計毀譽、不較得失。而群策會的研究成果中，「建立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深深吸引了筆者的目光。對此，李登輝曾說明道：

> 各項調查顯示台灣民眾的「台灣人意識」比例愈來愈高，但在野的反民主政黨與親中派政治勢力不斷操弄大中國意識，以此為政治手段，恣意破壞台灣

社會的和平與國家自我認同。……克服這項難關，方法只有一種，那就是國家領導人發揮領導能力，強化國民對台灣的自我認同。所幸，台灣民眾已經和五十年前完全不同，出現明顯的「質變」。五十年前被外來政權洗腦，大部分台灣人不疑有他地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相對的，今天大多數台灣人都已認清，過去強調台灣人是中國人的說法，不過是「捏造歷史」、「虛構的想像」。……台灣二千三百萬國民應該還是會理所當然認同台灣，台灣也因此毫不躊躇地往「正常國家」目標繼續邁進，蛻變成完全的民主國家。（李登輝 2009：126-128）。

在李登輝的心中，總是嚮往著能夠在僅剩的餘生之中，繼續利用生命的餘暉，陪伴著台灣人民邁向更美好的國度。對李登輝而言，「正常國家」是一個明確的目標，但在通往正常國家的這條路上，有許多必須打下的基礎與跨越的難關，台灣才有可能真正成為完全的民主國家。其中「認同台灣」、「台灣認同」，是李登輝一再強調的重要指標。

而李登輝也絕不是只會演講、只會帶領群眾齊呼口號的「政客」代表。如同柯義耕所說：「李登輝之所以堪稱一個政治家，在於他重新定義了『台灣』的概念。他走出中國、日本帝國以及國民黨高壓政權的歷史陰影，捨棄這些不健全的傳統，勇敢向前瞻望，希望能從人類的失敗中尋求救贖，使人民有機會過著自由而有創意的生活，並開拓自己的心靈空間，願意為了社會的進步而做不同的嘗試。對於許多正試圖擺脫內部反彈、偏執的傳統或政黨的專制，向未來邁進的民族或國家而言，這種為自己尋求新定位的做法是很重要的」（柯義耕 2008：319）。

沒有國民黨束縛，沒有總統職位的瞻前顧後、小心翼翼，李登輝能揮灑的空間更加寬廣了。除了前一段提及與李登輝產生緊密連動的台灣團結聯盟政黨之外，在這一段落中，我們先是看到了「群策會」的出現，但是李登輝手中的武器人如同不是一定只能拿「武士刀」一般，他也能夠拾起「高爾夫球桿」，做出更多動人的揮灑，展現更平和卻也能達到目的的姿態。

在台聯與群策會之外，「二〇〇三年時，『李登輝學校』招收了第一批共兩百多名學生。該校創辦的目的在建構台灣的主體意識並提升台灣的民主政治……

李登輝學校既非學院，也非研究所，反而比較像是一個『進修推廣部』，負責培訓一批能夠反映台灣觀點以及台灣與世界關係的重要人才。……他不斷的呼籲大家要建立台灣的主體意識，因為他深信台灣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唯有自由與獨立才能帶來長久的、真正的幸福」（柯義耕 2008：302-306）。

這就是李登輝。不被職務、不被政黨、不被場域所囿限的行動力長者。最後，我們回到「走自己路的李登輝」，是如何串起這些蘊含強大能量的「政黨成立」、「知識傳遞」與「政策建議」。「群策會」是其中的重要關鍵：「籌組台聯和李登輝學校的人才都來自群策會。李登輝形容群策會是『行動智庫』——『智庫』和『行動庫』的集合體，主要的宗旨在引領台灣的民主與自由，並傾其人才與資源為台灣制定各項政策以促進政治的穩定、提振經濟的發展並維護國家的主權」（柯義耕 2008：306）。

卸任後的李登輝、被國民黨「趕跑」的李登輝，在沒有選擇實質退休的情況下，看著台灣政局的紛亂不平靜，重出江湖、站上政治最前線。對於一位 7、80 歲的長者來說，光是體力的負擔可能就是一大問題。所幸健康不致於令人擔憂的李登輝，加上絕對過人的意志力，依舊組織、主持許許多多關心國家大政的政策研討與議題。或許「政黨」、「學校」、「智庫」只是一種表象膚淺的解釋行為，但透過李登輝發散出的巨大能量，非常清楚，李登輝繼續走上自己的路；而這一條路，即使是旁人更加年輕、更加有體力，也未必能夠超越李登輝的路。

第二節 與接任總統關係

國民黨來台統治超過 50 年，長期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怎麼也沒料想到，最後完完整整地政權，會在李登輝手中交出去；主政台灣長達 12 年的李登輝，頓時間成為了死忠國民黨支持者，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我們在上一節中，清楚知道了李登輝被離開國民黨；憂心台灣前途發展的他，除了協助本土政黨台聯的成立、運作之外，也嘗試找尋他能量所及，能夠為新政府獻策的各式機會。

台灣於 2000 年 5 月 20 日完成首次的和平政權轉移，所謂的政權轉移，簡單來說，就是由原先負責執政的政黨，將執政權移交給分屬不同政黨的新組成政府。原本隸屬國民黨的李登輝政府，就在李登輝任期到任之際，和平地將政權移交給新當選總統的民進黨籍陳水扁。這是李、扁兩人共同寫下的台灣光榮時刻。

誠如先前提到，李登輝在光榮卸下元首身分之後，展開了他退而不休的晚年生活。關心台灣的他，於是開始了與陳水扁總統有了友好的密切互動。陳水扁早期的尊李，甚至讓外界形容李、扁兩人情同父子，一位是台灣民主之父、一位是台灣之子，好不溫馨的前、後任總統情誼。兩人的關係交好，在 2004 年來到了一個關鍵的時間點；尋求連任、守護本土政權延續的陳水扁，陷入了苦戰之中。

因為陳水扁在 2000 年競選時的第二、三名對手，結合成組合，依選舉得票比例來看，第二名的宋楚瑜拿下 36.84%的得票率、第三名的連戰得到 23.10%的得票率，兩相加總後為 59.94%，遠超過陳水扁的得票率 39.30%，20 個以上的百分點。這一個連戰與宋楚瑜的夢幻組合，當然對於執政的民進黨陳水扁相當不利。擔憂如李登輝，於是發起了「二二八牽手護台灣」，正式牽起了陳水扁的手。

當然，最後陳水扁能夠勝出的原因繁多，不會是因為單純李登輝發起活動、表達相挺，就能讓詭譎多變的總統大選，江山底定。但是一位不同政黨的前總統，如今選擇與本土政權站在一起，已然產生良好的投票動能，窺見更團結的台灣。不過，「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李登輝與陳水扁的關係，最後因政黨資源的較量、陳水扁貪腐案的繪聲繪影，兩人漸行漸遠，久久不曾往來。

一、　民主之父李登輝與台灣之子陳水扁

> 對於陳水扁大量啟用原政府的班底，李登輝十分樂觀其成，特別是兩岸、國安、軍情系統的鞏固，不僅攸關國家安全的強化，也確實在政權轉移過程發揮了主要的穩定作用。李登輝非常自豪，政權能夠和平轉移，對於台灣民主發展歷程是很重要的一個結果，它結束了「父傳子、做到死」的權力傳承模式，它更檢驗了民主體制確實已經在台灣落地生根，剩下的只待民主內涵的提昇與充實。（鄒景雯 2001：167）

李登輝與陳水扁的關係，單就攜手完成台灣首次和平政權轉移，已經讓兩人雙雙能夠在歷史上留下定位。從此以往，台灣民主發展史的篇章，肯定記下這彌足珍貴的一頁。但是，這兩位順利完成交接任的前、後總統，卻有著在台灣才會發生的另一項光榮創舉，就是首次由本省籍總統，傳承給同樣是本省籍的總統。

省籍的問題，向來是在台灣國內才會發生的特有現象；同樣的人種、同樣的祖先，卻因為在大的概念上，來到台灣先後順序的不同，產生了本省與外省之分。加上兩蔣父子先後統宰台灣近 40 年，好不容易才產生第一位台灣人總統李登輝，在 2000 年總統大選時，雖然是陳水扁最終取得勝利，但緊追在後，得票率僅僅小輸 2.64%的宋楚瑜，正是外省人；李登輝主掌的本土政權，差一點又再次回到外省人手中。於是，陳水扁的勝出，具有非凡的本土政權延續意義。

在這樣的基礎下，身為民主先生的李登輝，從不因主政的政黨被其他政黨輪替而感覺苦；反而欣然接受「民主機制」下的選舉結果。畢竟，李登輝傾盡一生能力，無非也就是希望看見更加美好的「民主台灣」。李登輝也說：「回想起來，一九八八年初次坐上『總統』這個台灣最高權力寶座至今，我不曾有一刻執著於自己的權力，因為我無時無刻想的是『如何才能有利於國家民生』。在此前提下，若出現比我更具實力的好領導者，隨時都可讓賢，由對方接任總統。也所以，陳水扁先生大選勝出後，我立刻歡喜地交棒給他」（李登輝 2009：47）。

在沒有預設任何立場，也沒有黨派之分的李登輝，果真歡喜、和平地將政權移交給民進黨的陳水扁。但在陳水扁就職前夕，卻有一個插曲，讓人聯想到或許李登輝與陳水扁一度被形容成「情同父子」，就是從那一刻開始：

> 此時曾文惠女士很輕地說：「陳水扁總統在三月的選舉結束後不久，夫妻倆就到我們住的總統官邸來拜訪。當時應該是他們最忙的時候吧」。……就在陳水扁夫婦要告辭時，曾文惠眼怔怔的望著新總統陳水扁的年輕模樣，很自然地問起他的年紀。……對於曾文惠女士的詢問，陳水扁露出他那特有的無邪笑容說：「就快五十歲了。」聽到這一句，李夫人神色為之一震。「我看得出神，不禁脫口而出說：『啊，那跟我兒子年紀差不多呢。』我可以感受

到原本笑容滿面與我輕輕握手的陳總統，瞬間一臉嚴肅，使勁握住我的手，力道強得幾乎握痛我。我內心無限感慨，也不禁緊緊回握」（上坂冬子 2001：37-39）

雖然，上述是曾文惠看見陳水扁時的接觸與感受；但是，我們也都知道，鶼鰈情深如李登輝夫婦，向來具有近乎相同的感受，以及對待人事物特有的觀察與判斷。曾文惠的感想不能直接代表李登輝，但是不可否認地，在李登輝過往面臨許多人生上跨越不去的抉擇點時，都是曾文惠從旁陪伴、甚至是協助。所以曾文惠看待陳水扁的感受，很有可能也會直接影響李登輝的情緒，尤其，是正好挑起曾經讓李登輝痛苦萬分的喪子之痛。

李登輝有沒有因為陳水扁與李憲文年紀相仿，而對陳水扁流露出如同看待兒子般的關愛？我們無法證實。但是李登輝在陳水扁當選之後，確確實實幫助了陳水扁許多，「五二〇就職之前，在李登輝與陳水扁多次見面中，政權轉移不僅是形式轉移，更需實質轉移，是李登輝的觀念。因此他站在維護國家利益的立場，對陳水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盡可能提供心得」（鄒景雯 2001：167）。

面對陳水扁的年輕（並且與李憲文年紀相仿），以及民進黨政府從未有機會執政的經驗不足，關心台灣前途發展的李登輝說：「登輝早期就決定，將一生奉獻給台灣這一塊土地與這一群老百姓。雖然現在已經卸任公職，但是凡與台灣發展前途相關的事，登輝仍然要拚老命奮鬥到底」（李登輝 2008c：215-216）。拚了老命也要為台灣奮鬥到底，這或許才是李登輝協助陳水扁政府的初衷。

最後回到李登輝看待陳水扁個人的特質上。事實上，當陳水扁在政治上「出道」的時候，李登輝早已是國民黨內舉足輕重的一號人物了。那是還沒有解除戒嚴的時候，1979 年美麗島事件，陳水扁即是辯護律師團的成員之一，並且一舉成名，成為當時候備受期待的黨外政治新星；而那個時期的李登輝，擔任的是台北市市長。15 年後，陳水扁也當選了 1994 年開放的民選台北市長。

1994 年的李登輝，是現任的總統，作為首都市長的陳水扁，所作所為肯定映入主政者李登輝的眼簾。「李登輝究竟如何看待陳水扁？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

題，長期觀察李登輝與陳水扁互動的人都會發現，李登輝基本上是依照每個階段不同的位置，而有不同的考慮與對待。九四年的台北市長選舉，是李登輝與陳水扁的第一次『』交手」（鄒景雯 2001：173）。

當時即分為不同陣營的李登輝與陳水扁，作為國民黨主帥的李登輝，當然希望自己黨提名的候選人能夠獲勝，也就是長年跟隨他的學生、部屬、時任官派台北市長的黃大洲。但最後選舉結果，遇上國民黨系統分裂的陳水扁，得票數超越因李登輝國家路線分裂出走的新黨新星：趙少康，以及落居第三名的黃大洲，順利當選台北市市長。

「陳水扁順利當選市長後，李登輝擱下了國民黨主席的身分，改以國家元首的態度處理與陳水扁的關係。在李登輝的回憶中，他對『市長』陳水扁的印象極佳，這是反對黨人物中第一個得到執政機會者，基於追求民主改革的立場，李登輝認為應該讓這個年輕人有一些機會」（鄒景雯 2001：173-174）。

但畢竟台北市是國家首都，長期以來在政黨攻城掠地的版圖之中，向來被視為是國民黨的天下；若非 1994 年泛藍陣營的分裂，陳水扁恐怕難有當選的機會。於是 1998 年的台北市長一役，在國民黨沒有再次遇上分裂的情況下，由國民黨提名的馬英九，擊敗施政滿意度民調超越七成的現任陳水扁市長。

原來，原本對陳水扁印象極佳的李登輝，在政黨必須對決的現實狀況下，當「馬英九決定接受國民黨提名後，李登輝又回到黨主席的角色，決定在選前一週站出來為馬英九站台，當天他提出『新台灣人』的訴求，成功彌補了馬英九在省籍上的弱勢。馬英九最後擊敗陳水扁當選，李登輝臨門一腳的演出，引起了不少與李登輝親善的本土派人士輒有怨言」（鄒景雯 2001：174）。

這是李登輝與陳水扁早期在二役台北市長選戰中的互動與交手。2000 年的總統大選之役，國民黨主席李登輝，當然繼續努力扮演好他希望延續國民黨執政的角色，四處為連戰候選人奔走、賣力輔選站台，自是不在話下了：「李登輝自認，連戰選總統，他全力配合，在高雄一天連續站台七場，比自己的選舉還認真」

（鄒景雯 2001：162）。當然，這個時候的對手，正是自國民黨內出走的宋楚瑜，以及民進黨的陳水扁，這是李、扁兩人再一次的選戰交手。

在過往政治現實上形成李登輝與陳水扁總是站在不同的陣營與立場上，必須為自己的政黨辯護、為自己的勝選努力。但是李登輝已然無官一身輕，也再不需要非得為國民黨作嫁的千斤萬擔使命，心繫台灣的李登輝，在民進黨經驗相對不足卻已主政台灣的情況下，帶著良善的建議與祝福，似乎是李登輝更能輕鬆駕馭的。「李登輝非常坦率的表示，『只要阿扁展現處理問題的魄力，把執政的大格局拉開，台灣的主流一定會支持他，大家一起來把台灣各方面的建設做得更好一點』」（鄒景雯 2001：177）。

最後，李登輝與他所希望的繼承者，究竟應該具有什麼樣的信念與價值？李登輝說：「我覺得台灣社會就充滿多樣性，非常好。真的是個多元化的國家。所以，我很喜歡陳水扁總統在就職演說詞當中所說的：『今天，阿扁以一個佃農之子、貧寒的出身，能夠在這一塊土地上奮鬥成長，歷經挫折與考驗，終於贏得人民的信賴，承擔起領導國家的重責大任。個人的成就如此卑微，但其中隱含的寓意卻彌足可貴。』」（李登輝，小林善紀 2001：167）。

二、　二二八牽手護台灣

> 二〇〇四年三月的總統選舉中，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與國民黨候選人連戰，雙方進行了一場異常激烈的選戰。當時我已離開國民黨。為了鼓勵台灣內部和解、促進團結，於是發起「牽手護台灣」運動。距離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五十七年後，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橫跨南北四百九十公里，兩百萬人手牽手心連心，抗議中國將飛彈瞄準台灣，傳達守護台灣的堅強意志。陳水扁總統也出席了這場手牽手護台灣的活動，與我一起牽手。選舉結果，陳水扁總統險勝，與連戰之間的得票率僅差百分之 0.0 二八。（李登輝 2015：122-123）

一如本章節揭示所提，2004 年尋求連任的陳水扁政府，形勢早已沒有 2000 年時競選第一個任期遇上國民黨陣營分裂的好；除了正處於執政中的民進黨，自

然產生所謂執政包袱外，丟掉四年政權的國民黨，再也無法忍受或者只屈居於扮演在野黨的角色，國民黨難得全黨上下一心，誓言收復他們因李登輝丟掉的政權。連戰與宋楚瑜的正、副總統組合，營造出國民黨陣營中的氣勢非凡、士氣高昂。

於是李登輝能否出手相挺？成為了陳水扁能否連任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因為「和美國的卸任總統不同的是，李登輝卸任後依然有很大的政治影響力，一般相信李登輝對陳水扁 2004 年成功連任幫助不少」（蔡石山 2007：315）。是的，李登輝即使是在卸任之後，仍然保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力，「牽手護台灣」[159]運動的成功，凝聚了台灣人民的團結之心，也讓陳水扁的選舉拿下不凡的得票數。

那麼為什麼李登輝依舊能夠維持高人氣，號召這麼多的群眾，一起站在台灣各個不同的角落，手牽著手、大聲向中國的飛彈說不？一方面，當然是面對中國對台灣的武力侵犯念頭，升高到開始在中國沿海佈署飛彈瞄準台灣，有骨氣的台灣人，當然會奮不顧身地站出來捍衛自己的國家。另一方面，李登輝在卸任之後，對於熱愛台灣的種種舉動，讓台灣人民深刻感受到現在的李登輝，已經不是以往站在中國國民黨陣營，擁抱中華民國、期待兩國統一的那一個李登輝了。

於是，李登輝願意攜手陳水扁一起面對中國官方的非分之想，以及武力相向，當然是一個具有十足張力的號召行動。而「這次大選中，陳總統與民進黨所高喊的口號，主要是希望讓國家自我認同（歸屬意識）與民族自我認同，和台灣的民主改革、政治經濟改革結合，這是台灣總統大選第一次真正聚焦『台灣人意識』問題的豪賭」（井尻秀憲 2010：185）。

陳水扁競選總統連任主張訴求的「台灣人意識」，和李登輝強調的「我年歲大了，能讓我再活十年就好了，這世人[這輩子]剩十年的時間，我這個性命完全是台灣的，為了台灣而已。我只希望大家的理念能夠一致，大家一起來打拚，認

[159] 228 牽手護臺灣「是 2004 年 2 月 28 日（和平紀念日、二二八事件紀念日）舉行於臺灣西部的一場活動，大約有 200 萬臺灣民眾參與（主辦單位宣稱 230 萬，親藍媒體估計 190 萬）人參與，並以牽手方式排列成長約 500 公里的人鏈。北起基隆市和平島，南至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是臺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運動。活動的目的是反對中國大陸部署針對臺灣的飛彈設施以及支持反飛彈公投。活動方式的靈感來自 1989 年舉行於波羅的海三小國的波羅的海之路。」（維基百科 2019b）

同台灣！」（李登輝 2008c：134）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兩位先、後任總統面對台灣人意識，或說對於台灣國家的認同，看法是一致，推動的決心也無所差別。

這一場活動的結果，無疑是空前的盛大與成功，當時空拍圖拍下台灣西海岸綿延不絕的長長人龍，搭配著一首由陳明章創作、朗朗上口的福佬語歌：《伊是咱的寶貝》感動了無數的台灣人民自己，當然，這一場活動的主角，正是每一位生活在這一塊土地上的台灣人民「自己」。

李登輝成功運用自己的方式，讓早先分屬不同政黨，甚至曾經多次在議題、政策上對立的陳水扁暨民進黨政府，在即將進行 2004 年總統大選前夕，進行了大規模的「精神動員」。李登輝與陳水扁共同在苗栗的二二八手護台灣主活動場同台牽手，宣示了李登輝捍衛本土政權、拒絕中國飛彈、支持陳水扁連任的心；讓眾多李登輝的支持者（或說信徒），願意惜花蓮盆，投票給陳水扁。

不過話說回來，李登輝當然是憂心台灣的前途發展，面對中國的強權壓力以及中國國民黨強勢競選、勢在必得的情況下，必須站出來，走在第一線與台灣人民一起來勇敢地守護台灣。那麼身為執政者的陳水扁，當時雖然也動用了民進黨的輔選團隊，與李登輝團隊共同完成了這一項絕無僅有的民主盛大嘉年華，但是會有這一場活動的出現，卻也有著對於陳水扁不利的解讀聲音。

高齡 81 的李登輝，還是必須衝上第一線來確保本土政權的順利延續，原來，是身為現任元首的陳水扁，做得差強人意，以至於讓李登輝憂心忡忡：「自稱是『台灣之子』的陳水扁總統，並沒有身懷像人民那樣期待的使命感。因此在 2004 年的『二二八手牽手活動』，李登輝才會率先起頭參與，在那之後的活動也不得不站在最前線」（黃文雄 2011：165）。

二二八牽手護台灣的活動，是一場李登輝力挺陳水扁、守護台灣家園決心的表現，然而，這兩位台灣本土誕生的台灣人總統，也在這次的成功合作之後，因為其他齟齬的因素，漸漸地分道揚鑣。誠如井尻秀憲所說：「陳水扁能再度當選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李登輝前總統所發起的『牽手護台灣』運動。但李前總統後

來卻語氣沈重地表示，『上次總統大選大力支持陳水扁，錯了』，選後李與陳之間的裂痕愈來愈大」（井尻秀憲 2010：186）。

三、　漸行漸遠阿輝與阿扁

李登輝是一個長年受到國民黨重點栽培、蔣經國大力提拔的本土型政治人物，可以這麼說，沒有蔣經國的識人之明、沒有國家政黨機器的後盾，李登輝很可能終其一生的成就，會是限縮在農經領域的發展，或成為一名享譽國際的學者、或待在一般公部門的中高主管職位，直到退休。這麼一個與他生命緊密連結的政黨，最後走向分手一途，任誰也想像不到，李登輝本人也帶著意外。

正所謂「志不同、道不合，不相為謀」，面對 30 年感情都能離散割捨的李登輝，總是走著自己的路，不一定迎合大眾，卻總是走得快且灑脫。帶著上述的前提來看待李登輝與陳水扁的關係，也就不難理解了吧。前述提過，早在陳水扁 1994 年擔任台北市長以來，與李登輝早有人生中的重疊、政壇上的對立或合作；但是這些總的時間直至李、扁兩人出現決裂為止，前前後後算起來亦不過 10 來年的光陰，明顯短於李登輝與國民黨的關係，或說李登輝與宋楚瑜有著更深厚的情誼，最後也都會出現嫌隙，李登輝與陳水扁的漸行漸遠，倒也不足為奇了。

我們接著看到，自 2000 年陳水扁政府上任以來，李登輝其實一直與陳水扁都保持著十分良善的互動關係，那麼為什麼這兩位前、後任總統，關係不再，甚至是進入空戰、各自在媒體上放話攻訐呢？相互看不慣作風、各擁政黨上的票源搶奪紛亂，以及 2006 年陳水扁爆發疑似貪瀆弊案時李登輝的負面反應，可能都是一步步堆疊兩人終將交惡的主要原因。

李登輝最早與陳水扁關係出現裂痕的時間，應當就是李登輝協助陳水扁 2004 年順利連任後，當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一役。如同本文先前在「台灣團結聯盟關係」時指出，當時候的台灣國會，有著大綠（民進黨）與小綠（台聯黨）聯合的泛綠陣營存在，那是為了寄望透過結盟的相互合作，來推動總是被泛藍陣營（國、親、新黨）杯葛、否決的各項國政執行。

作為執政黨總統並兼任黨主席的陳水扁，與作為卸任總統並被奉為台聯黨精神領袖的李登輝，就在各自盤算與希望自己政黨能夠取得國會更多議員席次的情況下，開始了相互放話、批評與指責的情形。李登輝說：「在台灣，總統握有極大的權限。但是，政治這東西畢竟要靠協商。不能因為握有政權，執政黨就要掌控所有的政治決策。對待在野黨，也需深思熟慮，讓權力能自然地釋放共享。但民進黨並沒有充分意識到這點。結果，民進黨和台灣團結聯盟（台聯）組成的執政聯盟（綠營，源自民進黨旗顏色），與國民黨、親民黨的在野聯盟（藍營，源自國民黨旗顏色）之間，兩邊陣營的對立日漸加劇」（李登輝 2015：121）。

承著上述李登輝的話來討論。李登輝：「對待在野黨，也需深思熟慮，讓權力能自然地釋放共享」，看起來所謂的在野黨，是其後指稱的「泛藍在野聯盟的國、親兩黨陣營」；但真真正正的執政黨是民進黨，任何只要不是此政黨的其他黨，廣義上來說，都是在野黨。即使台聯在策略上是採取與民進黨合作，但是實質上台聯也是「在野黨」，與其說李登輝是在希望為台灣當時近乎陷入空轉的國政推動解套，為泛藍陣營（在野聯盟）尋求與執政黨對話的可能，倒不如說，他也希望能為自己主導的台聯小黨，換得更多與民進黨對話的資源與空間。

> 時序進入二〇〇六年，陳總統家族身陷貪瀆醜聞，朝野政黨間的對立已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更糟的是，受到政治氣氛影響，社會整體陷入兩極化的僵局，一到選舉，就瀰漫著針鋒相對的氣氛。政治人物不是在進行政策論辯，而是傾全力互相找碴、互扯後腿。立法院裡立法委員的政策論辯，與其說是進行論點的攻防，不如說是展現語言暴力的競技場。國防和民生預算相關法案都無法過關，政府機能停擺。（李登輝 2015：123）

不同政黨本來就存在著本質上競合的微妙互動關係。在相同的理念與價值，共同奮鬥；在不同的政策論辯、路線分歧，自然會互相攻訐，各自表現。在面臨自己的政黨是否能持續佔有一席之地，選舉必須一分高下，決定勝出的席次考量下，任何政黨間的較勁與各自爭取選民的支持，都是十分能夠理解的必然發展。然而，在李登輝與陳水扁逐漸針鋒相對之後，「二〇〇六年九月七日台灣總統府

公開承認，上個月陳總統曾在總統府內聽取檢察當局相關簡報，總統夫人吳淑珍也在同一個月接受類似的簡報。此舉引起在野黨嚴辭抨擊，陳總統本身『涉嫌挪用國務機要費』同樣遭受各方質疑」（井尻秀憲 2010：200）。

「扁案」的爆發，連帶著李、扁兩人的戶動，已非純然「政策建議」或是「政黨競爭」這類的先、後任總統關係與情誼了。因為，國家領導人的操守與清廉，絕對是受到百姓人民拿最高倍數放大鏡來仔細檢驗的重要大事。於是，彼時的李登輝，是怎麼樣評論與看待身陷貪瀆風暴的陳水扁總統，就是既有趣有值得深入觀察的事件；畢竟，李登輝可是做完 12 年總統之後，安全下莊呀。

李登輝選擇與清廉正義站在一起，「2006 年阿扁總統的幕僚、家人涉案乃至自己的國務機要費案沸沸揚揚，李登輝不但袖手旁觀，有時還發表批扁言論」（見陳儀深 2007）。或許，涉案的陳水扁，至今仍舊沒有因為「保外就醫」、「時過境遷」而走出清廉、誠信的泥淖；也或許，扁案的審理過程各界都有自己心裡的一把尺與檢視標準，吾人也理解、尊重「無罪推定」的基調與其代表的法律正義。但是，無論陳水扁及其家人究竟有無違反台灣法律規範，就李登輝的標準來看，可能這不應該是身為國家領導人所應當走近的死胡同裡頭。

即使法律未臻完善，許多爭議都在模糊地帶之中，作為國家元首本就該有至高的道德以及愛惜羽毛。陳水扁沒有把關好自己的清廉，甚至「總統親信、曾擔任總統府秘書長的陳哲男，涉及高雄捷運關說而被起訴（一審無罪）；陳總統女婿趙建銘涉嫌股票內線交易遭起訴」（井尻秀憲 2010：201），想必都令李登輝所不齒。崇尚道德如李登輝會做出批判、會選擇切割，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當然，李登輝於扁案爆發時的種種批扁發言舉措，也觸怒了向來無怨無悔的陳水扁死忠支持者，「當北、南、東社成立的『過程』，一方面與阿扁互動密切，一方面又要拉李來擔任榮譽總召集人，結果李登輝臨時拒絕出任，並且不出席台灣社的成立大會，讓社長吳樹民尷尬不已。於是，很多綠色電台的聽眾不斷 call-in 批李，說他是『黑金教父』，任內沒有處理國民黨產、栽培連宋馬等人『長大』、不應該成立台聯黨等等」（見陳儀深 2007）。

李登輝與陳水扁的嫌隙愈來愈深，隨著「紅衫軍」倒扁的民間聲浪推波助瀾，這兩位前、後任總統，漸行漸遠，一直到 2018 年 1 月 15 日，入獄 6 年後獲得「保外就醫」的陳水扁，在李登輝生日這天，「前總統陳水扁下午由兒子陳致中陪同前往翠山莊祝壽，彼此談了一些過往開心的事，還相互贈書，也一起喝台灣茶、吃鳳梨酥，氣氛歡樂。李登輝與陳水扁過去被媒體形容『情同父子』，但兩人已經 12 年未見面，今天的這場會面外界形容為『世紀破冰』」（中央通訊社 2018），才似乎盡釋前嫌，讓兩人不再形同陌路。

第三節 我是不是台獨教父的我

李登輝是否具有台獨思想？一直以來都是各界關注的焦點所在。不過通常一個人的內心中是支持兩國統一，還是渴望台灣獨立，只要不是任職於政府部門的高位，往往不太容易引起他人的注目。回想 1972 年李登輝剛剛得到第一份高階公職：行政院政務委員時，乃至於後來出任官派的台北市長、台灣省政府主席，他的統獨時間在那些職務的歷練階段中，並沒有真正受到世人檢視，也沒有被所謂的政敵刻意地拿出來討論。

直到 1984 年蔣經國在尋找連任總統搭檔的副總統人選時，成為熱門人選之一的李登輝，開始必須為統獨立場作一明確的表態，李登輝採取了嚴厲批判台獨的立場。是的，官拜台灣省主席，即將可能成為副總統的李登輝，當時候是明顯地展露堅決反對台灣獨立運動。

當時的李登輝究竟是否出自真心表達反對台獨的立場？蔡石山觀察道：「李登輝必須對他的黨負責，必須對提拔他的蔣經國有所交代，就能知道他只能那樣回答的必然性。另外就是時機還未成熟到可以讓他對台灣獨立表達同情的立場，因此為了確保政治生命安全，李登輝必須時時穿著適當的政治救生衣，跟著當時國民黨既定政策而行」（蔡石山 2007：221）。

以上，是早期李登輝面對職務身分的必須，或說是對謀求未來職位所做的吞忍，清楚表達堅決反對台獨的立場。而我們也都知道，後來在 1988 年因繼任而

成為總統的李登輝，透過接下來兩次選舉的勝利，李登輝一步步坐穩了掌舵台灣的大位。那麼再無權勢壓迫，也無需在謀求任何政治職位的他，是否因此而展現出他真正對於統獨立場的心性？以下，我們將透過在李登輝卸任後，幾次重要的「台獨立場」思辨，包括媒體報導的「放棄台獨」說、李登輝自己不斷強調的「從未主張台獨」，以及重要的新書出版，來觀察他究竟是真、是假的台獨教父。

一、 放棄台獨的轉向風波

> 出生在多次遭外國勢力征服的台灣，李登輝與三百多年來數以百萬計的台灣人一樣，心中總是帶著一股反抗情緒。如果李登輝未曾提出過台灣海峽兩岸是國與國特別關係，反而會讓李登輝變得很「不台灣」，而且也很「沒有李登輝特色」。如果李登輝沒有企圖去尋找台灣獨立的可能性，他勢必被許多人視為是膽小怯懦的國家領導人。總而言之，李登輝最高的政治理念是要確保台灣的自由、獨立與主權。（蔡石山 2007：325-326）

上述這段文字，取材自蔡石山（2007）的著作：《李登輝與台灣的國家認同》中最後結語的部分。在蔡石山的論述中，認為李登輝是一個支持台灣獨立的政治領袖，並且透過身體力行的方式，試圖在不同時期的各個角色，都能充分發揮引導台灣人民走向正確的道路。

而在柯義耕（2008）的著作：《台灣政治家：李登輝》中，也多次提到，柯義耕認為李登輝是一個台灣獨立支持者。柯義耕在解釋為何有此著作的理由時談到：「寫作本書的第二個理由，是為了解釋李登輝如何小心地、寧靜地促進台灣的獨立自主。……李登輝在支持一個中國意識形態的同時，還秘密地推進台灣的獨立自主這件事」（柯義耕 2008：6-7）。

以上都是他者對於李登輝是不是一個支持或者從事台灣獨立運動的表述，也是外界普遍對於卸任元首後的既有印象。或許，李登輝在各個公開演講場合、或是個人著作中，從來不曾把話說得直白：「我主張台灣獨立」，但是在李登輝卸任後的十餘年間，經常性參加「台獨團體」舉辦的各項活動，選擇與激進、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群眾站在一起，這些舉措，都讓人視之為李登輝支持台灣獨立。

不僅於此，李登輝一手協助於 2001 年創立的台灣團結聯盟政黨，更是貼上鮮明倡導台獨的標籤。李登輝成為前總統之後，對於台灣是否成能為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向來是念茲在茲的；但李登輝式的台獨言論，卻也部會挑明地說，而是透過許多種不同的方式，來承述李登輝心中認可的台獨立場。例如「台灣認同」的標記，就是李登輝時常傳達的一種理念。

李登輝說：「台灣民眾已經和五十年前完全不同，出現明顯的『質變』。五十年前被外交政權洗腦，大部分台灣人不疑有他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相對的，今天大多數台灣人都已認清，過去強調台灣人是中國人的說法，不過是『捏造歷史』、『虛構的想像』。按理說只要台灣人能由信念堅定的領導者帶領，進一步擺脫偽造歷史與虛構想像的束縛，台灣人對『台灣是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的自我認同，應該能更加確立」（李登輝 2009：126-127）。

這就是李登輝，明確區分「中國人」與「台灣人」的不同，沒有任何混淆的空間。但在現實上，中國一向奢望能與一起台灣朝向統一的道路，且不斷透過各種手段來逼迫台灣妥協，李登輝在「〈台灣海峽和平與亞洲安全〉論文中點出，『併吞台灣是中國最重要的國家綱領之一，共產黨認為，中國缺少台灣這塊就不算統一，非吃下台灣不可』，也所以，二〇〇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企圖正當化侵略台灣的行動」（李登輝 2009：125）。

面對中國片面追求統一大業，李登輝明白地表達他作為一個台灣子民、卸任元首，是不吃中國這一套的。即使中國祭出武力威脅、法律條文，李登輝仍舊認為只要台灣人民堅定民主自由的信心，並且深刻積累對台灣「是主權獨立民主國家」的自我認同，台灣人沒有什麼好畏懼的。文行至此，大抵可以說，李登輝是一位支持台灣獨立的卸任國家元首，但似乎仍然遇上不同的解讀與質疑。

事情就發生在：「『李登輝轉向』、『放棄台獨』—— 二〇〇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出刊的《壹週刊》（大眾路線週刊）刊載了這樣的標題。於是，掀起了關於台獨的大辯論，人民也被捲入這場論戰之中。『放棄台獨』的說法，是編輯擅

自下的標題，不是我說的話」（李登輝 2015：124）。已經卸任總統近七年的李登輝，國族認同的情況與是否支持台灣獨立，仍舊是媒體能夠藉機炒作的賣點。

事實上，李登輝卸任期初的幾年當中，大批興趣於李登輝研究的不論媒體、學者、文字工作者，不分國內外，紛紛找尋機會與李登輝進行訪問、訪談，一時間「李登輝研究」貴為顯學，因為，李登輝除了曾經主整台灣 12 年、當過日本人、領導國民黨之外，李登輝一生的經歷與生命歷練，也著實充滿張力與傳奇。

回到《壹週刊》對李登輝的訪問上。從上述中我們可以得知，所謂「放棄台獨」是媒體自身的解讀，並非李登輝個人的言論。要知道，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每一個人每一天所可能碰觸到的訊息，難以計數；在競爭激烈的媒體行業裡頭，常常為了吸引讀者的目光，下了許多或許「腥羶色」的標題，不然，恐怕閱聽者不會買帳，自動忽略該則消息。《壹週刊》很可能基於一慣的媒體下標操作手法，來刺激這一則專訪的張力、誘發讀者們的好奇，內容當然也就不一定趨近於真正的事實。讓我們來還原李登輝當時所要表達的意思：

> 我真正的意思是：「台灣已經是獨立的國家，現在沒有必要再宣告獨立了。」戰後台灣由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施行一黨獨裁統治。但是一九九六年的總統直選，人民已經能夠自己選出國家領導人。也就是說，台灣從外來政權的統治中解放了。更何況，那時台灣出生的台灣人當總統，是民進黨執政的時代，如此看來，可以說台灣是「完全獨立的國家」。所以我才會說，台灣就已經是獨立的國家，沒有必要再主張獨立了。（李登輝 2015：124）

李登輝的說法，指的是媒體扭曲、誤解了他的原意，但是李登輝在 2007 年就直觀地認定「台灣已經是獨立的國家，沒有必要再主張獨立了」，顯然與大眾的認知產生落差。當然李登輝自己也理解，「『壹週刊』是特別重視銷路的大眾化雜誌，……為了能吸引讀者閱讀，經常用很聳動的標題。……除非讀完，否則是無法清楚了解訪談內容的，大部分人卻沒有仔細讀報導，就說三道四」（井尻秀憲 2010：219）。

隨後，為了更加精準傳達李登輝想要表達的意念，李登輝「找來 TVBS，在《壹週刊》刊出的當天中午接受專訪。我告訴 TVBS，《壹週刊》的報導有些並不正確，某些狀況不是事實。我強調，自己多年來始終堅持台灣主體性，但我認為不必整天喊『獨立』。明明台灣已經是獨立的國家，為什麼現在還必須高喊『獨立』？台灣內部只會以『台灣獨立』當火種而相互鬥爭」（井尻秀憲 2010：219）。

李登輝清楚回應與否定了來自《壹週刊》標題中的「放棄台獨」說。對於李登輝而言，他絕非放棄了台灣獨立這條道路，而是他更進一步地認為，「台灣已經是獨立的國家」，也就不再需要高喊獨立。對李登輝來說，1996 年台灣成功地轉型成民選總統國家之後，已經從外來政權的統治中解放；2000 年以後，連續兩次的總統大選，也都是由象徵本土政權的民進黨贏得勝利，澈底擺脫外來政權統治的陰影，台灣當然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了。

李登輝的說法，的確有助於釐清「放棄台獨」這般看似不再支持台獨的言論；陳儀深整理說到：「重要的是，此篇專訪[TVBS 專訪]中李登輝澄清自己的統獨論述，包括：1.我從來沒有主張過台獨，因為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有主權的國家，已經獨立為什麼還要追求獨立？這樣說並不牽涉到『放棄』獨立主張的問題；2.台灣還不是正常的國家，需要正名與制憲，並且應該以『新時代的台灣人』來解決認同的問題；3.台灣和中國『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從廢除臨時條款進行國會改選的民主化，成立陸委會、海基會作為兩岸之間的平台，才有辦法處理雙方之間的問題，這些所謂的寧靜革命，立場都是一貫的」（見陳儀深 2007）。

陳儀深之所以會撰文談論有關李登輝因媒體採訪過後引發的「放棄台獨」風波，主要原因在於探討：「談李登輝先生 2006-2007 的變與不變」（見陳儀深 2007）；而所謂變與不變的內容，是在討論李登輝的台獨立場是否如同外界繪聲繪影的「變質」。陳儀深持的是反對意見，他認為，李登輝仍舊維持一貫的立場，持續進行著李登輝式的寧靜革命。李登輝依舊是支持台灣獨立的。

不過，面對時局的變化，李登輝並沒有僵固思想、裹足不前，我們可以從李登輝接受 TVBS 專訪中看到，雖然他認為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絕非是

一個正常的國家。於是如何讓台灣成為一個真正的正常國家，是接下來所有「新時代的台灣人」，所必須共同面對的。我們接著看：「追求國家正常化」。

二、 追求國家正常化

> 台灣尚未擁有主權，還不是正常國家，日本法務省（法務部）認定，台灣人的國籍是「中國籍」，原因在此。我認為，自己最大使命就是扭轉這錯誤、不合理的現象，讓台灣走進世界，和各國平起平坐。有朝一日台灣成為「正常國家」，任務結束，我將瀟灑揮手，離開政壇。（李登輝 2009：59-60）

上述這段話中，我們清楚看到，對於李登輝繼續留在台灣政壇奮鬥的主要原因，乃在於目前的台灣，還不是正常國家；李登輝希望，他終究能夠看見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這是 2009 年李登輝的著作：《最高領導者的條件》中，李登輝自述的一段話。當時的李登輝在書籍出版時，已經高齡 86 歲了，依舊心繫台灣國家正常化。不過，也能夠於此當中見識到，李登輝老先生的十分樂觀，在他的言下之意，他肯定認為自己在有限的年歲裡，是有機會等到台灣成為正常國家的那一天；也或者，他對於台灣邁向正常國家，是深具信心的。

我們也在這段話中觀察到，當李登輝在引述他國對我國的主權認定以及國籍類別時，所採取的官方視角，正是來自李登輝向來具有情懷所在的日本政府。李登輝在年少時曾經接受完整的日本教育、一度嚮往到位於廣義裡中國土地上的滿洲國生活，也曾經在步入職場後，兩度前往美國接受西方教育；但是當談論到有關台灣主權爭議時，李登輝沒有選擇美國、更不可能選擇與我國敵對狀態的中國，而是選擇了日本視角來詮釋台灣主權的現況，這是很微妙的事情。

或許我們從「我很感謝青少年時代所接受的優秀日本教育。回顧自己的成長，我想形成我這個人的人格等各項特質主要原因包括：『本性』、『台灣精神』、『日本精神』、『基督教』，其中最關鍵的則是日本戰前的教育，其優異制度讓我從小透過教養進行精神格鬥。這部分成為精神核心，後來才能在此基礎之上培

養台灣精神、信仰基督教」（李登輝 2009：140），這樣的敘述中，去理解為何李登輝經常在思考時，常以「日本的視角切入」；源自於他所認可的「日本精神」。

接著，讓我們進入到李登輝口中說的：「台灣成為正常國家」的實質內容。李登輝在卸任元首之後，不只一次認真地提到台灣必須正常化，那麼也就是說，現在的台灣，其實並不正常。不正常的地方到底指的是什麼？且讓我們一起跟著「阿輝伯」的視角，審視台灣出現哪些不正常狀況，以及要達到哪些目標，台灣才會成會李登輝認定的「正常化國家」。

> 我們不只叫做台灣，我們實質上更是一個國家，是一個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但問題是，就法律而言，我們真的已經是如假包換的國家了嗎？這就是問題所在。不待言，正如我們之前在《台灣二十一世紀國家總目標》之中所指出的，台灣並不是正常的國家。因為台灣本身沒有憲法，到現在還使用中華民國這樣的國號。所以，我們必須認真檢討這個問題，深入探討台灣民主化停滯這項危機背後的根本結構。（李登輝 2013b：144）

如上述所提，李登輝再次強調，「台灣並不是正常的國家」；延伸出來的問題，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正名與制憲」。這是目前台灣之所以還不能稱之為正常國家，李登輝認為遭遇最為明顯的困難之所在。國號是中華民國，用的憲法也還是中華民國憲法；台灣還不被國際間認同為一個國號、台灣沒有一部屬於自己的憲法，都是台灣人所共同面臨的國家不正常現象。

此點，也是當時執政的民進黨政府想要貫徹的主張，「[2004 年]成功連任之後，扁政權核心人士有一項很明顯的共識，那就是必須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民進黨人認為，二〇〇八年之前北京軍事侵略台灣的可能性極低[2008 年奧運在北京舉行]，因此，不妨趁這四年推動、建立台灣的國家自主性與主體性，具體做法則是二〇〇六年制定新憲法，二〇〇八年開始施行」（井尻秀憲 2010：186）。

然而在現實環境中，台、中關係向來緊張與不曾間斷的對立，亟欲併吞台灣的中國，對於任何想要改變現狀的舉動，一向都會反應十分過度，面對扁政府的主張，中國在「陳總統就任之前的[2004 年]五月十七日，由黨中央台灣工作辦公

室與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表針對台灣措詞嚴厲的『聲明』，就職演說發表後仍持續激烈批判扁政權」（井尻秀憲 2010：187）。

這就是台灣長期所無可避免的中國強權打壓，一直無法走向明朗的正常國家道路。那此次與李登輝不謀而合的「制憲」主張內容為何？「陳總統在[2004 年就職]『演說』中，針對憲改與新憲法也有說明，而他在此避免使用選前積極鼓吹的『制憲』，改用『憲改』，……不說『制憲』也不把『國家主權、領土、統獨問題』納入『憲改』問題，可想而知，陳總統主要是顧慮中國的感受，同時避免與美、日反對『海峽兩岸片面改變現狀』的主張相扞格」（井尻秀憲 2010：187）。

無論是 2000 年接替李登輝執政的陳水扁政府，還是在此之前主政台灣 12 年的李登輝政府，對於任何挑動台、中兩國敏感神經的舉措或論述，都必須戰戰兢兢地處理，沒有誰可以比較幸運的問題；李登輝也說：「我們可以這樣講，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的麻煩都是來自中國。台灣與中國關係能夠得到釐清，台灣就可以長治久安了」（李登輝 2008c：250）。另外，也同樣如自兩蔣時代以來的氛圍，台灣同時也必須顧與考慮美國官方的觀點與感受。

正名、制憲之路，是李登輝與當時民進黨政府共同有的共識。然而權力掌握在手的陳水扁政府，都無法透過公投、各種迂迴的方式達到成功，更何況是不在位子上的李登輝。但李登輝願意指出台灣未來應走向的道路，總是好的，只是有帶國人繼續努力以及凝聚更高的共信共識。於是，李登輝點出台灣無法成為正常化國家的另一個問題，於此浮現，國人的 —— 台灣認同 —— 問題。

> 台灣的國家自我認同，首要課題無疑是「存在」與否。雖然常有人說，「台灣實質上已經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這樣的國家是否已經是法律上完整的國家，仍有討論的餘地。……各項調查顯示結果，愈來愈多台灣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或者不否定自己是台灣人，這顯示隨著民主發展，台灣各族群逐漸融合，對「台灣人」有更高的認同感。只是，與此同時，台灣也再度出現特有的民族問題，也就是族群對立 —— 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摩擦 —— 成為可能導致政治社會混亂的火種。「自我認同」代表一個人的存在與希望。

當自我認同陷入危機，人們就會失去希望，民心渙散、政黨支持率下降。（李登輝 2009：121-122）

在台灣邁向成為「正常化國家」的道路上，李登輝先是提出了必須正視的「正名」、「制憲」主張，接著，他也道出了目前整體台灣國人是否認同自己國家的危機存在。李登輝同時點出了台灣內部長期存在的矛盾與衝突。所謂「統、獨」，通常指的是「與中國統一」對照「台灣獨立」的這個解讀方式；在台灣，支持兩國統一的訴求群體中，「外省族群」佔了很高的比例，原因無法詳述，但至少確定的，所謂的「外省」，許多第一代成員，正是來自彼岸的中國，稱自己是「中國人」、對「中國有認同」，這是現實上存在的既定事實。

而傾向支持「台灣獨立」的群眾，裡頭當然也有外省族群存在，只不過在省籍對立的另一端，「本省人」才更是支持台灣獨立的主體。不過當李登輝提出「新台灣人」這個論調後，他就是希望台灣人能更打破過去守舊的省籍意識，不分族群、不分先來後到，應該團結一致；每一位都是台灣這個國家的主人。但是國人同胞是否有這份自知？成為了決定台灣能否走向正常的至要關鍵。

為了國家自我認同能夠確立，以期台灣早日成為正常國家，李登輝不斷地在這件事情上琢磨。「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教授曾探討，每年湧進數十萬移民的美國逐漸失去國家一體感的問題，……雖然形式與內容各異，大多數國家都面臨國民自我認同的問題。……這項問題和台灣目前的處境非常類似」（李登輝 2009：121），也就是所謂台灣面臨的「杭廷頓現象」。

更具體地說，「杭廷頓教授所列舉可能防礙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繼續推動民主的三大因素，台灣某種程度而言可說都具備了。……除此之外，台灣還有許多必須克服的難題，其中包括皇帝型的領導方式、軍備不足、民主化過程中族群持續對立、……這些不利因素都可能威脅台灣的正常發展，造成混亂。但其中國家領導人首要迫切處理的，是如何重建民眾的國家認同」（李登輝 2009：124-125）。

我們看到李登輝在力行推動與追求台灣國家正常化的路上，前述兩個重大問題李登輝是如何主張來化解。李登輝將兩大問題融合成一個解決方式，「我們該如何讓台灣人建立台灣的自我認同？我想最關鍵的做法是推動民主化。推動民主化過程中，最後的結果我想就是，居住在這個國家的民眾認同這個國家。也因此我在《台灣二十一世紀國家總目標》之中提到，應該透過制定新憲法的動作，確立台灣人對台灣這個國家的自我認同」（李登輝 2013b：158-159）。最後：

> 什麼是台灣的國家正常化？就是將國號從中華民國改名為台灣，並且由台灣人親自制訂符合台灣現狀的憲法。這並不容易。中國必然會施壓，即使在台灣內部，也有許多需要突破的障礙。要讓國家正常化，不可或缺的一步，就是必須確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這個「共識」（李登輝 2015：126-127）

第四節 此一時期國族認同狀態分析

結束了上一時期長達十年的主政台灣光陰，曾經叱吒台灣政壇、大權在握的台灣人總統李登輝，隨著任期的到任，順利地和平轉移了國民黨超過半個世紀的執政權。李登輝也在同時，回復到了 28 年前身上沒有一官半職的平民狀態；當然，他成為了「卸任國家元首」，的確也不是一般常民所會遇上的退休狀態。

承接前一時期 1999 年李登輝提出石破天驚的「特殊兩國論」，在執政晚末台灣認同逐漸明朗化的李登輝，在進入本時期之後，又將呈現什麼樣不同的國族認同樣貌？是會繼續完成新萌發的國族認同生成，或是退回原先既有的國族認同狀態？這是吾人所關心並且需要持續抽絲剝繭的。

於此，我們先是確立了李登輝揚棄了「中華民國認同」；中華民國成為李登輝眼中需要「更改國號」、「制定憲法」，亟待邁向正常化的國家。同一時間，成為卸任元首的他，沒有因為權位的交出，而停下關心國家的步伐。李登輝依舊十分地關心國家大政，並且持續組織並提供專業意見，希望他愛的國家能夠更好。

在卸任元首之後，李登輝更成為了外界眼中積極投身台灣獨立運動的「李前總統」，他透過參與各項有關提升台灣意識、建立台灣認同的會議或活動，不斷地倡議與協助台灣真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在這當中，最為引人矚目的，包括了 2004 年總統大選前，李登輝帶頭參與了萬眾矚目的「二二八百萬人牽手護台灣」活動，在活動中充分表達支持台灣獨立的意志與決心。

甫於上一時期完成「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認同的李登輝，一成為卸任元首之後，「中華民國」似乎再也與之無關。在位時完全迴避「台灣獨立」議題的李登輝，卻在此一時期做出明確且巨大的轉變。這是他個人在國族認同上的抉擇，卻也是台灣國族認同是否有著更加強而有力的領袖型人物願意參與其中的關鍵。

因為在李登輝身上，除了是卸任元首的重要身份之外，同時也是一位長期於公眾的場合中，大力批判、反對台灣獨立的國民黨當權人物。李登輝的親身投入台灣獨立運動，如同李登輝成為第一位台灣人總統時的情況相同，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象徵所在。李登輝的國族認同狀態，是否在前一時期進入「遭遇期與沉浸期」之後，能夠在本時期朝往「內化期」前進，並呈現「台灣獨立」的台灣認同狀態？以下，將分成三大項目：「中華民國認同揚棄」、「卸任後的國政關懷」、「具體展現台灣認同」，藉此一一推敲此時期李登輝的國族認同狀態。

表 7-1：本階段時代大事與生命史事件：走回體制外的卸任元首早期

時間	時代大事	生命史事件
2000 年		5 月 20 日，正式成為卸任元首
		5 月 30 日，於淡水台綜院成立「卸任總統辦公室」
2001 年		4 月 22 日，以「赴日就醫」名義，達成在卸任後首次訪問日本的實質目的
		8 月 12 日，協助台灣團結聯盟黨成立，成為該黨精神領袖
		9 月 21 日，遭國民黨開除黨籍
		12 月，成立「群策會」
2003 年		2 月，成立「李登輝學校」

2004 年	3 月 20 日，民進黨籍陳水扁連任成功，當選第十一屆總統	2 月 28 日，發起「牽手護台灣」動，守護本土政權、協助陳水扁拚連任
2005 年	3 月 14 日，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一、　中華民國認同揚棄

上一時期呈現「中華民國在台灣版」台灣認同的李登輝，進入此時期最重要的國族認同轉變，即是「中華民國認同」的揚棄。在進入如此重要的區隔之下，筆者同樣有著三個主要的依靠，來說明何以主張李登輝沒有了中華民國認同。此三個依靠，分別是：「與中國國民黨分道揚鑣」、推動「正名制憲與國家正常化」，以及訴求「民主化與台灣的本土化」。我們先從「與中國國民黨分道揚鑣」談起。

「離開坐了十二年的總統席位，緊接著在選後交出黨主席棒子的李登輝，住在離台北都心約一個鐘頭車程的桃園縣。宅院位於背有高爾夫球場的大溪山莊一隅，他此刻的心境正如悠然自得的錦鯉一般」（上坂冬子 2001：20）。這是日本作家上坂冬子在李登輝卸任之後，到李登輝住所進行訪談之後，寫下的一段文字。

李登輝的任期到任，離開總統寶座是民主制度下的必然結果；但是 2000 年總統大選結果揭曉不久後，就被迫交出國民黨主席的職位，這肯定是李登輝始料未及的政治鬥爭戲碼；這也就是李登輝所說：「面對政權轉移，外省人眷戀獨裁體制的反彈力道非比尋常，導致我後來不得不離開國民黨」（李登輝 2015：118）。

我們無從得知前述上坂冬子寫下李登輝的心境是一種描摹下的比喻，還是李登輝分享當下心情後，她的解讀下筆；但我們可以想像，終於可以放下台灣這個國家的重責大任，或許李登輝的心情能夠輕鬆許多。至少，李登輝的確完成了應當擔負的階段性任務，他苦心於國民黨內將近 30 年的付出，總算有了開花結果。

李登輝也說：「我常常說，國民黨雖然充滿矛盾，但沒有國民黨的力量，就無法推動台灣的民主化。事實上，如果沒有發揮國民黨的龐大力量，我想大概什麼都做不成吧」（李登輝、小林善紀 2001：110）。離開國民黨，是面對選後國

民黨內不願接受敗選結果的必然發展，成為卸任元首的李登輝，接受了這樣的事實；也或許，對他而言正是一種釋然，如釋重負的自由感。

蔡石山說道：「在經過 2000 年總統大選之後，李登輝與國民黨正式決裂，似乎無法解決的台灣政治爭議對立也更為加深。李登輝背離國民黨究竟是一項精心計劃？還是他多變個性使然？或是現實對李登輝的命運安排？……李登輝的政治大轉變其實是既正常又可貴，因為這正是李登輝勇氣與心胸開放的表現」（蔡石山 2007：321）。總之，李登輝脫下了中國國民黨的外衣，開始走自己的路。

沒有了總統與黨主席身分的李登輝，在 2001 年時連國民黨員的身分都沒了，起因於在他主導與授意下，成立了新的政黨：台灣團結聯盟黨。這一個本土政黨的誕生，緊密扣連著李登輝卸任後的早期生活。因為台聯黨的台獨立場鮮明，被奉為台聯黨精神領袖的李登輝，自此也直接地被貼上了台獨的標籤。這當然是離開中國國民黨這個以「統一」為核心信念政黨的巨大轉變。

台聯黨成立之後，視之為李登輝「重出江湖」的表徵。所謂江湖，也就是李登輝再熟悉不過的台灣政壇。為了遏止因為民進黨政府上台形成的執政與在野黨相互對立，李登輝催生了一個新興的本土政黨，為的是可以平衡兩相失衡的朝小野大情況；台聯也就成為執政的民進黨，能夠相互合作的最佳盟友。

一生從政都與國民黨緊密相連的李登輝，卸任總統之後卻再也沒有與國民黨合作。李登輝帶領著台聯黨，扮演起民進黨的側翼，讓本土政權執政能更加順利；而在推動台灣獨立的立場上，甚至超越民進黨的腳步，走得更快、走得更激烈。明顯的切斷與中國的關聯，抗拒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是台聯的建黨宣言；但在台聯黨上著力甚深的李登輝，倒不如說，台聯的主張，正是李登輝的主張。剛成為卸任總統的李登輝，想要做的一切，都透過台聯黨展現在世人面前。

綜上所述，面對離開國民黨、協助成立台聯黨的情況柯義耕甚至直接推定李登輝：「在位時，既不曾公開宣稱統一幾乎已經是個死議題，也並未暗中打算推翻國民黨。因為他相信，唯有國民黨才能使台灣和平轉型成為一個民主社會。等

到他下了台，而台灣團結聯盟也已經成立後，他便可以全力的支持台獨了」（柯義耕 2008：295）也正是吾人所說，至此，李登輝開始揚棄「中華民國認同」。

接著我們看到第二個重要的依靠：「正名制憲與國家正常化」。事實上，於此時期李登輝成為卸任元首之後，他的「國族認同」為何？並不全然能夠如同以往在總統任內時，有著重要且顯著的影響力。於是已經呈現揚棄中華民國認同的李登輝，開始展現他言行一致的積極作為，提出更改「中華民國」國號，讓人見識到卸任之後的李登輝，最為大膽與明顯轉變的重要記號。

自從 1972 年正式成為行政院政務委員，一腳踩進「中華民國」這個偌大的國家政府體制內之後，中華民國與李登輝的直接關聯，也就從來沒有少過。即使是在卸任總統之後，他仍然是中華民國的卸任元首，享受著「卸任元首禮遇」。李登輝與中國國民黨分道揚鑣之後，似乎也開始了與「中華民國」的切割。

當然這是一個「一系列」推動「國家正常化」的宣稱，更改國名，只是其中一項環節；為使台灣能夠走向國家正常化，尚且有許多需要努力克服的準備工作。如同前原志保說道李登輝：「提出了更進一步的正名運動或者制定新憲法等， 需要脫離『中華民國』的框架達到『台灣的國家正常化』」（前原志保 2014：201）。

脫離中華民國框架，亦即一步一步放下了中華民國認同。那麼捨棄中華民國認同，李登輝又是為哪樁在鋪陳？李登輝說：「深入冷靜思考就會發現，台灣還不是個正常國家。台灣本身沒有憲法，而且還使用中華民國國號。台灣若要證明自己存在，當然必須有更明確的形式，也就是形成一個國家」（李登輝 2009：122）。形成以台灣為名的正常化國家，成為卸任元首李登輝首要關心之所在。

李登輝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有了如此巨大的轉變，國族認同的擺盪，呈現出天平的兩端。或許出走國民黨不等同斷了與中華民國的關聯，但是主導台聯黨成立、主張更改中華民國國名，以及推動台灣制訂自己的憲法，顯然遠遠超出中華民國認同的範疇。也許這正是彭明敏所說：「總感覺李登輝常在台灣人總統與國民黨主席兩角色中交戰，以致前後矛盾，身分衝突，必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直到卸任後，李登輝才真正還原自我」（鄒景雯 2001：89）。

第三，則是李登輝持續訴求「民主化與台灣的本土化」。李登輝會選擇走向與「中華民國」分手，想要改掉這一個與他羈絆許久的國號，在卸任總統之後，李登輝的各種動向，展露無遺。表面上這是一套自李登輝恢復成為常民百姓身分之後的嶄新論述，但實際上若從卸任前一年，提出石破天驚的「特殊兩國論」來看，「一個中國」的舊有思維，早已不復在其不斷修正、轉變的國族認同之中。

時序再稍往前推，李登輝在執政末期，就已經在「教育」上著手「台灣化」的進行。一如黃文雄（2011：172）所說：「李登輝的歷史觀，大多濃縮在 1997 年台灣中學一年級的社會科（歷史、地理、社會）的教科書當中。其歷史觀扎根在台灣本土上，並沒有停留在中華思想當中，此種歷史觀的改變，從台灣的戰後史來看，可說是很大的教育改革」。

教育，是一個國家的百年大計。作為當時主政者的李登輝，將自己的史觀帶入了影響青年學子甚遠的教材之中，以台灣本土為基礎，做出與中華思想的區別，這當然是一個早已埋下伏筆的重大轉變。依此理解下，我們也就更能明白為何在李登輝卸任後，鼓吹台灣需要進行本土化與民主深化的原因之所在。

於此，中國認同與台灣認同的問題亦慢慢浮現；李登輝說：「對台灣來說，如何掙脫外來政權，就成了最大的問題。同時，究竟是認同中國、還是認同台灣的族群問題，也必須釐清解決。這是相當錯綜復雜的問題。台灣的民主化究竟有何目標？簡單來說，就是『台灣的本土化』」（李登輝、中嶋嶺雄 2000：35）。

交出中華民國執政權、卸下中國國民黨黨主席職務的李登輝，同時也向世人展現他的國族認同，從今以後中華民國再也無需走在前，剩的只是什麼樣更貼切的「台灣認同」。李登輝說：「事實上，中華民國遷移到台灣以後，已經漸漸的『台灣化』了。所以我以前說『中華民國在台灣』。不過，演變到最近，我認為應該發展到稱為『台灣中華民國』的地步」（李登輝、小林善紀 2001：96）。

二、　卸任後的國政關懷

在確立了李登輝「中華民國認同揚棄」之後，接著讓我們繼續看到李登輝在此生命時期尚有哪些重要的觀察所在，也就是「卸任後的國政關懷」。同樣，三個重要的脈絡，是筆者切下本段落討論的主要依據，分別是：「群策會等實體智囊組織成立」、「和平轉移政權協助新任總統」、「協辦二二八牽手護台灣活動」。依例，第一個進行討論的，即是「群策會等實體智囊組織成立」。

如同鄒景雯在《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中所說：「李登輝還有影響力嗎？這是一個膚淺問題，或許大家可以拭目以待」（鄒景雯 2001：375）。李登輝開始發揮在卸任後的各種國政關心。那麼要在卸任之後真正有效地作出實質的影響力，就不能只有被動式的接受媒體訪問或者僅僅成為諮詢上的窗口，李登輝必須有更實際的作為，才可能真正發揮他憂國憂民的影響力。

源自於新政府執政上的諸多困頓，看不過去的李登輝，才必須再次站上第一線作戰，讓台灣邁向更好。這是一個被動下誘發的組織式國政關懷過程。但出發，總要有個具體的方向。於是包括前述提過的台聯黨，及更早為之的群策會等，成為了李登輝用心投入的全新政治事業。也就是黃鈺淳提到的：「台聯黨、群策會、李登輝學校與李友會基本上就是以實踐李登輝的政治理念為中心，而結合政治實際、路線建構、幹部培訓及社會支持的『四合一』混合體」（黃鈺淳 2010：114）。

李登輝花費了諸多心力在上述「四合一」混合體當中。透過仍存有的人際網絡及豐沛學術資源的交疊，就是李登輝實際實踐關懷國政的重要方式之一。其他也可以看到如李登輝在「李登輝學校」中，「不斷的呼籲大家要建立台灣的主體意識，因為他深信台灣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唯有自由與獨立才能帶來長久的、真正的幸福」（柯義耕 2008：306）。李登輝善用手上擁有的各式宣傳工具與過人的組織能力，繼續關心與奉獻於他所心愛的台灣。

第二個討論的脈絡，我們看到：「和平轉移政權協助新任總統」。前述李登輝推動成立台聯的一大主因，就是希望協助新政府能順利執政，不會因為與泛國民黨陣營的交惡對立，讓台灣國政陷入空轉、停滯不前。換句話說，除了是幫助執政的民進黨之外，也就等同於幫助這個執政團隊的最高領導人：陳水扁總統。

陳水扁是擔任過台北市市長的人，任期是在李登輝主政台灣的 12 年當中，也就是陳水扁對於李登輝而言，絕非陌生。雖然這兩個人分屬不同的政黨，但李登輝亦曾經對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表達過高度的肯定；1998 年陳水扁尋求連任市長失敗後，「李登輝找他到總統府聊天，當面鼓勵他要重新站起來」（鄒景雯 2001：174）。想見李登輝一直對陳水扁有著好的印象與期待。

2004 年，李登輝沒有支持 4 年前支持的連戰，而是憂心本土政權無法延續，主動支持陳水扁政府，並為他舉辦了盛大的「二二八牽手護台灣」活動，幫助陳水扁順利連任。以上，都是李登輝與陳水扁的良善互動；但是政治上發展的樣態，總是充滿著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李登輝與陳水扁漸行漸遠。

第一個衝突的時間點，爆發在 2005 年的立法委員選舉。同屬泛綠陣營的民進黨與台聯黨，嚴重於票源上的高度重疊，出現了自己人扯自己人後腿的最不好發展。但是各自希望自己政黨贏得更多席次的李、扁兩人，經常隔空叫罵，也就因此傷了和氣，漸漸疏離。另外一個則是 2006 年陳水扁涉及貪腐弊案，道德標準極高的李登輝，當然不會袖手旁觀；公開發表了批評陳水扁的諸多言論，種下了兩人終須一別的主要原因。而這一別，就是 12 年。

李登輝在不在位子上後，依舊關心著台灣國政；但與其說他僅僅只在乎台灣的國家與未來，倒不如說他也是真的在看顧著陳水扁。陳水扁是台灣史上最年輕成為國家領導人的總統，李登輝是在蔣介石之後，主政台灣最久的總統，看在李登輝眼裡，他當然也希望陳水扁能夠做得更好、更像一位全民期待的總統。顯然最後陳水扁讓李登輝失望了，但這卻沒有影響到李登輝繼續為台灣努力打拚、繼續支持本土政權延續的決心。李登輝繼續身體力行著台灣獨立運動的進行。

第三，「協辦二二八牽手護台灣活動」，是李登輝卸任後關懷國政的著名表現。如同前述所提，卸任後的李登輝，依舊憂心於台灣的民主發展；其中脫離不了關係的核心所在，就是代表本土政權的民進黨新政府，在朝小野大的不利執政情況下，施政上始終綁手綁腳，也才有了李登輝需要重出江湖的老年不得閒。2004 年總統大選時，是攸關本土政權能否延續的關鍵時刻，李登輝必須再次出手。

於是一場前所未見的二二八「百萬人牽手護台灣」運動，在李登輝與各路支持本土政權延續人馬的匯流下，隆重登場。為了展現團結台灣的決心，年過 80 的李登輝，依然登高一呼，盼用生命的餘暉，照耀在堅決守護台灣主權的每一塊土地上；凝聚台灣人的向心力，喚醒台灣人民的危機感，也才可能在艱困的選戰中，持續守護本土政權。

當然在此也能清楚地看到，面對中國的威脅，李登輝在卸任之後，依舊站在最前線發聲；在他年邁的軀殼下，住著仍是那一位自年輕時候就不曾忘情的愛國青年李登輝。而這一場成功的活動，也成為了民進黨政府再次於 2004 年贏得總統大選的關鍵基礎。年邁卻又站上第一線的李登輝，功不可沒。

在柯義耕的觀察之中，說李登輝「不僅藉著這場活動譴責中國和國民黨，也向世人明白宣告他支持台灣的主權和獨立」（柯義耕 2008：267）。在此一生命時期離開國民黨、揚棄中華民國認同的李登輝，更加勇於抗拒來自中國的併吞霸權，也清楚切割了長期以來與中國國民黨的聯繫；透過國政關懷的種種作為，李登輝的台灣認同愈趨明朗，「台灣獨立」漸漸成為他國族認同的重要標籤。

三、　具體展現台灣認同

本段落末所要探究的，在中華民國認同確定消失之後，我們如何來映證、詮釋李登輝新建立的「台灣認同」。於此，三件有關台灣認同創生的具體事項，讓我們得以拼湊並指稱李登輝確實展現出台灣認同。這三大事項依序是：（一）新時代台灣人主張、（二）建立台灣國家認同、（三）若有似無台獨運動。當然，率先登場的，正是「新時代台灣人主張」。

「新時代台灣人」一詞，更早的原型來自於 90 年代李登輝多次提到的「新台灣人」，當時為了 94 年輔選宋楚瑜競選台灣省長、98 年輔選馬英九競選台北市長，李登輝即為了打破宋、馬兩人皆是外省族群的刻板標籤，拉近與本省籍選民間的距離，提出了「新台灣人」的口號。

換言之，「不論何時從大陸來的，目前只要是在台灣平安生活的人，就是新台灣人」（上坂冬子 2001：269-270）。那麼為何需要一再彰顯所謂的新台灣人？主要原因仍在於台灣內部始終存在著「省籍差異」的問題，「是外省人或是本省人這種『省籍』情結，是台灣永遠的課題之一。李登輝捨棄對那些的執著，主張『新台灣人』這個自我認同」（黃文雄 2011：47）。

這樣的主張，到了 2000 年卸任總統以後，李登輝保持一貫的基調，繼續在新台灣人上做出更具細彌遺的努力。李登輝也將新台灣人順利過渡到「新時代台灣人」，李登輝說：「我們在台灣完成的民主改革，是我們打破幾千年來『封建思想與社會體制』的產物，是一個全新歷史的開始。在這基礎之上，我呼籲，新台灣人（新時代的台灣人）要團結一致，跨越省籍、族群、出身地的差異，合力鞏固台灣這個『生命（命運）共同體』的連帶關係」（李登輝 2015：142）。

我們可以這麼說，在李登輝的認知之中，「新時代台灣人」是一個重要的國族認同標記，因為李登輝更近一步宣稱：「如果是新台灣人的話，就可以清楚了解，台灣與中國是屬於不同的國家，台灣並非中國的屬國這個事實。而且，如果是新台灣人的話，當然很清楚不應與中國進行任何關於統一的對話。……新台灣人必須改變過去認為『台灣是邊陲』的看法，要以自己的國家為地圖中心，眺望世界。」（李登輝 2015：143-144）。

關於新時代台灣人的說法，李登輝亦曾提及：「我們二千三百萬人，不分來台先後，都應毫不遲疑地認同這塊土地，並且把台灣意識逐步化為實體，也就是依照國際標準，自由決定我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我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新時代台灣人』就是我們共同的結論」（李登輝 2005：92-93）。對此，前原志保觀察道：「對李登輝而言，『新時代台灣人』的理念應可說是台灣的國家認同建構理論之最終形態」（前原志保 2014：201）。

承續著前述「新時代台灣人的」理解，以及「國家正常化」的願景，這些都是在李登輝心中所欲刻畫台灣未來走向的藍圖。那麼於此過程之中，勢必有許多必經之途及需要克服的困難，隨之出現。如同李登輝所說：「進一步討論的話，

這裡須解決的問題就有台灣國家形態應該正常化，以及台灣人自我認同的問題，也就是新時代台灣人到底是什麼樣的問題」（井尻秀憲 2010：209）。於是，我們進入第二大事項：「建立台灣國家認同」的討論。

於是台灣人能否建立起對國家的自我認同，成為了邁向國家正常化、塑造新時代台灣人的重要根基。李登輝說：「過去外來政權統治下的老百姓的奴隸性格，要如何走出自己獨立的性格。在這個過程中，要如何建立 identity〔認同〕？『台灣是什麼？』、『台灣的將來是什麼？』、『要如何支持台灣？』這些問題都和個人的認同有關」（李登輝 2008a：89）。

當然「認同」的建立並非一朝一夕，如同李登輝自己的國族認同一般，就本研究的分析，李登輝在 2000 年以前，也仍然呈現著與「中華民國」相關的台灣認同；發展出完全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認同，是遲至 2000 年以後才發生，我們也就能夠理解台灣長期處在外來政權的威逼下，要產生屬於自己的國家認同，是一條艱辛且漫長的道路。

而這條邁向正常國家、建立自我認同的蜿蜒道路，同樣出現了許多可預見的阻礙，包括了阻礙民主化的發展。李登輝說：「如果阻礙台灣民主化的外部因素是中國，那麼內部因素是什麼？就是國家認同的問題。最終能讓中國放棄對台動武的，應該是台灣人民『堅強的抵抗意志』、『強韌的台灣精神』。在這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必須有『將自己的國家，當成是自己的國家』這樣的基本認識」（李登輝 2015：141）。

再細究「內部」因素的產生原因，我們再次看到了台灣特有的「省籍」問題。「受到中國統戰工作的影響，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摩擦造成國家認同的衝突」（李登輝 2015：122），這也是呼應著李登輝一再強調「新時代台灣人」的主要原因。也就是李登輝的主張與論述，向來都是緊密扣連、有條有理的一系列緩步進程。

台灣要邁向民主深化、國家正常化，就必須更加通透的排除形成國家認同衝突的各種阻礙，李登輝說：「如果能夠改善這些弊端，人民之間那份共通的『台灣認同』能夠更近一步扎根的話，台灣的民主化也能變得更加鞏固。也就是說，

在台灣所推動的民主化與『台灣認同』的追求，是息息相關的」（李登輝、小林善紀 2001：99）。

卸任後的李登輝，確實沒有淡出「江湖」。在確認了自己的國族認同之後，李登輝遠景中的民主台灣前途，是架構在「正名」、「制憲」、「民主深化」，以及「國家正常化」的道路之中，於是如何能讓台灣人民建立起正確的國家認同，是李登輝心心念念的關注所在。這也就是黃鈺淳所說：「李登輝更認為認同是絕不能迴避的重要問題，而認同問題在李登輝看來是主導未來台灣政治發展的重要議題，因為，台灣人民多年來一直為外來政權所『壓迫』，直到逐步推動民主化，才使台灣人民成為真正的主人」（黃鈺淳 2010：115）。

最後，進入第三事項的表述：「若有似無台獨運動」。延續有關上述「國家認同」的論述，我們同時間發現，李登輝對於是否主張「台灣獨立」，向來有著自己特殊的解讀與詮釋。李登輝說道：「台灣的國家自我認同，首要課題無疑是『存在』與否。雖然常有人說，『台灣實質上已經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這樣的國家是否已經是法律上完整的國家，仍有討論的餘地」（李登輝 2009：121）。

會指出上述的存疑，原因在於如同李登輝一手主導的「台灣團結聯盟」政黨，存在著十分明顯的「台獨」旗幟；卸任後的李登輝，所作所為在外界的主流辨識下，也都將李登輝與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畫上等號。但是李登輝一直沒有正面回應更顯露心跡的「台獨論述」，而是採用大量精美的文字迂迴包裝。

這也正是本段落標題所示：若有似無台獨運動。因為有關李登輝的台獨記號，絕大多時候是透過從李登輝自述的文字中，加以解讀其背後代表的意涵；或是他者對李登輝的各種支持台獨運動舉措，所做出的片面釋讀。換言之，並沒有更精準的文本，記載著李登輝直白地說出類似「我希望／支持台灣獨立」這類的話語。

即使李登輝的所言所行，再再都讓各界判斷他就是一位支持台灣獨立的重要領導人，一如黃文雄就明白地說道：「李登輝亦從總統時代開始，一直主張台灣的獨立」（黃文雄 2011：169），各界普遍認知李登輝是一個支持與主張台灣獨立運動的人，但李登輝的話語卻不一定是這麼地表示。

李登輝說：「台灣並非任何一個國家的殖民地，因此，提出『自決』並不恰當。而且，我們目前沒有要求『自決』的必要。而『獨立』一詞更是不妥」（李登輝、中嶋嶺雄 2000：42）。換言之，李登輝對於「獨立」一詞是存在著疑慮的。那麼如何在李登輝主張獨立與不主張獨立此二者間，尋找一個能夠平衡說法的絕佳方式？或許，以下的詮釋，是最接近李登輝對於台灣獨立的看法：

> 所謂的「台灣認同」，到底是什麼呢？有人會認為是台灣獨立。但是，我認為，即使台灣的國際地位必須明確化，卻不一定拘泥於「獨立」，反而是將「中華民國台灣」或者是「台灣的中華民國」實質化，才是當務之急。（李登輝 1999：63）

這是李登輝卸任總統前出版的《台灣的主張》其中的內容，能不能就此等同於卸任以後李登輝對於台灣獨立的看法與主張，當然可以有不同的判讀，如同柯義耕所說：「李登輝自己，則由於職務的關係，不便公然鼓吹台灣獨立。對他而言，時機尚未成熟」（柯義耕 2008：274）。

卸任後的李登輝，為台灣獨立運動投注的心力，恐怕也無需再由他的口中吐露出支持台灣獨立運動與否。或許李登輝是充滿著自信，看待著台灣國家的未來變化：「今後除了用心注意國際情勢和大局之外，其實不必特意宣布獨立，過不了多久，世界就非得承認台灣是一個新的共和國不可」（上坂冬子 2001：285）。

第五節 小結

此一時期的李登輝國族認同狀態，進入了嶄新的國族認同發展。所有與「中國認同」相關的標記，似乎都隨著李登輝離開總統職務後，走入塵封的歷史之中。即使是在中國認同與台灣認同的過渡之間，短暫出現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版」的台灣認同，中華民國認同這個與中國認同部分相仿的認同標籤，也自此再也不存在於李登輝的國族認同之中。

面對如此巨大的轉變與新的國族認同型態出現，首先，我們看到了具體的李登輝「中華民國認同揚棄」。無論是伴隨李登輝從政生涯：中國國民黨黨員身分

的割捨，或是李登輝力推更改中華民國國號，推動台灣制憲與國家正常化，我們都清楚地看見李登輝用盡心力地在與「中華民國」做出別離。換言之，李登輝認為擁有「台灣認同」，更符合真實、更值得驕傲。

李登輝高度否定了以往緊緊跟隨的中華民國／中國認同，並且一再強調台灣人需要共同建立新的國家認同，認為「新時代台灣人」，才是當代台灣應該發展的正確方向。於是李登輝積極地投入民主化與台灣本土化的行列之中，並且「重出江湖」組織智庫與協助成立台獨色彩鮮明的政黨；李登輝也第一線站在人群面前，參與「二二八牽手護台灣運動」，呼籲台灣人與民進黨新政府一同抵禦中國霸權的威脅。透過投身運動與政治組織的參與，台灣主體性的深化，是此時間李登輝考慮許多事情時，最重要的核心所在。

在不斷積極投入「台獨運動」的過程中，我們卻也看到了來自李登輝對於「台獨」的見解與主張，李登輝一再強調無需「特意宣布獨立」，並且對「獨立」一詞顯得似乎恢復起「國家元首」的謹慎，非常小心地看待與閃躲。以現實來看，或許這是即使進入「內化期」的李登輝，身上的卸任元首標籤並無法因此撕去；他會遇到的心境，肯定不會與常人相同。即使如此，我們卻也能夠清晰地看見台灣認同事實上已經內化於李登輝的心中，接下來只是如何務實地去面對台灣身處的特殊環境；因為獨立的訴求，依然關聯到法律上的詮釋與國際上的險峻形勢。

也或者是黃鈺淳所說：「李登輝從來不認為自己的認同轉變是思想中缺乏一致性，因為他認定他的目標其實是不變的，改變的只是因應不同時空及現實條件所採取的措施，而因為有信仰宗教作為依託，也才讓他領悟要形成國家認同將需要相當的時間來達成」（黃鈺淳 2010：74）。

基於上，我們也能夠理解，為何李登輝在投身台獨運動的同時，卻依舊認定台灣不需要宣布獨立；李登輝心中認定的台灣認同目標，未必然就是拘泥於「台灣獨立」口號的宣稱。當然，這也可能是進入內化期的李登輝，不再以簡化的方式，恣意指稱他認為唯一解的台灣獨立問題。

綜上所述，筆者反覆檢視相關此一時期的李登輝生命史之後，仍舊認為李登輝的國族認同狀態，確實已經轉變成為「台灣獨立版」的台灣認同。由於在 Cross 黑人化模型發展分類上，李登輝已經進入了「內化期」之中，我們將繼續透過最後一個生命階段的分野，來確定李登輝新建構的台灣認同，是否已經真正改變？是否進入了「認同循環」，讓台灣認同成為他最終展現的國族認同狀態。

第八章 見證第三次政黨輪替（2007-2016）

本章節是本文研究「以生命史取向分析李登輝國族認同的發展階段」內容中，最末的一個階段；內容記敘始自台灣第一個由本土政黨建立的民進黨政府政權進入執政末期的階段，至 2016 年 5 月 20 日，李登輝再次見證了台灣民主發展史上，又一次的和平轉移政權、政黨再次輪替為止。

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有所慶幸、值得一提的事，在本研究即將完成之際，歲次已正式邁入 2019 年；換言之，李前總統現在也已高齡 96 歲，並且健康、精神地持續關懷著台灣社會的發展。現在的李登輝前總統，依然不斷地以自身的學養、及無可取代的長足經驗，透過各種可行的方式，傳授、廣知於社會大眾。

但本文終究屬於學位論文之書寫，必須有所取捨地暫且做出可惜的時間截點，故選至 2016 年 5 月 20 日止，同時李登輝不再主政後，台灣已經經歷長達四任的總統任期。而 2016 年 5 月 20 日最新一任總統亦已上台完成就任，可視為李登輝卸任後第五任總統的開始。吾人認為，暫且將本研究——李登輝的生命史停留在此關鍵的時刻，應為難分難捨下，一個較為適當的時間截點。

由於卸任總統之後的李登輝，再無公職身份、任期之束縛，所以本章節採取的書寫順序，將不若過往章節中刻意謹慎地依照李登輝的生命歷程對照年份先後發展來寫；本章節將側重於上述標約 9 年期間，各種直接與李登輝產生關聯的重大事件，來賡續探究李登輝在此生命階段中，可能呈現的國族認同面貌與成因。

這些重大事件包括：在 21 世紀後，歷次的總統大選上，李登輝再也沒有支持過任何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而是轉為支持代表本土政權的民進黨；向來有著濃烈日本情懷的李登輝，在卸任後多次訪問日本，而每每到了日本之後時不時出現的驚人之語，以及許久以來李登輝長期被若干人士、特定團體認定的日本情懷，乃至於引爆的「釣魚台觀點」論戰；第三節則是透過李登輝出版的著作：2015 年的《新・臺灣的主張》、2016 年的《餘生》，這些近晚重要著作帶來哪些新的思考，與哪些調整？或者再次重申之關注。

第一節 再次支持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毫無疑問，李登輝一生的從政經歷，幾乎等同於他身為國民黨員的這個身分架構上，離開總統任期時的他，即使提前將出黨主席職務，卻仍舊是一位具有卸任元首身分的國民黨黨員。在李登輝主政的 12 年中，處處與李登輝抗衡、甚至是惡言以對的政黨，就是將李登輝主掌的國民黨政權給輪替的「民進黨」，長期以來對立的兩造雙方，是什麼原因，在李登輝卸任後開始有了緊密合作的機會。

正如前述提過的，李登輝並不像是許多其他國家的卸任總統，不再過問國政大事；相反地，李登輝依舊一本熱腸，不斷透過組織研究單位、出版政策建言，在必要時刻襄助沒有執政經驗的民進黨政府，為的就是希望他心愛的台灣能夠持續更好。基於這樣的脈絡之中，李登輝願意出手協助民進黨，本質上並不是在幫助這個政黨，而是這個新生的政黨，正掌舵著台灣大政；與其說李登輝是希望民進黨好，倒不如直接了當的直說李登輝一心一意為了台灣更好。

2004 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這一年的總統大選，不若 2000 年時的三強鼎立，分裂後的國民黨，形成民進黨有絕佳勝出的局面，這一次只剩下兩組主要正、副總統候選組合。一組是尋求連任的陳水扁執政團隊，另外一組是 2000 年總統大選位居二、三名的宋楚瑜與連戰，此次合而為一，組成了「連宋配」的夢幻組合。對於民進黨政府而言，當然是一場艱困的硬仗。

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以往與宋楚瑜、連戰交好，幾乎一輩子都在國民黨體制中服務奉獻的李登輝，出手了；幫的卻不是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而是感情交誼甚薄的陳水扁領導的民進黨政府。至此，往後的每一場台灣總統選舉時，李登輝再也不曾為國民黨提名人站台、輔選，而是一次次擁抱民進黨總統提名人，包括了 2012 年出馬角逐總統大選，曾為李登輝「兩國論」起草者的蔡英文。

嚴格來說，李登輝並沒有真正與民進黨有著太過密切的互動，平常時刻李登輝也不一定全般接受民進黨主張的各項政策；但在爭奪政權存亡之際，李登輝總是選擇站在象徵本土政權民進黨的這一邊，這是十分有趣的議題。最後，2012 年

沒能走完最後一哩路的蔡英文總統候選人，再次於 2016 年出戰總統大選，這一次，李登輝同樣沒有缺席；蔡英文最後一哩路的路上，有著 93 歲李登輝前總統的身影。2016 年總統大選選舉結果，蔡英文贏得勝利，民進黨闊別八年，重返執政；在李登輝的親眼見證下，台灣出現了執政史上，第一位女總統。

一、 2008 年「失去政權的民進黨」

延續著第七章中探討李登輝與執政的陳水扁政府關係，2007、2008 年的台灣，因為陳水扁自身清廉遭受強力挑戰的緣故，社會上瀰漫著民進黨就是一個貪腐政黨的代表；易言之，好不容易建立的本土政黨政權，將被輪替掉，似乎是不可逆的事實狀態。如同李登輝說的：「以陳水扁第一家庭為主、民進黨的貪污腐敗已經讓台灣人民非常厭惡。我想，民進黨接下來的選舉，大概會輸得很徹底」（井尻秀憲 2010：246）。

2008 年的總統大選，國民黨推出的總統候選人，總算不是已經連續兩敗的連戰；取而代之的，是自 1998 年台北市長一役，順利擊敗當時尋求連任、高滿意度的陳水扁市長，因此聲名大噪的馬英九。這一位馬英九，是一位在香港出生、台灣長大的外省人；除了在早年曾經擔任過蔣經國總統的英文秘書之外，也是李登輝擔任總統暨國民黨主席期間，重點栽培的國民黨新一代政治明星。在馬英九首次競選台北市長的期間，李登輝賣力站台輔選，並喊出「新台灣人」的口號，協助馬英九脫離外省族裔的標籤，拉攏更廣大台灣各族群的支持，贏得勝利。

而同樣是在上一章節中提過，2000 年李登輝因為國民黨在總統大選中的大敗，隨即遭到連戰落選人的「逼宮」；眾所皆知，台灣總統的官邸，正位於首善之地的台北市之內，而當時的台北市長，正是馬英九。在 3 月 18 日選舉後的「第三天晚上，抗議群眾仍然處於情緒高張狀態，當時的台北市長馬英九以台北市治安首長身分蒞臨現場，卻遭民眾投擲雞蛋，隨後其答應群眾向李登輝轉達訴求，李登輝則以已經休息為由未予接見」（柯義耕 2008：294）。

這一段插曲，所要說明的是，雖然馬英九在當時並未能如願進入總統官邸轉達抗議民眾訴求；而後來也從李登輝口中證實，是連戰最後做的逼宮動作。但是一手拉拔馬英九長大的李登輝，又如何能夠平靜看待當他在被民眾威迫的時候，竟連馬英九卻也站在民眾的立場，彷彿同仇敵愾般地想要來向李登輝表達民眾的訴求，這叫李登輝情何以堪。

後來在 2004 年陳水扁政府尋求連任、繼續執政，結果我們都知道了；一度被視為夢幻二人組的連戰、宋楚瑜，最終以些微的選票再次落敗。對於已經連續兩戰皆墨的連戰團隊而言，肯定再也按耐不住國民黨支持者的失望情緒；就在這個時刻，順利兩次在台北市長選戰勝選的馬英九市長，成為了國民黨支持者看見希望的所在。馬英九一時之間，前途看好。

「到了二〇〇五年七月十六日，國民黨舉行黨主席選舉，開票結果，兼任黨副主席的台北市長馬英九正式當選，也取得下一屆總統大選國民黨候選人的最佳起跑位置」（井尻秀憲 2010：194）。2008 年，在民進黨政府形象頓挫之際，國民黨果真推出了馬英九為總統候選人，搭配著蕭萬長副總統候選人，以懸殊的票數，擊敗了民進黨謝長廷與蘇貞昌的組合。國民黨在睽違八年之後，重返執政。

話說回來，李登輝在 2004 年的總統選戰當中，立場十分鮮明的拉起了陳水扁的手、站上了民進黨的台，而後後悔。那麼在 2008 年這一戰，民進黨聲勢陷入谷底的時候，李登輝又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是重新擁抱與他素有淵源的國民黨與馬英九，還是成為人民高度不滿、眾所矢之的民進黨同路人？

2008 年李登輝與日本作家井尻秀憲進行訪談，「井尻[發問]：這兩個月舉行大選，總統你持續保持中立的態度，最後才表明支持謝長廷。其中的過程為何？李[回答]：因為我與謝長廷素有私交，我認為他的條件可以擔任這個職位」（井尻秀憲 2010：262-263；標楷體為原文所示）。

李登輝最後選擇了支持民進黨所提名的總統候選人謝長廷，而不是受他提拔、一路走向政治明星一途的國民黨籍馬英九。在社會瀰漫民進黨貪污腐敗的情況下，李登輝仍然選擇了謝長廷作為他所支持的對象，這是必須承受許許多多外界的異

樣眼光的；雖然見過大風大浪的李登輝，也許早已習慣了。只是，不同於 2004 年李登輝登高一呼，訴求百姓支持陳水扁連任，甚至是牽成了「二二八牽手護台灣」的超大型運動；這一次的李登輝，顯然在表態上的進度十分緩慢。

2008 年時的社會政治氛圍，的確對民進黨相當的不利；李登輝是不是一直在觀察社會上的風向，來決定支持哪一個政黨的總統候選人？我們不得而知。看著民進黨樓起，短短時間內卻幾乎崩壞樓塌，李登輝可能也震驚不少。李登輝說：「好不容易台灣人組成的黨卻變成這樣，真令人失望。我雖然支持謝長廷，但記者會上應該沒有說要支持民進黨吧。坦白講，到了這個地步，我對民進黨那些人都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他們最嚴重的問題是貪污腐敗」（井尻秀憲 2010：266）。

支持謝長廷，並不等於支持民進黨，這是李登輝的基本認知與態度。「民進黨致政後，沒有致力『轉型正義』，本身在『不正義體制』中迷航，甚至腐化，以致在二〇〇八年失去政權。此一事實，後來也讓國民黨頑守『不正義體制』振振有詞，導致今天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明顯倒退。因此，下次獲得政權，民進黨務必要『以民為主』，完成『轉型正義』，讓台灣的政治競爭步上民主正軌」（李登輝 2013b：142-143）。

李登輝雖然強硬地說明自己並沒有支持民進黨，但是眼征征地事實是，不管怎麼說，謝長廷就是「民進黨」所提名的總統候選人，支持謝長廷，很難不把票算在民進黨的得票數上；或許，這是李登輝的語重心長、恨鐵不成鋼的心情吧。再者，即使民進黨在執政後的種種作為讓李登輝逐漸陷入失望，但李登輝依然期許民進黨將來若有機會再度執政，應當扮演好的重要角色。我們可以這麼說，阿輝伯並沒有真的放棄這個由台灣人建立起的政黨 —— 民主進步黨。

二、 2012 年「最後一次拜託」

民進黨在執政八年後，沒有繼續得到台灣民眾的認同與支持，馬英九首次參選，在只有兩黨候選人的捉對廝殺之下，贏得了將近 6 成的選票（58.44%），以超過 765 萬張的選票，大勝民進黨謝長廷的 544 萬票（41.55%），這無疑是民進

黨創黨以來進入最為嚴峻、寒冬的時刻。陳水扁的貪腐形象，使得民進黨兵敗如山倒，形成了「成也陳水扁、扁也陳水扁」的唏噓景象。

就在馬英九率領的國民黨團隊重返執政之後，高齡超過 91 歲的李登輝，這個時候又再度扮演著什麼樣的卸任元首角色？「李登輝提到，『若馬英九先生請我幫忙，即使年齡太大無法出任駐日代表，我也可用很自由的立場幫忙，』表明『願意貢獻一生累積的日本政經界人脈與經驗，協助即將就任的馬總統，為台灣做一些事』」（井尻秀憲 2010：268）。

即使李登輝支持屬意的謝長廷沒有當選，即使李登輝與國民黨早已鬧上分裂，即使李登輝對於馬英九始終心存疑慮；但只要有機會繼續為台灣奉獻心力，李登輝仍舊十分願意貢獻出自己，並且是利用自己再熟悉不過的對日事務，來協助馬英九政府的執政能早日上手。一個政治家的氣魄與高度，在此顯露無遺。

後來的局勢發展，顯然馬英九並沒有請李登輝重出江湖；在對日的觀點與政策執行上，馬英九與李登輝也有著明顯的落差，其中「釣魚台」爭議就是兩人最大的分歧之一。2015 年更曾經為此話題，爭鋒相對：「總統馬英九投書媒體，指出前總統李登輝，提出『釣魚台是日本的，不是台灣領土』，此話違反史實、違反中華民國憲法、違反國際法，嚴重傷害國家主權、人民感情與台灣主體性，是重大失言。要求前總統李登輝收回此話，並向國人道歉。對此，李登輝辦公室主任王燕軍今早說，請馬總統多念點書」（風傳媒 2015）。

不過早在李登輝與馬英九為了釣魚台爭議相互找麻煩之前，2008 年的馬政府在上台不久後，李登輝就開始起了擔憂：「國民黨政府上台後，馬總統加速向中國傾斜。為了開放台、中直航包機，以及爭取中國觀光客到台灣觀光，竟然承認了子虛烏有的『九二共識』，準備將台灣捲入『一個中國』的漩渦中。……二〇〇八年的總統選舉中，台灣人民雖然選出馬英九為總統，但並不代表台灣人給予他『放棄主權』的權限。更不用說，絕對不是允許他『把台灣變成中國的一部分』」（李登輝 2015：130-132）。

只要有關台灣的主體性與主權的維護，想當然李登輝肯定是寸土不讓。很明顯的李登輝絕對不會滿意馬英九政府的所作所為，「二〇〇八年以後，過度依賴中國的馬總統與國民黨政府，他們的重要政策就是強行推動『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馬政府在承認以『一個中國』為前提、虛構的『九二共識』之下，刻意使用 ECFA 這個名稱。……事情演變至此，我終於按耐不住了。二〇一〇年六月，在野民進黨在台北發起抗議示威遊行，我參與走在前頭。……我在大雨中發表演說批評：『既不聽人民的聲音，也不讓人民公投決定，馬總統已經沒有資格當台灣總統了』」（李登輝 2015：134-135）。

卸任的國家元首，與民眾一同走上街頭，向馬英九政府發出怒吼；這個時候的李登輝，已經高齡 87 歲了。頂著大雨走在街頭，對於街頭運動抗爭起家的民進黨來說，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但是以往民進黨陳抗時的主要訴求對象，就是以前主政台灣的李登輝；物換星移，李登輝選擇與民進黨以及廣大的台灣百姓一起走上街頭，或許這就是最為珍貴的民主台灣、台灣價值。

就在這樣馬英九政府倒行逆施的過程之中，包括民進黨支持者，也包括李登輝，都認為馬英九不再適任總統了。由於在台灣有了一次轟轟烈烈的「百萬紅衫軍倒扁行動」未能成功的經驗之後，台灣各界都有要將現任總統拉下台實屬不易的普遍共識。所以除了上街頭表達最高分貝的抗議之外，回到民主機制，台灣多數人選擇在下一次的總統大選中，清楚表達自己的意識與認同。

就在這個時候，2008 年敗選後幾乎陷入愁雲慘霧、彷彿將要倒店的民進黨，出現了一位備受矚目的全新政治領袖，她是曾經在扁政府時代歷練陸委會主委、不分區立法委員、行政院副院長，以及李登輝政府時代就嶄露頭角、協助李登輝「兩國論」起草的時任民進黨主席 —— 蔡英文。蔡英文在 2008 年民進黨最危機的時刻出現，一肩扛起聲勢急轉直下的敗選政黨。

丟了政權的民進黨，在當時如同一個燙手山芋，所謂黨內大老遲遲沒有人跳出來承擔這個本土政黨的未來，從沒投身選舉的國際談判專家蔡英文，不知哪來的決心與勇氣，決定幫助這個政黨走出谷底、重見天光。

2010 年的蔡英文，先是經歷了一場眾所矚目的「新北市市長」選戰，第一次參與選戰、成為候選人的她，不敵當時國民黨日正當中、挾桃園縣高票連任縣長、具有不俗政績的「朱立倫」。但是初試啼聲的蔡英文，卻也拿下高達 100 萬張以上的選票，小輸朱立倫 11 萬票，約 5.2 個百分點，令人刮目相看。自此之後，台灣社會逐漸瀰漫著一股期待誕生一位女性國家領導人的氛圍。

畢竟民進黨還是一個民主的政黨。雖然蔡英文得到了許多人民百姓的期待與勸進，但仍舊必須通過民進黨內的提名機制，確認能夠代表民進黨出征 2012 年總統大選。於是在前一年民進黨內的總統提名人初選當中，包括蔡英文在內，共有三組人選，分別是蔡英文、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以及曾在蔡英文擔任行政院副院長任內、她的直屬長官，2008 年搭檔謝長廷總統候選人副手的蘇貞昌。

最終蔡英文以「以平均支持度 42.50%勝出，蘇貞昌以平均支持度 41.15%次之，許信良平均支持度則為 12.21%。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並於 2011 年 5 月 4 日正式公告提名蔡英文代表民主進步黨參與 2012 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維基百科 2019d）。這是台灣首度出現的女性總統候選人，民主列車再度向前躍進。

回過頭來繼續看李登輝在這場選舉中扮演的角色。可想而知，在馬英九正式上任之前，李登輝還是給予祝福，甚至是願意為馬政府奔走日本；但很快地李登輝就必須面對馬英九極度傾中的現實。李登輝當然是失望的。有著過人行動力的他，甚至無懼風雨，走上街頭正告馬英九的不適任總統，李登輝肯定不會再去支持馬英九連任。而在 2004 年過後的脈絡下，李登輝在卸任後的兩次總統大選，都是支持民進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這次是否會有意外？

蔡英文曾經是李登輝主導「特殊國與國關係」論調的重要倚靠。在陳水扁政府時代擔任陸委會主委對於捍衛台灣國家主權的強悍作風，不僅僅振奮台灣人民的心，看在李登輝眼裡，肯定也是抱持著支持與肯定。在馬英九政府勢必必須下台的情況下，李登輝再一次支持本土最大型政黨 —— 民進黨贏得政權，絕不會是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持平而論，李登輝始終不願意台灣繼續由外來政權主政，況且，是一位出身外省權貴集團的代表來領導台灣；本省人也是人才輩出的。

就在 2012 年 1 月 14 日總統大選的前一個晚上，代表民進黨競選總統的蔡英文，舉辦了選前大型造勢晚會，已近 90 歲的李登輝，抱病出席參加這場活動。站台輔選，一向是李登輝所熟悉與擅長的。李登輝說：

> 「讓蔡英文成為台灣第一個女總統，創造台灣民主新的典範！選蔡英文，選出咱的希望、咱的幸福，相信自己、相信蔡英文，讓自己有一個機會、讓台灣有一個機會！」九十歲的前總統李登輝，昨晚抱病出席綠營選前之夜，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向全民發出最深情的呼籲：「台灣要交給你們了！」……「我年紀大了，身體不太好，什麼時候會離開心愛的台灣也不知道」，能再做的實在有限，「未來要靠恁大家打拚啦！」這場選舉，票數很接近，大家一定要去投票，全力固票、催票！「我李登輝這輩子今天是最後一次向大家拜託！」李登輝真情流露的壓軸演說，讓舞台下的支持群眾哭成一片，感動不已，眾人放聲高喊「疼惜阿輝伯，支持蔡英文」，成為整場晚會的最高潮。……「希望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繁榮有人權、有尊嚴的國家，不用煩惱會被別人統一、被別人管」，可以大聲講「我是台灣人！」……有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的李登輝去年十一月初才因大腸癌開刀，李登輝幕僚透露，李登輝力挺小英的意志力堅定，堅持為蔡站台助講。（劉榮、李欣芳、陳慧萍 2012）

拜現代影音科技發達所賜，事實上這一段李登輝為蔡英文抱病站台的珍貴畫面，不僅僅只有媒體文字與照片的報導；許多當時留下來的新聞畫面，至今在網路上依然四處可見。高齡 90 的李登輝，帶著病體，在 1 月份的寒風當中，裹著圍巾，穿搭著他一向紳士優雅的穿著，在民進黨籍蔡英文總統候選人的造勢台上，聲嘶力竭地向台灣人民懇託。希望蔡英文當選、希望台灣的未來更好。

從來鮮少在人前示弱的李登輝，面臨心愛的台灣已然陷入的傾中危機，在選前告急時刻，真情流露的說出：「我年紀大了，身體不太好，什麼時候會離開心愛的台灣也不知道」；這是令人何其動容的一刻。一生守護台灣民主發展的李登輝，當然也會十分掛念著台灣未來的民主發展。於是即使是大病初癒不久，堅強、堅毅如李登輝，再次披掛上陣，用他生命最後的餘暉，希望蔡英文能夠贏回政權；更希望，「『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繁榮有人權、有尊嚴的國家，不用煩惱會被別人統一、被別人管』，可以大聲講『我是台灣人！』」。

三、　2016 年「台灣第一女總統」

2012 年的選舉結果，馬英九再度蟬聯總統寶座；代表民進黨出征的蔡英文，至終沒能順利帶領民進黨光榮地重返執政，實現第三次政黨輪替，也就是蔡英文在發表落選感言時所說的，「沒能走完最後一哩路」。這樣的結果，當然又是一次本土政權的挫敗；台灣人民選擇了親近中國的馬英九政府，這也是在民主國家中，必須接受的民主必要機制之惡。

對此，李登輝也有他的看法與解讀：「二〇一二年一月，總統和立法委員的選舉同時舉行，馬總統與執政的國民黨再度勝選。究其背景，與中國有生意往來的大企業紛紛表態支持，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另一方面在野民進黨選舉失利的原因，是因為仍受到陳水扁執政時代的腐敗印象的影響」（李登輝 2015：136）。

表 8-1：知名企業家表態支持馬英九連任總統一覽表

時間	企業	表達內容
2011.12.14	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	將包機載員工回台投票，他本人更搭專機全台走透透和青年座談，專攻首投族
2011.12.28	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	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擴大兩岸良性交流；支持對台塑集團友善的總統
2012.01.03	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	直言若有人當選後說沒有九二共識，台灣經濟會很慘
2012.01.05	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	要選在兩岸和平穩定上最不冒險的人，並比手勢「V」
2012.01.05	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	砸大錢在各大報買半版廣告，呼籲台灣需要開放穩定的政策環境
2012.01.11	聯電榮譽董事長宣明智、矽品董事長林文伯、宏齊董事長汪秉龍等 5 人	聯合開記者會強調九二共識有良好發展並共創雙贏，為何要停掉並改變？
2012.01.13	威盛、宏達電董事長王雪紅	開記者會強調無法想像沒有九二共識後的兩岸關係，且支持清廉的政府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蘋果日報 2012）；表格為作者自繪。

一場選戰的結果勝利與否，決定的因素往往許多；像是李登輝就舉出了兩個可能導致蔡英文敗選的因素，一個是陳水扁政府遺留下的貪腐形象尚未從人民的心中排除，另一個則是中國介入的「九二共識」。一個不存在、沒有具體內容的口號，就在馬英九政府主政下，成為了一門顯學。所有重金投資在中國的台灣大企業家，都為了保全自己龐大的事業體，順從中國的需求，做出令台灣人傷心的事情(類似的事情一直不曾間斷，例如 2018 年台灣亦再出現知名商人「吳寶春」，為了在中國的展店，同樣發出支持九二共識的聲明，令人遺憾）。

不過 2012 年不管基於什麼樣的複雜因素，決定了馬英九、蔡英文誰勝誰敗？被李登輝評為不適任、極度傾斜親近中國的馬英九政府，再次經過全民的直選授權，取得了新一任執政台灣的機會。顯而易見地，如同 1996 年在中國的文攻武嚇下，順利當選的李登輝，有著最堅實的最新民意來當作後盾；馬英九政府當然也可以這麼做。顯然台灣老百姓是不反對馬英九擁抱中國大腿的。

在繼 ECFA 之後，馬英九政府變本加厲，想要強行通過出賣台灣的「服務貿易協議」，於是在 2014 年三月間，台灣爆發了「太陽花學運」（第三節會有更多敘述）；人民再次向馬政府嚴正怒吼，卻也在學運期間發生令人遺憾的「324 行政院流血衝突事件」。一時之間，台灣整個的社會氛圍轉變了。人民變得不再願意相信馬英九政府，馬總統的民調也持續下探。

一直到了 2014 年底的九合一地方選舉大選，國民黨的選舉成果受到中央執政的牽累，普遍選得不好。以六都直轄市為例，國民黨更只保住新北市市長一席的席次，民進黨贏得了四都，台北市則是由「綠白合作」、無黨籍身分參選的柯文哲當選。在當年的各方解讀下，都認為這是一場學運過後的大型海嘯，與人民站在對立面的國民黨，當然必須承受選舉失敗的苦果。

就在這段期間內，2012 一役失利的民進黨蔡英文，則持續參與各項民生相關的運動、成立影子內閣、回任民進黨主席、走入基層等等，進入所謂的「養望」時期。源自於馬英九的施政不力，很快地，人們回想起 2012 年總統大選票數並

沒有相差太多的民進黨蔡英文；若當初是由她勝出，是不是肯定做得比馬英九更好？台灣人民就無需經歷馬總統執政產生的各種無奈傷痛？

民主政治的可愛與可貴，就是人民始終能有機會利用選舉制度來表達自己的立場，與希望的國家政策走向。台灣雖然目前尚不是一個已然正常化的國家，但民主選舉在台灣卻也行之有年。扣除過去常有的「買票文化」之外，台灣的民主深化向來是能夠令百姓引以自豪的。這一次，人民再次希望利用選票來轉動台灣，看看是不是能夠找到一位更能帶領台灣人民前進的國家領導人。

面對國民黨馬英九政府做不好的情況下，目標很明確、很簡單，就是 2016 年台灣能夠再次進行政黨輪替，把國民黨送回在野黨的角色。有別於 2012 年蔡英文是通過民進黨內初選才成為黨提名總統候選人；2016 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提名，除了蔡英文，再沒其他挑戰者。定於一尊的蔡英文，很早就起步投入繼續尋求首次勝利的總統大選選戰。

自 2014 年選舉結果以及聲勢一路潰敗的國民黨，在推出總統候選人期間，由於整個黨的沈淪與渙散，甚至出現了更換已經提名為候選人的「換柱風波」。經過國民黨內民調機制出線的國民黨提名總統參選人，時任立法院副院長的洪秀柱，因為選情始終未見看好，聰明如國民黨，竟能夠粗糙地利用「臨時全國黨代表大會」，在選前倒數三個月，廢止洪秀柱提名，改由時任新北市市長的朱立倫來代表國民黨參選。陣前換將，想當然選情也很難好得起來。

最後的選舉結果，第二次參與總統大選的民進黨籍蔡英文，以懸殊的選票贏得選舉的勝利；與總統大選同時進行的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也拿下了 113 個席次中的 68 席，民進黨首度站上「完全執政」的里程碑。這一次的李登輝，因為年事已高，沒有再如 2012 年親自為蔡英文站台輔選，但是李前總統對於蔡英文的關愛，從來只有多，沒有少。

憂心於台灣前途的李登輝，當然不願意見到馬英九帶領的團隊持續向中國靠攏；在這一個基礎的認知之下，2012 年雖敗猶榮的蔡英文，到了 2016 年自然會是李登輝願意繼續支持的對象。2012 年的未竟之路，蔡英文沒有放棄前進的目

標，果真如她 2012 年落敗時向民眾許下的承諾，2016 年與台灣人民共同走完民進黨重返執政的「最後一哩路」。

這一次的總統大選過程中，李登輝一路以來其實並沒有表達太多關注的聲音。或許是因為這一次蔡英文的參選之路相對安穩平順，選情也一路看好，各項民調數據蔡英文也始終在一個遙遙領先的狀態，不像是 2012 年時選得那麼艱困，所以阿輝伯不需要再出重手，蔡英文應當能「自然」過關。但也有可能真的是因為李登輝年事已高，並不適合再去造勢場合中大聲呼籲、大力拉票，以免傷了元氣。

不管真相到底為何，李登輝從來就沒有不關心這一場台灣總統大選。事實上，李登輝 2016 年出版的著作：《餘生》，所有的敘事內容都是停留在 2014 年 4 月以前；這一本書的日文版，也在 2015 年即已在日本發行，所以包括在書寫的內容上，今年都必須加上註腳說明是 2014 年。但是李登輝的匠心獨具，特別稍微延遲了在台灣上市出版的時間，巧妙等到了 2016 年總統大選結果揭曉後，才開始印刷販售、公諸於世。於是，我們得以看到在 2016 年 1 月 25 日的自序中：

> 今年我國三次政黨輪替，距離一九九六年台灣人民第一次直選總統，適值二十週年；過去八年，由於馬政府長期忽視民意、黑箱作業，代議制度失衡失調，貧富差距高達九十九倍，公平正義蕩然無存，終導致「太陽花學運」，年輕人及被壓迫的弱勢者，用實際行動表達對馬總統最直接的不滿與抗議，終導致原在野黨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主席勝出以擔任台灣第十四任總統。（李登輝 2016：2）

因為對於馬英九政府的各項爭端與爭議，李登輝希望台灣能夠出現更好的國家領導人來取代國民黨的執政；選舉的結果由蔡英文勝出，李登輝應該是滿意與接受的。此外，作為台灣首次完成政黨輪替的重要關係人李登輝，睽違 16 年之後，見到了台灣即將邁入第三次政黨輪替的階段。對於李登輝而言，這一些豐碩的民主果實，都是他一生最希望看見的結果。相信李登輝也同樣期待，見證台灣「第一位女性總統」，在台灣民主前進與國家正常的道路上，增添美麗的雲彩。

第二節 走訪日本的實話之旅

李登輝是日本人？是，他是日本人，在他 22 歲以前，包含其他台灣人在內，因為統治台灣的是日本殖民政權，所以大家都是「日本人」；不過，這一個殖民政權，十分清楚地就是一個「外來政權」，這是歷史的哀歌，也不一定是台灣人認定的「祖國」日本。李登輝是中國人？是，他是中國人，1945 年以後，日本走了，新的外來政權來了，名字叫做「中華民國」，李登輝甚至當了中華民國的總統、副總統，前後共一十六年，他當然是「中國人」；在這個政權體下的每一位台灣人，也都是中國人，至少，至今拿的都是「中華民國身分證」。

那麼李登輝是台灣人嗎？無論日本統治時期，或是後來「狗去豬來」的國民黨政府時代，李登輝都是「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土生土長的台灣子弟，李登輝怎麼可能不是台灣人！但是這個問題顯然沒有想像中容易一分為二、一分為三，「國族認同」指的是一個人的內心中真正踏實不假的認同取向，不因外在的國籍、統治者的政體等因素所更改，這也就是本文研究的複雜所在。

本第四節要探究的，就是除了 1945 年以前，因國籍身分的「綁定」下，李登輝在客觀條件下是為大日本帝國的子民，他的生活、接觸的若干文化、學校教育的學習，都在在引導他沉浸於做一個日本帝國光榮子民的環境，沒錯，他甚至曾經有著「岩里政男」的日本名。而在日本政府徹頭徹尾地離開台灣國境後，重新適應新國籍身分，學習新的語言、教育、文化與生活的李登輝，內心中那一塊難以望穿的「日本魂」究竟是否持續存在？

我們將以長年以來備受台、日、中三國矚目的「釣魚台爭議」，來推敲在主權與法律爭議之外，李登輝是以什麼樣的心情看待釣魚台的歸屬。而在卸任國家元首前，即一心希望到日本造訪「奧之細道」的李登輝，以及李登輝自年輕就心心念念、於戰爭中身故的胞兄李登欽，李登輝是帶著什麼樣的心情去到日本供奉戰士神靈的「靖國神社」。以及，為何每每李登輝造訪日本時，在諸多對外的記者會上，都彷彿吃了「誠實豆沙包」般，不斷披露以往任內的決策秘辛。

一、　奧之細道與靖國神社

在李登輝的一生當中，「勤奮好學」，大概是多數人都會對他擁有的基本認知；年少時在日本菁英教育的培養下，沉溺於書海中的無限廣闊，是李登輝最怡然自得的書香時光。如同黃文雄說道：「李登輝非常喜歡讀書，以前我就從他高校時代的同學和朋友聽說過。在世界各國元首中，應該沒有像他那麼愛讀書的人」（黃文雄 2011：59）。要瞭解李登輝口中的「奧之細道」，當從他熱愛讀書的角度來切入，才或許可以窺探其中一二。

我們先從李登輝所說的美國總統歐巴馬訪日本行看起。「二〇〇九年美國總統歐巴馬到訪日本，在訪問天皇居所的宮殿時，歐巴馬與天皇一面握手一面行九十度的鞠躬大禮，不知道有多少日本人能夠瞭解其中的意義呢？……歐巴馬總統其實是向天皇所象徵的日本文化，以及日本人所擁有的精神行最敬禮。……日本就是這麼受到全世界的尊敬，日本人應該對此銘記在心才是，而且日本的文化乃取自於配合大自然的生活當中……」（李登輝 2016：206）。

李登輝認為的日本精神，一直是深深影響李登輝人生發展的重要元素，「如果被問到日本及日本人特有的精神為何，我會立刻回答『大和魂』或是『武士道』」（李登輝 2016：216）。求學時廣泛閱讀的李登輝，因為曾經閱讀到新渡戶稻造撰寫的《武士道·日本之魂》一書，受到深深的啟發；成年後的李登輝，對於日本特有的武士道精神，也常熱於與人分享。甚至在看到日本步入所謂「失落的二十年」後，為了提醒日本人該當保有、找回曾經有的精神以及光榮感，特別在 2004 年出版《「武士道」解題》一書，藉以希望喚回日本當有的榮耀。

以此為出發，李登輝就是一位十分喜愛日本傳統的精神與文化。而所謂「奧之細道」，就名稱上來看，是日本俳諧師松尾芭蕉所著之紀行書，書名為《奧之細道》。「書中記述松尾芭蕉與弟子河合曾良於元祿 2 年（1689 年）從江戶（東京）出發，遊歷東北、北陸至大垣（岐阜縣）為止的見聞，與沿途有感而發撰寫

的俳句」（維基百科 2019e）。於是松尾芭蕉此趟遊歷所經過的各個地方，形成了後人藉以書名進行遊歷、探訪的統括名稱，稱之為「奧之細道」。

回到書的作品上，「《奧之細道》並不是現場實錄的旅遊文集，而是通澈領悟出來的文學作品。對在此作品中被描繪出來的遙遠過去之思念、和自然情景、地方上的人之交流等，實在非常耐人尋味。在那裡有芭蕉的美的意識，再加上又有日本古老的『物之哀』意識，這些使得《奧之細道》變成日本旅遊文學的代表性存在。深深瞭解日本文化與靈魂的李登輝，對這本書會如此愛不釋手，一點也不會讓人感到不可思議」（黃文雄 2011：64）。

但是李登輝這一趟心嚮往的「奧之細道」行，卻遲遲未能如願成行。早在 2000 年李登輝剛剛卸任總統不久後，就曾經在與日本作家小林善紀進行對談時，表露想要探訪奧之細道的念頭，「我想和日本人一起走一趟『奧之細道』。到石卷北邊或平泉一帶去看看，途中可以走走路或搭搭車。這是我目前的計畫」（李登輝、小林善紀 2001：191）。

李登輝與小林善紀的上述對談，約莫發生在 2000 年的 12 月，當時李登輝並沒有能夠以想要的方式去到日本，「我沒有日本簽證呢。雖然可以利用七十二小時落地簽證的方式，但是因為我曾是台灣的總統，我不希望用那種方式訪日。……我希望堂堂正正的去日本」（李登輝／小林善紀 2001：187-188）；對於李登輝沒有辦法順利地前往日本，背後當然依舊是存在著「中國因素」。

無論如何，李登輝自卸任國家元首至今（2018 年為止），一共去了日本 9 次，第一次是日本政府允許李登輝赴日就醫，所以核發簽證。而在「二〇〇四年十二月我與四位家人一塊到訪了睽違六十年的日本，得到了一週的觀光機會可以享受，接著又在二〇〇七年五月到六月，以文化與學術交流為目的造訪了日本，而且在這個時候實現了探訪『奧之細道』的心願」（李登輝 2016：222-223）。

「可惜的是，我沒有辦法踏遍芭蕉所有足跡，只有遍歷深川、日光、仙台、松島、平泉、山寺以及象潟，之後的路線只能留待下次機會了，這趟旅途讓我慢慢領略到日本人的生活與大自然之間的和諧，是我人生中最棒的旅行，永遠難忘

的回憶」（李登輝 2016：223）。截至目前為止，李登輝也尚無再一次造訪奧之細道的機會，作為李登輝國族認同研究者，衷心企盼，李登輝在未來的年歲裡，仍有機會再一次走上奧之細道，繼續完成他尚未完成的路線。

> 「奧之細道」的旅行和兄長長眠的靖國神社之參拜，是李登輝長久以來的夢想。然而因中國暗地阻撓，日本政府一直沒有發簽證給他，直到他實現為止，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日本政府很容易就會屈服於不合理的外來壓力，這種態度實在非常軟弱。在因「思慕芭蕉」而越洋過海到日本的旅客李登輝夫婦眼中，現代日本不知又是怎麼樣的日本？（黃文雄 2011：64）

正如上述提到，李登輝 2007 年的日本行，不只是圓了造訪「奧之細道」的夢想；也終於等到超過半世紀的思念，有機會到靖國神社向亡兄參拜。「靖國神社在戰後經過將近七十年，都替這個因故無法弔唁兄長的家，撫慰了兄長的在天之靈。雖然我在二〇〇〇年卸下總統職位，但因為有各種約束存在，所以訪日這件事一直沒能實現，現在睽違六十二年，再度與我感情很好的兄長見面，我終於因為能夠為他祈求冥福而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頭」（李登輝 2016：227）。

對於手足情深的李登輝兄弟而言，日本政府能夠有一個靖國神社讓在戰爭中喪命的兄長李登欽長眠的所在之地，李登輝肯定是心存感激的。那是李登輝家人心中永遠的痛，「兄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一九四五年（昭和二〇年）二月十五日於菲律賓的呂宋島戰死，但是聽聞此惡耗的父親，到最後一刻都不願承認兄長的死。……所以我家沒有兄長的牌位，也沒有墓地，自然也沒有弔唁過兄長的在天之靈」（李登輝 2016：226）。

但畢竟靖國神社，向來是「中」、「韓」兩國都抱持高度歧見的一個存在爭議。以致無論是李登輝想要去參拜其胞兄，或是日本當局首相前往參拜，都會引發爭論。乃至於與李登輝同行的記者，途中也不斷追問李登輝是否會參拜靖國神社，李登輝回答說：「已經超過六十年沒見過面的兄長就在靖國神社裡，身為他的弟弟，我來到了東京，如果你是我會怎麼做？你只要把這份心情寫成報導就可以了，請不要用政治思考，而是以身為人的角度來思考」（李登輝 2016：227）。

二、 釣魚台觀點

2015 年，李登輝出版了《新・台灣的主張》一書，這是繼 1999 年出版《台灣的主張》之後，李登輝再一次詳細的傳達他對台灣未來的關懷；當然，也在書中回答了許許多多長期以來外界對於他內心世界的好奇，以及看待某些爭議事務的態度。其中，就包括了「釣魚台」的爭議。

這一個釣魚台爭議存在許久。我們嘗試利用簡化後的輪廓，來梳釐李登輝認知的釣魚台主權歸屬。早在 2008 年馬英九即將就任台灣總統以前，李登輝就曾釋出善意，願意協助馬英九處理相關日本事務的問題，在上節中曾經粗略地談論過。但當時李登輝最為關注的，其實就是馬英九看待釣魚台歸屬的態度：「李登輝先生還建議，『馬英九先生過去在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島）歸屬問題方面，抱持和日本針鋒相對的態度，而一旦出任總統，仍須謙虛地處理台日關係』」（井尻秀憲 2010：268）。

接著 2008 年九月份，李登輝在卸任後第四次訪日，「在日本琉球參觀台灣人經營的東南植物樂園，他以日語致詞說，二次大戰期間，琉球與台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現在經常被提到的、也是琉球人很關心的釣魚台問題，『就我個人的觀點來說，釣魚台是屬於日本的』」（彭顯鈞、邱燕玲、張茂森 2008）。李登輝認為釣魚台是日本的論調，自此就在各種不同的場合之中散播，立場始終一致。

包括 2010 年 11 月 18 日李登輝上年代新聞台，由謝震武主持的〈新聞面對面〉節目專訪中，重申他認為釣魚台是屬於日本的；也包括了 2011 年在「日本文藝春秋雜誌上說：『多說幾次也一樣，釣魚台就是日本的領土』」（日本李登輝友の会 2011）。李登輝對於釣魚台的歸屬問題，無論是接受國內亦或國外媒體訪問，或者面臨隨之而來的台灣「保釣人士」、關心釣魚台主權的國人批評與抨擊，李登輝始終堅定他的立場，無所畏懼。

在此同時，我們就必須認真地檢視，是什麼樣的依據與脈絡，讓李登輝能夠毫不猶豫地回答這一個非常受人注目的爭議問題。李登輝在 2015 年說：

關於釣魚台列嶼，我從以前就主張台日之間不存在領土問題。很早以前，馬英九總統便開始宣傳「釣魚台是台灣的」，但我擔憂，那樣的宣傳只是有利於中國「藉以離間台灣與日本」而已。那樣的態度很容易撕裂台日友好的關係。……釣魚台列嶼是日本的領土，這在歷史和國際法上都是相當明確的。日本宣布擁有釣魚台的時間是在一八九五年，台灣與中國第一次主張擁有釣魚台的主權是在一九七一年。在日本宣布與有主權的七十六年後，台灣與中國才提出主張，其實是說不過去的，到頭來將會是一場空。（李登輝 2015：175-176）

那麼釣魚台為什麼屢屢成為「台、日、中」三國矚目的爭議主權所在？或許可以從兩大面向來理解。第一個牽涉到的，自然是攸關漁民捕魚的漁權問題。「釣魚台列嶼的近海，自古以來就是海產豐富的漁場，不只是沖繩的居民，台灣基隆、蘇澳的漁民也都在釣魚台列嶼的海域捕魚。然而沖繩漁民因為回程距離較遠所以比較麻煩，而台灣有基隆和台北兩個大市場，所以幾乎所有的沖繩漁民都在基隆住下並從事魚貨買賣」（李登輝 2016：109）。

簡單來說，這是一個台灣與沖繩漁民行之有年，共存共榮的漁場場域，各蒙其利，長久以來也都相安無事。直到「一九七二年，在佐藤（榮作）內閣的時候，釣魚台列嶼隨沖繩一起歸還日本，……而日本政府對於台灣過去在日本統治之下，沖繩和台灣的漁民都在一起捕魚的行為缺乏了解，所以把台灣漁民習慣到釣魚台列嶼捕魚的行為視為國際法上的領土侵略，而驅逐台灣的漁船，也因此讓台灣的漁民開始騷動」（李登輝 2016：110）。

上述是爭奪釣魚台主權的第一個面向背景成因。接著我們繼續看到在漁權之外，第二個造成主權爭議的面相是什麼。「馬總統是台灣最早炒作『釣魚台列嶼歸屬問題』的人。一九七二年，他首先在國民黨的報紙《波士頓通訊》（Free Chinese Monthly）中發表：『我們擁有釣魚台列嶼的主權』。當時正值聯合國公布海洋法，而且釣魚台周邊海域海底發現石油的消息已經傳開，在此時機，他提出『釣魚台是台灣的領土』，應該是想發揮愛國心，爭取人民的支持」（李登輝 2015：176）。是的，「發現石油」的存在，釣魚台一時之間顯得更為重要了。

台灣雖然地理位置良好，氣候宜人，農產品也向來產量穩定、不虞匱乏，但是天然的礦產資源卻是十分地稀少。單就「石油」這一項與民生、產業息息相關的礦產資源，台灣長年來都是倚賴進口油品來維持國內各項生活的基本運作。換言之，也就必須隨著國際油價的起伏漲跌，影響著普羅大眾的常日生活。政府雖然盡力地維持油價的穩定，但仍然必須看著產油大國的臉色，這是現實所在。

所以若是台灣能夠擁有足量的產油領土，這當然是放諸國際間都會令人稱羨的議題。近年來，無論是台灣南邊的南海海域石油礦產議題，或是釣魚台有無石油含量的問題，都是各國覬覦與欲逞勇奪下主權的較勁場域。當馬英九主張釣魚台是台灣領土的時候，優先考量的，除了是主權所在的宣示意涵之外，更多的想法，或許與釣魚台發現石油的存在有關。

釣魚台的爭議，迄今仍舊無解。無論是日本、中國、台灣，都各自有自己的論點與主張。我們無法因為李登輝在詳細解說釣魚台列嶼的歷史與脈絡之後，片面地相信李登輝的主張；當然，也不可能去否定李登輝的智慧與判斷。但是十分明確的是，2008 年之後，馬英九政府除了在親近中國的立場令李登輝不滿與無法接受之外，關於釣魚台的歸屬問題，同樣形成南轅北轍的各說各話。

一位卸任元首，一位 2008 年執政到 2016 年的國家領導人，從以前上、下屬的關係，到後來沒有走在一起，各自擁護不同的政黨與不同的國家路線立場，這是民主發展的一種常態狀況。李登輝的對日情懷與反中立場，對比馬英九的親中態度與捍衛釣魚台主權心態，這是截然不同的發展走向。或許這是 1998 年拉起馬英九的手，高喊「新台灣人」的李登輝，始料未及的。

向來關心台日關係是否友好的李登輝，最後在表達釣魚台主權歸屬問題的時候說：「至今為止，日台之間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就只有釣魚台列嶼的漁業權而已，只要這件事情獲得解決，台灣就再也沒有任何理由埋怨了，也不再有任何阻礙日台友好發展的事物，馬英九總統的主張也會變成虛言吧」（李登輝 2016：111）。李登輝把台日關係做了相當大程度的簡化，顯然，事情不會這麼地順利；於此同時，李登輝再一次把矛頭指向馬英九，雖不意外，卻也有趣。

第三節 李登輝的「餘生」

李登輝的一生，經常性地與「日本」這個記號產生關聯。其中最為著名的一句話，無非是李登輝在 1994 年接受司馬遼太郎訪問時，說出的：「二十二歲以前，我是日本人」。但在此之前，李登輝的從政路上，就一直遭受到來自國民黨內的政敵質疑，包括：「曾為共產黨員」、「支持台獨運動」，以及李登輝根本就是一個日本人。一直到李登輝卸任之後，有關「釣魚台屬於日本」、「參拜靖國神社」等，在在都持續地無法與日本切割。

2016 年李登輝的著作：《餘生》出版後，裡頭有關李登輝自述相關「日本」的經驗與問題，再度受到各界的討論或質疑。但是這一次的風波，早在 2015 年李登輝出版《新・台灣的主張時》，已經讓台灣社會沸沸揚揚；步入晚年的李登輝，心之歸屬究竟屬於台灣，還是最早形成國族認同的「日本認同」，再再有著好事者以及關心李登輝的人反覆的琢磨，想要了解其心中的認同，倒底是什麼。

我們同樣在《餘生》這本書中發現，曾經在 1990 年主政時經歷過「野百合學運」的李登輝，面對 2014 年台灣再一次上演大規模的學生運動 —— 太陽花學運（或稱 318 學運），李登輝充滿著對台灣青年學子的期望與不捨。我們且讓看看這一場對於台灣民主發展至為關鍵的學生運動，李登輝提出了什麼樣的看法？以及李登輝對於當權者應該如何面對純粹的學生運動，該有什麼樣的態度。

當然，李登輝出版著作題名為《餘生》，卻絕不代表他自己的生命來到了盡頭；但是這一本著作除了主標題醒目之外，副標題「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同樣吸引人的注意。如同本文是以李登輝的生命史取向分析他的國族認同發展階段一般，李登輝自己的生命歷程，當然緊緊環扣著他的國族認同發展；但李登輝的一生，卻也同時牽引著台灣民主之路的發展。

一、 李登輝看太陽花學運

2014 年 3 月 17 日，執政的國民黨國會議員以極其粗糙的方式，在國會議事中，強度關山，逕自宣布通過在台灣社會存在高度爭議的「服務貿易協議」。太陽花學運，一群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因之而起。在 3 月 18 日全面佔領國會議場後，風起雲湧的學運浪潮，在全台各地遍地開花，各地校園、甚至是生活周遭的公園，都不難發現反服貿的學生與人民，在訴說表達自己的聲音。人民不信任政府的情緒，隨後 3 月 30 日 50 萬人民上凱道活動中，展露無疑。

回顧學運發生期間，對抗政府者因不願見到主政者近年來急速過度傾斜於中國，所以希望政府能夠在「服貿協議」中急踩煞車，以致爆發了佔領「立法院／行政院」等重大新聞事件。那麼，比較起 2014 年主政的馬政府，同樣面對重大學運（1990 年野百合學運）發生時，時任總統的李登輝，是站在什麼樣的邏輯思考、政治考量下，做出的處置與回應。因為對照於 24 年後同是國民黨主政的馬英九總統執政團隊，顯然在處置上李登輝本人是看不慣馬英九政府的做法的。

> 今[2014]年三月十八日，雖然因為學生佔領立法院而引起了「太陽花學生運動」，可是即使經過了兩週，到現在馬英九總統仍然不願傾聽學生們的聲音，僅僅只是用「服貿協議如果繼續延宕下去，將會關乎台灣的信用，學生們占領立法院的作法違法」的說法來轉移根本問題上的注意力，而堅持「服貿生效」的態度。在此，我想要強調。占領立法院的學生們有學生們的意見，他們的行為也是為了國家著想，在現場的學生們沒有一個人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靜坐，他們何罪之有呢？馬總統應該盡早聆聽他們所說的話，努力讓他們及早返家或返回學校。（李登輝 2016：14-15）

是的，很顯然李登輝對於馬英九面對學生運動的處理態度，是多有質疑與不滿的。這兩位曾經在國民黨內的上、下屬，先後成為台灣的國家領導人，倚靠著的也都是同樣一個政黨 —— 中國國民黨，但卻不一定因此而能夠同心，做出一樣好、對於學生訴求的傾聽與回應。李登輝是李登輝，馬英九是馬英九。

前面章節已提到過有關李登輝在 1990 年時處理「野百合學運」的方法與態度，在此不再贅述；但是必須提到的是，在野百合學運期間，李登輝曾幾度興起

想要至學運現場探視學生們的念頭，最終聽從幕僚的建議與安全考量下，沒能成行。李登輝是那種願意走在第一線解決百姓問題的國家領導人，這一種性格，即使是在他卸任之後，我們仍舊時常看見。

所以當太陽花學運發生期間，「三月三十日，於總統府前舉辦了一場反服貿黑箱大遊行，結果台灣史上前所未見的五十萬人……把整個總統府前廣場都給淹沒了。其實那天我也想去參加，可是我的二個女兒和孫女都叮嚀我：『你的感冒不適還沒完全好嗎？讓我們代替你去就好了』孫女回家之後，興奮地跟我報告：『真的來了好多人，我都動彈不得了，沒想到會有這麼多台灣人站出來呢』」（李登輝 2016：15）。

這個時候的李登輝，早已不當總統近 14 年了，當然不再是以掌權者的身分，想要參加（親近）為台灣而奮鬥的學生運動；李登輝更多的念頭是，他樂見台灣人民勇敢站出來實踐民主賦予的權利與價值，這是他一生都在推行與努力的，他想要和大家站在一起。李登輝說：「我堅信這場學生運動已經為台灣民主主義的未來與發展帶來了偌大的影響，學生和人民已經透過身體力行展現出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台灣的未來是由台灣人來決定」（李登輝 2016：16）。

最後，我們來看到與太陽花學運同一時期發生的一個相關事件。一部由魏德聖導演所監製的電影《KANO》，在 2014 年初上映。這一部電影的大致內容是：「電影背景設定在 1931 年大日本帝國下的臺灣，講述一支由原住民、日本人與漢人所組成的嘉義農林棒球隊，原本實力貧弱一勝難求，但在新教練近藤兵太郎指導之下，拿下全島冠軍並遠征第 17 屆夏季甲子園大會的故事」（維基百科 2019c）。學運期間曾在學運現場播放此電影，引發許多青年學子的共鳴與回響。

那麼這一部電影又與李登輝有什麼樣的關係呢？在電影上映期間，李登輝曾經與妻子曾文惠走進戲院，共同欣賞這部電影，「對這部電影，成長在日本時代的李顯然很激動，看完後面對守候媒體，直道『我和你講正經的，剛才在流眼淚，流眼淚，人的精神、作法，不是只有打球，透過打球本身，每一個人這樣奮鬥，有目標，大家團結』，李還講到哽咽，『這是很好的一個教育』」（風傳媒 2014）。

91 歲的李登輝，仍舊帶著妻子一同進入戲院欣賞著時下流行的電影，當然令人好生羨慕，有著一種「只羨鴛鴦不羨仙」的浪漫氛圍。不過，李登輝笑著入場，卻是帶著淚痕與哽咽，在片後與來採訪的媒體分享著。或許是李登輝回憶起 22 歲以前的大日本帝國生活，也或許是李登輝看見「日本精神」，期望國人同胞也能團結一致、發揮「台灣精神」。無論究竟是哪一種原因，使得李老先生留下「英雄淚」，這一部電影，的確成功打中一位前總統的心。

因為這個緣由，李登輝在 2015 年出版的《新・台灣的主張》時，特別收錄與魏德聖導演的對話，題名是：「KANO 精神是台灣的驕傲——李登輝與魏德聖的對談」（李登輝 2015：211）。李登輝特別提到：「二〇一四年三月，台灣發生了震撼東亞的大事，就是『太陽花學運』。聽說在學生佔領的立法院裡特別放映了《KANO》。我很感興趣，這究竟帶給學生們什麼樣的訊息？……我聽說在立法院播放《KANO》之後，忽然出現了『台灣加油』的聲浪。甚至有女學生哭了起來」（李登輝 2015：224）。

李登輝接著說：「學生從立法院撤退後，過了幾個禮拜，我應學生們要求，在立法院餐廳與他們談論今後台灣必要的工作。其中一項是『新台灣人』這個概念。我再度強調，不要受限於來到台灣的時間和不同族群的差別，繼續建設民主台灣才是最重要的任務。魏德聖：我周遭的朋友很少有人像以前那樣會區分外省人和本省人，大家都說：『我是台灣人』」（李登輝 2015：224-225）。

是的，最終李登輝仍舊有機會與參與學生運動的部分台灣學子對談，李登輝持續闡述的，依舊是他堅持族群沒有差別的信念，以及必須繼續建設自李登輝主政時代就一直極力打造的「民主台灣」。沒有第一時間走到第一線參與兩次大規模學生運動的李登輝，1990 年的時候，選擇接著學生代表，開啟對話；2014 年，李登輝同樣運用自己的方式，找到了關心台灣青年學子的平衡點。或許，面對他一生熱於報效的國家、心愛的台灣，他總鍥而不捨地選擇最佳的方式吧。

二、　光榮赴死日本兵

2008 年國史館出版了由張炎憲主編的《李登輝總統訪談錄》，共有四冊，詳盡的記載了各個時期的李登輝重要記事。其中在第一冊「早年生活」中，就有著關於李登輝當年在日本成為學徒兵的經過與歷程。不過在這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章「求學與參戰」的記述中，當描述到李登輝當兵的經驗時，下的標題是：「圖像式的學徒兵記憶」（李登輝 2008a：97），就筆者的理解是，有關這一段李登輝的生命經驗，受訪時年齡超過 80 的李登輝，自然對於 22 歲以前生活的記憶，產生一定程度的遺失與模糊，這是無可厚非的事情。但也因為這樣，時過境遷，李登輝記憶所及，也就很可能是令他印象十分深刻的重要回憶。

關於「從軍」這件事，李登輝曾經提到，「我在一九四三年十月進入京都帝大，讀了不到半年，一九四四年二月就『學徒出陣』了。當時許多日本學生早就『出陣』，台灣人比較晚才去做兵。這當然是上面派的，不是我們自願去做學徒兵」（李登輝 2008a：97）。李登輝說得坦然，也是人情之常，應該鮮少有人展現積極的態度想要加入戰爭的行列吧。不過採取消極面對「參戰」的李登輝，卻有著一個性格截然不同的兄長，李登輝著作的《新・台灣的主張》，就曾經轉載過一段李登欽當時接受《台灣日日新聞》訪問的報導：

> 報名的時候，我[李登欽／岩里武則]本來就有自信會考上海軍特別志願兵。如願以償後，內心還是欣喜無比。當然，在後方身為維護治安的戰士，為國效力，同樣是在奉公。但可能的話，我還是希望能在第一線盡展所能為國效力，現在終於如願以償了。而且我能夠加入無敵帝國海軍，在光榮的軍艦旗下從事擊潰英美的工作。我這輩子從未如此興奮過。從今而後，我只祈求成為堂堂帝國海軍報效國家的那天能夠早日到來。（李登輝 2015：53-55）

李登輝後來又說：「『身為決戰下的學員，我們最殷切的想法是，無論如何，都要在大東亞戰爭中獲勝。』……這既不是所謂的學員動員，也不是徵兵，完全是自己決定自願入伍的」（李登輝 2015：51-52）。沒錯，在這裡看到的，是李登輝「自願」從軍，而不是前述所提，「不是我們自願去做學徒兵」。後面這一個說法，是李登輝 2015 年的著作裡描述的，其實觀察李登輝所說過的話，總是

不難發現前、後對於同一件事情的看法，李登輝偶有不是那麼一致的發言；或許是主要論述的對象，或是事情再更深入研析，呈現的落差樣貌。

我們且以李登輝最新的說法來陳述李登輝當年成為日本兵的那一段生命史，來嘗試了解李登輝當時抱持的心態，以及對日本國家的認同。李登輝說：「『武士道的真諦，就是發現死是什麼』—— 正如《葉隱》的精神，為了自己的國家，就算戰鬥到死，也無怨無悔。對一個接受日本統治時代的教育，並且成為志願士兵的台灣青年來說，這是極為自然的想法」（李登輝 2015：52）。

這也就是本段落標題提到的：「光榮赴死日本兵」。當然，李登輝最後幸運地免於戰爭的非死即傷，算是平安地存活了下來；不過，他一生敬愛的兄長裡的李登欽就沒如此幸運了。「聽說當時在馬尼拉灣，日本要撤退時，他做しんがり，日本人說的『殿軍』，掩護軍隊撤退，結果被美軍打了幾十槍，中槍而死，屍體沒有留下來」（李登輝 2008a：32）。李登欽死於戰爭之中，也就是第七章提到過「靖國神社」的李登輝相關情感與參拜的討論了。

李登輝回憶道：「當年，我哥哥是最優秀的巡查，任職於台灣最大的警察署。為了當兵，他拋棄了原來職位，留下年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離家而去。究竟當時他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儘管到今天，距離哥哥陣亡以七十年，我內心還是無法理出頭緒」（李登輝 2015：55）。

李登輝坦然地敘述出年輕時報效「國家（日本）」的心，對於彼時是馬英九主政下的國民黨政府思維，當然是高度鄙視與不認同的。就「中華民國」史觀而言，日本是挑起「八年抗戰」的萬惡帝國；無論是打從「七七事變」開始，或是到「南京大屠殺」的階段，每一段都是中華民國的傷痛記憶所在。終戰 70 年後，見到了一位曾經擔任中華民國總統的卸任元首，如此深刻的懷念願光榮赴死、報效日本帝國的記憶，肯定心裡非常不安與憤怒。

對於中華民國而言，李登輝觸及回憶二戰相關陳述的時刻，也正是馬英九政府擴大舉辦「抗戰勝利 70 週年」的時刻，李登輝的所有言行，也就自然會被放大檢視。時任總統的馬英九，也對此作出回應：「出席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

復 70 週年』音樂會時，受訪時被問到此事，他生氣地說，一個作過 12 年中華民國總統，現在還享受總統卸任禮遇的人，居然會說出這樣出賣台灣、羞辱人民跟作賤自己的媚日言論，『我感到非常地震驚痛心與遺憾』，認為這樣怎麼地對得起抗日戰的台灣先賢先烈以及兩千萬犧牲的軍民同胞」（賴于榛 2015）。

面對馬英九高分貝的批評，李登輝當然也不會示弱，「前總統李登輝 7 月底接受日本雜誌《Voice》專訪，提及台日同屬一國，因此二戰時期『沒有對日抗戰』，雜誌出刊後，總統馬英九大動作抨擊他媚日，應向國人道歉。李登輝 22 日表示，『老實人被要求道歉，那說話豪沒的要怎樣？』……做政治的，就是要跟老百姓說實話，台灣那時後屬於日本，哪有抗戰？去問 70 歲以上的人就知道了，國民黨過去在中國大陸對日抗戰，並將此想法帶來台灣，『台灣沒有這樣啦！』」（張語羚 2015）。

一段對於 70 年後提起的回憶往事，是李登輝的史觀，卻也是他記憶傷痛、與兄長天人永隔的悲傷所在。後來演變成上綱到現任總統必須跳出來大聲批判、指責卸任元首，這是台灣的現況也是不幸。中華民國當然有著「抗日」的史觀，但如同李登輝所說，台灣沒有抗日的史實，因為當時台灣歸為日本所殖民，這也是存在的事實。或許各說各話，就是現在所呈現遭到扭曲的台灣價值。

第四節 此一時期國族認同狀態分析

此一時期的李登輝生命史，是本研究最後登場的李登輝生命史分析階段，現今的李登輝，當然健康地持續在奉獻與燃燒他對台灣的愛與熱情。但囿於本文篇幅與必須階段性完成目前已經呈現的李登輝國族認同狀態，只能做出取捨；在自李登輝卸任後，台灣已經完成三次和平政權轉移的 2016 年，暫且依此時間點，做為本文李登輝生命史的階段性終點所在。

我們在上一時期的李登輝國族認同狀態中，看見其認同發展進入到了「台灣獨立版」的台灣認同。而為何在短短七年間，同樣是卸任元首的李登輝，吾人再次做出分野，讓李登輝生命階段再次出現不一樣的國族認同樣貌？原因在於即使

已不再高任總統，李登輝所呈現出的國族認同狀態，也並非自此抵定、再無分歧。況且國族認同本就是可以展現流動的一面，我們必須更加細緻探究其中。

為此，本段落的第一大項：台灣已經獨立的台灣認同，闡述的內容即是李登輝在前一時期已經完成的「台灣獨立版」台灣認同，到了 2007 年之後，其實認同符號已經產生變化。李登輝一再公開表明自己「沒有支持台灣獨立」，因為「台灣已經獨立」，則無須再重申與強調「追求獨立」的必要。這當然與前一時期狀態的樣貌，與吾人的認知產生明顯的不同。

除此之外，人生進入晚年的李登輝，生命力依舊強韌。一方面持續以前國家元首的高度，針砭時政、甚至是若干程度的參與其中；一方面也透過接連出版的著作，去宣揚自己堅持一輩子的信仰及信念。李登輝也不忘利用機會，出訪外國，實踐了自己心心念念諸如走訪日本「奧之細道」與參拜「靖國神社」的願望。

我們也看到李登輝在這幾年中突然「大量」的回憶有關日本生活的一切經驗，包括教育、文化、軍旅、國族認同等，這是非常特殊之所在，有必要一併放入探討。最終則是看到基督教信仰對於李登輝長久以來的影響，以及到老仍舊透過身體力行於公共事務，展現出對於死生意義的超然態度。「台灣已經獨立版」的台灣認同，我們應當如何解讀與詮釋？於下展開三大部分各自的不同探究。

表 8-2：本階段時代大事與生命史事件：卸任國家元首的晚近時期

時間	時代大事	生命史事件
2007 年		1 月 29 日，《壹週刊》報導「放棄台獨」說，引發軒然大波
		5 月 30 日，抵達日本進行卸任後第三次訪問，除參訪「奧之細道」外，並至「靖國神社」參拜亡兄李登欽英靈
2008 年	3 月 22 日國民黨籍馬英九當選第十二屆總統	3 月，表態支持民進黨提名總統候選人謝長廷
		9 月 24 日，卸任後第四次訪問日本，強調「釣魚台」主權是日本所有

2010 年		6 月 26 日，參加「反一中，ECFA 要公投」遊行，大批馬英九不再適任總統
2011 年		1 月，接受日本《文藝春秋》專訪重申釣魚台是日本的
		11 月 2 日，進行大腸癌二期切除手術，術後平安
2012 年	1 月 14 日，國民黨籍馬英九連任成功，當選第十三屆總統	1 月 13 日，為蔡英文競選總統輔選站台，表示可能是人生「最後一次拜託」
2014 年	3 月 18 日，爆發「太陽花學運」	3 月 10 日，與妻子曾文惠前往戲院觀看電影《KANO》，淚灑戲場
2015 年		7 月 23 日，在日本舉行記者會再次強調釣魚台是日本的
		9 月，出版新書《新・台灣的主張》
		12 月 15 日，孫女李坤儀完婚
2016 年	1 月 16 日，民進黨籍蔡英文當選第十四屆總統	2 月 1 日，出版《餘生》
	2 月 1 日，國會選出首次民進黨籍立法院正副院長	
	5 月 20 日，蔡英文就任總統	5 月 20 日，見證第三次和平政權轉移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一、 台灣已經獨立的台灣認同

確立李登輝在上一階段呈現「台灣認同」的國族認同狀態之後，扣連於前的國族認同標籤，究竟是「台灣獨立」或是「台灣已經獨立」，是我們必須不斷思辯的重要探討。但在本段落所要探究的「台灣已經獨立的台灣認同」，我們仍舊必須提出三個重要的討論，來說明為何有著如此的宣稱。這三個討論分別是：「片面扭曲放棄台獨」、「主張台灣已經獨立」，以及「堅決守護本土政權」。依照慣例，我們依舊先從第一個論點：「片面扭曲放棄台獨」，進入討論之中。

在上一時期當中，有關李登輝支持台灣獨立運動、具有台灣認同的國族認同狀態，已然深刻烙印在外界普遍對於李登輝的認知中。即使李登輝從未親口說出

「主張台灣獨立」，我們仍舊能夠透過其他方式的佐證，分析李登輝 2000 年以後的國族認同狀態，呈現出「台灣獨立版」的台灣認同。

然而就在 2007 年的 1 月間，李登輝的支持台獨與否，再次引起軒然大波。如同先前提到，採訪李登輝的《壹週刊》，片面式地扭曲了李登輝所欲傳達有關台灣主權獨立國家的說法，讓李登輝必須立即做出更貼近事實的回應，李登輝說：「更進一步說，其實我從未主張過『台灣獨立』。……台灣已經實質獨立，沒有必要在國際社會做出引起爭執的發言；我認為，台灣能夠以台灣之名而『存在』，才是唯一的重點」（李登輝 2015：125）。易言之，在李登輝的認知裡，「不曾主張台灣獨立」，又何來「放棄台獨」之說。

是的，就李登輝「善用文字」的詮釋上，的確無法精準找出李登輝宣稱主張台灣獨立的說法，反而是看到了更多李登輝不認為自己是台獨同路人的用詞：「二〇〇八年立委選舉前，李登輝公開宣稱：『我不是台獨份子，我也不主張台獨』」（黃鈺淳 2010：89），就讓人深感霧裡看花，對於李登輝的台獨態度，無法做出明確的判斷，也就讓外界有了更多想像與解釋的空間。

具體來說，李登輝對於媒體報導「放棄台獨」、「李登輝轉向」抱持反對的態度，其中很大的原因在於李登輝認為媒體扭曲了他的原意，並沒有完整地報導他所傳達的理念與價值。也或許在李登輝心中的真正想法「並不認同那些高唱『台灣獨立』的基本教義派。坦白講，陳水扁過去很依賴這些人，他們整天拚命喊『獨立』，也不太認真思考如何具體處理台灣的各種問題」（井尻秀憲 2010：215）。

第二個主要關注，是「主張台灣已經獨立」。我們從李登輝卸任總統後的所作所為中不難發現，再也不需要中華民國標籤、擁護中華民國立場的他，開始了走向擁抱台灣獨立運動。除了前述組織台獨立場鮮明的台聯黨外，李登輝也積極參與各項有關台獨社團、組織的大小活動，公開演講、宣揚他的台灣獨立理念。

但從上一段的記述當中，我們卻也看到了李登輝是矢口否認有關他主張台灣獨立或者放棄台灣獨立的說法。那麼究竟什麼才是李登輝認定的台灣獨立狀態？在前述《壹週刊》引發的風波後，「兩天後，李登輝接受 TVBS 專訪時，他說，

他不必追求台獨，因為台灣事實上已經是一主權獨立的國家。他又說，追求台獨是退步，而且是危險的作法；因為這種作法不但把台灣降格為未獨立的國家，傷害台灣的主體性，也會引起美國、大陸方面很多問題」（黃鈺淳 2010：116）。

對於李登輝來說，「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意即「台灣已經獨立」；無需再去追求獨立，也不應該將台灣降格為未獨立的國家，是他對於台灣獨立情況最具體的看法。這樣的論述，事實上也反覆出現在李登輝的自述當中：「我真正的意思是：『台灣已經是獨立的國家，現在沒有必要再宣告獨立了』」（李登輝 2015：124）；這正是本段標題所說：「主張台灣已經獨立」的意思。

但我們卻也看到許多研究李登輝的學者，大多認為李登輝就是一個支持台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這幾乎是毫無懸念的普遍認知。李登輝卻在 2007 年接受 TVBS 專訪的時候，明白地指出他從來沒有主張台灣獨立；這樣的話語一出，當然引起外界的好奇與質疑。李登輝怎麼會是一個不支持台灣獨立的人？又或者他的從未主張又是怎麼一回事？

對於李登輝而言，他的論點十分清楚，在他的認知之下，台灣沒有獨不獨立的問題存在；因為，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他認為台灣無需再喊要不要獨立的問題。這是李登輝式的台灣獨立解釋。但不只於此，李登輝更清楚地指出了台灣雖然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卻不是一個已經正常化的國家，唯有持續克服台灣的不足之處，才可能早日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這是一段非常拗口，也必須仔細閱讀的李登輝版的台灣獨立說。在李登輝的論述中，兩個迫切克服的問題，就是台灣必須正名，也就是把中華民國的國號改掉。第二個是捨去不適宜台灣現狀使用的中華民國憲法，應該讓台灣人制定一部真正適合自己國家的憲法。「正名與制憲」，就是這一段時期李登輝積極鼓吹以及倡議的台灣邁向正常化國家的必經之路。

李登輝並沒有像是 2007 年媒體報導的放棄台獨或者轉向，李登輝還是李登輝，一個支持台灣獨立、具有台灣認同的李登輝。但如同我們一直熟悉的李登輝，他所說的話在許多時候並不是一時片刻能夠消化與理解；因為，在他話的背後，

往往有著另一層沒有在字面上的含義，也或者可以解釋為但書。從未主張台灣獨立的李登輝，其實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幫助台灣早日成為一個真正民主自由的主權獨立國家，但李登輝性格使然，他不一定會掛在嘴邊。

接著進入第三個重要的討論，李登輝「堅決守護本土政權」。源自於陳水扁總統及其親屬、親信爆發的貪腐形象危機，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本土政黨政權，8年之後，就拱手讓國民黨所取回去了。即使李登輝在 2008 年總統大選前表態支持民進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謝長廷，依舊無力回天，民進黨甚至是以懸殊的票數慘敗，並且走入空前的谷底低潮。

這一切看見李登輝的眼裡，肯定不是滋味，至少在 2000 年時，他可是沒有受到國民黨敗選的影響，依然歡歡喜喜的完成了和平轉移政權。不過選舉的有輸有贏，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常態；一生經歷無數選舉戰役的李登輝，卻也不會因此而懷憂喪志，李登輝甚至還願意成為馬英九政府的橋樑，為馬英九總統處理其相對陌生且有些許過結的對日關係（當然馬英九最終沒有拜託李登輝）。

而在馬英九政府上台沒多久之後，李登輝最不樂見的情形發生了。馬英九總統開啟了一連串親中的措施，過度的傾斜中國，致使台灣的主權捍衛陷入危機。馬英九支持的不存在的「九二共識」，讓卸任後一再強調聲明台灣不屬於中國一部分的李登輝，感到焦慮與不滿，李登輝甚至是走上街頭抗議；李登輝說：「我在大雨中發表演說批評：『既聽不見人民的聲音，也不讓人民公投決定，馬總統已經沒有資格當台灣總統了』」（李登輝 2015：135）。

這樣的惡化的台、中傾斜情況，讓李登輝直指馬英九不再適任總統一職。以致於當 2012 年民進黨由蔡英文代表角逐競選總統之後，憂心台灣前途的李登輝，即使是抱病的情況下，仍舊賣力為蔡英文站台輔選。顯而易見的，李登輝是擔心馬英九政府若是取得繼續執政的機會，將很可能對台灣人民產生最大的不利。

蔡英文最終沒能在第一次參選總統的機會中，贏得最後的勝利，李登輝也只能繼續完成自己未竟的志業，持續不斷推動台灣獨立的各項議題所需。時間一直

到 2014 年地方型九合一選舉之後，民進黨在該場大選中開出亮麗的成績（學運因素後敘），距離本土政權重返執政之路，似乎又再進了一步。

在這連續三次的總統大選裡頭，我們看見李登輝不斷擔心的身影，他總是希望，台灣人總統能夠順利延續；如同黃文雄（2011：170）所說：「李登輝賭上剩下的生命，將自身奉獻給台灣，在這裡不可或缺的是全台灣人的自覺和覺醒」。所幸天佑台灣，李登輝在 2016 年時，總算見證了台灣第三次的政權轉移。

二、　晚年特殊的日本經驗回憶

釐清上述的「台灣已經獨立的台灣認同」之後，接著討論在國族認同之外，此生命階段李登輝呈現出的「晚年特殊的日本經驗回憶」。同樣地，我們將分述三個不同的觀察，來闡明李登輝此時期特殊的日本經驗回憶，分別是：（一）奧之細道與靖國神社、（二）武士道與日本精神、（三）追憶效忠日本皇軍。照例，我們先從「奧之細道與靖國神社」說起。

卸任總統後的李登輝，一直到 2018 年底以前，一共去了日本九次；算起來就是平均兩年左右會去一趟日本。這其中當然有時候是醫療需求考量，必須赴日就醫而去的日本行，但是相較其他國家來說，李登輝的確蠻頻繁地飛往日本。或許，這和他精通日語，也曾經赴日留學，更當過「日本人」有著密切的關連。

而這九次前往日本的訪問當中，2007 年終於如願造訪「奧之細道」與參拜「靖國神社」供奉其亡兄神靈的訪日行，應當是李登輝甚為欣慰的一趟旅行。如同前述所提，李登輝甚至說這一趟旅行「是我人生中最棒的旅行，永遠難忘的回憶」（李登輝 2016：223），就可以知道李登輝有多麼滿意去到奧之細道與靖國神社。

那麼為什麼這一趟旅行令李登輝印象深刻、回味無窮？以奧之細道來說，是李登輝長期以來專研日本古文學的心嚮往所在。深受日本教育與文化影響的他，一生也都在體認日本「大和魂」與「武士道」的奧妙，而黃文雄也提到：「李登輝是出了名的讀書人，他亦非常喜歡詩歌。我到他家訪問時，他向我講解有關武

士道和《奧之細道》的種種，就連芭蕉的俳句，他都能朗朗上口，讓人非常吃驚」（黃文雄 2011：62）。

另外一點則是終於到了「靖國神社」的現場。與李登輝同樣在戰爭時自願報效國家的兄長李登欽，不幸於戰爭中罹難；李登輝一直苦無機會去參拜他手足情深的兄長，終於在戰爭結束 62 年後，才得以一償宿願，完成了對李登輝非常重要的大事。李登輝自然會對這一趟旅行留下永難忘懷的記印。

李登輝回憶道：「二〇〇七年六月七日，哥哥陣亡的六十二年，我終於在靖國神社見到哥哥。哥哥是海軍陸戰隊員，在馬尼拉之役負責斷後，不幸為國犧牲。能夠在靖國神社哥哥的靈前深深鞠躬，祈求哥哥在天之靈安息，讓我感到非常欣慰。……來靖國神社參拜，畢竟是我身為家人、身為一個人該做的事，我不希望有人以政治或是歷史的角度來看待」（李登輝 2015：60-61）。

無論是走訪「奧之細道」，或是至「靖國神社」參拜，都是李登輝多年來希望一償宿願的重要大事。而在此二者之間，有一個地理上的共同點，那就是，它們都存在於「日本」之中。22 歲以前是日本人的李登輝，自己的年歲進入晚年以後，時常提起自己在日本時代所經歷過的生活經驗與回憶，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也正是我們第二個要討論的：「武士道與日本精神」這兩件事。

讓我們先看到有關李登輝口中「武士道」的這件事。源自於青年時期啟蒙自「新渡戶稻造」先生的著作《武士道・日本之魂》，李登輝自年少時即已對日本獨特的武士道深深著迷。一直到了西元 2004 年李登輝甚至撰寫成書，出版《『武士道』解題：做人的根本》，我們可以看出李登輝對於武士道的信仰與重視。

在《『武士道』解題：做人的根本》中，李登輝亦明白指出他為何如此重視「武士道」，李登輝說：「對於總統任內十二年的奮鬥，我自詡確實能一貫始終地朝理想奮鬥前進，而我內心最大的支柱，當然就是早年『日本教育』打下的『大和魂』，也就是『武士道』精神」（李登輝 2004：77）。

那麼什麼是李登輝口中的「武士道」精神？黃文雄解釋道：「他所謂的武士道精神，具體是指秩序、名譽、勇氣、潔身自愛、惻隱之情（同情心）、實踐躬

行（親身實行）等。奉公精神是不可欠缺的。這些都深深地滲透在生活之中，成為日本人的行動基準以及生活哲學」（黃文雄 2011：188-189）。

有了上述的認知後，我們方可進入到標題的第二件要事上：日本精神。一如李登輝所說：「台灣人總是習慣把『日本精神』這個詞掛在嘴上。這是台灣人接受日本統治時學到的，也是日本戰敗後從中國大陸來的中國人身上看不到，台灣人引以為傲的精神。日本精神代表『勇氣』、『誠實』、『勤勉』、『奉公』、『自我犧牲』、『守法』及『清潔』的精神」（李登輝 2015：17）。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武士道精神」，其實幾乎等同於「日本精神」，也就是李登輝所說台灣人引以為傲的精神。換言之，接受日本教育長成的李登輝，一直沒有忘記日本帝國教育留下了什麼樣好的價值以及值得的精神學習。這一種武士道／日本精神，深深烙印在李登輝的思維當中，即是到了晚年超過 90 歲的高齡，李登輝依舊透過著作，分享他認為好的日本教育。

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思念。李登輝就曾說過，「現在，大概沒有人會否認台灣是『世界上最親日的國家』這個說法。非但是經歷過日本統治所謂的日文世代，就連年輕一輩也有很多是親日派。但長久以來，台灣人對日本的感情，或許只是『單相思』」（李登輝 2015：32）。沒錯，即使是「單相思」，李登輝仍舊不忘學自日本教育中的日本／武士道精神，正如李登輝所說：「我長期接受『日本式教育』，對於我的人格養成具有莫大的意義」（李登輝 2015：34）。

第三，是李登輝有關「追憶效忠日本皇軍」的特殊事例。人生步入晚年的李登輝，依舊沒有停下他對國家社會的關懷，也沒有停下他產出著作的腳步。2015 年《新・台灣的主張》、2016 年《餘生》的相繼問世，成為了李登輝在近晚當中非常重要的著作。除了在書中持續表達對於國政、國際的關懷、建言提出之外，回憶日本生活經驗，同樣佔了許多篇幅與更深度的敘述。

在這所有有關日本生活的追憶之中，除前述提過的「奧之細道」、「靖國神社」、「武士道精神」、「日本精神」以外，李登輝曾為日本帝國軍的相關記述，

也是格外珍貴的一章。像是前述提過有過「靖國神社」的過往，李登輝即曾在著作中描述其兄長：「要成為堂堂帝國的海軍，報效國家」（李登輝 2015：55）。

那麼為何李登輝在卸任元首之後，一再提起他與他的胞兄曾經參與戰爭的這段回憶？並且對於當時台灣有無「抗日」的事實爭辯上，李登輝同樣非常在意他的立場與他認知的既存事實。或許這是一段李登輝難以撫平的悲傷戰爭記憶，於是抱持了異於常人的執著與不可能的忘記。

李登輝對於日本特殊的情感成因諸多，但「學徒出陣」、曾經參與戰爭的這件事情上，應當佔有很高成份的比例。摯親不幸戰死於沙場，直到李登輝的人生步入晚年，才得以親赴由日本政府設置的靖國神社參拜兄長，那是相隔 62 年的重度思念，也讓我們再度想起為何李登輝總說他的兄長對他影響很大。

沒戰死的李登輝，並不代表他不勇敢，也不代表當時的他沒有熱愛祖國日本的心。因為戰爭天人永隔的兩兄弟，面對可怕的戰爭都無所畏懼，因為他們都抱持著熱愛國家本的心，從容就義。多年後，李登輝特別追憶這段經歷，台灣出生的李氏日本人兩兄弟，在國難當頭之際，誰也沒有讓誰、誰也沒有阻止誰，先後加入日本帝國軍，挺身守護著他熱愛的國家、他當時毫無疑問的日本國族認同。

三、　人生最後的心力奉獻所在

如同標題所示：「人生最後的心力奉獻所在」，本段落將逐一闡述，在此一生命時期逐漸步入人生晚年的李登輝，尚還有哪些重大的心力投注所在。端此，我們找到了三件具有重要意義的生命史事件，分別為：（一）釣魚台事件引起的爭議風波、（二）太陽花學運後的評論與展望、（三）基督教信仰與探究死生意義。對於研究李登輝國族認同的最後篇章，這些仍然是重要的依據與線索。

且讓我們從第一個重要事件的：「釣魚台事件引起的爭議風波」，開始說起。李登輝與馬政府爆發爭辯的「釣魚台」爭議。自 1972 年以來，馬英九就不斷主張釣魚台的主權屬於台灣，甚至引用法律、撰寫文章、參與保釣來宣告天下。但

是學識涵養不下於馬英九的李登輝，卻提出了迥異的論述；李登輝無懼挑戰與批評，一再明白地舉證與闡述釣魚台主權是屬於日本的。

李登輝就是這麼硬脾氣的人。當他認為該有是非立場的時候，他絕不會因為社會輿論的壓力而低頭。如同 2015 年李登輝出版新著：《新・台灣的主張》，談論有關二戰時期他光榮成為日本兵的心路歷程；即使明顯地與主政的國民黨政府有著截然不同的史觀，他仍舊無所畏懼地點出在殖民歷史的脈絡下，「台灣不存在抗日的史實」。這就是李登輝，「戰鬥到死，無怨無悔」的「日本精神」。

有關於釣魚台主權歸屬問題與馬英九總統的立場完全不同，李登輝是可以不厭其煩、帶著心情平靜的心，來向社會大眾反覆論述與舉證他抱持的看法。但是一遇到馬英九政府不斷傾斜中國的問題，李登輝就不會維持平靜的情緒，來看待攸關台灣主權的嚴肅課題。

第二個別具意義的事件探討，則是有關李登輝「太陽花學運後的評論與展望」。然而不管馬英九政府再怎麼樣的倒行逆施，他終究還是經過選戰的洗禮，是透過一張張選票堆疊當選的台灣總統，以現行的台灣選舉罷免制度來看，只要順利贏得選舉之後，若沒有碰觸「內憂」、「外患」的問題，很難透過現有的機制讓總統下台；陳水扁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即使當時倒扁聲浪喊得震天價響，施明德為首的「紅衫軍」長期進駐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到道進行抗爭，國會跟進提出倒扁案，陳水扁依舊完完整整做完八年任期。

所以面對不適任總統的情況，最符合期待值的，大概就是在下一次的選舉之中，利用選票來告訴執政者的施政不力，或是沒有滿足人民的期許。會有上述的敘述，其實是要說明，在民主體制中，人民當然能夠表達或是宣洩心中的不滿，但即使擔任過國家領導人的李登輝，雖然看見馬政府執政的缺失與馬英九的不適任，仍舊沒有多餘的能力，立即來解決與改善國家面臨的危機。

這是為了維持國家政權安定性的必要之惡。因為若是一個政府容易被推翻，整個國家將應此而陷入動盪不安，政權的不穩定性一旦提高，最終受苦的依舊是人民百姓。但或許台灣真是一個上帝保佑的應許之地，李登輝自馬英九政府執政

後的憂心忡忡，在眼征征就要看著馬英九把台灣駛向中國彼岸之前，「太陽花學運」如同及時雨般的出現，立刻澆熄了馬政府一昧親中的賣主權熱情。

主政時遇過大規模學生運動 —— 野百合學運 —— 的李登輝，非常樂見台灣的民主發展有著一群象徵活力、青春與未來無限希望的學生參與。距離倒數人生百歲僅剩個位數的李登輝，無疑為台灣的民主發展感到開心與驕傲。在李登輝或是個在野黨政治菁英不一定有能力直接回擊馬英九政府的不當施政之際，學生運動的純粹與真誠，讓李登輝的關愛台灣的「餘生」，頓時更加無比的璀璨。

最後，讓我們看到第三個在此生命階段具備意義非凡的重要討論：「基督教信仰與探究生死意義」。信仰是分析李登輝生命史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構成要素。自青少年時期開始探索死生意義的李登輝，接觸了「禪宗思想」，也透過閱讀的世界，企圖找尋對於生命意義的解答。直到接觸了基督教信仰之後，茫然於思想世界中的李登輝，終於有了可供其追尋內心世界以及心靈倚靠的重要根據。

這一份對於基督信仰的信念，橫貫了李登輝往後所有不同的生命時期，即使卸任之後肩上再無重擔的李登輝前總統，仍然不斷地傳達信仰的重要性：「就信仰而言，每個人相信的神可能都不同，……我認為人要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信仰就不可少，就個人層次而言，信神非常重要」（李登輝 2009：20）。或許這正是李登輝深度探究死生意義後，認為人生而於世上，信仰是無可避免的必要伴隨。

因為有了信仰，讓李登輝直到年老，仍舊正面迎擊探索「死生」的意義之上，並且毫無畏懼的身體力行：「李登輝到了近九十高齡，仍然參加站台助選的工作，那是因為他公開表示，『只要還沒看到台灣真正的民主化，我就不闔上眼』。在此我們可以看到，他瞭解生死真正意義的生活態度」（黃文雄 2011：102）。

本研究的主標題：「我是不是我的我」，即是引用自李登輝澈底探究信仰與死生意義之後，產出對於生命態度的領悟。李登輝說：「內心存在用深深的愛寬容別人的神，於是自我中心的自我消失，產生凡事為他人著想的心靈與思想。這種狀況我稱之為『我是不是我的我』，也就是在否定自我的基礎之上建立對他者的肯定，以抱持澄清的心靈面對未來」（李登輝 2009：36-37）。

第五節 小結

本時期進入李登輝國族認同發展階段的尾聲，究竟本研究擷取長達 93 年的李登輝生命史，能否透過 Cross 黑人化模型發展，找尋到李登輝國族認同發展的最終樣貌？筆者只能說，認同是會流動的，並非一成不變的，我們只能透過大量文本的爬梳，嘗試理解李登輝在各個生命階段中，最為可信的國族認同狀態。

換言之，本研究將李登輝的生命史限縮在 2016 年以前，得出的最終國族認同樣貌，亦僅是到了 2016 年時，李登輝的國族認同發展呈現。或許在往後持續走下去李登輝的生命史，亦可能再次出現李登輝國族認同的轉變，李登輝再次進入認同循環亦或產生新的國族認同。當然，認同發展若是能夠順利進入「內化期」，則國族認同的狀態，將相對呈現穩定；也就是 Cross 黑人化模型發展內容中所提示的：「在此指的內化，是建構一種深植入內心深處的非凡意義」。

李登輝在前一生命時期的國族認同發展來到了「台灣獨立版」的台灣認同當中，吾人亦明確地指出李登輝是進入了「內化期」的階段。於是，此一時期是否在內化期之後，認同發展及呈現不變穩定的狀態？亦或是進入了「認同循環」之中？將關乎我們能否宣稱李登輝最終形成「台灣國族認同」的關鍵所在。

於此，我們第一個看到了在我們認為李登輝已然形成「台灣獨立版」的台灣認同之後，李登輝就在 2007 年引發李登輝是否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的論戰。依照李登輝的說法，媒體將他受訪回應的台灣獨立論述曲解，以致李登輝必須充分地向外界說明他的台獨立場。於是我們看到了李登輝主張的「台灣已經獨立說」。

對於李登輝來說，他透過身體力行的實踐，讓各界看見他「守護本土政權」的決心；在他的心中，台灣早已不存在需要「宣布獨立」的議題，因為「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只是台灣必須持續推動國家正常化，亦即在上一時期即開始主張的「正名」、「制憲」以及「建立人民的國家認同」。

另外，本研究特別點出，李登輝在本時期生命史的呈現上，出現了一個特別的記號，亦即：「晚年特殊的日本經驗回憶」。曾為日本人，在 22 歲以前呈現

「日本國族認同」的李登輝，步入晚年之後，面對過往的國族認同並未否定以待，而是抱持正面的態度，去看待所有一切曾在日本生活的過往。李登輝甚至明白的說：「不論是精神文明或道德方面，日本都是唯一能夠成為亞洲領袖的國家。作為東西文明融合之地，實現明治維新的日本，到現在還是台灣應該學習的偉大兄長」（李登輝 2015：204）。

對李登輝而言，無論是走訪「奧之細道」、參拜「靖國神社」、推崇「武士道」與「日本精神」，再再都只是認為日本是一個充滿文化底蘊，值得台灣效法的成熟國家。即使李登輝追憶過往投效日本帝國軍，也只是透露出無論是在什麼樣的動盪背景下，作為國家之下的子民，都應當懷抱愛國之心，願意犧牲奉獻，即使身處於殖民的體制之中亦然。

這些都與李登輝已然形成的台灣認同無關。李登輝並非再次燃起「日本認同」，而在晚年大量回憶起日本生活的過往，也就是黃鈺淳所說：「不同的認同並不必然呈現絕對斷裂，選擇新認同是因應環境的變化，藉由既有文化資源選擇內在的歸屬，而非敵意或揚棄，這個部分的釐清有助於解釋為何李登輝在打造最終的台灣認同後，不盡然厭惡日本認同或中國認同」（黃鈺淳 2010：129）。

在李登輝「主張台灣已經獨立」的宣稱下，配合此一生命時期李登輝呈現的各種有關國族認同樣貌，吾人認為李登輝已經來到了認同循環當中。於此認定下，我們也同時看見了李登輝關心「學生運動」背後隱藏的社會階級和貧窮問題。離開總統職務許久的李登輝，依然持續表現出對於台灣社會的關懷；年邁的他，或許不再追求任何所謂的「生涯發展」，但卻依然實踐其對生命意義的最真態度。

最後，橫貫李登輝生命超過半世紀的「基督教信仰」，在此生命階段依舊沒有缺席；這是在「內化期」中，關懷其他認同的重要標記。中華民國／中國認同再也不是困擾李登輝國族認同的影響因素，李登輝對於新形成的「台灣認同」，也有著自成一格的解釋與看法，我們可以從他的言行之中清楚看出。最終，進入 Cross 黑人化模型發展階段內化期的李登輝，吾人的分析結果，即是李登輝的國族認同發展，完成了「台灣已經獨立版」的台灣認同。

第九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 李登輝各生命階段國族認同狀態綜合回顧

讓我們再一次完整地回顧李登輝各個不同生命時期，生命史是如何呈現與國族認同發展的各式樣貌。首先，李登輝出生於 1923 年的台北州淡水郡三芝庄，當時日本殖民政府已統治台灣將近 30 個年頭。出生於漢人家庭的李登輝，雖短暫、片斷地學習過漢文，但童年至青少年時期，主要接收的學校教育與養成，仍是最純然的日本式菁英教育。李登輝完成了日本教育體制下的公學校、中學校，以及高等學校教育，並於 1943 年遠赴日本攻讀帝國大學學業。

在學校教育的過程之中，李登輝盡力在課業上的卓越表現，努力地透過流利的日語、擠進台北高等學校的窄門，為的是自感於殖民體制下次等國民的日本性不足。即使如此，面對戰禍的洗禮，1944 年學徒出陣的李登輝，仍然表現出效忠大日本帝國，願意將死生置之度外的報效國家。這也正可呼應，李登輝的家庭是為「皇民化」教育的典範；岩里政男服從於日本帝國，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但也就是在日本菁英教育的催化下，李登輝積極於知識上的廣泛涉獵與視野開拓，從此過程中接觸日本盛行一時的「唯心論」以及「唯物論」。除此之外，李登輝亦在其精神世界中，不斷探索有關死生意義與自我克制等禪宗思想的課題，並且受新渡戶稻造影響，種下了學習農業知識的前因。於是，國族認同在第一時期，並未是李登輝最為關注的首要大事；這即是在分類上，李登輝的國族認同狀態，呈現出「低強度（日本）認同」，並且是在內涵上屬於日本認同的前遭遇期。

1945 年終戰後，由於一度想要重回日本校園學習，後又因等候回台船期的延宕，李登輝在 1946 年春天才再次踏上已由國民黨政府治理的故鄉台灣。回到台灣之後，李登輝踏入台灣大學校園，繼續其未竟的大學學業。就在返台不到一

年之際，親眼目睹了 1947 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曾經在台大校園中加入「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的李登輝，更因此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躲藏於友人家中。最後雖幸運地逃過大劫，但二二八事件以及隨後而來的「白色恐怖」年代，卻始終不斷地困擾著李登輝的往後生活。

由於國籍的轉變，台灣不再是日本的殖民地，取而代之的，是中華民國政府；李登輝也因此自然並且接受了這一個新的國族認同。即使遭遇到「二二八事件」以及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造成民不聊生的重大衝擊，李登輝依舊割捨了從小建立的日本認同，轉而適應與嘗試學習新的語言、文化、體制，來迎接新認同的必須到來。李登輝於 1949 年與曾文惠結為連理，這是在混亂的時局之中，李登輝有了至為重要的家庭依靠開始；後來亦影響了他虔誠信仰於基督教。

在第二時期之中，李登輝於 1952 年及 1965 年先後兩度赴美留學，不僅使得他在職場上的專業能力因此加分，也因為受到美國自由學風與民主國度的影響，讓他有機會重新思考與檢視自己的國族認同。李登輝也在這段期間，與倡議台灣獨立運動的人士相識並往來，讓李登輝從此不陌生於台獨運動的課題；甚至許多台獨人士更成為李登輝後來人生中多年交好的朋友。

此段期間中，影響李登輝往後人生重要大事尚有：1961 年受洗成為基督徒、1969 年遭受警備總部約談，這些都是李登輝生命史中重要的斷點與記號。但告別日本認同、新誕生中國認同的李登輝，在大環境的壓迫與新建立家庭生活的需要上，李登輝仍舊沒有將太多的心力去思考國族認同的意義所在，而是繼續找尋可依靠的方式，專注在職場上專業領域的表現與追求。於是職涯發展幾乎成為其生命重大重心後，職場上始終不斷面臨「省籍」上的困頓，成為了此一時期李登輝國族認同的重要記號。亦即是「低強度（省籍意識／中國）認同」，並且進入到了內涵上是「中國認同」的前遭遇期。

李登輝於 1971 年加入中國國民黨，並自 1972 年起，展開了他光輝的從政歲月。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台北市長、台灣省政府主席，讓李登輝逐漸擺脫了早年職涯發展上的困頓；搭上蔣經國一手催生的「吹台青」列車，李登輝從一介學

者，逐步成為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中的台灣人要角。但官場順利如李登輝，卻在 1982 年擔任台灣省主席期間，遭逢喪子的家庭巨變，一度讓李登輝萌生退出政壇的念頭，最後依靠基督教信仰的轉念，才繼續留在政壇上服務社會。

第三時期有關李登輝國族認同最重要的標記，當屬於 1983 年李登輝公開於台灣省議會上宣示反對「台灣獨立」的立場，李登輝並因此成為了蔣經國願意託付重任的中華民國「副總統」人選。由於此一時期李登輝的平步青雲，省籍正確扮演了很關鍵的角色，於此，在國族認同狀態上，吾人稱之為「省籍意識」的中國認同，並且讓「低強度」順勢退場；而也正是「中國認同的前遭遇期」。

李登輝在 1984 年成為中華民國副總統、1988 年繼任成為中華民國總統（第一位台灣人總統），並於 1990 年競選中華民國總統；於是第四時期的李登輝，與「中華民國」標籤緊密相連。中間雖然有著 1989 年訪問新加坡出現可接受「來自台灣的總統」稱呼，卻仍舊不會讓人質疑李登輝對中華民國的認同與效忠。於是此一時期李登輝國族認同狀態，呈現出「中華民國版的中國認同」，並且是延續著前一時期的「中國認同的前遭遇期」。

進入第五時期之後，1990 年李登輝透過選舉當選成為中華民國第八屆總統，1996 年更順利贏得台灣史上第一次民選總統的寶座，讓李登輝徹徹底底的掌握了此一時期完全主政的黃金十年。此一期間李登輝運用「登輝式」的寧靜革命，主導國會改革與憲政改革，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萬年國大」退場與國會權全面改選，並實質限縮了中華民國政府的有效治理範圍。

李登輝並且在 1995 年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之際，向國際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重要主張，清楚向世人說明中華民國政府的真實現況。1998 年讓帶有中國意涵的「台灣省政府」虛級化、1999 年更進一步提出「特殊兩國論」，李登輝的中華民國認同漸漸暗淡，而台灣認同悄然發生。也就是筆者所主張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版的台灣認同」，並且亦進入了 Cross 黑人化心理學認同發展中的「遭遇期與沉浸期」之中；遺憾的是，並無法明確地指出單一的遭遇事件。

2000 年之後，成為卸任國家元首的李登輝，讓世人清楚看見他清晰可見的「台灣認同」。李登輝成為了台獨立場鮮明的台灣團結聯盟政黨的精神領袖，並且澈底與過去緊密相依的中國國民黨斷絕關係，主張更改中華民國國號、制定台灣憲法，推動台灣國家正常化，捨棄了中華民國認同、建立了台灣認同。

第六時期的李登輝，是走回體制外的卸任元首早期；沒有國家領導人身分束縛的他，許多過往依存在中華民國體制下的「統一」發言已不復在。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力主台灣成為主權獨立國家的語彙。無論李登輝習慣式的迂迴用語是否準確，此一時間李登輝的各種所作所為，都脫離不了外界解讀其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的既定印象。於是，吾人認為，李登輝的國族認同狀態，呈現著「台灣獨立版的台灣認同」；並且進入到了「內化期」之中。

第七時期，是本研究分類上的最後一個時期。在上一時期進入內化期，完成「台灣獨立版的台灣認同」的李登輝，因為 2007 年對媒體宣稱從未支持台灣獨立的立場，讓我們察覺李登輝的國族認同，進入了「認同循環」當中。在此時期間，我們看到了李登輝更多有關「台灣已經獨立」的說法，李登輝的國族認同狀態，再次產生不同的變化；也就是筆者主張的：「台灣已經獨立的台灣認同」。

在第六時期即已進入「內化期」的李登輝國族認同狀態，即使到了第七時期我們發現了李登輝進入「認同循環」當中，卻依舊不容易影響他已然內化完成的台灣國族認同。換言之，經歷內化期的台灣認同狀態，就很難再退回到「日本認同」亦或「中國認同」之中。就算認同循環中仍舊可能出現前遭遇、遭遇、沉浸與內化各種時期，李登輝完成的國族認同發展，仍然是「台灣國族認同」。

從 1923 年一直走到了 2016 年，李登輝的國族認同發展歷經日本認同、中國認同，最後完成了台灣認同。這是一段長達 93 年的特殊境遇，也是橫跨兩個世紀、在台灣這塊土地呈現最為特殊的風景。或許台灣再也不會遭遇殖民政府的統治，也可能無需再由外來政權治理；但不變其中的，仍然是李登輝所說，台灣人必須建立對自己國家的認同，台灣人才可能真正能夠自主、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

在台灣真正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以前，橫貫李登輝一生的國族認同發展過程，讓我們見識到了台灣國族認同生成與發展的不易，即使貴為國家領導人，仍舊有許多的限制與現實。希望藉由剖析李登輝國族認同發展的過程，能夠帶給熱愛這個美麗國家的台灣人若干的啟發與共鳴。

表 9-1：李登輝各時期國族認同狀態簡表

階段	生命期別	國族認同狀態	Cross 模型期別	附註
一	成長於日治的 童年至青年期(1923-1946)	低強度 （日本）認同	前遭遇期	
二	新國籍誕生的 早期成年期(1946-1971)	低強度（省籍意識 ／中國）認同	前遭遇期	
三	進入國家體制內的 從政早期(1971-1984)	省籍意識的 中國認同	前遭遇期	混淆中的「中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四	浸淫國家體制內的 躍升時期(1984-1990)	中華民國版的 中國認同	前遭遇期	內涵上是「中華民國」的中國
五	國家體制內的 完全制霸時期(1990-2000)	中華民國在台灣版 的台灣認同	遭遇期與 沉浸期	無法明確指出單一的遭遇事件
六	走回體制外的 卸任元首早期(2000-2007)	台灣獨立版的 台灣認同	內化期	
七	卸任元首的 晚近時期(2007-2016)	台灣已經獨立版的 台灣認同	認同循環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二、　可能貢獻與既有李登輝認同研究比較分析

在通透與爬梳整理完李登輝的生命史，並對其各個生命階段劃分出不同類型狀態的國族認同分析之後，我們究竟能夠透過本次的李登輝國族認同研究中，得到哪些以往相近似的認同研究中，尚未展現出的李登輝國族認同研究風貌？而本研究運用的 William E.Cross「黑人化心理學（Psychology of Nigrescence）發展模型」，又帶給我們什麼不一樣的全新視角，藉以俯瞰李登輝生命史中的國族認同流動過程？植基於本研究完成的各階段分析與發現狀態的若干變化，筆者提出以下整理表格，嘗試解說本次研究的最新發現與新的李登輝國族認同發展經過。

表 9-2：生命階段轉換主要成因比較

生命階段轉換	Cross 模型期別	主要脈絡	結果／性質	呈現內容
階段（一）→ 階段（二）	前遭遇期	○	X	○
階段（二）→ 階段（三）	前遭遇期	○	○	X
階段（三）→ 階段（四）	前遭遇期	○	X	○
階段（四）→ 階段（五）	遭遇／沉浸期	○	○	○
階段（五）→ 階段（六）	內化期	○	X	○
階段（六）→ 階段（七）	認同循環	X	X	○

1.註：「○」表示該項目符合改變要素；「X」則表示該項目未符合改變要素。
2.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上述的表格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李登輝各個生命階段的轉換、前進之際，各有著若干不同的影響因素，決定了為何告別過去階段、邁向新一階段的開始，暨而從中看出不一樣國族認同狀態樣貌成因之所在。其中有三個重要的軸線，分別是「主要脈絡」、「結果／性質」，以及「呈現內容」，是本研究在面對李登輝生命階段轉換之際，主要依據與參考指標。透過上述三者各自發展面貌不同，相互輝映整理成在運用「Cross 黑人化心理學發展模型」下，可能得到的具體貢獻。

於此，我們將展開在表 9-2 之中，我們得到了什麼樣的具體成果。在結合與表 9-1 的綜合討論之下，首先在階段一轉換至階段二的生命史分期中，主要的變化，落在時代脈絡的不同，亦即是李登輝的生命史發展，由大日本帝國子民，轉變成為中華民國體制下的國民；國族認同亦從日本認同轉換成為中國認同。但同屬於前遭遇期的「低強度」狀態，則維持不變。

第二，生命史階段二轉變至生命史階段三，李登輝選擇進入國家體制內，開啟了他的從政生涯；原先呈現的「低強度」認同狀態，也由「省籍意識」的標籤所取代。其中維持不變的，是自前一生命階段既已形成的中國認同。接著生命階段三轉變至階段四，李登輝進入了在國家體制中的「躍升時期」，也就是「主要脈絡」的改變；認同標籤亦從「省籍意識」轉換成為「中華民國版」。國族認同狀態則是持續維持中國認同。

第四，在李登輝生命階段進入了「遭遇／沉浸期」之後，是所有生命階段轉換之中，唯一一個三個軸線都產生變化的時期，吾人將其解讀為為何在此之後會產生「台灣認同」的重要關鍵。在階段四轉換至階段五的過程之中，李登輝透過兩次贏得總統選舉的契機，完整掌握了國家主政權長達十年之久；原先產生的「中華民國版」標籤，也變成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版」的標籤。而吾人持續關注的國族認同狀態，亦從「中國認同」轉變成為「台灣認同」。

第五，李登輝的生命史走到西元 2000 年以後，成為卸任元首的他，當然是主要脈絡的重大改變。在此同時，階段五轉換到階段六的過程之中，李登輝的國族認同標籤，亦從「中華民國在台灣版」轉變成了「台灣獨立版」，這是更加具體明晰化台灣認同的重要記號。當然，透過表 9-1 與 9-2，我們同樣可以發現，李登輝的台灣國族認同狀態，自此維持穩定不變。

第六，最後分類的生命史階段六至階段七，依舊是卸任元首的李登輝，在大時代的脈絡下，並無特殊產生的重大變化；國族認同狀態亦是呈現著「台灣認同」。但是此時期有了變化的部分，即是李登輝國族認同的標籤，由原先的「台灣獨立版」轉變成為「台灣已經獨立版」的微調整記號。此一時期亦是李登輝進入「認

同循環」的階段，亦即走過內化期、進入認同循環的台灣認同，將是李登輝國族認同的最終樣貌；無論認同循環未來如何發展，台灣認同都將不會輕易地離開李登輝的心中。這是從「Cross 黑人化心理學發展模型」中，得到的最具體結果。

那麼有了以上的發現與經驗，究竟帶來哪些與以往李登輝國族認同相關研究不同的嶄新面貌與研究新發現？延續表 9-2 的解說，第一個特殊之處，是本研究透過 Cross 黑人化心理學發展模型的應用，至少能夠清楚地區辨「結果／性質」與「內容」兩個面向的不同，與其各自代表的不同意義，這是既有李登輝國族認同研究中，較少探討到的認同狀態分析方法。

第二個可能做出的貢獻，是在本研究中明白指出有關李登輝台灣認同的完全登場，是在「2000 年」以後才真正出現。即使生命階段六（1990-2000）即已出現了「中華民國在臺灣版」的台灣認同，「中華民國」仍是出現在此一時期的認同標籤敘述之中。究其本質，畢竟還是一個守住「中華民國觀」的認同概念，雖然這一「中華民國」已經清楚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完全等於「中國」）分道揚鑣。這也正是為何是本研究分析的進入「遭遇期與沉浸期」的主要原因。

換言之，李登輝的台灣認同並沒有在 90 年代中完全完成，也就是這是一個正在「形成中」的過程。原先具有中國認同的李登輝，開始有了想要改變的想法與作法，只是李登輝並沒有在此一階段即完成「台灣認同」。倚靠著上述的研究發現，我們也能因此更具體地與既有現存的李登輝認同相關文獻，做出若干不同的看法並嘗試與之對話，也希望這是本研究能做出的第三個可能的貢獻。

以下，在眾多有關李登輝台灣認同出現時機的描述中，筆者篩選出分別是 1970s、1980s、1990s，三個年代中，具有代表性意義的敘述，來回應本研究李登輝台灣認同是在 2000 年以後確立的發現，與其他觀點不同的差異所在。首先，在 1990 年代廣為大眾所知的李登輝台灣認同確定，是在 1999 年發生的「特殊國與國關係」論調，部分研究者會說：「之後關於兩國論創造並耕耘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民意，意味著台灣的國家認同轉變就逐漸成形，某種程度上以說體現李登輝在尋求自我，找尋認同過程後的結果被落實之表現」（黃鈺淳 2010：114）。

或許李登輝的台灣認同，在「特殊兩國論」出現時，即十分明顯地浮現；但在吾人的主張下，這並非是台灣認同的完整登場。其他尚有同樣在 90 年代出現相關李登輝台灣認同登場的論述，例如 1995 年李登輝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引發的劇烈風波（台海危機），就有學者引述：「中國當局指李登輝的康乃爾訪問是為台灣走向獨立建國序幕」（蔡石山 2007：290）。蔡石山亦不斷強調李登輝在擔任總統的過程中，「轉變成為一名台灣獨立的運動鬥士」（蔡石山 2007：318）。

另外，也有研究者指出：「李登輝亦從總統時代開始，一直主張台灣的獨立」（黃文雄 2011：169）。加上 1994 年李登輝告訴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司馬遼太郎 1995：524），1990 年代是外界解讀李登輝台灣認同登場的黃金年代。雖然上述的各研究者指稱，都有其主要利基之所在，但本研究更傾向李登輝台灣認同的確立，應是在 2000 年以後登場，更為保守與可靠。

時間再往回推，事實上李登輝台灣認同出現的描述，更不止於 1990 年以後，柯義耕就說：「在擔任省主席期間，李登輝開始覺得自己有責任締造一個獨立、自決、民主的台灣國」（柯義耕 2008：193）。這是敘述 1980 年代時，李登輝台灣認同即早早登場的宣稱，當然也與本研究的發現產生差異。在本研究的分析當中，1980 年代的李登輝，應是呈現著中華民國標籤的中國認同；台灣認同在此時尚未有機會出現，即使能夠稍稍探出頭來，也是到了 90 年代以後，才慢慢浮現。

最後回到最早出現有關「台灣意識」的論述當中，這是出自本研究主人翁李登輝的自述裡頭，李登輝說：「我因為『吹台青』政策被找去，但是沒有被利用。我起碼老神在在，還有台灣意識」（李登輝 2008b：168）。李登輝因為吹台青政策加入蔣經國內閣，是發在 1970 年代，在本研究的分析當中，當時李登輝擁有的「台灣意識」，應更接近吾人指稱的「省籍意識」內容。當時的李登輝是呈現著「中國認同」狀態，與「台灣認同」尚未產生關聯。

透過 William E.Cross「黑人化心理學（Psychology of Nigrescence）發展模型」的應用，讓我們能夠洞悉在不同年代中，抱持若干論調與觀察，讓李登輝台灣國族認同登場的可能性是否成真。李登輝生命史的分階段劃分，與國族認同狀態轉

換的根本原因，亦在此模型運用上表露無遺。據此，企盼本研究做出以上三個可能的具體貢獻，能為前仆後繼的李登輝研究者，提供更為有效的研究分析應用，與進入李登輝國族認同發展過程的全新視角。

第二節 研究檢討與未來展望

一、 研究檢討

有幸行筆至此，看似是這個學位論文研究的即將告終所在，但其實更是必須認真檢討一路以來對於李登輝國族認同研究，許多沒能一一細解的重要元素，做出必要的回顧與反省。以下將概分為五點，做為本研究的自省與檢討，並期望自己在將來進行任何學術研究時，不再有此次過程中留下的遺憾及應避免的錯誤。

第一，宏觀來說，要做一個完完整整的李登輝國族認同研究，必須琢磨的文獻、既有研究成果，乃至於李登輝個人的著作等，都存在著量體龐大的既有事實。囿限於修業年限的緊迫以及在職工作上的無形時間壓力，技術上確實無法逐字逐句的全面檢視與爬梳所有文本內容；這是筆者的第一個力有未逮之處。

第二個要檢討的問題是，主人翁李登輝的一生成就非凡，學問涉獵也慎廣，不管是取得美國康乃爾大學的農業經濟博士，並且學術成就聞名於世的農經專業；或者是李登輝自小培養的廣泛閱讀興趣，直到年老時依舊手不釋卷的熱愛閱讀，若沒有真正跟隨李登輝的腳步，進入他所沉浸的知識書海，許多透過他所呈現出來的末端樣貌，吾人不一定就能片面式的消化理解。

第三則是李登輝接觸了「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日本古文學」、「禪宗思想」、「基督教信仰」等等，每一個面向的背後代表，都有著巨量可觀的論點存在，絕非在書本上看著李登輝自己雲淡風輕的描寫，就能全然理解李登輝的思維與脈絡。好比李登輝一生心心念念的《奧之細道》，若無法如同他身體力行地走進現場體悟，真的無法了解他為何如此感動、心嚮往之所在。

第四，吾人認為，日本教育養成的李登輝，學習過最扎實的日本教育，也說得一口非常流利的日本話；許多李登輝發行的著作，事實上第一個版本也都是以日文版發行，若是往後投入研究李登輝的台灣研究者，能夠具備一定程度的日語能力，將能夠更準確地閱讀有關李登輝第一手產出的日文著作。同時，具有日文能力之後，也定能更加利用日文的思考邏輯，來進入李登輝的世界。

第五，整個研究下來，筆者知道自己的文風非常冗長、贅字煩多，將造成閱讀此論文的人負擔沉重與不便利，向願意閱讀此研究的人致上最誠摯的歉意。筆者也會期許與策進自己，將來若能有繼續做研究的機會，必然好好澈底改善行文的方式，讓研究更加聚焦、貢獻隨之俱進。

二、 未來展望

本研究的核心理論基礎，乃是依靠 William E. Cross 的黑人化認同發展模型，並對照國內學者許維德（2005）對此模型的再詮釋，運用於李登輝國族認同發展階段的分類。但不同於 Cross 表達的黑人化過程，將此發展模型運用在國族認同研究上，會陷入認同狀態中不僅僅存在「黑人／白人」的二元化劃分，更可能出現如同李登輝的「日本認同／中國認同／台灣認同」三種認同以上的差異。

或許在完成最終認同的意義上，所有之前產生的各種認同，都能夠視之為「前遭遇期」之中，筆者同樣是以此種態度來處理李登輝擁有過的「日本認同」與後來出現的「中國認同」。但若是中國認同並非僅止於台灣認同形成前的前遭遇或遭遇階段，而是李登輝台灣認同建構以前，即已確定的國族認同狀態，並且是完成「內化期」的中國認同；那麼在 Cross 的黑人化認同發展模型的定義上，李登輝又何以打破中國認同，出現了嶄新的台灣國族認同？

認同當然不是牢不可破，同時也存在著「流動」的可能；但黑人認同研究，比之國族認同研究，卻有個先天上的不同。在黑人化心理學的認同發展中，研究的標的是作為黑人，如何在生理特徵之外，從內心中找回最真實的自己；但在國族認同研究中，並沒有先天上的生理確定，所有國族認同亦容易因為政治環境與

國家政策走向而產生波動。在 Cross 的黑人化認同發展模型的基礎上，期望將來能有更好的認同理論誕生，以期更加貼近干擾因素繁多的國族認同研究。李登輝的國族認同研究，饒富趣味與別具時代意義，期望未來投身此領域的研究者，能延續與整理 2016 年之後的李登輝生命史；台灣國族認同研究將會更臻完善。

參考書目

丁遠超，1997，《李登輝選戰日記》。台北：中央日報出版。

上坂冬子，2001，《虎口的總統：李登輝與曾文惠》，駱文森、楊明珠譯。台北：先覺。

大陸委員會官方網站，〈本會簡介-成立緣起〉https://www.mac.gov.tw/cp.aspx?n=D0A96AFB69833077，取用日期：2018年12月17日。

王甫昌，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

王妙玲，2013，《「日本精神」和台灣民族主義---以李登輝的武士道觀為考察》。台中：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碩士論文。

王莉菲，2013，《陳芳明國族論述與其自由主義立場的一個考察》。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明珂，1996，〈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34（3）：147-184。

方志賢，2014〈不甩撕裂族群批評 郝柏村重提皇民說〉。《自由新聞網》，12月9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837496，取用日期：2016年9月6日。

文麗，2007，《大陸與台灣報紙對李登輝2007年訪日報導之比較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日本李登輝友の会，2011，〈聯合報：李登輝元総統が『文藝春秋』誌上で「尖閣諸島は日本の領土」と発言したことを批判〉，2011年1月11日。http://www.ritouki.jp/index.php/info/20110111-2/，取用日期：2019年1月16日。

井尻秀憲，2010，《李登輝的實踐哲學》，蕭志強譯。台北：允晨文化。

田麗虹，2002，《總統民選後行政與立法互動關係下的大陸政策—李登輝時期

與陳水扁政府的比較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司馬遼太郎，1995，《台灣紀行：街道漫步》。台北：台灣東販。

正中書局編，1993，《存在.希望.發展：李登輝先生「生命共同體」治國理念》。台北：正中書局。

民主進步黨官方網站，〈關於DPP-DPP黨史-民主進步黨。大事紀〉https://www.dpp.org.tw/about/history_3，取用日期：2018年09月20日。

台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網站，〈學校簡介〉http://www.ttsh.tp.edu.tw/content.php?c=8，取用日期：2018年09月27日。

伊藤潔，1996，《李登輝新傳》。台北：希望。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賴澤涵總主筆，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

李登輝，1989，《愛心與信心：李登輝總統證道見證集》。台北：宇宙光。

_____，1995，《經營大台灣》。台北：遠流。

_____，1996，《細讀李登輝》，章益新主編、許蓉華輯。台北：中央日報出版。

_____，1999，《台灣的主張》。台北：遠流。

_____，2004，《武士道解題：做人的根本》，蕭志強漢譯。台北：前衛出版。

_____，2005，《新時代台灣人》。台北縣淡水鎮：群策會。

_____，2008a，《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一：早年生活》，張炎憲主編。台北：允晨文化。

_____，2008b，《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二：政壇新星》，張炎憲主編。台北：允晨文化。

_____，2008c，《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三：信仰與哲學》，張炎憲主編。台北：允晨文化。

_____，2008d，《李登輝總統訪談錄四：財經專業》，張炎憲主編。台北：允

晨文化。

_____，2009，《最高領導者的條件：領導者的 23 堂課》，蕭志強譯。台北：允晨文化。

_____，2013a，《為主作見證：李登輝的信仰告白》。台北：遠流。

_____，2013b，《二十一世紀 台灣要到哪裡去》。台北：遠流。

_____，2015，《新・台灣的主張》。新北：遠足文化。

_____，2016，《餘生：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台北：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李登輝、小林善紀著，2001，《李登輝學校的教誨》，楊子瑩譯。台北：先覺。

李登輝、中鳩嶺雄著，2000，《亞洲的智略》，駱文森、楊明珠譯。台北：遠流。

李登輝先生畫集編輯委員會，1990，《李登輝先生》。台北：中視文化。

李登輝受訪、鄒景雯採訪記錄，2001，《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台北縣樹林市，成陽。

李靜宜，2001，《近寫李登輝：紅樹林生活筆記》。台北：遠流。

李靜宜，2013，《李登輝外交理念的思維架構與實踐----1995 年訪美行個案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博士論文。

李敖，2000，《李登輝的真面目》。台北：李敖出版。

李孟，2000，《李登輝學校：厚黑教戰手冊》。台北縣汐止市：采竹文化。

李曉莊，1996，《李登輝與女人》。香港：夏菲爾。

李季鴻，2012，《流動的臺灣：陳映真與臺灣左翼文學史觀》。桃園：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宋美慧，2008，《教會課後照顧對國小單親兒童生活適應之影響》。台中：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宛玲，2004，《李登輝總統務實外交政策之研究（1988-2000）》。台北，淡

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建國，2017，《破局：揭祕！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台北：時報文化出版。

林姮妤，2003，《台灣國家認同爭議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柏州，2003，《國民黨政權的台灣化：國家體系轉換的內涵與起源之分析》。台北：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林耀淞，2004，《李登輝與國民黨分裂》。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范正祥、王淑芬，2018，〈扁向李登輝祝壽 賀台灣民主之父萬壽無疆〉。《中央通訊社》，1 月 15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1801150213.aspx，取用日期：2019 年 1 月 14 日。

呂承泰，2014，《兩岸大學生的國族認同：以Q方法論檢視》。南投：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邱定一，1995，《少年李登輝》。台北：商周。

前原志保，2014，《李登輝與台灣認同》。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

施懿珊，2002，《李登輝總統言論之戲劇觀—從柏克戲劇五因語藝觀點分析》。台北：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施茗棻，2010，《嘻嘻哈哈之外：蜜拉希耶爾小說《安妮塔與我》中的南亞/英國認同(Beyond Ha-ha-hee-hee: Negotiating South Asian Identity in Meera Syal's Anita and Me)》。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姚立明，2016，《也許我們沒有共同的過去，但一定可以有共同的未來》。台北：圓神。

胡淑裕，1987，《大眾傳播媒介塑造政治人物形象之研究--孫運璿、林洋港、

李登輝之個案分析》。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秋淑等著，1995，《從源興居到總統府：與李登輝面對面》。台北縣三重市：漢光文化。

柯義耕，2008，《台灣政治家：李登輝》，蕭寶森譯。台北：前衛。

徐淵濤，1990，《替李登輝卸妝》。台北：徐淵濤出版。

高玉芳，1997，《李登輝總統對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言論之戲劇五因分析—以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六年為分析範圍》。台北縣：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景明，2002，《李登輝主政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以國家認同為例》。台北縣：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茂森，1992，《兩千萬人的抉擇：李登輝總統的政治改革軌跡》。台中市：台灣日報。

張永和，1990，《李登輝傳奇》。台北：躍昇出版。

張友驊，1992，《李登輝兵法：李、郝軍權爭奪戰》。台北：新高地出版。

張嘉蘭責任編輯，1999，《李登輝理念的實踐：中央日報 87 年度社論精選》。台北：中央日報。

張正修，1996a，〈第一章 李登輝這個人〉。頁 11-18，收錄於台教會編著，《會診李登輝》。台北：前衛。

_____，1996b，〈第四章 李登輝「憲政改革」的真面目〉。頁 79-106，收錄於台教會編著，《會診李登輝》。台北：前衛。

_____，1996c，〈第四章 李登輝「憲政改革」的真面目〉。頁 79-106，收錄於台教會編著，《會診李登輝》。台北：前衛。

_____，1996d，〈第四章 李登輝「憲政改革」的真面目〉。頁 79-106，收錄於台教會編著，《會診李登輝》。台北：前衛。

_____，1996e，〈第二章 李登輝的「台灣人」立場，貳、李登輝如何利用反對運動與民進黨〉。頁 19-54，收錄於台教會編著，《會診李登輝》。台

北：前衛。

_____，1996f，〈第四章 李登輝「憲政改革」的真面目〉。頁 79-106，收錄於台教會編著，《會診李登輝》。台北：前衛。

商安妮，2013，《1999 年 7 月 9 日李登輝的「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論述：動力、意向與影響》。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

陳鵬光，2000，《李登輝時期大陸政策之研究》。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振盛，1984，《李登輝的小故事》。台北：台視。

陳儀深，2007，〈台灣地位論述的環境因素：談李登輝先生 2006-2007 的變與不變〉。論文發表於「國家定位政策研討會」，台灣安保協會、台獨聯盟主辦、現代文化基金會、亞洲安保論壇主辦，8 月 4 日，台北。

_____，2012，〈關鍵的一九九一：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誕生〉。《思與言》50（2）：33-58

陳明成，2002，《陳芳明現象及其國族認同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博士班碩士論文。

陳逸凡，2010，《神諭或鬼辯：台灣文學史書寫中的差異敘事》。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宛頻，2013，《通譯的國族認同之探討：以皇民化時代戰場通譯為例》。新北：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陳陽德，1995，《奪權：吳梓.李登輝恩怨秘錄》。台北：大村文化。

陳仁公，2013，《中國軍事大戲》。台北：領袖出版。

陳茂雄，2007，〈臺灣主體與殖民地臺灣〉。《台灣獨立建國聯盟》，6 月 14 日。https://reurl.cc/ZKelW，取用日期：2016 年 10 月 28 日。

許維德，2013，《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台灣客家、原住民與台美人的研究》。台北：遠流。

許漢，1993，《李登輝的七十年：李登輝評傳》。台北：開今文化。

郭壽旺，2001，《華府智庫對美國臺海兩岸政策制定之影響---對李登輝總統九五年訪美案例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博士論文。

郭書銘，2010，《消費者之國族認同、國族意識對大陸產品態度影響之研究》。台北：東吳大學國際貿易學系碩士班國際企業組碩士論文。

郭致佑，1999，《李登輝談論兩岸關係議題之論辯分析》。台北：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編輯，2005，《李登輝總統照片集》。台北：允晨文化。

梁婉渝，2015，〈要李登輝道歉 馬英九遭回多念點書〉。《風傳媒》8 月 3 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59719，取用日期：2019 年 1 月 16 日。

陸鏘、馬西屏採訪記錄，2001，《李登輝總統照片集》。台北：天下遠見。

張語羚，2015，〈馬英九要求道歉　李登輝：那說話豪沒的要怎樣？〉。《ETtoday 新聞雲》，8 月 22 日。https://reurl.cc/ry9Kr，取用日期：2019 年 1 月 16 日。

黃邦如，2004，《前總統李登輝的對日觀之研究》。台南，長榮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班論文。

黃鈺淳，2011，《在台灣與中國之間：李登輝的思想脈絡及其中國認識》。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黃少梅，2002，《前總統李登輝卸任後之媒體形象以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三報相關事件報導之分析》。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文雄，2011，《哲人政治家李登輝之「我」》，廖東哲譯。台北：前衛。

彭明敏，1996，〈彭明敏序〉。頁 1-5，收錄於台教會編著，《會診李登輝》。台北：前衛。

彭顯鈞、邱燕玲、張茂森，2008，〈李登輝：釣魚台是日本的〉。《自由新聞網》，9 月 25 日。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245589，取用日

期：2019 年 1 月 16 日。

曾祥鐸，1996，《李登輝批判》。台北縣新店市：中華民族團結協會。

雷鳴，2002，《李登輝甩了我：一位癡情女子的哀怨心聲》。台北：漢斯出版。

楊馨，2018，〈李登輝「空包彈」曝「少康專案」 2 台情報員被捕關 20 年將出獄〉。《中時電子報》，2 月 28 日。https://tube.chinatimes.com/20180521001883-261416，取用日期：2018 年 12 月 25 日。

鄒景雯，2015，〈那一年，李光耀李登輝共評天下人物。《自由新聞網》，3 月 24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865586，取用日期：2019 年 1 月 16 日。

遠藤隆志，1997，《李登輝・民選總統就任前後 3 年間（1994 年 1 月 1 日~1996 年 12 月 31 日）の朝日新聞兩岸報道－考察》。台北，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

維基百科，2015a，〈台灣人口普查〉。《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7 月 20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臺灣人口普查&oldid=36409324，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_____，2015b，〈臺灣對東日本大震災之援助及各界反應〉。《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2 月 5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臺灣對東日本大震災之援助及各界反應，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_____，2016a，〈周子瑜國旗事件〉。《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1 月 16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周子瑜国旗事件，取用日期：2016 年 8 月 16 日。

_____，2016b，〈天然獨〉。《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3 月 21 日。https:// zh.wikipedia.org/wiki/天然獨，取用日期：2016 年 7 月 28 日。

_____，2017，〈蘇志誠〉。《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2017 年 12

月 21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蘇志誠，取用日期：2018 年 12 月 18 日。

_____，2018a，〈中壢事件〉。《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02 月 06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壢事件，取用日期：2018 年 06 月 11 日。

_____，2018b，〈台灣省政府〉。《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08 月 29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臺灣省政府，取用日期：2018 年 09 月 01 日。

_____，2018c，〈台灣人口普查〉。《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09 月 05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臺灣人口普查，取用日期：2018 年 09 月 23 日。

_____，2018d，〈大陸委員會〉。《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12 月 10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大陸委員會&action=history，取用日期：2018 年 12 月 17 日。

_____，2018e，〈1992 年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12 月 15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92 年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取用日期：2018 年 12 月 18 日。

_____，2018g，〈中華民國總統及副總統在臺灣之公民直接選舉與罷免〉。《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4 月 20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中華民國總統及副總統在臺灣之公民直接選舉與罷免&action=history，取用日期：2018 年 12 月 19 日。

_____，2018h，〈1996 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2018 年 11 月 25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96 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action=history，取用日期：2018 年 12 月 20 日。

_____，2019a，〈台灣團結聯盟〉。《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2018 年 12 月 26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台灣團結聯盟，取用日期：2019 年 01 月 09 日。

_____，2019b，〈228 百萬人手牽手護台灣〉。《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2018 年 09 月 02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 228 百萬人手牽手護台灣，取用日期：2019 年 01 月 09 日。

_____，2019c，〈KANO〉。《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2018 年 11 月 19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KANO，取用日期：2019 年 01 月 15 日。

_____，2019d，〈2011 年民主進步黨總統提名選舉〉。《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1 月 12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11 年民主進步黨總統提名選舉&action=history，取用日期：2019 年 01 月 16 日。

_____，2019e，〈奧之細道〉。《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2018 年 9 月 21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奧之細道，取用日期：2019 年 01 月 16 日。

臧汀生，1996a，〈第三章 李登輝的宮廷鬥爭〉。頁 55-78，收錄於台教會編著，《會診李登輝》。台北：前衛。

_____，1996b，〈第三章 李登輝的宮廷鬥爭〉。頁 55-78，收錄於台教會編著，《會診李登輝》。台北：前衛。

劉煒錚，2005，《國統綱領及其影響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劉榮、李欣芳、陳慧萍，2012，〈「最後一次拜託」 蔡英文泛淚光／李登輝站台：台灣交給你們了〉。《自由新聞網》，1 月 14 日。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554145，取用日期：2019 年 1 月 16 日。

蔡石山，2006，《李登輝與台灣的國家認同》，曾士榮、陳進盛譯。台北：前

衛。

蔡羊我編，1990，《愛的推銷員：李登輝的心靈世界》。台北縣永和市：號角。

錢震宇，2002，《檢視台灣報紙兩岸政治新聞的脈絡與演變—以李登輝執政時期為例》。台北，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賴于榛，2015 ，〈痛批李登輝作賤自己、媚日 馬英九怒：向國人鄭重道歉〉。《ETtoday 新聞雲》，8 月 20 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50820/552943.htm，取用日期：2019 年 1 月 16 日。

總統府網站，1996，〈總統就職演說〉。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2070，取用日期，2016 年 11 月 1 日。

簡琬璧，2001，《李登輝的報紙形象-以聯合報及自由時報為例》。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顏振凱，2014，〈看 KANO 李登輝哽咽流淚〉。《風傳媒》，3 月 10 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28411，取用日期：2019 年 1 月 15 日。

藍博洲，2000，《共產青年李登輝》。苗栗縣西湖鄉：藍博洲出版。

羅致遠，2011，《在變與不變之間：客籍作家吳濁流的國族認同》。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蘋果日報，2012，〈「不能沒 92 共識」王雪紅挺馬〉，1 月 14 日。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20114/33959958/，取用日期：2019 年 1 月 16 日。

Anderson, Benedict，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台北：時報文化。

Shu, Wei-der ,2005,Transform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Disaspora:An Identity Formation Approach To Biographies of Activists Affiliated With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h.D. diss., Syracuse University.

附錄一：李登輝年表

時間	時代大事	生命史事件
1923 年	日本在台灣已殖民 28 年	1 月 15 日，出生於台北淡水郡三芝庄埔坪村源興居（現今新北市三芝區）。父李金龍，母江錦，排行第二，上有大哥李登欽。
1928 年	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成立	
1929 年		進入汐止公學校
1930 年	泰雅族原住民反日起義，釀成「霧社事件」	
1931 年		轉學至南港公學校（三年級）
1932 年	日本扶植滿洲國成立	轉學至三芝公學校（四年級）
1934 年		轉學至淡水公學校（六年級）
1937 年	日本發動侵略中國戰爭	進入私立台北國民中學
1938 年		轉學至淡水中學（二年級）
1940 年		改日本名為「岩里政男」
		考入舊制台北高等學校
1941 年	太平洋戰爭爆發	祖母過世
	台灣「皇民奉公會」成立	
1943 年	台灣實施特別志願兵制度	
1943 年	台灣實施海軍志願兵制度	9 月，渡海前往日本，就讀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林經濟學科。
1944 年		2 月，學徒出陣，以在學學生身分加入日本帝國陸軍。
1945 年	日本戰敗，台灣由國民黨政府接收	
1946 年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完成日本資產接收。	春天自日本返回台灣
1946 年		4 月，進入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1947 年	爆發「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府軍隊隨即登台鎮壓，展開「清鄉運動」，台灣人傷亡頗巨	躲避「二二八事件」，興起參加謝雪紅「二七部隊」念頭但沒有成行
1949 年	蔣介石宣佈下野，由李宗仁繼任總統。之後國民黨政府遷台。	台灣大學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
	5 月 20 日，台灣實施《戒嚴令》。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	2 月 9 日，與曾文惠結為連理
1950 年	蔣介石復行視事再度擔任總統	9 月 3 日，長子李憲文出生
	韓戰爆發，美軍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	
1951 年	美國恢復對國民黨政府進行軍事及經濟援助。	
1952 年		獲中美基金獎學金，赴美國愛荷華州立學院研究農業經濟。
		長女李安娜出生。
1953 年		遭遇馬尼拉轉機入境搜身事件
		自美返台。擔任省農林廳技士及經濟分析股股長，並兼任台大農經系講師。
1954 年		次女李安妮出生。
1955 年		擔任合作金庫研究員
1957 年		擔任農復會農經組技士
1961 年		入信基督徒，在聚會所第四會所受洗。
1964 年	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因「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捕。	
1965 年		獲美國洛克菲勒農業經濟協會及康乃爾大學聯合獎學金，前往康乃爾攻讀農經學博士。
1968 年		獲頒康乃爾大學農經博士，論文題目為《農、工間資本移動問題—台灣個案研究（一八九五～一九六〇）》
		回台擔任農復會技正兼台大教授
		泰國學術參訪未能核准成行
1969 年		6 月，被警總約談十七小時後返家，訊問持續一週才結束
		8 月，美國農業經濟學會將李登輝博士論文選為「年度最佳論文」。
1970 年	4 月，蔣經國訪美期間，遭鄭自財、黃文雄行刺。蔣未受傷，鄭、黃當場被捕，後又棄保逃亡。	

1971 年	10 月 26 日，台灣退出聯合國	加入中國國民黨
1972 年	2 月，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發表「上海公報」。	6 月，進入蔣經國行政院長內閣，成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農復會顧問，負責制定重要農業政策。
	6 月 1 日，蔣經國接任行政院長，大力推動「本土化」人才策略。	
	9 月 29 日，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1973 年	蔣經國宣佈「十大建設」計劃，以因應石油危機中的經濟景氣衰退問題，並更新台灣基礎公共建設	
1975 年	4 月 5 日，蔣介石總統於任上逝世，由嚴家淦繼任成為總統，蔣經國則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1977 年	發生「中壢事件」，許信良脫離國民黨當選桃園縣長，「黨外」社團逐漸成形。	
1978 年	5 月 20 日，蔣經國就任總統	出任官派台北市市長，學習日本城市治理方法；但對政治事務如「台美斷交」、「美麗島事件」發生均選擇噤聲，不表達意見
1979 年	1 月，台灣與美國斷交	5 月 3 日，長子李憲文與張月雲結婚。
	中國確立鄧小平主導之「改革開放」路線。	
	4 月，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	
	12 月，爆發「美麗島事件」，憲警人員與支持「黨外」之群眾，在「國際人權日」遊行中流血衝突。	
1980 年	2 月，發生「林宅血案」，林義雄老母與稚女神秘被殺。	率領「中華民國市長友好訪問團」赴美訪問。

	3 月，「高雄事件」軍法大審，施明德、黃信介、林義雄、張俊宏等人於次月宣判刑期。	李安娜與黃循武結婚。
1981 年		李憲文發現罹患鼻咽癌
		出任官派台灣省政府主席，正式擠身黨政高層核心之林
		李安妮與賴國洲結婚。
		8 月 6 日，孫女李坤儀（巧巧）誕生
1982 年		3 月 21 日，李憲文因鼻咽癌病逝，李登輝傷心欲絕，並且有了沒實現的告別政壇、成為傳教士想法
		倡導「八萬農業大軍」，培養「核心農家」。
1983 年		出版《台灣農業經濟論文集》。
		於省議會表達堅決反對台獨立場
1984 年	10 月 15 日，爆發「江南事件」	2 月 15 日，經中國國民黨第十二屆中全會通過提名為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
		3 月 22 日，與蔣經國共同當選中華民國正、副總統
		5 月 20 日，就任中華民國第七任副總統
		蔣經國藉李登輝之手，釋放部分主張台獨的政治受刑人，並成為橋樑
		9 月 12 日，代表蔣經國至南非外交訪問；其後多次代表總統出訪友邦
1985 年	8 月 16 日，蔣經國宣布蔣家人不再任總統	先後率團前往中南美洲烏拉圭、巴拉圭、巴拿馬、瓜地馬拉、哥斯達黎加等國訪問。
1986 年	9 月 28 日，民主進步黨成立	
1987 年	7 月 15 日，台灣解嚴，實施國安法。	9 月 16 日，蔣經國授命領導「新大陸政策特別委員會」，負責台灣外省人回中國探親事宜
	11 月，開放中國探親	
1988 年	1 月，開放黨禁報禁	1 月 13 日，因蔣經國總統任內逝世，依憲法規定繼任總統，成為第一位「台灣人」總統

	1 月 13 日，蔣經國總統逝世	1 月代理國民黨主席，7 月真除為國民黨主席
1989 年	1 月，立法院通過「第一屆資深民意代表退職條例」。	3 月，至新加坡訪問，被稱為「來自台灣的總統」
	5 月，李登輝派遣財政部長郭婉容率團前往中國北京參加「亞銀年會」。	
	6 月 4 日，中國爆發「天安門事件」	
1990 年	3 月，爆發「野百合學運」；學生要求：一、解散國民大會；二、廢除臨時條款；三、召開國是會議；四、擬定政治經濟改革時間表。	3 月，與李元簇搭檔參選中華民國第八屆正副總統並當選
1990 年	5 月 26 日核准郝柏村除役，郝於 6 月 1 日正式組閣、出任行政院長	5 月 20 日，就任中華民國第八屆總統，並簽署「美麗島事件特赦令」，特赦 27 名黨外政治人物
	6 月 28 日，召開召開不分黨派「國是會議」，討論政治改革事宜。	
	8 月，籌設「國家統一委員會」，以超黨派任務編組。	5 月 22 日，上任記者會宣布與李元簇副總統會在六年後退休
1991 年	2 月，制定《國家統一綱領》	
	4 月，啟動憲改工程，並於第一次修憲通過第二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法源；在勸退「萬年國大」退場後，國會全面改選	
	5 月 1 日，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結束與中國的內戰關係，是為「兩個政治實體關係」	
1992 年	2 月 23 日，行政院公布「二二八事件報告書」	
	7 月，修訂《刑法一百條》	
	12 月 19 日，立法院全面改選	
1993 年	2 月 2 日，通過郝柏村內閣總辭案	

	2 月 23 日，李登輝提拔連戰成為第一位台灣人閣揆	
	4 月，首次舉行「辜汪會談」。台灣代表為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中國代表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於新加坡會談。	
	8 月 10 日，「新國民黨連線」出走，趙少康等另組「新黨」，國民黨出現分裂	
1994 年	3 月，中國浙江發生「千島湖事件」。	赴菲律賓、印尼、泰國進行訪問，新聞界稱之為「破冰之旅」。
	7 月 28 日，第二屆國大臨時會通過「總統、副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	司馬遼太郎發表與李登輝訪談實錄，題名為《場所的悲哀》，《自立晚報》翻譯刊登時改題名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美方同意將台灣駐美機構更名為「台北駐美經濟文化代表處」。	前往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南非、史瓦濟蘭等地，進行「跨洲之旅」的訪問。
	12 月，台灣省長、北、高市長人民直選	出版《經營大台灣》。
1995 年	中國江澤民發表對台八點策略，一般稱之為「江八點」	以國家元首身分公開對「二二八事件」遺族道歉。
	李登輝總統回應中國提六項主張，一般稱之為「李六條」	6 月 9 日赴美康乃爾大學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為題發表演講，並多次提到「Repulic of China on Taiwan」，也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7 月起，中國對台實施導彈試射威脅	正式宣佈競選第九任、也是首任民選總統，並提名連戰為副總統候選人。
1996 年	12 月召開國家安全會議會中通過精簡台灣省政府決議	3 月 23 日，與連戰搭檔當選台灣第一屆民選正副總統
		5 月 20 日，就任中華民國第九屆總統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中國。	出席巴拿馬運河會議，並訪問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巴拉圭，同時也與中美洲各國元首舉行高峰會議，倡議成立「策略聯盟」。
1998 年	12 月，台灣省政府虛級化	

1999 年	7 月 16 日宋楚瑜表態參選總統，11 月 17 日國民黨開除宋楚瑜黨籍，國民黨再陷分裂	5 月 20 日，發行《台灣的主張》全球中文版。
	9 月 21 日，芮氏規模 7.2 大地震發生	7 月 9 日，接受外媒「德國之聲」訪問，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
2000 年	3 月 18 日，民進黨籍陳水扁當選第十屆總統	3 月 24 日，遭連戰逼宮，提早辭去中國國民黨主席職務
	5 月 20 日，完成台灣首次和平政權轉移	
2000 年		5 月 20 日，正式成為卸任元首
		5 月 30 日，於淡水台綜院成立「卸任總統辦公室」
2001 年		4 月 22 日，以「赴日就醫」名義，達成在卸任後首次訪問日本的實質目的
		8 月 12 日，協助台灣團結聯盟黨成立，成為該黨精神領袖
		9 月 21 日，遭國民黨開除黨籍
		12 月，成立「群策會」
2003 年		2 月，成立「李登輝學校」
2004 年	3 月 20 日，民進黨籍陳水扁連任成功，當選第十一屆總統	2 月 28 日，發起「牽手護台灣」動，守護本土政權、協助陳水扁拚連任
2005 年	3 月 14 日，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	
2007 年		1 月 29 日，《壹週刊》報導「放棄台獨」說，引發軒然大波
		5 月 30 日，抵達日本進行卸任後第三次訪問，除參訪「奧之細道」外，並至「靖國神社」參拜亡兄李登欽英靈
2008 年	3 月 22 日國民黨籍馬英九當選第十二屆總統	3 月，表態支持民進黨提名總統候選人謝長廷
		9 月 24 日，卸任後第四次訪問日本，強調「釣魚台」主權是日本所有
2010 年		6 月 26 日，參加「反一中，ECFA 要公投」遊行，大批馬英九不再適任總統

2011 年		1 月，接受日本《文藝春秋》專訪重申釣魚台是日本的
		11 月 2 日，進行大腸癌二期切除手術，術後平安
2012 年	1 月 14 日，國民黨籍馬英九連任成功，當選第十三屆總統	1 月 13 日，為蔡英文競選總統輔選站台，表示可能是人生「最後一次拜託」
2014 年	3 月 18 日，爆發「太陽花學運」	3 月 10 日，與妻子曾文惠前往戲院觀看電影《KANO》，淚灑戲場
		9 月，卸任總統後，第六次訪日。
2015 年		7 月，卸任總統後，第七次訪日
		7 月 23 日，在日本舉行記者會再次強調釣魚台是日本的
		8 月，出版新書《新・台灣的主張》
		12 月 15 日，孫女李坤儀完婚
2016 年	1 月 16 日，民進黨籍蔡英文當選第十四屆總統	2 月 1 日，出版《餘生》
	2 月 1 日，國會選出首次民進黨籍立法院正副院長	
	5 月 20 日，蔡英文就任總統	5 月 20 日，見證第三次和平政權轉移

資料來源：

1.李登輝 1999《台灣的主張》、2015《新・台灣的主張》，書中附錄李登輝年表。

2.作者整理製表。

附錄二：李登輝總統就職演說全文（1996.05.20）[160]

各位遠道而來的友邦元首、各位特使、外交團的各位使節、各位貴賓、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姐妹：

今天，我們相聚一堂，在廣大同胞的面前，以莊嚴歡欣的心情，舉行慶 祝就職大會。這個盛會，不僅是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副總統任期的開始，更是國家前途與民族命運嶄新的開端。

今天，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正式邁進「主權在民」的新時代。

今天，中華民族進入一個充滿希望的新境界。

今天，在台灣的我們，以無比的驕傲與自信，堅定地告訴全世界：

我們已經成功地站上民主興革的高峰，且將屹立不搖！

我們已經清楚地證明中國人有能力施行民主制度，運用民主政治！

我們已經有效地擴大了國際民主陣營的力量，對全人類的自由民主，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所以，今天的這個慶典，不是為了慶祝任何一個候選人的勝利，不是為 了慶祝任何一個政黨的勝利，而是為了慶祝我們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追求 民主的共同勝利！是為了人類最基本的價值｜自由與尊嚴，在台澎金馬獲得肯定而歡呼！

親愛的全國同胞們：民主的大門已經全然開啟，民主的活力正沛然奔放。今天最應該接受喝采的是每一位中華民國的國民。

喝采大家思考國家的未來，如此果斷，毫不猶豫。

喝采大家捍衛民主的決心，如此堅定，毫不動搖。

喝采大家面臨強權的威脅，如此鎮靜，毫不屈服。

從此，統治國家的權力屬於人民全體，不是個人、不是政黨。這是「自由意志」的充分發揮，是「主權在民」的完全落實，是真正的「順乎天，應乎人」，真正的革故鼎新。一切的榮耀，歸於所有的人民。

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在這個歷史的新起點，我們要以新的決心、新的作為，開展新的時代。這裡是我們共同的家園，是我們生存奮鬥的根本憑藉。五十年來的禍福相共，已經讓我們成為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體；而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更讓我們確立了以台灣為主體的奮鬥意識。

[160] 出處見：總統府網站（1996）。

如何讓這塊土地更美麗，讓生活在這裡的人民更安全、更和諧、更幸福，是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的共同責任！

「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登輝對全國同胞的需求，有充分的領會，也 一定會全力以赴，達成付託。然而，影響國家發展深遠的重大政策，不是由一個人或一個政黨就可以決定。因此，登輝將儘快責成政府，針對國家 未來發展的重要課題，廣邀各界意見領袖與代表，共商大計，建立共識，開創國家新局。

競選活動雖已結束，但是競選時所作的承諾，一定要切實信守，早日實現。要建設一個現代化國家，有賴各方人才的投入。為追求政局的安定與國力的壯大，登輝認為，政府決策階層的工作，也要不分黨派，不分族群，延攬各界品德良好，能力卓越，見識宏遠，經驗豐富的人才，來擴大參與。

時代已經改變，社會環境也在變。墨守成規，不思突破，注定將被淘汰 。我們不能用權謀的眼光，推度政治互動；不能以私利的考量，決定政治 立場。打鬧不能代表民意，杯葛也並非就是制衡。我們所追求的民主政治理想，除了有效的監督制衡之外，也要力求不同黨派能夠為了民眾福祉，共同攜手奮進。

四年的時光，轉眼就會過去，我們沒有時間可以猶疑，也沒有時間可以等待。為了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為了後代幸福安樂的未來，就從今天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日起，我們要有一個積極的開始。

首先，我們要提升民主運作的廣度與深度。以廣度而言，我們要與海內外所有的中國人及國際人士，分享民主經驗。以深度而言，我們必須推動 第二階段的憲政改革，澄清選舉文化，強化廉能政府，改善社會治安，調整政治生態，落實政黨政治，以確保民主政治的穩定與發展。

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同等重要。沒有成功的經濟發展，我們會失去一切。為了厚植國家實力，讓中華民國能在國際社會，以至未來國家統一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我們必須依據既定時程，如期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並且同步規劃推動跨世紀的國家建設，儘速營造自 由化與國際化的經濟體系，建設低稅負、無障礙的企業投資環境，改革土地制度，壯大中小企業，提升國家競爭力，以迎向互利共榮的亞太新世紀，成為國際繁榮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夥伴。

為求均衡發展，我們也將致力內政的革新，並以司法、教育、文化與社會重建為重點，同步並進。

司法改革首要強化法治精神，尤其要站在人民的立場，落實司法審判的公平，真正做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治精神是民主政治的基礎，如果司法審判不能

受到人民充分的信賴，民主政治勢必受到嚴重的斲傷。司法改革也絕對不能輕忽任何基本人權，包括受刑人及涉訟人在內，均應得到 完整的尊重。對於審檢體系的清廉與效率，更要痛下決心，具體改善。

教育改革的重點，則在實踐快樂、滿足、多元，相互尊重的教育理念，以啟發潛能、尊重人本、發展個性、鼓勵創造為目標，解除不合理的束縛，建立終生學習的制度，讓個人創意與特性有充分發揮的空間，不斷追求自我的成長與實現。我們要導引新生的一代，認識自己的鄉土，熱愛自己的國家，培養寬廣的國際視野，以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地球村」中，順利迎接國際挑戰，開拓國家光明前景。

全國同胞們：中華民族能歷五千年而不墜，端賴優秀文化的維繫。然而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華文化在西方文明的強烈衝擊下，備經危疑震撼，致使部分國人的信心動搖，國勢低落。所以，登輝無時無刻不在思考文化的重建與新生。希望在台灣地區的同胞，能建立新的生活文化，培養長 遠宏大的人生價值觀，並以我國浩瀚的文化傳統為基礎，汲取西方文化精髓，融合而成新的中華文化，以適應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國內外新環境。

這也就是「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的理念所在。環顧世界文明史上的幾個重要文化，大都發源於一個小的地域，中華民族五千年優秀文化，也起源於中原一隅之地，台灣位於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的匯集點，近數十年來，因時局變化機緣，不但充分保存固有文化傳統，並且廣泛接觸西方民主、科學及現代工商業社會文化。再加上台灣的教育水準與發展程度， 遠超越中國其他地區，勢必逐漸發揮文化主導功能，進而擔負起文化「新中原」的重任。

大台灣的經營，不僅在培育新文化，更在重建新社會。隨著政治的民主 開放，台灣社會已呈現蓬勃的多元化景象。我們要運用多元化所釋放的活力，孕育新的社會生命力量，帶動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我們要從基層開始，重振家庭倫理，建立社區意識，確立和諧感通的新社會，使民眾能真正享有家園生活之樂。我們也將從永續發展的觀點，提倡節約簡樸，珍惜現有資源，妥善規劃國土利用，加強生態環境保育，讓後代子孫永遠保有鄉土之美。我們更將本著促進社會和諧與維護人格尊嚴 的原則，加強關懷照顧弱勢團體，並依據財政負擔的能力，循序建立均衡公平、可長可久的社會安全制度，讓全民享有免於匱乏的自由。

當然，我們全心全力在台灣建設中華民國的同時，也不會忘記海外的中國人。我們將盡全力，繼續協助華僑在海外的發展。而港澳地區同胞的生活福祉，更是

我們關懷的重點。我們將隨時伸出相互扶持的手，共同維護此一地區的民主、自由、繁榮。

今天，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生存與發展，已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與尊重。在新的國際秩序之中，講求民主、尊重人權、崇尚和平，拋棄武力是共同遵守的信條，這與我們的立國精神，正相一致。因此，我們將秉持善意，依循互利的原則，繼續推動務實外交，使我們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擁有 必要的生存與發展空間，並進一步在國際社會中獲得應有的尊敬與待遇。

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二十世紀的中國，是一個苦難的國家。先是外患不斷，而後，五十年來，又因意識形態的不同，造成「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悲劇，積累了同胞手足間的對立與仇恨。登輝一向主張，在邁進二十一世紀的前夕，海峽雙方都應致力結束歷史的悲劇，開創「中國人幫中國人」的新局。

因此，六年來，在確保台澎金馬安全與維護全民福祉的前提下，我們無時不以積極主動的作為，務實雙贏的思考，發展兩岸關係，推進國家統一大業。但是，由於中共始終無視於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地區存在的事實，致使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時生波折。

去年以來，為了反對民主，中共對登輝個人發動一波又一波「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的誣衊，但是登輝忍辱負重，不予理會。因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解決不了累積五十年的歷史問題。

為了影響我們第一次民選總統的選情，中共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軍事演習 ，但是我們表現了無比的自制。因為我們知道必須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安定，更重要的是，我們不願意看到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經濟成果，前功盡棄。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的堅忍，不是懦弱。因為我們深信，和平寬容是化解對立仇恨的唯一手段。我們不會受威脅而談判 ，但是絕不畏懼談判。我們主張，只有透過對談溝通，才能真正解決海峽兩岸的問題。

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主權國家。海峽兩岸沒有民族與文化認同問題，有的只是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在這裡，我們根本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採行所謂「台獨」的路線。四十多年來，海峽兩岸因為歷史因素，而隔海分治，乃是事實；但是海峽雙方都以追求國家統一為目標，也是事實。兩岸唯有面對這些事實，以最大的誠意與耐心，進行對談溝通，化異求同，才能真正解決國家統一的問題，謀求中華民族的共同福祉。

今天，登輝要鄭重呼籲：海峽兩岸，都應該正視處理結束敵對狀態這項重大問題，以便為追求國家統一的歷史大業，作出關鍵性的貢獻。在未來，只要國家需要，人民支持，登輝願意帶著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的共識與意志，訪問中國大陸，從事和平之旅。同時，為了打開海峽兩岸溝通、合作的新紀元，為了確保亞太地區的和平、安定、繁榮，登輝也願意與中共最高領導當局見面，直接交換意見。

全國同胞們：今天我們在台灣實現了中國人的夢想！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奮力追求的是，建設富強康樂的新中國，與實踐中山先生「主權在民」的理想。五十年來，我們在台澎金馬的艱苦奮鬥，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完成了世人推崇的民主改革。百年以前，在踏入二十世紀之初，曾被西方國家認定為專制、封建、貧窮、落後的中國人，已經在台澎 金馬地區開創了民主、富足、進步的新局，傲然面對世人的讚譽。這不但是我們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共同的光榮，更是中華民族振衰起敝，再創新機運的關鍵。我們相信，同樣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在台灣做得到的，在中國大陸也可以做到。因此，我們願意以建設的經驗，導引中國大陸發展的方向，以進步的成果，協助億萬同胞改善生活福祉，進而集合兩岸中國人之力，共謀中華民族的繁榮與發展！

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登輝要再度對同胞們給予的信賴，表示衷心的感激。今天，登輝以謙卑嚴肅的心情，在宣誓儀式中，接下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的重任。我充分瞭解這項職務的意義所在，也完全明白其所包含 的責任，我保證將全力以赴，克盡職守，不負國人厚望；同時，也懇求全國同胞真誠、無私、寬容地支持，讓我們能攜手並進，昂然邁向二十一世 紀！登輝深信，在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必能完成和平統一的歷史大業，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善盡更大的心力！

敬祝中華民國國運昌隆！各位貴賓健康愉快！

謝謝大家！

附錄三：李登輝總統在歐林講座問英文版演講稿（1995.06.10）

Always in My Heart

It is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be invited to deliver the Olin Lecture at my alma mater, Cornell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 long and challenging journey, with many bumps in the road, yet my wife and I are indeed very happy to return to this beloved campus.

This trip has allowed both of us to relive our dearest Cornell experiences. The long, exhausting evenings in the libraries, the soothing and reflective hours at church, the hurried shuttling between classrooms, the evening strolls, hand in hand—so many memories of the past have come to mind, filling my heart with joy and gratitude.

I want to thank you, President Rhodes, for your hospitality and for your unflagging support of my visit here to my alma mater.

I thank you, my fellow alumni,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as I undertake this important sentimental journey.

I thank the many, many fri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have been so supportive of my visit to your great country again.

And I also want to thank the people of this academic community, my professors and classmates, for the deep and lasting influence that Cornell University has had on my life. The support each of you has given means a great deal to me.

I deem this invitation to attend the reunion at Cornell not only a personal honor, but, more significantly, an honor for the 21 million peopl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In fact, this invitation constitutes recognition of their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developing their nation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And it is the people of my nation that I most want to talk about on this occasion.

Listening to the People

My years at Cornell from 1965 to 1968 made an indelible impression on me. This was a time of social turbul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rotest. Yet, despite that turbulence, the American democratic system prevailed. It was also the

time I first recognized that full democracy could engender ultimately peaceful change, and that lack of democracy must be confronted with democratic methods, and lack of freedom must be confronted by the idea of freedom before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hasten the day of genuine democracy and freedom. I returned to my homeland determined to make my contribution toward achieving full democracy for our society.

Ever since I becam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88, I have sought to ascertain just what the people of my country want and to be always guided by their wishes. Ancient China's Book of History from over 2000 years ago, contains the phrase, "Whatever the People desire, the realm must follow." My criterion for serving as president is that I do it with the people in my heart. And it is obvious to me that most of all they want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Democracy entails respect for individual freedom, social justice, and a sense of directly participating in the destiny of their n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goes beyond attaining prosperity, it also involves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Today we are entering a new post-Cold War era, where the world is full of many uncertainties. Communism is dead or dying, and the peoples of many nations are anxious to try new methods of governing their societies that will better meet the basic needs that every human has. There are many pitfalls in this search for a new rationale, and Man must strive to make the right choices with all the wisdom and diligence he can command.

Czech President Vaclav Havel said, "The salvation of this human world lies nowhere else but in the human heart." In my heart, I believe that the Taiwan Experience has something unique to offer the world in this search for a new direction.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our experience can be transplanted entirely to fit the situation faced by other nations, but I believe that, without a doubt, there are certain aspects of this experience that offer new hope for the new age.

The Taiwan Experience

By the term Taiwan Experience I mean w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accumulated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successful political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experience has already gained widespread recognition by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is being taken by many developing nations as a model to emulate. Essentially, the Taiwan Experience constitutes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my nation over the years, a transformation which I believe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world peace.

It is worth remembering what w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have had to work with in achieving all that we now have: a land area of only 14,000 square miles (slightly less than 1/3 the area of New York State) and a population of 21 million. My country's natural resources are meager and its population density is high. However, its international trade totaled US$180 billion in 1994 and its per capita income stands at US$12,000. It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now exceed US$99 billion, more than those of any other nation in the world except Japan.

The Taiwan Experience bases peaceful political change on a foundation of stable and continu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Taiwan, under Presidents Chiang Kai-shek and Chiang Ching-kuo, experienced phenomenal economic growth. Currently, aside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Taiwan has been undergoing a peaceful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to full democracy.

For many developing nations, the process of moving to a democratic system has been marked by a coup d'etat, or by the kind of "political decay" suggested by Professor Samuel P. Huntington. In short, it is not unusual for such a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to be accompanied by violence and chaos. However, the case of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is a notable exception. Non-existent is the vicious cycle of expans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lass confrontation, military coup and political suppression, which have occurred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process of reform in Taiwan is remarkably peaceful indeed, and as such is virtually unique. In addition to the "economic miracle," we have wrought a "political miracle," so to speak.

The Taiwan Experience has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as well. In 1994, the indirect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reached US$9.8 billion. Taiwan's indirect investment in southern mainland China, made through Hong Kong, amounted to nearly US$4 billion, according to estimates from various quarters. Taiwan's trade and investment have also been extended to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Vietnam, Russia, and countries in Central America and Africa.

Although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has been excluded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it has accelerated the forma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with economic ties as the key link. Recently, it has even begun to launch a project to build Taiwan into an Asian-Pacific Regional Operations Center, aiming at further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our economy.

I never allow myself to ever forget for a moment that Taiwan's achievements have been realized only through the painstaking effort and immense political wisdom of the people. However, success comes from difficulty, and the fruits of the Taiwan Experience are all the sweeter today from a recognition of the arduousness of the process.

Popular Sovereignty

W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have found that peaceful transformation must take place gradually, and with careful planning. Five years ago, on my inauguration day, I pledged to initiate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period of time. My goal was to provide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a legal framework that is in accord with the times, and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model for democracy. These goals have since been realize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people.

Our constitutional reform was conducted in two stages. First, all the senior parliamentarians last elected in 1948 were retired. Then, in the second stage, comprehensive elections for the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Legislature were held in 1991 and 1992 respectively. This enabled our representative organs 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evel to better represent the people.

Last year, the governor of Taiwan province, and the mayors of Taipei and Kaohsiung, the two largest cities in Taiwan which used to be directly administer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s special municipalities, were directly elected by the people for the first time. Next spring, th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will also be directly elected by the people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the completion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we have established a multiparty system and have realized the ideal of popular sovereignty. This has led to full respect for individual freedom, ushering in the most free and liberal era in Chinese history. I must reiterate that this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s the result of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the 21 million people in the Taiwan area.

Today, the institutions of democracy are in plac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uman rights are respected and protected to a very high degree. Democracy is thriving in my country. No speech or act allowed by law will be subject to any restriction or interference. Different and opposing views are heard every day in the news media, including harsh criticism of the President. The freedom of speech enjoyed by our people is in no way different from that enjoyed by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I believe that the precept of democracy and the benchmark of human rights should never vary anywhere in the world, regardless of race or region. In fact, the Confucian belief that only the ruler who provides for the needs of his people is given the mandate to rul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odern concept of democracy. This is also the basis for my philosophy of respect for individual free will and popular sovereignty.

Thus, the needs and wishes of my people have been my guiding light every step of the way. I only hope that the leaders in the mainland are able one day to be similarly guided, since then our achievements in Taiwan can most certainly help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the cause of democracy in mainland China.

I have repeatedly called on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to end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and to open up a new era of peaceful competi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nd reunification. Only by following a "win-win" strategy will the best interests of all the Chinese people be served. We believe that mutual respect will gradually lead to th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China under a system of democracy, freedom and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To demonstrate our sincerity and goodwill, I have already indicated on other occasions that I would welcome an opportunity for leaders from the mainland to meet their counterparts from Taiwan during the occasion of some international event, and I would not even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meeting between Mr. Jiang Zemin and myself.

Yearning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When a president carefully listens to his people, the hardest things to bear are the unfulfilled yearnings he hears. Taiwan has peacefully transformed itself into a democracy. At the same time, it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ctivities have exerte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its relations with nations with which it has no diplomatic ties. These are no minor accomplishments for any nation, yet,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does not enjoy the diplomatic recognition that is du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is has caused many to underestimate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the Taiwan Experience.

Frankly, our people are not happy with the status accorded our nation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believe tha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ould not be solely seen in terms of formal operations regulated by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e say so because there also are semi-official and unofficial rules that bind the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of nations. This being so, we submit that a nation's substan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to be appreciated in light of such non-official activities as well.

During last year's commencement, President Rhodes brought up the old saying, "Be realistic. Demand the Impossible!" Well, over the last four decades, we have been extremely realistic while always trying to look forward, not backward, and to work, not complain. Accordingly, we have created the very fact of our existence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We sincerely hope that all nations can treat us fairly and reasonably, and not overlook the significance, value and functions we represent.

Some say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break out of the diplomatic isolation we face, but we will do our utmost to "demand the impossible." Ultimately, I know that the world will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is a friendly and capable partner for progress!

If we view the recent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in the ROC in this light, we have a basis for defining the status of my country in the post-Cold War and post Communist era.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propose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new world order as we enter the 21st century.

Close Traditional Ties

I want to once again express how grateful I am to be with you. My gratitude extends not only to Cornell but also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hole. When we look back in history, we can immediately realize how close the traditional tie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re. Indeed, our shared ideals for human dignity, and peace with justice have united our two peoples in the closest of bonds.

The United States was extremely helpful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have never forgotten America's helping hand

in our hour of adversity, so your nation occupies a special place in our hearts.

Today, as the 6th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public of China imports and exports US$42.4 billion worth of goods through our bilateral trade. We also are the number two buyer of US treasury notes. About thirty-eight thousand students from Taiwan are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Students who have returned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our society.

The Republic of China's development has been partly influenced by the experiences of its people while studying abroad. I gained substantial know-how in the mechanics of nati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I worked with here in America at both schools where I studied. I had the chance to see democracy at its b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observe its shortcomings as well. We in Taiwan believe that we have much to learn from an advanced democracy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we also believe we should develop our own model. The success of our democratic evolution has provided tremendous hope for other developing nations, and we wish to share our experience with them. Our efforts to help others throug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ave been well received, and we are eager to expand our technical assistance programs to friendly nation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aiwan has grown from an agricultural exporting economy to a leading producer of electronics, computers and other industrial goods. We are "paving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with disk drives, computer screens, laptop computers and modems. We are poised to become a major regional operations center as well as to buy more American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develop our infrastructure.

We stand ready to enhance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It is my sincere hope that this visit will open up new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I want to publicly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and admiration to President Clinton for his statesman-like decision. We are equally grateful to others in the administration, to the bipartisan leadership in Congress, and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lways in My Heart

Whatever I have done as president of my nation, I have done with the people in my heart. I have thought long and hard about what my people want, and it is clear that most of all, they desire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These wishes are no different than those of any other people on this planet, and represent the direction in which world trends will certainly continue.

As I have spoken to you today, I have done so with the people in my heart. I know that what my people would like to say to you now can be expressed by this simple message:

The peop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are determined to play a peaceful and constructive role among the family of nations.

We say to friends in this country and around the world:

We are here to stay;

We stand ready to help;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haring the fruits of our democratic triumph.

The people are in my heart every moment of the day. I know that they would like me to say to you, that on behalf of the 21 million peop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we are eternally grateful for the support—spiritual, intellectual and material—that each of you has given to sustain our efforts to build a better tomorrow for our nation and the world. In closing, I say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Cornell University,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God bless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ank you very much.

附錄四：1995 年江八點與李六條重點節錄對照表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 1995.01.30 談話	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 1995.04.08 談話
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	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
二、對於台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不持異議。	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雙方領導人藉此自然見面。
三、進行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是我們的一貫主張。	
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絕不是針對台灣同胞，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和搞「台灣獨立」的圖謀。	兩岸均應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
五、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主張不以政治分歧去影響、干擾兩岸經濟合作。	增進兩岸經貿往來，發展互利互補關係。
六、五千年燦爛文化，始終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	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加強兩岸交流。
七、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做主的願望，保護台灣同胞一切正常權益。	
八、歡迎台灣當局的領導人以適當身分前來訪問；我們也願意接受台灣方面的邀請，前往台灣。	兩岸共同維護港澳繁榮，促進港澳民主。